

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
Los años con Laura Díaz
【墨西哥】富恩特斯 著 裴达仁 译

这是墨西哥当今最著名的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的一部力作，讲述了德国移民的后裔劳拉·迪亚斯丰富的生活和精神追求，讲述了她与亲人和朋友们的悲欢离合，以及她所见证的墨西哥的各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通过女主人公的一生和家世，展现了墨西哥这个处在拉丁文化与美国文化交流和冲突的边界地区的国度近百年的风云变幻，揭示了有着特殊历史、文化和种族渊源的墨西哥人民的苦难，他们特殊的生活和特有的内心世界。作品气势恢宏，波澜壮阔，扣人心弦。



ISBN 7-80657-791-2
I·580 定价：29.30元



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

[墨西哥]富恩特斯 著 裴达仁 译

Los años con Laura Díaz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墨)富恩特斯(Fuentes,C.)著;裴达仁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5
(外国文学最新佳作丛书)
ISBN 7-80657-791-2

Ⅰ.与… Ⅱ.①富… ②裴… Ⅲ.长篇小说-墨西哥-现代 Ⅳ.I7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2605 号

登记号 图字:10-1999-092 号

书　　名	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
作　　者	[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
译　　者	裴达仁
责任编辑	陆元昶
原文出版	1999, Alfaguara S. A., España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391 千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791-2/I·580
定　　价	29.3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一

卡洛斯·富恩特斯于1928年11月11日出生于欧洲和印第安两大文明交汇的墨西哥城，祖籍德国。曾祖父因受俾斯麦迫害，远涉重洋来到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种植咖啡。祖父为银行家，后携全家移居墨西哥城。父亲拉斐尔·富恩特斯·博蒂盖尔为职业外交官。卡洛斯·富恩特斯从青少年时代起便随从父母游历了欧美各国。

富恩特斯从小就已显露出文学天赋，他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即在国立智利学院的校刊上发表过短篇小说。1950年，富恩特斯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系毕业，赴日内瓦深造，同时作为墨西哥代表团成员在国际劳工组织工作，开始了外交官生涯，先后出使瑞士、西班牙、法国等地，历任文化参赞、外交部文化关系司司长、驻法大使等职，业余从事文学创作。

1954年富恩特斯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戴假面具的日子》由墨西哥著名作家胡安·何塞·阿雷奥拉创办的当代作家出版社出版。收入其中的《恰克·莫尔》、《特拉克索尔卡索》等作品，在欧化现代文明的“假面具”下流露出的仍是墨西哥人的民族特性，其将印第安民间传说融入故事情节、将

神话与现实融合起来的手法开始引起读者的注意。

1955年富恩特斯获正式律师资格。同年与友人合作创办《墨西哥文学杂志》,提出"有益于民族的文化才能被接受为世界文化"的主张。

1958年,富恩特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问世。这部小说,正如作家自己所言,是"一个城市的传记,一部现代墨西哥的总结"①。对当时的读者而言,《最明净的地区》为他们带来的不仅是一种新的文学风格,而且是一种新的小说模式。其影响之大从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的话中可见一斑:"当领会到在我的周围和在我这一代中间,竟有人以如此自由的方式写出一本小说时,我信奉的一切规律都被轰毁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鼓舞"②。

继《好良心》(1959)、《奥拉》(1962)两部优秀作品之后,1962年,富恩特斯的另一部长篇力作《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出版。通过"复合式心理结构形式"表现主人公阿尔特米奥·克鲁斯弥留之际的内心活动,时而清醒,时而恍惚,过去与现在、梦魇与现实交叠闪现,追忆了他从贫苦农民到军官,投机革命,混迹政界,钻营欺诈的一生,展现出1910年革命前后墨西哥社会的风云变幻。

富恩特斯这一时期的其他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盲人之歌》(1964)、《神圣的地区》(1967)、《换皮》(1967)、《生日》(1969)、《西班牙语美洲新小说》(1969)、《两扇门户的房子》

---

① 转引自林一安为《最明净的地区》中译本所写的前言,《最明净的地区》,徐少军王小芳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5页。

② 何塞·多诺索,《"文学爆炸"亲历记》,段若川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6页。

(1970)、《墨西哥时代》(1971)、《独眼的是国王》(1971)、《我们的土地》(1975)、《堂吉诃德或阅读的批评》(1976)、《水蛇头》(1978)、《遥远的家族》(1980)。上述作品里具有"扇形结构"、包含多种读法的《换皮》和历史与幻想的交响曲《我们的土地》格外受到评论家的重视。

在富恩特斯80年代及80年代后的创作中,首先须提及的是据称带有"女权主义色彩"、由小说梗概改编而成的影视剧《月光下的兰花》(1982)、《美国老人》(1985)、《克里斯托瓦尔·诺纳托》(1987)、《甜橙树或时间怪圈》(1993)。《美国老人》是虚构的历史,小说以描写一位美国作家在墨西哥革命时期的遭遇为线索,反映美墨两种文化的冲突。富恩特斯的后期作品还有中篇小说《康斯坦西亚及其他献给处女的故事》(1989)、长篇历史小说《运动》(1990)、文论集《勇敢的新大陆》(1990)、剧本《黎明的仪式》(1991)等。

富恩特斯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被公认为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胡利奥·科塔萨尔并列的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四员主将之一[①],是使拉美文学走向世界的代表。杰出的文学成就使他赢得了西语世界几乎所有的重要文学奖项:1967年获西班牙简明丛书文学奖,1977年获委内瑞拉加列戈斯文学奖,1979年获墨西哥阿方索·雷耶斯奖,1984年获墨西哥国家文学奖,1987年获西班牙塞万提斯奖。据称他是目前诺贝尔奖呼声最高的拉美作家[②]。

---

① 何塞·多诺索,《"文学爆炸"亲历记》,第84、95页。

② 陈众议,《20世纪墨西哥文学史》,青岛出版社,1999年,第145页。

二

《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1999)是富恩特斯的力作。关于这部小说有评论家写道:“对作家的文学生涯和20世纪末的小说而言,这都是一部具有决定意义的作品,这样说并不为过。”(米盖尔·加西亚-波萨达,《国家报》)。与《最明净的地区》等其他作品相似,书中主人公的命运同墨西哥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小说以劳拉·迪亚斯这位女性为线索,涉及上下六代人的悲欢离合,见证了20世纪墨西哥社会的百年风云,勾勒出波澜壮阔的长篇画卷。作为异时异地的读者,简略地回顾一番有关的历史背景相信对我们会有所裨益:

1876年波菲里奥·迪亚斯将军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1877年5月就任总统,开始长达三十四年之久的独裁统治。经济上大力加强大庄园制,为外国资本敞开大门;政治上,对人民群众进行镇压。1905年布兰科河纺织工人大罢工。1910年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表马德罗号召武装起义。广大农民揭竿而起,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萨帕塔在南方高举“土地和自由”的旗帜,潘乔·比利亚在北方组织了一支贫苦农民的队伍,屡战屡胜。独裁者迪亚斯宣布辞职,流亡海外,马德罗就任总统。他上台后却没有满足工人农民关于民主、自由和土地的要求。1913年韦尔塔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马德罗被捕入狱并被害。北方在卡兰萨领导下,南方在萨帕塔领导下,人民再次起义,奥夫雷贡和比利亚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美国武装干涉失败,韦尔塔政权垮台。

获胜后的革命运动分裂为两派，比利亚在塞拉亚败给了卡兰萨派的奥夫雷贡将军。1914 年宪政主义者卡兰萨执政，1917 年政府颁布了土地法和著名的 1917 年宪法。宪法规定，土地、河流、矿藏属国家所有，实行土改，实施八小时工作制。1916 年比利亚袭击美国村镇哥伦布，潘兴将军讨伐比利亚，入侵墨西哥，次年撤退。1919 年比利亚被卡兰萨手下军人杀害。1920 年卡列斯、奥夫雷贡和韦尔塔联合政变，推翻卡兰萨政权，同年奥夫雷贡就任总统，实行土改，加强工会组织，委派工会领袖担任政府要职，以寻求工人团体的支持。奥夫雷贡卸任后，卡列斯镇压了韦尔塔的暴乱后任总统，继续土改，发展交通事业，兴修水利，支持工人运动，采取反教权主义措施，镇压“教会叛乱”。后期渐趋保守，对美国让步，修改《石油法》。1928 年奥夫雷贡再次当选总统后遇刺身亡。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墨西哥国内经济困难，卡列斯作为实际上的最高领袖，通过名义上的总统对国家进行控制，外交上日益亲近美国。迫切希望迅速改善自身处境的革命者开始腐败。1934 年卡德纳斯当选为总统，将卡列斯流放，六年任期内认真执行 1917 年宪法，进行了一系列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包括积极实行土改，加强全国劳工法，推行国有化政策，先后将铁路、石油收归国有。并将执政的国民革命党改组为墨西哥革命党。1940 年，阿马乔继任总统，政治上向右转。1946 年墨西哥革命党改名为革命制度党。

1946 年，阿莱曼就任总统，积极推动始于二战期间的进口代替工业化进程，政治上排斥左派，加强对劳工运动的控制。美国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到 1964 年已增长到近十三亿美元。迪亚斯·奥尔达斯上台后采取铁腕手段进行统

治，这一时期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两极分化严重，加之古巴革命的影响，政局日趋紧张。

1965 年墨西哥城五十九家医院和四十八家地方医院罢工二十八个月后遭镇压。1968 年又爆发了学生运动，政府采取高压政策对付手无寸铁的群众。国立自治大学和国立理工学院 7 月 30 日成立了全国罢工委员会，提出惩办警察头子、政府承担暴行责任、释放被捕学生和政治犯、解散防暴警察部队、废除宪法第 145 条及附加条文等要求。抗议群众多达四五十万人。10 月 2 日，满载军警的坦克和装甲车包围并袭击三文化广场上集会的群众，造成三百二十五人死亡，两千人受伤，两千余人被捕，即历史上有名的特拉特洛尔科大惨案。

1970 年新总统上台后进行了政治改革，释放被捕师生，经济上试图使更多的人分享发展成果。80 年代墨西哥经济经历短暂的“石油繁荣”后持续衰退，政局不稳，几经调整与改革，90 年代初产生明显好转，但过分依赖外资等一些问题依然存在。

三

在《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中作家富恩特斯又一次将某个特定人物的遭遇与一个国家的一段历史相结合，以小见大，以一总万，所谓“见一叶而知秋”。这里需要提及富恩特斯关于文学与历史的一些观念和想法，他曾说：“每一部小说都必须是历史的产物，都必须建立在历史的基础

上，同时又高于历史。”[①] 富恩特斯借《我们的土地》中一个人物胡利安之口说过：“不要轻信任何人，更不要轻信编年史。因为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为短暂而垂直的时代建立合乎逻辑（而非真实）的轮廓。这里的历史是循环的、模糊的、不可穷尽的（因而也是永恒的）。”[②]富恩特斯看重历史的模糊性，以此来反对一切有意无意中简单、片面地将历史“合理化”的做法，他满怀激情地描写重大历史事件中具体人物的悲欢离合，为白纸黑字的历史提供一种有血有肉的个人版本，致力于挖掘历史中隐藏沉寂的许多声部，在他看来，这些代表着一种更大的真实，其中包含着“昨天的神话，今天的史诗，明天的自由”（《我们的土地》）。

从《好良心》、《最明净的地区》到《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再到《换皮》、《我们的土地》以至更后期的创作，富恩特斯一直进行着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探索。劳伦斯、福克纳、詹姆斯·乔伊斯以及多斯·帕索斯等作家都对他有所影响，这也是许多评论者早已指出的事实。在《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一书中，尽管对景物声、色、香、味的精微描写令人想起巴尔扎克或加尔多斯，过去与现时的交替变幻使人想到福克纳，对人物心理的深邃刻画与洞察会使读者联想到乔伊斯的意识流，然而最吸引我们的已不再是什么令人目眩的新奇技法，也许是步入古稀之年的作家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洗尽铅华的境地，惟有“拉丁美洲式的巴罗克”色彩依然存留，放肆而不失节制，绚丽亦兼备平实，似乎

① 《今日西班牙语小说》，原载《伊维亚美洲杂志》1981年第47期，第31页。转引自《20世纪墨西哥文学史》，第140页。

② 《20世纪墨西哥文学史》，第141页。

非此不能表现墨西哥乃至拉丁美洲丰富深沉的现实。

正如何塞·多诺索谈到《最明净的地区》时所说："富恩特斯……的的确确把目光投向外部、投向社会及社会问题、投向历史和人类学；但是，另一方面，在寻求自我的人生探索方面，他的眼光又转向了内部，投向了正在观察和写作、同时对自己的眼光和写作进行批判的个人。"① 面对20世纪壮观而惨烈的现实，各种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信仰归宿之间的冲突和幻灭，无数个体难以估量的鲜血和眼泪，富恩特斯的文学是一种记录，一种反思和一种"质询"，但却没有回答。

在《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里，将要与读者邂逅的是一段求索与皈依、痛苦与激情、背叛与饶恕的个人心灵史，一部政治、历史、宗教、思想、艺术包罗万象的恢宏史诗，二者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为我们打开了又一扇了解今日的墨西哥与墨西哥人的交流之窗。

富恩特斯熟谙多种西方语言，出于艺术表现的需要，行文中常有法文、德文、英文词汇和墨西哥及拉美方言口语出现，又加上小说涉及墨西哥、美国、西班牙多国历史及各地风物，译文中错谬之处在所难免，敬祈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译者

2002年春

---

① 何塞·多诺索，《"文学爆炸"亲历记》，第32页。

目　　录

第一章　底特律:1999 年

我知道历史,却不知道真相。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谎言。我来底特律是为了拍摄一部关于墨西哥壁画家在美国的电视纪录片。说心里话,我对拍摄这个曾是第一座汽车之城的大都市的衰落更感兴趣。就是在这座城市里,亨利·福特拉开了汽车批量生产的序幕,从此这种机器比任何一个政府都更牢固地控制了我们的生活。

1932 年,墨西哥艺术家迭戈·里维拉①应邀前来装饰底特律艺术学院,当年这座城市的影响力从中可见一斑,而今,1999 年,我在这里,官方名义上是为了完成一部关于里维拉和其他墨西哥壁画家在美国的电视系列片。这部记录片将从底特律的里维拉开始,然后拍摄加利福利亚和达特茅斯的奥罗斯科②,之后派我到洛杉矶寻找一幅西凯罗斯③的神秘作品,以及里维拉的一些失传之作:洛克菲勒中心那幅因为在上面出现了列宁和马克思而备受非议的作品,还有新学院的组画,这几幅大型的镶嵌画同样不存于世了。

---

① 迭戈·里维拉(1886—1957),墨西哥画家。"墨西哥壁画三大家"之一。

② 奥罗斯科 (1883—1949),墨西哥壁画家,与里维拉和西凯罗斯并称"墨西哥壁画三大家"。

③ 西凯罗斯(1896—1974),墨西哥画家。"墨西哥壁画三大家"之一。

这就是我所承担的工作。我之所以坚持在底特律开机,是有原因的。我想摄下一个伟大的工业城市的废墟,作为我们生活着的这个恐怖的20世纪当之无愧的墓志铭:我既不是为了警世,也不想记录贫困和畸形启迪后人,更不是出于人道主义。我是一名摄影师,我既不是神奇的塞巴斯蒂安·萨尔加托①,也不是威严的黛安·阿布斯②。如果我是一名画家,我情愿拥有安格尔③那无忧无虑的透明和培根④内心的痛楚。我曾试图作画,但没有成功。我并没有屈服。我认为镜头是我们这一时代的画笔,我在这里受雇去完成一个目标,但是当前——我预感到——是为了实现另一个全然不同的目标。

我起得很早,想在摄制组到达迭戈的壁画以前做好准备工作。这是2月份的一天,早晨六点左右,我等待着黑暗,我守望着它。然而这漫漫长夜让我心神不宁。

"如果您想购物或者看电影的话,旅馆可以派专车接送。"前台告诉我。

"商业中心离这里不过两个街区。"我又好气又好笑地回答。

"我们可不想担责任!"侍应生虚伪地笑着,他长相平庸,没有什么值得记住。

这家伙不知道我要去很远的地方,要去一个比商业中心远得多的地方。我将无意中到达这满目疮痍的地狱的中心,我快步疾走,把像一面面镜子一样堆聚在一起的摩天大

① 塞巴斯蒂安·萨尔加托(1944—),巴西摄影家。
② 黛安·阿布斯(1923—1977),美国摄影家。
③ 安格尔(1780—1867),法国画家,古典主义画派最后的代表人物。
④ 培根(1910—1992),英国超现实主义画家。1932年转向超现实主义,曾描绘一些极度痛苦的形象。

楼甩在身后,——这是一个为抵御野蛮人的进攻而新建的中世纪的城市——十余个街区过后,我便消失在这片遍布垃圾堆的贫瘠的土地和黑暗的荒野中。

我每迈一步,——由于持续的黑暗,这每一步都是盲目的,因为我惟一的眼睛是镜头,我是一位现代波吕斐摩斯[①],我的右眼贴在莱卡相机的单目镜上,左眼紧闭,仿佛盲人,我的左手前伸,如同一只警犬,摸索着,有时双脚磕磕拌拌,有时深陷进一种闻不到又看不见的东西里,——陷入一个不但持久而且再生的黑夜中,在底特律,黑夜生生不息。

突然,照相机在我胸前跳了一下,我感到光圈干涩的撞击——这里有两个光圈,一个是我的,另一个是莱卡相机的——我的感觉更加深刻了,笼罩着我的并非冬日黎明前的漫漫长夜;想像使我懂得,那也不是新生的黑暗,白昼不安的伴侣。

这是持久的黑暗,与城市不可分离的黑暗,是它的伴侣,它忠实的反映。我兜着圈子在一片灰色的旷野中央沉思,那里水洼遍布,胆怯的步履踏出转瞬淹灭的小径,光秃的树木比战后的景致更加幽暗。远方,荒废的房子幽灵般若隐若现,上世纪的住宅屋顶破烂不堪,倒塌的烟囱,残破的窗户,斑驳的门廊,支离破碎的大门。有时,一棵干枯的树木温柔又轻佻地挨近满是尘垢的天窗。一把摇椅孤独地摇摆着,发出伊伊呀呀的声音,使我隐约想起了记忆中的其他时刻……

这孤独的田野和寥落的山丘,重现了我学生时代的记忆,我的双手拿起相机,而我思想的相机在咔嚓咔嚓回放

① 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

着，墨西哥城，因河而闻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因海而闻名的里约，混账的加拉加斯，可怕的利马，没有神圣信仰的波哥大，和无可救药的圣地亚哥[1]，在这个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在这个汽车之都，密歇根州的底特律，这个流水作业与最低工资的摇篮，就在此刻，我拍摄着我们拉丁美洲城市的未来。一切都是我拍摄的对象，一辆辆旧车被遗弃在最为荒凉的牧场里，突然出现的街道洒满了碎玻璃片，零售店闪烁的灯火……那里卖的是什么？

在这座巨大漆黑的坟墓中，这些惟一光明的角落里卖的是什么呢？带着几分疑惑，我走进了一家小店，想买一杯冷饮。

像天色一样灰暗的一对夫妇看着我，他们的眼神里交织着嘲弄、顺从与邪恶的好客，他们问我要什么，并且告诉我，这里什么都有。

我有点不知所措，也许这是一种习俗，但我还是用西班牙语要了一杯可乐[2]，他们愚蠢地笑着说："我们迦勒底人只卖啤酒和葡萄酒，"男人说，"可不卖毒品。"

"还卖彩票。"那女人补充说。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回到旅馆，换下那双被忘却的污秽弄脏的鞋子，我看看表，就要开始第二天的拍摄了。摄制组在大堂里等我。准时不仅是我的好名声更是我服众的法宝。我一面穿衣，一面看着窗外的风景，在底特律，这个既属于基督又属于真主的城市，阳光照在摩天大楼和清真寺

---

① 原文中连续出现了数处双关语，如"河流(rio)"与"里约(Rio)"，"混账(carajo)"与"加拉加斯(Caracas)"，阿根廷、智利、古巴都有叫作"圣菲(Santa Fe)"的地方，这一地名的字义即"神圣信仰(fe santa)"。

② coca亦可指可卡因。

的顶部。世界的其他部分依旧沉浸在茫茫黑暗之中。

我们的摄制组来到了艺术学院，首先，我们穿过了那片无际的荒野，荒野上街区连着街区，时而可见维多利亚式建筑的废墟，在城市沙漠的尽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它的中心）有一座建于世纪初的宏伟建筑。她保存完好，宽敞整洁。顺着宽阔的石头阶梯拾级而上，穿过玻璃与金属的大门，便可以进到内部。它仿佛是充盈着不幸的匣子里的一卷幸福的弥撒经文，她是一位老人，肃然而又欣悦，因为她比自己的所有后代都长寿，她是无泪的拉结①，这就是底特律艺术学院。

高高的天窗遮掩下巨大的中央庭院，正是一场花卉展览的舞台。今天早上，这里就挤满了观众。“这么多花，是从什么地方运来的？”我问摄制组里的一位美国佬。他耸耸肩，算是给了我一个回答，看也不看那些争芳斗艳的郁金香、菊花、百合和黄昌蒲。这些花卉摆在庭院的四周，而我们正好从此匆匆而过。影视是这样一种工作，一旦剪辑的铃声响起，就要立刻丢下。不幸的是，以此为生的人们无法想像还能用他们的生命做其他的事情，只能日复一日地拍摄……我们是来工作的。

里维拉，迭戈，迭戈·马利亚·德·夸纳华托，迭戈·马利亚·康塞普西翁·胡安·涅波穆塞诺·埃斯塔尼斯拉奥·德·拉·里维拉·伊·巴利恩托斯·阿科斯塔·伊·罗德里格斯（1886—1957）曾经生活在这里。

请原谅我笑了，这是善意的笑，是出于认同和思乡的无法抑制的哈哈大笑。为什么笑呢？我想笑的是失落的天真

---

① 圣经人物。《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八节：“在拉玛听见号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和对工业的虔信;由于工业的发展,进步、幸福和历史才能相辅相成。里维拉已经在底特律歌颂过了这一切荣耀。中世纪的那些无名的建筑师、画师和雕刻匠人为歌颂惟一的、永恒的、无可质疑的上帝而修建和装饰了宏大的教堂,里维拉满怀着信仰来到了底特律,就像古时的朝圣者去往坎特伯雷和康普斯特拉一样。我笑了,因为这墙壁就像卓别林的黑白片《摩登时代》里面活动舞台的彩色明信片。同样是光洁如镜的机器,同样是严丝合缝的齿轮,在马克思主义者里维拉看来,这些可靠的机器是进步的可靠的象征,而在卓别林看来,这些机器就像是吞咽的咽门,如同铁胃一样吞食了工人,最后,再把他们像粪便一样排泄出来。

这里却不同。这里曾经是一首工业的田园诗,是里维拉在30年代所认识的那个富有城市的写照,当时底特律给大约五十万工人提供了工作和体面的生活。

这位墨西哥的画家又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呢?

这幅壁画里有一种很奇怪的东西,画面充满了人的形象,犹如蚁群。机器光洁蜿蜒,没有尽头,就像一根缓缓地爬向现时的史前生物的肠子。我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了这奇怪的感觉的缘由。我感到由创造性的发现带来的不安和激动,而在电视工作中,这一点是极不寻常的。我在迭戈·里维拉的壁画前停住了脚步,里维拉依附于他的赞助者,就像我依附于我的观众一样。然而,他却敢嘲笑他们,在资本主义的堡垒里,在他们的鼻子尖下,他插上了红旗,歌颂了苏联的领袖。而我正相反,审查和丑闻都和我无关,观众决定了我的成功和失败,如此而已。咔嚓,愚蠢的盒子关上了。现在,这些赞助者已经消逝了,谁还在乎他们呢!谁又会记得自己一生中看过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电视剧呢?

但是站在这幅如此出名的壁画面前,这奇怪的感觉使我无法平静,更不能随心所欲地拍摄。我上下打量着,借口要选取最好的角度,最好的光线,摄影师们很耐心,他们尊重我的努力,直到我最终一锤定音。迭戈·里维拉所画的所有的美国工人都背对着观众。艺术家只画工人的脊背,除了那些为了防止受到焊花伤害戴着玻璃面具的白人工人。美国人的脸是匿名的。他们一个个都戴着面具。美国人这样看待我们墨西哥人,里维拉也如此看他们。只有脊背,不知姓名,没有面孔。因此,里维拉不笑,他不是夏洛特,只是一位敢于告诉美国人你们没有面孔的墨西哥人。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告诉他们,他们的工作既没有名字又没有面孔,他们的工作不是他们自己的。

那么,又是谁在看着观众呢?

黑人。他们有面孔。1932 年,里维拉前来绘画的那一年,他们有面孔。那年,弗里达[①]住进了亨利·福特医院,而里维拉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他执意将圣家庭画在壁画里。当时,弗里达怀孕了,但不幸流产。在画里,里维拉没有画圣婴,而是画了一个布娃娃,鹦鹉、猴子、鸽子、一只猫和一只鹿参加了孩子的洗礼。在画中,里维拉不让美国人正面朝向世界,是想嘲笑他们还是对他们心怀恐惧?

艺术家永远不会知道观众所知道的事情。我们了解未来和里维拉的这幅壁画,他敢正视黑人的脸,黑人也敢正视我们,而他们的拳头并不只是为福特制造汽车。里维拉不知道这一切,他只是凭直觉在 1932 年画了这些黑人,而他们在 1967 年 6 月 30 日——这个日子被铭刻在城市的心脏里——放火,抢劫,烧光了城市,为停尸房留下了四十三具

① 弗里达·卡罗(1907—1954),里维拉的妻子。墨西哥著名画家。

尸体。难道这四十三位未来的死人才是壁画中惟一正面看着的人？1932年，他们被迭戈·里维拉画在了壁画上，1967年，在画家死后的第十年，在他们被画入壁画四十五年后，他们消失。

猛一看，你能见到的只是一幅壁画，而它的实质需要一种深远而又耐心的目光。这种欣赏不能停留在壁画的空间里，而是要延伸到无限。这壁画有着一种外延，凝住了画中人物和观众的目光。我觉得有点怪异，不得不将目光投到壁画之外再突然折回，好像电影全景镜头箭一般猛然切入，转向女工们脸庞的特写，短发和工作服使她们变得男性化，但毫无疑问，她们是女性。弗里达就在其中。然而她的同伴，画中的另一位女子，她有着线条犀利的五官，与她高挑的身材相得益彰，她的目光忧郁，眼眶幽深，她的嘴唇很薄，却又很性感，稍纵即逝的唇线仿佛宣告着一种绝对而充分的优越，不着口红，节制并因此活力无穷，在说话、吃饭、爱恋中都充满了神秘。

我看着这双欧洲和墨西哥混血的金色的眼睛，很多次我在一张护照上也是这样地看着这双眼睛，而那张护照和放护照的抽屉已经同样被人遗忘。我看到的这双眼睛和在我年轻的父亲——他在1968年10月被暗杀——家里四处丢弃的照片上的眼睛一模一样。我那死去的回忆不认识这双眼睛，而我鲜活的记忆却把它们珍藏在灵魂的深处，三十年后，我快要满三十四岁了，20世纪也正在渐渐地离我们而去，我颤抖地看着这双眼睛，涌起了一种几乎是神圣的惊慌。见到我如此的失态，我的同事们不由得停了下来，来到我面前，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我回忆起了什么？我看着这位工人打扮，美丽而又奇特的女子的面容，我一看到它，所有的回忆，记

忆或所谓生命里的特殊时刻，一齐涌进了我的脑海，它们就像波涛汹涌的海浪，仿佛一片汹涌肆虐的海洋，层层波浪永远雷同却更迭不休。我刚刚看过劳拉·迪亚斯的脸，这张暴露在墙上芸芸众生中的脸，是一位孤独的女性的脸，她的名字叫劳拉·迪亚斯。

摄影师泰瑞·霍普金斯，我的一位老朋友——尽管他还很年轻——给壁画打上了最后一抹蓝色的灯光，仿佛在与它作别，——泰瑞是一位诗人，他的照明光线与 1999 年 2 月这一天夕阳西下的实景浑然一体。

“你疯了吗?”他对我说，“你要走回旅馆?”

我不知道自己看他的表情是怎样的，但我没再说什么。我们分了手，他们背起讨厌而又昂贵的摄影器材，坐着汽车走了。

我一个人待在底特律，这座卑躬屈膝的城市。我慢慢地走着。

我充满了一种青年手淫的疯狂，自由自在地四处拍着照片，我拍摄黑人妓女和黑人女警察，我拍摄头戴破帽、衣衫褴褛的黑人孩子，我拍摄蜷缩于垃圾箱——街头暖气——里的老年黑人，我拍摄那些荒废了的房子——我觉得我进入了所有的房子——那里居住着一些无家可归的穷人，我拍摄那些瘾君子，在角落里，他们把快感和污秽注入体内，我懒散而又无耻，挑衅般地拿着照相机拍摄着每一个人，好像我正走在一条漆黑的走廊之中，而那个看不到的人不是他们中的一员，而是我自己，突然之间，对一位女子的柔情、思念和亲密一齐向我袭来，我一生从不认识这位女人，而此刻却充满了对她的各种回忆，她的无意识，她的意志，她的天赋和她的危难：记忆同时是对家的排斥和对家的

回归;与敌人的鲁莽遭遇和对巢穴的怀念。

一个人手拿火把,呼喊着走过废弃房屋的走廊,点燃了所有可燃的东西;我的后颈被打了一下,倒在了地上,我看到一幢孤单的摩天大楼在患黏膜炎的天空下昂首挺立;我触摸到了夏天的燃烧的热血,尽管它还未到来,我喝下了无法洗净黑色皮肤的眼泪,我听到了清晨的喧闹,却听不见渴望的寂静,我看到孩子们在废墟中玩耍,我检视着这座躺卧的城市,毫不愧疚地给它下了断言;砖与烟的灾难,城市的燔祭,无人居住的城市的诺言,压迫着我的全身。在这座空城里,人类无家可归。

我倒在地上问自己,能否像一位逝去的女子那样生活,发现她记忆的秘密,并回忆起她所能回忆的一切吗?

我看到了她,想起了她。

她是劳拉·迪亚斯。

第二章　卡特马哥:1905 年

有的时候,回忆是可以触动的。这个家族中最被人津津乐道的传说与科西玛·克尔森祖母的一次勇敢行为有关。那是在遥远的 1870 年,她前往墨西哥城为维拉克鲁斯的家购置一些家具和装饰品。回来的路上,乘坐的马车被一伙强盗劫持了,这伙散兵游勇打扮得花里胡哨:头戴宽檐礼帽,身穿岩羚羊皮的短外套和带幅的裤子,脚踏马靴,马刺带响。所有人身上的纽扣都是古银制成的。

科西玛·克尔森更喜欢回忆这些细节,而不是讲述事情的经过。但无论如何,当这件逸闻被重复多次之后,当它从一个人的手中传到另一个人的手中(因为这是一个关于手的传说,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关于手指的),它变得越来越精彩,越来越难以置信,越来越离奇,尽管也越来越广为流传。

马车是在一个名叫"佩罗特"的奇特的地方被劫持的。在这里,旅人们不是迎着海雾上山,而是从明净的高山上下来,来到一个浓雾氤氲的湖边。这伙强盗就是在浓雾的掩护下,在马匹的嘶叫声中和手枪的射击声中突然出现的。一般的强盗会问"要钱还是要命",可是这一伙强盗却别出心裁,问"要命还是要命",仿佛他们忽然理解了年轻的堂娜科西玛向他们展现出来的令人仰视的高贵和摄人心魄的尊严,那是他们所没能表现出的。

她对他们不屑一顾。

强盗头子曾是战败的马克西米利安[1]帝国军队的军官。他曾无数次地在查普特佩克宫殿边巡逻,因而练就了区分各种社会阶层的本领。尽管他在维拉克鲁斯地区以好色闻名——他的外号叫“帕潘德拉的美男子”——但他准确无误地区分出一位夫人和一个荡妇的能耐也同样出名。他是前骑兵部队的军官,现在却已沦落为一名强盗,这是因为帝国倒台了,马克西米利安,米拉蒙[2]和梅希亚[3]被枪毙了。“三个 m[4],真见鬼”,这位迷信的墨西哥军官不时发出这样的感叹,然而,他对贵族妇女的尊敬,却是发自天性的,面对年轻的新娘堂娜科西玛,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一双明亮如蓝宝石的眼睛,之后是她那招摇地放在车窗上的右手,这个强盗头子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

“对不起,夫人,请把您的戒指给我。”

科西玛挑衅般露在外面的手上,闪耀着一枚金戒指,一颗炫目的蓝宝石和一枚珍珠戒指。

“这是我的订婚戒指和结婚戒指。除非你砍掉我的手。”

没有太多的迟疑,好像双方都非常了解这捍卫荣誉的程序,令人生畏的前帝国军官动手了:他一刀切掉了堂娜科西玛·克尔森右手四根纤长的手指。她毫不抵抗。野蛮的

---

① 马克西米利安(1832—1867),奥地利大公,后被拿破仑三世选为墨西哥帝位候选人,1864 年成为墨西哥皇帝,1867 年被枪决。

② 米盖尔·米拉蒙(1831 或 1832—1867),墨西哥保守派将领。1859 年 2 月被推为保守派政府临时总统。曾流亡欧洲,与拿破仑三世商议在墨西哥建立君主制。1863 年回国,1867 年 5 月被俘,同年 6 月被枪决。

③ 托马斯·梅希亚(1820 或 1823—1867),墨西哥将军。1867 年 6 月,与马克西米利安和米拉蒙同时被处决。

④ 指三人姓名第一个字母。

前帝国军官摘下按照军队的传统绑在头上的红色头巾，把它递给了科西玛，让她包扎一下伤口。他站在那里，任四根手指落到帽盔里，好像接受施舍一样，拿着这位美丽的德国女郎的四根手指。当他重新戴上帽子的时候，鲜血顺着他的脸流了下来。对他而言，经受这红色的沐浴就像别人在湖里扎个猛子一样自然。

“谢谢，”年轻貌美的科西玛说，同时，看了他一眼，也是惟一的一眼，“您还要别的吗？”

“帕潘德拉的美男子”向身边最近的马的后臀抽了一鞭，算是对问话的回答。马车的轮子慢慢地向山下滚动，朝着浓雾笼罩的高山后边的维拉克鲁斯驶去，那片滚热的土地才是她的目的地。

“谁也不许再给我碰这位夫人。”他对他的同伙说。他们明白这是生死攸关的命令，同时他们还知道，他们的头儿从那一刻起，或许是永远地坠入了情网。

“如果他爱上了外婆，那为什么不把戒指还给她呢？”劳拉·迪亚斯问，那时，她才刚刚学会思考。

“因为他没有对她的其他纪念。”希尔达姨妈回答说，她是科西玛·克尔森所生的三个女儿中年龄最大的。

“那么，那些手指头呢？”

“孩子，这些是不能说的。”年轻的二姨妈堂娜维尔希尼亚气冲冲地回答，放下了手中的书。每个月她都要读上二十本，并且以此为荣。

“小心那些吉卜赛人。”庄园的厨娘操着浓浓的沿海口音，总是吞掉了 s，“他们把小孩的手切掉做肉饼吃。”

劳拉·迪亚斯看了看自己的手，这双小手，她伸出手，像弹钢琴似的顽皮地动着手指。然后，她把手藏在蓝格子的校服罩衣下，越发恐惧地注视着各个手指在房间里的活动，仿

佛所有的人，无时无刻不在实践着“帕潘德拉的美男子”对外婆堂娜科西玛做过的事，那时的她年轻美丽，刚刚来到墨西哥。希尔达姨妈怀着一种被掩饰的热情，弹奏着一架斯坦威钢琴。它经过了一番长途跋涉从新奥尔良抵达维拉克鲁斯港口，不过据一些旅客的观察和向克尔森小姐的讲述，由于从路易斯安娜到维拉克鲁斯的一路上海鸥一直陪伴着轮船，也许是在陪伴着钢琴，这一旅程就显得不那么遥远了。

“妈妈当时要是去新奥尔良买嫁妆就好了。”[①]维尔希尼亚姨妈用半是炫耀半是批评的语气说了这些话，对她来说，把各种语言混杂在一起就像把各种读物混在一起那样自然，以无可厚非的方式挑战父亲的意愿也一样是家常便饭。新奥尔良，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离维拉克鲁斯最近的文化和商业中心，当年，年轻的自由主义者贝尼托·胡亚雷斯[②]被瘸子圣塔安纳[③]的独裁政权流放到这里，在一家工厂里卷古巴雪茄；而当胡亚雷斯这个丑陋的印第安人打败了法国人，并下令枪杀了英俊非凡的哈布斯堡家族的马克西米利安后，有没有发行什么纪念徽章呢？

“别忘了，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墨西哥的时间比任何人都长。没有比墨西哥更奥地利化的地方了。”维尔希尼亚一边读着写着，一边对她最小的妹妹，就是劳拉·迪亚斯的母亲雷特西亚说着话。对于雷特西亚来说，帝国的种种传闻与她惟一的关注点，她的家庭，她的女儿，她的日常生活，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

① 此句的原文中混有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词。

② 贝尼托·巴勃罗·胡亚雷斯（1806—1872），墨西哥总统。

③ 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塔安纳（1794 或 1795—1876），墨西哥总统，独裁者。1855 年流亡国外。

希尔达灵巧的双手弹出一串忧伤的旋律,她弹的是肖邦的一支序曲,她最喜欢的一支曲子,这音乐给这所建在热带湖畔山间的简朴的大房子增添了几许悲伤,真实的、回忆的或未来的悲伤。

“要是我们生长在德国,我们的境遇会不会不同呢?”希尔达若有所思地问。

“当然了,”维尔希尼亚急忙回答:“要是我们生长在中国,我们会更不同的。就会有很多的中国古玩,我亲爱的”。

“难道你就不思乡吗?”希尔达对她的小妹妹雷特西亚说。

“什么呀,我可没去过那儿,只有你去过。”维尔希尼亚抱怨地打断了她,尽管她问的是劳拉的母亲雷特西亚。

“家里还有好多事要做呢。”雷特西亚结束了谈话。

与西班牙遗留在新大陆的所有乡间别墅一样,这座房子只有一层,以天井为中心,周围有四堵墙,餐厅、客厅和卧室的门向天井开着。光从门厅射进内堂,外墙上没有孔隙,仿佛是为了抵御突然的袭击和永远遮蔽屋里的羞耻。

“我们日子过得好像印地安人、英国海盗、或是黑人叛乱者就要来攻打我们一样。”年轻的维尔希尼亚姨妈调笑着说:“拿起武器。”

然而,人们有时也会感谢羞耻。一群短工来到庄园收咖啡,他们好奇心强,缺乏礼貌,有时喜欢顶嘴,还想攀高枝儿。维尔希尼亚用掺杂着拉丁语的西班牙语回骂他们,拉远了同他们之间的距离,这位黑眼睛、白皮肤、薄嘴唇的年轻女郎好像是一位生活在湖的另一畔的巫婆。

要进入主人的房子,得像客人那样从大门进去。厨房的后部对着畜栏、马厩、酒窖和田野,而正面朝向磨房,下水道,放置锅炉及各种挖取果肉、发酵、清洗和烘干设备的院

子。在这座名为"女朝圣者"的庄园里没有多少牲畜，只有五匹带鞍的马，十四头骡子和五十头其他的牲口。它的创建者费利佩·克尔森给它取了这样一个名字来纪念科西玛，他勇敢而残疾的妻子。幼小的劳拉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她从不涉足外公统治的这片土地。外公纪律严明，从不抱怨，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引证，由于咖啡很娇弱，种植咖啡需要的劳力成本高昂，并诉说着自己事业的多舛。因此，堂费利佩总要精心地修剪枝条，保持必要的阴凉以促进生长，修剪咖啡树，分离新芽，清扫场地并维护晒干设备。

"咖啡可不像甘蔗，栽在哪里都能疯长。咖啡需要呵护。"庄园主堂费利佩，磨房、马厩、马车和著名的晒干机的忠实守护者，几乎无时无刻都这么说。他一天的时光，一半用来细心地关注田里的活计，一半用来同样细心地关注账目。

幼小的劳拉对这一切不感兴趣。她喜欢看庄园延伸在种植咖啡的山峦之间，山的后面，丛林和湖泊重合在一个仿佛是禁区的地方。小劳拉登上晒台，极目远眺，远方，湖水像涂了水银一样明净，爱读书的维尔希尼亚就是这样说的。劳拉不想考虑为什么最美丽的地方总是那么遥远。小女孩伸出手想摸一摸，仿佛全世界都给了她力量，但是太遥远了。她童年全部的快乐就是沉浸在想像里。一方湖，一首诗。

客厅里传出一支序曲的忧伤旋律，劳拉感到有点难过，但一想到能够与拥有十只通晓音乐的手指的大姨妈，一位美丽而又孤独的女子分享同一种感觉，就又高兴了起来。

一群工人正在外公兼庄园主堂费利佩·克尔森的吩咐下粉刷墙壁，他们的手被石灰、石块和龙舌兰汁液的混合物泡得湿乎乎的。然而墙壁却现出一种裸露女子背部的光

洁。在堂娜科西玛去世前一天，堂费利佩对他那病入膏肓，精神却始终矍铄的妻子说：

“每一次我触摸到屋里墙壁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的手指抚摸你赤裸的背部，你美丽精致的赤裸背部的感觉，你想起来了吗？”

第二天早晨，外祖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她的丈夫终于实现了堂娜科西玛一生都在抗拒的事：在她缺少四根手指的右手上，戴上了塞满棉花的手套。

他说，他把她送进了完全的永恒中，就像他当年把这位来自德国的“邮购”的新娘接到家中一样。那时她二十三岁，长得和照片中一模一样，头发从中间分开，梳成两个发髻，发缝分得很直，发髻也很对称，并遮住了耳朵，仿佛是为了突出被遮盖的耳垂下珠母耳环的美好。

“耳朵是一个女人最丑陋的部位。”维尔希尼亚嘟哝着说。

“别吹毛求疵了。”希尔达责备她。

“我让你念诗，维尔希尼亚，我用我可怕的耳朵听你弹琴。”劳拉·迪亚斯的母亲笑着说：“幸亏妈妈科西玛在佩罗特的时候没戴耳环！”

她从德国来的时候，只有二十三岁，她的头发油黑发亮，衬得皮肤异常的白皙。在照片里，她用右手的五指将一把扇子放在胸口。

希尔达羞愧而激动地弹着钢琴，似乎要借此弥补她母亲的缺憾，同时又略带恨意地刺激她，我可以弹琴，而你却不能。作为克尔森家的大女儿，她是惟一一个有机会跟随母亲回到德国的人，并且，她还在科隆歌剧院听了著名钢琴家和作曲家弗朗茨·李斯特的音乐会。这是对许多欧洲移民的一个讽刺。墨西哥是一个印第安人和杂役的国度，自

然资源极为丰富,无需努力,就能满足一些基本的需要。于是要通过德国移民的增长来改变这种状况,给墨西哥引进另一种资源,即欧洲人的工业资源。但是,那些被请来种庄稼的人,由于不堪忍受困苦和孤独,都去了城市。只有费利佩·克尔森坚守在他承诺耕种的土地上,辛勤地工作,同时,还要摆脱两种诱惑:回德国,或是去墨西哥城旅行(他的妻子科西玛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音乐会结束后,希尔达对她的母亲说:"妈妈,为什么我们不留下来在这里生活呢?墨西哥多可怕啊!"

从那时起,堂费利佩禁止家人回到祖国,并禁止他们在家中说德语。休息的时候,他神色威严,挥舞着拳头,尽管他没有击打任何东西,只是说他们现在都是墨西哥人了,要与当地人同化,不许再回到莱茵河,除了西班牙语外,不许再说其他语言。菲利浦就是费利佩,科西玛,没有办法,只能叫科西玛。只有维尔希尼亚可以狡猾地称妈妈为穆谛[①],并引用一些德语。堂费利佩耸耸肩膀:这孩子总是与众不同。

"有斜视,有白化病,还有维尔希尼亚,"她装成斜眼,谈论着自己。"健康万岁!"

女孩们不说德语,除了家庭,或是照时髦的叫法"家庭经济",她们不关心别的东西,她们一个个精通家务,这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母亲的缺憾,她总是坐在一把摇椅上(这是另一件来自路易斯安娜的新鲜玩意儿),左手扇着扇子,望着远方,望着皇家大道和雾中的佩罗特。在那里,年轻的科西玛失去了四跟手指,或者,像一些人说的那样,失去了她的心。

---

① 德语中称母亲为Mutti。

“当一个女人认识了‘帕潘德拉的美男子’，她就再也忘不了他了。”维拉克鲁斯的人这样说。

然而，堂费利佩还是责怪他的妻子在墨西哥的那次采购。“你看，要是你去新奥尔良的话，这场不幸就不会发生了。”

从第一天起，科西玛就猜到了她丈夫想与墨西哥同化的愿望。她是菲利浦·克尔森向他的祖国所作的最后一个让步。科西玛只是想把丈夫永远成为墨西哥人，永远脱离德国的愿望提前完成，并因此失去了四根手指，“我想在墨西哥的首都买嫁妆。我们是墨西哥人，不是吗？”

手指多危险哪！小劳拉被噩梦惊醒了，她梦见一只手在房间里孤独地爬行，爬上了墙壁，掉在了枕头上，正落在劳拉·迪亚斯的脸边。她尖叫着醒来，发现原来是一只蜘蛛落在了她的脸边，劳拉不敢一掌打死它，那样也许会像在摇椅上沉思的外祖母科西玛一样被切掉手指的。

“妈妈，我要一顶白色的帐子罩着我的床。”

“我们的家非常干净，连灰都没有。”

“但是我总做噩梦。”

雷特西亚笑了，蹲下身，亲切地拥抱她的宝贝，她从此显出一种明显的优雅，这是除了美丽而忧郁成疾的外祖母科西玛之外家族成员所共有的特点。

对于那些把柏拉图式的爱情强加给他的妻子的强盗，费利佩以三个美丽而且才智过人、精通家务的女儿回敬了他们。“爱一个男人，一个有六个手指的女人也就够了。”一天晚上，在酒馆里，他这样胡说了一番，之后便感到了生平从未有过的后悔。他是一位劳动者，当时，他累极了，有点儿失去理智。他是咖啡庄园的主人，来这儿是找乐的。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说过类似的话。私下里，他曾祈求那些

听他讲这番粗话的人早点死，或者离开此地不再回来：对于他来讲，这二者是一样的。

“出发差不多就是死亡。”费利佩总是这样说，这是他的母亲，一位法国女人的口头禅。那时，费利佩还是菲利浦，他的父亲叫作海因·克尔森，母亲叫作雷特提亚·拉萨尔。当时的欧洲处在波拿巴家族的统治之下，到处都在破坏，到处都在重建，因为工业兴起，手工业衰落了；因为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家园，来到工厂做工，而不是像从前那样，家庭与工作是融为一体的；因为人们谈论着民主，而国家却被暴君所统治；因为民族敞开自己的胸膛却被独裁残忍地杀害；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双脚踏上的是新的车辙还是昨日的灰烬，这是优秀的浪漫主义诗人阿尔弗雷德·缪塞写下的诗句，他的诗作被青年男女传诵，使他们激动，让他们爱上诗歌，让所有的人感动。激动的少年，骄傲的少女：菲利浦·克尔森，一位蓝眼睛，希腊脸庞的年轻人，留着络腮胡子，总是穿一件斗篷，戴一顶阔边帽，手持一只象牙手柄、刻着鹰饰的手杖。他想弄清楚他究竟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他认为在杜塞尔多夫[1]他明白了一切的答案。在杜塞尔多夫那场大罢工中，他见到了斐迪南·德·拉萨尔[2]，一位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和鼓动家。在他那混浊的映象里，菲利浦看到并承认了自我，他开始崇拜自己，甚至爱上了自己。

当二十三岁的菲利浦·克尔森看到这位几乎与他同龄的导师，听到他的讲话之时，便感到一种预感笼罩了自己。这位年轻人与费利浦的母亲雷特提亚一样，有着拿破仑母亲的姓氏：这些有利的迹象使得菲利浦去聆听拉萨尔的讲

---

① 德国城市。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首府。

② 拉萨尔（1825—1864），德国社会主义者，德国工人运动的创立者之一。

演，他想起了缪塞的诗句："从智慧的最高之境到物质与形式最不可及的神秘，这心灵和这躯体是你的兄弟。"

"拉萨尔，我的兄弟。"菲利浦默默地向他的英雄表白，他在有意或是无意中快乐地忘掉了他生命里的一些基本事实：海因·克尔森，他的父亲，是一名从属别人但又受人尊敬的商人和银行家。他的保护人是约翰·布登勃洛克[①]，在反拿破仑战争中，靠囤积粮食，然后高价卖给普鲁士军队而发了大财。海因·克尔森代表着约翰在杜塞尔多夫的利益。他是卢佩克人，但他拥有的一切，金钱和好运，却是在与法国银行家纽辛根[②] 的养女雷特提亚·拉萨尔结婚后剧增的。那位银行家给了他的养女年金十万镑的嫁妆。

当二十四岁的菲利浦·克尔森第一次听到斐迪南·德·拉萨尔的讲演时，他忘记了所有的一切。

拉萨尔对莱茵河畔的工人们的讲演中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激情和政治的理性，他告诉他们，在这个新兴的工业化的欧洲王朝，伟大的拿破仑被渺小的拿破仑代替了，而这种腐朽的专制制度的卑劣之处在于它与政府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工人。"第一位拿破仑，"克尔森听到拉萨尔在会议上讲道，"是一位革命者。他的侄子是一个傻瓜，代表垂死的反动派的利益。"

年轻的克尔森是如此地崇拜同样年轻、英姿勃勃的拉萨尔。杜塞尔多夫的警察们形容他是一位"才智超群，精力充沛，决定果断，思想极左，交游广泛，经验丰富，出手阔绰"的人。因此，在警察的心目中，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但是，在年轻的追随者克尔森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值得崇拜

① 这是托马斯·曼的作品中的人物。

② 这是巴尔扎克作品中的人物。

的人物。因为拉萨尔总是衣冠楚楚(而他的竞争对手马克思的外衣上却沾有油渍),因为拉萨尔可以去参加他所反对的那个阶级的聚会(而马克思却走不出伦敦最下等的咖啡馆),因为拉萨尔相信德国民族主义(而马克思是世界主义者,是民族主义的敌人),因为拉萨尔热爱冒险(而马克思是一名中产阶级的无聊的家长,甚至买不起一只戒指,送给他那贵族出身的夫人燕妮·冯·威斯特法伦)。

菲利浦·克尔森一生都在与他年少轻狂时信奉的拉萨尔式社会主义的激情进行抗争。他的青春失陷在这光芒万丈的理想之中,就像缪塞笔下欧洲的车辙,也许只不过是一个余烬的深坑。社会主义者拉萨尔最终与普鲁士极端民族主义者,极端反动分子俾斯麦联合起来。他们二人控制着贪婪的,没有祖国观念的资本家,这就是这场丑恶的联合的目的。对权力的批评变成了压制批评的权力。1864 年 8 月 28 日,菲利浦·克尔森离开德国,同一天,斐迪南·德·拉萨尔,从一位被玷污了的英雄变成了一位鲜血淋漓的英雄。他死在日内瓦附近的一艘船上,为了一个荒谬而浪漫的理由:这位英俊的社会主义者疯狂地爱上了海伦娜(全名冯·多尼格,据历史记载),因而引发了与她的未婚夫(杨克·冯·莱克维兹,据报纸报道)的决斗。杨克干净利落地射穿了拉萨尔的肚子,丝毫没有考虑什么历史、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和什么钢铁部部长。

伯雷斯拉乌的公墓里,埋葬了拉萨尔三十九岁的年轻生命,二十五岁的社会主义者菲利浦·克尔森的理想破灭了,他从汉堡出发,横渡大西洋,来到了大洋的另一岸,他来到美洲海岸,来到维拉克鲁斯,又向内陆纵深,来到了卡特马哥——人们谈论中的那一片炽热,丰富,慷慨,肥沃的土地,在这里,人们可以脱离欧洲破灭的理想,与自然融为一

体,发展繁荣——他还能去到别的什么更远离伯雷斯拉乌的地方吗?

菲利浦只保留了对拉萨尔最为感动的记忆,他将他的民族主义和对冒险的热爱从莱茵河带到了墨西哥湾。只不过在这里这些特征已不再是德国的,而是墨西哥化了。杜塞尔多夫的老海因,为儿子叛逆的决定而鼓掌叫好,给了他一笔钱,送他登上了前往新大陆的轮船。在新奥尔良的一家烟厂里,菲利浦·克尔森做了三年工。他所深恶痛绝的美国种族主义在南部联邦燃烧的废墟中摇摇欲坠。后来,他来到了维拉克鲁斯,沿着海岸,从绿意葱葱的华斯泰克州的图克斯潘走到了鸟类繁盛的图克斯特拉。

"肚子填饱了,才会有好心情。"在图克斯潘,他睡过的第一个女人这样对他说,她是一位黑白混血女郎,无论是在床上还是在厨房里,都奉献给他同样的热情,轮番用她紫红色的乳头和各种玉米饼填充他贪婪的欲望。他还是无法适应,又在图克斯特拉的圣地亚哥找了一位黑白混血的情人和食物,她与城市同名,叫作圣地亚加。当这位性感又新奇的德国小伙子休息的时候,她给他送上加勒比海风情的食物:木薯,大蒜,芭蕉制成的味道香浓的马哥马哥。但菲利浦·克尔森被图克斯特拉旁边的卡特马哥吸引住了,那里的美景比任何一种食物更引人入胜:这样的湖可以在瑞士和德国找到,四面群山环绕,植被葱郁,湖水平滑如镜,而远方,看不见的瀑布轰隆作响,这里是飞鸟和短尾猴的乐园。

湖面平滑如水银,菲利浦·克尔森站在湖畔的一座小山上,仿佛他的青春与未来,他的浪漫精神与金融家的门第,他的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他的放浪不羁与苦行僧般的禁欲,都融合在这一个动作里。他说:"我要留在这里,这里就是我的祖国。"

小劳拉只是远远地听说过她那位骄傲、节制而又英俊的外祖父的故事。这位德国人现在只说西班牙语,尽管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还用德语思考,也没有人知道他做梦说什么语言。对这孩子来说,日子都在不远的将来,而比起其他的东西来,她的生日最能表现出岁月的流逝。为了让人不要忘了向她庆祝,一大清早,她还穿着睡衣,就在院子里滑稽地边跳边唱:

5月12号
圣母出门早
一身雪白袍
短衣外面罩

家里所有的人都熟知这一仪式,但是,在她生日之前的几天,大家都装做忘了这一码事。即使劳拉知道大家都没有忘记,她也不会明白为什么大家要这样做。每个人都想给她一个惊喜,这样她会更快乐,尤其是1915年5月12日,劳拉满六岁了,她的外祖父送给她一件不一般的礼物:一个中国玩偶娃娃,脑袋和手脚是瓷做的,棉花做的小身子外面穿了一件红绸底,滚黑边,绣着黄龙的中式大褂。异国服饰并没有妨碍她兴高采烈地接受了礼物,她立即爱上了这个玩偶娃娃,因为她身上的零件是如此的小巧,还穿着白色的丝袜子和黑天鹅绒做的鞋。她的脸扁扁的,微笑着,一双东方人的眼睛,眉毛高高地画在丝绸做的刘海下面。小小的手儿却是娃娃身上最精致的部位,劳拉刚刚收到她的整个童年最美丽的礼物,就拉住了娃娃的手,去握钢琴家姨妈希尔达的手,作家姨妈维尔希尼亚的手,厨娘妈妈雷特西亚的手,农夫外祖父费利佩的手,和病重的外祖母科西玛的

手。她不自觉地将残缺的右手藏在披肩下，笨拙地向她的外孙女伸出了左手。

“你给她取名了吗?”堂娜科西玛问道。

“李白，”小劳拉哼着歌儿回答道:“我们叫她李白。”

外祖母用探询的目光看着她，劳拉耸耸肩膀，表示“就是这样”，每个人都亲了她一下，她回到卧室，把李白安顿在大枕头上，向她保证:即使别人会惩罚她劳拉，而李白决不会被责罚，即使劳拉走了背运，李白仍然会在劳拉·迪亚斯的卧室里找到容身之所。

“休息吧，李白，睡觉吧，幸福地生活吧。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当劳拉把李白丢进了卧室，跑出家门的时候，孩子的天性使她表现出回到自然的欣喜。维尔希尼亚姨妈用她那洪亮而又悦耳的声音形容道:大自然是丰富，慷慨，又是详尽的，它是如此的真实，又是如此地接近这位生长在茂密的雨林、激荡的湖水和生生不息的咖啡园中的小女孩的目光和触觉。

“肥沃，”她不想遗漏任何词汇，接着说，“这是一片最肥沃的土地。”

然而，家中的手指像浓密的热带雨林中的爬藤植物一样缠住了她。希尔达姨妈弹着钢琴(我有时茫然，有时激动。我感到羞愧，但是能够运用十根手指确实使我感到一种窃喜，因为这样，我可以抛弃自我，逃离自我，我感到并告诉所有的人，他们所听到的音乐不是我的，我也不是我自己，乐曲是肖邦的。我是演奏者，任这美妙的音乐从我的手中，从我的指尖流出。我的母亲坐在摇椅上听我弹奏，她不让我留在德国生活学习，成为一名伟大的钢琴家，一名真正的艺术家。我的父亲在听我弹奏，他把我们囚禁在这个没

有出路的小村子里。我控诉他们毁了我的前程。我希尔达·克尔森,本可以成就一番事业,但是现在再也不可能成功了,无论我多么努力,无论我是否拥有一个我无法控制或是说不清楚的好运;我创造了你,你是我的,为我带来幸运。但那不是幸运,而是一场事故,一个不幸的馈赠。我弹着肖邦最悲伤的乐曲,却无法抚慰我的忧伤,只是使我稍感安宁,使我感到一阵激怒父母的窃喜)。维尔希尼亚姨妈正在写诗(我被屈服包围着,尽管我不想听天由命,我设想有一天我会逃离,但是又害怕我对读书和写作的爱好只是一场逃避,而不是在这里或是在德国都可以一样实现的志愿,或者,就像那一天我所回答的那样,如果在中国,不知道我的结局是不是就像我外甥女的娃娃,美丽但却沉默,舒适但被束之高阁)。妈妈雷特西亚正帮着家中的厨娘准备玉米馅饼(把猪肉和辣椒填到松软的面团中,先烹制一下,然后再上屉蒸,最后再用一张芭蕉叶子小心地将每一个玉米馅饼包好,把味道、香气、鲜肉、辣椒、水果和面粉弄到一块,包起来,再吃上一口,感觉有多好啊!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我的丈夫费尔南多的亲吻,但我不应该去想这些。我们的分别对双方都有利。孩子和我生活在乡村,对她也有好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我们不应该在年轻的时候穷尽快乐,而是应该把快乐延伸到将来。快乐是补偿,而不是特权,也不是能够任意挥霍的赠品。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什么都应该拥有,他最终会一无所有。我愿意耐心地等待,我只有二十三岁,我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外祖父费利佩戴上了眼镜,正在查阅账目(我无可抱怨,一切都很顺利,庄园欣欣向荣,孩子们也都长大了。希尔达有她的音乐,维尔希尼亚有她的书籍,也许最该抱怨的是雷特西亚,她与丈夫分离,但这是双方同意的,不是我的强迫或专断,因为他们盼望着未

来,却从未想过他们或许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它。有些东西是需要立即抓住的,比如刚要起飞的小鸟,否则,它就会永远消失了。就像我投身于社会主义的冒险之中,激情退却了,我便奔向了美洲。从外观上看,这一望无边的大陆就是一块不会使人激情消竭的地方。我们欧洲人将我们的历史生吞进去,再进行反刍,有时,还要打上几个饱嗝,最后再把历史排泄出来。我们是历史的排泄者。而在这里,首先要创造历史,没有欧洲的错误,也就没有欧洲的美梦和醒悟。一切从零开始,一切从无做起,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这多么令人快慰,多么令人振奋。因此,人们可以接受堕落、不幸与错误,因为这是自己命运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遥远的历史事件的遗留。拿破仑,俾斯麦,拉萨尔,卡尔·马克思,在他们各自的王位和布道坛之上,并没有自由。而我,坐在这里盘算着咖啡的赢利,却拥有着自由。老天,真他妈的)。沉默的外祖母科西玛轻轻地摇晃着,身下的摇椅来自路易斯安那,而不是墨西哥城(我想告诉费利佩,我也是这方土地上的人。当我刚刚来到这里,刚刚认识了他,我就知道我是他向过去的德国所作的最后一次让步。为什么选择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地爱我,我希望这不是对我在佩罗特公路上不幸的冒险所作的补偿。但他从未使我感觉到他在可怜我,他是用一种真正的男人的热情来爱我。我们的女儿们是在一种不知廉耻的激情下孕育的,这是与我们有过接触的人难以想像的。他像对待妓女一样对待我,可是我喜欢;我跟他说自己幻想着与切掉我的手指的强盗做爱,而他喜欢听。我们是一种强烈的不知羞耻不加保留的爱的同谋。这种爱只有他和我知晓,对它的回忆变成死亡的痛楚,死神走近我,对我说,对我们说:你们中一人在失去伴侣的情况下继续生活。那么,两个人将如何继续相爱

呢？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对将要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而他还活着，回忆着我，想像着我，延伸着我的生命，相信我没有死，而是与那个我再未见过面的美男子私奔了。要是我再次遇见他，我会怎样做呢？杀了他还是跟他跑了？不，我只会想起我对别人所说的话：我那样做是为了救其他的旅客。但我又如何能忘记那野兽一样的目光，那男人的魅力，那猛虎一样的走姿和他与我之间不能实现的愿望。我忘不了，忘不了，永远也忘不了……)。

希尔达姨妈弹着钢琴，维尔希尼亚在用鹅毛笔写作，妈妈雷特西亚正在做饭，她不但喜欢做饭，而且对这门技艺颇有天赋。她把稻米，菜豆，芭蕉和猪肉放在一起烹制，把章鱼从它吐的墨水里捞出来，做成喷香扑鼻的菜。在晚饭的最后，上一道蛋白酥，乳蛋糕，酸乳酪，或是蛋黄甜食，这是世界上最甜的食物，从巴塞罗那传到了古巴，又从古巴传到了维拉克鲁斯，仿佛是为了安慰这满眼是革命、征服和专制的土地的苦楚。

"别提了，我不想知道墨西哥的过去，美洲只有未来。"一谈起这个问题，外祖父就会这样坚定地说，因此，他越来越少地去茶会和聚餐会了。自从那个疲惫的晚上他失态之后，他就再也没去过酒馆。从前，他从不去做弥撒，因为他首先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其次是一位新教徒。但这个小村子是一个大地狱，他最终还是向维拉克鲁斯人的习俗低下了头，这里相信上帝和奇迹，而不是教堂和神父。信教对费利佩有好处，不是因为出于什么犬儒哲学，而是为了与己方便。然而，当新的神父堂埃尔泽维尔·阿尔蒙特来了之后，全村的方便都没有了。这是一个黑头发、黑眼睛、态度傲慢的年轻神父，来自于庄重而又有教权的城市普埃布拉·洛斯安赫雷斯，是墨西哥大主教辖区派遣的十二名神父之一，其

任务是向居住在墨西哥湾附近的懈怠的教徒规范纪律和正确的习惯。

科西玛·莱特,幻想破灭的社会主义者菲利浦·克尔森用他在维拉克鲁斯咖啡庄园最初的盈利从德国邮购来的新娘,生来就是一名新教徒。菲利浦或费利佩是一位不可知论者,他发觉在墨西哥找一位不信上帝的老婆简直是不可能的。在这里,连无神论者都信仰上帝,甚至连妓女们都是信奉罗马教派和教皇的天主教徒。

从德国预定一个不信上帝的妻子听上去不仅是一种罪行,更像是一个热带的玩笑。菲利浦广泛地征求了亲戚和朋友的意见;直到一张银版照片吸引了他的目光:照片上是一个黑发的女孩,头发从中间分缝,梳成两个发髻,右手里拿着一把扇子。

尽管有许多特例,顺从始终是宗教社会的准则,这位年轻的拉萨尔主义者没有料到他的更年轻的新教徒妻子刚刚来到维拉克鲁斯,就面临了许多压力,其中社会压力只是最不起眼的一个。更主要的在于她不可避免地发现了菲利浦,或者是费利佩,在他的维拉克鲁斯独身生活中,并不像一位圣徒。这位长着一头长而拳曲的头发,金黄色胡子和希腊人轮廓的年轻的外国人,并没有遵守修士的准则。科西玛才刚打开铺盖卷,这湖畔小镇的流言蜚语就传进了她的耳朵。在他们的世俗婚礼结束后二十三小时,这位美丽而又骄傲的德国女郎对她惊得目瞪口呆的丈夫说:

"现在,我想要一个天主教的宗教婚礼。"

"但是,你我都是新教徒,我们得划清界限。"

"我们都是基督徒,没有人有权利知道更多的事情。"

"我不明白你这样做的理由。"

"我这样做是为了让你黑白混血的私生女当花童,提着

我的裙尾。”

这样,玛丽亚·德·拉奥,几乎从第一天开始,就走进了这对新婚夫妇的生活。科西玛给她专门提供了一个卧室,命令仆人们像对待小姐一样对待她,还在餐桌上给她留了一个位置,像对待女儿一样地对待她,完全不在意她的出身。除了玛丽亚·德·拉奥——那时候她还不到八岁,没有人听见科西玛·莱特和她生母的谈话:“夫人,请作出选择,您希望您的女儿在怎样的环境里成长。您去一个能够更好地生活的地方吧,去坦皮科或是哥特萨哥尔科,您什么都不会缺的。”

“但是,我爱我女儿。”黑女人呜咽着说。她为人所知的名字是特利埃斯蒂娜,这不知是因为她那悲伤的眼睛,还是因为别人推测她曾在特利埃斯特的米尔曼宫中做过皇后卡尔洛塔的侍女[①]。

“这个你都不会相信的。”科尔森的新婚妻子很快就学会了各种说法和习俗,开始用你来称呼别人。现在,她已经老了,这天,她向她的丈夫说起这件往事,却没有发觉劳拉正躲在栽种着欧洲蕨的大花瓶后偷听。

玛丽亚·德·拉奥,科西玛这样介绍这个美丽的黑白混血女孩,费利佩也就这样地接受了她。家里的女主人不须恳求她的丈夫信守年轻时代的人文主义准则。科西玛自己就做到了,开始的时候,她与她的混血女儿一起去教堂,用双手捧着弥撒书,到了后来,她又带着另外三个女儿,用仅剩的一只手拿着弥撒书。她为自己是四个女儿的母亲感到

① 特利埃斯蒂娜(Triestina)与“悲伤的”(triste)一词在西语中形似。特利埃斯特(Trieste)为意大利北方的城市,特利埃斯蒂娜(Triestina)一名又可被解释为“特利埃斯特女人”。卡尔洛塔即马克西米利安之妻。

骄傲,全然不顾别人的流言蜚语、惊诧和诽谤,尽管一些烂舌头的人胡说帕潘德拉的美男子是孩子真正的父亲。这件事可有些难度,因为那个强盗是个克里奥尔人,而堂娜科西玛是一位德国人,这样的话,玛丽亚·德·拉奥就只能解释为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了。

玛丽亚·德·拉奥比她的妹妹中最大的希尔达年长七岁,比维尔希尼亚大八岁,比雷特西亚大十岁。她是一个五官秀丽的黑白混血女孩。她的脸上常常挂着一抹微笑,走路总是挺胸抬头。科西玛刚把她接回来的时候,她总是弯着腰,缩着脖子。科西玛说她像一只躲在角落里被棍子吓坏了的小动物。她长着一双漆黑的大眼睛,里面充满了更为忧郁的幻象。这位母亲科西玛·莱特·克尔森出于情理,及时地开始教玛丽亚·德·拉奥挺胸走路,甚至到了强迫的地步:

"把这本字典放在头顶,走到我这儿来,别把字典弄掉了,小心一点。"

她教她使用床单,打扫个人卫生,给她穿上最漂亮最挺括的白色衣服,来衬托她那黝黑的肌肤。科西玛还在她的头发上扎上一个白绸做的蝴蝶结,她的头发不是像母亲那样拳曲,而是像她的父亲那样平滑。

"我要是把你带回德国,"科西玛骄傲地说:"你真的会十分引人注目的。"

科西玛来到教堂,告诉莫拉雷斯神父:我就要有一个孩子了,以后,我至少还要两个孩子。

"我不希望我的儿女们为他们的姐姐感到羞耻。我希望克尔森家族的人一出生,来到世上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的姐姐虽然与他们不同,但比他们更优秀。"

她把手轻轻地放在玛丽亚·德·拉奥的蝴蝶结上。

“给她洗礼吧,让她信教,给她所有的祝福,并出于对上帝的爱,为她的贞洁而祈祷。”她迟疑了一会,说道:“不要成为妓女。”

维拉克鲁斯的神父堂赫苏斯·莫拉雷斯是一个好人,尽管他并不得志,他所做的一切——公开的布道,私下的谈话,还有隐秘的忏悔——都在保护和支持着这位虔诚的皈依了罗马天主教的堂娜科西玛·莱特·冯·克尔森的仁慈行为。

“女士们,请不要破坏信仰和仁慈的胜利。一切各安其命,多好啊。”

赫苏斯·莫拉雷斯神父爱他的教民,而他的继任者埃尔泽维尔·阿尔蒙特却想改变他们。外祖母科西玛缺少的几根指头,对于这位神父而言,却似乎太多了。他用手指告诫、责骂、诅咒。他的布道给这个热带地区带来高原稀薄窒息的气息,不可忍受也无法容忍。人们对这位年轻却阴险的神父在讲道台上颁布的种种禁令议论纷纷:女人们不能穿短外衣了,那会暴露出女性的曲线,尤其是在雨水把衣服打湿的时候,因此,必须穿严实的内衣,拿着保守的伞;不许说维拉克鲁斯的粗言恶语,尽管我不是执政官也不是法官,我宣布,如果哪个人说了粗话,那么他那亵渎神明的嘴巴将得不到救世者的圣体,我绝对会这样做的;小夜曲也不许唱,这不过是深夜情欲涌动的借口,会干扰基督徒的静修;妓院不能开,酒馆也被关了,而且明文规定从晚上九点开始实行宵禁,这究竟是不是规定,当然是规定了,怎么不是呢,是的,先生;从今以后,人们要说走路的物事,而不能说“腿”,要说我感觉的器官,而不能说……

新来的神父宣布了这一切,他手舞足蹈,滑稽而又傲慢,好像要在空中给这些武断的禁令赋予一种雕刻的形式。

妓院搬到了圣地亚哥·图克斯特拉,酒馆迁到了圣安德雷斯,竖琴师和吉他手去了河口,在这场瘟疫般降临在本地商人头上的浩劫中,阿尔蒙特神父却利用忏悔的形式为自己寻找寻欢作乐的方法。

“孩子,你看过镜子中自己的裸体吗?”

费利佩没有责怪科西玛皈依了新的信仰。他只是在她每个星期天赴弥撒回来的时候,迎面看着她,她第一次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你偷偷摸过你自己吗,孩子?”

劳拉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她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她已经习惯了自己的形象:她想神父一定在他的身体里播下了什么不寻常的东西,就像当年她的姨妈们在僻静的河边洗澡的时候,在自己的肚脐上放上的一朵花,或者是双腿间的蜘蛛,但是当阿尔蒙特神父到处颁布禁令之后,她们就不再去了。

“你喜欢看你父亲的性器官吗,孩子?”

劳拉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站在镜子前,重复着神父怪异的举止和言语。她把神父傲慢狂妄的语气模仿得惟妙惟肖。

“女人是建筑在垃圾堆上的一座庙宇。”

“你看见过你父亲的裸体吗?”

她的父亲,费尔南多·迪亚斯,劳拉几乎从来没有见过,无论是穿着衣服的还是裸体的。他是银行的出纳,与一个十六岁的儿子一起住在维拉克鲁斯,这是他上次婚姻的结晶,他的第一任妻子艾丽莎·奥夫雷贡不幸死于难产。在特拉科塔勒班的节日庆典上,费尔南多爱上了少女雷特西亚·克尔森,她也对这位怪异的港口人动了感情。他总是衣冠楚楚,西装上衣、马甲、领带、领带夹,全副武装。头上戴着

的草帽,是他向酷暑所作的惟一的让步。维尔希尼亚姨妈说,英国人把草帽叫作 straw boater,她在妹妹的追求者,这个亲英分子身上找到了共鸣。尽管外祖父和外祖母是通过信件往来结合的,但是他们并不排斥这种自由恋爱。费尔南多·迪亚斯,接受了英式的教育,深受英国影响,费利佩·克尔森却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有助于继续抹去家族的日耳曼烙印。是雷特西亚自己接受了分居的安排,而当劳拉出生之后,外祖父费利佩更是庆幸他的女儿和外孙女是在乡村,在他的保护下生活,而不是在遥远的、喧闹的、罪孽深重的港口生活——他告诉科西玛,闲言碎语就是这样说的。而她则嘲讽地看着他。小村落……

对他新建立的家庭(首先是雷特西亚,九个月之后,劳拉降生了),费尔南多向她们郑重承诺:

“我现在不能提供给你们像样的生活。你们住在堂费利佩家里。在卡特马哥,我只能做一个小会计,而在维拉克鲁斯,我能够晋升,那时我会派人把你们接来。我不需要你父亲的施舍,不需要你母亲的同情。我不想依赖任何人。”

这对新婚夫妇刚开始住在卡特马哥克尔森一家的房子里,他们的依赖和不安是一个事实,当费尔南多最终作出决定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舒了一口气。

“为什么你的儿子圣地亚哥从来不来拜访我们呢?”三位独身的姨妈问道。

“他学习很忙。”费尔南多干巴巴地回答。

劳拉·迪亚斯热切地想了解她的父母,他们是如何结婚的,那个有权和父亲生活在港口的神秘的异母兄长是什么人,他们什么时候会团聚呢?她的母亲非常操劳,因为她好像同时要照顾两个家庭,一个是与她生活在一起的父亲的家,另一个是分居的丈夫的家,她好像不但要为这里的人做

饭,而且要为那些不在这儿的人……这是真的。母亲和女儿的孤独日益蔓延到全家,蔓延到三位独身的姐姐身上。希尔达弹奏着钢琴,维尔希尼亚读书写字,当秋风乍起的时候,玛丽亚·德·拉奥编织着羊毛披肩。

“我们不会结婚的,雷特西亚,直到你和你的丈夫团聚,就像你应该做的那样。”希尔达和维尔希尼亚异口同声地说。

“他这样做是为了你和孩子好。你们就要团聚了,我敢保证。”玛丽亚·德·拉奥补充说。

“那可得赶快呀,要不然我们姐妹三个到死都嫁不出去。”孤独的维尔希尼亚笑着说:“但愿那个好好先生能知道。我的先生![1]”

但是,真正的孤独的化身是外祖母科西玛·克尔森。

“费利佩,我一生中该做的都已经做完了。现在,请尊重我的沉默。”

“那你的回忆呢?怎么办?”

“没有一件是只属于我自己的。我和你分享了所有的回忆,所有的。”

“别担心,我知道。”

“那么就请你好好地保留这些回忆,别再让我说话了。我都向你说过了。”

1905年,堂娜科西玛说了这番话,这一年,天下大乱。

当地人能歌善舞,谈吐诙谐,爱吵爱闹,但也可以是非常虔诚的(当圣徒施恩给他们的时候),对此莫拉雷斯神父知道得很清楚,而阿尔蒙特神父则视而不见。穷人们,农民,乞丐,织渔网的人,渔民,船工,泥瓦匠还有所有的女人,

① 原文为德语:Mein Herr.

他们比富户们向教堂献上了更好的供奉。

堂费利佩和其他的咖啡园主贡献出钱币和粮食；那些穷人，他们偷偷地奉献出珠宝，世代相传的古老的房屋，向上帝为自己的幸运和别人的不幸祈求祝福，这两件事情，在他们的眼中，都是神迹。石华项链，银梳子，金手镯，数不清的祖母绿，珍贵的宝石，天知道来自什么样的秘密所在：顶楼，地窖还是山洞，或是盖着草席的土房，秘密的矿山。

财富慢慢地积累起来，因为莫拉雷斯神父一丝不苟地为他的教民保存着他们奉献的财产，仅仅当他知道那户将珠宝献给奥塔蒂特兰的黑基督的人家需要钱的时候，他才到维拉克鲁斯卖掉了那件珠宝。

和所有的墨西哥湾的村镇一样，人们在木地板上载歌载舞，庆祝圣徒日，踢踏舞的声音清晰可闻。竖琴，比韦拉，小提琴和吉他的声音随风飘荡。所有的人都记得，那是1905年，松戈里卡的圣婴节，神父埃尔泽维尔·阿尔蒙特没有露面，圣器看管人去教堂找他，却发现神父和财宝都不见了。装供奉的箱子空空如也。这位乡村神父失踪了。

"人们常说：普埃布拉，圣徒的发源地；维拉克鲁斯，无赖的洗礼池，这话真有道理。"

这是堂费利佩·克尔森作出的惟一的评论。辛辣而又一语中的。村民虽然难缠，却不及逃走的神父卑劣无耻。四位克尔森小姐没有什么改变。没有了邪恶的神父，生活恢复了正常。酒馆和妓院重新开张，寂静的午夜，又可以听到小夜曲，离开的人回来了……然而，从那天开始，精神恍惚的外祖母病情加重了，好像她浪费了整个生命去信奉一个根本不值得的信仰，浪费在与这个高尚的男人的爱情，而不是与那个浪漫的强盗（闲言碎语还在继续议论）。

"劳拉，孩子，"有一次，病重的外祖母不想把这个秘密

永远地藏在心底,“你看这个男人多么英俊,多么英武,多么勇敢……”

她没有说孩子,去接受诱惑吧,不要害怕,不要气馁,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两次,既不会增加美貌,也不会增添勇气,因为她是一位正派的女人,因为她是一位模范的外祖母。但是劳拉·迪亚斯在内心深处永远地保存着这些话语,珍藏着她的外祖母传授给她的这一课。不要让它溜走,孩子,不要……

“没有什么会发生两次……”

女孩劳拉照着镜子,她并不想从中看到可恶的阿尔蒙特神父的企图(对她而言,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再也不会让她发笑),而是想从自己的形象里看到病重的外祖母的年轻时代,或者至少是一点血统上的继承。鼻子太大了,她对自己说,太大了,五官长得像糕点一样柔软,闪亮的眼睛里没有诱惑,只有七岁女孩的天真无邪。中国娃娃李白都比她胖乎乎蹦蹦跳跳的小主人拥有更多的个性,她既没有要求被吻的激情,也没有要求拥抱的热力,更没有……

母亲葬礼的那一天,四位克尔森小姐——三位单身,一位已婚却分居——都身穿丧服。劳拉的母亲雷特西亚看到一只神奇的白鸟从敞开的坟墓上飞过,仿佛在逃离自己的葬礼,她不禁大叫:快看!一只白乌鸦!

其他的人抬头去看,而劳拉却跑去追逐着那只白鸟,她好像在遵循着外祖母的教诲。她觉得自己也可以高飞,白乌鸦好像在召唤着她,跟我来,孩子,和我一起飞,我要给你看……

就在这一天,这个女孩意识到她身在何处,她从何处而来,好像外祖母临死的时候给了她一对翅膀,让她回到了丛林之中,在那里玩耍着而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她像平常一样

蹦蹦跳跳，家族成员看着她远去，不禁发出了阵阵叹息，她还是个孩子，小孩子不知道什么是死亡，她没见过盛年时期的外祖母科西玛，她这样做不是出于恶意……

她跟随着白乌鸦越过了熟悉的地界，从那以后，她仿佛重新认识并永远地爱上了她看到和触摸到的一切，葬礼那一天的情景珍藏在她的心里，就像一件无法再现的事物，一件只属于她，只属于她这个年龄的事物，她出生于 1898 年 5 月 12 日，那时，圣母身穿白衣袍……

从那以后，她重新认识并永远地爱上了无花果树，印度郁金香，每年开花三次的中国百合：她重新认识了她所认识但忘却了的东西，红百合，红色的木头，芒果树球形的树冠；她认识了一些她从来不认识的东西，她不是发现而是回忆起一棵南美杉，它的形状非常对称，劳拉觉得在它的每一根枝条上，很快就会孕育出第二根枝条；开满小黄花的树干，一种能够抵抗飓风和干旱的神奇的树。

忽然，她害怕得差点喊出声来，但她咽下了恐惧，转而感到惊奇。她看到了一个巨人。劳拉颤抖着，闭上眼睛，触摸着这个巨人，这个石头巨人非常高大，兀立在丛林中，比面包树和吞食了一切——排水沟，土地，庄稼——的侵略者月桂树的树根更深地扎根于这一片土地。

这是一个巨大的女性雕像，她的身上长满了苔藓，双眼注视着永恒，腰间别着蛇和蜗牛的腰带，头上戴着的王冠被丛林染成了绿色，她的胳膊、鼻子和耳朵上装饰着项链、戒指和耳环。

劳拉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回来，她本来迫不及待地想把她的发现告诉别人，是这位丛林中的女士把她的珠宝给了穷人，是这尊被人遗忘的雕像保护着天上的财富不被讨厌的阿尔蒙特神父这无耻的家伙卷走，她，劳拉·迪亚斯，知

道了这个丛林的秘密;她知道了一切,也知道了她不能告诉任何人,不是现在,不是他们。

她不再跑了。她慢慢地沿着起伏的山间小路和种满咖啡的平缓的山坡回到了家中。外祖父费利佩正在庭院里教导工人们,他说,除了砍掉月桂树的枝条,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它们好像会移动一样,正在侵略我们,月桂树正在吞食着排水沟,马上就会把房子吃掉了,房子外面的木棉树上,有着成群结队的鹈,把门口弄得肮脏不堪,这样可不行;另外,咖啡也到了生白翳的季节了。

"得马上砍掉一些树了。"

维尔希尼亚姨妈长叹了一口气,尽管她不是长女,她却非常自然地占据了母亲的摇椅。

"我可不想听到这些话。"她对她的姐妹们说,"他们不知道没有一个人会比树活得长。"

劳拉不想和他们说,她只想向外祖父说,因为她看到他焦虑不安,想让他高兴一下。她拉着他的黑色的长礼服,外祖父,在丛林里有一位高大的女士,你必须去看看,孩子,你在说什么呀?我带你去,外祖父,因为我不相信别人,来呀,你要是去了,我就不害怕了,我会拥抱她的。

我想:我拥抱她,我要还她以生命,外祖母讲给我听的那些故事里就是这么说的,要想使一具雕像复活,只要拥抱它就可以了。

她责怪自己:她想把丛林中的女士的秘密藏在心底的决定这么快就打破了。

外祖父握着她的手,笑了,丧期还没有过,本来是不应该笑的,然而,这个美丽的女孩子,她的头发长且平直,她的五官日益精致,童年时胖嘟嘟的脸庞已了无痕迹,劳拉还没有在镜子里见过,甚至不曾梦想过自己今后的样子,外祖父

就已经在这一天预见到劳拉个子会长得很高，她的胳膊和腿会很长，她的鼻子突出，她的嘴唇比同龄的其他女孩要薄（就像维尔希尼亚姨妈的嘴唇一样），这个女孩是一个生命的回归，是科西玛的重生，一个生命在另一个生命上得到延续，而他，好像是一颗灵魂的守护者，这灵魂需要回忆起科西玛和费利佩之间的爱恋才能延续，并且在一个孩子，在这个女孩的生命里开始新的跳动，老人激动地说："我已经六十六岁了；科西玛五十七岁就死了。"劳拉来到了丛林中的空地上。

"雕像就在这里，外祖父。"

堂费利佩笑了。

"这是一棵木棉树，孩子。小心。你看，这棵树非常漂亮，但是却非常危险。你发现了吗？它的身上布满了钉子，或者说并不是钉子，而是像匕首一样的尖锐的刺，木棉树靠它保护自己，你看到了吗？木棉树身上长出剑来，这棵树全副武装，让别人无法接近，也无法拥抱它。"外祖父微笑地说，"这棵树多么坏呀！"

后来传来了不好的消息，在加纳内亚的矿山里发生了一场罢工，另一场罢工发生在布兰科河的纺织厂里，就在维拉克鲁斯州，联邦军队镇压了罢工，敞口的行李车把罢工工人的尸体从奥里萨瓦一直运到海里，这样，所有的人都会看到这幅惨景，并从中吸取教训。

"你认为堂波菲里奥[①]会倒台吗？"

"怎么可能呢？这正表现出他和以往一样精力充沛，尽管他已经快满八十岁了。"

① 波菲里奥·迪亚斯（1830—1915），墨西哥总统（1876—1880，1884—1911），独裁者。

“主人,应该砍掉查拉卡乌伊特了。”

“砍掉给咖啡提供阴凉的树,真的很令人痛心。”

“是的,那是在咖啡价格好的时候,现在价格太低了。把树砍倒,卖木材会更挣钱。”

“听天由命吧。它们还会再长起来的。”

第三章　维拉克鲁斯:1910年

他早到了。他迟到了。他总是来得太早或太晚。他总是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在晚餐桌旁。还有些时候,他不来吃晚饭。

雷特西亚在费尔南多刚刚派人把她接回维拉克鲁斯的那一刻起,就自然而然地把她在卡特马哥咖啡庄园的那一套作息时间搬了过来。不管这个港口城市是多么的喧闹,多么的荒淫,太阳总是在同一时间升起,不论是在湖畔还是在海边。六点吃早饭,一点吃午饭,七点钟吃下午茶,晚饭定在了九点,不过只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才吃。

维拉克鲁斯为雷特西亚提供了种类繁多的海鲜和鱼类,劳拉的母亲把这些东西神奇地结合在一起,墨黑的章鱼配上雪白的米饭,油炸香蕉片和透明色的油炸菜豆相映成趣,白色的墨西哥湾海鲷躺在洋葱、胡椒和橄榄之间;肉丝放在芫荽或是褐色的酱汁里,还有修道院的甜点和坊间的咖啡,醇厚悠长,以滚烫提神而闻名,是午睡和良宵的佳友。

无论什么时间走进著名的巴罗齐亚咖啡馆,都能看见一群身穿白围裙、戴着碎花领结的侍者在一片嘈杂声中穿梭于顾客之间,端上小面包和煎蛋,他们像是一场无休止的狂欢节上报酬欠佳的魔术师,高高地把咖啡和牛奶用玻璃杯一块儿举了过来,洒得到处都是。那只从德国进口的银质大咖啡壶主宰了这一切,它占据了咖啡馆的中心,壶身上

满是钥匙、水龙头、泡沫、烟熏火燎的痕迹和生产厂家的印章，就像一位身上挂满勋章的阿根廷女王。“勒布莱希特和尤斯图斯·克吕格尔，吕贝克，1887。”

画报和小说也从欧洲运来，劳拉的父亲费尔南多·迪亚斯每个月都等得很不耐烦。每当从南安普顿和勒阿弗尔出发的邮轮驶进港口，倒像是单单为了取悦这位会计师似的。他戴着草帽，防止毒辣的太阳直晒，手里拿着一根象牙柄的手杖，这套装束当年他在卡特马哥追求雷特西亚并最终俘获美人芳心的时候就颇引人注目。他的另一只手握着自己十二岁的女儿劳拉的手。

“爸爸，杂志，先拿杂志。”

“不，先拿你哥哥的书。告诉他书在这里。”

“最好我把书拿到他的房间里。”

“随你便。”

“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出入一个二十来岁的男孩子的房间，这合适吗?”劳拉刚刚天真地蹦蹦跳跳离开房间，雷特西亚就压低了声音问她的丈夫。

“重要的是，他们两个彼此喜欢，而且相互信任。”她的丈夫费尔南多·迪亚斯平静地回答。

雷特西亚耸耸肩，她想起逃跑的神父埃尔泽维尔·阿尔蒙特犬儒主义的道德观，不禁羞红了脸。不过，她很快又骄傲地看起新家的客厅来，这是共和国银行的二楼，她的丈夫刚刚在一个月前被提升为主管。

他实现了他的诺言。就像他承诺的那样，他辛勤地工作，从会计晋升到出纳又被提为银行主管，他对雷特西亚说，为此他牺牲了十一年的夫妻生活，与劳拉的亲近和家庭的正常秩序，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单身汉的日子——费尔南多和他的儿子圣地亚哥，他与亡妻艾丽莎·奥夫雷贡那

段婚姻的结晶——不论被服侍得多么周到，他们还是任凭点燃的或是熄灭的雪茄烟到处乱丢，书籍摊在床上，袜子丢在床下，长久以来床铺总是一片狼藉。

现在，圣地亚哥斜倚在这个舒适甚至可以说是豪华的新家的床上。他身上穿的带褶边的长睡衣像是一个鸽子窝。他并上双腿，同父异母的妹妹劳拉抱着一大摞书，像摇摇晃晃的秋千一样走了进来，手里的书本摞得就像是比萨斜塔，圣地亚哥急忙冲上去接应他的妹妹，以免阿纳托尔·法郎士①和保罗·布尔热②的著作掉在地上。

他们才刚刚认识，就已经"意气相投"，就像那时他们彼此之间说的那样。尽管他们之间的相遇是不可避免的，可是无论是雷特西亚还是她的丈夫费尔南多，两个人都有几分担心，因而从一开始，他们就在留心他们之间的交往。母亲担心一个正要进入青春期的小姑娘会因为与一位大她九岁的男子的亲近而受到影响，甚至是接触到不良的东西。他的确是她的哥哥，但是不管怎样又是一个陌生人，一样全新的东西。劳拉抛弃了乡村的生活，离开了堂费利佩·克尔森家长一般的统治，离开了残疾的外祖母和三个任劳任怨的姨妈，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母亲不再与她同住，而是睡在了在此之前一直单独睡觉的父亲床上，剩下女孩儿单独一个，她不能和同父异母的兄长睡在一起(这是她最初的天真愿望)。什么样的栅栏能够关住她湖水波浪一样的心呢？

"热带地区的女人成熟得早，费尔南多。我十六岁就嫁

① 法郎士，法国作家。192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② 布尔热，法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保守知识分子思想的代表人物。

给了你。"

我没有把实话都说出来，在我同父同母以及同父异母的姐姐们的脸上，我看到了孤独生活的痕迹，她们三个注定孑然一生，因为她们爱着别的东西，维尔希尼亚喜欢写作，希尔达想成为音乐家，她们知道永远不能实现，却不肯放弃这个愿望，这种无言而又苦涩的虔诚促使她们努力地去为一群看不见的人写诗和弹奏钢琴，她们的十四行诗和奏鸣曲好像是对她们父母费利佩和科西玛的指责。相反，玛丽亚·德·拉奥因为单纯的感恩而终身不婚，科西玛把她从悲惨的命运中拯救出来，玛丽亚·德·拉奥从此对这个给她庇护的家庭死心塌地。雷特西亚，当她还是个女孩子的时候便洞悉了家里全部良好而安静的规则，一面是父亲堂费利佩的幸运，一面是母亲科西玛和姐姐们的不幸，她决定尽早地甚至没有任何条件地嫁出去，以摆脱那些放纵而又模糊的灰色迷梦，正是这些毫无轮廓的梦想使得这三位卡特马哥的女子变成了迷雾中一出滑稽戏的角色。她嫁给了费尔南多，把自己从单身中拯救了出来。她有了一个女儿，免除了不育之虞。她与自己的家人住在一起，这样又把自己从忘恩负义中拯救了出来(只是借口而已)。费尔南多非常理解她，同时，他也需要时间升职，为雷特西亚和劳拉提供舒适的生活，而且，他要照顾他的儿子，圣地亚哥，这个没有母亲的孩子，因此费尔南多和雷特西亚定了一个特殊的协约，他们两个人都认为这份约定不仅仅是合理的，更是可以忍受的。

这一约定加强了堂费利佩对他女婿的依赖。此时正值波菲里奥·迪亚斯统治的后期，工人罢工被血腥镇压，革命的星星之火在墨西哥北部燃起，维拉克鲁斯本地的工会运动如火如荼，堂波菲里奥向美国记者克里曼发表了一番不

合时宜的讲话("墨西哥已经到了实行民主的时候了"),马德罗[1]的反再选运动,还有在市场内播下不安的种子的弗洛雷斯·马贡兄弟。血腥的美西战争之后,维拉克鲁斯的制糖业已无力与古巴抗衡,墨西哥的德裔企业家习惯于向墨西哥城的德国矿业公司求助,然而这一次却无人理会。欧洲战争一触即发。巴尔干成了一个火药桶。法国和英国结成协约国,德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结成同盟国,只差挖掘战壕,等待火花出现,燃起欧洲的熊熊战火。物资极其匮乏,资本冻结起来供给战争,而不是向墨西哥的德裔庄园主提供担保。

"我有二十万株咖啡树,出产一千五百公担的咖啡。"堂费利佩说:"我缺的是担保,我缺的是流通……"

他的女婿费尔南多·迪亚斯说不用着急。他已经升任共和国银行维拉克鲁斯支行的经理,他可以向堂费利佩和美丽的"女朝圣者"庄园(为纪念美丽的德国新娘堂娜科西玛而得名)提供担保。银行把收获的产品卖到港口的商行,从中抽取佣金,并保证克尔森庄园的收益。雷特西亚和小女孩劳拉也终于能够和堂费尔南多·迪亚斯以及圣地亚哥父子生活在一起了,这一家四口在共和国银行维拉克鲁斯支行的屋檐下得以团圆。

对于劳拉来讲,住在一个被街道而不是田野包围的房子里是多么新奇呀!她看到形形色色的陌生人每天从阳台下走过;他们家住在二楼,一楼是银行办公的地方;她舔着阳台的栏杆,尝到了一股咸味,她看着维拉克鲁斯沉重迟缓的铅灰色的大海,当狂虐的风暴过去,大海变得明净起来,

① 弗朗西斯科利·因达莱西奥·马德罗(1873—1913),墨西哥总统(1911—1913)。1913年被韦尔塔暗杀。

准备迎接下一次风暴的到来,大海吐出的热气与湖泊的凉爽是如此不同……满身珠宝的女巨人雕像所主宰的丛林,她真的看见了她,那不是梦幻,不是木棉,外祖父费利佩一定把劳拉当成了货真价实的傻瓜……

"茂密的森林,潺潺的流水,流通的空气还有许多热咖啡;这是抵御酷暑的好办法。"雷特西亚坚定地说,这位摆脱了父亲的监护,越来越自信的女主人,在丈夫的身上发现了当他还是她未婚夫的时候就使她高兴的优点,他们是在特拉科塔勒班圣烛节上认识的。

他是一个温柔的男人。工作自觉,效率很高。他希望晋升。他读英文和法文的书,不过更加亲英一些。但是他常常意识到一种奇怪的虚无,这种虚无阻碍了他去了解生活的秘密,阻碍了他去探听每个人心底的秘密,这是好是坏,无法下定论。总之,对于费尔南多来说,生活就是如此,准时上班,争取晋升,享受生活,还有种种的个性,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都是值得尊重的秘密。

对于这位有教养的四十五岁男子而言,探究他人的心灵无非是长舌妇们做的事,窥人隐私,飞短流长。雷特西亚之所以爱他是因为三十岁的她——结婚的时候才十六岁——有着同样的美德,和他一样对其他人的秘密漠不关心。惟一的一次她使用了这种表达方式"其他人",费尔南多放下托马斯·哈代的小说,对她说,千万不要说"其他人",因为这就好像在说他们是多余的人。

"我建议你用名字称呼别人。"

"包括那些我根本不认识的人?"

"编个名字。五官和衣着会告诉你这个人是谁的。"

"斜眼,丑汉,清洁工?"雷特西亚笑着说,她的丈夫和她一起,分享着一种特别而又宁静的幸福。

"美男子"。从孩提时代,劳拉就听说过这位把外祖母科西玛手指砍掉的土匪的外号,而她现在想把这个外号安在她同父异母的哥哥身上,中午十二点,他一袭白衣,领子高挺,戴着一条丝质的领带,身穿亚麻上衣和裤子,脚穿鞋带结法复杂的高腰黑色皮靴。他的面容更是与众不同,对称的五官让劳拉想起了热带丛林中的南美杉叶子。在他身上,一切都是对称的,他起床之后,影子就像他的孪生兄弟,在他的身边,从不缺席,从不偏斜。

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面容这完美的对称,圣地亚哥戴上了一副精巧的眼镜,银质的镜框几乎看不出来,当他戴上眼镜的时候,他的眼神变得深沉很多,而当他摘下眼镜的时候,他的眼神却没有变得迷茫。他在和眼镜游戏,一会儿把它藏在上衣口袋里,一会儿又把它像羽毛球一样,往天上扔去,之后不慌不忙地接住,放在口袋里。劳拉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我念完了预科。我父亲让我休息一下。"

"什么意思?"

"一年的自由,来让我严肃地决定自己的未来。你看到了,我在读书。"

"实际上,我见你的次数并不多,圣地亚哥。你总是动不动就不见了。"

年轻人笑了,他把手杖放在前臂,宽容地抚摸着气急败坏的小妹妹的头发。

"我已经十二岁了。快十二岁了。"

"我真希望你已经十五岁了,这样我就可以把你拐跑了。"

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堂费尔南多看到英俊高大的儿子走过,他怕妻子会责怪他,不是因为十二年的分离和等待,

也不是因为这些年来父子相依为命却把妻女排除在外……毕竟母女俩这些年来相依相伴过得也算幸福，而且他们一致认为分离将为日后的共同生活奠定持久稳固的基础。

堂费尔南多相信他们的婚姻尝试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不仅不是绝无仅有的，而且还给他们的婚姻镀上了光环（我们不能仅仅认为是一种试验或者牺牲，那也是预支、赌注和迟来的幸福）。

他害怕的是另一件事。是圣地亚哥自己。

他的儿子是一个例证，证明了父亲的意志无法把儿子塑造成与自己同一类型的人。费尔南多自问，如果给他完全的自由，他是不是会变得更加顺从？这和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他会有什么区别呢？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停滞在那个谜团边缘，那个费尔南多不知道如何探索的奥秘：别人的个性。他的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做了些什么？喜欢什么？想些什么？父亲无法回答。当圣地亚哥结束了预科学习，他请求一年的休息时间来决定自己的未来，费尔南多高兴地答应了。儿子的毕业与第二任妻子和女儿的到来，这一切都好像与这位会计师兼总经理的计划完全相符。圣地亚哥休息期间不在家中，正好可以让一个新的家庭不费周折地安顿下来（费尔南多不无羞愧地想道）。

"这段时间你准备去哪里？"

"我待在维拉克鲁斯，爸爸，这个港口，我的故乡，我居然一点都不熟悉，你看多滑稽呀。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

圣地亚哥从少年时代起就很好学，博览群书，文笔细腻。他曾经在少年读物上发表过诗歌和文学艺术评论。教授他的诗人萨尔瓦多·迪亚斯·米隆评价他是一个前途无量

的青年。费尔南多想着，谁能向我保证这一切是在预示一种延续，即使有短暂停顿的一种延续？抑或是在预示着一种规律，不是反叛，便是一种糟糕的特例？费尔南多曾想像他的儿子在结束了高中的学业之后，会用这一年的时间去旅行——父亲已经存好了足够的钱，而等他回来以后，他就会一扫年少时的轻狂，上大学，重新开始写作，成家立业。就像英国小说中写的那样，进行一场“伟大的旅行”。

“我就待在家里，爸爸，假如你不介意的话。”

“不，儿子，这是你的家，你什么都不会缺。”

他没有什么好害怕的。费尔南多的私生活可以称得上一个清白的典范。很多人了解他的过去，他的第一任妻子艾丽莎·奥夫雷贡是加利西亚人的后裔，生圣地亚哥时难产死了。这个现在刚刚高中毕业的诗人被一位仁慈的耶稣会教士抚养长大，在奥里萨瓦城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初的七年，他的父亲堂费尔南多再娶之后，离开了卡特马哥的新家，带着圣地亚哥生活在维拉克鲁斯。

在一次邻里的聚会上，这位严肃、正派、缺乏想像力但精通数目的男人被邀请介绍自己时说道，有时候为了完成责任有必要延迟幸福的到来，这样做最后反而会增加幸福感。

这些理由好像是要说服聚会的人，但只引起了当时在场的诗人萨尔瓦多·迪亚斯·米隆的嘲笑。

“毫无疑问，堂费尔南多，您比贡戈拉[①] 还要巴罗克。”

就是这样，堂费尔南多从不进入他人的世界里，也没有人能够进入他的世界——也许是因为那世界根本不存在。除了他的第二任妻子，他的完美伴侣。在这一点上，她与他

① 贡戈拉，西班牙著名诗人。夸饰主义的代表人物。

是完全相同的。然而,这对新婚夫妇刚开始的日子的确是巴罗克的。十一年里,雷特西亚在她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亚·德·拉奥的陪伴下,每月来维拉克鲁斯看费尔南多一次,她的丈夫在迪利亨西亚旅馆开了一个房间,以便两人相会。而玛丽亚·德·拉奥此时小心翼翼地消失了,只有失去了手指的外祖母堂娜科西玛·克尔森在猜测着她究竟去了哪里。每三个月,费尔南多回卡特马哥一次,问候外祖父,和劳拉一起共叙天伦。

在港口,父亲和儿子住在一幢公寓一室一厅的套间里。圣地亚哥住在卧室,在那儿,他可以读书、写字……费尔南多住在客厅,好像只是工作间歇之时顺便经过一样。每个人有独自的盥洗池和镜子以供穿衣打扮;公共浴室离这儿有两个街区。一个长着云朵般头发的黑女人负责清理夜壶。公寓提供一日三餐。

现在,一切都改观了。银行的上面,是经理的住宅,拥有各种各样舒适的生活设备。客厅很大,看得见码头的风景。藤条编的沙发用来乘凉。上漆的木质桌子,象牙镶边。还有摇椅、电灯、古老的烛台和橱柜,橱窗里陈列着从德累斯顿买的穿着考究的小人:殷勤有礼的宫廷朝臣,爱做白日梦的牧人和两幅精美的绘画。

在第一幅中,一个小流浪儿,拿着一根枝条骚扰一只熟睡的狗。第二幅中,那狗咬着小孩的腿肚子。他跳不过去了,一边挣扎,一边哭……

"让睡觉的狗躺着① ……"每当迪亚斯先生斜着眼看这两幅画,他总要一成不变地这样说道。

餐厅里摆放了一张可供十二个人就餐的餐桌,还有盛

① 意为不要惹麻烦。

满盘碟的玻璃橱。这些餐具上有手工绘制的反拿破仑战争的场景,还画着花冠形状的金色浮雕。

前饭厅,费尔南多称之为 pantry,位于饭厅和散发着青草、佳肴和熟得从中间裂开的热带水果的香气的厨房之间。厨房里面有火盆和饼铛,不知疲倦的手扇着蒲扇,让锅下的火苗越着越旺。在堂娜雷特西亚的心目中,再也没有比守在砖和铁砌成的灶台边,扇着蒲扇,拨旺炉火,看着汤、米饭还有菜肴咕嘟冒泡更让她满意的事情了,松戈里卡山区的印第安女佣在做玉米饼,黑仆桑帕亚一边在走廊里浇花,一边哼着小曲,好像是在为自己唱赞歌一样:

黑人桑帕亚在跳舞
他跳的舞呀真稀奇……

有时候,劳拉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兴致勃勃地听父母初次见面的故事,这个故事她百听不厌,他们相遇在特拉科塔勒班的圣烛节庆典上,这是一个小村庄,每年的 2 月 2 日,所有的人,不论老幼都会来到帕帕罗阿班河岸边的广场上,伴随高音短笛和小吉他的旋律翩翩起舞,河中,圣母的塑像从一只船上传到另一只船上,同时当地人开始打赌,他们赌今年上帝的母亲戴的是去年杜尔塞·玛丽亚·埃斯特维斯捐赠的头发还是今年玛丽亚·爱莲娜·穆尼奥斯捐赠的头发,因为圣母每年都需要不同的新鲜头发,能够把自己的头发献给圣母,对于正派清白的小姐来说,真是莫大的荣耀。

经过圣母像时,马队的男人们摘下了帽子,费尔南多·迪亚斯,这位三十二岁的维拉克鲁斯鳏夫,却目不转睛地盯着雷特西亚·克尔森小姐(他向别人打听到的名字),她年方十六,身材高挑,五官精致,身着一袭如羊皮纸一般光滑的

白色衣裳,打着赤脚,倒不是她没有鞋穿,而是因为在特拉科塔勒班,最大的快乐就是赤着双脚,走过长着青草的街道(她是这么解释的,当时,她差一点就滑进了烂泥里,鳏夫费尔南多适时地拉住了她)。他曾经在其他的城市见过这种长着青草的街道吗?没有,费尔南多笑着回答,他也脱下了样式繁琐的靴子和红白相间的袜子,特拉科塔勒班人既惊异又快乐地看着他,雷特西亚小姐笑得喘不过气来。

“这袜子好像是小丑穿的!”

他的脸红了,暗自责备自己做了一件没有分寸的事情,这不符合他的一贯作风。她说她就这样爱上了他,因为他当时脱下了靴子,脸红得和那双袜子一样。

“后来呢,后来呢?”劳拉问,她几乎对这段往事倒背如流。

“那个村庄简直无法形容,得亲自看看才行。”她的父亲补充说。

“什么样呀,什么样呀?”

“好像是玩具。”堂娜雷特西亚接着说:“所有的房子只有一层,一模一样,不过每一幢都有自己的颜色。”

“蓝,粉红,绿,红,橙,白,黄,紫。”劳拉一口气列举出这么多颜色。

“那儿的墙壁是世界上最美的。”爸爸点燃了一枝雪茄,下了这个结论。

“一个玩具一般的村庄……”

现在,他们住在港口的大房子里,姨妈们来看望他们,堂费尔南多劝说她们:“现在,雷特西亚、劳拉和我全家团圆了,难道你们还不想结婚吗?”

“要是我们结婚的话,谁来照顾玛丽亚·德·拉奥呢?”

“你们总是有借口。”堂费尔南多笑着说。

“这是事实，”玛丽亚·德·拉奥辩解道：“我会留下来照顾父亲，希尔达和维尔希尼亚要是愿意的话，就可以成家了。”

“我不需要丈夫。”作家姨妈维尔希尼亚笑着说：“……我是漂亮的忧郁女人①……我不需要别人的赞赏。”

钢琴家姨妈希尔达打断了大家的说笑，她说了一句谁都不懂的话，给这个话题画上了一个句号：

“一切都躲藏起来，窥视着我们。”

费尔南多看了看雷特西亚，雷特西亚看了看劳拉，小女孩挥舞着双手，模仿这位最为白皙的姨妈弹钢琴的动作，维尔希尼亚姨妈狠狠地打了她一下，劳拉忍住疼痛，不让眼泪流下来。

姨妈们来访的时候，通常是邀请维拉克鲁斯上流社会的成员前来做客的好机会。一天下午，一群贵妇聚在一起的时候，玛丽亚·德·拉奥姨妈走了进来，一位夫人对她说：

“姑娘，你来得太是时候了。给我扇扇风吧。不要那么懒惰，小黑姑娘，你看天多热呀……”

大家都笑起来，玛丽亚·德·拉奥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劳拉站了起来，挽着混血姨妈的胳膊，来到一张椅子前面。

“坐在这里，亲爱的姨妈，我先去给那位夫人扇扇子，然后再给你扇。”

一天晚上，从她异母哥哥房中传来的呻吟声将她惊醒了，那天之后，劳拉觉得在她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些永久的变化。她很害怕，不过当她第二次听到那痛苦的呻吟传来，就踮起脚尖，来到哥哥的房门前。她没有敲门，径直就闯了进去，圣地亚哥躺在床上，表情痛苦，他用眼神不可思议地向

---

① 原文为法语：Je suis la belle ténébreuse.

劳拉打了声招呼，眼睛里闪出一丝对劳拉到来的感激，尽管他的话语在试图掩饰他的感激，劳拉，不要出声，回到你自己的房间里，不要吵醒别人……

他的衬衫从肩部开始被撕碎了，他的右手紧紧护住前臂。这个小姑娘能帮上什么忙吗？

"不用。真的。你回去睡觉，别把这事告诉别人。你发誓。我自己会照顾自己的。"

劳拉画了一个十字。第一次有人需要她，尽管没有明言，不是她求别人帮忙，而是别人恳求她的帮助，尽管他说的是"不"，但是他实际在说"是的，劳拉，请帮帮我"。

从那一晚开始，每个星期六，他们都会牵着手，一起去大堤上散步，他胳膊上的伤口结痂了，劳拉感到紧张不安。这是他们两个人的秘密，他知道自己拥有她，她因为他知道这一点感到新奇、自豪。只有在牵着他的手的这一刻，劳拉才会感觉到自己属于维拉克鲁斯，海与天交汇在这个激荡的小海湾，海与天之间狂风呼啸，震撼着维拉克鲁斯后面闪光的平原，扫荡一切，直至消失在丛林中。她可以向他讲述卡特马哥的故事。他相信她看到的丛林之中的女人不是木棉树，而是一尊雕像。

"没错。是萨波塔尔文化的雕塑。你外祖父不知道吗？"

劳拉摇摇头，不，外祖父毕竟不会什么都知道，女孩头上的黑色发卷轻轻摇着，散发出好闻的香皂味。

"我爸爸说得真有道理。'圣地亚哥一个人占据了全家的智慧，只给我们施舍了一点儿'。"

圣地亚哥笑着说，关于树木，飞鸟，花朵，以及整个大自然，劳拉比他知道得多多了。他对此一无所知；他只希望有天能够这样消失，化身成丛林，变成一棵劳拉熟悉的树，比

如红木,南美杉,对称的花朵一齐绽放,月桂……

“不,那不好。”

“但是很美。”

“它毁掉一切,吞噬一切……”

“那我做木棉。”

“不,木棉也不好。树枝上全是鸫鸟,到处拉屎。”

圣地亚哥笑得透不过气,他说那么我就当无花果树或者紫百合或者印度郁金香,她回答说这个好,这个好,圣地亚哥,她笑得不像个孩子,她暗自奇怪,自己笑起来像个成熟的女人,再也不是那个黑色发卷散发着肥皂香的小女孩了。和圣地亚哥在一起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就像那个中国娃娃,李白。现在一切都变得不同了。

“不,木棉不能抱。木棉身上长出了匕首。”

她看着兄长受伤的胳膊,一言不发。

他开始每个星期天在共同生活的房子门口等她,好像他来自别的地方,他送给她一些小礼物,一束花,一个能听到海的声音的海螺,一只海星,一张明信片,一只小纸船,而雷特西亚则在晾晒衣服的平台上不安地张望(和在卡特马哥一样,她喜欢洗净的衣服贴近身体所散发出的清香),看着他们走远;她不知道她的丈夫费尔南多在客厅的阳台上也在这样张望。

劳拉在散步中收获的并不是只有海星和鲜花。她的同父异母的兄长和她讲话,好像她不是只有十二岁,而是像他一样已经二十一岁了,或者更成熟。他是需要向别人吐露心曲还是想认真地对待劳拉?圣地亚哥真的认为劳拉会听得懂他讲述的一切吗?对于劳拉来讲,他带她出去散步,带给她一些东西就已经足够美妙;不是指礼物,而是那些深深植入她内心深处的东西,他向她讲述的事情还有她陪伴他

得到的一切。

一天下午,他爽约了,她靠在房子的墙上(一层银行办公室的外墙),在这正在午睡的城市里,她感到如此的无助,她想跑回自己的房间,却又觉得这是逃避,是怯懦的表现(当时,她还不知道这个词,不过,从那一刻开始,她体会到了那种感觉)。她想她还不如消失在热带丛林中,这样她可以躲藏起来,独自长大,这样,这个英俊聪明的男孩就不会性急地带她走进一个不属于她的年龄。

她走着,在转弯处,她看到圣地亚哥靠在另一面墙上,他们笑了,亲吻着,他们误会了,原谅了彼此。

"我在想,要是在湖边,就轮到我领着你去看东西了。"

"劳拉,要是没有你,我会在丛林里迷路的,我是这里的人,属于城市,属于港口,我害怕大自然。"

她很疑惑,但是没有说什么。

"她会比你我更长久。"

他们来到码头的尽头,他停住了脚步,专注地看着,看到他这个样子,她感到害怕,一如从前听他讲那番话时一样地害怕。他说过,有时,他想走进她深爱的莽莽林海,消失在里面,再也不出来,再也不想见到人类的面孔。

"他们想要我怎样呢,劳拉?"

"大家都说你很聪明,说话好听,写文章也漂亮。我们的父亲说你前途无量。"

"老头儿是个好人,可那只是他的美好愿望。等哪天我给你看我写的东西。"

"太棒了!"

"不是什么天才之作,只不过语法正确,说得过去而已。"

"你说的这些还不够吗?"

"不,不是这样。要知道,我最厌恶的就是庸庸碌碌。我们的父亲就是这样,请原谅我这样讲他,他只是羊群里的一只好羊。而仅仅成为艺术家群体中的一员,在艺术,在文学……这些领域里混上一个位置,那样绝对不行。我会受不了的,劳拉,我宁愿一无是处也不愿做个庸人。"

"你不是的,圣地亚哥,别这样说,你是最好的,我发誓。"

"那我告诉你,你是最美丽的姑娘。"

"唉,圣地亚哥,不要总想着成为最好中的最好,为什么不能成为第二流中的最好呢?"

他捏了捏她的脸颊,他们又一次笑了起来,当回到家里的时候,他们的父母一言不发,因为费尔南多想,无中生有,罗织罪名,这是埃尔泽维尔·阿尔蒙特神父在卡特马哥犯下的罪行,这些臆想的罪名会把人毁了的,因为雷特西亚想,我承认我不了解我的儿子,对于我来说,这个孩子是个迷,但是我了解劳拉,我相信她,对吗?

下个星期天,他带她来到码头,让她看那些铁轨,火车载着尸体来到这里,这些尸体属于那些勇敢地宣布罢工并英勇地坚持下去的布兰科河的工人,他们最后被堂波菲里奥下令枪杀,他们在这里被投入大海。独裁者只能靠血腥维持统治,他将叛乱的美国佬关在索诺拉海域的舰船上,他下令枪杀加纳内亚的矿工,他把成百上千的工人囚禁在一处名叫民族谷的地方,他在乌路亚的堡垒里,关押自由主义者,马德罗和弗洛雷斯·马贡兄弟的支持者,工会主义者。他们是我的母亲艾丽莎·奥夫雷贡,这个加纳利女人的西班牙同胞,劳拉,他们是革命者。劳拉,革命者,这些人想为墨西哥谋求的东西很简单:民主,选举,土地,工作,不连任。堂波菲里奥执政已经三十年了。

“对不起,向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我还要讲演一番。”

革命者,那天和之后的夜晚,这个词开始在劳拉的脑子里轰响。从前,她从未听说过这个词,当她和她的母亲返回咖啡庄园的时候,她询问外祖父:“什么是革命者?”

“一个三十岁就该放弃的幻想。”

“唉,圣地亚哥刚满二十岁。”

“有道理。告诉你的哥哥,让他抓点紧。”

堂费利佩在庭院中和一个戴着肮脏白手套的英国人下棋,外孙女的这个问题使他被迫弃相,车王易位。这位德国老人没有再说什么,而那个英国人却喋喋不休:

“另一场革命,为了什么?所有的人都已经死了。”

“理查德先生,您也要希望别打仗,因为那样会死更多的人。”堂费利佩想把注意力从劳拉身上转向带手套的英国佬,并把他的注意力从下棋上引开。

“再说,您是德国人,我是英国人,我干吗和您说这些……我们是敌对的兄弟。”

堂费利佩辩解说自己不是德国人,而是墨西哥人,他的王被对手包围了,英国人大叫“将”。然而,仅仅四年之后,堂费利佩和堂理查德就彼此不再说话,更不下棋。他们在无聊和悲伤中死去;伊普尔[①] 战役的炮声响起,战壕成了英德年轻人埋骨之处,直到那时,费利佩才向他的女儿们和外孙女透露一段隐情。

“什么事儿呀,他戴白手套,是因为他为了赎罪切开了自己的指头肚儿。英国佬在印度切开了纺棉花人的手指肚,省得他们同曼彻斯特的纱厂竞争。没有比英国佬更残忍的了。”

---

① 伊普尔(Ypres 德语),佛兰芒语作 Ieper,比利时西部佛兰德省城市。

“背信弃义的英格兰。”维尔希尼亚姨妈说，为了不拉在后面。“背信弃义的英格兰。”

“那德国人呢，外祖父?”

“哎，孩子。没有人比欧洲人更野蛮了。你会看到的。所有的人都一样。”

“所有。①”维尔希尼亚违反了禁令，低声哼哼着。

但是她什么都没看到。她只看到了她哥哥圣地亚哥·迪亚斯的尸体。1910 年 11 月，他因为与在同月被枪杀于普埃布拉的卡尔曼兄弟和阿吉雷斯·塞尔丹这些自由派、工会主义者、马德罗主义者联合密谋反对联邦政府而被枪杀。

费尔南多·迪亚斯在银行楼上的客厅中给儿子守灵，儿子的尸体被密密麻麻的子弹射穿，脸色更加苍白，面容却丝毫未损，费尔南多没有想到这位白衣少年的平静竟会又一次被警察搅乱。

“这是公共场合。”

“这是我的家，先生。这是我死去儿子的家。我希望得到你的尊重。”

“只能在墓地替反叛者守灵。快点，都出去!”

“谁能帮帮我。”

费尔南多，雷特西亚，黑仆桑帕亚，印地安女仆们，还有劳拉，她将一朵花别在刚刚发育的胸脯上，他们抬着棺材，但是劳拉说，爸爸、妈妈，他爱堤坝，他爱大海，爱维拉克鲁斯，他的坟墓应该在这里，女孩子拉着妈妈的裙子，乞求地看着父亲和仆人们，他们听了她的话，好像每个人都害怕，如果埋葬了圣地亚哥，有一天，别人会把他挖出来再枪毙一次。

---

① 原文为德语：Uber alles.

兄长白色的身躯在大海坟墓里消失得如此缓慢,尸体绑缚在尸床上,棺材的盖子被故意打开,这样,大家都可以看见他缓慢地消失在风平浪静的夜色中,圣地亚哥在敞开的棺材里下沉,他变得越来越美丽,越来越悲伤,越来越让人牵挂,越来越令人心碎,海藻将会给他的脑袋戴上王冠,鲨鱼会把他的头连同那些没有写完的诗歌一起吞掉,行刑之前,他最后的愿望是保存这张脸:

"请不要打我的脸。"

没有过多的沉浮,圣地亚哥在海中慢慢地消失,仿佛消失于一面镜子之中,这面镜子,没有使他面目全非,而是一点一点地,神秘地将他送往远处,这面空气的镜子镌刻着他在人世的时刻。圣地亚哥渐渐远离海平线,远离了被寄予厚望的青年时代。他在大海之中漂浮,他请求那些爱他的人:让我消失,成为大海。劳拉,我无法像那天和你说的那样化成丛林,小妹妹,我只向你撒了一次谎,有些事情的确可以倾吐,的确可以诉说,我不会因为害怕流于平庸而保持缄默;因为我了解你,劳拉,每天晚上我在睡梦中想:除了劳拉你,我还会向谁倾诉呢?我在梦中决定为你而写作,美丽的小姑娘,尽管你不会懂,我们也不可能见面,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你,总有一天,你会了解这些,你会知道这些词汇属于你,你是我惟一的读者,为了你,我的每个词都不会浪费。今天,我将沉没在永恒的大海中,我将呼出肺内残存的空气,并将这些水泡奉献给你,亲爱的,我强忍悲痛告别自己,因为我不知道今后会与何人倾诉,我不知道。

劳拉记起她的兄长曾经希望永远地消失在丛林里,化成丛林。她这时希望同他一起变成大海。但是她脑子里却想着向他描述自己生长的湖区。真奇怪,圣地亚哥,我在湖边长大,却没有好好地看过它,湖很大,简直是个小小的海

洋，然而，我对它的记忆却是破碎的，埃尔泽维尔神父没来之前，姨妈们在这里洗澡，渔夫们在这里停靠，艄公们在这里休息，但是，圣地亚哥，我从未像你了解大海一样了解湖泊，我不得不去想像自己成长的地方，哥哥，你迫使我去想像湖和其他的一切，在这一刻，我知道今后我将不会坐视事物溜走，我不会不加注意便让它们逝去，你迫使我去想像你不曾经历的生活。但是，我发誓，你将生活在我身边，在我的脑海里，我的故事里，我的想像中。我不会让你从我的生活里逃走，圣地亚哥，你是我最重要的东西，我会永远想像着你，对你忠贞不二，我以你的名义生活，完成你未尽的事业，我不知道怎样去做，我年轻英俊却死去的哥哥圣地亚哥，说实话，我不知道怎样去做，但我发誓我会去做的……

这是她最后的想法，她转过身去，背对沉入海底的尸体，回到家中，她放下自己的想法，准备再次做个小姑娘，失去圣地亚哥曾经给予她的短暂的早熟。她恳求保存那副伤痕累累的眼镜，想像着他不戴眼镜的样子，她希望他摘下眼镜，把它放在衬衫兜里……

第二天，黑仆和往日一样边唱边打扫走廊，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结成对儿，跳起舞，
腰放松，放松放松
再放松……”

第四章　圣卡耶塔诺:1915年

“你认为你非常了解圣地亚哥吗?你认为你的哥哥把一切都给了你吗?对这样一个复杂的人,你知道的太少了。他只把一部分给了你。他把他孩童的心灵中多余的那一部分给了你。一部分给了他的家庭,一部分给了他的诗歌,一部分给了政治。然而,激情,恋爱的激情,他又把它给了谁呢?”

堂娜雷特西亚一语不发,她希望能够及时完成舞衣上的贴边。

“不要动,孩子。”

“妈妈,我很紧张。”

“没必要紧张呀,这只不过是个传统的舞会,又不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

“对我而言是这样的。妈妈,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舞会。”

“你会习惯的。”

“真难受。”劳拉笑着说。

“安静一点儿。让我干完活。你这个姑娘呀!”

劳拉穿上了这件淡黄色的衣服,跑到镜子前,她看的并不是身上穿的时髦的衣服,她的母亲心灵手巧,仿照最新一期的《巴黎生活》做了这件衣服,现在,由于欧洲战争的爆发,也由于哈拉帕和维拉克鲁斯距离遥远,这本杂志总是迟到,但尽管如此,每隔一段时间,终究还是会到的。巴黎已

经摒弃了19世纪凡尔赛式的撑裙、筛架和束胸这种繁琐而又不舒服的款式。今日的款式就像亲英派的堂费尔南多说的那样是“流水型”，也就是说，像小河流水一样，样式简单，线条流畅，与女性躯体的真正曲线一致，肩部、上半身和腰身纤细而又曲线毕露，腰部以下遽然张开。劳拉所穿的巴黎样式在胯部和小腿之间收束了一些，裙摆并不是像前袖那样卷起来，而是在腿间，好像一位女王为着跳舞而撩起了裙尾。

劳拉看着她自己，而不是身上的衣服。她十二岁时就已经显露出的这些特征并没有随着五年时光的流逝而减弱，反而加强了。她有着一张坚毅的脸，她的额头过于宽阔，鹰勾鼻子过于大了，而嘴唇过于薄了，但是，她喜欢自己的眼睛；它们呈现出清澈的栗色，好像是镀了一层金一样；当太阳初升和落山的时候，它们现出真正的金黄色。就算是醒着的时候，看上去也像是在做梦。

“我的鼻子，妈妈……”

“你很幸运，你看意大利电影里的女明星。她们都是大鼻子……对，侧影很动人。不要告诉我你想有一张扁平的脸，别开玩笑了……”

“我的额头，妈妈……”

“要是你不喜欢的话，用刘海遮住吧。”

“我的嘴唇……”

“你可以把它描画成你喜欢的形状。亲爱的，别看别的部位了，上帝给了你一双多么美丽的眼睛……”

“是的，妈妈。”

“真爱虚荣。”雷特西亚笑着说。

劳拉却不敢去设想。要是亲吻时弄掉了我嘴上的唇膏，我会不会看上去像个假惺惺的戏子，要是他们再来吻

我，我是不是得像老太太那样抿着嘴唇，捂着肚子装成要呕吐的样子，跑到洗手间里，重新画我的嘴唇呢？做一位小姐多么麻烦呀！

“什么都别担心，你非常漂亮，你会引人注目的。”

她没有问雷特西亚为什么不陪她去舞会。她将会成为惟一的一个没有保护人的女孩。这会给人不好的印象吗？雷特西亚曾经总是叹气，但是她决定以后再也不这样做了，因为她想起了这是她那总是坐在卡特马哥家中摇椅上的母亲科西玛的习惯。她以前总是唉声叹气。就像堂费尔南多说的那样，要么不下雨，一下就停不住了。

三位单身的姨妈在卡特马哥照顾外祖父费利佩·克尔森，他身上各样的宿疾一点点地汇聚起来，没有间歇，就像他自己在惟一一次被女儿们逼着到维拉克鲁斯去看病的时候所预料的那样。“你觉得怎么样，爸爸？”三个女儿齐声问，这个异口同声的习惯一天天地根深蒂固，而她们自己却没有察觉。

“我有胆结石，心律不齐，我的前列腺像甜瓜那么大，我还有胃憩室炎和肺气肿的前兆。”

女儿们又惊又怕地面面相觑，而他却微笑着说：

“别担心，米奇斯医生说了，这些小病单个来没有一种会要我的命。不过要是一起来的话，我就要完蛋了。”

雷特西亚没有待在父亲身边，因为她的丈夫需要她。圣地亚哥死后，银行的总经理把费尔南多·迪亚斯叫到了墨西哥城。

“这事并不急，堂费尔南多，但是您也知道银行要想生存就得仰仗和政府的良好关系。我知道没有人会因为他儿子的行为受到责罚，但是他们是我们的儿子，我有八个呢，我知道我要和你说的是，我们即使不应该受到责罚，至少也

是有责任的，尤其是在他们生活在我们保护之下的时候……”

“经理先生，您简单点说吧。这种谈话让我难受。”

“没有什么，您的继任者已经被任命了。”

费尔南多不屑于作出评论，只是冷漠地看着总经理。

“但是不要着急，我们把您调到哈拉帕的分行工作。您看，这可不是什么惩罚，而是谨慎的行动，而且我们承认您很能干，我的朋友。相同的职位，不同的城市而已。”

“在那里，没有人能让我想起我的儿子。”

“不，儿子是我们的，不论在什么地方。”

“好了，经理先生。我认为这是一个谨慎的办法。我和我的家人都非常感谢您。”

搬离这座面海的二层小楼使他们所有人都付出了代价。对雷特西亚来说，是因为她将远离卡特马哥、她的父亲和她的姐妹。对于劳拉来说，是因为她喜欢生她养她的热带地区的气候。对于费尔南多来说，是因为别人卑鄙地惩罚了他。对他们三个人来说，离开维拉克鲁斯就意味着与圣地亚哥、与对他的回忆、与他大海中的坟墓永远地说再见了。

劳拉在她哥哥的卧室里待了很长时间，她用心地记着这里的一切，她想起了那个晚上，她听到他呻吟，发现他受伤，要是她把这件事告诉她的父母，是不是会救圣地亚哥一命呢？为什么圣地亚哥的请求“不要和别人说”会那么有效力呢？现在，她就要和这间屋子告别，她尽力想像着圣地亚哥在这里写下的所有东西，所有他留下的空白，一大本书中空白的书页等待着手的抚摸，等待着钢笔和墨水，等待着一个不可代替的男子的字迹。

“看，劳拉，你一个人写作，非常的孤独，但是，你使用着

一种属于所有人的东西,这就是语言。世界给了你语言,你又把它回馈给世界。语言就像是世界:我们死了,它却依旧存在。你明白吗?”

堂费尔南多悄悄地走近他的女儿,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告诉她他也很怀念他的儿子,他在想他儿子的一生究竟会成为什么。从前他总是说,我的儿子前途无量,所有的人加起来都不如他一个人聪明,而现在,他的儿子本来要在其中度过一年休息时光的房间无限凄凉,就是在这里他儿子写下了他的诗篇……费尔南多拥抱了劳拉,而她却不愿意看父亲的眼睛;只为死者流一次眼泪,之后,要去做他们已经不能做的事情。当我们的眼睛和心灵被泪水遮蔽之时,我们无法去爱、去写作、去战斗、思考和工作;无休止的哀伤是对逝去的生命的背叛。

哈拉帕是多么不同呀! 由于维拉克鲁斯滨临大海,夜晚的温度并不会比白天凉爽多少;而依山的哈拉帕却是白天炎热,夜晚凉爽。维拉克鲁斯暴雨来去匆匆、气势汹汹,而这里则是细雨绵绵,到处都是绿油油的,细雨蓄满了水坝,这是城市的重要所在之一,里面的水总是涨到了堤坝边缘,同时给人以悲伤又安全的感觉。城里稀薄的雾气从水坝上升腾而起,与山间浓重的水雾相遇;劳拉记起她刚刚来到哈拉帕的印象:凉爽的空气、一场接一场的雨、小鸟、穿黑衣服的女人、美丽的花园、铁制的长椅、被湿气侵蚀成了绿色的白色雕像、红色的屋顶、宽阔而又崎岖的街道、市场和面包房的气味、湿漉漉的院子和果树、橘子的清香还有屠场的臭味。

她走进新家。屋子里洋溢着清漆的气味。房子只有一层,这家人很快为此感到庆幸。劳拉马上想到,在这个雾气弥漫的城市里,她将任凭嗅觉引导着她,这嗅觉将成为她的

安静和不安的尺度:公园中的潮湿,花朵沁人的香气,众多作坊、皮货店里鞣制皮革的气味和油漆店里浓重的沥青的味道,棉花包和龙舌兰绳子的味道,鞋店、药房、理发店还有棉布的气味。滚沸的咖啡,泛起泡沫的巧克力,香气扑鼻。她一直闭着眼睛。她触摸着发烫的墙壁,她睁开眼睛,雨水沐浴后的屋顶闪闪发亮,屋顶危险地倾斜着,好像希望阳光把它们烤干,雨水经过沟渠、街道、花园,从天空降到了堤坝,一切都在这个消沉的城市中运动着,而她是一种永不停息的自然的主宰。

这是一幢典型的庭院式住宅,院中放置着花盆和天竺葵,卧室和其他房间分布在这个四边形的周围。堂娜雷特西亚带来了属于自己的物品,藤条编成的家具适用于热带,但是却无法抵御这个地方的潮湿,她还带来了画着小孩和睡觉的小狗的那两幅油画,并挂在了客厅的墙上。

厨房令雷特西亚欣喜;这是她的私人领地,很快,房子的女主人便把海边的烹饪习惯和山里的口味调和到了一起,她开始做外面裹着一层白面的玉米粽子,她在维拉克鲁斯白花花的稻米中加入了哈拉帕的辣味玉米肉汤,一种用面团、嫩玉米、鸡肉、乳酪等混合制成,味如夹肉面包的美味食品。

“当心呀。”堂费尔南多说,“这儿的食品让人发胖,因为人们要靠脂肪抵御寒冷。”

“不用担心,我们家的人都很瘦。”雷特西亚看着丈夫那双充满了赞许的温柔的眼睛,一边说话,一边做着哈拉帕特有的玉米馅饼,在炸过的软面团中填入菜豆和肉馅,这样就做成了馅饼。面包在家里做:法国军队的占领使得法式长面包流行一时,可是在墨西哥,人们习惯用指小词来形容人和事物,以示亲密,因此,长面包变成了小面包,体积只及手

掌大小。不过,人们并没有忘记墨西哥传统的甜面包,比如奶油糖酥饼,麸皮面包、小旗面包、贝壳面包什么的,当然还有西班牙面包房最为美味的馈赠——浸渍在巧克力中的香甜酥脆的炸糕。

虽然雷特西亚并没有放弃海边的乌贼和海蟹,但她已不再怀念这些东西了,因为她从不多想,便能自然地适应生活,尤其是当生活中,就像在这个新家里,有一个带大炉台和圆火盆的至关重要的厨房的时候。

这是幢只有一层的建筑,从后门即车库门走进去,在房子的尽头有一间小阁楼。劳拉本能似的觉得自己应该要这间房子,作为送给圣地亚哥的礼物,因为在这个女孩心底的一个寂寞角落里,她相信自己要以圣地亚哥的名义去完成劳拉的一生,也许死去的圣地亚哥在继续着名义上是劳拉的人生。这样,她就把哥哥的愿望和一个独特的空间联系起来,一个仿佛他可以在此写作的僻静所在,而她也会通过对逝者的纪念,神秘地找到自己的使命。

“你长大后想干什么?”在拉莫斯小姐学校里的同桌伊丽莎白·加西亚问道。

她不知该如何作答。我希望在那间阁楼里闭门不出,来完成我哥哥的一生。别人不会理解这些,该怎样说出这个秘密呢?

“不行。”她的母亲对她说,“很遗憾,那上面住着阿尔莫尼亚·阿斯纳尔。”

“她是谁? 她怎么有权利住在阁楼上?”

“我不知道,你去问你的父亲吧。好像她一直住在那儿。住进这幢房子的条件就是得接受她,不要打扰她,更确切地说,是不要理睬她。”

“她是一个疯子?”

“不是那么简单,劳拉。”

不,堂费尔南多强调说,工会主义者阿斯纳尔夫人之所以住在这里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她是房子的主人。她是西班牙人,一对西班牙工会主义者的女儿,你知道在胡亚雷斯推翻马克西米利安之后,许多西班牙人来到了墨西哥。他们以为这里将会有自由和光明。但是,堂波菲里奥上台之后,他们的梦想破灭了,很多人回到了巴塞罗那,因为生活在那里,在萨加斯塔与加诺瓦轮流执政下要比在堂波菲里奥的个人独裁下拥有更多的自由。还有一些人放弃了他们的理想,成为了商人、农场主和银行家。

“可是这一切与那位住在阁楼上的女士有什么关系?”

“房子是她的。”

“这不是我们的房子?”

“孩子,我们没有自己的房子。银行让我们住哪儿,我们就得住哪儿。当时银行想买下这幢房子,但是堂娜阿尔莫尼亚不卖,因为她对私有制持否定态度。你尽量试着去理解这件事儿吧。银行留给她这间阁楼,作为购买房子使用权的补偿。”

“那她怎么生活呢?她吃什么?”

“银行给她送来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他们告诉她这是用她在巴塞罗那的同志给她寄的钱买的。”

“她疯了吗?”

“没有,她只是很固执。她相信她的梦想就是现实。”

劳拉对堂娜阿尔莫尼亚没有好感,因为她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圣地亚哥的敌人:她不让这位死去的年轻人在新家里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从未露面的阿尔莫尼亚·阿斯纳尔从劳拉的注意中渐渐消失,那时,这个小姑娘在拉莫斯小姐们创办的学校里报

了名，两位小姐受过良好的教育，可惜家道中落，因此她们建立了这所哈拉帕最好的私立学校，也是第一所男女混合学校。她们不是双胞胎，但是衣着、发式、谈吐和行为都一模一样，因此所有的人都认为她们是孪生姐妹。

“为什么大家会这样认为呢？其实只要好好看看，就会发现她们长的不一样了。”劳拉向同桌伊丽莎白·加西亚问道。

“因为她们希望我们这样看待她们。”伊丽莎白回答说，她总是穿白色的衣服，金发碧眼，光彩照人，在劳拉的眼里，她要么极其愚蠢，要么极其谨慎，让人猜不透她是在故意装傻还是为了掩饰愚蠢而假装聪明。“你没有觉察到吗？她们两个人比一个人更加博学。两个人的时候，精通音律的那个人也可以解数学题了，诵读诗歌的也可以解释心脏的机理了，劳拉，别看那些诗人总是到处说什么心啊心啊的，其实只不过是一块不可信任的肌肉而已。”

劳拉试图把两位拉莫斯小姐区分开来，她发现实际上两个人长的并不一样，但是一旦要说出这些不同之处，劳拉自己也觉得很困惑，她沉默不语地想着：即使她们真是同一个人，即使她们就像爸爸书屋里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一样，真的无所不知，那又怎么样呢？

要是拉莫斯小姐对外宣称是两个人，而实际上她们是同一个人，那会怎么样呢？一天，伊丽莎白恶意地笑着说道。劳拉回敬道，这是一个奥秘，就像神圣的三位一体，你只要相信就可以了，不必太过追究。同样的道理，拉莫斯小姐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这没什么可争的。

劳拉颇费周折才最终接受了这种想法，她自问如果圣地亚哥还活着，他会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想法，还是半夜三更，跑到老师的家中，看看她们穿着睡衣的样子，于是

水落石出:她们是两个。因为在学校里,她们总是小心翼翼地不同时出现在同一场合,谁能说清楚是不自觉的还是精心策划过的,这就成了神秘的起源。圣地亚哥也许还会登上嘎吱作响、通向马厩(现在已经改称车库了)上面的阁楼的那道楼梯。哈拉帕是一个落后的城市,直到现在,还没有一辆汽车,也就是不用马拉的车辆。在交通要道上,也听不到马达的轰鸣,作家堂娜维尔希尼亚姨妈认为环游世界有马车和火车就够了,出海的时候可以坐战舰,就像那首起义者的军歌里唱的一样……

“就是在马车上,他们砍掉了外祖母的手指。”

革命的马车和火车驶过了哈拉帕,但几乎没有人注意这座城市。他们的目的地是维拉克鲁斯的港口和海关,那里控制着收入,能为士兵提供食品和衣服,此外,它还具有国家的另一个首都的象征意义。这个地方集中了反叛者和立宪派的种种势力,与墨西哥城里的政府分庭抗礼:我可以,你不行。1914 年 4 月,美国海军占领了维拉克鲁斯,他们想要逮捕凶狠的独裁者维多利亚诺·韦尔塔①这个杀害民主主义者马德罗的凶手,年轻的圣地亚哥正是为了马德罗而献出了生命。

“美国佬太愚蠢了。”亲英派堂费尔南多说:“他们非但没有伤害韦尔塔分毫,反而让他成了抗击美国入侵,维护国家独立的英雄。在美国人打击一个拉美独裁者的时候,即使他再坏,谁又敢去反对他呢? 韦尔塔利用维拉克鲁斯的失陷大肆招兵买马,对外宣称这些士兵将会前往维拉克鲁斯,抵御美国人的入侵,而实际上,他们被派到了北方和南

---

① 维多利亚诺·韦尔塔(1854—1916),墨西哥总统(1913—1914),独裁者。

方，去和比利亚[1]和萨帕塔[2]打仗。”

在哈拉帕的预科学校里，年轻的学生们身穿海蓝色带金色纽扣的法式军装接受军训，他们背起武器，开赴维拉克鲁斯，准备与美国人作战。可是他们到得太晚了；韦尔塔倒了台，美国佬撤了军。比利亚、萨帕塔同革命的最高长官卡兰萨[3]开战，并且占领了墨西哥城，卡兰萨躲到了维拉克鲁斯，直到1915年4月，奥夫雷贡[4]在塞拉亚击败了比利亚，才重新占领了墨西哥城。

这一切是通过流言和那些印在报纸上，像科里多民谣一样被传唱的新闻影响到哈拉帕的，但也有一次例外，一伙骑马持枪的叛军曾来到这里，大呼小叫，胡乱扫射。雷特西亚关上窗户，把劳拉扑倒在地，并把床垫盖在她身上。1915年，和平好像又重新回到了墨西哥，而这个外省小城中的生活却没有被打乱。

同年，传来了首都墨西哥城发生大饥荒的消息，因为其他地区尚自顾不暇，人们早就把那个奢侈、自私的首都忘到了九霄云外，他们不再向首都运送鱼、肉、玉米、蔬菜，热带的水果以及温带的谷物，首都的人只能靠米勒帕阿勒塔的奶制品还有科索奇米勒科和伊克斯塔帕拉帕之间的菜园子维持生活。墨西哥盆地之内，依旧鲜花盛开，然而，谁又能

---

① 即弗朗西斯科·比利亚(1878—1923)，“潘乔·比利亚”为其绰号。墨西哥革命时期北方农民起义军领袖。

② 埃米利亚诺·萨帕塔(1879—1919)，墨西哥革命时期南方农民起义军领袖。

③ 贝努斯提亚诺·卡兰萨(1859—1920)，墨西哥总统(1914，1915—1920)。1920年被暗杀身亡。

④ 阿尔瓦罗·奥夫雷贡(1880—1928)，墨西哥总统(1920—1924)，将军。

拿康乃馨和斑叶阿若母当饭吃呢?

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商人们囤积居奇,严厉的将军阿尔瓦罗·奥夫雷贡进驻墨西哥城,他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让那些投机商清扫街道,以示惩戒。他腾空了他们的仓库,为这个饥饿的城市重建了进口食品的途径。

这些不过是传闻而已。然而堂娜雷特西亚不管情况怎样,睡觉时总是把一把匕首藏在枕头底下。

报刊杂志上刊登了很多革命时期风云人物的照片,这给了堂费尔南多充分的机会评头论足:波菲里奥·迪亚斯上了年纪,四方脸,印第安人的颧骨,白色的八字胡,他的胸膛上戴满了"国家"授予他的勋章,这是独裁者在从维拉克鲁斯出发的德国汽船"伊普兰加号"上自己说的;马德罗,个子不高,秃顶,留着黑色的胡子,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打倒独裁者的憧憬和恐惧;正是这双眼睛告诉世人他会死在韦尔塔将军的手上;韦尔塔是个不折不扣的刽子手,他长着骷髅脑袋,戴副深色的眼镜,几乎没有嘴唇,好像一条蛇;卡兰萨是一位留着白胡子,戴着蓝眼镜的老人,肩负着成为国父的使命;奥夫雷贡,这位年轻的将军意气风发,他的眼睛是蓝色的,留着高傲的八字胡,他在塞拉亚战役中失掉了一只胳膊;萨帕塔,是一个深沉而又神秘的人,仿佛是一个暂时化身为人的精灵:劳拉喜欢注视着这位被称为"南方阿提拉[①]"的先生大而有神的眼睛,而潘乔·比利亚则被称作是"北方半人马",在劳拉看到的照片上,他总是微笑着,仿佛在炫耀着如同玉米粒一般整齐的白牙和像中国人一般狡猾的小眼睛。

劳拉尤其记得盖在她身上的床垫和街上的射击声,现

① 阿提拉,5世纪时的匈奴王。

在,她看着镜中的自己亭亭玉立,“多美呀”,她的母亲这样评价道,她就要出发去参加成人后的第一个舞会。

“你确定我一定要去吗,妈妈?”

“上帝呀! 劳拉,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在想爸爸。”

“不要为他担心,你知道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开始的时候,堂费尔南多感到膝关节有点疼痛,他没有放在心上。后来,疼痛渐渐从腿部蔓延到了腰部,雷特西亚开始给他涂药。但是不久,她的丈夫又开始抱怨胳膊发麻,行走困难。终于,一天早上,他刚刚起床便摔在了地上,医生毫不费劲便诊断出这是偏瘫,开始对腿部有影响,后来逐渐发展到胳膊。

“能治好吗?”

医生们摇了摇头。

“多长时间?”

“可能得一辈子,堂费尔南多。”

“那脑子呢?”

“没有问题,很正常。只不过在行动的时候,您需要别人的帮助。”

因此,全家人都开始为房子只有一层感到庆幸,玛丽亚·德·拉奥来到了哈拉帕,成为了妹夫的护士,推他去银行,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你的两位姨妈希尔达和维尔希尼亚留在卡特马哥照顾你的外祖父。我们商量了一下,一致同意我过来帮帮你的妈妈。”

“我父亲用英语怎么说的来着? 下雨的时候,总会打雷,差不多这个意思。换句话说,这真是祸不单行。”

“好了,劳拉,还有件事:如果有什么人对我不好,别管

我。否则你会有麻烦的。最重要的是照顾好你的父亲，和帮助我的妹妹雷特西亚料理家务。”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

“我欠你父亲的情，就像欠你外祖母把我带回家的情一样。过几天我再和你讲。”

另一种忧虑降临在这个本来就为圣地亚哥的不幸身死而悲伤欲绝的家庭，但是这一切没有使堂娜雷特西亚垂头丧气，她只是日渐消瘦，不过精神却越来越旺盛，她的鬓角飞上了银霜，那张有着莱茵人优美线条的面孔也慢慢爬上了皱纹。

“你应该去舞会，不要想别的。我和你的父亲都不会有事儿的。”

“你得保证，要是他病情加重了，一定要去找我。”

“看在上帝的分上，孩子，圣卡耶塔诺离这儿不过四十分钟。另外，你也不是孤身一人，你的灵魂陪伴着你，伊丽莎白和她的妈妈也陪伴着你，记住，没有人会说你什么的。”

金发碧眼的伊丽莎白同她十六岁的时候一样光彩照人，彬彬有礼，尽管和劳拉相比，她更矮更丰满，穿着也更为暴露。她费劲地把自己塞进一件宽袖的粉红色塔夫绸的裙子里。这种过时的款式永远会被某些人喜欢。

“姑娘们，不要炫耀胸口上的那两块肉。”伊丽莎白的妈妈说道。这位名叫路西亚·杜邦的女人一生都在竭力证明她的姓名在法国是如此的平常，而在美国却是如此的高贵，但她为什么会和一个叫加西亚的男子结婚呢？也许只有她丈夫所拥有的男性魅力方可解释，她的女儿坚定地叫自己加西亚，始终不肯叫那个用连字符连接起来的加西亚-杜邦。

“劳拉没有这种麻烦，因为她的胸部很平。可是我……

妈妈。"

"伊丽莎白,我的女儿,你让我生气。"

"没有办法,托你的福,上帝才把我造成这个样子。"

"行了,不谈胸脯了。"伊丽莎白的妈妈一屁股坐在地上,丝毫不感到难为情,"想想吧,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呢。我们得找出那些不一般的交情。要亲切地向奥利维、德里格、萨托里奥斯、费尔南德斯·兰德罗、埃斯特万、帕斯克尔、布切斯、鲁恩卡斯等家族的人问好。"

"还有加拉萨一家。"伊丽莎白打断了她。

"别气我了,"她的母亲大发雷霆,"你们得记好名门望族的姓名。要是你们忘记了他们,他们也会忘记你的。"

她同情地看着这两位姑娘。

"可怜的孩子。注意观察别人是怎么做的,跟着学点儿。"

伊丽莎白夸张地撒着娇:"够了,妈妈,你都把我弄糊涂了,我要晕倒了。"

圣卡耶塔诺是一个咖啡庄园,但是只有它的中心区域才被大家称为圣卡耶塔诺,它坐落在山毛榉林中,旁边是水雾升腾的瀑布和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河。70年代以来,西班牙的传统在这里被忘却了,法国式的别墅蔚然兴起。葡萄藤图案的柱廊支撑着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

房子很宽敞,共有两层,门口有一棵巨大的无花果树和一个寂静的喷泉。沿着十五级的台阶向上,就会来到第一层,门口栽种着矮小的植物,雷特西亚曾经告诉过劳拉,卧室就在这一层上。一条华丽而又宽敞的石头楼梯通向第二层,这里是接待宾客的地方,有客厅、餐厅,但最重要的——也是这个地方的特点——有一个面积相当于房子一半的平台,平台的顶上是晒台,平台正面、左面和右面三面开阔,只

用栏杆包围起来,将平台变成了夜晚微风中的大阳台,午间阳光里午睡的秋千。

情侣们或是在这里驻足,倚着栏杆聊天、休息,或是放下酒杯,翩翩起舞。在劳拉的一生中不时回想起这个地方,这里代表着豆蔻年华的陶醉,为自己的青春而快乐。

堂娜赫诺薇娃·德尚·德拉·特里尼达德,这位传奇的女主人,外省社交生活的监护人,也在这里迎接客人。劳拉原以为她会遇到一位高大威严甚至傲慢的女士,然而,她所见到的却是一位个子不高,精力旺盛的女性,她的笑容明媚动人,一对酒窝镶嵌在玫瑰色的双颊上。她和蔼的双眼呈灰色,恰好与她式样简洁的晚礼服同一色调。由此可见,德尚女士一定参考了《巴黎生活》杂志,因而才穿上了这件比劳拉的衣服还要简洁朴素的服装。这件礼服没有任何虚假的装饰,闪光的灰色丝绸不过沿着身体垂下而已。堂娜赫诺薇娃披上一条灰色的纱巾,遮住了裸露的双肩,这显得她的眼睛更加锐利,像水一样透明的珠宝也更加璀璨了。

无论如何,劳拉还是庆幸女主人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她发觉德尚夫人在亲切地问候每个来宾之前及之后,都会用一种像法官一样审视与揣摩的奇怪眼神冷漠地注视着他们。这位富有而令人嫉妒的女士的眼神仿佛正在盖下一个个及格或者不及格的印章。人们就会知道来年的舞会,谁将收到邀请,谁将被摈弃。这冷漠的眼神——责备或者赞许——不过持续了几秒,当下一位宾客到达的时候,她的脸上便恢复了明媚的目光,绽放出动人的微笑。

“告诉你的父母,我对今晚无法见到他们而深表遗憾。”堂娜赫诺薇娃一边说,一边轻轻地抚摸着劳拉的头发,好像在为她整理没有梳上去的鬈发。“希望堂费尔南多健康。”

劳拉屈膝致谢,这是拉莫斯小姐学校里的课程,随后她便开始审视这间被哈拉帕上流社会津津乐道、羡慕不已的房子。淡绿色的墙壁,墙上的花饰和五彩的天窗令她深深陶醉。外面栏杆围绕的平台是聚会的中心,那里有穿着丝绒外套的管弦乐队和参加宴会的年轻宾客,尤其是年轻人,少年身穿燕尾服,少女们更是争奇斗艳。劳拉想,一个戴着白色领带,身着凸花衬衫和黑色礼服的男人,看上去如此潇洒,而且可以不暴露任何东西,而女人却被迫不无危险地暴露出她们个人的、古怪的、貌似保守却总是任性的审美观。

现在,舞会还未开始,每一位少女都从管家手中接过了一张写着女主人姓名的字母缩写 DLT 的卡片,少女们期盼参加舞会的男人邀请她们跳舞,劳拉和伊丽莎白曾经在一些规模不如这儿的舞会上见过其中的一些人,当时,他们可没瞧上她们两个,因为那时她们不过是两个姿色平平,毫无身材可言的孩子。现在,她们拥有女性完美的身材,衣着华贵,表现得比事实上自信得多。劳拉和伊丽莎白首先向学校里的和出自名门的女友们问好,将那些燕尾服少年晾在了一边。

一位糖果色眼睛的少年走向伊丽莎白,邀请她跳第一曲舞。

"谢谢,不过我已经有约了。"

男孩礼貌地鞠了一躬。劳拉踢了她的朋友一下。

"你撒谎,我们刚刚才到。"

"我要么和爱德华多·加拉萨跳第一支曲子,要么不和任何人跳。"

"你的爱德华多·加拉萨究竟哪点好?"

"他什么都好。他又有钱又英俊。他来了。你看,我都

和你说了。”

对于劳拉来讲，她并不认为那个爱德华多强过别人，不过也不比别人差。她不得不接受他并赞赏他，哈拉帕上流社会白人居多，像玛丽亚·德·拉奥姨妈这样的有色人种一个都没有，不过有时能够看到一些长相英俊的印第安血统的人出现。劳拉被一位消瘦的黑发男子迷住了，他看起来就像埃米利奥·萨勒加利小说中描写的马来西亚海盗，——劳拉从圣地亚哥那里继承了他的全部藏书，也包括这些小说在内。他那黝黑的皮肤没有一丝瑕疵，乌黑发亮，他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行动轻缓而又优雅。他就像小说中那个名叫桑多坎的印度王子。他是第一位邀请劳拉跳舞的人。堂娜赫诺薇娃安排先跳华尔兹，然后跳些现代舞，最后，再回到那个古老的年代，跳华尔兹，波尔卡，兰塞罗以及马德里的丘梯斯舞。

那位印度王子始终一言不发，以至于劳拉暗自担心他的语调，或他的愚蠢会破坏这种马来海盗的美好形象。而她第二支舞的舞伴正好相反，他出身于科尔多瓦的一个富有的家庭。他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着鸡的饲养和交配，弄得劳拉头晕脑胀。他说这些不是想影射什么，只是由于单纯的愚蠢。她的第三个舞伴是位红头发的大个子，劳拉曾经在网球场上见过他不遗余力地炫耀自己粗壮多毛的大腿。大个子肆无忌惮地对待劳拉，咬她的耳垂，还把她紧紧贴在胸前。

“谁请来了这个讨厌的家伙。”劳拉问伊丽莎白。

“从前他表现得没有今天晚上差劲。我想是你使他意乱情迷，要不，就是他喝多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去找堂娜赫诺薇娃说说。”

劳拉使劲地摇着头，问：“那你呢，伊丽莎白？”

“你瞧他，难道这不是一种享受吗?”

那位爱德华多·加拉萨跳着华尔兹，翩然而过。他的眼睛直视天花板。

“你瞧，他看都不看自己的舞伴。”

“他希望别人欣赏他。”

“我看他无所谓。”

“他舞跳得真不错。”

“劳拉，我该怎么办?”伊丽莎白急得要哭了，她结结巴巴地说：“他从来都不瞧我。”

舞曲结束之后，堂娜赫诺薇娃走了过来，请伊丽莎白起身，带着她来到正擤鼻子的爱德华多·加拉萨面前。

“孩子，”女主人小声地宽慰这个眼泪汪汪的金发美女。“你不要当众表现出自己的爱情，你要让所有的人都觉得你高不可攀，让他们恨你。爱德华多，现在开始跳现代舞了。伊丽莎白希望你能教她跳‘蛋糕舞’①，因为你比伊雷尼·卡索跳得好。”

她让这两个年轻人挽着胳膊，走进舞池，之后她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像一位检阅士兵的将军，严苛地审视着每一位宾客，从头到脚，指甲，领带，鞋子。为了要进入堂娜赫诺薇娃的社会关系小册子，这个省里的人做什么都愿意，在这里，每一位年轻人都像在学校里接受考试，来决定是否可以进入下一年的学习一样接受评定。然而，这位出色的女主人心中不禁叹息，总有一些人，你不得不邀请，尽管你看他们十分不顺眼，尽管他们的指甲没有修剪整齐，尽管他们身上的燕尾服和脚上的鞋子搭配不当，尽管他们不知道怎样

---

① Cake-walk：步态竞赛(旧时美国南部地区黑人的一种娱乐，因对步法及姿势优美者奖以蛋糕而得名)，一种步态舞。

系领带，尽管他们非常的粗俗，就像那位网球爱好者。

“对社会的评判者而言，权势和金钱总是比优雅的仪表和得体的举止更有威力。”

堂娜赫诺薇娃的晚宴闻名遐迩，绝对不会让人失望。一位头戴白色假发套，举止隐约有18世纪遗风的管家用法语宣布：“夫人请用餐。”

这位仆人肤色黝黑，显然是维拉克鲁斯当地人，劳拉见他无可挑剔地说着堂娜赫诺薇娃教他的这惟一一句法语，不禁哑然失笑，与此同时，伊丽莎白的母亲带着这两位要她监护的少女走进餐厅，讲了另一件趣闻：

“去年是一位黑人戴着白色的假发套，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海地人。不过，让一个印第安人化装成路易十五……”

人群朝餐厅走去，他们都长着欧洲面孔，这证明女主人的做法是正确的。他们是西班牙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苏格兰人和德国移民的子孙，就像劳拉·迪亚斯和她的兄长圣地亚哥一样，他们的祖先来自莱茵河畔和加纳利群岛，他们从维拉克鲁斯港口进入，在这里，在哈拉帕，在科尔多瓦和奥里萨瓦，他们经营咖啡庄园，牧场，糖厂，银行，进口商品，发展教育，甚至从政，以此发家致富。

“看看这张堂波菲里奥内阁的照片。他是惟一的印第安人。其他人都是白人，浅色眼睛，穿着欧式服装。再看财政部部长利曼托尔，他的眼睛蓝得像一泓碧水，看这位统治墨西哥、兰达和埃斯坎东三城的长官，他的秃头跟罗马元老的一样；再看司法部长胡斯提诺·费尔南德斯那副西哥特贵族式的胡子，还有宠臣加萨苏斯那双加泰罗尼亚人的邪恶眼睛。至于独裁者自己，听说他用米粉来增白。想想吧，他是自由的战士，改革的英雄。”一位大块头的糖酒进出口商

滔滔不绝地讲着。

进出口商对一群女士说的话仿佛是对牛弹琴,其中的一位女士问道:“您希望怎样呢,希望我们回到阿兹特克时代吗?”

“请您不要拿墨西哥历史所创造的惟一严肃的人物波菲里奥·迪亚斯开玩笑。”一位先生坚持道,他的目光中充盈着某种突如其来的念旧的情感:“我们会怀念他的,你看着吧。”

“现在还不会。”那个商人回答说,“由于战争,我们比任何时候都出口得多,比任何时候都更挣钱。”

“但是由于革命,我们连裤衩都穿不上了,对不起,女士们,恕我失言。”有人回答说。

“唉! 那些法国兵多帅呀!”劳拉听到刚才抱怨阿兹特克时代的那位女士的感叹,她放弃了继续听宾客们的谈话,慢慢地走向桌子,上面摆着肉冻、肉饼、火腿、鸭肉,烤面包片……

一只苍白的手,几乎没有血色的手,把一只已经盛好了的盘子递给劳拉。她注意到金戒指上镌刻着开头字母OX,这个人身穿笔挺的燕尾服衬衫,黑玛瑙的皮带扣,衣服的质地上乘。似乎有什么东西阻止劳拉抬起双眼,去正视这个人的目光。

“你认为你了解圣地亚哥吗?”这个声音本来是低沉的,此时却故意地升高;这令人晕厥的话语出自男中音的嗓子。为什么劳拉不想看到他的脸呢? ……他托起她的下巴,对她说,这个平台有三面,我们可以去右面单独谈谈。

他挽着她的胳膊,而她,两只手交叉托着盘子,发现自己身边的这位男子高大英挺,他穿戴考究,身上有着英国熏衣草的淡淡的清香,他带领着她,一步不停,步履和

谐，来到了最清静的平台，右边便是乐手们的房间，他们把乐器盒子放在这里。他领着她避开障碍，但是她却笨拙地把盘子掉在了大理石地上，盘子碎了，肉冻和面包撒了一地。

“我再去拿一个。”这位不期而遇的美男子突然压低了声音，说道。

“不，不要紧。我不饿。”

“随您的便。”

角落里光线不是很足。劳拉首先看到了一个完美的逆光的剪影，他的鼻子挺而且直，在上唇边突然停住，而下唇则微微地向后收，他的下颌微微隆起，就像世界历史书中出现的哈布斯堡的王公一样。

年轻人没有松开劳拉的胳膊，她很惊讶，甚至很害羞，因为他在门口的时候表白说：“我是奥兰多·希门内斯。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我很了解你。圣地亚哥谈起你的时候，总是很亲密。我觉得你是他心中的圣女。”

奥兰多发出一阵无声的笑，他的头向后倾着，当月亮照在他身上的时候，劳拉看到他有着拳曲的头发，面色发黄，长着西方人的五官，但眼睛是东方人的，和他的皮肤一样，是在维拉克鲁斯码头上干活的中国人的颜色。

“您和我说话的样子好像我们很熟一样。”

“请用‘你’来称呼我，要不然我会生气的。也许你希望我离开，让你安安静静地吃东西吗？”

“我不明白，先生……奥兰多……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奥兰多握着劳拉的手，亲吻着散逸出香皂气味的指节。

“我在和你谈论圣地亚哥。”

“你认识他吗？我从来不认识他的朋友。”

“那当然。”奥兰多无声的笑让劳拉感到紧张。“你觉得你的哥哥把一切都给了你,真的是只给了你吗?”

“不,我怎么会这么想?”姑娘结结巴巴地说。

“你就是这样想的,每一个认识圣地亚哥的人,都会这么想。他总是能让我们相信,我们是惟一的,是不可替代的。这就是他的魅力所在。他有这种天赋:我是只属于你的。”

“是的,他是个好人……”

“劳拉,劳拉,‘好人’,这可不是该用的词!如果有人称圣地亚哥是‘好人’的话,他当然不会打他耳光,但是会对他不屑一顾,这是他最残忍的武器。”

“他可不残忍,你错了,你就是想让我生气……”

劳拉做出一个要走的动作,奥兰多阻止了她,他的手柔弱而有力,有着一种意想不到的亲密。

“你不要走。”

“你让我生气。”

“你不要这样。你会去告状吗?”

“不,我想走了。”

“好吧,我希望至少会让你不安。”

“我爱我的哥哥。你却不爱他。”

“劳拉,我比你更爱你的哥哥。尽管我不得不承认我很嫉妒你。你认识的是如同天使一样的圣地亚哥。而我,唉,我不得不承认我很嫉妒你。他总是和我说……他……‘太遗憾了,劳拉现在还是一个孩子。希望她快点长大。说实话,我想她都要想疯了。’他要疯了,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我。和我在一起,他很严肃……我不称他为残忍的圣地亚哥,叫他严肃的圣地亚哥,你觉得怎么样?或者,为什么不呢,叫他复杂的圣地亚哥,一个希望所有的人,男人,妇女,

小孩都爱他的人。为什么他希望被爱？因为他自己不想去爱。劳拉，这个激情澎湃，生气勃勃的男人，他是不知满足的使徒圣地亚哥！他好像知道自己会英年早逝。他的确知道这一点。因此他尽情挥霍着生命。但他又蔑视这一切。你别以为他像这儿的人所说的那样，是‘墨西哥酱里的芝麻’①。他懂得如何去选择，因此他选择了你和我，劳拉。”

劳拉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青年，他大胆，高傲而又英俊；但是在听了他的话后，劳拉越发地思念圣地亚哥。

开始的时候，她很想抗拒这位宾客(他是一个浮躁的花花公子，奥兰多仿佛猜到了劳拉的想法，这正是别人常给他下的断语……)，可是后来她却被他的哀伤深深地吸引。她听着他的讲话，了解了一个自己从不了解的圣地亚哥。一种希望更加了解圣地亚哥的渴望战胜了最初的抗拒。劳拉在这两种冲动中挣扎。奥兰多猜到了，他不再说话，转而邀请她跳舞。

“听，又在跳斯特劳斯，我简直无法忍受这些现代舞。”

他扶着她的腰，握着她的手，他那双东方人的眼睛看着她，进入到她那双眼波流离的眸子深处。从来没有人像这样注视过她。而她和他共舞的时候，也感受到一种震撼，好像华丽的衣服之下的两个人都是赤裸的，就像埃尔泽维尔神父想像的那种赤裸。华尔兹节奏控制下的距离仿佛并不存在，两个人不着一缕，紧紧拥抱。

劳拉把目光从奥兰多身上移开，她突然清醒了。她发觉所有的人都在望着他们两个。他们让出了地方，停止了舞蹈，看着劳拉·迪亚斯和奥兰多·希门内斯跳舞。

---

① 大约意思是：“什么都少不了他”。

一群守夜的孩子打破了这种气氛，他们身穿睡衣，手里拿着一顶大草帽，里面盛满了从果园里偷摘的橘子，叫着，喊着。

“看呀，你成了舞会的焦点了。”在回哈拉帕的路上，伊丽莎白·加西亚对她的朋友说。

“那个男孩子名声不好。”伊丽莎白的母亲急忙补充道。

“不过，真希望他邀我共舞。”伊丽莎白嘟囔着：“我可什么都不在乎。”

“可你那时候要和爱德华多·加拉萨跳舞，那是你的梦想。”

“他根本不和我说话，真没有教养。他和我跳舞，却不和我说话。”

“下次就好了，亲爱的。”

“不，妈妈，我对生活失望了。”这位身穿粉色衣裙的女孩扑到妈妈的怀里，痛哭流涕，然而她的母亲却没有直接安慰她，她宁愿逃开，转而去建议劳拉。

“我觉得有必要告诉您的母亲。”

“不用了，夫人。我不会再见这个男孩子的。”

“那样对你更好。不好的伴侣……”

黑人桑帕亚打开了车门，加西亚·杜邦母女掏出白手帕——母亲的手帕是干的，女儿的手帕却是湿漉漉的——和劳拉告别。

“这儿真冷，小姐。”老黑人抱怨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维拉克鲁斯的家呀？”

他跳了一个舞步，但是劳拉却没有看他，她的双眼正望着被加泰罗尼亚人阿尔莫尼亚·阿斯纳尔占据的阁楼。

他们不得不一大早儿就赶往卡特马哥：混血姨妈告诉

大家,外祖父要不行了。劳拉悲伤地看着她深爱的热带风光在她亲切的目光下重生,它们已然预见到与外祖父费利佩诀别的悲伤。

他躺在他的卧室里,他曾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从前,他孤身一人,后来,他与他深爱的妻子共同居住。现在,他又孤身一人,只有三个女儿陪伴左右,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她们三人不结婚的借口:服侍鳏居的父亲。

"孩子,你们现在可以结婚了。"费利佩·克尔森在病床上不无嘲讽地说。

在劳拉的眼中,卡特马哥的房子的大门看上去不一样了,仿佛在她离开的这段时间,一切都变得更小,但又更窄更长了。回到过去就像走入一条漫长而空旷的走廊,在这里,你见不到希望见到的人和事。过去的人和事,仿佛在同我们的记忆和想像捉迷藏一样,向我们挑战,要我们在现时找到它们的位置,同时不能忘记曾有的过去和将有的未来,尽管这未来不过是当下回忆中的未来而已。当人们试图陪伴死亡的时候,什么又是生命的有效期呢?因此,劳拉花费了很长时间才来到外祖父的卧室,仿佛要经历老人一生的岁月,从她所不了解的孩提时代,到为缪塞的诗歌和拉萨尔的话语而激情昂扬的青年时期,直到他对政治完全失望,移民墨西哥,成家立业,积累财富,他与科西玛的深情厚意,她和帕潘德拉的美男子在路上可怕的遭遇,三个女儿的诞生,收养自己的私生女,雷特西亚和费尔南多的婚礼,劳拉的出生,年轻时代,他的脚步缓慢而烦躁,而到了老年时代,我们的耐心没能拦住他嘲弄而悲伤的脚步。因此劳拉花费了很长时间才来到外祖父的卧室,来到将死之人的床前需要触摸一切,需要接触他生命中的每一天,回忆、想像甚至补充从未发生过的甚至无法想像的东西,一个被爱

的存在代表着曾经有过，不曾有过，可能有过，永远不会有的一切。

现在，就在这个日子里，握着外祖父青筋暴露、长满老人斑的双手，抚摸着他那因岁月的流逝而失去生气、几近透明的皮肤，劳拉再次感受到：她是为了其他人而活的，她的存在只是为了走完没有结束的人生。抚摸着一位七十六岁的垂死的老人的双手，一位有着完整人生的完整的人，这时候她怎么会这样想呢？

圣地亚哥是一个没有实现的希望，年逾古稀的外祖父会不会也是如此呢？真的存在一个已经完成的生命吗，一种不包含未实现的诺言和潜在的可能和更多……的生命？随同我们每一个人一同死去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未来死了。

劳拉望着外祖父清亮的眼眸深处，他在生死之间徘徊。她问了他这个她问自己的问题。费利佩·克尔森艰难地笑了。

"我没有告诉过你吗，孩子？有一天，所有的小病小灾会一股脑地向我袭来，现在，你看到了……不过，在我离开人世之前，我必须承认你是对的。在丛林的深处，的确有一位满身珠宝的女人雕像。我故意弄错是不希望你陷入迷信或者巫术之中。我带你去看那棵木棉，因为我希望你拥有理智，而不是幻想或是激情，在我的青年时期，这些东西把我折磨得很苦。你要对一切存有戒心，木棉浑身是刺，像匕首一样锐利，记住了吗？"

"是的，外祖父……"

突然之间，老人好像感到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他不在乎向谁诉说以及谁在倾听，喃喃道：

“我是一个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我生在达姆斯塔特[1]，却必须死在这里。我需要靠近我的河流、街道和广场。我需要闻到化工厂里的缕缕青烟。我需要一种信仰。这是我的生命，我不会改变。”

“改变……”他的嘴呼出芥末一般颜色的气泡，再也闭不上了。

舞会结束时，奥兰多把他那像小女孩一样肉嘟嘟的嘴凑近劳拉的耳朵。

“我们要分别了。我们已经引起了别人的注意。我会在你家的阁楼上等你。”

在舞会的喧闹中和来宾好奇的目光下，劳拉惊愕地听着奥兰多的建议。

“可是阿斯纳尔小姐住在那里。”

“现在不了，她想死在巴塞罗那，我替她付了船票，现在，阁楼属于我了。”

“但是我的父母……”

“别人不会知道的，除了你。想去就去吧。”

他把嘴唇从劳拉的耳边移开。

“我想把我给圣地亚哥的一切都给你，不要让我失望。他喜欢这样。”

从外祖父的葬礼归来之后的几天，奥兰多的话语一直在劳拉的脑袋里回响，你认为你很了解圣地亚哥吗？你认为你的哥哥把一切都给了你吗？你对这个复杂的人了解得太少了，他只把他生命的一部分给了你，而激情，爱的激情，他又给了谁呢？

她长久地注视着阁楼。没有任何的变化。除了她自

① 德国城市，位于黑森州。

己。她并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变化。也许,只有在她蹑手蹑脚地爬上楼梯,小心翼翼地提防着不让父亲,母亲,玛丽亚·德·拉奥姨妈,黑仆桑帕亚以及印第安女仆看见的时候,这一变化才会真正实现。无需敲门,因为奥兰多把门虚掩着。奥兰多等待着她。在月光之下,奥兰多英俊而且神秘,模糊不清。不过,也许在阳光下,奥兰多丑陋而且平庸,满嘴谎言。劳拉的身躯渴望和奥兰多身体的靠近,因为他,因为她,因为庄园舞会那次浪漫的不期而遇,不过也因为圣地亚哥,这是因为爱奥兰多就是爱自己兄长的间接却可能的方式。奥兰多的暗示是认真的吗?如果这只是一个谎言,如果没有圣地亚哥的幽灵,她会爱上奥兰多吗?如果情况正好相反,她会不会像恨圣地亚哥一样憎恨奥兰多呢?她会因为奥兰多而恨圣地亚哥吗?她怀疑,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一出戏,一个由那个年轻的引诱者操纵的谎言。劳拉并不需要埃尔泽维尔·阿尔蒙特神父魔鬼般的告诫,就摈弃所有性的满足和幸福。七岁那年,她看着自己在镜子里面的裸体,却没有看到半点神父声称的恐怖,这已足够使她免于陷入引诱,一种迅速又强烈的直觉让她感到,如果不与爱人分享,这种引诱是不起作用的。

她爱家里的所有成员,包括圣地亚哥,这种爱是快乐热烈而又纯洁的。现在,第一次有一个男人用其他的方式令她激动不已。这个男人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他会让她幸福?或者劳拉要冒险与一个根本不值得如此的男人发生关系呢?这个男人也许根本不属于她,只不过是她哥哥的幻影和延伸,这个神秘,英俊,充满魅力的勾引者,这个邪恶同时又令人愉快的窥视者,在她的家里等她,与她的父母同处在一个屋檐下……

也许是黑仆桑帕亚在舞会当晚载着劳拉、伊丽莎白和

杜邦·加西亚夫人三人返回哈拉帕时无意中说的话使她茅塞顿开。

“你们看到笼子门口的那棵无花果树了吗?”黑仆问。

“笼子?”杜邦·加西亚夫人说:“这可是这个地方最美丽的庄园,傻瓜,舞会每年才开一次。”

“请原谅,夫人,最好的舞会在街道上。”

“你呀!”杜邦夫人叹息着说。

“你在外面冷吗?”劳拉关心地问。

“不,孩子,我一直在看那棵无花果树。我想起了圣费利佩·德·赫苏斯的故事。他是一个傲慢而且没有教养的孩子,就像我今晚看见的很多人一样,他的住所旁边有一颗干枯的无花果树,他的奶奶说:‘要是小费利佩成了圣徒,无花果树就会开花。’”

“你为什么这样评论圣徒,黑伙计?”杜邦夫人气呼呼地说:“圣费利佩·德·赫苏斯前往东方,感化日本人,被他们活活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圣徒,你不知道吗?”

“夫人,这话是他奶奶说的。费利佩遇害的那一天,无花果开了花。”

“这里的无花果树却枯死了。”伊丽莎白坏笑着说。

“圣地亚哥的力量在于他不需要任何人。”在圣卡耶塔诺的平台上,奥兰多这样向她解释:“所以我们都对他心悦诚服。”

一个月以后,人们说在阁楼上发现了阿尔莫尼亚·阿斯纳尔夫人的尸体。人们说是在桑帕亚把饭送到门口之前,银行的职员给她送每月的支票的时候发现的,她当时已经死了两天了,尸体还未腐烂。

“一切都躲藏起来,窥视着我们。”劳拉重复着维尔希尼亚姨妈这句神秘的口头禅,它把她带到中国娃娃李白身边,

它正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枕头中间;劳拉决定摆脱对第一次舞会的回忆,她想像自己苗条而又透明,她的躯体像衣服一样透明,衣服之下空无一物,劳拉优雅地跳着华尔兹,旋转,飘荡,直到自己满心感激地被梦的面纱遮蔽。

第五章　哈拉帕:1920年

“你错了,奥兰多,这里不行,找别的方法见面吧。好好想想。不要嘲弄我的家庭,也不要逼我自轻自贱。”

劳拉的家庭生活仍在继续,她既悲痛于外祖父的病逝,又忧虑父亲脆弱的病体。奥兰多的引诱,阿斯纳尔小姐的死亡,劳拉将这些从她的回忆而非记忆中驱赶了出去;她从来不去想这些事情,既不向别人提及,也不提醒自己。她不想回忆这些,尽管在她的记忆深处珍藏着这一切,那只装载着过去的箱子,她将永远不会开启。在她家庭的苦难中添加上奥兰多·希门内斯和阿尔莫尼亚·阿斯纳尔的话,她会承受不了,就像奥兰多带来了对圣地亚哥的记忆的传染病,而劳拉希望珍藏这些纯洁清晰的记忆。她对那个花花公子耿耿于怀的是,他损害了保存在劳拉灵魂深处的圣地亚哥生命中的一部分。

圣地亚哥是不是也活在我父亲的心中呢?这位二十二岁的姑娘看着父亲费尔南多·迪亚斯日渐衰弱的病体,问着自己。

没有人知道答案。这位会计师兼银行家的中风迅速恶化。开始的时候,只不过两条腿失去了知觉,后来则蔓延到了全身,再后来,他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劳拉的心里装满了对父亲的同情,再也容纳不下别的事情。他只能蜷缩在轮椅上,系着围嘴,像个孩子,姨妈玛丽亚·德·拉奥尽责地给

他喂饭。他看着世界，他的眼神不可捉摸，你看不出他是在听、在想还是在说，他无助地眨着眼睛，他同样无助地试图不眨眼睛，他拼命地睁大了双眼，仿佛在探寻和审视，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忍受能力，好像他害怕一旦闭上眼睛，就再也不能睁开一样。他的目光澄澈透明。然而，在现有的处境下，堂费尔南多摸索出使用眉毛的一套奇妙动作，他的眉毛有着一种令劳拉害怕的表达能力。父亲的双眉就像两道拱柱一样支撑着他残存的个性，他的眉毛并非因为惊奇而挑起，反倒比惊奇的时候挑得更高，像在询问，又像在交谈。

玛丽亚·德·拉奥姨妈尽心尽力地照料着病人，而雷特西亚则撑起了照顾全家的重担。不过，只有雷特西亚能握着丈夫的手，与他交谈，慢慢地读懂了他的眼神。

“他希望你把领带夹别在领带上，玛丽亚·德·拉奥。”

“他希望我们带他到贝卢斯散散步。”

“他很任性，就像当年摩尔人对待基督徒那样。”

她母亲讲的是真的吗？或者只是编出了一个交流和生活的幻象？玛丽亚·德·拉奥抢先干完了所有繁琐的工作；她用温热的毛巾和燕麦肥皂给病人擦洗身体；每天早上，给他穿衣，仿佛这位一家之主依然要去上班似的，坎肩、硬领、领带、黑色的袜子、高筒的靴子，一件不落；晚上，替他脱衣，九点钟，在桑帕亚的帮助下，把他放在床上。

劳拉惟一能做的就是握着父亲的手，给他朗读他所喜欢的法语和英语小说，与此同时，出于对父亲的敬重，劳拉自己也学会了这两种语言。费尔南多·迪亚斯身体的恶化很快表现在他的脸上。他老了很多，不过他依旧感情丰富，有一次，劳拉看到他流下了眼泪，当时，劳拉正在给他朗读托马斯·哈代的《无名的裘德》，小费德的死亡让人唏嘘不已，他听到父母说没有法子养活这么多人，就自杀了。不

过,这泪水却让劳拉欣悦。她的父亲懂得她的话。她的父亲在病魔前依然听着并感受着。

“离开这里,孩子,去过你这个年龄应该过的生活。没有比知道你为他牺牲更让你的父亲难过的了。”

为什么母亲使用这种动词形式呢?据拉莫斯小姐们讲,虚拟语气必须和另外一个动词使用才会有意义,表示假设,大拉莫斯小姐说;表示愿望,小拉莫斯小姐如是说;和“假若我是你”有一点儿相像,她们两个在不同的地方同时说。日复一日地同患病的父亲生活在一起,不去想什么将来,这是父亲和女儿之间惟一能够分享的健康。只要费尔南多能听得懂,劳拉会给他讲自己每天做了些什么,哈拉帕的生活是什么模样,又有了什么新闻……而那时候劳拉才发觉根本没有什么新闻。她的同学都已经毕业、结婚,离开了外省,去了墨西哥城,因为她们的丈夫带她们去了那里,因为革命比独裁更能够使权力集中,因为有关农业和工人的法令威胁着外省的富人,因为很多人甘心失去他们曾经拥有的一切,抛下在内陆的土地和工厂——那里因争战而荒废,逃离了无依无靠的外省农村,在首都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这一切都使得劳拉的朋友离她远去了。

对花花公子奥兰多和那个加泰罗尼亚无政府主义者的激情被她抛在了脑后;对圣地亚哥狂热的崇拜也归于平静,剩下的只是时间的流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哈拉帕的风俗是一成不变的,仿佛外面的世界无法介入这个城市的传统、安宁、自足,或者智慧,出于奇迹,尽管也出于它自己的愿望,当时席卷全国的混乱没有波及这个城市的表层生活。对富人们来讲,维拉克鲁斯的革命仅仅是一种对失去财产的恐慌,对于穷人而言,不过是一种争取生活必需品的渴望。在维拉克鲁斯,堂费尔南多隐约谈起过无政府主义思

潮的影响，墨西哥是这种思想的避风港，此后，在他自己的家里，那位没人见过的阿尔莫尼亚·阿斯纳尔的存在使劳拉不大理解的这些概念生动了起来。在她的学生生涯结束之后，她的朋友们因为成家立业而不见了踪影，劳拉却没有出嫁，她们去了首都，劳拉却依然留在当地，这一切使她不得不与比自己小的女孩交朋友，她的母亲希望她多交朋友，免得为家里的事伤心，那些女孩子的幼稚不仅仅表现在年龄上，更表现在童年的经历上。而她是圣地亚哥的妹妹，是奥兰多试图引诱的年轻猎物，是卧病不起的父亲和坚守尽职的母亲的女儿。

也许是为了麻痹她敏感的伤口，劳拉从不过多地去想这生活是否属于自己。它近在咫尺，它很舒适，这不重要，她不去想不可能的事情，甚至不去想与哈拉帕的日常生活不同的东西。她每天去她最喜欢的贝卢斯花园里散步。没有什么能够打破她的习惯。那里生长着高大的杨树，树叶闪闪发光，那里有铁制的长椅，喷水池里绿波荡漾，栏杆上长满了苔藓，小女孩们跳着绳子，少女们在一边散步，少男们走在另一边，彼此眉目传情，他们或是放肆地相互凝视，或是避开对方的目光，但所有的人都在盼望着有那么几秒钟可以独处，即使他们常会把这样的机会当作一种刺激或一段等待。

“小心胡亚雷斯公园里那些把手杖放在肩上的男人。”姑娘们的母亲警告说，“他们不怀好意。”

那个公园是露天聚会的另一个好去处。山毛榉小道，印度月桂，南美杉及阵阵的歌声，构成了一个清新而芳香的世界，为来公园滑冰的人平添了几分乐趣，天气晴朗的时候，在公园里可以看到美丽的奥里萨瓦峰，西特拉勒特贝特勒，这高可摘星的大山，是墨西哥最高的火山。西特拉勒特

贝特勒有着一种自身的魔力，大山会随着光线的转移和四季的变幻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透明的清晨，它近在眼前，中午，阳光洒下薄雾，将它推远，午后的细雨给它披上一层薄纱，黄昏，这一天中新生的时刻赋予它引人注目的光辉，在晚上，每个人都知道这座高山是维拉克鲁斯天空中一颗看不见的静谧的星星，它是这里的守护神。

雨时不时地就下了起来，劳拉和她的那些与她截然不同的新朋友(她已经记不起她们的名字了)不得不跑出公园，寻找一个避雨的地方，她们在屋檐下面绕着走，避开直冲到街心的雨柱。雨点落在屋顶上淅淅沥沥的声音和树木飒飒的声音非常好听。微小的事物也有生命。当夜幕降临之时，初浴的大街小巷充满了郁金香和胡尼库伊雷的气味。年轻人出来散步。七点到八点是隔窗传情的时刻，男人们站在故意敞开的阳台前向他们的女友倾诉衷情——这在哈拉帕很平常，然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却很少见——在这隔窗传情的时刻，丈夫们开始重新追求自己的妻子，仿佛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重现激情，再叙旧盟。

在那个年代里，墨西哥大革命和欧洲战争差不多同时结束，电影成了一样新鲜的玩意。武装革命被平息了，自从塞拉亚一役，阿尔瓦罗·奥夫雷贡大败潘乔·比利亚之后，剩下的战斗只不过是小打小闹而已；比利亚驻扎在北部的强大军队溃不成军，各个派别试图找个靠山以图东山再起，1917年，贝努斯提亚诺·卡兰萨获得了胜利，建立了宪法军，新的大宪章生效，哈拉帕的老爷们每天下午都在赌场里聚会，而这些事件成了他们辩论的话题，思考的对象和恐惧的来源。

“要是农业改革一字不差地执行，我们都得破产。”说这话的是舞会上那个科尔多瓦的小伙子的父亲，他儿子只会

谈论公鸡或是母鸡。

“不会那样做的,国家也得吃饭呢。只有大庄园才能提供。”那个打网球的年轻人的父亲这样说,他那个儿子一头红发,举止轻佻。

“那么工人们的权利呢?”一个老先生问道,他的妻子就是那个成天念叨着英俊的法国士兵的女士。“宪法规定了那么多的工人权利,多得像插在公牛背上的小旗。”

“先生,就像是基督拿着手枪。”

“红色旅,世界工人之家。我敢说卡兰萨和奥夫雷贡是共产党,他们在墨西哥要做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俄国做的事。”

“这一切都行不通,不信你们等着瞧。”

“一百万人死了,先生们,都是为了什么?”

“我敢说大多数人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在酒馆里斗殴死的。”

这席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但是,当维多利亚电影院放映阿比提亚兄弟拍摄的一部关于革命的战争片的时候,风雅的观众们还是抱怨不已。人们来电影院可不是来看拿着来复枪的丘八的。该放的电影应该是意大利电影,也只能是意大利电影。热情和美貌是银幕上的意大利贞女和荡妇的特权;人们为着皮娜·梅尼凯利、伊塔利亚·阿尔米兰德·曼齐尼、乔瓦娜·特利比里·冈萨雷斯的故事片,为着这些有着明亮的眼睛,幽深的眼眶,不安的眉毛,蓬松的头发,肉感的嘴唇和忧伤的举止的美丽女子而高兴或痛苦。当美国电影第一次在这儿放映的时候,大伙都在电影院里抱怨。为什么当吉斯姐妹哭泣的时候,要掩住面孔呢?为什么玛丽·比克福特穿得像个乞丐呢?要是想看贫穷,那可以去大街上;要是想压抑情欲,那就回家好了。

这些在劳拉和外省的所有阶层的生活里,依旧是日常生活不可替代的基础。人们经常“会客”,但是这种聚会是分散的,大家轮流坐庄。在自己家里,人们围坐在桌子旁,玩着彩票和七分半。那里保留着那些烹饪的习惯。年轻的姑娘们在那里学习跳舞,在客厅里学跳舞,“要这样跳,提起裙子。”她们精心准备,去参加俱乐部赌场里举行的盛大晚会,以及圣诞夜圣婴受洗和入睡的仪式,午夜弥撒之后,“法国之舟”礼堂开放,摆满了甜品,中心陈列着耶稣诞生和东方三王的模型。然后是狂欢节,人们纵舞狂欢。学期末,拉莫斯小姐学校上演情景剧,她们表演倡导独立的伊达尔哥神父和与瓜特鲁佩圣母相遇的印地安人胡安·迭戈的故事。不过最主要的节日是每年4月19日在赌场里举办的舞会。届时当地上流社会的成员都会参加。

劳拉更愿意待在家里,这不仅仅是为了陪伴她的父母,更是因为自从那位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死后,小阁楼被封住,而劳拉却开始为家里的每一个角落赋予一份特殊的意义,好像她知道住在并在这房子里成长的快乐不会天长地久一样。卡特马哥外祖父的房子,维拉克鲁斯银行上层面朝大海的房子,现在居住的哈拉帕莱尔多大街只有一层的房子……她一生里还会住进多少幢房子呢?对此她无法预测。她只能回忆起昨天住过的房子,记住今天住着的房子,她要给她飘摇的生活创造一些庇护所,以后的岁月再也不会像湖边的童年住所那样清晰而又确定,在未来的岁月里,她需要找到一个避风港。对于二十二岁的劳拉而言,未来是无法想像的。尽管她总是说:“不管怎样,未来总是与现在不同。”她不愿意去想那些让生活变得艰难的理由。最坏的莫过于父亲的去世了。进一步说,最悲惨的莫过于像希尔达姨妈和维尔希尼亚姨妈那样被遗忘在一个小

村子里了，她们以照顾堂费利佩·克尔森为借口终身未嫁，然而现在，这惟一的理由被剥夺了。外祖父已经去世了。没有人倾听希尔达弹奏的钢琴曲；也没有人欣赏维尔希尼亚写就的诗歌；所以她宁愿过一种积极的生活，与另外一个生命相互承诺，就像一直在照料费尔南多·迪亚斯的玛丽亚·德·拉奥姨妈这样。

"没有你我该怎么办，玛丽亚·德·拉奥。"不知疲倦也从不抱怨的雷特西亚一脸严肃地说。

劳拉闭上眼睛，就像那天回忆起圣地亚哥的卧室一样，她仿佛走过了庭院、走廊、拼花地面、棕榈、欧洲蕨、桃花心木的衣橱、镜子、有柱子的床、水缸、梳妆台、浴室、衣柜和她母亲的属地，那飘着薄荷和欧芹味道的厨房。

"你和你外祖母一样，动不动就沉思。"雷特西亚无法掩饰眼里的悲伤，对她说，"和朋友们出去走走。乐一乐。你才二十二岁。"

"妈妈，你是想说，我都已经二十二岁了。你像我这么大时，已经结婚五年了，我都生出来了。哦，妈妈，不要问我了：我一个男孩子都不喜欢。"

"告诉我是不是他们不追求你了？是因为过去发生的事情吗？"

"不是，妈妈，是我在逃避他们。"

劳拉结交的那些年轻女孩子决定将自己的童年延长，尽管她们也向不受欢迎的成年作出了一些轻佻的让步，她们就像夏末的树叶在轻轻颤动，回应着一个不可理解的转变。她们自称是"浪荡女"，依旧有着与十八岁的年龄不相符的淘气。她们在公园里跳绳，在迷人的散步之前让红晕飞上脸颊；美美地睡上一个午觉之后，去贝卢斯打网球；在狂欢节上，她们天真地嘲笑她们戴假面具的男友。

“你是个走钢丝的吗?”

“不要羞辱我,你没看出来吗? 我是个王子。”

她们在胡亚雷斯公园里滑冰,以减掉吃“魔鬼”而增加的体重,“魔鬼”是一种糕点,馅心是巧克力做的,外面裹着一层松子糖,带有面包房的清香,是城中馋鬼们的最爱。在拉莫斯小姐学校念到最后一年的时候,她们主动请缨,排演情景剧,因为这是看清这两位老师是两个不同的人的惟一一次机会,那时,她们会一个领着排练,另一个则在帷幕之间走来走去。

“一件可怕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劳拉。我当时正在演圣母这个角色,我突然想上厕所,我不得不做了一个可怕的手势,让拉莫斯小姐降下帷幕。我小便完了,又跑回来再做圣母。”

“在我家里,劳拉,他们烦透了我的表演和服装。我父母雇了一个人,作为惟一的观众为我喝彩。你觉得怎么样?”

“你会很得意的,玛格里特。”

“我决定做一名演员。”

此刻,所有的人一窝蜂地涌向了阳台,去看预科士官生队列经过,他们戴着法国军帽,扛着枪,身穿金制纽扣、前襟紧绷的制服。

银行通知他们,在俱乐部的舞会之后的9月份,他们要从这幢房子搬走。堂费尔南多会领到退休金,而一个新经理会搬进这幢房子,这也很自然。在阁楼上还举行了一个授予堂娜阿尔莫尼亚·阿斯纳尔荣誉勋章的仪式。墨西哥的工会决定给予这位勇敢的同志以荣誉,因为在革命期间,她资助过红色旅和世界工人之家,当过它们的通信员,甚至就在此地,在银行经理的家里,她还收留过几个被通缉的工

会成员。

“妈妈，这些你都知道吗？”

“我不知道，劳拉。姐姐，你知道吗？”

“一点都不知道。”

“不知道最好，对吗？”

她们三个不敢想像一个像费尔南多这样诚实的人竟会在自家的屋檐下忍受一桩阴谋，尤其是有了1910年11月21日，圣地亚哥被枪杀的先例。一想到这些，劳拉总会认为奥兰多·希门内斯知道实情，他是阁楼和堂娜阿尔莫尼亚的无政府主义工会成员之间的调解人。她否定了这个猜想：奥兰多，花花公子，到处留情……或者正因为如此，他才是最佳人选？劳拉开心地笑了；她刚刚给她的父亲读过奥切男爵夫人的《赤色地榆》一书，在她的想像中，可怜的奥兰多就像是一株墨西哥的地榆，晚上是花花公子，白天是拯救工会成员于水火之中的无政府主义者。

没有一部小说能够告诉劳拉将怎样去面对她一生中将会发生的事件。雷特西亚和玛丽亚·德·拉奥专心致志地去找房子，她们要找一间舒适并且费尔南多的退休金能够支付得起的房子。同父异母的姐姐建议，出于形势所迫，希尔达和维尔希尼亚应该卖掉卡特马哥的咖啡庄园，用这笔钱，在哈拉帕买一幢房子，大家住在一起，以节省费用。

“为什么我们不回卡特马哥呢？毕竟，我们曾经在那里生活，而且……我们曾很幸福。”雷特西亚说，并没有像她那位习惯沉思的母亲一样叹息。

当两个单身的姐姐，希尔达和维尔希尼亚，带着行李、书箱、衣柜、雕像、鹦鹉笼子、还有那架斯坦威钢琴出现在哈拉帕的家中的时候，她的这番话便变得毫无意义了。

人们聚集在莱尔多大街，看这些奇异的行李抵达，一辆

骡车上载着这对姐妹的财富，而她们自己满脸风霜，好像很久以前输掉了一场战役，现在来逃难一样，她们戴着黑色的面纱，用面纱把硕大的草帽绑在下巴上，抵御苍蝇、阳光和一路的风尘。

她们的故事非常简单。维拉克鲁斯的农民武装暴动，占领了克尔森一家的庄园及这个地区其他的产业；他们宣布农业合作，之后就把主人赶跑了。

“我们没法通知你们。”维尔希尼亚姨妈说，“就来投奔你们了。”

她们不知道4月份举行完俱乐部的舞会之后，也就是在9月份，哈拉帕的房子就会被收回。看着两个姐姐，再看看瘫痪不起的丈夫和尚未出嫁的劳拉，雷特西亚崩溃了，她哭了。两个身无分文的姐姐疑惑地相互对视。雷特西亚擦干眼泪，说了一声对不起，请她们进屋并安顿下来，当天晚上，在劳拉的卧室里，玛丽亚·德·拉奥姨妈走近劳拉的床，她坐了下来，抚摸着她的头。

“不要泄气，孩子，看看我的遭遇。有时候，你不得不去想我的生活真是太难了，尤其是我和我的母亲生活的那段时光。但你知道吗？来到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即使是出生于悲伤和苦难之中，我说的是心里面的苦难和悲伤，比外面的更为强烈；你来到人世间，你的身世便被抹去，出生永远是一场盛会，我只能去庆祝我要度过的一生，而不去计较我是从何处来的，在我之前发生了什么，我的母亲是在何处又是在何时生的我，以及我的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你知道吗？你的外祖母拯救了我的一生，但是倘若没有她，没有我欠她的一切，没有我敬重她的一切，我还是会为这个世界而庆祝，我知道我之所以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在艰难和成长中欢庆生命，孩子，我他妈的会努力坚

持的,原谅我说话像一个阿尔瓦拉德纳的粗人,可是,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玛丽亚·德·拉奥的手从劳拉的头上移开,她看着她的外甥女,她的微笑光芒四射,好像在她的嘴唇和眼睛里面,永远充溢着热情和快乐。

"劳拉,还有一些,让我讲完这个故事。你的外祖母前来拯救我,把我带去和你们生活在一起,她怎么样拯救了我,对此我不想再重复。但是,你的外祖母并不关心我的母亲,好像她救了我一个人就已经足够了,而任由魔鬼带走了我的母亲。然而,你的父亲费尔南多关心我的母亲。要不是费尔南多找到了她,帮助她,给她金钱,让她体面地度过晚年,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母亲会怎么样:请原谅我的粗俗,但是没有什么事比年老了还做妓女更悲惨的了。我想说的是下面的话。最重要的是生活以及在哪里生活。让我们一起拯救这个家和它的成员,劳拉,玛丽亚·德·拉奥,你最值得尊敬的姨妈向你发誓。我绝对不会忘记的!"

她已经发胖了,行动起来有一点不便。当她推着轮椅,带着瘫痪的费尔南多出去散步的时候,行人们纷纷避开他们的目光,他们对要同时怜悯一个瘫痪的男人和一个肤色灰暗、小腿肥胖的混血女人而心怀恐惧,她行走不便,这让节日里的那些健康的年轻人心中不悦。玛丽亚·德·拉奥的愿望可以克服一切的困难,希尔达和维尔希尼亚到达以后,四个姐妹决定不但要给这个家找一所房子,还要把那所房子变成一处客栈,每一个人都要共同照顾费尔南多,为维持这个家贡献一份力量。

"至于你,劳拉,我求你不要担心。"希尔达姨妈说。

"你什么都不会少的。"维尔希尼亚姨妈补充说。

(……我不担心,各位姨妈,妈妈,我不担心,我知道我

什么都不会缺的,我是家里的小孩子,我不是已经二十二岁了,而是只有七岁,我无法保护自己,需要别人保护我,我好像还没有经历过第一次死亡,第一次痛苦,第一次激情和第一次发怒,但是这些我都已经经历过了,我拥有它们,我过去能够入睡,而我现在依然能够睡得着,尽管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我知道生活里充满了痛苦、激情、愤怒和死亡,我也知道怎么与它们共处,我所不能忍受的是我自己的倚小卖小,不是因为别人,而是因为我自己,我没有长大不是因为那些愚蠢的小女孩,不是因为我的姨妈们把我保护得太好,更不是因为我的妈妈,她不要任何的激情,只求能够保持体面并尽到对家庭的责任,因为她知道一旦她不在了,这个家就会像小孩子们在马坎波海滩上垒起的城堡一样迅速地垮掉,如果不是她去承担责任,那么由谁去承担呢?当我劳拉·迪亚斯想起自己的时候,当我从一个遥远的角度注视着我自己,好像是另一个,第二个劳拉在看着第一个,我发现自己与周边的世界如此疏离,我对家庭以外的人漠不关心,这样做对吗?然而,我又是如此地关心和我生活在一起的家人,但不论怎样,我是与世隔绝的,而且我不可饶恕地成为了一个负担,就像是托马斯·哈代小说里的那个孩子一样,我被所有的人关心疼爱,现在却成了他们的负担,尽管他们从来不对我这样讲,我是一个将满二十三岁的大孩子,从未给这个供我吃穿的家庭任何贡献,一个大孩子,自认为只要给她瘫痪在床的父亲读小说就可以了,因为她爱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也都爱她。我生活在我施予的和接受的爱里,这是不够的,爱我的母亲,怜悯我的父亲,为我的兄长而哭泣,这些远远不够,不能够把我的爱和痛苦看成逃避责任的权利,现在我要为了他们献出我的爱,为了他们超越我的痛苦,让我自己得以解脱,彻底的解脱,使他们欣慰,因为他

们不必为我操心,然而我却为他们,为爸爸费尔南多,妈妈雷特西亚,希尔达、维尔希尼亚和玛丽亚·德·拉奥姨妈,还有亲爱的圣地亚哥而不停地操心,我不奢求他们的理解以及帮助,我做了我应该做的,是为了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而不是一个局外人……)

胡安·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格林身材高大,足有六英尺,肤色黝黑,外貌上带有印第安人和黑人的特征,他嘴唇厚重,线条生硬,头发拳曲,然而他的皮肤像塔糖一样平滑甜蜜,如同吉卜赛人的皮肤,发出黑夜一般的光芒。一双眼睛恰似黄色海洋里的绿色岛屿。他的肩膀宽阔而又高耸,使粗壮的脖颈黯然失色,脖子比看上去的要长,他的胳膊也很长,一双典型的工人的大手。他躯干短,腿长,脚比矿工鞋还要大。

他强壮,笨拙,脆弱而又与众不同。

他在哈维尔·伊卡萨的陪伴下来到舞会,哈维尔是一个年轻的工党律师,贵族出身,而现在却为工人阶级效劳,就是他把一个与哈拉帕的中产阶层格格不入的人带到了舞会现场。

伊卡萨是一个从不墨守成规的优秀的年轻人,他写先锋派的诗歌和流浪汉小说;他的书里全是画着摩天大楼和飞机的立体派插图,他试图在诗歌里寻找现代的速度,他的小说继承了克维多的遗风,把小拉撒路带到了墨西哥城,这个现代城市挤满了——伊卡萨对那些有幸被请来参加一年一度的俱乐部舞会的宾客解释说——来自农村的移民,而城市在不断地膨胀。他向那些地方的实业家挤了挤眼睛,现在是便宜地买进跑马场区,那不勒斯区,查布尔特佩克山庄,水藻公园,甚至是莱昂沙漠的时候了,这样就可以看看财富是怎样升值的,别傻了——他露出快乐的牙齿,笑着

说——现在是投资的时候了。

别人叫他未来主义者，夸张主义者，达达主义者，这些名词以前从未听人在维拉克鲁斯提过，而伊卡萨在外省的小城里，傲慢地一口气引进了所有的词，他开着一辆黄色敞篷的“伊索塔-弗拉斯基尼”，沿着原始的道路来到了这里，好像是为了迅速地承担起责任，他向安娜·基多小姐求婚。因为她的父母对这场婚姻表现出些许疑虑，一个星期天，哈维尔·伊卡萨开动他这辆意大利生产的汽车冲上了大教堂的台阶，当时教堂里正做着弥撒；马达声嘶力竭地叫着，汽车疯狂地冲上了陡峭的台阶，这位精力充沛的年轻律师把油门加到最大才达到了这种效果，汽车在台阶尽头通往内院的地方停住了，真是惊心动魄，他宣布他到这里是要与安娜小姐结婚，没有任何人和任何事可以阻挡得了他。

“我没有出卖理想。”年轻的律师伊卡萨向他参加俱乐部舞会的老友们声明，“这只是彼此方便而已。革命唤醒了这个国家所有沉睡的力量，商人和实业家因为国家向外来势力投降而遭遇破产，政府官员因为波菲里奥式的官僚主义而举步维艰，更不要说那些没有土地的农民和渴望组织起来、拥有一个受人尊重的声音的工人了。诸位，布兰科河工厂和加纳内亚矿山里的那些第一批反抗独裁的造反者是一些什么人呢？他们不是别人，正是工人。”

“马德罗没有向他们作出让步。”科尔多瓦的那个养鸡的年轻人的父亲说。

“马德罗什么都不懂。”伊卡萨辩解道，“但左派的维多利亚诺·韦尔塔，就是谋杀马德罗的那个人，他却在工人阶级里寻找支持，并允许在 5 月 1 日举行大规模的游行，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他实行每日八小时每周六天的工作日，但是当工会向他要求民主时，他就不允许了。他逮捕并

流放了领头的人。其中的一位就是我的朋友胡安·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格林,我很高兴为大家介绍。姓格林并不意味着他是英国人;在塔巴斯科,他们被叫作格拉汉姆,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是英国海盗的后裔,而他们的母亲是印第安人和黑人,是这样的吗?”

胡安·弗朗西斯科笑了笑,点了点头。“劳拉,你受过良好的教育,我就把他交给你了。”伊卡萨优雅而又坚定地说,之后便去忙另一件事了。

劳拉暗地里想,这个与外省传统格格不入的不速之客,出现在圣卡耶塔诺庄园的舞会上,就和上次那个科尔多瓦的地主所谈到的“佩枪的基督”一样,他举止笨拙,像他脚上穿的那双方方正正的矿工钉鞋一样憨厚。她以为他的演讲应该像沉默中爆发的一场石头雨。因此,当她听到一个舒缓低沉甚至甜蜜的声音时,不由得呆住了,每一个词都极富说服力,由此可以认为胡安·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格林是一个温柔而谈吐深沉的人。

“哈维尔·伊卡萨讲得有道理吗?”劳拉找到了一个话题,开始了谈话。

胡安·弗朗西斯科回答说:“是的。我知道所有的人都想利用我们。”

“利用谁?”劳拉极其自然地问道。

“利用工人。”

“你是工人吗?”劳拉又发问了,她使用了“你”,因为她确定他不会因此而不快,同时希冀着他也会以同样的方式称呼她,而不叫她“小姐”或是“您”,她小心翼翼地寻找着与这个陌生人之间的共同之处,她试探着感到他有一点粗鲁,有一点野蛮,这与奥兰多给她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奥兰多强迫她去想一些邪恶、精致、细微的事情,像是某种有毒的香

气转瞬即逝,那种感觉强烈、致命而又倏忽。

他没有用“你”。——“这是一种冒险,小姐。必须去接受它。”

(请用“你”来称呼我,劳拉恳求道,我希望您用“你”来称呼我,不要叫我小姐,我希望有一次我能够感受到不同,我希望一个男人会和我说并做一些我不知道的,也不盼望,或者是不能奢求的事情,这机会就在他身上,之后的事情都取决于这一切,取决于简简单单的一声“你”或者是“您”……)

“您冒什么险,格林先生?”劳拉恢复了“您”这个正式的称呼。

“我们冒着被别人操纵的危险,劳拉。”

他接着说,丝毫没有注意到(或者是装傻)劳拉神色的改变,“我们”是一个比“他们”暧昧得多的词。劳拉一下子就习惯了这个奇怪的复数,没有野心,也没有虚假的客套,这个词包含了一个团体,里面有人,工人,斗士,同志,还有这个和她谈话的男人。

“伊卡萨没有理想,而我却有。”他第一次笑起来,他的笑容有一点坏,但劳拉这样想,他不过是在嘲讽自己而已,“我有理想。”

他说他之所以还有理想是因为宪法作出了一些本没有必要向墨西哥工人和农民作出的让步,卡兰萨是一个旧式的庄园主,每当和工人农民接触的时候,他的山羊胡子就一动一动的,奥夫雷贡是一个聪明的土生白人,同时也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同上帝还是同魔鬼共进晚餐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他能够让魔鬼相信自己实际上就是上帝,又能够让上帝相信不用着急他自己就能够成为魔鬼,因此没有必要去嫉妒那个魔王;但不管怎样,阿尔瓦罗·奥夫雷贡将军是一

个法官,他最终宣判:你是魔鬼……宪法规定了工人和农民的权利是因为要是没有“我们”——又来了,又来了,劳拉·迪亚斯暗想——“他们”既不能赢得革命也不能把政权维持下去……

他邀请她跳舞,她笑着做了一个痛苦的鬼脸,因为脚上穿的鞋子受尽了践踏,她向这位工人领袖央求说他们两个最好还是到阳台上聊聊天,他也笑了,说好吧,无论是上帝还是魔鬼都不是为了舞厅而创造我的……但是,要是您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感兴趣的话,我就在阳台上给您讲一讲大革命中工人斗争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人们通常认为革命是一群土生白人的精英领导着农民军,殊不知革命也是在工厂和矿山里发轫的;在布兰科河与加纳内亚;工人们组织了红色旅,与韦尔塔的独裁统治进行着斗争,在墨西哥城的阿苏莱霍宫,在那座从前贵族聚会的乔克俱乐部,他们还创建了国际工人之家;韦尔塔的警察闯了进来,把“我们”逮捕了,他们想放火烧了那地方,逼迫“我们”逃亡,我们因此找到了奥夫雷贡张开的双臂。

“小心呀。”伊卡萨凑了过来,对劳拉和胡安·弗朗西斯科说,“奥夫雷贡是一只老狐狸,他要得到工人的支持,好和萨巴塔和比利亚领导的农民军讨价还价。他动辄谈论‘无产阶级的墨西哥’,只是为了对抗农民和印第安人的墨西哥,要注意,革命中土生白人的领导人认为,墨西哥依旧是一个反动、落后、宗教化的墨西哥,在僧侣的法衣和教堂香火的乌烟瘴气中奄奄一息,别上当,胡安·弗朗西斯科,要小心哪……”

“但这也是事实。”胡安·弗朗西斯科有几分激动地说,“农民们在帽子上戴着圣母徽像,跪爬着去听弥撒,他们不是现代人,他们是信奉天主的农村人,大学生。”

"听着,胡安·弗朗西斯科,别叫我'大学生',否则,我们就绝交。别太土了。要是你认识了一个你喜欢的上流社会的小姐,可以和她交往,笨蛋。别像个反动、落后、没有现代意识的农民。"哈维尔·伊卡萨哈哈大笑起来。

然而,胡安·弗朗西斯科却没有一点幽默感,他坚持说农民是反动的,而城市里的工人是真正的革命者,十五万工人在红色旅里浴血奋战,一百五十万工人参加了国际工人之家,从前什么时候在墨西哥看到过这种情况?

"你想听听反面的例子吗,胡安·弗朗西斯科?"伊卡萨打断了他的话,"想想那些雅基印第安人的兵团吧,奥夫雷贡把他们组织起来,去攻打驻扎在塞拉亚的潘乔·比利亚的农民军。你慢慢会习惯的,我的朋友。革命是矛盾体,若是发生在墨西哥这样一个矛盾重重的国家,只能是变得疯狂。"伊卡萨低声说,"就像人们看到劳拉的眼睛时一样。简而言之,洛佩斯·格林,当革命使卡兰萨和奥夫雷贡取得大权之后,领袖们真的接受了工厂自治和驱逐外国资本的条件了吗?这可是他们从前向红色旅作出的承诺呀。"

没有,胡安·弗朗西斯科辩解道,他知道"我们"是在官方怀柔和高压政策的夹缝里求生存,但是"我们"不作原则上的让步,"我们"曾经组织了墨西哥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我们反抗着革命政府的压力,因为他们要把我们变成官方工人主义的傀儡,我们使工资得到了增加,我们一直在谈判,我们让卡兰萨气得发疯,因为他不知道在哪儿逮住我们,他囚禁我们,宣称我们是叛徒,我们切断了墨西哥城的电力供应,他们抓走了电业工人的领袖埃尔内斯托·维拉斯科,用手枪顶住他的太阳穴,逼他说出怎么样才能恢复电力,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打击我们,但是"我们"从未屈服,我们总是回到斗争中,回到谈判桌旁,我们胜利过,我们失败

过，我们胜利少而失败很多，不能那样，不能那样，不能降下我们的旗帜，我们知道如何熄灭和点亮电灯，他们需要我们……

“阿尔莫尼亚·阿斯纳尔是一个战斗者的榜样。”在劳拉和她家人所居住的房子里举行的授勋仪式上，胡安·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格林说，“和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工会成员一样，她来到了维拉克鲁斯，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阿梅德奥·费雷斯和她一同来到了这里，在堂波菲里奥掌权的时候，她秘密地组织起印刷工人和制版工人。后来，在大革命时期，阿尔莫尼亚·阿斯纳尔勇敢地参加了国际工人之家，更难得的是，她默默无闻地在这里，在哈拉帕做起了通信员，把资料秘密地从维拉克鲁斯港口送到首都墨西哥城，又从首都把资料带回这个港口城市……”

胡安·弗朗西斯科停顿了一下，在与会的一百多人里，他寻找着劳拉·迪亚斯的眼睛。

“多亏了银行经理堂费尔南多·迪亚斯无私的慷慨，这一切才能够成为现实，他允许阿尔莫尼亚·阿斯纳尔躲在他的家里秘密地工作。堂费尔南多现在尚在病中，我斗胆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向他问候，并向他、他的妻子和女儿表示感谢。我们知道这位勇敢而又谨慎的先生所做的一切为的是纪念他被独裁政府的警察残酷杀害的儿子圣地亚哥·迪亚斯。向所有的人致敬。”

那天晚上，劳拉紧张地注视着她瘫痪的父亲那双沉默的眼睛。随后，她慢慢地向他讲述了胡安·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格林在纪念会上发表的讲话，费尔南多眨着眼睛。在那块家人为了与父亲交流而准备的可携带的小黑板上，劳拉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感谢你为圣地亚哥所做的一切。费尔南多，和平时一样，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努力着不眨眼睛。

所有的人——家里的所有女人——都很熟悉这两种表情，或是不停地眨着双眼，或是不眨眼睛，眼球好像要从眼眶里蹦出来一样，但是她们并不清楚这两种行为的意义。这一次，费尔南多费力地抬起手，握紧拳头，但是又不得不无力地垂落在膝盖上。只有两条眉毛高扬着，像两个抑扬音符。

“我们在黑嘴大街上，找到了一所房子，我们可以住在那里并且在那里招待客人。”几天之后，妈妈雷特西亚宣布说。

“每天晚上，我会给费尔南多读小说。”作家姨妈维尔希尼亚说，她的双唇紧闭着，眼睛放射着光芒，“你不要担心，劳拉。”

劳拉去和她的父亲告别，她给他读了半个小时《无名的裘德》，多亏了哈代的这本小说，劳拉才能够幻想她父亲死后的情景，他的脸因为死亡而熠熠生辉，死亡焕发了他的青春，他曾坚定地甚至是幸福地等待着死亡，死亡把岁月的痕迹一笔勾销，劳拉永远怀念着这温情脉脉而又百折不挠的男人。

“不要让机遇溜走。”当天晚上，钢琴家姨妈希尔达·克尔森对她说。“看看我的手。你知道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是吧？劳拉。我不希望听到你将来也这么说。”

1920年5月12日，劳拉·迪亚斯和胡安·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格林在哈拉帕的一所法院里结了婚，那天正是劳拉·迪亚斯的生日，在以往的这个日子里，她曾经唱着“5月12号，圣母出门早，一身雪白袍，短衣外面罩”，黑仆桑帕亚一边扫地一边唱着“噢噢噢啦啦啦，我的黑姑娘到这儿来呀，我的黑姑娘到那儿去呀”。劳拉·迪亚斯和她的丈夫乘坐着洋际列车来到了墨西哥城，半路上，她哭了，不仅是因为她把中国娃娃李白忘在了哈拉帕的枕头边，还因为当火

车到达特华坎的时候，有人告诉胡安·弗朗西斯科，贝努斯提亚诺·卡兰萨总统不幸在特拉克斯卡兰通果遇刺身亡。

第六章　墨西哥城:1922 年

墨西哥城没有四季之分,只有从 11 月到 3 月的旱季和从 4 月到 10 月的雨季。季节的变换不过是濛濛细雨或炎炎烈日,它们才是墨西哥真正的条纹与十字。但这已经足够了,对劳拉·迪亚斯来说,那个雨夜已经把她丈夫胡安·弗朗西斯科的形象铭刻在她心中。胡安·弗朗西斯科毫无遮蔽地站在城市的中心广场上,他根本就不需要高声喊叫,他的声音低沉有力,与他私下里说话时的喃喃细语截然不同,他的形象犹如一幅战斗的画卷,稀疏的头发湿淋淋地搭在后颈、前额和耳边,雨水顺着眉间淌过眼睛又流向嘴边,橡胶雨衣裹着这个粗壮的身躯。劳拉在新婚之夜,曾满怀敬畏和感激,犹疑不决地靠近这个躯体。二十二岁的劳拉已经决定了自己的一生。

她记起外省舞会上的那些小伙子,她分辨不出这一个和那一个,第一个和第二个,前一个和后一个。他们都是一样的和蔼可亲、风度翩翩。

“劳拉,他长得太丑了。”

“但他谁也不像,伊丽莎白。”

“他太黑了。”

“黑不过玛丽亚·德·拉奥姨妈吧。”

“你又不跟她结婚,你呀。维拉克鲁斯皮肤白嫩的小伙子多着呢。”

“可这个最独特，或者最危险，我说不清楚。”

“就因为这个原因你选了他？你简直是疯了！劳拉，你自己才是个危险分子！我对你是既羡慕又同情啊。”

这对新人刚刚离开哈拉帕，上了高原，劳拉就开始怀念起省会的平和与美丽，怀念赋予她新生的如此完美的夜晚，怀念赋予万物生命的每一个黄昏。她想起她的家：所有的不幸立即消融在被往日萦绕的和谐之中，她想起她的父母，想起圣地亚哥和她那些至今独身的姨妈，想起已逝的外祖父母。一说到“和谐”这个字，她便感到一丝彷徨，因为她回忆起那位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女英雄[①]，在那个下着雨的傍晚，胡安·弗朗西斯科在一次旨在捍卫八小时工作日，最低工资限额，产假以及带薪节假日的演讲中提到了这位女英雄。他用庄严宏亮的声音向广场上密集的人群宣布：这一切将会由革命来保证，他要在 1922 年 5 月初的这个绵绵雨夜来保卫和保障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款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劳动权益和劳工保障获得了宪法的承认，因此墨西哥革命是场真正的革命，它不同于拉美其他国家所发生的政变、叛乱或是骚动，它与众不同，独一无二。这里所有的一切归根结底都代表了民众，且服务于民众。胡安·弗朗西斯科对雨中聚集的二千余人这样说，对细雨这样说，对渐渐浓重的暮色这样说，对新政府这样说，对被谋害的贝努斯提亚诺·卡兰萨的后继者这样说（人们都认为贝努斯提亚诺·卡兰萨是被阿瓜·普列塔，卡列斯，奥夫雷贡和德拉韦尔塔[②]三人叛乱政府杀害的），洛佩斯·格林以革命的名义对所有的人这样说，包括对劳拉·迪亚斯也这样说，

---

① 阿尔莫尼亚 Armonia 意为和谐。

② 阿多尔福·德拉韦尔塔（1881—1955），墨西哥总统（1920）。

她是他从外省新领回来的年轻妻子,一个美丽、颀长的姑娘,五官由于鲜明瘦削而显得奇特,她的美丽正来自于她的奇特。他对我也说,对我也说,我是他语言的一部分,我一定要成为他演说的一部分。

眼下,中心谷地正下着雨,她想起她在哈拉帕登上前往墨西哥城"布埃纳维斯塔"车站的火车的场景。我从沙变成了石,从丛林变成了荒漠,从南美杉变成了仙人掌。高原逐渐被一片烟雾和焦地的景象所代替,接下去是一片岩石嶙峋的坚实平原和几个石工,岩石般的石工,一棵棵杨树的叶子泛着银光。这样的景色让劳拉的嗓子眼儿发干,喘不过气来。

"睡着了吧,我的小姑娘?"

"这景色吓了我一跳,胡安·弗朗西斯科。"

"你错过了高原的松树林。"

"哦,怪不得这么好闻。"

"不要以为这里到处都是光秃秃的一马平川。你知道,我是塔巴斯科人,我像你一样,怀念热带的风光,但我现在已经离不开这片高原,离不开这个城市了……"

当她问为什么时,胡安·弗朗西斯科变换了口气,清了清嗓子,甚至有些一本正经地回答:墨西哥城是国家的枢纽和心脏,正如别人所说的那样,是阿兹特克之城,殖民之城,现代之城,一层盖着一层……

"就像一块千层饼。"劳拉笑了。

胡安·弗朗西斯科没有笑,劳拉继续打着比方。

"就像人们给你的英雄阿斯纳尔小姐带上去的饭盒,亲爱的。"

胡安·弗朗西斯科显得更严肃了。

"对不起,我是开玩笑。"

"劳拉,你从来没有产生过要去看一看阿尔莫尼亚·阿斯纳尔的好奇心吗?"

"我那时还很小。"

"可你那时已经二十岁了。"

"可能是我童年的印象在作怪,胡安·弗朗西斯科,有时候,尽管你已经长大了,但你小时侯听过的鬼怪故事仍然能吓倒你。"

"忘了它,劳拉,你已经不是家里的小孩子了,你现在是和一个坚定地战斗着的男人站在一起。"

"我知道,胡安·弗朗西斯科,我敬重你。"

"我需要你的支持,我需要的是你的理智,不是你的幻想。"

"我会尽力不让你失望的,亲爱的,我很敬重你,你是知道的。"

"那你就该想想:你为什么不反抗你的家庭?为什么不去看一看阿尔莫尼亚·阿斯纳尔?"

"因为我害怕,胡安·弗朗西斯科,我对你说过,我当时还很小。"

"你失去了认识一位伟大女性的机会。"

"请你原谅我,亲爱的。"

"应该是你原谅我。"胡安·弗朗西斯科拥抱她,亲吻着她因为紧张不安而握紧的拳头。"我要在现实中慢慢地教育你。你在童年幻想中生活得太久了。"

奥兰多不是幻觉,但她知道,她永远不敢提到这个不安分的金发男孩。奥兰多擅长于诱惑人,他曾约我去阁楼。所以自从他约我之后,我再也不去那里了。另外,阿斯纳尔小姐喜欢受人尊敬,是她自己要求……

"是她自己下令不让别人打扰她,我是什么人,可以违

背她的意愿?"

"换句话说,你不敢。"

"我是不敢,有许多事情我不敢做。"劳拉微笑着,脸上带着虚假的后悔表情,"但跟你在一起,我会敢做的。你会教我的,不是吗?"

他也笑了,充满激情地吻了她,从洋际火车上的新婚之夜开始,他就向她倾注这种激情;他是个高大健壮,精力充沛,含情脉脉的男人,既没有她从前那个情人奥兰多·希门内斯散发出来的神秘气息,也没有圣卡耶塔诺舞会上那个金色鬈发男孩那股坏味道。与奥兰多相比,胡安·弗朗西斯科就是朴实,就是坦率,有着几近原始的性欲冲动。正因为此,劳拉对他的爱与日俱增,仿佛她的丈夫证实了这位年轻姑娘在哈拉帕俱乐部看到他时的第一印象。作为情人的胡安·弗朗西斯科与作为演说家、政治家、工人领袖的胡安·弗朗西斯科一样出色。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的,我知道的仅此而已,我无法比较,但我可以享受,而且我已经享受了,事实上,我和这个男人,和这个既不如奥兰多那样细致,也不如奥兰多那样遍体芬芳的男子在床上享受。哦,我的胡安·弗朗西斯科。")

"你以后改掉那个在大庭广众之下叫我'亲爱的'的习惯。"

"好的,亲爱的。请原谅。为什么?"

"我们和同志们在一起,我们是在斗争的过程中,这样叫不好。"

"同志之间难道没有爱?"

"这不够严肃,劳拉,够了。"

"请原谅,只要在你的身边,对我来说,一切都是爱,工

团主义也是。”她一如既往地微笑着，抚摸着她男人汗毛很重的大耳廓，她想对他这么说：你是我的男子汉，我是你的小妻子，我的男人是我的“亲爱的”，但我却不能对他说“亲爱的”。

“你常常叫我‘小姑娘’，却从不说‘亲爱的’，我敬重你，知道你觉得这样自然些，就好像我喜欢叫你……”

“亲爱的”……

他吻了她，但她由于刚才的过失所引起的不安仍然呆坐着，仿佛两人说了什么至关重要的、无法重复的话，终有一天，他们会为此高兴或后悔一样。实际上，他们彼此互不了解，这个事实使一切付之东流。所有的事情都让人惊奇，让他们两个人惊奇。每一个人都等着对方向自己逐渐展示自我。这么想是一种安慰吗？她不安的直接理由，也就是她此时此刻脑海中所想的：她的丈夫因为她不敢上楼去敲开阿尔莫尼亚·阿斯纳尔的房门而责备她。胡安·弗朗西斯科的现在和过去都驳倒了她这个所谓的理由，让这个理由更像是个借口。阿斯纳尔小姐本人要求清静和受人尊重，劳拉用的是这个借口，而这个借口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那就是奥兰多，这是没法说出口的。劳拉觉得错误在她，但她又无法替这个含混不清的错误辩解。她突然发现，她隐瞒这件事是为了和丈夫更加靠近，和斗争的生活更加贴近，避免在两人之间树立障碍而拉开两人的距离。她不知道怎么解释好，就只好把一切全部归咎于自己的天真幼稚。

“不要在公众场合叫我‘亲爱的’。”

“别担心，亲爱的……”年轻的妻子一边大声笑着，一边把枕头扔到她丈夫那头乱蓬蓬的硬发上，而此时贪睡的他正赤裸着黝黑、强壮的身体，露出一排结实、宽阔的、有如印第安人墙板那样的牙齿，微笑着；像玉米粒，劳拉为了除去

丈夫身上的神话气息，就说："你有一口玉米粒一样的牙齿。"胡安·弗朗西斯科是她生活中的新鲜事物，是远离家庭，远离维拉克鲁斯，远离回忆之后的另一种生活的开始。

"不要仅仅因为他与众不同，你就选他做丈夫。"玛丽亚·德·拉奥姨妈劝她。

"还有谁比你更加与众不同呢，姨妈，我最喜欢的不是你还能有谁？"

外甥女和姨妈互相拥抱亲吻。现在贴着胡安·弗朗西斯科的脸和他做爱，让她感觉到一种阴暗的诱惑，一种难以抵抗的奇异。爱情像是用塔糖糊住烛台的插烛孔，或是在热带生物天生具有的桂皮香气中陶醉，仿佛所有的生物都是从一片野生果园中，在芒果、木瓜和香子兰之间孕育生长出来的一样。和丈夫躺在床上，她想着这一切，想着芒果、木瓜和香子兰，周而复始，无法克制，她知道当她想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她就不再注意自己正在做什么，但这些念头也延长了时间，她担心胡安·弗朗西斯科觉察到她的出神，会误认为她天性冷漠，把她笫对床笫之间肉体缠绵的热情看作是将他与其他男人不利的比较。虽然他已经证实了劳拉是处女，他是她的第一个男人。她猜想：他是否是她的第一个男人，这不是困扰他的问题，而另一件事才会使他担忧：会不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甚至第四个男人出现在他女人的感情故事中？

"你从未谈起过你以前的恋人。"

"你也从未谈起过你以前的恋人。"

胡安·弗朗西斯科的眼神、表情和肩膀的动作都表明了"男人是不同的"，为什么他不开诚布公地说出来呢？

"男人是不同的。"

因为这根本就不需要解释？因为社会就是如此？没有

人可以改变它？在雨中，听着他低沉浑厚的声音飘扬在城市中心宽阔的广场上，劳拉的心中荡漾着来自于他、伴随着他、也为他存在的各种话语和道理。她要为它们找到一个意义以便去理解他，如同他深入她的身体一样，去深入他的思想，去成为他的伴侣、他的战友。这场革命难道不包括墨西哥男人对女人态度的改变？难道不去开创一个与胡安·弗朗西斯科为之奋斗的工人们的新时代同等重要的妇女们的新时代？

她从未属于其他任何一个男人，她只选择了这一个，并只想完全属于这一个。胡安·弗朗西斯科会不会任她诱惑，然后去完全地占有她，正如她心甘情愿地被他占有？胡安·弗朗西斯科从未谈及他过去的恋人，也从不在公众或私下场合喊她"亲爱的"。他难道不担心，甚至不害怕她也会进入他的思想，侵入他的心灵，夺走他的秘密？他默许她每天从一个会议跟到另一个会议，从不说"留在家里，这些是男人的事，会令你厌倦"，在这个人背后还隐藏着另外一个人吗？相反，他衷心欢迎劳拉参与他的事业，倾听他的话语——作为领袖的她的丈夫的演讲。因为这是维护工人，维护罢工的权利，维护八小时工作日的惟一的演讲。演讲是惟一的，因为回忆是惟一的，这是对布兰科河纺织工人罢工、加纳内亚矿工、无政府工团和自由派斗争仅有的回忆，一种无休止的回忆，一条原因与结果的河流，那些结果只会被叛逆的火焰中断或延续，而那火焰足以点燃流水，矿井中的铜和银。

劳拉没再多想什么，婚礼之后的第九个月，第一个儿子出生，打断了这一切。孩子的父亲因为是个男孩而大大庆贺了一番，以至于她不禁自问，"要是生个女儿又会怎么样？"因为生了一个儿子，又看到胡安·弗朗西斯科十分称心

满意，劳拉才得以作主给孩子取名字。

“我们就叫他圣地亚哥，和我的兄弟一样。”

“你的兄弟为了革命而牺牲，这对孩子来说是好的预兆。”

“我宁愿他好好地活着，胡安·弗朗西斯科，不要为了革命也不要为了任何事情而牺牲。”

这是每个人保留自己的意见没有说出口的时刻之一。全人类的命运要高于个人，劳拉，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我们是人民，是劳动阶级。你不能那样小气，把你的兄弟藏在你小小的心灵里，就像把一朵花夹在书页当中那样。他是个新生命，胡安·弗朗西斯科，你难道不认为他是世界上的一个新生命？是从未存在过也不会再有的珍宝？因此我祝贺我的儿子，因此我亲吻他，我哄他入睡，我给他喂奶，我歌唱我儿子的到来。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不可替代的，我要对你倾注我所有的爱，只因为你是你。我要摈弃这种想法：你是死去的圣地亚哥，你是获得重生的第二个圣地亚哥，你要去实现我亲爱的兄弟未完成的使命。

“当我叫自己儿子圣地亚哥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你兄弟的英雄气概。”

“我不是，胡安·弗朗西斯科，我希望我们的圣地亚哥不会变成你所说的那样，做英雄实在是太痛苦了。”

“那好，我理解你，我还以为你想在小圣地亚哥身上看见第一个圣地亚哥的一些影子呢。”

“如果我惹你不高兴了，那么对不起，不过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他什么也没有说，站起身来，走到窗边去看 7 月的雨。

在第一个儿子出生十一个月之后，又恰逢阿尔瓦罗·奥夫雷贡将军任总统第二年，全国政局日益稳定的时候，劳拉

无论如何也阻挡不了胡安·弗朗西斯科给新降临人世的二儿子取名为丹东。劳拉喜欢这位杰出的总统,他很聪明,对任何事情都应付自如。他在塞拉亚战役中失去了一只胳膊,他击溃了潘乔·比利亚和他的王牌军,他有时甚至会自我嘲讽。

"战场就是屠场,在那么多尸体当中我怎么能再找到我那只炸飞了的胳膊?但是先生们,我有一个好办法,我往天上扔一块金币,我的胳膊就会从尸体中飞出来抓住它。没有一个革命将军可以抵抗住五万比索的轰炸!"

"他虽然只有一只手,但是手腕强硬。"她曾经听一位在家里集会,并与胡安·弗朗西斯科一起谈论政治的工人领袖这样说。

她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中闲逛,探寻着远离噪音的街区——那些喧嚣的街道上奔跑着各种车辆,有车身上写着各种目的地——罗马-梅里塔-查布尔特佩克和阿内克萨斯,潘塞尔-布艾诺斯艾利斯-佩尼丹西亚利亚-萨尔托·德尔·阿瓜,考约坎,卡尔萨达·德拉·皮埃达,尼诺·佩尔迪多——的大公共汽车,能跑得更远的黄色有轨电车——楚路布斯科,霍奇米尔科,米尔帕·阿尔塔,小公共汽车,还有挡风玻璃上嵌着"随招随停"招牌的出租车,以及在改革大街上开得像在高速公路上那样飞快的福特车——她的心情好了许多。

我可真是个公园迷,劳拉笑着这样称呼自己。她推着小车——开始里面是一个孩子,后来是两个——从家里出来,沿着索诺拉大街去查布尔特佩克森林,那里可以闻到桉树、松树、青草和绿色的池塘的味道。

丹东出生的时候,玛丽亚·德·拉奥姨妈自告奋勇来帮她的忙,胡安·弗朗西斯科对这个黑白混血的姨妈的到来倒

也不反对。玛丽亚姨妈越来越胖,脚踝和手臂都快一样粗了,腿肥得直打颤。这幢两层小楼前的低平台上修了一堵回形砖纹的围墙,上部涂着黄色的灰泥。在第二个儿子出生的第二天,胡安·弗朗西斯科就开回一辆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送的福特敞篷轿车,进了车库。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是新制度下影响最大的工人组织,该组织的领袖路易斯·拿破仑·莫罗内斯①把这辆车送给胡安·弗朗西斯科,并说,这是对他在革命期间为工会事业所作出的功绩的回报。

"如果没有工人阶级,"这位嘴唇、鼻子、脖颈和下巴长满了赘肉,眼皮更是长成两道肉帘的肥硕男人说,"如果没有世界工人之家和红色旅,我们就不会取得胜利。是工人们发动了革命,农民们、比利亚和萨帕塔都是墨西哥殖民黑暗社会中反革命的教会的残渣余孽。"

"他说了你想听的话。"当胡安·弗朗西斯科问劳拉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劳拉毫不迟疑地答道。

"他说的是事实,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先锋。"

那辆福特 T 型车就停在那儿,虽说不如哈维尔·伊卡萨开到哈拉帕的那辆奢华的"伊索塔-弗拉斯基尼"来得醒目,但用来载一家五口外出到特那尤加金字塔或霍奇米尔高的空中花园郊游,却是十分方便。车库深处放着锅炉和几个木桶,里面装着必要的热水,用柴和报纸点火来加热。由车库可以进入马赛克装饰的小前厅,然后是朝向大街的客厅,客厅里装饰简洁舒适,劳拉在铁宫家具市场开了户,胡安·弗朗西斯科也就随她心愿,买了一张沙发、几把蓝天鹅绒椅和一些仿照时尚杂志上装饰艺术的流行式样做的灯。

① 莫罗内斯(1890—1964),墨西哥工会领袖。

“别担心，亲爱的，现在有一种新的分期付款方式，用不着一笔付清。”

玻璃门后是餐厅，厅里有一张架在软木基座上的方餐桌，周围放着八把沉重的桃花心木直背椅。一面立镜收集着下午的阳光，另一扇门通向厨房，里面的炭炉和冰柜等待着每天卖柴卖炭和送奶送冰车的来到。

这是个漂亮的客厅，比外面街道要高上几米，还有个小阳台可以远眺查布尔特佩克森林的风景。

顺着富丽堂皇的楼梯上去，是四间卧室和一间浴室，带有浴缸、马桶和一件玛丽亚·德·拉奥姨妈从未见过的东西——法国坐浴盆，胡安·弗朗西斯科一直想把它撤走，但劳拉求他留下它，因为它非常新奇有趣。

“你想想我工会的朋友们坐在那里的样子。”

“不，我只想得出莫罗内斯的大肚子。别跟他们说，让他们大吃一惊。”

胡安·弗朗西斯科的朋友们有几次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身上带着难闻的气味，甚至连裤子都搞湿了。但胡安·弗朗西斯科与生俱有的严肃和庄重平息了一切，他也容不得玩笑，只要他火热而又冰冷的闪电般的目光扫过，所有的玩笑便都销声匿迹了。

他们在餐厅聚会时，劳拉就在客厅看书。在哈拉帕的时候，她怀着像被抛入大海的救生瓶一样渺茫的希望，在瘫痪了的堂费尔南多床边高声朗读，希望父亲能够听得懂。而现在，阅读对于这位新婚不久的女人来说，已是一种无声而愉快的习惯。她从生动的近代文学入手，阅读了马里亚诺·阿苏埃拉医生写的一本叫《底层的人们》的小说，书中解释了为什么说农民军是一群野蛮的乌合之众，但同时，也深刻地揭示了小说中的政客、律师和知识分子只是一群背信

弃义的机会主义分子和叛徒。她发现已过去的大革命在维拉克鲁斯只激起了一点小波浪,但在国家北部和中部却掀起轩然大波。在这些阅读中劳拉发现了一位刚满二十三岁的名叫卡洛斯·佩耶塞的塔巴斯科年轻诗人。当劳拉读到他的处女作《海的颜色》时,不知道是该高兴和感谢,还是该祈祷和哭泣,因为她童年的热带复活了,活生生地闪现在书页之中,触手可及。而且卡洛斯·佩耶塞和胡安·弗朗西斯科都是塔巴斯科人,读他的作品让她觉得和丈夫贴得更近了。

“热带,为什么你向我伸出
五彩缤纷的双手?”

此外,劳拉知道胡安·弗朗西斯科喜欢她待在附近,以便在会议延长的时候,为他的朋友们端茶送水,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当姨妈替他们照顾孩子时,她可以在一旁为他所说的话作见证。劳拉很难把餐厅里那些人的脸和他们的声音对上号,因为他们一旦离开那里,就沉默不语、表情陌生,像是刚从阴暗的甚至是无形的角落里突然冒出来的那样。一些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但另一些穿无领衬衫,戴毡帽;还有几个穿着蓝色工装和条纹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上。

这天下午下雨,那些人湿漉漉地来了,有几个穿着雨衣,但大部分人没带雨具。在墨西哥几乎没有人用伞。这场雨来得准时、凶猛,从下午二点左右开始,雨就哗哗地下成一片瀑布,之后时大时小,一直下到第二天清晨,太阳才算露了面。这些男人身上散发着一股浓烈的湿衣服、脏鞋子和湿袜子混合而成的气味。

劳拉看见他们安静地鱼贯出入,戴礼帽的人见到她把

帽子摘下，但随即又戴了回去，戴草帽的人就把帽子留在门口。还有几个见到她时手足无措。但一到厨房，他们就变得滔滔不绝，劳拉在他们眼里视若不见。她关注着他们的话，觉得这些声音仿佛已经在地底深处关了很久，声音的主人至少沉默了几个世纪。他们曾和堂波菲里奥的独裁统治作过斗争——这是劳拉听到的大意——那些最年长的曾加入过无政府主义工会组织“光明”，后来又加入无政府主义者蒙卡雷阿诺教授建立的世界工人之家，最后在革命胜利之际，在卡兰萨这个忘恩负义的老家伙忘掉他亏欠红色旅和工人之家的一切，并解散了工人之家之后，他们又参加了工党。是奥夫雷贡(他下令杀了卡兰萨?)为工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党组织——工党，一个新的工人中心——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以便让他们能够继续为正义而斗争。

“另一场欺骗？你们要清楚，同志们，所谓的政府，他们所有的人只不过是在欺骗我们罢了。马德罗，这个革命的传道士，也用他的哥萨克兵来对付我们。”

“你以为呢，迪奥尼西奥？那矮胖子不是革命家，他充其量不过是个民主主义者，但我们欠他一个人情。你看，马德罗以为在墨西哥可以不必革命，不需要真正的变革就实现民主，他的天真送了他的命。军人、大庄园主，那些他不敢动的人弄死了他，因为他们早就受够了民主法制。难哪。”

“但这个杀害马德罗的家伙韦尔塔倒是挺重视我们的，你见过比 1913 年 3 月 1 日那场游行规模更大的游行吗？八小时工作日，一周工作六天，韦尔塔将军全都接受了。”

“彻头彻尾的欺骗。但我们一讲民主，韦尔塔就烧了我们的基地，还要逮捕我们，流放我们。你别忘了，这可是个教训。独裁可以提供给我们一定的工作保障，但不是政治

自由。既然奥夫雷贡将军在他1915年占领墨西哥城时也说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要压制资本主义,我们为什么不把他当成救星来拥护呢?"

"帕罗莫,你当时在场,你还记得奥夫雷贡是怎么来到我们的会场,和我们一一拥抱的吗?他那时还有两只胳膊呢。他对我们每个人都说,老兄,你说得有道理。他说的都是我们爱听的话……"

"彻头彻尾的欺骗,何塞·米盖尔。奥夫雷贡是想拉拢我们和他一起对付农民,对付比利亚和萨帕塔,他做到了,他让我们相信农民们是反革命分子,是教会分子,他们把圣母像戴在草帽上,他们都跟不上时代了……"

"彻头彻尾的欺骗,潘菲洛。卡兰萨是庄园主,他痛恨农民。比利亚和萨帕塔没征得这老山羊胡子的同意就分土地是有道理的。"

"但现在是奥夫雷贡获胜了,哪怕他是在利用我们的支持去对付比利亚和萨帕塔,他也是一直在庇护着我们。注意,同志们,奥夫雷贡通过那场战役击败了所有的人……"

"你是说,杀了所有的人。"

"好了,政治就是这样。"

"难道政治就应该如此?我们要去改变它,迪奥尼西奥。"

"奥夫雷贡胜利了,这是事实。他胜利了并且还会继续执政。墨西哥现在很安定。"

"你得去把这话告诉那些蠢蠢欲动的将军。政权还未被瓜分完毕,他们也想取得政府的一部分权力。帕罗莫,我们还有好戏可瞧,看看到时候,我们会落到什么下场。"

"彻头彻尾的欺骗。我们就能得到这个。欺骗。废话。"

“同志们，”胡安·弗朗西斯科为这次讨论作总结，“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解决具体问题：罢工、薪金、工作日以及其他一些有待于我们去争取的权益，比如说带薪节假日、产假、社会保险，这才是至关重要的方面。同志们不要被蒙蔽了双眼，不要在政治的崎岖道路中迷失了方向。”

劳拉停下了手上的编织活，闭上眼睛，想像她丈夫站在厨房的一头，述说事实，睿智的事实，可能实现的事实，来结束这场辩论：必须和奥夫雷贡合作，和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以及它的总领导路易斯·拿破仑·莫罗内斯合作。雨越下越大，劳拉竖起了耳朵，胡安·弗朗西斯科的同志们不停地用着铜痰盂，痰盂是小康之家、公共场所尤其是有许多男人聚会的大厅的必备之物。

“为什么我们女人从不吐痰？”

随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出了餐厅，向劳拉无声地告别致意。劳拉徒劳地试图把刚才听到的言论和这些脸对应起来，这个眼窝深陷的（潘菲洛？），那个鼻子狭长得像是通往天堂之门的（何塞·米盖尔？），这个眼神明亮的（迪奥尼西奥？），那个走路时没头没脑的（帕罗莫？），所有的一切和点点滴滴，竭力掩饰的瘸腿，为一个被爱的人而哭泣的欲望，苦涩的口水，患伤风的过去，值得回味的往日，因为再也没有机会让青春重现而失神充血的眼光，迟迟不至的爱情，一具具的死尸，焦虑的一代人，无能为力的绝望，毫无乐趣的动荡生活，一连串的诺言，衬衫上的面包屑，领子上的白发，嘴角边早餐鸡蛋的余迹，回到遗弃者身边的紧迫以及逃避回报的迟缓；劳拉从她丈夫同伴们的脚步中看到了这一切。

没有人笑，这让她很是不安。胡安·弗朗西斯科说得不对？还是她一点儿都不明白？她想和离开她家的那些沉默不语的人说些什么，她十分焦躁，自觉在这片只有欲望和梦

想的领域里还要找出些理由是种罪过。

她喜欢奥夫雷贡总统，他聪明、精干，虽然说比不上战斗照片中那么帅，照片里的他头发金黄，年轻力壮，双臂齐全地战斗在沙场上，而现在，他掉了一只胳膊，头发也白了，身子也发胖了，大概是缺乏锻炼，或是总统的绶带也无法代替失去的那只手臂。每当清晨阵雨之前，劳拉推着小车带着孩子上公园散步，她总能感到有新鲜的事物在发生。革命政府的第一任教育部长是个激情澎湃的杰出哲学家，他把公共建筑的墙交给画家们去随心所欲地发挥自己的灵感，去抨击教会、资产阶级、神圣的三位一体或是给予他们工作的政府。自由，劳拉欢呼着，她趁着姨妈负责照料孩子的时候，跑去看在预科学校作画的奥罗斯科和在国家宫作画的里维拉。

奥罗斯科和奥夫雷贡一样是个独臂人，眼睛近乎失明，神情忧郁，劳拉敬佩他是因为当他在预科学校的墙上作画的时候，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仅剩的手臂上下飞舞，眼睛在阳光下一眨也不眨，他正是用他的缺陷在画画。另一个眼光明澈的奥罗斯科寄居在这个奥罗斯科的身体里，指引着他，启发着他，同时也向劳拉·迪亚斯展示，一个似火如风般果断的精灵是如何将一团无形的火传递给这位又瞎又瘫，嘴唇紧闭，眉头紧锁的艺术家，从而控制着画家的身体的。

相反，当穿着领口嵌宝石的新上衣和短裙的劳拉在国家宫的台阶上坐下来，想要看迭戈·里维拉画画时，这位画家就分神了。他紧紧地盯着她看，以至于劳拉的脸都红了。

“你有一张男孩的脸，一张圣母的脸，我说不清楚，你自己选择吧，你是谁?”里维拉在休息的时候问她。

“我是女人，”劳拉笑了，“我有两个儿子。”

“我有两个女儿。我们让他们四个结婚，等到你不用替

他们揩鼻涕的时候，我就可以既不把你画成男人，也不画成女人，而是男女同体，你知道这有什么好处吗？你可以爱上你自己。”

与奥罗斯科正好相反，他长得一副高大肥胖的蛤蟆相，眼球突出，但又睡眼惺忪。有一天她一身黑衣，头系黑带——用以悼念父亲费尔南多·迪亚斯在哈拉帕的逝世——出现在那里时，画家的一个助手过来请她离开：因为大师害怕不祥的目光，不能一边作画一边画着十字驱逐厄运。

“我只是在服丧，红色大师，您竟会如此迷信，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就把您吓着了。”

她没有时间回哈拉帕去参加葬礼，她的母亲雷特西亚给她发来份电报：你有你的责任，劳拉，你有丈夫和两个儿子，所以就不用来了。为什么不再说些什么呢？你的父亲临死前一直惦记着你，叫着你的名字，为了你劳拉，他最后又会开口说话了，上帝在他临终前又赋予他说话的能力了吗？

“他是个好人，劳拉，”胡安·弗朗西斯科说，“你知道他帮了我们多大的忙。”

“他全是为了圣地亚哥。”劳拉一手拿着电报，一手揭开窗帘回答。傍晚六点天色已经渐渐灰暗，她穿过雨幕望去，似乎看到了哈拉帕的公墓。山谷里两座火山在暴雨中只露出白色的峰顶来。

玛丽亚·德·拉奥姨妈回来后，她说上帝知道该怎么做，费尔南多·迪亚斯只想死去，好不再打扰别人。她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彼此的目光坦诚而理智，对一个不仅救了玛丽亚·德·拉奥的母亲，还保护她，并给她一个体面的晚年的男人理应如此。

“你妈妈还活着?”

姨妈有些慌乱了,摇着头说不知道,不知道。但有一天早上玛丽亚·德·拉奥姨妈推着小车带孩子们出门散步,劳拉留在家里收拾床褥,她在枕头下发现了一张老照片,上面是一个穿着高领衫的身材匀称苗条的黑女人,她嘴唇泛光,目光凛然,蜂腰隆胸。劳拉一听到玛丽亚·德·拉奥回来的声音,就赶紧把它藏了回去。玛丽亚·德·拉奥走了三夸德拉[1] 的路,累得粗肿着的脚踝直哆嗦。

“哎,劳拉,这城市海拔太高。”

高海拔和稀薄的空气,雨和清新的空气。太阳和雨,雨和太阳,收缩,舒张,如同墨西哥城的心跳,天天如此。好在这里每晚都下雨,而第二天又是阳光明媚。每到周末,哈维尔·伊卡萨就上门拜访,教他们如何驾驶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送给胡安·弗朗西斯科的那辆福特车。

结果劳拉倒是比她粗壮笨拙的丈夫要驾驶得好,他几乎坐不进座位里,也没处搁腿。而劳拉好像生下来就有开车的天赋。现在可以轻而易举地带孩子们到霍奇米尔科看隧道,到特那尤加看金字塔,到米尔帕·阿尔塔的牲口棚闻奶、草和湿漉漉的牛脊背的气味,喝新挤的牛奶。

一天,劳拉在国家宫门口躲雨,在那里里维拉又一次认出了刚脱去孝服的她。之后她开着停在造币厂大街的车子,沿着新更名的马德罗大街,以前这叫布拉特罗斯大街,她欣赏着街边那些屋顶灼热、大理石面黯淡的殖民时期的房子,随后又由杨树阴大道来到改革大道,这里的建筑都是法式的,漂亮的房屋带着正式的花园和高高的屋顶窗。

一种舒适的感觉从她内心浮升而出,她婚后的生活舒

---

① 夸德拉为长度单位名,一夸德拉合一百二十五米。

适、惬意,她有两个漂亮的儿子和一个不同寻常的丈夫,虽然说她丈夫脾气耿直,也从不让步,有时候不好相处,但他始终是柔情似水,并且全心全意地工作,不给劳拉制造任何麻烦。她转过尼撒的街心花园往左开向起义者大街和索诺拉大街的家时,她突然开始排斥自己的这种舒适感觉。所有的一切都过于平静,过于完美了,一定会发生些什么……

"你相信预感吗? 姨妈。"

"嗨,我相信感情,你的姨妈们一封又一封的信让我认识到了这一点。希尔达、维尔希尼亚和你的妈妈住在一起,整天忙着招待客人。只有她们坐下来写信的时候,才会变得与众不同。我想她们并不关心她们在对我说什么,这让我有点生气,她们给我写信不像是和我,倒像是和她们自己说话,我只不过是个写信的借口。希尔达因为关节炎不能再弹钢琴了,所以她告诉我她是如何用脑子去想像、去触摸、去诵读音乐的。上帝有多么仁慈,或是残酷,我不知道,他让我用大脑准确无误地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回忆起肖邦的小夜曲,但就是不让我去听头脑之外真正的音乐。你听过维克多牌留声机这个新鲜玩艺吗? 肖邦的音乐从被他们称作唱片的东西中嘎吱嘎吱地传出来,可是在我的脑海里,他的音乐清澈悲伤,好像这纯净的音乐发自于忧伤的灵魂深处。姐姐,你没听到吗? 你听见我了吗? 如果我能知道有谁也能用他的大脑听到如此清澈的肖邦的音乐,正如我听到的那样,我会很高兴的。玛丽亚·德·拉奥,如果有这么一个人能与我一起分享我的最爱,这将和我一个人享受完全地不同,我愿意和其他人一起分享音乐的仙境,但我已经无能为力了,我的命运并不是我所期望的那样,我想,尽管我不愿意,我的命运可能就是如此,听到我说的话了吗? 姐姐,这里有个小小的请求,一个同刚才肖邦的小夜曲一样无

关紧要的恳请,听说肖邦是被一场暴雨驱赶到一座小教堂之后,才写成这首最后的小夜曲。姐姐,你明白我的恳求是什么了吗?维尔希尼亚从未对我提起过,但她不愿意这样不发表任何作品就死去。劳拉,你的丈夫不能请求巴斯贡塞罗斯[①] 部长为你的维尔希尼亚姨妈发表她的诗吗?她见过的在大学里印制的绿皮小书是多么的漂亮啊!你相信吗?虽然维尔希尼亚出于高傲从未对我说起这事,但希尔达给我写的就是维尔希尼亚所想的,只是诗人没有说出来而钢琴家把这一切都说出来罢了,希尔达说过我的音乐就是我的语言,而维尔希尼亚的回答是,我的语言就是我的沉默……只有你妈妈从不抱怨,但也从不为任何事而高兴。"

她心里空荡荡的,就去要求胡安·弗朗西斯科让她和他并肩工作,帮助他,至少要有半天,两人在一起组织工人活动。他回答说这很好,只是先陪我干几天看看,你是不是会喜欢。

他们在一起只待了四十八小时,这个古老的城市中充斥着家庭主妇、修鞋匠、铁匠、店员、木匠、陶器工人和在革命战争中受伤致残的人。年迈的战争寡妇们在街角叫卖玉米棒子和烈酒,历数着打过的败仗及其往事,这个脉搏跳动着无产阶级血液的总督辖区旧城,宫殿被改成了居民住宅区,城门被甜食店、杂货店和皮革店包围,古老的客栈改头换面,成了收容所,里面躺着流浪汉、四海为生的乞丐和无家可归的老人,臭气熏天。后面是香气扑鼻的红灯区,妓女们倚在敞开的厅门旁看着路人半是邀请,半是引诱。妓女的香味和殡仪馆的香味是一样的,栀子花和龟头的味道,恶心之极的垃圾味儿,还有野狗的屎尿味儿都弥漫在空气中。这

① 巴斯贡塞罗斯(1882—1959),墨西哥教育家,政治家,作家和哲学家。

群肆无忌惮的癞皮狗“大军”混杂在越来越多的蓬头垢面、一身疮疖的拾荒人中间拨弄着垃圾。他们像是长着毒瘤的巨肺，不知道哪一天就会掐断这个城市的呼吸。垃圾从这个印第安人之城——这个被谋害了的城市——为数不多的沟渠中溢出，据说这些沟渠将会被疏通，然后用柏油填死。

“你想从哪里开始，劳拉？”

“你说吧，胡安·弗朗西斯科。”

“我说？你还是回家吧，在家里好好待着，小姑娘，你在家里要比你来这些街区组织和拯救人们来得更好，再说，他们也不会为此感激你。这工作让我来做，它不适合你。”

他说得有道理，但是那天晚上回家后，劳拉心潮起伏，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仿佛这一趟是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这赐予了她激情澎湃的勇气，这种激情使她在童年发现并爱上了丛林和长满了藤条和宝石的巨岩、树木和藏在桂树中的精灵。在维拉克鲁斯，她与圣地亚哥分享着这份激情，并随着年岁的增长而增加，即便是圣地亚哥的死也不能改变。在哈拉帕，她的热情在苍白无力的奥兰多面前遭到拒绝，又被身体残废的父亲紧紧缠住，而现在，胡安·弗朗西斯科、墨西哥城、家、孩子们，她的请求被她丈夫像打苍蝇一样地打扁了，请让我和你一样，热血沸腾地做你所做的事，胡安·弗朗西斯科。

“可能他是对的，但他不了解我，但当时应该告诉他更多些我心里的想法。我想要我所拥有的一切，不要任何改变，但我还想要其他东西，那是什么呢？”

就是它让劳拉默默地服从激荡的心灵。

“胡安·弗朗西斯科，车在哪儿？”

“我把它还了。别那样看着我，我的同志们要求我这样做，他们不想接受任何官方工会的礼物，这叫腐败。”

第七章　索诺拉大街:1928 年

他在想些什么？她在想些什么？

他像刀刃一样不可琢磨。她只有当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的时候才能明白他在想些什么。当胡安·弗朗西斯科一次又一次地指责她为什么不上哈拉帕小阁楼去看那个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时,她在想些什么呢。这一次次不断重复的指责对胡安·弗朗西斯科来说越来越无足轻重,而对她来说却越来越令人恼火,直到她被问得精疲力竭,低头认输,放弃辩解,转而埋头在一本记录家庭收支的方格本上记录下胡安·弗朗西斯科因为自己的疏忽,不分青红皂白就责备她的次数,这并非觉醒,而只是一种神经质的习惯,就好像毫无神采的眼睛在凝视时会不由自主地眨上几下一样。当她又一次听到这九年来一直在听的演说词,她又在想些什么呢。这些话开头几次听起来是那么新鲜,那么引人入胜,后来渐渐变得难以理解,因为它太过理性主义了。她徒劳地期望着演说的梦境,它的梦境,而不是演说本身,尤其是当圣地亚哥和丹东开始学会说话之后,她发现作为母亲的她只能和孩子们讲梦想和寓言。孩子父亲的演说已经丧失了梦想的成分,它是失眠的演说。胡安·弗朗西斯科的言语从不入睡,一直虎视眈眈地醒着。

"妈妈,我害怕,你看窗外,太阳不在了,太阳上哪儿去了？它死了吗?"她的儿子圣地亚哥每到傍晚或清晨,就睁

着初涉人世的眼睛询问劳拉。劳拉打断了她丈夫的话：

“胡安·弗朗西斯科，不要用给一群人作演讲的口吻和我说话，我只不过是一个人，劳拉，你的妻子。”

“你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崇拜我了，以前，你很崇拜我的。”

她想要爱他，想要这样做，但出了什么差错？发生了什么她既不知道也不明白的事？

“谁明白女人的心思？头发长，见识短。”

她懒得费时间去告诉他，每次孩子讲故事或提问时都会多明白一些事理，欢乐和想像造就了语言，它不是为了讲给插满锦旗的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群听的，而是讲给你我听的。你究竟是在对谁说话，胡安·弗朗西斯科？她常常看见他站在高高的讲台上演讲，这讲台是她自结婚以来为他搭建起来的基石。无论是革命、工人阶级，还是工会、政府，谁也没有像她那样为此操劳过。她是这座叫作胡安·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格林的神庙的基座，她也曾要求过丈夫不要辜负妻子的虔诚，但神庙是个重复祭祀的场所，如果没有信仰去支持，重复的祭典也会令人心生厌倦。

劳拉没有失去对胡安·弗朗西斯科的信仰，她只是对自己诚实，一五一十地把生活中的不快记录了下来。有哪一对夫妻没有过口角呢？这在结婚八年之后是很正常的。一开始，他们互不相识，一切都是惊喜。现在她想重拾这份惊喜和新奇，到头来发觉惊喜不过是习惯，而新奇不过是怀旧。这是她的错？她从一开始就崇拜这个公共形象，随后又试图了解他，试图在这个公共形象后面再发掘出一个公共形象，在这之后再发掘出一个，直到她发现这个形象，这位光彩照人的演说家，这位群众的领袖，就已经是一个真真切切的形象，不存在一星半点的虚假。她不需要去寻找他

人性中的另一面，只需乖乖地和这个把妻儿也当作感恩戴德的民众来看待的男人共同生活，只不过这个讲台上的光辉形象也会睡在双人床上。一天劳拉的脚碰到了在被单下的胡安·弗朗西斯科的脚，她情不自禁地蜷起了双腿，丈夫的胳膊肘让她产生了反感，她盯着他上臂和小臂间关节上的皱褶，想像着他整个人都是一只胳膊肘，一具从头到脚瘫软在床上的皮囊。

"请原谅我，我很累，今天晚上就不了。"

"为什么不早说？你希望请个女佣吗？我原来是觉得你和姨妈两个人把家料理得很好。"

"是这样的，胡安·弗朗西斯科，不需要再请女佣了，你已经有我和玛丽亚·德·拉奥，你不应该请用人，你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

"你能理解这一点，真是太好了，劳拉。"

"你知道吗，姨妈，"她只敢对玛丽亚·德·拉奥讲，"有时候我怀念哈拉帕的生活，那更有意思。"

姨妈没有表示赞同，她只是死死地盯着劳拉，劳拉笑了一下以便不引起她的注意。

"你和孩子们待在这里，我去市场。"

逛市场不费她什么劲，她喜欢去罗马区的巴林，这可以打破她一天的惯例，事实上，这并非惯例，她爱姨妈，爱她的孩子，她喜欢看他们一天天地长大……市场是一座微缩的丛林，那里有许多令她着迷的东西，花、水果，这两样在墨西哥是应有尽有，百合和菖蒲、石竹和三色堇、芒果、木薯还有豆荚，她做爱时就想着它们，苹果、榅桲、山楂、菠萝、酸橙、柠檬、山番荔枝、橘子、人心果和小人心果：市场的味道、样子和气息都让她内心充满了喜悦以及对童年和青年的回忆。

“可我只有三十岁啊!”

她由巴林往索诺拉大街走去,一面想着,一面问自己,还会有些什么呢?这就是全部吗?谁对你说过还会有别的,谁对你说过在结了婚,有了两个儿子后,还会发生些别的事?谁保证了这些?她耸了耸肩膀,算是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便加快了脚步,丝毫没感觉到手中篮子的分量。现在已经没有车了,这是因为胡安·弗朗西斯科是正直的人,他把这份礼物还给了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但她记起他并不是自愿归还轿车的,这是同志们的要求:你不要收取官方工会的礼物,你不要腐化。他并不是自觉自愿的,而是他们要求的。

“胡安·弗朗西斯科,要是你的同伴们不要求,你会还那辆车吗?”

“我为工人阶级服务,就是这样。”

“为什么你如此地依赖于不公正,亲爱的?”

“你知道我不喜欢……”

“我可怜的胡安·弗朗西斯科,要是在一个公平的世界里,你可怎么办呢……。”

“别把我说得可怜兮兮的。有时候,我真不明白你。赶快去做早饭吧,我今天有个很重要的会议。”

“你没有一天,没有一个月,没有一年没有重要的会,你每一分钟都有重要的会要开。”

他怎么想她?劳拉不过是他的习惯,他的性伙伴,会默不作声地服从他,会永远感激他,等待他吗?

“我想说,有人需要你去保护,这有多好,这是你的力量所在。外面的工作耗尽了你的精力,我喜欢看你精疲力竭地回来……”

“你真是难以理解。”

“哪能呢，我喜欢你躺在我的胸口，我还给你失去的力量，你的工作让你消耗太多的力量，尽管你不相信……”

“你真是够异想天开的，有几次让我觉得挺逗，但有时候……”

“惹你发火……我太喜欢这个主意了！”

他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他怎么想她？他想起了在哈拉帕俱乐部的舞会上认识的那个女孩了吗？想起了他向她保证要教育她，教她成为城市和世界的女主人？想起了她这位年轻的母亲想和他一起工作、一起战斗、一起分享世界，过着志同道合的生活？

这个想法一天比一天更强烈地占据了劳拉的心灵；她的丈夫拒绝了她，没有履行两人要共同奋斗的诺言，在床上、在血缘上、在工作上，他们都要结合在一起。工作这部分吞噬着每天的生活，就像孩子们吃着橘瓣，把所有剩下的一切，床和父子关系、婚姻和梦想变作了屈指可数的分分秒秒，难以舍弃的鸡肋。

“热情的灵魂的无声服从。”

劳拉认为是自己的责任。她回忆起卡特马哥的童年，维拉克鲁斯的少年和哈拉帕的青年时代，在每一段日子里，她发现她许下的心愿都会滋长一点，一直到八年前她结婚那一天才得到满足。从那时起，我就变小了，不是长大，而是越变越小，好像是因为他配不上我，好像因为他，我才变小的。他不要求我，也不激励我，是我自己在要求自己，激励自己，去和他相称。现在我知道当初急切地想要配得上这个谜一般的人，是因为我不认识他。他的样子，谈话的方式，或是让一大群人毕恭毕敬的风度，都令我震惊。他在我哈拉帕的家中纪念那位隐形的加泰罗尼亚女人的致词，也让我印象深刻。因此我才爱上了他，希望把我对别人的爱

升华为我被人爱的经验。这份爱就是破解他这座迷宫的钥匙。天哪,我化费了八年时间去发掘一个不是谜的谜。我的丈夫和他表现的一样,他的外表等于他的内心,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发掘的。我要对领袖胡安·弗朗西斯科的听众说,这个男人所说的全是真的,他的言语没有任何隐藏,他的话句句是真,全部都是真的,你们所见到的他就是他本人,他所说的别无他意。

对她来说,这种曾经使自己深感满意的生活成了惯例。渐渐地,那种曾使双方都称心如意的生活不再令她满意了。

“我认识你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配不上你,你觉得呢?为什么不回答我?”

“我想你会改变的。”

“那你认为你在哈拉帕买的东西不值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所有人都会进步,我们所有人都会变好或者变坏。”

“你是在说,你想要改变我?”

“为了你好。”

“听着,请你说话明确些。我难道不是个贤妻良母吗?当我想和你一起工作时,不是你为了打消我的念头带我去散那个该死的步吗? 你还想要什么?”

“要信任人。”胡安·弗朗西斯科说。他先是从床上站起来,又立刻目光炯炯地盯着劳拉,随即,他面带苦涩地投入了妻子的怀抱。

“亲爱的,亲爱的。”

那年的总统是普卢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三人执政集团的成员之一,因为波菲里奥·迪亚斯通过作弊的连选,在总统宝座上盘踞了三十年之久,所以掀起了一场要求真正的选举而不要连选的革命。如今前总统奥夫雷贡也想通

过连选去掉额头上那个“前”的标记，重新回到蛇和鹰之国的宝座上。许多人说这样做就背叛了革命原则，但对权力渴望的力量更强大。宪法也作了修改，以适应连选。大家都相信三人执政集团的成员会像堂波菲里奥一样，终生掌握国家大权，除非再出现一个马德罗，再爆发另一场革命。

“莫罗内斯想让我们工会支持奥夫雷贡的连选，我想就此事和大家讨论一下。”就像这么多年来每月在他家的聚会一样，胡安·弗朗西斯科又一次对与会的各位工人领袖说。这时劳拉在侧厅放下了看着的书。

“莫罗内斯是个机会主义者，他想的和我们不一样，他憎恨无政府工会主义者，喜欢养肥了政府的行业合作主义者。如果我们支持他，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独立性，他会把我们当作羔羊牵去屠宰场宰了，这回也一样。”

“帕罗莫说的在理，胡安·弗朗西斯科，我们要做什么？是独立的工会斗士，还是官方工会的合作机构？你们回答我。”另一个声音说。劳拉努力地要把这声音同排队进出餐厅的人的那一张张脸对应起来，但徒劳无功。

“操！胡安·弗朗西斯科，还有厅里的夫人，恕我失礼。我们的前身是‘光明’无政府主义团，是革命的红色旅，是世界工人之家，是革命红色军营。我们有一天会结束我们作为政府走狗的这种状态吗？他们一直在利用我们来使他们显得更革命些。革命同志们哪。”

“我们到底对什么更感兴趣？”劳拉听到了她丈夫的声音，“是获得我们所期望的——工人们更好的生活条件，还是浪费精力与政府对抗，点燃地狱的火焰，让其他人去完成革命对工人们许下的诺言？我们要失去大好机会吗？”

“我们会输得精光的。”

“这里有谁相信灵魂？”

“革命会自己合法化,从中产生法规,同志们。”胡安·弗朗西斯科总结,“奥夫雷贡拥有发动革命的人的支持。现在连比利亚和萨帕塔的人也支持他了,他知道如何争取所有的人,难道我们要成为例外吗?”

“我说要,胡安·弗朗西斯科,工人运动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为了与众不同,他妈的,我们就是要永远给政府捣乱,别拿走我们的这种乐趣,我……”

年轻妻子的这一生都在听这种类似的争论,就像是礼拜日去教堂听布道。有一次劳拉想,习惯应该具有它的意义,应该变成一种仪式。她回想起她一生中的各种仪式,出生、童年、青年、婚礼和死亡。她只有三十岁,却已见过了所有的场面,这是个人的体验,是与她家庭相关的体验。它又变成了一种集体经验,正如整个国家无法和它的爱人——死亡相分离一样。7月的一天,胡安·弗朗西斯科出人意料地在下午六点光景回到家,恼怒地宣布:

“他们在宴会上杀害了新当选的奥夫雷贡总统。”

“谁?”

“一个天主教徒。”

“把他给杀了?”

“把奥夫雷贡杀了,我不是说了吗。”

“不是,那个杀了奥夫雷贡的?”

“没有,还关着呢,他叫托拉尔,是个狂热分子。”

劳拉这辈子所遇到的所有的巧合中,没有一次像这个消息那样让她深受触动,它在这个下午轻轻地敲响了劳拉的家门。玛丽亚·德·拉奥带着孩子去了公园,胡安·弗朗西斯科回来得越来越晚,在餐厅里的常规会议也由于行动的需要而转移了地方。奥夫雷贡已经死了,本来他和卡列斯分享权力,现在只剩下卡列斯一人:卡列斯是杀害奥夫雷贡

的凶手吗？墨西哥难道是一条牺牲不绝的链条？一个接着一个，而这一个人又会奔向他极有可能的结局：死亡引导他走向权力，又同样使他离开权力。

“你看到了吗？胡安·弗朗西斯科，莫罗内斯和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对奥夫雷贡的死很高兴，莫罗内斯也想要竞选总统。”

“这个胖子可需要一张两个人宽的座椅。”

“别开玩笑，帕罗莫，不连选是神圣原则。”

“闭嘴，潘菲洛，不要用宗教词汇，让我觉得……”

“我告诉你要严肃一点。如果你喜欢，那就叫革命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好了。卡列斯暴露莫罗内斯要当总统的野心是为了让他的老兄奥夫雷贡从中获益。谁会从这桩罪行中得到好处？你问一问你自己这个再明显不过的问题：谁会从中得到好处？”

“当然是卡列斯和莫罗内斯，那谁又是替罪羊？是天主教徒。”

“你还是那么反对教会，帕罗莫，你总是批判农民们信奉天主教。”

“正因为这个我才说，加强宗教的最好方法是迫害它，这也是我现在所担心的。”

“为什么卡列斯也压制宗教呢？那土耳其人[1] 并不是胆小鬼。”

“为了掩人耳目，何塞·米盖尔，无论如何他总得表现得革命些。”

“这下我可是一点儿都不懂了。”

“你只需要弄懂一件事：在墨西哥，连残废人也会走

① “土耳其人”是卡列斯的绰号。

钢丝。”

“你还要记住一件事:政治就是吞青蛙不眨眼的艺术。”

她的脸色苍白得有如惨淡的月光,因此她那两道在眉心相连的浓重的黑眉也就显得格外醒目。她眼圈发黑,就像是她那双大眼睛的影子,眼睛黑得如同人们所说的罪恶,尽管这个女人眼中充满了善意。她一身黑衣,穿着长裙和平跟鞋,衬衫纽扣一直扣到脖颈,黑披肩不安地搭在后背上,紧缠在身上但却位置不对,一直滑到了腰间,倒像是一个脱衣舞女,这让她感到很不好意思,不得不重新把它扯回到肩上。她的头发不是合规合矩的中分,颈后的长发挽成了一个髻,但还是有一部分散乱得像是对她全身服饰风格的秘密谋反。在这位苍白而又不安的女人头上散出来的头发没有盘进髻里的头发来得那么黑,仿佛是在预示着什么,仿佛是什么不幸消息的前兆。

“对不起,他们说这里要雇女佣。”

“不,小姐,在这里,我们不剥削奴役任何人。”劳拉微笑着回答,但语气中包含着抑制不住的揶揄的味道。难道嘲笑是她对于习惯惟一可能的反抗? 她的嘲笑既不夸张也不贬低,而是平平淡淡,连绵不断地就像是她这些年来度过的岁月。

“我知道您需要帮手,太太。”

“听着,我刚刚说过……”

劳拉没再说下去,因为这个面色惨白、眼圈发黑的黑衣女人硬是进了劳拉的车库,她合着手,只是用眼神静静地哀求她,突然让劳拉感到吃惊的是,她像惊弓的鸟一样紧紧抱着劳拉,双眼紧闭,像是发生了什么灾难一样。与此同时,门外几个士兵奔跑而过,人行道在皮靴的震动之下破裂粉碎。钢铁一样的士兵们在这个没有灵魂的城市中钢铁一样

的街道上行进。女人在劳拉的臂膀中颤抖。

“求求您，太太。”

劳拉注视着她的眼神。

“你怎么称呼？”

“卡尔梅拉。”

“我看不出来为什么一整队的士兵要满街跑着去追一个叫卡尔梅拉的女用人。”

“太太，我……”

“你什么也别说了，卡尔梅拉，来吧，在院子那边有一个空的用人房间，我们马上把它收拾出来。那里有很多旧报纸，把它们放到锅炉里去。你会做饭吗？”

“我会做薄饼，太太。”

“我会教你做饭的，你是哪里人？”

“瓜达拉哈拉人。”

“你就说你父母是维拉克鲁斯人。”

“他们已经死了。”

“好，那么就说他们曾经是维拉克鲁斯人，我需要了解你的一些情况以便保护你，卡尔梅拉，我需要一些可说的话题，你跟着我的思路。”

“上帝会报答您的，太太。”

胡安·弗朗西斯科对卡尔梅拉的出现出奇地平静，劳拉都不需要对他做什么解释。他自己称之为轻率，对家庭的需要，劳拉的疲惫，和她对于阅读和绘画的兴趣都不怎么留心。孩子们长大了，需要母亲的教育。玛丽亚·德·拉奥日益见老，很容易疲倦。

“为什么不回哈拉帕休息呢？卡尔梅拉可以在这里帮我。”

劳拉眺望哈拉帕老家所在的小山，从母亲雷特西亚和

姨妈维尔希尼亚和希尔达生活工作的公寓屋顶平台上可以看得到这座小山。高龄已经不能再改变克尔森姐妹们,她们已经凝固了,姐妹们把时间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劳拉爱她们,她记得雷特西亚在那个狭窄的小厅里堆放着她自己的家具、柳条箱、大理石桌和小孩与狗的画,显得不够雅致。希尔达粉嘟嘟的下巴肉,衬着雪白的头发,尽管眼睛藏在厚厚的、不时从笔直的鼻梁上滑下来的眼镜片后,却永远是清澈的蓝色。

“我快要瞎了,小劳拉。再也看不到我的手,这真是件好事,你看看我的手,就像是码头上水手们打的结,就像是枯树的根。我怎么可以用这样的一双手去弹钢琴呢?幸好你的姨妈维尔希尼亚给我念些东西。”

维尔希尼亚,眼睛总是睁得大大的,像受了惊似的,她的手搁在一本羊皮书上,就像是放在爱人身上,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眼皮打鼓般有节奏地眨着,她是在等待什么出人意料的事发生,或是从天而降的不速之客的闯入吗?是上帝,是邮差,是情人,还是编辑?在维尔希尼亚姨妈生动的双眸中,这一切的可能性刹时间都涌现出来。

“你从没有和巴斯贡塞罗斯部长说过出版我的诗集的事吧?”

“维尔希尼亚姨妈,巴斯贡塞罗斯已经不是部长了,他是卡列斯政府的对立派。再说我不认识他。”

“我不懂政治,但为什么不是由诗人来统治我们呢?”

“因为他们不会生吞青蛙而不眨眼。”劳拉笑着说。

“什么?你说什么呢?你是疯了还是怎么了?劳拉!”

尽管是三姐妹共同决定要接管“宾客之家”,实际上只有雷特西亚在操劳。她体弱多病,又情绪紧张,但她身材高大,脊背笔挺,头发花白,是个寡言少语的女人,但为人忠实

可信。她准备食物，打扫房间，浇灌花木，只有黑人桑帕亚给她一些有用的帮助，桑帕亚用他的舞蹈和不知从哪里学来的歌继续给这个家带来欢乐。

一会儿卡其邦——兵邦——兵邦
一会儿卡其邦邦
我的黑姑娘跳到这里
我的黑姑娘跳到那里

劳拉吃惊地看着黑人头上钢丝般的白发，她想桑帕亚肯定和一群跳舞的女巫和一个无声的合唱团有着秘密的接触，他们就是和我们一起把我兄弟的身体送到大海的怀抱的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见证人……劳拉望着小山，想着哈拉帕的阿尔莫尼亚·阿斯纳尔，不知道为什么还想着墨西哥城用人房中不知其姓的卡尔梅拉。

“宾客之家”平常专门接待那些路经哈拉帕的维拉克鲁斯老友，但是现在由于劳拉、孩子和玛丽亚·德·拉奥的来到，以及维尔希尼亚、希尔达这两位终生寄宿的姨妈，所以只能再容纳两位客人。劳拉惊悚地又一次看到了昔日那位高大、健壮、苗条、多毛的金发网球手，他曾在圣卡耶塔诺的舞会上迷惑了不少的姑娘，如今苍老了许多。

他歉疚而恭敬地向劳拉打招呼，这和他在这里出现同样令人吃惊。他说，他出差推销汽车轮箍，经营范围是科尔多瓦塔-奥里萨瓦-哈拉帕-维拉克鲁斯等，幸好他们没让他去哥特萨哥尔科港这个鬼地方。他们给他一部车——他的脸放了光，就像1915年在舞会上疯狂起舞时那样——虽然车是公司的，不是他个人的。

灯灭了。

另一位客人是位老人，雷特西亚说，他从不出门，我给他送吃的过去。

一天下午，雷特西亚在门口发呆，任凭那位客人的食物在厨房里逐渐冰冷。劳拉托起盘子，无声无息地端着它来到那位从不让人见到的客人门口。

客人坐在床边上，手里拿着什么东西，一听到劳拉的脚步声，他就把它藏了起来，劳拉依稀听到了什么声音，勿庸置疑，那是念珠碰撞的声音。劳拉把托盘在客人身边放下后，突然间，她穿过了一层又一层遗忘的时间之帘，还夹杂着轻蔑，她认出了他是谁，劳拉感到浑身发凉，顿时一阵颤栗。

“是您，神父先生。”

“你是劳拉，是吗？请保守秘密，千万别把你的母亲给连累了。”

劳拉必须让记忆向后跳跃一大步，才能回忆起当年这个皮肤黝黑、待人苛刻的乡村年轻神父有一天携着捐款箱失踪了。

“埃尔泽维尔神父。”

神父拉起了劳拉的手。

“你怎么能记得？你那时只不过是个孩子。”

劳拉根本就不需要问他藏在这里干什么，“请保守秘密，千万别把你的母亲连累了。”他说她不必问他。他都会告诉她，他当时并未跑多远。他承认，他是个懦夫。当警察差一点要抓住他的时候，他想还不如回到教会仁慈的怀抱，波菲里奥的宪兵可是一点怜悯都不讲。

“我请求原谅，他们也原谅了我，我作了忏悔，得到了赦免。我后悔至极，也重新回到了我的宗教社团中，但我觉得一切都过于容易了，教训深刻，但太容易了。我必须要为我

做的坏事、我受的诱惑、我犯下的欺骗付出代价。我们的主上帝给了我这个惩罚:那就是卡列斯的宗教迫害。"

他用他那双被征服的印第安人的眼睛看着劳拉,说:"我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觉得自己有罪。我做噩梦,我坚信上帝因为我亵渎了神明,所以让这场对他自己宗教的迫害运动降临人间。我觉得因为我个人的错误,大家都遭了罪,我必须为这负责。我深信不疑。"

"神父,你不用跟我忏悔。"

"不,我要忏悔。"埃尔泽维尔又攥紧了一直未放开的劳拉的双手,"是的,我必须忏悔,你那时还是个孩子,还有比请求一个孩子原谅他灵魂的丑恶更好的吗?你能原谅我吗?"

"是的,神父,我从没有指责过你,但是我的母亲……"

"你的母亲和姨妈们知道,是她们原谅了我,所以我能留在这里。要不是她们,我早就被枪毙了。"

"我想告诉您,您从未伤害过我。对不起,不过我已经把您淡忘了。"

"这是一种伤害,你发现了吗?忘记是一种伤害。我在我的教区干下了荒唐事,如果我的教民忘了这件事,那是因为这件事已经深入心中,甚至到了被人忘记,被人原谅……"

"我的母亲已经原谅您了。"劳拉插话了,她对神父的推理迷惑不解。

"不,她让我留在这里,供我食宿,是为了让我懂得我在我的教民中不曾拥有的慈悲之心。你的母亲让我承受了活生生的责备,我不愿被任何人原谅。"

"神父,我的孩子们还没有领过圣餐。您知道,要是我求我丈夫这样做,他会大吵大闹的。您是不是愿意……?"

“为什么你求我做这个?”

“我想成为不同寻常的仪式的一部分,神父,习惯快要把我闷死了。”劳拉发出一声像是愤怒,又像是哭泣的呻吟。

她内心感到极度的满足,终于通过这次仪式填补了她婚后生活中所缺少的那部分,她发现她违背了丈夫的意志。胡安·弗朗西斯科从不去教堂,也不谈宗教,劳拉和孩子们也一样。只有玛丽亚·德·拉奥在她的镜子里嵌了几张旧的圣像,虽然胡安·弗朗西斯科不说,却把这个看作是旧宗教的遗俗。

“我什么也不反对,但我坚持要问,这是为什么呢?”雷特西亚问。

“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仪式来标明时间的话,就显得太平淡了。”

“时间的流逝让你那么害怕吗?”

“是的,妈妈,我害怕没有小时的时间,那就该是死亡了。”

雷特西亚、她的三个姐妹还有劳拉带着圣地亚哥和丹东这两个孩子一起来到了神父的房间里。

“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埃尔泽维尔一面说,一面把两块面包放进八岁和七岁的两个孩子嘴里。这两个孩子开心得很,把他们带到这个幽暗的房间里吃面包,还听拉丁文。他们喜欢奔跑在哈拉帕的花园里,奔跑在贝卢斯和胡亚雷斯公园,虽然如同以前一样被黑黑的玛丽亚·德·拉奥姨妈死死地盯着,但在这里,他们仿佛拥有了一片宁静的天地,可以随心所欲,纵情驰骋,而且没有危险,这块他们自己的领域给予了他们城市中无法比拟的自由,这里没有大街小巷川流不息的汽车,也没有公立学校中逞强好胜之徒上门挑衅,逼迫圣地亚哥出手保护他的弟弟。

“为什么你老是盯着家里的天花板看,妈妈?”

“不为什么,圣地亚哥,我在这里和你的外祖父母一起度过了我的青少年。”

“我也想在家里有个和这个一样的小房子,我是城堡的主人,我保护你,不让你受坏人的欺侮,妈妈。”

“圣地亚哥,来哈拉帕之前,我在墨西哥城的家里雇了个女用人,那时候你们已经和姨妈在这儿了,你们回去后要尊重卡尔梅拉。”

“卡尔梅拉。好的,妈妈。”

劳拉总预感到会发生些什么,她让玛丽亚·德·拉奥姨妈带孩子们在哈拉帕再多住几天,她先回墨西哥收拾房间。估计那边该脏得不成样子了,只有胡安·弗朗西斯科一个人在那里,还在忙着搞他的政治。等到一切都井井有条之后,我再把他们叫回来。

“劳拉。”

“哎,妈妈。”

“你看看你结婚的时候忘了带什么了。”

那是中国娃娃李白,真的,她没再想到过它。

“哎呀,妈妈,真是的,我居然忘了它。”

她假笑了几声以掩饰心中的悲伤。

“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成了我丈夫的娃娃李白……”

“你想带走它吗?”

“不,妈妈,还是让它待在这里等我回来吧。”

“你觉得你会回来吗,我的女儿?”

等劳拉从布埃纳维斯塔车站回到家时——由于习以为常的火车误点,大约在中午十二点才回到索诺拉大街的家中——胡安·弗朗西斯科和卡尔梅拉谁也不在。

她感觉到家里有些不一样，寂静，还缺少了什么：当然，是孩子们和玛丽亚·德·拉奥姨妈，他们是家中的声息和欢乐。她顺手拾起从车库门下塞进来的报纸，好看看怎么安排她今天的个人生活。去皇家电影院吗？先看看报上登了些什么吧。

她翻开了国内新闻版，突然看到了“卡尔梅拉”的正面照片，格罗丽亚·索里亚诺，圣衣会修女，因参与谋杀当选总统阿尔瓦罗·奥夫雷贡而被捕。她于查布尔特佩克森林边的一户人家中被发现，逃跑时被警察一枪击中后背，当场毙命。

整个下午，劳拉就这么坐在那个经常举行政治聚会的餐厅里，呆呆地对着桌上翻开的报纸，死死地盯着照片上那个惨白的、眼窝深陷、眼珠乌黑的女人。天色渐晚，尽管已经看不清照片了，但她却一直没开灯，她已经把这张脸记在了心里。卡尔梅拉是她的道德补偿。如果胡安·弗朗西斯科这些年来因为她没有去看过阁楼上的加泰罗尼亚无政府主义女英雄而责备她，这次又怎么能因为她收容了一位被追捕的修女而怪罪她呢？绝对不会怪罪她的，他们最后在为人道主义斗争这一点上走到了一起，劳拉重复了一遍：斗争。

胡安·弗朗西斯科在晚上十一点回到了家。家里黑灯瞎火的，这黑大个把帽子往沙发上一扔，叹了口气，打开了灯。当他看到劳拉坐在那里，报纸摊开放在一边时，显然是吃了一惊。

“哎，你回来了。”

劳拉点了点头。

“你知道修女索里亚诺的事了？”胡安·弗朗西斯科问她。

“没有，我只知道无政府主义者阿斯纳尔的事。”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当你到哈拉帕去发现阁楼上的‘珍宝’时，你赞扬了我的父亲，因为他庇护了阿尔莫尼亚·阿斯纳尔，就是在那时候我认识了你，并且爱上你的。”

“当然了，她是工人阶级的英雄。”

“你难道不因为我收留了一位受宗教迫害的女英雄而夸奖我吗？”

“可她是一个谋杀总统的修女。”

“那么一个谋杀沙皇和王子的无政府主义者呢？”

“不对，阿尔莫尼亚是为了工人们而战斗，你的卡尔梅拉却是为了神父们。”

“啊，是我的卡尔梅拉，不是你的。”

“不，不是我的。”

“胡安·弗朗西斯科，她不是人类，她是从另一个星球来的……”

“她属于另一个已经被淘汰的时代，仅此而已。”

“她不配得到你的庇护……”

“她是个罪犯，再说，要是她像我要求的那样安安静静地待在这里，就不会被按照潜逃法给杀了。”

“我以前不知道革命警察和独裁时的警察一样，都从背后开冷枪。”

“我早对她说过，可能她早就被记录在案了，就同凶手托拉尔和他的同伙孔奇塔嬷嬷——另一个女人一样。这你已经看到了。”

“你究竟能和谁相处得好，胡安·弗朗西斯科？你和我之间永远没法和平共处。”

她不想再听解释，胡安·弗朗西斯科也没敢再多作解

释。劳拉收拾了一下行装，上了街，叫了一辆出租车，给了司机她年轻时的朋友伊丽莎白·加西亚-杜邦的地址。

胡安·弗朗西斯科尾随而至，猛地拉开车门，抓住了她的胳膊，想要把她从车里拖出来，他打了她一记耳光，出租车司机下了车狠狠地推了胡安·弗朗西斯科一把，把他掀翻在地，然后开车飞快地跑了。

劳拉和伊丽莎白一起住在跑马场区一套现代的公寓里。少年时的好友喜出望外地欢迎她，又是拥抱，又是亲吻，亲热之情溢于言表，这正是劳拉所期待的。然后，她们两个穿着睡衣，各自讲起了自己的故事。伊丽莎白刚和自己著名的丈夫爱德华多·加拉萨离了婚，加拉萨在圣卡耶塔诺的舞会上一下子就吸引了她，之后他俩结了婚，定居在墨西哥城，因为加拉萨是内务部部长阿尔贝托·帕尼的朋友，帕尼在革命时期的通货膨胀之后，每个集团都在铸造自己的钱币即著名的“比林比凯”[1] 之时，奇迹般地整顿了全国的金融业。加拉萨觉得自己的魅力不可抗拒，他把自己称为“上帝送给女人们的礼物”，还让伊丽莎白明白她能嫁给他是莫大的荣幸。

“可是这样让我觉得我像是整天在求着你。”

“你就当你过得很好吧，亲爱的，你只需要我一个人，而我需要很多女人。还不如咱俩互相关照一下的好。”

“那么虽然我有你了，但我也需要其他男人。”

“伊丽莎白，你说话的口气像个妓女。”

“那你就象是男妓，我亲爱的拉罗[2]。”

“对不起，我不想惹你生气，我只是开个玩笑。

① Bilimbique，墨西哥1913年宪政革命时期发行的钞票。

② 拉罗（Lalo）是爱德华多（Eduardo）的爱称。

“我从未听你说过比这更正经的话，你已经惹恼我了，我亲爱的，如果我还要接着听你发表人生哲理，还要接着忍受更多的侮辱的话，那简直太残忍了。因为你有权得到一切，而我什么也没有。我是个妓女，而你是个真正的男人。我堕落了，而你怎么看都是个所谓的绅士。不是吗？再见，再见。”

幸好，他俩没生孩子，又怎么会有呢？这个拉罗每天在外面恣意欢闹，直到第二天凌晨六点才精疲力竭地回到家中。

“胡安·弗朗西斯科倒没有这样，他一向很尊重我。直到今天晚上他才想打我。”

“仅仅是想？你瞧瞧你那张脸。”

“好吧，他打了我。但他不是这样的人。”

“我的小心肝劳拉，照我看，这样下去你会原谅他所做的一切，不出一个星期，你就会回到你的牢笼里去。我们还是先去找乐子吧。我请你去歌剧院看大肚子罗贝尔托·索托演的《逐渐崩溃》。它讽刺了工人领袖莫罗内斯，据说谁看都会开怀大笑的。在这出戏里所有的人都出场了。趁它还没有闭幕，我们赶快去看。”

她们挑了一个隐蔽的包厢，罗贝尔托·索托和路易斯·拿破仑·莫罗内斯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长着比别人厚一倍的下巴、肚子、嘴唇和眼皮。这一幕发生在这位工会领袖的特拉尔潘的庄园里。他穿着侍童的服装，唱着《当我是名侍童》出场，立刻就有九、十个半裸、披香蕉叶作遮羞布、乳头上还粘着星状物的少女围住了他，她们的扮相像极了约瑟芬·巴克尔在《巴黎牧羊人的疯狂》里的时尚装扮。少女们扯去了他大肚子上的十字裙，齐声高唱《无产阶级万岁》。这时又上来一个高大黝黑，穿着工装服的男人，

向索托扮演的莫罗内斯敬香槟。

“谢谢，洛佩斯·格林兄弟，你服侍我一直比别人好些。你不如改名叫红色洛佩斯[1]，免得与气氛不合，你知道吗？在这里，我们都是老红色分子，不是老色鬼，小子，是吧？哎……”

“妈妈，帮我照看孩子，直到我再来找你。姨妈就和你在一起吧，我会给你们寄钱的，我现在必须重新调整一下我的生活，我亲爱的妈妈。我会告诉你一切的，你要帮我看好李白，你以前说得有道理。”

① 此处为讽刺的双关语，胡安·弗朗西斯科·格林名字中“格林”Greene与英文中“绿色”green相近，而“色鬼”与“绿色”在西班牙语中是一个词(verde)。

第八章　改革大街:1930年

“有的墨西哥人只有到了躺在棺材里的时候看着才顺眼。”

在卡门·科尔蒂娜为她的表妹演员安德莱阿·内格瑞特的肖像画揭幕而举办的鸡尾酒会上,奥兰多·希门内斯这个庸俗的玩笑受到了所有来宾的欢迎。这幅肖像画的作者,年轻的瓜达拉哈拉画家迪索克·安布里斯随即成为最有市场的肖像画家,那些不想把自己的尊容交给里维拉、奥罗斯科或是西凯罗斯之类被人们称作“涂鸦者”的可怕的共产分子去画的人,便纷纷转向了他。

卡门·科尔蒂娜千方百计地要嘲弄常规习俗,她邀请来参加她的鸡尾酒会的客人全是些被她称为“城市部落一族”的人。伊丽莎白头一次带劳拉去参加聚会的时候,不得不指给劳拉看,哪些是被正式邀请来的客人,尽管他们看上去和来“吃白食”的没什么两样。女主人想着:这些人不请而至全是因为自己号召有方,难道有谁不愿意在卡门·科尔蒂娜的晚会上露个面?于是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多过问了。她爱慕虚荣,眼神又不太好,分不清谁是谁,但据说她已经把嗅觉和触觉提高到了一种伟大的艺术的档次,因为她只要把她那双近视眼凑近她身边的某张脸,就能说,亲爱的,你真迷人!或者抚摸着细密的开司米面料惊呼:“鲁迪,这真让人赏心悦目!”

鲁迪的确是鲁迪，但奥兰多却是粗鲁[1]。卡门对十分好客的安德莱阿说："要当心哪！"安德莱阿有着珍珠般色泽的皮肤，眉毛淡得几乎看不出来，总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她的五官长得绝对对称，尤其是中分的头发加强了这种效果。虽然她模样青春、性感，却大胆地在额边用两缕白发做装饰。正因为此，再加上她好与人斗的脾气，放荡不羁的奥兰多不客气地叫她"双色母牛"。奥兰多评价，安德莱阿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一名相当肥硕的女人，但现在还不是，现在就像一颗刚从树枝上摘下的成熟果子，敢于傲视全世界。

"吃了我。"安德莱阿笑着说。

"剥了我。"奥兰多很严肃地回答。

"真是个粗人。"卡门放声大笑。

迪索克·安布里斯的画现在被一块布盖着，等待在这个晚会高潮到来之时大白于公众。卡门，也只有卡门能决定这个时刻，在气氛临近白热化的时刻，所有的部落一族都到齐了，情绪开始沸腾。卡门心里有本账：谁到了？谁没来？

"你是高质量生活的'统计图'[2]。"奥兰多凑在卡门耳边大声说。

"哎呀，我不是聋子。"卡门呻吟。

"你看上去真不错。"奥兰多掐了她屁股一把。

"粗人，什么叫'统计图'？"

"这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新学科，一种撒谎的新方式。"

"什么，什么？我很想知道。"

"巴尔加斯研究这个。"

---

① Rudy（Rudulf 的简称）与 rudo（粗野无礼的）形式相近。

② estadígrafa，奥兰多杜撰的词。

“佩德罗·巴尔加斯？他是广播之魂，你听过他？他在‘W’唱歌。”

“亲爱的卡门，美术宫刚落成，你别对我说什么‘W’。”

“什么，是那座堂波菲里奥修了一半的陵墓吗？”

“我们有场交响乐会，是由卡洛斯·查韦斯指挥的。”

“哪个查韦斯？”

“好多猪圈啊①。”

“哦，见你的鬼，你真是不可理喻。”

“我了解你，你在想宴会的名单。”

“我是女主人，这是我的责任。”

“我敢打赌，我能知道你在想些什么。”

“奥兰多，再没有什么可让你知道的了。”

“你在看什么呢？盲仙女。”

“看融合，亲爱的，不再有阶级了，你没觉得吗？告诉我，二十年前，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

“卡门，我当时看到你在1910年百年大庆② 的舞会上卖弄风骚，——可惜没什么效果。”

“那是我的姨妈。无论如何再看我一眼吧，你看见什么了？”

“我看见了杨柳，看见了仙女，看见了彩虹，看见了忧郁，看见了疾病，看见了自私，看见了虚荣，看见了个人与社会的混乱，看见了优美的姿态，看见了丑恶的事物。”

“花言巧语的家伙，你不过是个失败的诗人。说几个人的名字吧，名字，名字。”

“名字里有什么东西？”

---

① 此处似又是文字游戏，查韦斯(Chávez)与“猪圈”(cochitas)。

② 记念墨西哥独立一百周年的庆典。

“什么?”

“罗密欧与朱丽叶,诸如此类的人。”

“什么? 谁把他们邀请来的?”

劳拉经受着伊丽莎白无微不至的关心:你不是寡妇,却表现得像个寡妇,劳拉,你离开洛佩斯·格林和我离开加拉萨一样,恰是时机,伊丽莎白和她一面走在马德罗大街上寻觅着便宜货,一面对她说。伊丽莎白组织了外出的计划:上街淘些削价的服装、首饰,革命后,这类东西在“康特”、“玻利瓦尔”以及“9月16日”的店铺中重新露面了。这些天总是在桑波吃早饭,在博兰德斯吃午饭,最后以去堂塞雷斯大街的彩虹电影院看一场电影而告终。这是劳拉最喜欢去的地方,因为那里播放的常常是在地铁站海报中出现的由最杰出的演员出演的美国片,克拉克·盖博、葛丽泰·嘉宝、威廉·鲍威尔,而伊丽莎白偏爱5月5号大街的宫殿影院,在那里可以看到纯粹的墨西哥电影,她和查多·奥尔丁一起笑,和萨拉·加西亚一起哭,对费尔南多·索勒的演技赞不绝口。

“你还记得那次我们一起去看大肚子索托的戏吗? 从那时起,你的生活就改变了。”

“死亡的婚姻毁灭了一切,伊丽莎白。”

“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 你和我一样都比丈夫聪明。”

“不是,我相信他爱我。”

“但他不理解你,一旦你明白了你比他聪明,你就离开了他,别对我说不是这样的。”

“不是,我只是觉得胡安·弗朗西斯科没有达到他的理想高度,虽然今天考虑这件事让我感到有点心烦,但我想,可能是我比他更有道德些。”

“你记得索托的讽刺剧吧？在墨西哥要成为聪明人，就得先是个流氓。我亲爱的，我建议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性感女人，做个你以为的女流氓。好了，赶紧吃掉你的苏打冰淇淋，把汽水喝了，我们先去买东西，再去看电影。”

伊丽莎白一下“射击”给她那么多事，这让劳拉感到很别扭，就像她必须要开始学说都市黑话那样难受，其中夹杂着无数古语假扮的新词汇和新词汇冒充的古语。然而这里还包含着过去武装斗争中的词汇精华，比如说“射击”是送，“卡兰萨”[①]是抢，“包围”是献殷勤，“竭尽全力”是展开战斗，“我配得上威尔逊”[②]是经过凯旋门，那是为纪念这位美国总统命令水手在维拉克鲁斯登陆和潘兴将军对潘乔·比利亚的毁灭性出击而建的。命运是“巴伦蒂娜”：如果明天我就得死，那就干脆把我杀了；爱的决心是“阿德丽塔”[③]，如果她跟随别人而去，我也要追随她至天涯海角。乡村与城市的差异好像歌里唱的“留下四块孤零零的玉米田”或者“秃子们完蛋了，不再自以为是了”，又好像粗俗无比的骑手瓜德松·贝里斯塔因，据说这位将军惟一取胜的战役就是与其岳母的交锋，他对“小白猫”玛丽亚·科内萨的细腻与优雅念念不忘，每当她唱起“啊呀呀呀，我亲爱的上尉”，人们就说她在回忆那个可怕的军人，也是她的情人，统率着一群以“灰色卡车之队”著称的游击队，枪毙就是抄袭。而“马德罗”正是她们现在所做的，即沿着马德罗大街散步，它是市

---

① 此处“卡兰萨”(carrancear)与下文的“马德罗”(Maderear)都是从人名衍生的动词。

② 威尔逊(1856—1924)，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曾派潘兴将军远征墨西哥。

③ 墨西哥著名民歌，歌唱要追随心爱的女人到天涯，“如果她跟随别人而去，我也要追随她至天涯海角”为其中歌词。

中心的商业动脉，以前叫布拉特罗斯街，为了纪念这位叫作布拉特罗斯的为革命和民主而斗争的传教士。

“我看过胡里奥·托里写的一本很有意思的叫《枪决》的书，他抱怨被枪决最不舒服的地方是得早起。”劳拉浏览着玻璃橱窗中的摆设说道。

“别操心，我可怜的丈夫加拉萨说过，革命期间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但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酒馆斗殴中，劳拉，”伊丽莎白在堂塞雷斯大街上的议员厅前停住了脚步，“你喜欢来彩虹影院看电影，是因为你丈夫在这里当议员，对不对？”

她俩买了票，是克拉克·盖博和诺玛·谢瑞主演的影片《自由的灵魂》。伊丽莎白说影院门口蜜饯和苹果酒的味道让她兴奋不已。

“新鲜的苹果和浓稠的蜜，”这个头发一天比一天金黄，精神一天比一天焕发的年轻女子在走出影院时叹了口气，“你看到了吗？诺玛·谢瑞放弃了一切：地位、有身分的未婚夫——这个英国人雷斯里·霍华德多棒啊！——而她做这些只是为了一个性感的美国人——克拉克·盖博，太让人感动了！”

“我更喜欢那个金黄头发的雷斯里·霍华德，再说他是匈牙利人，不是英国人。”

“不可能，匈牙利人都是吉卜赛人，他们的耳朵上戴环儿。你从哪里知道他是匈牙利人的？”

“在电影剧本上。”

“不管你喜欢的那个黄毛是英国人还是哪个地方人，你总归是嫁给了黑皮肤的胡安·弗朗西斯科，甜心，别骗我了。你要来彩虹影院是因为它在议员厅旁。要是碰巧，你就见到他了。我是说，你们就见面了。我是说，我不说了。”

劳拉摇头否定了伊丽莎白的推断,但却不做任何解释。有时,她觉得她的一生就像是一年的四个时令,只是她的婚姻一下子就把生命从春天推到了冬天,跳过了过渡的开花和收获的季节。她爱胡安·弗朗西斯科,但一个男人只是在他自己尊重爱他的女人之时才值得敬重。这个环节正是劳拉生活中欠缺的方面。或许伊丽莎白说的有理,她需要再尝尝别的水,再沐浴其他的河流:即便不一定遇得上完美的爱情,但还有可能建立一份浪漫的感情,"柏拉图式"的感情,这个词伊丽莎白不太明白,但她在经常出入的晚会上总是把它挂在嘴边。

"可以看我,但别碰我,如果碰了我,你就会被传染。"

她从未屈身于任何一个人,她的朋友劳拉想,感情可能会自发地产生,因此她俩相安无事地住在一起,回避着那一大群由于欢庆革命而从家里解脱出来的好色之徒,他们寻找着情人,而实际上他们要的是母亲。

迪索克·安布里斯为安德莱阿·内格瑞特画的那幅肖像的揭幕仪式最终成为劳拉走出没有保障的寡居生活的借口,正如伊丽莎白幽幽地说的那样,去参加一次艺术表演,就不用再咀嚼苦涩的过去,想像着已不可能的爱情,讲述在维拉克鲁斯的故事,挂念她的儿子,因为觉得是自己的错,是自己抛弃了家庭,抛弃了孩子,而不好意思回哈拉帕,她不知道如何来评判她做过的一切,她不愿意在孩子面前贬低胡安·弗朗西斯科的形象,也不愿意向妈妈和她的姨妈们承认是她错了,她当初还不如在圣卡耶塔诺的舞会上或是哈拉帕的俱乐部里找个门当户对的小伙子,总而言之,她不想数落胡安·弗朗西斯科的不是,她想让所有人都认为她对一个勇敢战斗着的男人还怀着信念,因为他是承担墨西哥这个世纪所有重大事件的领袖,她不愿对她家里人说,我错

了,我的丈夫是个腐败分子,是个平庸之辈,我的丈夫是个野心家,却配不上他的野心;圣地亚哥,你的父亲,如果人们不承认他的业绩,他就生存不下去;丹东,你的父亲,如果没有人给他现在的地位,他就会一蹶不振;伊丽莎白,我的丈夫,他还认识不到他已经丧失了他光辉的过去,他的勋章不过是一堆破铜烂铁。

"你的父亲不过是告发了一个被追捕的女人。"

怎么才能把这件事告诉将满十岁的圣地亚哥和将满九岁的丹东?怎么向母亲和姨妈们解释?怎么说得清楚只是因为做坏了一件事,这些战斗岁月中积累下来的声望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了?劳拉心甘情愿地忍受这份寂寞,她对自己说:但愿胡安·弗朗西斯科知道她这么做是在谴责他;但这并无大碍,因为他会认为只有她才这么看待他,他的儿子们,住在哈拉帕的宾客之家的那几个无关紧要的老太婆,还有其他人都不这么看待他。丈夫的自尊心毫发无伤,女人的悲哀总是女人自己的悲哀。

她不知道如何把这一切都同固执的伊丽莎白讲,正如她不能告诉和她一直保持通信往来的家里一样,她只能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信都寄到了索诺拉大街的家,胡安·弗朗西斯科的新女佣每周一次把信件交给她。劳拉都是在中午他不在家的时候才回去。她坚信,即使是玛丽亚·德·拉奥姨妈对此有所怀疑,也会保持缄默的,因为她为人十分谨慎。

最后劳拉不得不去参加安德莱阿·内格瑞特肖像的揭幕仪式,那是因为一天前,伊丽莎白和她谈到开销的问题。

"没关系,劳拉,帽子、衣服的钱,都可以等到你宽裕的时候再还我。"

"我还没拿到胡安·弗朗西斯科的钱。"

“你拿不到了！”金发的玫瑰亲热地笑着，“你穿得可真漂亮。”

“我喜欢漂亮的东西。可能是因为这段时期没有其他的东西来填补我心里的空虚，我想。”

“你会喜欢上什么的，不用去苛求。”

实际上，她花的钱不多，她一个人看书、去听音乐会和参观博物馆，和伊丽莎白一起看电影、吃饭。和丈夫分居的日子对她来说是种挑战。只因为他俩之间发生了一次告发，一次死亡——一个死去的女人——但是夏奈尔香水，斯基亚帕雷里草帽，还有巴伦西亚加牌的衣服……时尚往往在很短的时间内变化，劳拉怎么可能还穿着查雷斯顿式的短“弗莱帕”[1] 舞裙，留着克拉拉·伯恩式的短发出门，而眼下流行的是像好莱坞的新秀那样，穿长裙，烫波浪，胸部用大绣花领衬托，胆子大一些的就穿上了凸现体形的真丝晚礼服，就像那个金发的简·哈罗一样。一顶流行中的帽子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女人只有在睡觉或者是打网球的时候才摘下帽子，就是在游泳池，也戴着胶皮泳帽来保护马赛尔式的鬈发。

“走吧，打起精神来！”

在劳拉想要向女主人卡门·科尔蒂娜问候、也想欣赏由帕尼装饰的线条明朗的房子，更想夸赞可敬的安德莱阿·内格瑞特之前，一双手就蒙住了她的眼睛，是一个献媚的客人？劳拉半睁着眼看到了耳边那枚刻着名字缩写 O. X. 的沉重的金戒指。

这会儿，劳拉并不想见到他，随他那双手浮上心头的是圣卡耶塔诺庄园中那名叫奥兰多·希门内斯的青年男子，当

① “弗莱帕”，原文为英文 flapper，指 20 年代不拘传统的时髦少女。

时劳拉也不愿看他。她又一次闻到了英国熏衣草的味道，又一次听到了像英国人那样故意升高音阶的嗓音，她想像着热带地区平台上柔和的光线，她仿佛看见了他的轮廓，挺拔的鼻子，金色拳曲的头发……

她睁开了眼睛，认出了那张上嘴唇略比下嘴唇缩进一些的嘴，像哈布斯堡国王那样突出的下颚，但现在鬈发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锃亮的秃头和一张成熟的脸，以及和维拉克鲁斯码头上干活的中国苦力一样蜡黄的皮肤。

奥兰多看见了劳拉眼神中略带悲伤的惊奇之色，说：

“我是奥兰多，你不认识我，可我认得你。圣地亚哥经常很亲热地说起你，我想你是——我对你说过什么……？”

“他的亲爱的圣女。”

“难道已经不是了？”

“我有两个儿子。”

“那你的丈夫呢？”

“不在了。”

“死了？”

“你已经看到了。”

“只有你和我还一直活着。哎呀，瞧瞧那些事啊。”

奥兰多看看四周，像是重新在寻找圣卡耶塔诺的阳台，那个让两人独处的僻静之处，重新开始交谈。失去的时光一时酸甜苦辣都在劳拉心头涌现，但卡门容不得轻浮的腼腆或是害羞的独处出现在她的晚会上，好像她嗅到了这里有不同寻常的——或者说，有排他的——情况正在发生，就过来打断了这一对的交谈，把他们介绍给这个人或是那个人。先是介绍纳尔贡·德尔·罗萨尔，一个戴单目镜的老贵族，他的玩笑就是除下脸上的玻璃片，“你们看，”然后一口把它吞了进去，“这是假的，是果冻。”接下去是奥诺玛斯蒂

科·加兰,一个胖胖的脸上长着红斑的西班牙人,他总是穿着睡衣,戴着有红流苏的条纹睡帽,来参加晚会。他手里还拿着一枝蜡烛,以防这个混乱的革命国家会突然停电,那里需要的是像西班牙的普里莫·德·里维拉[1] 那样优秀的"温和的独裁者"。接下去是一对水手,男的穿着短裤,戴着写有"吻我"字样的蓝色帽子,而女的穿着玛丽·皮克福德,戴一顶都是卷儿的金色假发,穿着白色护踝和漆皮鞋,荷兰布短裤和玫瑰红小短裙,此外鬈发还盘成了一个众人皆知的大髻。再接下去,是一个穿着一身干干净净的白西服的艺术批评家,他嘴里不停地轻蔑地说道:

"所有人都长得那么丑。"

他总是牵着他妹妹的手,她是一位高挑美丽有如埃及塑像的女人。像是哥哥的应声筒,她一直重复着:丑陋,我们都长得那么丑陋。另一个带有杂食动物特有的无影无形的口臭的老画家四处宣扬,说他是新画家迪索克的老师,他的身分受到另一名擅长画悲凄绝望的插图的画家的质疑,这位画家以黑白色调的葬礼画及他黝黑的情人兼弟子而闻名,他的弟子有个众所周知的绰号叫"韩科",为了掩人耳目——卡门·科尔蒂娜说,这是一种传闻——这名强壮的黑人有一个意大利妻子,据他介绍是《蒙娜丽莎》的模特。

所有这些人都与一对英国伴侣保持一定的距离,并表现出明显的厌恶,卡门介绍说女的叫菲利茜蒂·斯密斯,是个除非她轻蔑地低下头来看,否则不会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事的高傲女人,所以尽管她彬彬有礼,还是避而远之的好。她的男伴是个风度不凡的大胡子矮个儿,叫詹姆斯·萨逊。她又轻声补充,他是英国乔治五世的私生子,现在躲在

---

① 普里莫·德·里维拉(1870—1930),西班牙将军和政治家,独裁者。

波多锡·德拉·乌阿斯特卡的一个热带庄园里，并把它变成了一个游乐场。菲利茜蒂评价道，连威廉·贝克福特荒诞小说中的国王住在这里都不为过。

“住在詹姆斯的家里，就像进入了无穷无尽的兰花、石鹦鹉和竹帘的世界。”

卡门对奥兰多和劳拉交头接耳地说：问题在于这里的一些人爱着其他一些人。菲利茜蒂爱着詹姆斯，但詹姆斯是个同性恋者，他看上了那个大谈“丑陋”的批评家，而批评家为黑人“韩科”而疯狂，黑人是个冒牌的同性恋，他喜欢忧郁画家是为了他的地位，实际上他要的是他那位意大利“蒙娜丽莎”，而她打算把忧郁画家培养成双性恋，好让三个人组成一个家庭，这不仅是为了肉体上的享受，更可以解决危机时刻的经济困难。亲爱的，当谁也不来买画，而政府成了共产主义画家的保护人的时候，是多么可怕啊！玛丽·皮克福德爱着那意大利女人，而意大利女人偷偷和同是大洋彼岸的水手睡觉，她是因为他很有男人味，所以想试一试，这也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的大力水手知道做牛郎可以激发女人们的母性，她们想要保护他，让她们为自己而兴奋。只有“蒙娜丽莎”知道她的丈夫只是个彩头，并不是神奇的魔法师，她想让自己出现在纳尔达的画布上。“你们在听我说话吗？亲爱的，别看国际报的周末版。”她和“韩科”排练如何让忧郁画家恢复常性，正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以便组合成一个三口之家。事情照此下去，就会变成四角恋爱，如果再加上玛丽·皮克福德，就是五角恋爱。“天啊，做一个女主人要碰上多少麻烦事啊，尤其是像我这么一个体面的家庭。”

“卡门，”奥兰多谦恭地说，“让一切都顺其自然吧，你想想，如果陀斯妥耶夫斯基被治好了他的精神病，他就写不出《白痴》了。”

"奥兰多先生,"卡门高傲地嘟哝着,"我只邀请高智商的人,从不邀请白痴。难道还不够多吗!"

卡门说的这一大席话让她有些喘不上气来,但她倒还腾出时间来介绍宾比内拉·德·奥邦多,一个不常来的贵族,以及格罗里亚·伊度尔贝,她被怀疑是德国弗朗兹·冯·巴彭总理的间谍,这可是个秘密!但所有的人都很国际化,年轻人们,马林切① 的错误已经没有人再提了!

卡门的唠叨和她请来的客人滔滔不绝的话一起汇成了言语的海洋,除了那个僵尸般寡言少语的黑白两色画家("我已经删除了我画中一切多余的部分"),他在现任政府公共教育部秘书自我介绍之前把奥兰多的那句名言"有些墨西哥人只在躺在棺材里才显得不错"低声念了出来,才得以让女主人和她庇护下的瓜达拉哈拉画家不约而同地一起为画像揭开幕布。当大家看到《虞美人,你已不再孤独》一片中的女主演光彩照人的全裸形象时,都兴奋之至,喧闹顿起。画中女演员斜倚在一张蓝色的沙发上,衬得雪白的肌肤分外醒目,而汗毛全都消失不见了,该藏的地方藏,该显的地方显,画家运用绘画技巧把她升华成一个完全的精神体现,仿佛裸体成为这位修女接受笞刑时的习惯,如同一种高于私通的形式,她为了获得比羞愧更为重要的东西去牺牲她的快乐。或者正如奥兰多总结的那样,你看,劳拉,这就像上个世纪一部小说的名字:修女、已婚妇女、处女和烈士。

---

① 即玛丽娜(Marina 约 1500—约 1527),墨西哥阿兹特克人一首领之女,后被人献给西班牙殖民者科尔特斯,为其情妇,得名玛丽娜,印第安人称之为"马林切"(Malinche 或 Malintzin)。在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期间充当译员,被印第安人视为通敌分子。

"这是我灵魂的写照。"安德莱阿·内格瑞特对教育部长说。

"那你的灵魂也长着毛。"这位先生如此回答,他的眼神不错,一眼就看到画家并未除去安德莱阿小姐的阴毛,而是把它画成白色,就像女明星鬓边的头发一样。

随着话音落下,这场晚会就像是由浪峰转向了浪谷,突然间,风平浪静,人群中传出一片惊叹的喃喃低语声,有中伤,也有褒奖,但绝对无法知晓他们究竟如何评价迪索克的艺术或是安德莱阿的大胆。部长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辞别,他对卡门低声说:

"您对我说过这完全是个文化活动。"

"像戈雅的'玛哈'一样,部长先生,哪天我会给您看那幅'阿尔瓦公爵夫人',那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

"放荡不羁的公主。"这位奥尔蒂斯·鲁比奥的内阁成员干巴巴地说。

"哎,多么高兴能够见到内阁所有成员中的一些人啊!"戴着"吻我"字样帽子的水手说。

当穿短裤的水手吹足了一个气球,并把它抛向天花板时,部长略一点头,说道,"再见。"

"这就结束了,"这个"波佩"兴高采烈地说,"我们接着去哪儿?"

"'雷扎'。"玛丽·皮克福德大叫。

"去'不眠之夜'。"口臭的画家建议。

"去'阿卡查多'。"穿白套装的批评家叹了口气。

"多丑陋啊!"他的妹妹开口了。

"那去'玫瑰河'。"意大利女人来劲了。

"'墨西哥厅'。"小个儿的英国人发表意见。

"美丽可爱的墨西哥。"高傲的英国女人打了个哈欠。

“‘小非洲’。”社会新闻记者挤了挤眼。

“我去‘高厅’。”奥兰多对劳拉说。

“我们俩的名字一样。”坐在沙发上的一个漂亮女人对劳拉说。她调整着身边小茶几上的灯光，笑着又说，“女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得借助灯光了。”

“您还很年轻。”外省来的劳拉礼貌地回答。

“我们应该差不多，三十来岁，不是吗？”劳拉点了点头，接受了那位金发女子的无声邀请，她拿了个垫子摆在身边，劳拉转身端起了自己的威士忌酒杯。

“我叫劳拉·里维埃。”

“劳拉·迪亚斯。”

“我知道，奥兰多对我说过。”

“你们认识？”

“他很有意思，只是头发太少。我叫他剃光头，这样一来，他就不仅有趣，还显得很危险了。”

“我能告诉您一件事吗？他常常让我害怕。”

“请用你来称呼我，好吗？我也害怕，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让我来告诉你，他从未有过第一次。”

“没有过。”

“我不是在问你，亲爱的，而是在向你保证。我从来不敢和他发生关系。”

“我也是。”

“那么你就试一试，我从未见过他像看你那样看别人。再说，我向你发誓，关上一扇门要比打开一扇门来得更可怕。”劳拉·里维埃摸着自己缀满了宝石的脖子，“你知道吗？自从我和我丈夫分手后，我就开了一家古玩店，哪天可以过来看看我。”

“我现在和伊丽莎白住在一起。”

“不会一直住下去,是吗?”

“不会。”

“那你以后怎么办?”

“我不知道,这也是困惑着我的问题。”

“我劝你不要继续沉迷于不可能的事情当中去了,和我同名的姑娘。最好还是按你的喜好和时间去改变事物,去试一试吧。看,你的朋友伊丽莎白来了。”

劳拉环顾四周,已经没有什么人留在那里了,连卡门·科尔蒂娜也和她的一班人马去别处寻乐子了。去哪里了呢?是去“特南巴”听民乐了?还是去“班底达”看妓女表演?是去低矮的“不眠之夜”酒吧喝酒了呢?还是去新的改革饭店和路易斯·阿尔卡拉斯乐队共舞?还是去老的“瑞吉斯”酒店听男高音“丝绸嗓子”胡安·阿尔维苏唱歌了呢?

劳拉·里维埃整理了一下头发,让它盖住自己的一半脸。伊丽莎白·加西亚-杜邦,加拉萨的前妻对劳拉·迪亚斯,胡安·弗朗西斯科的前妻说,我真是很不好意思,但亲爱的,今天我在家里有安排,你能理解我的,一个人总有他寻欢作乐的时候,哈哈,不会再有下一次的。但我已经替你考虑了,所以我给你在瑞吉斯饭店准备了一个房间,你拿好钥匙,乖乖地在那里待着,明天给我打电话……

当她打开饭店的客房门,看到奥兰多只在腰间围了一块毛巾,几乎全裸地待在屋里时,她丝毫不感到诧异。她奇怪的是她居然可以立即喜欢上另一个男人,而那个男人却不那么喜欢她。可以这么假设,他的镜子不只是把他变成一个镜像,而是借助美丽的阴影,幻化成会说话的幽灵,它可以刺激她——在此时此刻——超越她的内心,进入这面镜子,像艾丽斯那样,只是为了发现每一面镜子中还有另一面镜子,每一个奥兰多的镜像都在等待她伸出手去触摸他,

同时又感到他正在向下一个目标逃去……

她看了一眼光着身子躺在床上的奥兰多，很想问他，我们究竟有多少个目标？

他在等待着她，而她幻想着无数的男人，如同男人们幻想女人时一样，只是女人们无法当众表达这种愿望，只能在心灵深处默默地说：我喜欢不只一个男人，我喜欢好几个男人只因为我是个女人，并非因为我是个妓女。

她开始除去手上的戒指，她想干干净净地来到奥兰多的身边，用一双灵巧、轻盈的手去抚摸他的身体。而奥兰多伸着拳头，戴着刻有他名字缩写 O. X. 的金戒指，也想摸透眼前这个女人。他的戒指像是在对她挑衅，是的，责备她错过恋爱的时光，约会迟到。这一次是了，现在是了，劳拉一面说着，是了，一面摘下她的戒指，尤其是她同胡安·弗朗西斯科的结婚戒指和她从外祖母科西玛·克尔森那里继承下来的钻戒，她的外祖母因为“帕潘德拉的美男子”充满爱意的一刀，失去了她的手指。她走向奥兰多的床边时，让戒指顺手落在地毯上，就像小红帽在森林里为鸟儿们撒下面包屑一样，鸟儿们无一例外都是猛禽，这些美丽的食肉者，一面抢食着路上的碎屑，一面对这个迷了路的小女孩说：“你已经没有退路了，因为你在狼窝里了。”

第九章　洋际火车:1932年

乘着当年结婚时从哈拉帕坐到墨西哥城的那趟火车,劳拉现在是回去。但这一次是白天,不是晚上,而且只有一个人。在到达科罗尼亚车站之前一直陪伴着她的是一群开始紧紧跟随她,后来又赶上她的狗,这是城里新出现的危险事物,她以前从未留意到这两件事,这座城市已经干涸了,一个湖泊接着一个湖泊,一条河流接着一条河流——特克斯可可,拉维加,拉贝罗尼加,以及阿兹特克湖的那些奄奄一息的支流——先是被垃圾,后又被浮土,最后被沥青所覆盖。这座湖泊众多的城市已经死去了。这对劳拉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她曾多次梦见这个城市是一座在水中央的金字塔。

相反,那些狗占据了她的整个思想:那些漫无目的地游荡于街头巷尾的杂种狗,既令人害怕又让人怜悯,它们之中有娇贵的吧儿狗、奔跑如飞的大丹麦狗和变了种的德国猎犬,所有的狗最后都混杂成一群没有项圈、没有方向、没有主人、也没有种族的野狗。从前养良种狗的家庭在革命期间大多移民去了国外,让这些动物放任自流,或任它们逃走或是忠诚守家而饿死。在罗马殖民区和改革大街的几座豪宅中,可以看见系在柱子旁的狗的尸体,它们被掩埋在自己的小屋底下,既不能进食也无法逃走。为了生存,狗和它的主人都不再忠诚。

“它们之间胡乱配种，没有一只狗知道它原来出身高贵。劳拉，等它们的主人回来——他们已经开始返回，主要从巴黎，有一些从纽约，也有很多从哈瓦那回到国内——也没法收拾这残局了……”

奥兰多对她说了这些话。在火车上，劳拉试图忘掉这些野狗，可它们却始终萦绕在眼前，甚至覆盖了她与奥兰多共同度过的这十八个月以来的生活中的所有场景。从那天在瑞吉斯饭店他俩第一次同眠之后就一直住在那家饭店里。奥兰多支付房间费和服务费，于是两人开始了奥兰多称之为“小说的观察”的社交生活。劳拉有时自问，她的情人是真的乐于在这座经历了二十年革命政变而终于恢复平静的城市中过这种浮华简单的生活，还是他坐地铁往来于城市之间执行着一项秘密计划，就像他当年做加泰罗尼亚无政府主义者阿尔莫尼亚·阿斯纳尔的接头人那样。

她从未问过他这些问题，她不敢，胡安·弗朗西斯科会告诉她一切发生过的事，以至于谈话变成了演讲，奥兰多则不同，从来不说他干了些什么，劳拉总是只知道将要发生的事，而不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她既不清楚他和哈拉帕阁楼上那个无政府主义老太太的关系，也不了解他与在维拉克鲁斯被枪决的她兄长的交情到底如何，奥兰多要吹嘘夸大他与这两个人的关系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英雄的光环就会像笼罩着阿尔莫尼亚·阿斯纳尔和圣地亚哥那样笼罩着他，为什么奥兰多不利用这层关系呢？

在这位难以成眠的女人眼中，睡着的奥兰多一副精疲力竭、毫无防备的样子，劳拉脑海中顿时浮现出许多事情，首先，尽管奥兰多常常自嘲或恶毒地讽刺社会，他在公众场合却总是表现得很羞涩，他把这个叫作保守和自尊。劳拉对此毫不怀疑，但这个在公众场合羞怯的男人，一到了床上

就变得恬不知耻，为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他与自己的结合难道怀着某种秘密需要：是为了什么呢？是无政府主义，还是工会，是不连选，还是革命，更恰当地说是那个大写的革命，这是每个墨西哥人都铭记在心的，是一幅人人都生活在其中的巨大壁画，是一幅里维拉的壁画，马队和凶杀，争吵和战役，极度英雄主义和无尽荒凉景象，逃跑和追踪，拥抱和暗杀……？她回想起，当她刚结婚的时候，发现了这门新的壁画艺术，还去国际宫看里维拉画画。

“奥兰多，他赶我走，因为那天我为我父亲带着孝。”

“你不想念哈拉帕？”

“我有你在身边啊，又会想念什么？”

“你的儿子们，你的母亲。”

“还有那些老姨妈，”劳拉笑了，因为这次奥兰多居然不同寻常地严肃起来，“我想迭戈·里维拉很迷信。”

“是的，那些老姨妈，劳拉……”

他是一个神秘的英雄？是一个谨慎的朋友？还是一个感情用事的孩童？每天早晨劳拉脑海中形成的有关“真正的”奥兰多的所有想像，一到晚上“真正的”奥兰多就将这一切摧毁。他就像个吸血鬼，白天是天使，既朴实善良，又情意绵绵，但当太阳一落山，他就变成一个好斗的恶魔，言语恶毒，目光狰狞。他倒是从未虐待过她，她的脸上还残留着那天晚上胡安·弗朗西斯科把她从出租车里拖出来时那一记热辣辣的耳光。她不能忘记这个，也不能原谅他。一个男人永远不会知道一记耳光对于一个女人的意义，它是没有受到惩罚的胡作非为，是最严重的冒犯，是懦弱的表现，是对任何一个女人对自己脸上所保持的美丽的侵犯……奥兰多从不把她当作是讽刺和讥笑的对象，尽管每到晚上，他就强迫她接受这个白天的奥兰多的对立面。奥兰多对待女

性的身体就像对待自己的身体那样谨慎小心、温柔多情,他对与自己结合在一起的肉体能表现得热情似火同时又奉若神明。

“你准备一下。”他看也不看地对她说,随后抓起了她的胳膊,其决心之大犹如两个进入斗兽场的基督徒。“拥抱你自己,亲爱的,这里可是最大的马戏团。但我没听到狮子的吼叫,只听到牛哞,羊叫,对了,还有狼嚎。前进,罗马人民,我们的女主人来了,你好好地看一看她,那可是卡门·科尔蒂娜。用三个词就可以形容她:喝酒、抽烟、衰老。”

“我亲爱的! 多么高兴又能见到你们……特别是见到你们还在一起。真是奇迹,奇迹……”

“卡门,别抽烟喝酒了,它会使你衰老。”

“奥兰多!”女主人大笑,“要是没有你的话,我们又能干些什么? 你和我的母亲一样,总是对我说些真话……”

这一晚屋外狂风暴雨,屋内一片狼藉。

“想一想你喜欢什么,别期望我会说朋友的好话。”凄凉画画家对穿白西装的批评家说,后者还在喋喋不休地重复着他那句“所有的人都是那么丑陋”的名言。

“这并不是我想要说的,我的朋友都是不可冒犯的。如果他们配得上我的友谊,我也不会让他们受气。谁也不该受到冒犯。”

“极其丑陋。”

“这并不是问题所在。”一个素有“不受歧视的诱惑者”之称的年轻哲学教授插嘴。

“重要的是有个坏名声,这在当今的墨西哥可是一种公共道德。你得叫自己普卢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或安德莱阿·内格瑞特。”安布罗西奥·奥希金斯说,他是个高个金发、神情忧郁的胡塞尔研究专家,他的典型表情就是一脸的不

满，再加上虽然总眯缝着、却炯炯有神的双眼。

“没人能占得了你的便宜。”刚才被提到后复苏了的安德莱阿·内格瑞特说。自从她的最后一部影片《人生是眼泪之谷——但女人比男人要受更多的苦》失败之后，她就到家乡杜兰戈省由她姑母掌管的一家修道院中隐居了一段时间，在那里还住着她的十二个表姐妹。

“我的姑母院长和我的修女表姐妹们都没有发觉，算上我，我们一共有十三个人一起坐在餐厅里吃饭。她们都是善良纯朴的修女，只有我担心得要命，我怕被点心噎着，因为墨西哥最好的餐厅就是我姑母玛丽亚·奥西里亚多拉嬷嬷的修道院。我向你们保证……”

安德莱阿吻着自己交叉的手指。劳拉闭上眼睛，眼前又浮现出“帕潘德拉的美男子”那充满爱意的一刀，她外祖母科西玛·克尔森被砍断的手指，在帽盔里，从断指处汩汩流淌的鲜血……

“没人能占得了你的便宜。”女演员对哲学家说。

“不对，你就可以。”这个有着爱尔兰姓、眉毛僵硬地弯曲着的年轻人回答。

“那么看看我们俩是不是能凑成一对。”安德莱阿微笑着说。

“要凑对，那你还得再长些白头发。”奥希金斯摘下烟斗，“这边、那边，都要再长些白头发。我说的是白头发，不是欲望[①]。”“天呀，你真是绝了，你已经不需要道德了。”

安德莱阿转过身去迎接穿短裤的水手和一头鬈发的童星。他们彼此小小地恐吓了对方一番。

“总有一天，我要拿匕首把你扎得像筛子一样……”

---

① 西班牙语中白发(cana)与欲望(gana)发音相近。

“亲爱的，你知道你有什么毛病吗？你只有一个屁股，却想同时在二十只便盆上拉屎……”

“奥兰多，你看到了吗？你看那个帅哥。”

奥兰多对劳拉的眼光表示赞同，两个人都盯着聚会中这个长相最为出众的小伙子看。

“你注意到了吗？从我们来到这里以后，他就一直在照镜子。”

“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照镜子，可要命的是，有时候我们从镜子里看到的不是自己。你看安德莱阿·内格瑞特，她一个人在那里摆姿势摆了有二十来分钟了，好像大家都在看她一样，其实根本就没有人理她。”

“除了你自己，你谁都看得一清二楚。”劳拉抚摸着情人的下巴。

“这个整天只照镜子的小伙子从不和人搭话……”奥兰多突然挥了一下手，“安德莱阿，你站到那个小伙子身后去。”

“那个阿多尼斯[①]？”

“你认识他？”

“他不和人说话，只照镜子。”

“你站到他后面去，好不好？”

“你说什么？”

“你展现一下你自己。我知道他镜中的人像是谁，这正是他要寻找的东西。我知道他的灵魂。我敢打赌，今晚你会和他同床共枕的。”

“亲爱的，你怂恿我……”

劳拉·里维埃同一个高傲的“正当壮年的”黑皮肤男人

① 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

进了大厅。奥兰多告诉劳拉·迪亚斯，他是百万富翁、政界要人阿尔特米奥·克鲁斯，是另一个劳拉的情人。卡门·科尔蒂娜凑近他俩又轻声说：谁也不明白为什么阿尔特米奥不甩掉他那个外省的农村老婆（对不起，劳拉，我不是指你），那个女人矫揉造作。我的意思是，既然他现在已经有了我们社交圈中最优秀的女人之一……生活可真是一团乱麻！卡门·科尔蒂娜这个瞎子，愤怒得几乎要喊了起来，正如奥兰多所说，每当她情绪低落、百无聊赖之时，她就会这样。

"亲爱的劳拉，"伊丽莎白走过去对她在哈拉帕的舞伴说，"你看谁来了？你看他们是怎样咬耳朵的？阿尔特米奥·克鲁斯又想对俯首帖耳的劳拉·里维埃说些什么？亲爱的，我有个忠告，如果你想征服一个男人，不要说话，只是呼吸，呼吸，稍稍地喘息几下，就这样。我告诉你是因为有几回我听见你说话声音太大。"

"可是伊丽莎白，我已经有个男人了……"

"这有谁知道，你也永远不会知道……我过来不是给你上呼吸课的，而是来告诉你，你继续给我寄你买假发、衣服的账单，千万别太见外。亲爱的，加拉萨这个笨蛋给我留了不少钱，花钱让我开心。我可不想有人说我的朋友让奥兰多·希门内斯养着……"

劳拉苦涩地笑着，问伊丽莎白，"为什么你要侮辱我？"

"我侮辱你？侮辱我的老朋友？天哪？"

伊丽莎白擦了擦流向她那对硕大的乳房间的汗。

"那好吧，至少你让我羞愧万分。"

"你千万别这么想。"

"我已经说过我会还你钱的，你知道我现在的处境。"

"我们期待着下一场革命吧，我亲爱的，看看你的丈夫

那时是不是会更好些,成为塔巴斯科的议员?别逗我了,这是个馋鬼和喝特帕切酒的酒鬼的国家,不是付账的先生们的国家。"

劳拉转过身去,背对着伊丽莎白,她抓住奥兰多的手,想要赶快逃走。奥兰多微笑着抚摸劳拉的手。

"你不想和那个可怕的阿尔特米奥·克鲁斯在电梯里碰上吧?他们说他可是条鲨鱼。不过,亲爱的,你只有我才会啃你。"

"你看哪,他是个多么骄傲的家伙啊,他居然把劳拉晾在一边。"

"我告诉过你,他是条鲨鱼,鲨鱼得不停地游动,只要一停下来,它就会沉到水底死去。"

两个劳拉互相吸引着,两个劳拉都一脸悲哀,"都已经那么优越了,还有什么可悲伤的呢?"奥兰多喃喃自语,然后去为她们找杯子。

"为什么我们要忍受这种社交生活?"那个金发女郎没头没脑地问上一句。

"我想是因为害怕。"劳拉·迪亚斯回答。

"害怕说话,害怕说出真相,还是害怕别人在背后笑我们?你发现了吗?这里的每一个人肚子里都装满了笑话。这是他们在这场比赛中用以保护他们的利剑,比赛的奖品就是荣誉、金钱、美女,尤其是可以觉得自己比其他人都要聪明。你喜欢这样吗,劳拉·迪亚斯?"

劳拉使劲地摇摇头说:"不!"

"那你得赶紧把自己解脱出来。"

"……?"

"我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我已经被俘虏了,我的身体已经被陈规陋习束缚住了。但我向你发誓,如果可以的

话，我会从我自己的躯体中逃脱出来——我憎恨我的身体。”劳拉·里维埃发出一声听不见的呻吟，“你知道这一切会通往哪里？通往一种永远残酷的道德准则，它让你最后憎恨你自己。”

“瞧，”奥兰多双手端着三杯曼哈顿酒走了过来，“他们选出了最伟大的女演员和最伟大的自恋者，我说的没错，著名的女人是被无知的男人造就的。”

“不对，”里维埃接过杯子，“是被谴责我们过于戏剧化的坏男人造就的。”

“亲爱的，”卡门·科尔蒂娜打断了她们的谈话，“我为你们介绍一下凯鲁比纳·德·兰达小姐，好吗？”

“没有人叫凯鲁比纳·德·兰达，”奥兰多对卡门，对空气，对夜晚，对这位姗姗而来、挽着花花公子哲学家的胳膊、自称为凯鲁比纳·德·兰达的小姐说道，他顺带还拆穿了哲学家的西洋镜。

“怪不得大家叫你‘大盲流’。”

“我亲爱的文盲奥兰多，关于名字，没有人比柏拉图说得更好了：有习惯的名字，有与东西相关的名字，有与自然和需要相和谐的名字。比方说劳拉·里维埃和劳拉·迪亚斯。晚上好。”

奥希金斯向他的同伴鞠了个躬，然后往这个名字通俗、自然、和谐的凯鲁比纳·德·兰达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说：“让我们来做爱。”

“我敢说她叫佩特拉·佩雷斯。”热心的女主人说道。随后她向刚刚走进面向改革大街的大厅的一对不同寻常的夫妻——一位老先生挽着他那抖个不停的太太——跑去，同他们打招呼。

劳拉·迪亚斯的高跟鞋敲在街边的下水道上丁当作响，

她微笑着挽着奥兰多的胳膊，对他说，他们俩在维拉克鲁斯的庄园里相识，又在改革大街的一幢房子中告别，每一次分分合合的原则和意志都是相仿的：都是被社会和它的女皇肯定或否定：在圣卡耶塔诺是堂娜赫诺薇娃·德尚，在墨西哥城是卡门·科尔蒂娜。

“我们不能逃走吗？我们在一起已经有十八个月了，亲爱的。”

“和你在一起，时间过得不知不觉。”已不再年轻而且还脱了发的奥兰多说。

“为什么你不戴礼帽？你是惟一的一个不戴帽子的。”

“就是为了这个，成为独一无二的一个。”

他俩在这个12月的寒冷夜晚中沿着大街的树阴走着。这条土路是为早起的骑手们准备的。

“我对你还是一无所知。”劳拉抓紧了他的手，这才敢问他。

“我从未对你隐瞒过任何事情。只是你不注意那些你不想知道的事罢了。”

“奥兰多，一晚又一晚，就像今晚一样，我们听到的尽是些既成事实的意料之中的话……”

“你说得不准确。是意料之外的话。”

“你知道吗？我刚刚发现，在你带我进入的这个圈子里，我们俩是如何结束关系的，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今天晚上对我来说很有意义。他们眼中最重要的是劳拉·里维埃和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你已经看到了，他一走，这一夜也就完了，这才是今晚最重要的事。”

“让我来宽慰你几句。你说的的确有道理：我们俩怎么分手，这并不重要。好在我们不知不觉中一切都结束了。”

“亲爱的，我觉得我正从一架晃动的梯子上往下

掉……"

奥兰多挥手招了一辆出租汽车,给劳拉留了一个陌生的地址。司机惊讶地看着这一对。

"真的吗? 您确定?"

1932年的墨西哥城,街道很早就空荡荡的了。家庭聚餐都有固定的时间表,一家人聚在一起,十分团结,就像是漫长的内战——整整二十年的战乱——教会这些家族要时刻小心,兄弟同心,等待着不幸、失业、征兵、枪毙、抢劫、强暴、骤然间消失的积蓄、不能使用的纸币、叛军一张张自大的脸。一个旧的社会已经消失,而新社会的轮廓还不明晰。正如法国后拿破仑时代的缪塞所说的那样,那些城里人一只脚踏在沟里,另一只脚踏在灰里。更糟糕的是有时血把沟和灰全淹没了,永远地抹平了这块荒芜的土地上的界线,扼杀了为了结果必先死亡的种子。

著名的瞎子卡门·科尔蒂娜举办的晚会是一些社会精英的安慰,他们是这个社会的主角:种子和灰烬,其中有那些从革命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人,有依赖革命生活的人,还有那些莫名其妙死于革命的人。卡门的晚会是一个特例,一件稀罕事,体面的人家早早地互相拜访,也早早地相互联姻,让这个新的革命社会从放大镜和过滤器中匆匆而过……如果一个索诺拉的野蛮将军同一位西纳罗的美丽小姐结婚,他们的父母和亲戚就会从古利阿坎赶来表示赞成或不赞成。奥夫雷贡将军一家没有对结婚的社会奢求,这个塞拉亚的独臂人本该留在他瓦塔邦伯的庄园里养火鸡,比谋求连选而被暗杀强多了。卡列斯正相反,喜欢把他们家的女儿在楚鲁布斯科的乡村俱乐部中介绍出去,然后让她们全都在教堂里结婚,虽然是私人仪式,但一个也不落下。但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是霍阿金·阿马罗将军,他是

革命领袖之一，是一位印第安骑士，一位举世无双的勇士，乌木般的脚，性感挑逗的厚嘴唇，迷失在部落的源头之中的目光，他与一位北方上流社会的小姐结了婚，她送给这位将军的结婚礼物是强迫他学会了法语和文雅的举止。

那里总有寻欢作乐的小伙子，虽然他们现在已经没钱去国外学习，只能去圣伊尔德方索的法学院或圣多明各的医学院，穷一点的去职业技校，再穷一点的学建筑：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古老的市中心。而百姓们默默无闻地一天又一天地苟延残喘下去，墨西哥仍然是一个戴草帽穿草鞋的乡下佬的城市，是一个工装和披巾的城市。这就是我丈夫胡安·弗朗西斯科带我去参观贫民区时教会我的一切，他还让我认识到，这些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我还是留在家里照顾孩子们为妙。

“你的丈夫什么也没有教会你。”奥兰多·希门内斯异常用力地抓住了劳拉的胳膊，强迫她下到一片乱七八糟的工地中，这是一次激烈的冲突，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这些是街道，那些是房屋，然而这里是城市中的荒漠，是布满尘土的断垣残壁，它如同一座废墟，孕育成一座沙土的金字塔，修葺未半，轮廓模糊，依稀难辨，莫可名状。他们行进在这个灰蒙蒙的神秘之城中，奥兰多牵着劳拉的手，就像是维吉尔牵着贝阿特丽兹的手，而不是但丁的手，拉着另一个劳拉的手，而不是彼特拉克的手①；他强迫她看啊，看啊；你看他们从地坑中爬出来，从垃圾堆里冒出来。告诉我，你能为这个叫作青蛙的只能用干瘪的大腿根蹦来蹦去的女人做些什

① 在但丁的《神曲》中，维吉尔带领但丁周游地狱、炼狱；而但丁理想中的情人贝阿特丽兹带他访问天堂。彼特拉克（1303—1374），意大利学者、诗人，他的情人也叫劳拉。

么？你看看她，她只能像青蛙那样跳着，在垃圾堆中找些可以吃的东西。你能做些什么？你看看他，你能为这个既没有鼻子，也没有四肢的，一天到晚像条蛇一样在街上蠕动的男人做些什么？你现在能看到他们，那是因为只有在晚上，只有在黑暗中，他们才会出现，因为他们害怕阳光，因为他们被恐惧阻隔在日光之外，因为他们害怕被人看见。他们是什么？劳拉，好好看看他们，他们是侏儒，是再也长不大的孩子，还是僵死了的孩子？他们虽然站着，却已有半截被埋在了尘土里。劳拉，告诉我，你的丈夫教你这些了吗？他只给你展示贫穷的美丽一面：那些穿衬衫的工人、扑满香粉的妓女、手摇风琴艺人和锁匠，卖玉米粽子的和皮匠。这就是他的工人阶级？你想要反抗你的丈夫，你憎恨他，因为他不给你为他人服务的机会，他轻视了你？那么现在我给你这个机会，我扶住你的双肩，劳拉，我命令你睁开双眼，不妨问问你自己，劳拉，你能对这些做什么？为什么我们不在这里度过我们的良宵，和害怕阳光的青蛙、人蛇以及不再长大的孩子们在一起，却去了卡门·科尔蒂娜那里，与凯鲁比纳·德·兰达和纳尔贡·德·巴耶以及那个阴部被画成白色的女演员在一起，这是为什么？

劳拉·迪亚斯死死地抱住奥兰多，迸出了抑制已久的眼泪，她说，从她出生起，从她第一次失去她的亲人开始，她就问自己，为什么我爱的人要死去，为什么他们要来到这个人世……

"能做什么呢？他们有成千上万，也许胡安·弗朗西斯科说得对，你该从哪里入手？又能为这些人做些什么呢？"

"你告诉我。"

"从他们中间挑选出一个最可怜的，只要挑一个就够了，劳拉，挑一个就可以救所有的人。"

劳拉从回家,也就是回哈拉帕的火车车窗中远眺晒得滚烫的高原。她的家远离那座沙土金字塔,那里的人们像毛虫、蟑螂、螃蟹一样地在无影无形的崎岖不平的人生道路上行进,每到夜晚,青蛙女人、人蛇和饥饿的孩子就从这条崎岖山路的坑坑洼洼中露出头来。

直到那天晚上,她才真正地相信这世上有贫穷存在。我们一直生活在保护伞下,只能看到我们想看到的东西。劳拉对奥兰多这样说。而现在,在前往哈拉帕的路上,她自己也产生了要求被人同情的强烈愿望:她感受到一种需要获得怜悯的焦虑。她知道她所要的,所要的同情,就是住在黑嘴大街的一家对她的期望:对她们给予一点点的同情;对被遗忘的人——母亲、姨妈和孩子们——一点点的关注,这样就可以不用对他们说明真相,可以让他们仍然沉浸在原来的幻想之中:让圣地亚哥和丹东在这个外省的城市中得到精心看护、茁壮成长,而让劳拉和胡安·弗朗西斯科在墨西哥城,在这个从沟壑、灰烬和革命的鲜血中浮升出来的艰难国度里继续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事业……只有玛丽亚·德·拉奥姨妈了解事情的底细,但她知道谨慎是避免伤害的真理。

四姐妹正坐在当年从维拉克鲁斯港拖回来的柳条背的旧椅子上。为劳拉开门的是黑人桑帕亚,他是第一个让劳拉大吃一惊的人:这个昔日欢快的舞蹈家现在已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而当年用来跳“如果她答应,搂上佳人腰”的扫帚,如今也成了这个家中老佣的拐杖。劳拉把手指放在嘴唇边做了个禁声的动作,将老黑人的一句“乖乖劳拉”生生地打断。他接过劳拉的行李,尽管已快力不从心了,可为了他的自尊,劳拉也就随他这样做了。

劳拉想的是她可以从客厅的门先看到她们,而不是让

她们先看见她。四姐妹静静地坐在垂落的布帘之后：希尔达姨妈紧张地抖动着她那得了关节炎的手指，仿佛正在弹着一架无声的钢琴；维尔希尼亚姨妈喃喃地念着诗，却已无力把它记录下来；玛丽亚·德·拉奥姨妈出神地盯着自己肥胖的脚踝；只有雷特西亚，她的妈妈，正在编织一件上衣，她一面织，一面把上衣盖住自己的膝盖，以抵挡哈拉帕 12 月的寒气；这时候，佩罗特山的冬雾和湖泊、山泉和小溪的雾气一起在这片处于山峦和大海间的肥沃的亚热带地区会师。

雷特西亚刚刚抬眼要审视一下手中的成品，就看见了劳拉，她大喊一声女儿，我的女儿，就艰难地站起来要和奔跑过来的劳拉拥抱。你别动，妈，你别累着了，谁也别站起来，拜托，谁也别站起来。希尔达姨妈下巴上的赘肉还让她难以呼吸吗？她那墙一样厚的镜片之后的老花眼还在折磨着她吗？维尔希尼亚姨妈是不是去掉了那层面具？她那张用米粉敷出来的脸，已不再是用粉遮盖的皱褶，而是满是皱褶的粉。在没铺地毯并清扫干净的石砖地板上，玛丽亚·德·拉奥姨妈仅靠她那两只肿大的脚踝是否还能站得住？

但雷特西亚却站起来了，站得像一枝箭那么笔直，站得像她家的墙壁那么挺拔。她的家，她的。劳拉的母亲的态度就足以表明：这家是我的，是我使这个家里保持干净整齐、简朴生动而又丰衣足食。在这个家里什么都不缺。

“你需要我们，女儿，你需要你的孩子们。”

劳拉拥抱她，吻她，一句话也不说。她绝对不会去提醒母亲，她们母女俩曾居住在卡特马哥，与父亲费尔南多以及兄弟圣地亚哥分居长达十二年之久。往事总是会在当下被重新提起。昨天的现在，不等于今天的过去。卡门·科尔蒂娜举办的那些晚会中的一幕幕场景急速地从劳拉眼前掠

过,就像是火车站边那些放任的野狗狂奔而过。也许这群野狗在偷偷地羡慕火车头的疾驰,也许卡门请来的客人也是一群流浪的野狗。

“孩子们在学校呢。他们已经不迟到了。”

“他们的学习怎么样?”

“当然是和拉莫斯小姐在一起。”

她想说,天哪,她们还活着呀!但这也许是另外一次失误,正如卡门·科尔蒂娜说的,是一个错误,她的世界现在已经消失在这个无形的遥远的非现实之中。劳拉暗自偷笑,这就是她和奥兰多·希门内斯一年半以来共浴爱河的那个日常世界,或者说是两个人的夜间生活。

劳拉和奥兰多。在哈拉帕的家里、在维拉克鲁斯、在对兄弟圣地亚哥的回忆中,她发现这一对名字听起来的感觉完全不同了。她想着这些,突然惊诧地察觉,她的兄弟在二十一岁时就被枪决了;而眼前的小圣地亚哥只有十二岁,正背着书包走进客厅,表情严肃得就像是肖像画上的大人。他一开口就说:

“丹东被罚了,还留在那里。他得抄写整整二十页不带一丁点儿墨迹的作业。”

拉莫斯小姐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但圣地亚哥已经有四年没见过他的妈妈了。他立即就认出了面前这个女人,但他没有上前去拥抱她,而是等她过来弯腰亲吻他。孩子仍是面无表情,劳拉求救似的看着家里的其他女人。

“圣地亚哥就是这个样子,”雷特西亚妈妈说,“我从未见过比他更一本正经的孩子。”

“我可以走了吗?我还有许多作业要做。”

他吻了吻她的手——是谁教会他这个的?是拉莫斯小姐,还是出于他与生俱来的礼貌或是出于对劳拉的疏

远？——他蹦蹦跳跳地出去了。劳拉很欣慰看到儿子这个天真无邪的动作：尽管她的儿子讲话的口气像个法官，但他是蹦跳着出来进去的。

晚饭既漫长又费劲。丹东差使一个女佣回来说，他今晚要在一个朋友家睡。劳拉不想做出一副解放了的都市女性的样子，也不想打扰姨妈们由于夜晚失眠而导致的间歇的午睡，更不想搅乱母亲各种繁琐迫切的活动，因为只有雷特西亚在做饭、奔波、为众人服务，而黑人桑帕亚只是在院子里哼着小曲。由于很少有人说话，一种奇特的气息，一种宾客之家特有的气息在所有的地方弥漫开来：这是一种在孤寂的夜晚，客人匆匆拜访时在角落里留下的死亡的芬芳。尽管妈妈在这些角落里下了不少的功夫，黑人也时时挥舞他的扫帚，但在这里还是堆积起灰尘、岁月和遗忘。

虽然时不时有一两个客人会在这里逗留个把礼拜，以维持宾客之家艰难的时日，虽然还兼有劳拉帮着照顾孩子们，但这段时间宾客之家却依然没有什么客人。劳拉听着母亲讲话，她越来越焦躁不安，急切地想要和母亲单独待在一起，和她的母亲雷特西亚待在一起。同时，她也想和家中的每个独身女人待在一起，好打破那死气沉沉的永恒不变的午睡习惯。但这种想法不仅仅是对她们的一种侵犯，对劳拉来说也很虚伪。因为在伊丽莎白家寄人篱下的那段日子中，她把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议员胡安·弗朗西斯科的薪水分成了好几个部分，一部分还给伊丽莎白，一部分个人支出，还有一小部分算是偿付寄养在哈拉帕的孩子们的生活费。在那段日子里，劳拉晚上不到凌晨三点不睡，第二天睡到中午十二点才起床。她睡得很死，丝毫听不到在更早的时候奥兰多已经起了床，出门从事他那神秘的工作。劳拉躺在床上看书，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她并没有浪费时

间，她在自我教育，在读她以前从未读过的书。她在发现了卡洛斯·佩耶塞的诗歌之后，又读了聂鲁达、洛尔加、克维多和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的诗……还同奥兰多去美术馆听卡洛斯·查韦斯指挥演奏，这都是她从前闻所未闻的，因为在她的脑际向来只回荡着卡特马哥的希尔达姨妈弹奏的淡雅的肖邦音乐，而现在他们站在巴赫、贝多芬、柏辽兹、庞塞、雷武埃尔塔斯[①]和维拉洛博斯[②]广阔的音乐天地之中。没有，她没有在卡门·科尔蒂娜的晚会上浪费时间。每当她念完一本书或听了一场音乐会的时候，她就有意识地——她对自己说——让思维的触角伸向心灵的深处，在这个世界里给自己找个位置，考虑清楚发生于身边的每个变故，树立起更坚定、更可靠的生活目标，而不是那种轻而易举、唾手可得的——她现在觉得，这就像重新回到少女时睡过的床上，抱着娃娃李白——和胡安·弗朗西斯科共度的夫妻生活甚至是与奥兰多一起放浪形骸的生活，她要找的是一种对她的孩子圣地亚哥和丹东更为有利的生活，她要成为一个更成熟、更自信的母亲……

现在她又回到了家里，这是她所能做的最好的选择，叶落归根。她可以安安静静地坐在堂安东尼奥·C.巴埃兹的酒吧里喝泡沫红茶，老板正向客人们保证：这家店从不往水中加糖精；或是观赏奥耶维尔兄弟家壁橱中陈列的各种“歌剧”牌胸衣；或是坐在堂拉乌尔·巴萨涅兹的现代书屋中翻阅欧洲画报，她的家里也保存了许多类似的画报，是从前她父亲费尔南多·迪亚斯每个月从维拉克鲁斯码头上运回来的。她走进胡亚雷斯公园前的瓦格纳和列文专卖店为她的

---

① 雷武埃尔塔斯(1899—1940)，墨西哥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
② 维拉洛博斯(1887—1959)，巴西作曲家。

希尔达姨妈买莫里斯·拉威尔的乐谱,她曾与奥兰多在美术馆卡洛斯·查韦斯的音乐会上听到过,可能希尔达姨妈从未听过。

她们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那样继续生活。这是她们的力量源泉。她们永远生活在莱茵州的达姆斯塔特出生的咖啡园主堂费利佩·克尔森的庇护之下。她们在餐桌上小心地挪动着手,仿佛餐具都是些银器,而不是锡器;是瓷盘,而不是陶盘;是亚麻桌布,而不是粗毛桌布。这其中蕴含着一个她们不愿意放弃的具体含义。每个女人都有一块自己的亚麻餐巾,它被小心地卷叠起来,并用一个银环保护,银环上精美地镂刻出每个人的首写字母:或是一个 V,或是一个 H,或是一个 M,或是一个 L[①]。这是每个人就座时必然会先拿在手里的东西。这是家族的骄傲、救星和徽标。这代表了克尔森家的门第,凭借它可以傲然对抗自己的丈夫、离群索居的生活和亲人死去的局面。餐巾上的银环是对她们所有人和每个人的人格、传统和回忆的肯定。

用着银环和折叠起来的上了浆的干净餐巾,大家在餐桌上表现得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劳拉怀着一种要捕获她们——这些不安的要逃逸出劳拉的时代和她们自己的时代的鸟儿——的感觉分别地去寻找她们内心的自我……维尔希尼亚和希尔达表现得要比她们真正知道的多。一旦弹钢琴的希尔达姨妈又一次地开始抱怨当年她的父亲费利佩·克尔森不允许她留在德国继续学习音乐,劳拉就可以套出她内心压抑已久的幽怨:我是一个老处女,劳拉,一个无药可救的老处女。你知道这是因为什么?我轻率地相信,只要我扑灭男人的希望,他们就会越

---

① 分别是四姐妹的名字首字母。

发地爱我。在特拉科塔勒班的圣烛节晚会上,有多少人围着我转哪!你的父母就是在那里认识的,你还记得吗?我却因为骄傲,竭力地让我的追求者明白,我是不可接近的。

“对不起,里卡多,下个礼拜天我要回德国学弹钢琴。”

“赫利贝尔多,你十分温存,但是我在德国已经有男朋友了。我们天天通信。总有一天,不是他过来找我,就是我过去找他……”

“并不是你不讨人喜欢,阿尔贝托,只是你配不上我。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吻我,但这是告别的吻。”

下一次圣烛节晚会时,她还是孤身一人,里卡多开始讽刺她,赫利贝尔多带来了当地的女朋友,阿尔贝托已经结婚了……希尔达姨妈海水般的蓝眼睛里溢出了眼泪,泪水在厚厚的有如通往佩罗特的公路那样污浊不堪的镜片后直打转。她最后总是这么劝导劳拉:劳拉,别忘了老人们。年轻人往往没有同情心,会忘记其他人……

维尔希尼亚姨妈不得不在院子里散步,她已经无法上街了,因为她有老年人普遍的恐惧心理:害怕摔跤,要是摔断了一条腿,那就会有不到灵魂升天那天再也站不起来的可能。她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涂脂抹粉,直到她觉得收拾利索之后,才会到院子里转上几圈,用听不见的声音念叨自己的或是别人的诗,这就不得而知了。

“维尔希尼亚姨妈,我陪你走走,好吗?”

“别,别陪我。”

“为什么?”

“你是因为同情我才这么做的,我不允许你这样。”

“不是的,我纯粹是出于亲热才这样做的。”

“你可别让我养成被人同情的习惯。我总是担心在这个家里我会最后一个死去,孤独地死去。到那个时候,如果

我给在墨西哥的你打电话，你会过来陪我，免得我孤独地死去吗？"

"我一定会的，我向你保证。"

"胡说，到时候，你就实现不了你的承诺了。你住得那么远，说不定还在和别人跳着狐步舞，那里会管我是死是活。"

"维尔希尼亚姨妈，我向你起誓。"

"不要随便起誓，你这个亵渎神灵的家伙。如果你不能好好照顾你的孩子，你又为什么要生下他们？难道你从未保证过要照顾好他们？"

"生活是艰难的，姨妈，有时候……"

"瞎扯，难的是去爱别人，爱一个人。你明白吗？而不是抛弃他，强迫他在临终之前去乞讨那一丁点儿的怜悯。"

她停下不说了，用一双被厚厚的脂粉衬托得更为明亮的钻石般的黑眼睛看着劳拉。

"你从未试过让巴斯贡塞罗斯部长出版我的诗。你就是这样来实现你的诺言的，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除了我自己，没有谁会在我死之前念诵我的诗。"

她猛地转过身，背对着她的外甥女。

劳拉对玛丽亚·德·拉奥讲述了她和维尔希尼亚姨妈之间的对话。姨妈仅仅对她说：同情，孩子，给那些既没有人爱也没有人尊重的老人多一点同情。

"你是惟一一个知道真相的人，姨妈，告诉我，我该怎么做？"

"让我想一想，我可不想管闲事。"

她看着自己臃肿的脚踝，爆发出一阵大笑。

每到晚上，劳拉就感到心痛和害怕。她睡不着觉，只好独自在庭院里散步，就和维尔希尼亚姨妈在白天做的一样，

只是她光着脚,生怕惊动了已经睡着了的四姐妹,或是打断了她们房中传出的由对往事的回忆引起的不自觉的尖叫和哭泣……

谁会是第一个过世的,谁又会是最后一个?劳拉暗暗起誓,不管她身处何地,她都会负责起最后的那一个,要么带上她和自己一起生活,要么过来陪伴她,绝不能让维尔希尼亚姨妈的结论"我担心我会最后一个死,在这个家里孤独地死去"成为现实。

这个夜色沉沉的庭院中弥漫着四位老人的梦魇。

劳拉很不情愿把她的母亲雷特西亚加入到这个害怕死亡的队伍中去。她责备自己,因为如果四姐妹中只能有一个活到最后的话,她希望是她的妈妈或是玛丽亚·德·拉奥姨妈。维尔希尼亚姨妈和希尔达姨妈已经变得有些疯疯癫癫,不可理喻了,而且劳拉坚信她们俩至今还是处女。但玛丽亚·德·拉奥姨妈不是。

"我的母亲从我十一岁起就逼我和她的客人睡觉……"

当玛丽亚·德·拉奥姨妈承认这个事实的时候,劳拉既没有感到震惊,也没有产生怜悯。她知道这位慷慨热情的混血女人说起这些只是为了让劳拉明白,她这个费利佩·克尔森外公的私生女有多么感激外婆科西玛·莱特纯朴的人道主义精神——她本人也具备了这一美德,尽管她与外婆的年龄、阶级以及门第相差甚远——以及劳拉的父亲费尔南多·迪亚斯的宽宏大量。

多年以前,当玛丽亚·德·拉奥姨妈在索诺拉大街向劳拉吐露这一切的时候,劳拉想要上前拥抱亲吻她,但玛丽亚·德·拉奥伸手阻止了劳拉。她并不想乞求怜悯,因此劳拉只是亲吻了一下她摊开的手掌。

但愿是雷特西亚活到最后。自从劳拉回家以后,她就

衷心希望是她的妈妈能够活到最后。因为她从不抱怨，也不为困难所压倒，是她承担起了这个宾客之家的清洁和整理工作。劳拉想，如果没有她，其他三姐妹就会孤立无援，像孤魂野鬼似的在走廊里逛来逛去，留下厨房里一大堆脏盘子没有人清洗，任凭野草在庭院中疯长、食柜中空无一物、猫随意出入、还有营营成群的绿头苍蝇扑头盖面地落在睡着了的维尔希尼亚、希尔达、玛丽亚·德·拉奥和雷特西亚的脸上。

"是的，我们所有的人将来都有可能落到孤立无助的下场。"一天下午，当劳拉在帮雷特西亚洗碗碟的时候，雷特西亚十分高兴劳拉能回到自己的家，她沉默了片刻，忽然没头没脑地冒出这么一句。

"妈妈，我很怀念我的童年，特别是我当时的想法。你为什么会留下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为什么会自己保存下来：比方说一个房间、一只衣架、一个水罐以及那两幅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保留下来的画着孩子和狗的可怕之极的画……"

"没什么东西可以像它那样唤起我对你父亲的回忆。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并非如此……"

"他究竟是流里流气，还是很有绘画天赋？[①]"劳拉笑着问。

"这并不要紧，只要这些东西和他有关系就行了。我每次坐下来吃东西的时候，总能看到他躺在床头，那两幅画就在他的脑袋后面。"

"你俩相爱吗？"

"我们非常相爱，劳拉。"

---

① 劳拉在做文字游戏，在西语中"下流，狡诈"为 pícaro，而"绘画的"为 pictórico，二者有形似之处。

她又牵起女儿的手，问女儿是否相信过去判定了所有的人都要死亡。

“你总有一天会看到过去对于继续生活下去以及相爱的人继续相爱下去有多么重要。”

虽然劳拉已经重新拾起对往昔的回忆，但她却无法与两个儿子建立起真正的母子关系。圣地亚哥是个不折不扣的小绅士，彬彬有礼，过分严肃。而丹东却是个小恶魔，从不把他的母亲当回事，好像她不过是这个没有苏丹的王国之中的又一位姨妈。劳拉不知道如何和他们交谈，也不知道如何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她觉得这全是她的错，是她，而不是她的儿子内心缺乏足够的激情。

更准确地说，丹东，她的小儿子，在他十一岁的时候，就把自己当成了苏丹，家里的王子，无需尝试就敢肆意妄为，提出各种非分的要求，并且轻而易举就能得到四个女人的许可。她们几乎是害怕地看着他，而满怀爱意地看着圣地亚哥。丹东对他的外祖母和姨婆们在他面前那种畏畏缩缩的态度似乎很是得意，尽管有一次，玛丽亚·德·拉奥说过，这孩子就欠顿揍。还有一次，丹东宣布他将不回去睡觉的话音还未落，雷特西亚就给了他一顿好打。孩子恨恨地回嘴，他永远都不会忘记这次侮辱。

“我没有侮辱你，小傻瓜，我只是打了你一顿屁股。侮辱是我用来对付大人物的，小子。”

这是劳拉惟一一次见到她母亲动武，这一下，缺乏权威的所有不足之处立即就显示了出来，仿佛应该是劳拉去挨她母亲的那顿板子，因为是她没有管教好她那个叛逆的儿子。

圣地亚哥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表情依然严峻。好几次，他对弟弟既不满又无奈，却只能在内心发出一声叹息。

劳拉想召集他们一同出去散步或游玩，但两个孩子都在顽固地做着抵抗。他们倒没有出言不恭，也并不拒绝劳拉的亲近，只是他们之间互相排斥，好像分属两个敌对的派别。劳拉记起在战争年代，家里也因为分成盟军派和德军派而争论不休，但现在的情况和那时截然不同，现在是性情与个性的冲突。大儿子圣地亚哥像谁，小儿子丹东又像谁呢？（应该把他们的名字掉个个儿，大的叫丹东，而小的叫圣地亚哥。圣地亚哥第二会像他那个刚满二十岁就被枪毙了的舅舅吗？丹东会像他的父亲——一个野心勃勃的男人吗？只是儿子会更加坚强，而不像他的父亲那样软弱。胡安·弗朗西斯科是个懦弱的野心家，一点小恩小惠就可以让他心满意足。）

劳拉不知道如何和他们交谈，也不知道如何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她觉得这全是她的错，是她，而不是她的儿子们的内心缺乏足够的激情。

“我向你保证，妈妈。”她向雷特西亚告别时说，“我会安排好我的生活，让孩子们回到我们的身边。”

劳拉强调了“我们”两个字，雷特西亚假装吃惊地皱了皱眉，仿佛在无声地责备她的女儿虚伪地说了“我们”这两个字，她暗示，“我和你父亲在这件事上有所不同，我们忍受分居是因为我们相爱……”。但是劳拉在重复“我们，胡安·弗朗西斯科和我”时，突然产生一种突如其来的强烈预感。

当她踏上回墨西哥的火车，她知道自己撒了谎，她要找的是一种没有胡安·弗朗西斯科存在的新生活，虽然和丈夫重归于好是最方便的出路，但对孩子们来说却是最坏的结果。

她摇下了车窗，看见他们并排坐在那辆“伊索塔-弗拉斯基尼”车里。哈维尔·伊卡萨尽管现在已无所作为，却仍

然举止得体,是他赐予胡安·弗朗西斯科和劳拉这桩婚姻。同样年老体衰的四姐妹和他坐在一起。四姐妹现在极少出门,任凭黑人桑帕亚带着孩子们外出郊游,出尽风头。劳拉看到四姐妹坐在那里,她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同孩子们赶到这里和她告别。丹东不看劳拉,只用嘴和鼻子发声,可笑地模仿着火车开动的声音。圣地亚哥的眼神让她难以忘怀,那是他灵魂的写照。

火车起动了,劳拉突然烦躁起来。在哈拉帕的家里不只有四个女人,还有李白,她居然忘了李白!那个中国娃娃被放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她从没有去找过它,从没有想到过它?她想叫喊,她想询问,但火车已渐渐离去,那几块手绢还在挥舞告别。

“你想让一个工人领袖把一辆欧洲豪华轿车停在自家的车库里吗?忘了它吧,劳拉。把它留给你的母亲和姨妈吧!”

第十章　底特律:1932 年

劳拉从哈拉帕回到瑞吉斯饭店后,在总台上收到了奥兰多的留条,是给她留的。

劳拉,亲爱的,我既不是我说的那样,也不是我看上去的那样,我想要保守自己的秘密,而你又太过于接近这个秘密了。

你的奥兰多

又及:如果我们之间没有了这个秘密,我们的爱也就失去了生趣。我永远爱你……

饭店的服务生告诉她,不用急着退房,因为科尔蒂娜太太已经预付了下周的房钱。

“是的,是堂娜卡门·科尔蒂娜太太付的钱。是她支付您和您的朋友奥兰多先生的房间费用。三年以来,一直是她在替奥兰多先生付钱。”

他是谁的朋友？她差点要问出这个愚蠢的问题。是哪种意义上的朋友？他是劳拉的朋友,还是卡门的朋友？他是其中一个的情人,还是脚踩两只船？

现在,在底特律,她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种可怕的无所依靠的感觉,那种想被人同情的迫切愿望。“这是我的被同情饥渴症。”她对于获得怜悯的渴望,使得她下意识的反应,如

同一直萦绕着她的悲痛一样地强烈的反应就是到考约坎的迭戈·里维拉家里去，对他说，我来了，你还记得我吗？我现在需要一份工作，需要一个容身的地方。大师，请留下我吧。

“哦，你是那个穿一身黑的小女人吧。”

“对，所以我这回还是穿着黑衣服，你记得我了吗？”

“你这一次又把我吓得够戗。先让弗里达借你几件鲜艳的衣服，然后我们再谈。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与众不同，美丽非凡。”

“我也有同感。”劳拉的背后传来了银铃般的声音，弗里达·卡罗浑身上下佩戴着项链、徽章、指环丁丁当当地走了进来。她每根手指上都戴着戒指，有的甚至带了两个。劳拉看着这个不寻常的女人——她双眉相连，一头黑发用羊毛线扎起来，还穿着宽大的村妇式的裙子——走进画室，立刻就想起了外祖母科西玛·克尔森的往事。她不禁自问，也许当年“帕潘德拉的美男子”把外祖母的戒指都抢了下来正是为了献给他的情人弗里达。劳拉觉得出现在她面前的里维拉夫人就是那位变化女神。劳拉和外祖父费利佩·克尔森一起，在维拉克鲁斯的丛林中发现了萨波塔尔文化之神的雕像，她的外祖父费利佩·克尔森想要打破这个神话，就将雕像说成是木棉，好阻止外孙女继续沉湎于幻想之中……这是一尊精美的女性塑像，目光注视着无尽的永恒，她脊背挺直，腰间缠绕着蜗牛和长蛇盘旋的皮带，头戴一顶被森林染成青色的王冠，胳膊、鼻子和耳朵上装饰着链圈、指环和耳环……不管外祖父怎么说，木棉实际上比女人要危险得多。它遍身长刺，连碰都不能碰，更不用说是拥抱了。

弗里达·卡罗莫非是某个土著女神的化名，她又转世为人，四处现身，和游击队员、强盗以及艺术家做爱吗？

“你就跟着我工作吧。”弗里达一面盛气凌人地说道，一面走下画室的楼梯，她的目光始终不离里维拉鼓出的双眼和劳拉发黑的眼圈，此时劳拉看看弗里达，又看看自己，她看到劳拉·迪亚斯正在观察劳拉·迪亚斯，她看到自己在变化，她迁徙变化的新个性在熟悉的面貌之中孕育成长，或许劳拉差不多忘了自己的长相，她那雕塑般瘦削硬朗的脸，挺拔修长的鼻子，越来越忧郁的眼睛衬着一头鬈发，耳朵好像无定的湖泊在苍白的面颊边被止住，薄薄的嘴唇上抹着淡淡的口红。现在的劳拉表情更加严峻，她整个人仿佛正好是弗里达的对立面：劳拉是种哥特式的庄严，而迭戈·里维拉的女人代表了几近枯萎却仍在不断漫延的植物旺盛的生命力。

“就跟着我工作吧。在底特律，我需要一个帮手。你知道，当你工作的时候，我就可以……”

她一脚踩了个空，摔了下来；劳拉跑过去搀扶她。她搀住了弗里达的胳膊，却不小心碰到了她的大腿。您受伤了吗？劳拉摸到的是一条干瘪无肉的腿，弗里达当下的一个含有敌意又显出脆弱的动作也弥补或证实了这一点。两个女人互相交换着奇怪的梦幻般的眼神。里维拉笑了。

“别担心，我连她的手指也不会碰。亲爱的弗里达，她是你的。你想，她和你一样是德国人。一个瓦尔齐利亚[①]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向你发誓。”

弗里达很快就喜欢上了劳拉，邀请她去自己的房间。弗里达做的第一件事是拿出一面蓝色珐琅框架的镜子。你看到了吗？姑娘，你知道你有多美吗？你从中可以获益匪浅。你知道你长得有多么与众不同吗？很少有人能像你这

---

① 北欧神话中主神沃丁(Odin)的使女。

样有着刀削斧砍般的脸形和笔直的鼻梁，深陷的眼圈。你的奥兰多想去掉你眼中郁郁寡欢的落寞，随它去吧，我还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您怎么会知道？”

“你别天真了。整个城市就像是一个小村落，什么事都会被人知道。”

弗里达把红漆腿的大床上的枕头摆好。当劳拉帮她打包的时候，她随即又说，我们明天去美国①，迭戈要在底特律艺术学院画一幅壁画。你想想看，是亨利·福特的委员会邀请他去的。你要知道，对于迭戈自告奋勇所做的一切，共产党员说他收了资本家的钱，而资本家又说他是个共产主义者。我只是对他说，一个艺术家应该高于这一切混账东西，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这是可以留存下来的东西，是谁也无法抹杀的，它对于人民群众最有说服力，让那些政治家和批评家去兴风作浪吧。

“你有自己的衣服吗？我可不想你模仿我的打扮。你已经知道我穿成鼓鼓囊囊的样子一方面是出于个人的喜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掩盖我的病腿和一瘸一拐的走路姿势。我的意思是，瘸腿的人可以先挑选。”弗里达一面说着，一面抚摸着自己上嘴唇黑黑的汗毛。

劳拉带着她的小手提箱回到了迭戈的家。弗里达会喜欢她的那些巴伦西亚加式和斯基亚帕雷里式的时装吗？这是承蒙伊丽莎白的慷慨解囊，和她一起买的。还是换上些更为简朴的式样？直觉告诉她，这个精心装扮自己的女人最愿意看到的恰恰是其他人的自然。这也正是她让别人接受她——弗里达·卡罗——的奇异装饰中流露出的自然感

① 此处的“美国”原文作 Gringolandia，是对美国的贬称。

的独特方式。

在弗里达和她的伊克司昆特雷无毛狗吻别之后，他们就登上了前往底特律的火车。

在漫长的旅途中，窗外可见的尽是墨西哥北部沙漠上成排成行的龙舌兰，这让里维拉想起了年轻诗人萨尔瓦多·诺沃的诗句："龙舌兰做着一百五十个人的瑞典体操。"但弗里达说，这个家伙是个坏蛋，可得提防着点他。他油嘴滑舌，是个女里女气的坏种，但还不像她认识的那些温柔热情的男妓，他们和她倒也十分亲密。里维拉笑了："如果他真的很坏，那么越坏越好。"

"小心着点他。他是那种为了开个玩笑，残酷得都能把自己的妈给卖了的墨西哥人。你知道那天在迪索克的画展上，他对我说些什么吗？'再见，巴甫洛娃[1]。''再见，大屁股。'我这么回答他，他当时吓得都说不出话来。"

"亲爱的弗里达，你真是好记仇，如果你说了诺沃的坏话，你也就给了诺沃说我们坏话的权利。"

"他少说了我们的坏话吗？他叫你'绿乌龟'，叫我'屁股弗里达'。"

"这没什么关系。这就是所谓的积怨、闲话和轶事。作家诺沃将继续存在，画家里维拉将继续存在，生活也将继续存在，只有闲言碎语消失了。"

"好吧，迭戈，把乌克勒勒琴递给我，我们来唱一首密克斯特卡之歌，这是我们在墨西哥旅行时最爱唱的歌。

我远离我的故乡
思念缭绕在我的心房……"

---

① 似指安娜·巴甫洛娃(1881—1931)，俄国芭蕾舞蹈家。

他们在边界换了火车,又到了圣路易密苏里,从这里他们上了直达底特律的火车。在车上,弗里达时而弹着乌克勒勒琴唱歌,时而讲些黄色笑话。到了晚上,迭戈睡着了,弗里达就看着窗外无边无垠的北美平原从眼前掠过,她说火车头的鸣笛声,是铁路心跳的声音,它让弗里达的脉搏也跟着跳动亢奋起来,就如同所有的机器那样既生机勃勃又极具破坏性。

"年轻的时候,我就爱女扮男装,跟我的好友们去上哲学课。我们给自己取名叫'帽子派'。我喜欢它,因为我终于从我所在阶层的陈规陋习中解放出来了。和这帮同我一样深爱着这座城市的年轻人一起,我们不知疲倦地跑遍了城市的每个公园和街区。我们读着这个城市就像是在读一本书,从一个酒吧到另一个酒吧,从一个帐篷到另一个帐篷。这是个娇小、美丽、晴朗、芬芳的城市,有着甜蜜而无序的公园、悄无声息的情侣、宽阔的街道和幽暗神秘的里弄……"

在火车开过堪萨斯平原、穿过密西西比河的时候,弗里达向劳拉讲述了她的一生:她在这个黝暗的城市中寻找并发现了它的气味和味道,特别是在寻找同志和友谊,寻找指引这个该死的社会的方法,成为人群中的一部分,保护自己不受那些混账王八蛋的欺侮。劳拉,在墨西哥,只要你伸出头去,就会被这帮侏儒所定的制度砍去脑袋。

"是怨恨和孤独。"这个目光温柔但眉峰上扬的女人又重复了一遍。她把四朵玫瑰插在头发上来代替花冠,从火车的镜子中观察自己上了油戴了花的发型,和太阳在草原之河——水的源头——密西西比大河上徐徐落下的景色。草原散发着一股炭灰、淤泥、粪便和肥沃土地的气味。

“我和帽子派一起干了些荒唐事，比如说抢占电车，让那些警察追赶我们，忙得团团转，就像是布斯特·基顿拍的电影里的那些场面。这些事都是我的最爱。但又有谁能知道有那么一天，一辆电车从我身上呼啸而过，用这种方式报复了我。我们帽子派向来都是抢单独出行的或是晚上停放在小印第安纳街头的电车。我们没抢过谁的东西，只是让电车在晚上可以带我们随心所欲地逛上大半个墨西哥城。劳拉，我们继续疯狂，可是我们只能沿着轨道前进，沿着永远无法摆脱的轨道前进，这可是个秘密，但我得说虽然有轨道，但我们是用它来逃跑的，用来解放自己的……”

宽阔的密西西比河就像大海，它是所有失去土地的印第安人的水之源。你可以在水中尽情嬉戏，它兴高采烈地把你拥入怀中，摩挲你，带给你清新的感觉。水是一种神圣的东西，它能像神那样恰如其分地分配各个空间，它与排斥你、伤害你、侵入你身体的其他种类的坚硬物质相反，它能包容你。

“那是在七年前，1925年的9月，我从考约坎的父母家出来，搭乘一辆公共汽车。一辆电车撞上了我们。我的脊柱、脖子、肋骨和盆骨断了，全身的骨头都散了架，我的左肩还脱了臼——你看我这件泡泡纱袖的衬衫把我这些缺陷掩盖得多好，你说是吧？——我的一条腿就这么废了，一根铁扶手从我后背插进，从阴部穿出，这一下撞得我的衣服全掉了。你想像得出来吗？衣服消失了，我浑身是血、遍体鳞伤、赤身裸体地躺在地上。劳拉，那时发生了一桩怪事：金子洒了我一身，我残破不全的身子躺在那里，而上面覆盖着一层金粉。”

她点燃了一枝“阿拉斯”烟，又吐出一大口烟雾。

“那趟该死的车上正好有个手工艺人带了几袋金粉。

我一身是伤,却又浑身金光闪闪。如果换了你,你又会怎么样?”

对劳拉来说,在这趟与迭戈和弗里达同行的底特律之旅中,生存问题占据了她的全部思想以至于她都没有时间去考虑哈拉帕、她的母亲、孩子、姨妈、她的丈夫胡安·弗朗西斯科、她的情人奥兰多、她情人的情人卡门·科尔蒂娜以及她的“朋友”伊丽莎白,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那么的遥远,就像是阴郁贫苦的拉雷多边界以及前面出现过的荒漠和弗里达讲到“保护自己不受王八蛋的欺侮”时经过的高原。

看着渐渐睡去的弗里达,劳拉问自己,究竟是弗里达自己在保护自己,还是她需要迭戈,一个冷静男子的保护?他是真实的她的主宰,还是谎言的她的主宰?劳拉试图想像她生命中的那些男人会如何评价迭戈这样一个男人;那些像外祖父费利佩和父亲费尔南多一样代表威严和道德的男人;那些像她丈夫胡安·弗朗西斯科一样野心勃勃的小人物;那些像她哥哥圣地亚哥一样无法实现承诺的男人;那些像她的儿子圣地亚哥和丹东一样无力作出承诺的男人;那些像奥兰多一样永远是个谜的男人;以及周而复始,又回到了那些像她外祖父费利佩一样无耻的男人,可以遗弃自己的私生女,一个混血女人,如果不是由于外祖母科西玛坚定的决心和她父亲坚持的善举,温柔可亲的玛丽亚·德·拉奥姨妈不知道会成为什么样子?

从迭戈身上(他和劳拉同样坐在餐车的窗边,信口开河地编造着各种有关他出世的神奇莫测的故事——有时他是一个修女和一只热恋中的青蛙的儿子;有时他又变成了保守军上尉和发疯的皇后卡尔洛塔的亲生骨肉——接着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在巴黎的传奇生活,他和毕加索、莫迪里阿尼以及一个叫伊利亚·埃伦布尔格的俄国人常见面,那俄

国人还出版了一部描写迭戈在巴黎生活的名为《墨西哥人胡里奥·胡雷尼托的冒险经历》的小说,书中尤其详细地描述了吃人肉的阿兹特克式的奇特饮食习惯,这也是特拉斯卡尔人的偏好——因为叛徒罪有应得,活该就着猪油被烤死——这一切都是谎话。他还在餐桌上铺平的纸上画着底特律壁画详实而又庞大的设计方案,这是向现代工业献上的一曲颂歌),劳拉发现这个富有创造性的男人有着一种令人兴奋的新鲜气息。他时而狂放,时而自律;他像泥水匠一样勤劳,像诗人一样爱幻想,像马戏团小丑一样滑稽,像艺术家一样残酷;总而言之,他要成为他所有时间说一不二的主人,而从不考虑他人的需要、他人的疾苦和他人乞求帮助的悲鸣……迭戈画呀画,这扇门就向世界敞开了。人们自我封闭是为了让一门艺术的形式、色彩、回忆和记念,可以在艺术的藩篱中自由地发挥,这门艺术无论表面上宣称得有多么政治化或社会化,它总是艺术史的,而不是政治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艺术给传统增加或减少现实成分,也正是通过传统为凡人认为过眼烟云的历史增加或减少现实的成分。艺术家本人最清楚,他的艺术并不反映现实,而是创造现实。他可以牺牲慷慨大方、忧国忧家的美德,以及与其他人之间的正常联系,只要它们打断或妨碍他作品的完成;反之,吝啬、轻狂、自私自利是他的首选原则,只要它们有利于他的创作。

像弗里达这样虚弱的一个女人究竟想从这个男人身上找到些什么?她的力量又是什么?是迭戈给了她脆弱的身体中所缺乏的力量,还是他们两股力量合在一起,能给予这个柔弱的躯体虽然痛苦但独立的个人地位?而这个迭戈本人,真的像他所表现的那样强壮高大,还是像劳拉一天早上无意推开他的房间门所看到的那个肥胖无毛、阴茎瘦小的

裸体那样虚弱无力？会不会弗里达是个牺牲品，在为这个活力充沛、事业有成的男人不停地注入新的力量？

比迭戈早，弗里达第一个发现了光线的变化，但她说成是迭戈首先看到这一点的，她知道他会为此感激她，继而就会把这个谎言当作是确凿的真理，是迭戈自己的发现。

“美国佬的国土光线不足，阴影也不足，我亲爱的小不点，你猜得真准……”她一脸兴奋，而他回转身来，企图忘记这一切，既然对于你亲爱的小不点——你夜晚的镜子来说，整个世界只有两种光线，一种是巴黎傍晚的光线，它让我成为了画家；另一种是墨西哥高原的光线，它让我成为男人。我既不懂得美国冬天时的阳光，也不明白墨西哥热带的日照，所以我的眼睛是嵌在你肉里的绿剑，它又变作了你手中的光波，弗里达……

因此他俩从车站到饭店时就一直憋着劲要大干一架，他们不放过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件作为争吵的素材。底特律让他俩兴致大增，从一开始就让他们劲头十足，他有机会干些荒唐事，而她可以发发脾气。饭店的登记处排着队。他们前面的一对老夫妻被接待生一口回绝：

“很抱歉，我们这里不接待犹太客人。”

那对夫妇茫然地退了出去，嘴里嘀咕着，不知道该找谁来帮他们处置一大堆行李。弗里达要过登记单，填上大大的“里维拉先生和太太”等字样，并在下面加上了他们在考约坎的地址，他们的墨西哥国籍，用更大的字体写上了他的宗教是“犹太教”。接待生惊慌失措地看着他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倒是弗里达代他先问：

“先生，出了什么事？”

“是因为我们以前并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

"对不起,太太,您的宗教……"

"不仅仅是宗教,我的种族也是。"

"是因为……"

"你们不接待犹太人?"

她背转身,再也不理睬接待生的解释,劳拉忍住笑,她听着周围那些白种客人的议论,那些女人戴着夏天的宽边草帽,男人们穿着奇怪的美式府绸料,蓝条纹的"希尔-萨克"西服,还戴着巴拿马帽。他们是吉卜赛人吗,为什么这个女人要乔装出行呢?

"迭戈,劳拉,我们走,离开这里。"

"里维拉太太,"一身橡皮味的经理急匆匆地从办公室里赶了出来,手里拿的报纸还翻开在漫画那一页上。"对不起,我们不知道您是犹太人,但没关系,您是福特先生的客人,请接受我们的歉意。"

"快告诉那对老夫妻,虽然他们是犹太人,饭店也接受,就是那对要出门的人。快点,他妈的!"弗里达下令道。到了他们住的套间之后,弗里达笑得都直不起腰来,要是我们低头的话,今天就吃亏了。现在不仅我们有得住,那对老人也能住下来,还给我们房价打折。

迭戈马不停蹄地就开始工作,第二天就去了底特律学院,测量绘画空间,准备户外器材,为到场者做讲座,摆开画纸,接受记者采访。

"我要为这个钢铁世纪的新一代作画。"

"没有记忆的民族就像是一条别有用心的塞壬女妖①。她不知道时间,因为她没有知道时间的手段。"

"我要给无人性的工业加上人情化的光环。"

① 希腊神话中半鸟半女人的怪物,常用美妙歌声引诱航海者触礁。

“我要教患了失忆症的美国学会记忆。”

“耶稣把商人从他的教堂中赶了出去,而我要为那些商人准备一个他们所缺少的神庙,看看他们是否会表现得更好些。”

“里维拉先生,您住在汽车之城,但您真的不会开车吗?”

“不会,但是我会打鸡蛋。我煎的鸡蛋棒极了。”

他一刻不停地说话,开玩笑,下命令,边画画边说话,边说话边画画,好像这个形象与色彩的世界需要兴奋和动作来防护,来消遣,需要他这双充满睡意的凸眼配合下的滔滔不绝的言语,但最后他还是垂头丧气地回到饭店。

“我真是搞不懂这些美国人。我询问他们,我竭力试图去喜欢他们,我笑容可掬地看着他们、请求他们:能否告诉我这是什么? 我觉得他们就像是面包房里的面包,全都长得一个样,没有自己的色彩。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感觉这里的机器很棒,人却很糟糕。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画出来的人会长着什么样的脸,会摆出什么样的姿态?”当迭戈为了躲避大陆性气候一天比一天热的夏日而一大早就出了门以后,弗里达一遍又一遍地问劳拉。

“我远离我的故乡……”弗里达哼着歌,又向:“你知道天为什么会这么热吗?”

“因为我们离两个大洋都很远,海风吹不到这里,只有从北极吹来的风可以让我们稍微凉快一下。真舒服啊!”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因为我的父亲虽然是个银行家,却博览群书。他每个月都收到杂志,我们常去维拉克鲁斯港拿回那些从欧洲来的书和杂志。”

“那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特别热,是因为温度计测出的

温度太高的缘故吗?”

“是因为你要有孩子了。”

“你又是怎么知道这个的?”

通过她走路的方式,劳拉向她解释。但我是个瘸子啊。以前你踮着脚尖走路,轻飘飘地仿佛随时都会飞走的样子,而现在你走路是整个脚掌落地,每走一步都像是要在地上扎下根来。

弗里达拥抱她,感谢她一直陪伴在自己身边。从一开始,劳拉就让她心情愉快:第一次看到劳拉并与之接触,她就知道,这个年轻的女子觉得她自己是个没用的人,或是未有作为的人。

“在我家门口,我从未见过有比你更渴望工作的女人。我想你自己大概也不知道这一点。”

“是的,我并不知道。我只是发疯似的要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且我个人认为这也就是给自己找到一份新工作。”

“生一个孩子,也是一种创造。”弗里达询问似的看着劳拉。

“我有两个孩子。”

“他们在哪儿?”

为什么劳拉会有这种感觉:她和弗里达的这番谈话——女人之间坦诚相见、毫无恶意的知心话——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也是弗里达对她做母亲不够负责的一种责备。责备倒不是为了她离经叛道,而是她对丈夫、情人,这些让母亲离开孩子的男人的反抗还不够彻底?弗里达开诚布公地对劳拉讲,因为迭戈先不忠于她,所以她才背叛了迭戈,但他俩一直信守着一个条约:迭戈和女人们睡觉,弗里达也是。弗里达和男人睡觉会激怒迭戈,但同样是对于女

性的爱却不会让迭戈光火。问题绝非仅仅如此，一天晚上，这个残废的女人向劳拉坦白：有时，不忠和性爱毫无关系可言。她只不过想和另一个人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也许不能让外人知道，需要用谎言来掩盖，那就是性爱。

“你和谁睡觉，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信任谁，你对谁撒谎。我觉得你谁都不相信，劳拉，你对谁都不说实话……”

“难道你想要我？”

“我已经对你说过，我喜欢你。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更需要你做我的伴侣和护理。如果我们卷入了感情的旋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只剩下我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也没有人送我上医院了。亲爱的，哎，你是我的小保姆。”

她像往常那样放声大笑，但劳拉坚持问她，那另外一个原因呢？你只说了一个方面，那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又会怎么样？

“我不会告诉你，可能我希望你明天也会像我今天责备你一样来责备我吧。我们来说些实际点的事情。”

现在是 7 月，孩子的预产期是 12 月。如果迭戈 10 月能完成壁画，那我们可以一起回墨西哥，把孩子毫无危险地生在那里。但一旦迭戈延误了时间，我怎么能在这里生孩子？这里又寒冷，又没有朋友，除了你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我。如果我先回墨西哥，有可能在路上流产，在喧嚣的火车上流产，就像我的医生提醒的那样？

劳拉看着这个极其脆弱的女人，她的已经萎缩的纤细的躯体淹没在宽大的村妇式的衣裙之中，衣裙不仅遮掩了她身体的残疾，更隐藏了她的恐惧。这种难以察觉的恐惧，是发自内心的第二种恐惧，不只加重了这个残废的女人对

自己躯体的恐惧,更多地包含了她对腹中尚未出生的小生命的忧虑。在母亲和胎儿之间有一种默契,没有人能闯进这个秘密的小圈子。

弗里达又是一阵大笑,她央求劳拉帮她梳理发辫,整理衣裙,戴好披肩修剪鬓角。劳拉搀扶她,和她出门去参加在美国的各种欢迎"世界最著名画家迭戈·里维拉及其夫人"的晚会和晚宴,和这个新兴工业社会的百万富翁们跳舞。当问及弗里达一瘸一拐的舞姿时,弗里达谎称这是奥克萨凯诺的一种民间舞步,属于那种令人惊叹的印第安人舞蹈,其令人震惊的程度,就如同弗里达在用餐当中突然高声问亨利·福特先生,"您是犹太人吗?"让反犹主义者福特大惊失色的程度一样。弗里达假装天真无知地说着英语中的粗话,在这个密歇根的上流社会中制造出了一桩桩的闹剧。她往往是在离开餐桌前彬彬有礼地微笑着说上一句"吃屎去吧[①]",或是和一群贵妇人玩牌玩到兴头时,突然说:"我喜欢操,你呢?[②]"她在劳拉的陪伴下,去看了一场又一场热闹的却又被这个华氏一百来度的城市所冻结的电影。她看卓别林的《城市之光》,看劳莱与哈代,看馅饼大战,看被洗劫一空的房屋,看警察一阵狂追猛打,看一盘子通心粉扣在女主人的胸口上。这些镜头都能让她笑得喘不过气来。她紧紧地抓住劳拉的手,笑出了眼泪,她又是笑又是流泪,高兴地大喊大叫……

病床在一盏盏灯下滑过,它们就像是一只只没有眼皮的眼睛。医生们问劳拉,她有什么感觉?她觉得热,皮肤上长斑,恶心想吐,子宫疼痛,曾经有一根铁扶手从她的阴部

---

① 原文为英语:Shit on you.

② 原文为英语:I enjoy fucking, don't you?

穿出来,是一辆电车压住了她。她今天吃了什么？两杯奶油,一些蔬菜,全吐了。她被那辆电车毁了,你们知道吗?她的丈夫正在画着干净锃亮的钢铁机器,可她却被一辆急驶而过的老掉牙的生锈机器压在了底下。她在电影院里尖叫着,脸色发青,然后开始出血。人们把她从血泊中抬了起来,她的身边全都是因为大笑而流出的血块。你们知道吗?她正在看"胖子和瘦子"。

瘦削的像是十二岁的女孩蜷着身子安静地躺在床上,她的头发被泪水打湿了。

"我要见我的儿子。"

"他只不过是个胚胎,弗里达。"

"我没能把他生下来。"

"是医生们不让。"

"告诉他们这是由于人为的原因。"

"弗里达,他没有长全,在肚子里他就化了,他没有形状。"

"我会让他长好的。"

她睡着了,又醒了过来,难以忍受热浪的侵袭。她爬起来,想要逃走,人们却让她躺下来。她要求见一见孩子。迭戈过来看她,态度亲昵,体贴入微,却又心不在焉,他急着回去工作。他眼里看见的是别处的壁画,而不是眼前的妻子。

一天晚上,劳拉听到了一阵久违了的声响,把她又带回了在卡特马哥丛林里生活的童年时代。劳拉睡在弗里达病房里的一张简易床上,声音把她惊醒了。她看见弗里达残破的身躯光溜溜地躺在床上,一条腿比另一条腿要细得多。她的阴道出血不止,像是一眼康乃馨的泉水,背绞得像一扇天窗,头发明显地在几秒钟之内就长长了许多,一根根头发像是长在美杜莎的头颅上,喷涌而出,如同蜘蛛网一样攀过

枕头，又像长蛇一般爬下床单，最后在床脚生了根。弗里达伸出手，向劳拉展示她流血的阴道，求她触摸它。你别害怕，我们女人身体里面是玫瑰色的。你用色彩把我从性爱中解放了出来，用色彩把我的手指弄脏。给我拿些画笔和本子来。劳拉，别这样看着我。一个裸体的女人是如何看着另一个裸体的女人的？你自己也光着身体，劳拉，尽管你不知道，但我知道。你的大脑里全是丝带，上百根脐带缠绕着你的大腿：我梦见了你的梦。劳拉，我看见你梦到了蜗牛，缓缓爬过你往昔岁月的易碎而黏稠的蜗牛。它们并不知道它们身处的这个花园也是座坟墓。花园里的植物喊着要喝奶、要哺育。幼小的植物又饥又渴，可是小蜗牛们是聋子，它们不理睬它们的母亲。只有我看到了，我听到了，我明白了，只有我看到这个世界中的小蜗牛，幼小的植物，丛林母亲的真实颜色，它们是蓝的、绿的、黄的、紫的、土黄的……大地是花园也是墓地，你所看到的全是真的。医院的房间是底特律这块水泥荒漠中的最后一方神奇的绿洲，医院的房间里挤满了黄鹦鹉、灰猫、白鹰和黑猴，它们都为我带来了礼物，只有你没有，劳拉，你送我什么？

迭戈来看她，他让劳拉为弗里达拿些本子、画笔和水彩笔。弗里达只要迭戈的一个眼神几句话就心满意足了。

“我亲爱的小不点，你长的没像别人讲的那么丑，你长的还不赖……”

“亲爱的弗里达，我越来越爱你了。”

“谁说你长的丑，我亲爱的？”

“你看，这是张墨西哥剪报，他们管我叫肥胖的赶狼人。”

“那我呢？”

“人老珠黄。”

她笑了，拉住了劳拉的手，所有的人都笑了。那劳拉呢？

“我给你正式命名为黑曜岩的蝴蝶。”迭戈说，“是我说的。”

有劳拉在一旁递给她铅笔、画笔、颜料、纸，弗里达一边说话，一边开始作画，和她的丈夫一模一样，仿佛他们两个人没有语言的保护就无法创作一样，同时艺术家和他不可或缺的保护伞又是毫不搭界的。弗里达和劳拉说话，但她又是在和自己说话，但她又是在和劳拉说话，求劳拉给她一面镜子，让她看看自己。劳拉看着这个缩在床上的一头乱发、眉毛高挑、鬓脚未修的女人，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弗里达说她觉得这很好，第一件事是有一个身体，第二件事才是长得美丽，她现在晓得她有身体，这就足够了，她的身体幸存了下来，美丽才会接踵而来，最重要的是身体要健全，但现在她的身体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她，她的身体就像那个一阵大笑就掉了下来的胚胎一样，越来越不完整。她画得越来越快，笔触越来越疯狂，就像她的话一样。劳拉永远不会忘记这些话：没有形状的身体是丑陋的。劳拉，帮我把散开的骨架子拼凑起来，做成一个自己的样子，帮我赶快拾起云朵、太阳、我衣服的轮廓、我和我的胚胎相连的红色丝带，浸润了鲜血的床单，那是我的长袍，流过我面颊的眼泪凝结而成的水晶，所有的一切。请帮我把我失散开去的一切都聚集起来，做成一个自己的样子，你愿意吗？无所谓主题、痛苦、死亡、出生、革命、权力、骄傲、虚荣、梦想、记忆、意志，无所谓是什么来驱动这个身体，只要能做出一个自己的模样，你就不再丑陋，因为美丽只属于理解它的人，而不是拥有它的人。美丽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而是我们每个人的真实，迭戈的美丽显现在他作画时，我的美丽就是我现在躺

在医院的床上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你也需要发掘你的美丽，劳拉，你完全明白我说的这些话，我并不是要把它揭示给你看，现在轮到你去理解你的真实。你现在不要不好意思，看着我，劳拉，告诉我我现在看上去糟透了，所以你不敢给我拿镜子，在你的眼里我今天不美，在这一天，在这个地方我不美。我无需用语言来回答你，相反，我向你要颜料和纸，把我受伤的可怖躯体和流淌的鲜血变成我的真实和我的美丽。因为你知道，我真正的朋友，我孪生的姐妹。你知道吗？认识自我让我们变得美丽，因为我们清楚我们的愿望。当一个女人有愿望时，她是美丽的……

医院的房间里先是扔得满地都是本子，后来又到处是散乱的纸张和铜板。迭戈带来几幅瓜纳华托教堂的装饰画，这让弗里达记起了村庄里的人是如何画画的，他们在铜板和被丢弃的木板上作画，通过这些村民的手，画板变成了还愿的供奉，用以感谢阿托查的圣婴，大慈大悲的圣母和查尔马的上帝，感谢他们赐予人们神迹，这些天天都在发生的奇迹，拯救了生病的孩子，困在塌陷的矿井中的父亲，溺水的母亲，被铁栏杆穿膛而过奄奄一息的弗里达，在去佩罗特的半途上遭到刀劈的外祖母科西玛，被遗弃在黑人妓院中的玛丽亚·德·拉奥姨妈，几乎死在马恩战壕中的外祖父费利佩，黎明时分被枪毙在维拉克鲁斯的哥哥圣地亚哥，又一次拯救了分娩时大出血的弗里达，可是劳拉，她又该为什么而感谢主的拯救呢？

“把这首诗念给弗里达听。”迭戈递给她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这是自索尔胡安娜[1]以来最优秀的墨西哥诗歌，念

---

① 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1648或1651—1695)，墨西哥女诗人、学者、修女，以写作爱情诗著称，被誉为“第十个缪斯”。

一念这页上写的。”

“充满我，寄居在我的表面上
一位难以捉摸的神将我窒息
之后
哦，火焰中的智慧和孤独
所有这一切都在孕育中，而不在创造中
最终，
伴随着他，伴随着我，伴随着我们三个人……”

“你们看高罗蒂萨是如何理解这点的？我们是三个人，总是三个人。父亲、母亲和孩子。妻子、丈夫和情人。无论你怎么改变，最后总是剩下三个人，因为四个人不道德，五个人难以控制局面，两个人又让人无法容忍，而一个人是孤独和死亡的开始。”

“为什么你说四个人不道德？”弗里达很奇怪，“劳拉结婚了，并且有两个儿子。”

“我的丈夫离开我们了。”劳拉羞怯地微笑着，“更恰当地说是我抛弃了他。”

“而且总是有一个孩子特别偏爱，即便你生了一打。”弗里达补充。

“三个人，总是三个人。”画家喃喃自语地走了。

“这家伙有心事。”弗里达拧紧了双眉，“把那边的铜板给我拿过来，劳拉。”

当医院抱怨房间越来越乱，地上到处是纸，还散发着一股颜料的气味时，迭戈像传统悲剧中的雷神一样出现了，他用英语说，这位妇女是位艺术家，你们这些白痴难道没有看出来吗？他冲他们大叫大嚷，但对她却饱含爱意和自豪地

说，这位妇女是我的妻子，痛苦迫使她在画中写下了真实、痛苦和这个世界的残忍，你们，整天被医院里的各种痛苦所包围，永远不可能发现这种垂死挣扎的诗，所以也就无法理解她……

“我亲爱的小不点儿。”弗里达说。

当弗里达可以走动之后，她们回到了宾馆，劳拉帮她整理已画好的稿纸。终于有一天，两个人去看迭戈在那所学校画画，壁画进展不错，但弗里达还是看出了其中的问题以及画家本人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闪闪发光的毁灭性的机器像钢铁巨蟒一样纠缠在一起，占据了画面的主要位置，而背后操纵它的工人们却是灰蒙蒙的。弗里达在画中找不到一张美国工人的脸，她明白其中道理。迭戈把他们都画成背影是因为他不理解美国工人，他们的脸是没有个性、只有轮廓的大圆面包，一张张面团做成的脸。而相反，画中出现了一张张黑白混血人、黑人和墨西哥人的脸。他把他们的脸展现给公众，展现给整个世界。

她们两人每天都给画家用提篮带去好吃的东西，然后坐在一旁静静地看他工作，任凭画家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话。弗里达一勺勺地吮着“塞拉亚”盒里的烤奶油甜点，本来是助消化的食品，而现在她吃是为了恢复体力。劳拉衣着简洁，而弗里达却越穿越花哨，每天换不同颜色的披肩，绿的、黄的、紫红的，编彩色的发辫，还戴玉石项链。

迭戈在他的那张工业之颂的壁画中留下了三处空白，他一次又一次地盯着坐在脚手架边看他作画的那对女人，弗里达吮着甜食，首饰丁当作响，而劳拉面对画家助手热辣辣的目光小心翼翼将腿交叉叠放。一天，她们俩进门之后，发现自己成为了画中的两个男人，她们变成了短头发、长工装的工人，穿着混纺衬衫，戴着手套，还拿着铁制工具。劳

拉和弗里达站在墙角边,独占着整个壁画的光线,劳拉五官棱角分明,轮廓有如刀劈斧砍,头发比留刘海儿的维拉克鲁斯女人和水手都要短。弗里达也是短发,留着男人的鬓角,眉毛依旧浓黑,更有男人的特征,上唇的汗毛被画家略去不画,连弗里达本人都既奇怪又好笑地说:我自己都画上我的小胡子,可你倒不画。

壁画只剩下中间和上部还留有空白,弗里达焦躁不安地望着空白之处。直到一天下午,她抓往劳拉的手说,我们走,就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饭店。弗里达拽出一张废纸,摊在桌上,开始一次又一次地涂抹,不知疲倦地画上分开的太阳和月亮,并拢的月亮和太阳。

劳拉透过饭店的天窗眺望天空中的恒星和卫星,它们被弗里达升华到了白昼之星和黑夜之星的地位。它们由维纳斯孕育而生,一个成为白天的第一颗星星,另一个成为夜晚的最后一颗星星。太阳和月亮在相同的空间内,却在不同的时间里活动,它们被世人的眼睛看到,却不为宇宙的眼睛所关注。劳拉,迭戈会在他壁画空白的地方画上些什么呢?

"他让我害怕,他从未如此严密地保守过他的秘密。"

到了揭幕的那一天她们才看到,一个工人模样的圣家族,指挥着机器、背对公众的白种工人和面对世界的混血工人的工作。在壁画的一端,有两个男人装扮的妇女正看着那些男人。机器的上面,是一个穿着廉价印花布,戴着白色小球,普通得如同底特律商场里任何一个女职员的圣母,托着一个头顶光环的全裸的婴儿,徒劳地寻找背对母子俩的木匠支持的目光。木匠拿着他干活的家伙,一手是锤子和铁钉,一手是两段交叉成十字状的木头。他的光环色彩黯淡,与把圣家族和工人以及机器区分开来的海一样的鲜红

旗帜相比黯然失色。

当遮掩壁画的幕布落下时,嘘声四起。

这是嘲笑,讽刺。这是在嘲笑雇用他的资本家,在讽刺底特律精神,是"渎神",是共产主义。这些声音渐渐地在迭戈·里维拉面前垒起了一堵围墙,观看者们开始分成派别,叫骂声更大了,埃德塞尔·福特,这个巨头的儿子,要求全场肃静。迭戈登上一架手梯,宣布未来社会的一项新艺术诞生了,他下来的时候被他事先安排好的一群扔颜料桶起哄的家伙溅得身上一块黄一块红的,但此时此刻,又有一队迭戈先前布置好的工人站到壁画前面,宣布要誓死保卫壁画。

第二天一早,弗里达和劳拉就登上开往纽约的火车,前往洛克菲勒中心画壁画。迭戈兴高采烈地用汽油擦着脸上的颜料,像一个淘气的孩子一样兴冲冲地为下一次恶作剧作准备,而且还将一一成功:他被资本家攻击为共产主义者,又被共产主义者指责为资本主义拥护者。迭戈觉得自己是个纯粹的墨西哥人,一个爱开玩笑、爱调侃的墨西哥人,他为了抵御这里和那里的混蛋,身上的刺长得比豪猪还要多,他对事先在这里和那里被击败的混蛋的愤恨浑然不觉,只是为自己成为全国批判迭戈·里维拉运动的靶子兴奋不已,这早已是一项国家的传统项目,而现在又将在美国掀起一轮新的攻击迭戈·里维拉的运动。迭戈这个胖子,不是站在夏夜森林中的枝叶上,而是站在画家脚手架的木板之上,在摔到地面之前的一分钟,还嘲笑着这个世界。他发现,虽然他长了个倔驴的脑袋,却有一个温柔的怀抱可以躲藏,他被夜的女王所抚爱,在女王的眼中,他不是蠢驴,而是迷人的王子,青蛙变成了王子,深爱着保护着他的亲爱的弗里达,连月亮都会钦羡不已。我的小姑娘,我可亲的小宝贝,我可怜的小东西,你知道,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不

是这样吗？当我对你说，弗里达，让我来帮你，小可怜，我对你说的实际上是帮助我吧，我是个可怜的家伙，帮帮你的迭戈吧！

他们让劳拉带着夏天的行李和装满了画纸的纸板箱先回墨西哥，她可以把考约坎的家先整理一下，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住下来。他们无需再向劳拉说些什么，因为劳拉已经看出在弗里达流产之后，他们俩彼此更加需要了。弗里达到纽约后一段时间内不会工作，也就不再需要劳拉了，她多余了。弗里达在那里有许多朋友，她喜欢和他们一起出门逛街，看电影。在那里有一场人猿泰山的电影节，她是绝对不会错过的。她对于有关大猩猩的电影特别着迷，曾经看过九次《金刚》，它令她心情愉快，开怀大笑。

“你知道迭戈在冬天很难入睡，所以我现在必须天天晚上陪着他，以便让他好好休息，有精力去画新的壁画。劳拉，别忘了给我在考约坎的床上带个娃娃回去。”

第十一章　索诺拉大街:1934 年

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希尔达姨妈和维尔希尼亚姨妈失踪了。

她们的妹妹雷特西亚早上六点起床,她一般在这个时间准备早餐,——芒果、榅桲、苹果、桃子、鸡蛋、全麦面包、牛奶、咖啡——七点的时候这一切都各就各位,摆在由卷在银环里的餐巾所标出的位置上。

雷特西亚悲伤地看着她三个姐姐的位子和那些银色的字母缩写:H,V,MO[①],很快她便把这悲伤当作了某种预感。当七点一刻仍无人出现时,雷特西亚来到玛丽亚·德·拉奥的房间,叫醒了她:

“对不起,我做噩梦了。”

“梦见什么了?”

“波浪。我也不太清楚。”雷特西亚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哦,真倒霉,为什么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呢?”

雷特西亚接着又去敲希尔达的门,却没人回答。她推开门,只见床铺得十分整齐,一丝不乱。拉开衣橱,只有一个衣架是空的,而这个衣架通常都挂着那件雷特西亚曾洗熨过无数次的白色亚麻布长睡衣。但那一排排整齐有序的便鞋和短靴却一双不少,好像一支休整中的军队。

---

① H 指希尔达,V 指维尔希尼亚,MO 指玛丽亚·德·拉奥。

雷特西亚不安地加快脚步,走向维尔希尼亚的房间,她知道在那里她将看到的也不会是一张凌乱的床。靠在镜子旁的信封里有一张留给雷特西亚的便条:

小妹:希尔达无法成为她希望的那样,我也不行。昨天在照镜子的时候,我们有了一致的想法。死亡比疾病和衰老要好得多。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以"基督徒"的耐心来等待那注定的时刻,为什么不鼓起勇气走向死亡,却要等待死神某天晚上叩响我们的房门,给予她这样的乐趣呢?我们成天呆坐在这里,接受着你的悉心照料,就像两根怯懦的蜡烛渐渐熄灭。我俩都渴望能做一件我们一生中都不曾做过的事。希尔达静静地凝视着关节发炎的手指,轻声哼唱着肖邦的小夜曲。我盯着我的黑眼圈,在每一条皱纹里念出一首从未发表过的诗。我们彼此对视,心照不宣——你想,我俩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从一生下来就不曾分开过,彼此都能猜出对方的心思!——前天晚上,你还记得吧,我们四个人一起在客厅里玩牌。轮到我洗牌的时候(鉴于希尔达手指的状况,我们没让她洗牌),我开始觉得很难受,就像一个自知不久于世的人所感觉的那样。尽管很难受,我还是得洗牌。我心不在焉地洗着牌,直到你和玛丽亚·德·拉奥诧异地看着我。我开始近乎疯狂地洗牌,仿佛洗牌维系着我的整个生命。而你,雷特西亚,在这个时候说了那句谶语似的话,那句陈旧、可笑又可怕的成语:老太太洗牌,一命呜呼。

当时,我看了看希尔达,她也看了看我,我俩就都明白了。你和我们的另一个姐妹在另一边,在我俩的世界之外。

我们看着牌,你出了一张梅花K。

我和希尔达从内心深处对望了一眼……别来找我们。

昨天晚上我们穿上了白睡衣，光着脚，叫醒了桑帕伊塔①，叫他用马车伊索塔拉着我们去海边，去那个湖，我们出生的地方。他没有违抗，看着我们像疯子似的只穿着睡衣就跑了出去。他总是听从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命令。因此当你醒来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已经找不到我、希尔达、黑人，以及那辆马车了。桑帕伊塔会在我们指定的地方让我们下车，我们就赤脚消失在丛林中，漫无目的，身无分文，也没有带面包，光着脚，只穿着睡衣遮羞。如果你爱我们，就别找我们。请尊重我们的意愿吧！我们渴望把死亡变成一种艺术：最后的、惟一的艺术。请别破坏我们这最后的兴致。

爱你的姐姐维尔希尼亚和希尔达。

“你的姨妈们从此再也没有露面。”雷特西亚告诉劳拉，“我们在阿卡尤坎的公路弯道上找到了马车，在当地的妓院里找到了黑人，他全身已经被刀子捅烂了。对不起，孩子，玛丽亚·德·拉奥就是在那儿长大的。别这样看我。这些都是谜，我不会去当那个把它们弄明白的人。知道这些就够我头疼的了，加上我不知道的只会更糟。”

在得知两个单身姨妈失踪的消息之后，劳拉立刻赶到了哈拉帕，但她并不知道那个多年来一直忠心耿耿的黑仆的悲惨命运。仿佛是玛丽亚·德·拉奥的母亲“特利埃斯蒂娜”的那个黑得和她皮肤不相上下的恶毒灵魂又回来了，在向所有的那些有着体面生计的人施加报复。据她女儿所说，这位母亲曾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

“做妓女是多么幸福啊！那些让我从良的人，操他妈的！”

---

① 桑帕伊塔是桑帕亚的昵称。

雷特西亚很早就把劳拉熟知的一切告诉了她。妈妈从不传闲话,也不乱打听。她总能随遇而安。她不需要打听,因为她什么都明白,像她刚说的那样,她不知道的她都能想像出来。

回到维拉克鲁斯的家,劳拉就像看到了一只失准的日晷。回想姨妈们的命运和母亲的态度使她明白,雷特西亚已经知道了关于她的一切:和胡安·弗朗西斯科婚姻的失败,对丈夫的背叛,而这背叛又融化在伊丽莎白舒适的庇护中。接着就是和奥兰多空虚、漫长、最终却毫无结果的关系。然而,这些阶段不也是必不可少的吗,它们虽然本身无关紧要,但却将各个孤立的感受的瞬间堆积起来,正是这些瞬间的总和将她引向一种对事物崭新却又模糊、渺茫的认识。日之晷和影之晷不能分开。

雷特西亚谈起单身姨妈们出走的时候,深深地凝视着女儿的双眸,要她重新考虑说过的这番话,——对你和小姨来说,照顾两个八九岁的孩子实在太辛苦了。我要把孩子、你和小姨带到墨西哥城去……

"孩子,我们还是留在这儿,互相作伴。你应该自己重组家庭。"

"妈妈,你还是一起去吧。胡安·弗朗西斯科在索诺拉大街的家里等着我们。我已经说过了,如果你和小姨愿意一起来,我们就找一间更宽敞的房子,别的就什么都不缺了。"

"你还是乖乖地和我们分开住吧。"雷特西亚笑了。"我一辈子都不想离开维拉克鲁斯州。首都让我害怕。"

有必要向她解释这些吗,自己如何被奥兰多抛弃,如何作出决定,不是因为软弱,而是出于从与奥兰多一起生活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一种必要而强烈的意愿,和胡安·弗朗西

斯科重归于好？劳拉曾指责丈夫缺少起码的真诚，对怯懦和背叛的缄默使他在妻子的眼中永远变得令人讨厌，也使她痛恨自己。因为现在看来，她和这个工人领袖结合的理由是不够充分的，只能归咎于她的年轻和缺乏经验。

这天下午，在她少年时代的古老城市，在母亲的身边，劳拉本想把这一切都向母亲和盘托出，但雷特西亚一个不容分说的决定阻止了她这样做：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先把孩子留在这儿，直到你和丈夫把一切都安排妥当，重新开始夫妻生活。不过这些我不说你也知道。”

两个人差点儿同时说“告诉我”，但两人又突然意识到其实不需要言语的交流她们就都已知晓了一切。雷特西亚知道了劳拉婚姻的失败，劳拉知道自己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回到胡安·弗朗西斯科身边，再给家庭和孩子一次机会。她又想到，并且几乎要开口承认，她确实把近几年的生命都浪费在欺骗中了，现有幻想的破灭将她引向了谎言：她以为这些是正当的，与家庭决裂并且采取对一个寻常女子而言，自身仇恨的内心世界和首都社会的外部世界这两个世界都可以接受的报复手段：寻欢作乐和独立自主。

现在，劳拉不知道这两种东西——快乐和自由——是否曾经属于她。她一直都依赖伊丽莎白，直到慷慨变成了保护，接着又变成了恼怒，最后化作了轻蔑。她全身心地投入与奥兰多的爱情，直到发现激情不过是游戏和欺骗。她找到了一个由艺术家、纨绔子弟、暴发户和野心家组成的新团体，他们的确从未欺骗过她，因为在卡门·科尔蒂娜的晚会上，现象就是本质，现实只是它的面具。

有用，感觉自己是有用的，想像自己能做点什么，这样的想法将她带到了卡罗-里维拉家的屋檐下。这一对杰出

的夫妻在她落难时收留了她，并像朋友一样待她，然而一切的感激都无法掩盖这一事实，她是这两位艺术家的世界中的点缀；她是一个无比润滑的几何体之中可以替换的部件，这几何体就像里维拉在底特律所盛赞的、熠熠生辉的钢铁机器一样，只是这台机器缺少有力的支柱，一如弗里达·卡罗受伤的双腿。他们不需要其他人。劳拉一直都很爱他们，却从来不抱任何幻想：他们也爱她，但却不需要她。

“妈妈，我需要什么？谁需要我？”劳拉在向雷特西亚讲述了这一切之后问道。她曾发誓不告诉母亲，而现在，她紧紧地抓着母亲那双操持家务的有力的手，飞快地向她倾诉了这一切。她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说了，还是雷特西亚不等劳拉说话就再次猜中了女儿的想法和感受。

“告诉我。”雷特西亚说。劳拉明白她什么都知道。

“这么说，孩子们还要继续待在这儿？”

“只是在你回去和丈夫团聚的期间。”

“如果我们无法互相理解呢？这很有可能。”

“那样你们就永远不能互相理解。这就是问题所在。重要的是你得真正尽到你的职责，你要下定决心去挽救，而不是等着别人来挽救你，就像目前为止你所做的那样。对不起，恕我直言。”

“明知道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也要去做？”

雷特西亚点了点头，“有些事情，明知要失败，我们也必须去做。”

“妈妈，那什么是胜利呢？”

“我想是能够让你成为你自己的机会。抛开你失败的经历吧，别让它们重演。”

“睁着眼睛走向灾难，妈妈，这就是你要我做的？”

“应该把事情做完。你扔下了太多半途而废的事情，这

就是所谓'散乱的线头'。做你自己,而不是别人的玩偶,尽管每多一分真实,你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难道离开奥兰多以来我所经历的一切还不够'真实'吗?"

这次,雷特西亚只是把中国娃娃塞给女儿。

"拿着。上次你来的时候落下的。现在弗里达太太会需要它的。"

劳拉拿着李白,亲了亲熟睡的丹东和圣地亚哥,回到在她惊悉姨妈的失踪而赶到哈拉帕之前就已经结束的一切。

第一个晚上他们并排躺着,就像躺在一座坟墓里,没有热情,也没有指责,更没有肌肤间的接触。他们在讨论一些事情,作出某些承诺。并不是不给肉体的结合创造机会,但也不会把这作为必须履行的义务。他们并排躺着,从试探性的提问和回答开始。胡安·弗朗西斯科,你知道早在认识你之前我就已经通过传闻知道了你,你从不吹嘘自己,这点我不能指责你,相反,当你出现在哈拉帕的俱乐部时,正是你的朴实吸引了我。你并没有为了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向我献殷勤,而我早已被想像中那个勇敢而充满激情的人深深吸引住了。在我的想像中,你已经取代了我哥哥圣地亚哥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你活了下来代替我的亲人继续战斗。你没有达到我想像中的那种高度,错不在你,而在于我。希望这次我们能共同生活,不再幻想。劳拉,我从未感受到你的爱,有的只是尊重、钦佩、幻想,而缺少激情。激情是短暂的,但尊重和钦佩却能永恒。但如果连这些都失去了,劳拉,我们还有什么?胡安·弗朗西斯科,那我们就没有激情、没有钦佩地生活,但要有尊重,尊重我们真实的自己,抛弃幻想,为了无辜的孩子,为了这些我们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就把他们带到世间来的孩子。这就是你我达成的协议

吗？不，不只这些，尽量别让我再害怕。我怕你，因为你打过我。你发誓，向我保证今后无论我们之间发生什么事，你都不再打我。你无法想像男人打女人的时候，女人所感受到的恐惧。这是我主要的条件。别担心，我曾以为自己拥有比实际更大的力量，对不起。

接着，他悲伤地抚摸着她，而她也感激地与他亲热，但在作出令人羞愧的反应之前，她从床上坐了起来，胡安·弗朗西斯科，我不该骗你，我得从这儿说起，告诉你自从你告发了格罗丽亚·索里亚诺修女，并在我走的时候当街打了我一个耳光之后我所经历的一切，我想让你知道，我与谁共眠，我渴望着谁，和谁寻欢作乐，我希望我不在你身边时所做的一切都能深深地嵌入你的脑海，这样最后你就能回答我那个你至今仍未回答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指责我对你的欺骗，却认为我是真心爱你的？胡安·弗朗西斯科，我现在就问你，然后再告诉你一切，免得过去的一切重演。这次你会因为我爱你，自愿回到你身边而指责我吗？或者若是我再次欺骗你，你就要谴责我？你敢回答我吗？我是个十足的坏女人。我这么认为。但是请注意我的问题，如果我欺骗了你——第一次或者再一次，这你并不清楚，对吧？——你有勇气指责我吗？你永远不会知道我告诉你的是真实的，还是为了报复你而随意编造的。我可以告诉你一些名字和地址，你也可以去调查，调查我离开你之后的爱情经历，看看我是否说了实话。但这都无法改变我刚才对你提出的要求，你不再指责我了？永远都不？我以被你告发的修女和你背叛的事业的名义向你要求回报。我会原谅你这一点的，你会原谅我吗？你能做到吗？……

劳拉的话之后是一阵长久的沉默。丈夫并没有打破沉默，而是下了床，扣上了蓝白条纹睡衣的扣子，走到梳妆台

前,从玻璃瓶中倒了点水,喝完之后坐到了床沿上。这个房间在雨季显得十分阴冷,雹子打鼓似的落在房顶上,一阵比一阵密,一阵比一阵急。从敞开的窗子里传来蓝花楹清新的香味,多情地飘过摆动的窗帘和窗台下细小的水洼。就在这时,胡安·弗朗西斯科缓缓地说着,仿佛他是一个没有过去的人——他从哪里来?他的父母是谁?为什么他从来不提起他的来历?

"我一直都知道自己外强中干。从小我就知道。所以我很努力地使自己在人前表现得非常坚强,特别是在你面前。因为我从小就了解自己内心的恐惧和软弱。你听说过狄摩西尼[①]吗?他为了克服自己胆怯的口吃,经常去海边散步,直到他的声音盖过了海浪的咆哮,成了希腊最著名的公众演说家。我也是这样。我使自己坚强是因为我曾经软弱。劳拉,你永远都不知道,战胜恐惧要花多少时间啊!因为恐惧是软弱的,当世界向你提供抚慰恐惧的礼物——金钱、权力或者淫乐,它们是一起的还是分开的,这无关紧要——,你只能感谢世界对你的怜悯,你会一点一点地交出你一无所有时获得的真实的力量,把它交给世界开始与你对话时的那种虚假的力量。这时,软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战胜了你。如果你帮助我,就可以达到一种平衡,我就不再像你刚认识我时那么坚强,也不像你抛弃我时那么软弱了。"

她不想讨论究竟是谁抛弃了谁。如果他坚持说自己是被抛弃的人,那么她会带着怜悯,顺从地看他扮演这个角色,不愿再失去对他的尊重。而他却不得不忍受关于她的一切真相,甚至最残酷的真相。但这不是为了残酷,而是为

---

① 古希腊著名的演说家。

了今后无论多么不幸，他们俩都能生活在真实之中，特别是为了能让丹东和圣地亚哥生活在一个没有谎言的家庭中。劳拉想起了母亲雷特西亚，希望自己能和她一样，拥有那种不用废话就能理解一切的能力。

从哈拉帕回来之后，她带着那个中国娃娃去找弗里达·卡罗。他们在考约坎的家中空无一人。劳拉走进花园，大声喊道："有人在家吗？"一个女仆细小的声音回答了她："没人，小姐。什么人也没有。"夫妇俩仍在纽约，里维拉在洛克菲勒中心画壁画。于是劳拉把李白放在了弗里达的床上，也没有留个字条什么的。弗里达会明白的，这是劳拉送给那个失去的孩子的礼物。她尽力想像着，这个东方娃娃象牙般纯洁的脸庞出现在很快就会充斥卧室的热带丛林中：猴子，弗里达说，鹦鹉、蝴蝶、长毛狗、美洲豹猫以及茂密的藤蔓和兰花。

劳拉派人把孩子们从哈拉帕接来。圣地亚哥和丹东非常听话地遵从外婆雷特西亚准确而实际的指示，独自登上了开往布埃纳维斯塔车站的洋际火车。劳拉和胡安·弗朗西斯科就在那个车站迎接他们。孩子们的性格劳拉已经有所了解，但却让胡安·弗朗西斯科大吃一惊。其实劳拉也感到很诧异，因为孩子们正在迅速地成长。丹东动作粗鲁，行为莽撞，匆匆地在爸爸妈妈脸颊上亲了两下，就跑去买糖吃，一边还大声喊着："火车上没有拉林巧克力，也没有咪咪棒棒糖，那外婆给我们钱干什么？而且那个小气鬼才给那么一丁点儿烤面包片。"接着又飞快地跑到报亭前去买刚出版的那期《佩平》和《小查马科》。当他发现身上的钱不够时，就改买最新一期的《小机灵鬼》。胡安·弗朗西斯科把手伸到口袋里准备掏钱买那两本杂志时，劳拉阻止了他。丹东转过身，向街上跑去，跑在大家的前头。

而圣地亚哥只是和爸爸妈妈挥手打了招呼，然后保持着一个不可逾越的距离，防止一切亲吻的可能。他任由劳拉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领他走向出口，胡安·弗朗西斯科提着两个小行李箱一直走到停在街边的黑色别克车旁，对此圣地亚哥也并不介意。两个孩子都显得很不自在，但是因为不愿把这种不安归咎于与父母的见面，他们用食指来回蹭着打着领带挺得笔直的脖子。这一身正式的装束是雷特西亚为他们准备的：三颗纽扣的滚边上衣，直到膝盖的“金客”裤，印有菱形图案的长袜，咖啡色的鞋子和与之相配的鞋带。

从火车站到索诺拉大街，一路上大家都没有说话。丹东全神贯注地看着漫画，圣地亚哥则冷冷地望着这座雄伟的城市，刚刚落成的革命纪念碑，在一个巨型加油站买东西的人们，改革大道，接二连三的街心花园好像在为所有的人呼吸，从胡亚雷斯大街、布卡雷利大街和埃希多大街交汇处的十字路口，哥伦布和围绕在他身边的冷漠的教士和法学家们，再到挺立在起义者大道路口，高举着长矛的夸乌特莫克①像；他们路过一条绿阴掩映、人行道密布的大道，晨起的骑士们喜欢在这儿悠闲地遛马，马路两边是一座座门面豪华的私人府邸和巴黎式的尖塔。在帕塞奥街通向胡亚雷斯区的那些雅致的街道两旁是石砌的双层小楼房，底层都是车库，透过敞开的白色边框的阳台，隐约可见接待来访的客厅。梳着式样复杂的辫子，身穿蓝色制服的女佣们借这些阳台为室内通风，还在上面拍打壁毯上的尘土。

---

① 夸乌特莫克（1500—1525），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末代国王（1520—1521）。其名意为“扑击之鹰”，曾率领阿兹特克人英勇抵抗西班牙殖民者对特诺奇蒂特兰城的围攻。墨西哥人民尊奉他为民族英雄。

圣地亚哥一路上念着街道的名字：从尼萨、日内瓦、安特卫普、布拉格，到查布尔特佩克森林公园——即使在这个时候，丹东也没有从他的漫画书中抬起头来——直到在索诺拉大街的家。一进入这个栽满了桉树和松树的巨大的公园，圣地亚哥就仿佛进入了梦幻之中，两侧是卧着的雄狮，中间高处有一座童话般的城堡，那里有蒙特祖马的浴室，是1848年阿尔卡萨尔军事学校的少年英雄们宁死也不向美国佬投降的地方，是统治者居住的地方，从哈布斯堡家族的马克西米利安到卡西诺家族的阿贝拉尔多，直到新总统拉撒路·卡德纳斯①，后者觉得这豪华的处所不是为他准备的，非常"共和派地"搬到了卡斯蒂略山脚下一个普通的村子，松林镇。

坐在那儿吃第二顿早饭的时候，孩子们面无表情地听着他们生活中的新规矩，然而丹东目光中闪过的火花默默地表明，对每一项义务他都将报以出人意料的调皮行径。圣地亚哥的目光既抗拒新奇，又抗拒崇敬。劳拉准确地发觉，他空洞的目光中盛满了对哈拉帕，对外婆雷特西亚，以及对姨外婆玛丽亚·德·拉奥的思念。难道得把事物放在年轻的圣地亚哥身后，才能使他感到惊奇吗？劳拉想到这里，不由吃了一惊。她仔细地观察着她的大儿子，他面色严肃，五官端正，长着一头栗色的头发，那么像他死去的舅舅。这和丹东微黑的面庞，肉桂色的皮肤，两道又浓又黑的眉毛，抹着发蜡，头发梳得十分服帖的模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金黄头发的圣地亚哥有一双乌黑的眼睛，而肤色较黑的丹东却有一双灰绿色的眼睛，像猫的眼睛一样微微发黄。

---

① 拉撒路·卡德纳斯（1895—1970），墨西哥总统（1934—1940），在任期间将石油收归国有。

劳拉叹了口气。思念的对象总是过去，没有对未来的怀念。然而，在圣地亚哥眼中闪烁的，正如胡亚雷斯大街上十分抢眼的新广告词中所写的一样：我想念那将要发生的事……

他们将去马萨特兰大街的戈尔登学校上学，离家不远。早上胡安·弗朗西斯科将用别克车送他们上学，下午五点他们将搭乘橘黄色的校车回家。学习用品的单子很令人满意：瑞士产的伊贝哈德牌铅笔，没品牌的钢笔反正是要蘸到课桌上的墨水瓶里，学算术用的方格本，写作文用的横格本，共产党员特赫·萨博雷任教的民族史，仿佛是为了补偿由玛利亚派教士安弗斯教的数学、英语、西班牙语语法以及法国人马雷和伊萨克教的绿皮本的世界历史，书包，菜豆饼，夹着沙丁鱼和辣椒的薄饼，必须带上橘子，禁止买糖果，因为这只会蛀坏牙齿……

劳拉想用新的家务来充实每一天。夜晚窥视着她，清晨来敲她的门，而在这之间，她不能说：夜晚是我们的。

她不停地自责："我不能把自己最美好的部分埋入记忆的坟墓。"然而，夜晚丈夫无言的请求——"我向你要的就这么点儿。让我感到被需要吧。"——并不能平息白天当孩子们去上学，胡安·弗朗西斯科去工会，劳拉独自在家时常有的怒气，"没有孩子，没有丈夫的日子该多么简单啊！"当里维拉一家在纽约一场新的风波的余响中归来，劳拉也来到了考约坎。在纽约，迭戈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头像画到了洛克菲勒中心的壁画上，结果与中心同姓的内尔逊提出把苏联领导人的头像擦去，迭戈拒绝这么做，并且提议把列宁的头像画得和林肯的头像一样大。十二名全副武装的宪兵责令画家停工，并给了他一张一万四千美金的支票（"共产主义的画家靠资本主义的美金致富"）。工会试图抢救那幅壁

画，但洛克菲勒家族却派人把它拆了，扔到了垃圾堆里。真不错，美国共产党说，里维拉的壁画是“反革命”的。迭戈和弗里达回到了墨西哥，前者愁容满面，后者却不断地问候美国佬的老娘。大家都回来了，但对劳拉来说不存在确切的人数；迭戈想联合另一个新画派的壁画家一起报复美国佬。弗里达画了一幅穿着特华卡裙子的痛苦的自画像。这幅画挂在墨西哥和美国边境上没有灵魂的摩天大厦群中。劳丽塔[①]，你好。你好吗？有空过来。再见……

没有丈夫和孩子的日子。只是一种愤怒，像一只不断企图落在我们鼻尖上的苍蝇，异常顽固，挥之不去，因为劳拉已经知道没有胡安·弗朗西斯科和两个孩子丹东与年轻的圣地亚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了，在二者中选择，没有比重新做个贤妻良母更好、更伟大的存在方式了——只要胡安·弗朗西斯科不这么露骨地把爱她的义务与认定妻子在评断他的想法搅在一起。丈夫正在一个固定的港湾里停泊。一方面，他对劳拉过分的亲热仿佛是在弥补他过去所犯下的错误，这使劳拉感到愤怒，因为这原本是一种请求原谅的方式，最后却完全变质了。“我不是恨他，而是厌倦，他太爱我了。一个男人不应该爱得这么过分。胡安·弗朗西斯科缺少一种理智的平衡，他应该了解在女人被爱的需要和她对爱的怀疑之间有一条界限。”

胡安·弗朗西斯科，他的甜言蜜语，他的彬彬有礼，他向孩子们努力尽到父亲的责任，那是六年来未曾有过的，他的新习惯——每天向劳拉汇报自己白天干了些什么，却从来不过问对方，他讨好似的、拖沓的求爱方式，他在床单下将自己的脚靠近劳拉的脚，赤裸着突然从浴室中走出来，像个

---

① 劳丽塔为劳拉的昵称。

傻子似的四处寻找睡衣，全然不顾腰上已经出现的赘肉以及肤色黝黑的混血种人特有的苗条身材的丧失，甚至迫使劳拉采取主动，动作匆忙，机械地尽着配偶间的义务……

劳拉顺从地忍受着这一切，直到有一天，一个模糊的身影开始变得逐渐清晰，先是藏匿在街上的车水马龙中，接着在对面人行道上现出身影，最后当劳拉去巴林并且采购了一堆日用品回家时，出现在她身后不远处。劳拉不想请用人，因为关于格罗丽亚·索里亚诺修女的记忆太让她心痛了。再说，做家务能打发寂寞的时光。

这一发现的令人诧异之处在于，当劳拉发现自己被丈夫的手下跟踪时，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但这却比她看重此事对她触动更大。她向胡安·弗朗西斯科敞开了一条跟他们居住的那条街一般狭窄的街道。劳拉决定不从外在上监视胡安·弗朗西斯科，——不像他傻里傻气地这么干——而是使用另一项更有力的武器：道德监视。

拉撒路·卡德纳斯，来自米却肯州的将军，他的州的前任州长，执政党的领袖，曾当选总统，大家都认为他将成为革命最高首领普卢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将军操纵下众多不知羞耻的傀儡之一。那时的讥讽到了如此的地步，以至于在帕斯卡尔·奥尔蒂斯·鲁比奥任总统期间，一个爱开玩笑的家伙在查布尔特佩克的官邸前挂出了一条横幅：此处住的是总统，发号施令者住对面。下一位总统阿贝拉尔多·罗德里格斯[1]，被公认为是最高首领的又一傀儡。他镇压了一次又一次的罢工，首先是报务员大罢工，接着是新米却

---

① 阿维拉多·罗德里格斯（1889—1967），墨西哥总统（1932—1934），将军。

肯州的伦巴第的雇工大罢工和习惯了安东尼奥·葛兰西[①]领导的共产党斗争的新意大利地区意裔农民大罢工，最后是恰帕斯、维拉克鲁斯、普埃布拉和新莱昂地区农民的全国性罢工运动；罗德里格斯总统下令解雇所有参加罢工的人，而代之以军人。执行委员会控制下的法庭宣告一次又一次的罢工是“无理取闹”；军队和白色宪警杀害了许多意大利-墨西哥社区的工人。阿贝拉尔多又将那些为争取最低工资而战斗的全国罢工领袖囚禁到玛利亚斯群岛上废弃的监狱中，其中包括年轻的作家何塞·雷维尔塔斯[②]。

路易斯·拿破仑·莫罗内斯领导的老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无力保护工人，实力日渐衰弱，这时一个新领袖维森特·隆巴多·托莱达诺[③] 却像新星似地升了起来。他原先是一个托马斯主义者，现在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他一副苦行僧的外表，目光忧郁，瘦瘦的，头发凌乱，嘴上叼着烟斗。在墨西哥工农总同盟面前，隆巴多为现实中的工人斗争提供了新的选择；为土地、工资、集体合同而奋斗的劳动者们开始团结在墨西哥工农总同盟的麾下。正如在米却肯州，新总统卡德纳斯已经成了工会斗争之父。现在一切都需要改变：不再是卡列斯和莫罗内斯了，而是卡德纳斯和隆巴多了……

“那么，工会的独立呢，到哪儿去了，胡安·弗朗西斯

---

①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意大利共产党创建人，其思想至今对意大利共产主义仍有很大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钻研马克思主义，成为著名理论家。

② 何塞·雷维尔塔斯(1914—1976)，墨西哥作家。因从事群众运动，曾被捕和流放。

③ 维森特·隆巴多·托莱达诺(1894—1968)，墨西哥工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党创始人。

科?"一天晚上,劳拉听到惟一还来拜访她丈夫的一位老同志如是说。这位意志消沉的潘菲洛找不到吐痰的地方,因为劳拉叫人撤去了那些黄铜痰盂。

胡安·弗朗西斯科像背诵教义似的重复道:"在墨西哥,事物变化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

"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呢?"潘菲洛叹了口气,回答道。

卡德纳斯开始露出独立的迹象,而卡列斯则有些急不可耐了。处在其中的胡安·弗朗西斯科好像对工人运动的趋向和自己在其中所处的位置感到不知所措。劳拉捕捉到了这种不安,以适当的关心的口吻,开始不停地询问丈夫,如果最高首领卡列斯和卡德纳斯总统决裂,你会站在哪一边? 胡安·弗朗西斯科别无选择,又犯了和劳拉和好之前的老毛病,政治修辞法,说革命是团结的,革命领导者之间永远不会出现裂痕。可是,胡安·弗朗西斯科,当你还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时候,革命早已与你先前的那些理想分道扬镳了。(阿尔莫尼亚·阿斯纳尔在哈拉帕阁楼上的形象,她的封闭生活,和奥兰多的神秘关系,以及胡安·弗朗西斯科在葬礼上的祈祷,这一切重又联系起来了)。他像个信徒似的再次重复了那条教义:应该从内部开始施加影响,从外部会把你像口香糖似的压扁,战争爆发于制度的内部……

"应该懂得适应时势,不是吗?"

"当然,一向如此。政治是承诺的艺术。"

"承诺的艺术。"她一本正经地重复着。

"不错。"

应该蒙住眼睛否认发生的事情;胡安·弗朗西斯科可以解释,正是政治需要迫使他对政府许下了承诺……

"所有的政府? 随便哪个政府?"

……她无法问他是否受到良心的遣责;他大概会承认

自己不怕别人的意见,但他害怕劳拉·迪亚斯,害怕再次受到她的谴责。一天晚上,两人又吵了起来:

“我受够了你对我的审判。”

“我也受够了你监视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你把我的灵魂关在了地窖里。”

“你别这么伤心,你让我很难受。”

“别像圣徒跟罪人说话似的和我说话。就直接冲我来吧。”

“你跟我要这些毫无真实性的事情的结果,真让我生气。”

“别再以为我在审判你。”

“你以为只有你来审判我吗,可怜的人,你并不在乎我。”而她想问他,你以为我回到你身边就是为了原谅自己所犯的错误吗?她咬住了嘴唇。夜晚将我窥视,清晨将我释放。她走到孩子们的卧室,看看他们睡得怎么样,顺便平静一下情绪。

孩子们睡得正香。

只要看到埋在枕头里的那两个小脑袋,劳拉就心满意足了。圣地亚哥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被子一直拉到下巴颏,丹东却劈着腿,蹬翻了被子,仿佛即使在睡梦中两个孩子都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性格。劳拉扪心自问:劳拉·迪亚斯,在你生命的这个时刻,你得教给孩子们点什么,或者至少鼓起勇气问问他们:你们想知道什么?我能告诉你们什么?

她就这样坐在两张一模一样的床前。她只能告诉他们,他们被带到世间,并没有征得他们自己的同意,因此父母创造他们的自由并不能拯救他们,这些孩子是仇恨、需要

和无知的继承者，不管父母怎样努力，都无法取消这一遗产而不伤害到他们的自由。将轮到他们为了自己与世上遗留的种种恶习作斗争，而她作为母亲，只能退后，消失，变成自己后代的鬼魂。她有义务以他们的名义来抵抗，但却永远不能现身，只能永远隐匿在儿子的身边，不能去减少他的荣誉和责任，他要相信自己的自由，懂得打造自己的命运。除了像希尔达姨妈和维尔希尼亚姨妈那样，谨慎地关注，努力地忍受，祈求多活一段时间，少受点折磨之外，她还能做什么？

有时候，她整个晚上都看着他们睡觉，下定决心要陪伴着儿子们，无论去何方，就像那条悠长的海岸线，有了它，大海和海滩尽管完全不同，但却永不分离。尽管这种旅行只持续了一个晚上，但希望它永远不结束的想法在她的脑海中留下了一个关于孩子们的问题："上帝和人们会让我的孩子们在世间待多久，待多久呢？"

她注视着熟睡的孩子们，直到旭日东升，阳光照到孩子们的头上，她用双手就能感受到阳光，同时在问自己，她和她的孩子们能承受多少阳光。每一束阳光都会洒下一片阴影。

这时，劳拉·迪亚斯离开孩子们睡的床，带着轻微的晕眩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自言自语(好像是在对孩子们说)，为的是让他们理解自己的母亲，不要一开始同情她，后来却把她忘了，她对他们说，做一个被憎恨的母亲，被孩子的恨所释放的母亲，被憎恨，如果能承受的话，却永远不会被忘记，为此我必须变得积极，积极而活跃，尽管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希望能有一次真正的启示，是一种提升而非拒绝。没有丈夫、没有孩子的生活该多么容易啊！再来一次？这次吗？为什么不呢？自由在第一次里耗尽，上一次的失败关

上了我们通往幸福的门吗,那门通往可能存在于家园之外的幸福?我已耗尽了我的命运吗?圣地亚哥,丹东,不要抛弃我。让我跟你们去天涯海角,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我不想被人爱慕。我想被人等待。你们帮帮我。

第十二章 水藻公园:1938年

1938年,欧洲的民主国家在慕尼黑向希特勒屈服,纳粹占领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共和国被击溃了,在各条战线上节节败退。沃特·迪斯尼首次上演《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谢尔盖·爱森斯坦①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列尼·里芬施塔尔②的《柏林奥运会》也相继问世。"水晶之夜",德国的党卫军纵火焚烧了犹太人的教堂、商店、住宅和学校,美国国会成立了"反对美洲活动委员会",安托南·阿尔托③创建"残酷戏剧",奥尔逊·韦尔斯④使整个世界都相信火星人入侵了美国新泽西州。在墨西哥,拉撒路·卡德纳斯将石油收归国有。同样在墨西哥,两家敌对的电话公司——瑞典的爱立信和本国的墨西哥电信公司——分别独立提供服务。这样一来,不幸的爱立信用

---

① 谢尔盖·爱森斯坦(1898—1948),俄国电影导演和电影艺术理论家。他的创作包括三部经典影片《战舰波将金号》(1925),《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938)和《伊凡雷帝》(第一集 1944)。

② 列尼·里芬施塔尔(1902—2003),德国电影女演员、制片人、摄影师兼导演,以制作20世纪30年代那些渲染纳粹赫赫权势的记录片知名。

③ 安托南·阿尔托(1896—1948),法国剧作家、诗人、演员和超现实主义运动理论家,企图以他的"残酷戏剧"取代"资产阶级"的古典戏剧。

④ 奥尔逊·韦尔斯(1915—1985),美国电影演员、导演、制片人和剧作家。他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公民凯恩》(1941)成为了电影史上最有影响的影片之一。

户就无法与墨西哥电信公司的用户通话,反之亦然。这种混乱迫使爱立信的用户不得不求助于邻居、朋友、办公室或者公用电话来和墨西哥电信公司的用户联系,反之亦然。

“在墨西哥,连电话都是巴洛克式的。”奥兰多·希门内斯说。

现代城市的扩张使恋爱变得困难起来;谁也不愿意坐半个小时的汽车去享受一分钟或者半分钟的性爱。电话可以协调约会的中间环节。在巴黎,气压传输信或“蓝纸头”成为情侣幽会的纽带。这些蓝色的小信封可以容纳一切爱情誓言。情侣们收到蓝纸头比收到电报更加激动。然而在墨西哥,在这个石油国有化和保卫马德里的年代,如果恋人们不是邻居,并且又一个是爱立信的用户,另一个是墨西哥电信公司的用户的话,那么他们必须要创造出另外的、复杂的或者正如奥兰多所说,巴洛克式的各种通讯网络。

然而,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交流,第一条个人信息,却是再直接不过了。那是简简单单的四目相交。以后,她会告诉自己当时已经准备好去接受将要发生的一切,但当她看到他的时候,却好像她从未想过他。他们不是交换目光;他们把目光停泊在对方的眼中。她问自己:“为什么这个人与众不同?”隔着数百名应邀前来参加晚会的宾客,他默默地作出了回答,因为我的眼里只有你。

“因为他的眼里只有我。”

她想离开那儿;这种突如其来却又如此坦率的吸引让她感到害怕,这种邂逅的新奇让她警觉,一想到接近后会产生的后果她就感到不安。她想到了一切可能,激情、付出、罪孽、悔恨、丈夫和儿子;这些并非发生在既成事实之后,当时她已经不情愿地预见到这一切;而这一切仿佛发生在一

个大厅里，那里只有家族的幽灵围坐交谈，并严厉地审判她。

她想离开那里。她想逃走。他走上前来，仿佛猜透了她的心思，对她说：

“请你再多待一会儿。”

他们四目相交；他和她差不多高，比她的丈夫矮一些。在他开口之前，她就感觉到他对她的尊重，而且以“你”称呼只是西班牙人交往的习惯。他略带卡斯蒂利亚口音，外表也显出那里的特征；他不会超过四十岁，却早生华发，和他除了眉间之外没有明显皱纹的年轻肌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眼神，灿烂的笑容，笔直的侧影，礼貌却饱含激情的双眼。他面色白皙，眼眸乌黑。她想像他一样看看自己。

“请你再多待一会儿。”

“你的命令吗？”她冲动地说。

“不，”他笑了，“我的建议。”

从第一刻起，她就认为这个男人具有三项优点：含蓄、谨慎和独立，再加上无可挑剔的社交手腕。他不是小康阶层的墨西哥人，和那些经常造访圣卡耶塔诺庄园，参加卡门·科尔蒂娜鸡尾酒会的人不同。他是西班牙人，出身贵族。然而他的目光中却蕴含着忧郁，他的身上带着某种不安；这些不仅吸引着她，也令她不安，并且邀请她进入某种神秘。她问自己这是不是——她很快这样就称呼他——贵族所惯用的伎俩：谜一般出现在世人面前。

她试图进入这个男人的目光。他的双眼深陷，靠近头骨，靠近脑子。花白头发使黑色的目光变得明亮起来，就像在我们墨西哥人当中，印欧混血人的面庞也会变得白皙；一个肤色黝黑的青年借助白发可以变成像纸一样苍白的老人，仿佛时间冲刷掉了皮肤的颜色。

这个“贵族”向她投来充满爱慕的一瞥。这一瞥决定了她的命运。当晚，在水藻公园旁雷斯卡尔戈饭店的房间里，他们躺在一起，缓缓地，一次又一次地抚摩着对方的脸颊、头发、太阳穴。他请求她羡慕他，因为他可以看到各种姿势中她的脸庞，特别是在两人共度的分分秒秒里她神采奕奕的脸，光线使女性的脸庞发生了什么变化，女人的脸庞是怎样地依赖于一天中的各个时刻，白天、早晨、上午、中午、下午、黄昏、夜晚不同的光线，在任一时刻，光线无论是正面的或是侧面的，出人意料地自下而上的或是从上笼罩而下的，白天突如其来的或是暮色中轻柔抚摩的，在女人脸庞上说了些什么？他问她，而她却没有回答，也不愿回答，她觉得自己被宠爱，被羡慕，因为他在床上向她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她一直希望有个男人能问她这些问题，她知道这些问题是任何一个女人都希望自己的一生中，至少一个男人，至少一次能向她提出的问题。

她不再去想时间，她和他住在一起，从那个晚上，时间之外的时间，爱与激情的时间，就像一股旋风，把对生活的一切其他担忧都抛到九霄云外。一切场景都已被遗忘。尽管在那个夜晚之后的黎明，她曾担心时间，担心这个晚上，已经吞噬了以前她生命中的所有时光，也会把自己吞噬。她依偎着男人的身躯，以一种藤蔓般的坚韧拥抱着他，想像着没有他的时刻，他不在场却令人难忘，她审视自己，在那个可能出现却绝对不愿出现的时刻：他已经离去，而对他的记忆却仍存留的时刻。他将离去，但对他的记忆会永远地陪伴着她。她从那时起就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她很高兴，在她看来，就当时的完满而言，这个代价是低廉的。她不停地痛苦地问自己，那种无始无终的表情——目光——声音到底是什么意思？从第一刻起，她就不愿再失去它：

“为什么你如此与众不同?”

“因为我的眼里只有你。”

她喜欢性爱后的宁静。从第一次起她就喜欢上了这种宁静。这是一种期待中的承诺,关于一种分享的孤独。她喜爱选中的这个地方,因为这也是一个命中注定的地方。情侣们幽会的地方。市中心一个阴暗、凉爽、隐秘的公园附近的饭店。这正是她所期待的。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别人看来普通,只有情侣们才感到神秘的地方。她永远喜爱这个男人的躯体,苗条而结实,匀称而激情洋溢,谨慎却又野蛮,好像这个男人的躯体是一面千变万化的镜子,是造物主和不可避免的野兽在想像中的决斗,或者是我们之中最神圣的动物。她以前从不知道从激情到平静,从安静到燃烧,从节制到放纵的转变会是这么的迅速。一对湿漉的情侣,彼此丰富,不停地揣测着对方。她告诉他,无论在哪里她都能认出他来。

“在黑暗中摸索着也行吗?”

她点了点头。两具躯体顺从激情的释放,又紧紧地贴在了一起。窗外晨曦微露,公园里的垂柳将饭店包围其中。很容易迷失在高高的树墙迷宫中,迷失在那些更高的树丛中,这些树飒飒的声音,树冠摇曳的声音,传到情人们耳中,将人引入歧途,他们离近处很远,离虚空很近。

“从什么时候起你就不在外过夜了?”

“回来以后就从来没有过。”

“你需要借口吗?”

“需要。”

“你结婚了吗?”

“是的。”

“你找什么借口呢?”

“晚上我和弗里达在一起。”

“你必须解释吗?”

“我有两个很小的孩子。”

“你知道英语中有句成语,叫‘从不抱怨,从不解释’吗?”

“我认为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解释或不解释?”

“如果不说实话,我自己会很难受。但是如果我说了实话,会伤害所有的人。”

“你想没想过你我之间的事是我们私生活的一部分,谁也没有权利知道吗?”

“你是说我们俩吗? 你也需要保持沉默或者需要坦白吗?”

“不是,我只是问你知不知道一个结了婚的女人也能征服男人?”

“幸好弗里达家的电话是墨西哥电信公司的,而我们家的电话是爱立信的。这样我丈夫很难控制我的行动。”

他为着电话网的事笑了起来,她也不想问他是否结了婚,是否有别的女人。她听到他说,一个结了婚的女人能够征服除了她丈夫之外的男人,一个结了婚的女人能够继续征服男人,他的话足以使一种近乎混乱的兴奋,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将她再次热烈地投入西班牙人那对纤细却有力的胳膊,那黑黑的汗毛,那饥渴的双唇之中。那是她的贵族,她的情人,她所分享的男人,他很快就知道了一切,他知道她结了婚,她也想像着他有别的女人,只是这种直觉还无法让她理解那位女子,更无法亲眼见到她,豪尔赫·莫拉与那位在或不在这里的女人有什么样的关系?

劳拉·迪亚斯选择了怯懦。他没有告诉她另一个女人

是谁,长得怎么样。她却会告诉他,她的丈夫是谁,长得什么样,但是她会对胡安·弗朗西斯科守口如瓶,除非豪尔赫跟她说起另一个女人。她的新情人(奥兰多已经走过她记忆的街道)拥有一幢两层楼的房子。在门口他含蓄、谨慎,举止完全无可指摘,而在第二层他是开放的,完全付出的,仿佛被放逐于暴风雨中,在共沐爱河的时候毫无保留。结合的想法是无法抗拒的,这是一种成为男人的完美方式,一个严肃又充满激情,开放却又秘密,衣着庄重而赤裸时却又无所顾忌的男人。她承认一直渴望着一个这样的男人。终于,他出现了,一直在期望之中,也许此时刚刚被创造出来,但却揭示出一种永恒的渴望。

在这第一个共度的黎明,劳拉·迪亚斯透过饭店的窗户向公园望去,她知道,这是第一次,她和一个男人能互相凝视,互相了解而不需要言语、解释或多余的算计。他们彼此理解一切。共同度过的每一个时刻都使他们靠得更近。

豪尔赫再次吻她,仿佛猜透了她的所有,身体和头脑。她无法离开他,离开这个躯体,离开这个与她纠缠在一起的形象,她想重新感受性爱高潮的欢乐,宣告高潮时交织在一起的目光为她所有,她希望世上所有的情侣都能像她与莫拉一样,享受这时刻的美妙,这是她最大、最热切的渴望。任何其他人,不是闭上眼睛,就是转开脸,都不曾在高潮时注视过她,只有他们俩在高潮时彼此凝视,每次都是如此,借助含情脉脉却仍然清醒的目光,他们互称女人和男人,男人和女人,他们面对面地做爱,是惟一互相注视、面对面做爱的动物,看着我睁大的眼睛,没有比看到你注视着我更让我兴奋的了。性爱变成了目光的一部分,目光则成了性爱的灵魂,任何其他姿势,任何其他回答都成了诱惑,而被征服的诱惑都成了情侣们对下一次真实、美好的激情的许诺。

她转过脸，在彼此到达高潮的时候，睁大了双眼。

“豪尔赫，让我们祝愿世上所有的情侣都能如此。”

“祝愿所有的人，劳拉，亲爱的。”

现在，他像只猫一样在饭店凌乱的房间内踱来踱去。她从未见过这么多揉皱的纸团，这么多翻开的文件夹。房间显得很凌乱，而房间的主人却举止优雅，在其他方面都表现得井井有条。仿佛豪尔赫·莫拉根本就不喜欢这一堆乱纸，仿佛他的行李箱中装了些什么令人不快，惹人厌恶甚至有毒的东西。他没有合上文件夹，似乎是想把它们晾一晾，或者希望纸片渐渐飞到别处，或者希望某个冒失的房间女服务员能读上一读。

“她肯定一点儿也看不懂。”他带着苦涩的笑说道。

“你说什么？”

“没什么。但愿一切顺利。”

劳拉恢复到以前，或者说恢复到没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的样子：忧郁，羞涩，不拘小节，坚强，惹人喜爱。她这样做是因为她知道这一切会破坏欲望的脉搏，而欲望能破坏快乐，会变得挑剔，无视男人女人们的局限，使情侣们变得对自己的幸福太过在意。因此她开始引入日常生活的话题，以平息那毁灭的风暴，它从第一个晚上开始一直宿命般地伴随着快乐，让他们暗中感到害怕。然而她不必这么做，他已经抢先了一步。是他抢先了一步，还是预感到两人中的一个将从激情降为行动？

豪尔赫·莫拉作为西班牙共和国的代表来到墨西哥。1938 年 3 月，西班牙共和国的辖地已缩小为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几块飞地，以及南方巴伦西亚的一些地中海沿岸地区。拉撒路·卡德纳斯领导的墨西哥政府向共和派提供了外交援助，但是这些道德援助无法抵消纳粹法西斯政府向

佛朗哥叛军提供的压倒性的物质援助，更无法补偿那些欧洲民主政府，英国和法国怯懦的抛弃。柏林和罗马尽一切力量支持佛朗哥，巴黎和伦敦却抛弃了玛丽亚·桑伯拉诺所说的"婴儿共和国"，这朵西班牙民主的小花遭到了所有人的践踏：朋友、敌人、有时还有她的支持者……

劳拉·迪亚斯告诉他，她愿意和他共度此生，和他分享一切，了解一切，她爱他，疯狂地爱他。

听到这段告白，豪尔赫·莫拉却无动于衷，劳拉不知道这种倾听却不作任何评价的态度是否是一种严肃，抑或这个"贵族"只是稍事休息，以便开始他的讲述。也许两者都有些吧。他希望她先倾听，然后再作出决定。

"我发誓，如果我不了解你的一切，我会死去。"这次，她抢了先。

对西班牙的怀念使他陷入了沉思之中。他说西班牙对西班牙人来说，就像墨西哥对墨西哥人一样，是一种痛苦的怀念，而不像美国对美国人那样，是一首乐观的赞歌，也不像英国对英国人而言，是一则冷漠的笑话，不是情感上的疯狂——像俄国人那样——，不是理智的讥讽——像法国人那样——，也不是像德国人认为的那样，是一道进攻的命令，而是敌对双方的冲突，是灵魂的呻吟，西班牙与墨西哥，阳光和阴影下的国度。

当他俩漫步在水藻公园的树墙和松林之间，他开始讲述他的经历，但不作任何评论。几次散步中他先谈到墨西哥和卡斯蒂利亚的相似让他十分吃惊。为什么西班牙人选择了一个与卡斯蒂利亚如此相似的高原来建立她在美洲第一个主要的总督辖区？

目光所及之处，是两个饥饿国度的干燥土地，褐色的山峦，积雪的山峰，寒冷透明的空气，被毁的道路，毛驴，赤裸

的脚丫，穿着黑衣、围着披巾的妇女，有尊严的乞丐，漂亮的孩子，绚烂的鲜花和丰盛的美食。他还参观了和这里一样生长着新鲜蔬菜的绿洲。他感觉不到地域的变换，也许这不光在外表的，也是历史性的普遍现象，因为生为西班牙人或墨西哥人就意味着将经历化为宿命。

他爱她，希望她了解他的一切，了解他所经历的战争。他是个军人，服从命令。但是他先反抗，为的是以后更好地服从。鉴于他的出身，他从一开始就被安排从事外交任务。他曾是奥尔特加·加塞特[①]的弟子，是世纪之交那位主张改革的首相安东尼奥·莫拉·蒙塔内[②]的后裔，毕业于德国弗赖堡[③]大学。他要求首先经历战争以便了解真相，如果需要的话再去捍卫它，为它奔走协商；但首先必须了解战争。首先是经历的真实，然后是结论的真实。经历和结论，他对劳拉说，也许前者才是完整的真实，甚至结论本身也会被其他经历所否定。

“我不知道。我有一种强大的信念，同时还有一个巨大的疑团。我认为信念是思想的终结。我总是害怕这个我们帮助建立的制度最后会毁了我们自己。这并不容易。”

他在哈拉马参加了1937年冬天的战役。对那些日子他还能想起些什么？首先是生理上的感受。雾从你的嘴里飘出来，凛冽的寒风掏空了你的双眼。我们在哪儿？这是

---

① 奥尔特加·加塞特（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对20世纪西班牙的文化和文学复兴有重要影响。曾创办《西方杂志》（1923）。其著名作品为《没有脊梁骨的西班牙》（1922）和《群众的反抗》（1929）。

② 安东尼奥·莫拉·蒙塔内（1853—1925），西班牙政治家，曾五次出任首相，支持和实行一系列民主改革，以期阻止革命，推行君主立宪。

③ 德国西南部城市，南临瑞士，西接法国，是一座著名的大学城。德国著名哲学家胡塞尔于1916—1928年期间曾在弗赖堡大学任教。

战争最令人迷茫之处。你根本无法确定自己在哪儿。士兵的头脑中没有地图。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上级命令我们向侧翼移动,向虚无进发,命令我们化整为零,避免炮弹的轰炸。这是战争巨大的混乱。寒冷和饥饿是经常的。人也经常是不同的。很难在一天之后重新见到你见过的面孔,或重新听到你听过的声音。因此我决心专注于某个人,为的是让战争能有一张面孔。但主要是为了能有个伴,使自己在战争中不再孤独。那是多么孤独啊。

记得有一天我见到了一个美丽的女孩。她穿一身蓝色的工作服,有一张修女般的面庞。但她嘴里却吐出我一生中从未听到过的最粗俗的话语。我会永远记得她,因为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她有一头乌黑的秀发,像夜色一样黑得发蓝。浓密的双眉在生气时紧蹙在一起。鼻子上有道伤痕,但这也丝毫没有损伤她雄鹰般的侧影。不过她不时吐出脏话的嘴却破坏了在沉默时无声的祈祷。我确信这一点,于是我用目光向她说出了我的想法,她明白了我的意思,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她冲我说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话,我则以"阿门"来回答。她皮肤白皙,白得像一个从未见过阳光的修女,长着加利西亚式的小胡子。在这一切之中,对这一切而言,她弥足珍贵。她的话不仅是对法西斯分子,而且更是对死神的宣战。佛朗哥和死神是一对伟大的狗娘养的!有时候我想抹去对这个身穿蓝色工作服、脸色苍白、头发黑得发蓝的女孩的记忆。他笑着说,我需要像你这样和她完全不同的人让我现在想起她。也不是完全不同,你们俩都是高个子女人。

她开拔去了瓜达拉马,而我仍然留驻在哈拉马。我记得马路边上有许多孩子,他们高举着拳头,神情严肃,冲着太阳挤眼睛,满脸沧桑(你知道吗,那些被送到法国或英国

家庭的格尔尼卡[①] 孤儿,每次听到飞机的声音就又哭又闹?)。后来我只记得那些被遗弃的凄凉的地方,人们从那里匆匆离去。

在一条湍急浑浊的河边。

在一个布满山石和迷宫的潮湿山洞里。

与寒冷和饥饿相拥。

德国空军开始轰炸了。

我们知道德国人从不轰炸军事目标。

他们想把它们完整地留给佛朗哥。

施图卡轰炸机向城市和民众俯冲,这比炸毁一座桥引起了更大的伤亡,更能摧毁人的斗志。

因此最安全的是待在桥上。

目标格尔尼卡。

教训。

针对民众的战争。

我们在哪儿?

谁赢了?

这无关紧要:谁还活着?

豪尔赫·莫拉将劳拉·迪亚斯拥入怀中,"劳拉,我们弄错了历史。我不愿接受任何会破坏我们信念的事物……"

国际纵队开始到来。佛朗哥分子莫拉[②]率领城外的四个纵队和城内由叛徒和奸细组成的"第五纵队",将马德里团团围困。支持抵抗的是逐渐逃离佛朗哥控制的移民潮。首都到处是难民。那是高唱着"马德里,你多么顽强地抵

① 西班牙北部城市。

② 莫拉·维达尔,西班牙元帅。1936 年国民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一生追随佛朗哥。

抗"和"马德里妇女用流氓扔下的炸弹做发卷"的时刻。这不完全正确。城里还有不少佛朗哥分子。1936年，有一半马德里人投票反对人民阵线。共和派一些骄横的人坐着抢来的轿车在城里兜风，杀死了不少佛朗哥分子、教士和修女。这些举动使他们失去了人民对共和国的好感。我认为移民潮是马德里最大的防御。如果不是那些"发卷"，一种自杀式的但又不失尊严的战斗将席卷整个城市。作家们躲在一家剧院里，拉菲尔·阿尔维蒂[1]和玛丽亚·特雷莎·莱昂每晚都在那儿摸黑组织舞会，用来消除德国空军撒下的恐惧。我曾去参加过一次，那儿除了西班牙人，还有不少西班牙语美洲人，包括巴布罗·聂鲁达[2]、塞萨尔·巴列霍[3]、奥克塔维奥·帕斯[4] 和西凯罗斯，最后一位是墨西哥画家，他自封"上校"，雇了个擦皮鞋的跟着他，使他的"费德雷科"皮鞋保持锃亮。聂鲁达像大海一样行动缓慢，神情慵懒；巴列霍在眼皮间带来了穿着裹尸衣、画着黑眼圈的死神；帕斯的双眼比天还蓝；西凯罗斯本人就是一个军事仪仗队。所有的人都穿着特诺里奥戏剧的戏服，《拉斯·雷安德拉斯》[5]、《堂蒙多的复仇》和《萨拉梅阿村村长》的戏服以及所能找到的戏服。大家在炸弹威胁下的马德里，在同一个屋檐下跳舞喝香槟，不时地被德国的轰炸机照得雪亮。劳拉，这是

---

① 拉菲尔·阿尔维蒂(1902—1999)，20世纪西班牙著名诗人之一。代表作有《陆地上的水手》、《紫罗兰的黎明》、《石灰与歌》等。

② 巴布罗·聂鲁达(1904—1973)，智利著名诗人。197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③ 塞萨尔·巴列霍(1892—1938)，秘鲁诗人。

④ 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1999)，墨西哥著名诗人，199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⑤ 为弗郎西斯科·阿伦索(1887—1948)创作的戏剧。

怎样疯狂、兴奋的聚会啊！这可笑吗，应该受到指责还是应该受到夸奖？———一群诗人和画家在死亡中赞颂生命，让装腔作势、躲躲藏藏的敌人见鬼去吧，这些敌人正向我们扑来，带着法西斯反动派无穷的不幸和永恒的禁令：血脉的纯洁，宗教的纯洁，性的纯洁。我们早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从 1931 年共和国成立以来，他们就反对教会与世俗的混合教育，当确立世俗教育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孩子在胸口挂着耶稣受难像送到学校，他们是虚伪的长裙和恶臭的胳肢窝，是与阿拉伯的清洁、犹太人的节约为敌的哥特人，因为洗浴是摩尔人的证明，高利贷是犹太人的罪孽。他们是语言的腐化者。劳拉，你得听他们说话才能相信这是真的，他们毫不脸红地谈论自己捍卫的价值观，上帝炙热的呼吸，祖国高尚的土地，高贵自重的女人，稻穗丰产的皱褶，攻击共和国的阉人们和共济会的犹太成员，谴责马克思主义的号角，说它在西班牙引进了异国思潮，在西班牙人对天主教坚定的信仰领地上撒下了怀疑的种子：没有国籍的世界主义者，叛徒，西班牙和基督教血脉基石的破坏者，红色流氓！所以在炸弹照明下的剧院里，阿尔维蒂的化装舞会就像是另一个西班牙的宣战，一个借着想像永远脱离压迫的西班牙。就是在那儿，我认识了两个国际纵队的小伙子，两个美国人。意大利共产党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①和法国共产主义者安德烈·马尔蒂奉命组织国际纵队。从 1936 年 7 月起，一万多名外国志愿者越过了比利牛斯山。到 11 月初，大约三千人到达了马德里。当时的口号是“不许通过”。不让法西斯分子通过，而让国际纵队的战士们通过，人们张

①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1893—1964)，领导意大利共产党近四十年的政治家，使意共成为西欧最大的共产党组织，曾任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

开双臂欢迎他们的到来。咖啡馆里到处都是国际纵队的战士和外国记者。人们向他们所有的人高呼“俄国人万岁!”。有个德国人经常在那儿出没,他是共产主义者,也是贵族,我忘不了他那神话般的名字:阿诺德·弗里德里希·维尔特·冯·戈尔泽瑙。他走到我身边,仿佛认识我似的,用“莫拉”和我其他的姓氏称呼我,像是为了使我们更加相似,他把我叫到身边,带着一种贵族和共产主义者的优越。他发觉我有所保留,就笑着说:“莫拉,我们之间是可以信任的。我们并不想得到什么好处。我们的真诚不容置疑。应该由有钱有势的贵族,那些没有自卑感,也没有经济需要的人来进行革命。那样就不会产生腐败。是腐败使革命失败了,让人们想到,即使从前的那种制度让人讨厌,新制度却更令人讨厌,因为如果说保守派已不再使人有希望,左派就则会背叛希望。”“不错,”我以和解的口吻回答他,“在革命中失败的是贵族和工人,攫取胜利果实的却是资产阶级。”“对,”他让步了,“他们总是有些东西要得到。”“而我们,”我提醒他,“我们总有些东西要失去。”他放声大笑。冯·戈尔泽瑙,在国际纵队中大家都叫他的化名“任”,他的犬儒主义却不属于我。这场战争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战争的谈论者,理论归纳者,思考者以及战略部署者,另一层是广大的普通百姓,他们其实并不普通,而是非常的不平凡,他们每天都表现出无穷的勇气,劳拉,他们战斗在所有伟大的战役中:马德里、哈拉马、布鲁内特、特鲁埃尔①,在瓜达拉哈拉使墨索里尼大溃败。第一线从未空缺。村子里的共和党人争着做第一批牺牲的人。高举着拳头的孩子,光着脚丫的男人,胸前揣着最后一块面包的妇女,扛着生锈步枪的民兵,所有

---

① 西班牙北部阿拉贡地区特鲁埃尔省省会。

的人都战斗在战壕里，大街上，田野上，没有人皱眉，没有人怯懦逃跑。这真是前所未见的一幕。我在哈拉马的时候，战斗十分激烈，数以万计的非洲军队在奥尔加斯将军①的指挥下，在纳粹"神鹰兵团"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冲上阵来。共和派的俄国坦克阻止了法西斯的进攻，战线在两股力量之间来回摆动。战斗非常激烈，医院里住满了伤员和染上非洲佬带来的疟疾的病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可笑的联合。过去摩尔人被天主教国王和王后② 以保持血统纯洁的名义驱逐出西班牙，今天，他们站在德国种族主义分子一边，与另一个专制主义暴君约瑟夫·斯大林的坦克支援下的民主共和的民族作战。几乎是下意识地出于一种对自由的亲近和对任和陶里亚蒂的反感，我和来自美国的国际纵队战士成了朋友。他们是吉姆和哈瑞。哈瑞是一个纽约小伙子，犹太人，促使他前来的两个原因很简单：对排犹主义的痛恨和共产主义信仰。吉姆的情况比较复杂。他是纽约一位著名记者兼作家的儿子，他来的时候非常年轻——那时他大概二十五岁——带着报社的委任书，受到两位著名的特派记者文森特·希恩和厄内斯特·海明威的庇护。希恩和海明威曾争论过在西班牙前线光荣牺牲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来西班牙干什么，海明威对希恩说，你惟一能得到的报道就是关于你自己死亡的报道，而这对你也派不上什么用场，因为这篇报道将由我来写。希恩是一个面貌英俊，神采奕奕的男人，他很快答道："你牺牲的故事会更有影响，而这将由我来写。"他俩身后跟着一个高个子青年，长相平平，

---

① 奥尔加斯(1881—1946)，西班牙将军、陆军统帅，1941 年被任命为西班牙驻摩洛哥高级官员。

② 历史上，天主教国王和王后专指的西班牙国王和王后。

眼睛近视，这就是吉姆，吉姆身后是小个子的犹太人哈瑞，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希恩和海明威去报道这场战争，但吉姆和哈瑞却留下来参加战斗。犹太小伙子以斗鸡般的英勇弥补了体质的虚弱。长相平平的纽约高个子一开始就把他那副重要的眼镜弄丢了，还笑着说看不清他要杀的敌人更好。两人都有这种纽约式的幽默，介于伤感、禁欲与自嘲之间。“我想给朋友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吉姆说。“我需要给自己弄一份简历来抵消我的公众情结。”哈瑞说。“我想知道什么是害怕。”吉姆说。“我想拯救自己的灵魂。”哈瑞说。两人都说：“永别了，领带！”他们留着胡子，穿着草鞋和越来越破旧的制服，大声地吼着吉尔伯特[①]和沙利文[②]创作的《日本天皇》中的歌曲，这一对美国人真是我们团队的兴奋剂。他们不仅丢了领带和眼镜，甚至连袜子都丢了。但是他们赢得了所有人，包括西班牙人和国际纵队战士们的一致喜爱。像吉姆这样的近视眼一天晚上要求带领一支小分队出去侦察，你从此可以看出我们的战争是一种英雄主义的疯狂。哈瑞则比较谨慎，“今天我们必须活下去，为的是明天能继续战斗。”在哈拉马，尽管有德国的飞机，俄国的坦克和国际纵队，然而却是我们西班牙人，是我们在战斗。哈瑞承认这一点，却提醒我注意：是西班牙的共产主义者。他说的不错。1937 年初，共产党员的人数从两万人增加到二十万，到夏天，已有一百万名共产党员了。马德里保卫战使共产党拥有了这些数字和这种优势。斯大林的政策是想最

---

① 吉尔伯特（1836—1911），英国剧作家和幽默作家，以同沙利文合写的喜剧闻名于世。《日本天皇》（1885）即是他们合写的一部歌剧。

② 沙利文（1842—1900），英国作曲家，和吉尔伯特一起建立了具有特色的英国轻歌剧。

终除去他们。社会主义从来没有比斯大林更可怕的敌人。然而在1937年,哈瑞只看到了无产阶级及其共产主义先锋的胜利。他成天和大家讨论。他阅读了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像读《圣经》似的不停地反复阅读,总是以同一句话“我们会见到明天”来结束他的祈祷。这是他的 Dominus Vobiscum[①]。在他看来,对像布哈林这样正直的共产党员的审判和处决只是通向未来的光辉大道上发生的意外。哈瑞,哈瑞·杰夫,身材矮小,生性不安,理性坚强,体质虚弱,道德上模糊不定,因为他不懂得一种不容批评的政治信念的虚弱之处。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个子吉姆,他认为理论并不重要。“一个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有理,”他说,“那么就应该为正确的事物而战斗。这很简单。现在在这儿,共和国有理,法西斯分子没理。应该和共和国站在一起,如此而已。”他俩就像堂吉诃德和桑丘,只是他们的蒙铁尔战场是布鲁克林[②]和昆斯[③]。嗯,他们更像是穆特和吉夫,只是更年轻,更严肃。我记得我那时常常和哈瑞在桥上一起倚着栏杆,一边抽烟,一边聊天,这一举动倒是符合法西斯分子不攻击交通路线的理论。相反,吉姆总是寻找行动,要求去最危险的哨所,跑到火线前沿去“寻找我丢失的眼镜”,他总是这么开着玩笑。他个子高大,总是笑眯眯的,彬彬有礼得令人难以置信,说话谨慎(“我把脏话留给了我父亲。这些脏话我听了这么多次,最后它们对我不再构成负担。在纽约,有一种报纸、罪行和粗野的赌博所共用的公众语

---

① 拉丁语,“主与你们同在”。

② 美国纽约州东南部纽约市的五个行政区之一,位于长岛西南部,与曼哈顿隔河相望。

③ 美国纽约市五个行政区中面积最大的一个,位于长岛西部,现既为住宅区和也是工业区。

言,还有一种秘密语言,关于感性、微妙的欣赏和幸运的孤独。我想等我从这儿回去以后,用第二种语言写点东西,老乔治[1]。其实,我和父亲互相补充,他感谢我的语言,我也感激他的语言。真他妈的!这个长相平平,勇敢无畏的高个子笑了)。我和他一起爬上树梢,眺望卡斯蒂利亚的田野。在大地躯体上战争留下的道道伤痕中间,我们俩分辨出畜群、风车,黄昏的康乃馨,清晨的玫瑰,姑娘们美丽的双腿,田垄等待着战壕像伤痕一样愈合;这是塞万提斯和戈雅的土地,我告诉他,没有人能把她杀死。不,这也是荷马的新土地,他回答,这块土地与粉红色手指的光环、人们被毁灭的致命的愤怒一起诞生……一天,吉姆没有回来。我和哈瑞等了他整整一个晚上,起先我们互相注视,一言不发,接着我们开玩笑说,这个美国佬,威士忌可能把他弄死,炸药却无论如何不可能。他再也没有回来。大家都知道他死了,因为在一个像哈拉马那样的前线,一个人要是两天不回来,那就是已经死了。医院最多耽搁四十八个小时就会发布伤员的消息。统计死亡人数需要更多的时间,在前线,每天都有数百人失踪。但是这次,大家都继续询问着吉姆的消息,好像他只是迷了路或者暂时不在。我和哈瑞直到这时才发现,其他国际纵队和共和派军队的人都是那么喜爱吉姆。他有千百个理由让大家喜爱他。我们告诉自己,这个回忆的举动让我们在死亡中看到,说出了一生中从未看到从未说出的东西。劳拉,我们永远拙于现时,却善于怀念过去。后来我让自己相信,只有我知道吉姆死了,是我一直让他活着,为的是不让哈瑞和其他喜爱这个能说会道的美国大孩子的同志意志消沉。但后来我发现大家都知道他死

---

[1] 西班牙语的Jorge(豪尔赫)在英语中为George(乔治)。

了,大家一致决定撒谎,说我们的同志还活着。

“你看见吉姆了吗?”

“看见了。早上他和我告别来着。”

“他接到了命令,有任务在身。”

“真希望能告诉他我们都在等他。”

“他跟我说他知道。”

“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我知道你们大家都在等我。”

“他肯定知道。我们在这儿等他。但愿没人说他死了。”

“你看,今天的邮件里有他一直等着的眼镜。”

豪尔赫·莫拉把劳拉·迪亚斯拥入怀中。“我们弄错了历史。我不愿承认会破坏我们的信念的任何事物。我们多么希望能成为英雄,多么愿意保留我们的信念啊……”

这天早上,劳拉·迪亚斯走过了整条起义者大道,一直走到她在罗马区的家。莫拉激动的颤抖仍然像密集的雨丝扫遍了她的全身。她不在乎这个西班牙人没有将他的私生活坦诚相告。他已经向她讲述了他整个的公众生活:多么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成为英雄。她自己也多么渴望成为英雄啊。但是在听了豪尔赫·莫拉的话之后,她明白英雄主义不是一厢情愿的计划,而是面对可以想像却无法预料的周围环境的一种反应。在她自己的生活中,没有什么算得上是英雄的;或许某一天,借助她的西班牙情人,她会知道如何应付英雄主义的挑战。

胡安·弗朗西斯科……他坐在双人床上,或许是在等她,或许不再等待她这个明显该受到谴责的人……圣地亚哥和丹东,我们的孩子,我有责任独自照顾他们。我不会问你去了哪里——然而这取决于他自己,取决于不再监视她的承诺,他最后的尊严。在这样没有任何解释,也根本无法

解释地离开了四天之后，她能跟他说什么？除了劳拉·迪亚斯和豪尔赫·莫拉，没人能够解释：对情侣们没有时间可言，激情无法用时间来测量……

“我跟孩子们说你妈妈身体不大舒服，你得去一趟哈拉帕。”

“谢谢。”

“没有别的了吗？”

“你想要什么？”

“劳拉，欺骗是让人最难忍受的。”

“你以为我觉得自己有权利做这一切吗？”

“为什么？因为有一天我告发了一个女人，因为那天我打了你，因为另一天我派了个侦探跟踪你？”

“这些都没有赋予我欺骗你的权利。”

“那么，是什么？”

“今天你好像已经有了所有的答案。你自己回答吧。”

胡安·弗朗西斯科背对着他的妻子，以一种伤感的口吻说道，只有一件事赋予了她世上所有的权利，安排她自己的生活的权利，欺骗他、羞辱他的权利，不是一场彼此进球直至打成平手的体育比赛，不，从来不是那么简单，这个高大、老迈、黝黑的男人忍无可忍地说，那就是一项没有履行的诺言，一种失望，我不是当初你在俱乐部的舞会上认识的那个无畏的革命者。

我不是英雄。

可有一天你曾经是，劳拉想作出肯定的回答，又想提出疑问，你曾经是英雄吗？他会明白，仿佛她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似的作出回答，当岁月和环境都不再许可时，怎样才能维持失去的英雄主义？

“我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大家都在为革命，为反对

不公正而战斗，也为反抗不幸而奋斗。劳拉，我们不想继续做贫穷、卑微、没有权利的人，我也不例外。你看看大家。卡列斯曾是一个穷苦的乡村教师；莫罗内斯曾是个报务员；现在这个菲德尔·贝拉斯克斯曾经卖过牛奶，其他的领导人过去曾经做过木匠、农民、电工和铁路工人。你想他们怎么会不抓住并好好地利用机会呢？饿着肚子长大，和六个人一起挤在一间茅屋里，有一半的兄弟姐妹未到成年就夭折，母亲在三十岁时就显得十分苍老，你知道这些意味着什么吗？一个出生在本哈莫，屋顶只比炕席高出一米的人想在波朗科找一个屋顶比他的脑袋还要高出十米的房子，你无法理解吗？你说，莫罗内斯他身边有了一幢养那群婊子的房子，还要送给他老妈一幢坐落在加利福尼亚的别墅，这是否有理？妈的，想做一名正直的革命者，你知道，像美国那个罗斯福一样，得先有钱……如果你来自芦席饼铛之家，亲爱的，你一定也永远都不愿回到那个满是跳蚤的世界，直到忘掉那些被你抛在身后的人，你置身于炼狱之中，为的是不再回到地狱，让别人在你所背弃的天堂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你怎么看我的？说实话，劳拉，说实话……”

我没有答案，只有问题。胡安·弗朗西斯科，你做了些什么？你曾是个英雄，现在你已经厌倦了吗？你的英雄主义是谎言吗？为什么你从来不告诉我你的过去？你想和我从头开始吗？你以为你自吹自擂会侮辱我吗？你在等待，像过去那样，等待别人来替你做吗？让别人向我灌输关于你的种种传说，而你不需要强调、证实或否认？你就满足于我听别人怎么说你，这是对我的测试，相信他们，不是凭借了解，而是凭借其他的什么东西，凭借盲目爱情就相信你？因为刚开始时你就是这么对待我的，把我当作你忠诚、沉默的小妻子，当你和其他领导人在餐厅计划着墨西哥的未来，

我则坐在一旁的客厅织毛衣，你还记得吗？告诉我，我能把你的哪一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孩子，全部的真相还是部分的真相，我对你的生活好的想像，还是坏的想像？父亲的哪一部分能够触动丹东，哪一部分能触动圣地亚哥呢？

“你生活中的哪一部分对孩子们的生活更有用？”

“劳拉，你知道吗，教义上说有原罪，所以我们才是现在这种样子。”

“我只相信有原始的秘密。你的秘密是什么呢？”

“别逗我了，小傻瓜。如果是秘密的，就没法知道了。”

只有时间，像烟雾一样消散的时间才能揭示胡安·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格林，这位来自塔巴斯科州的工人领袖的真实面目，这个3月的早晨，劳拉走在水藻公园里，这么想着。她仍然沉浸在对一个完全不同的男子的爱情中，那是她热切渴望的男人。豪尔赫·莫拉是我真正的丈夫，豪尔赫·莫拉应该是我孩子真正的父亲。她决心回家告诉她的丈夫，我有个情人，那是一个很棒的人，我把一切交给了他，都留给了他，我抛下了你，抛下了我的孩子……

她要在孩子们从学校回来之前跟他说。孩子们放假了。全家人要去中心广场庆祝石油国有化，是卡德纳斯总统，一个勇敢的革命者对抗外国公司，下令让他们离开，收回了国家的财富

地下

魔鬼的毒药

抢占了塔毛利帕斯[①]村社公共土地的英国公司

雇用无赖当打手对付工会的荷兰公司

坐着接待墨西哥劳动人民，又不理睬他们的美国经理

---

① 墨西哥东北部一州，北邻美国，东临墨西哥湾。

美国佬，荷兰人，英国人，带着他们的白人工程师，带着他们的蓝图走了，用盐水注满了油井

第一位来到波萨里卡[①]的墨西哥工程师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凑上来询问的工人："头儿，我往油管里倒桶水？"

因此他们一家四口，胡安·弗朗西斯科，劳拉·迪亚斯，丹东和圣地亚哥这天下午也挤在中心广场的教堂和市政厅之间的人群中。他们的目光集中在宫殿的阳台上，注视着革命总统拉撒路·卡德纳斯。他已经降服了那些外国探险者，那些墨西哥劳动和财富永远的吸血鬼。石油是我们的了！广场上的人群为卡德纳斯欢呼，为墨西哥欢呼。为了偿还被征用的债务，有钱的太太捐出了首饰，贫穷的妇女献出了母鸡，伦敦和海牙与墨西哥断绝了关系，石油是墨西哥的了，那么就让他们去喝石油吧，看谁会买他们的石油。受到抵制的卡德纳斯不得不把石油卖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而同时他又向西班牙共和国运送枪支弹药。在人群中豪尔赫·莫拉远远地看见劳拉·迪亚斯和她的家人，劳拉也认出了他，豪尔赫摘下帽子，和他们大家打招呼，胡安·弗朗西斯科好奇地看着这个人，劳拉默默地对他说，亲爱的，我不能。我不能，请原谅我。请再来看我，我给你打电话。你家的电话是墨西哥电信公司的，而我的是爱立信的……

---

① 墨西哥中东部维拉克鲁斯州内中北部城市，海拔六十米，位于墨西哥城东北，不宜居住，但为全国最大油区之一，是主要的石油化工中心。

第十三章　巴黎咖啡馆:1939年

“我得跟你说说拉克尔·阿莱曼。”

他还向她说起在墨西哥的共和国事业的伙伴,他们肩负着与他不同的使命。他们习惯于在市中心5月5号大街的巴黎咖啡馆碰面。当时墨西哥的知识分子们经常光顾此地,为首的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奥克塔维奥·巴雷达,他的讽刺无所不在,他与鲁佩·马林的一个姐妹,也就是迭戈·里维拉在弗里达之前的妻子,结了婚。卡门·巴雷达坐在巴黎咖啡馆,不动声色地听着她丈夫的讥讽和嘲笑,从不为他喝彩,而他似乎很感激她这么做;这是对她丈夫干瘪、不动声色的幽默[1] 的最佳评论。她丈夫最终将艾略特的《荒原》译成了西班牙语。

大家都盼望他能创作出一部前所未有的巨著;他是一个尖锐的批评家,文学杂志的推动者,外表高瘦醒目,五官好像独立时期的英雄,面孔黑而闪亮,双眼碧绿,目光灵活。他与两位杰出的诗人哈维尔·比利亚乌鲁蒂亚[2]和何塞·戈罗斯蒂萨[3]同坐一桌。比利亚乌鲁蒂亚善于约束自己,他的诗使人感觉太过直白,以至显得内容贫乏。实际上他已

① 原文为英语 dead-pan humour。
② 哈维尔·比利亚乌鲁蒂亚(1903—1950),墨西哥诗人,戏剧家。
③ 何塞·戈罗斯蒂萨(1901—1973),墨西哥诗人。

经创作了厚厚的一卷诗集，在其中墨西哥城被赋予了一种忧伤、温柔的敏感，这是在他之前，谁都不曾办到的。

梦，梦见夜晚、街道、扶梯
和在拐角处舒展身子的雕像的叫喊。
奔向雕像，只找到了叫喊声，
去触摸喊声，却只找到了回音，
去抓住回音，却只碰到了墙壁，
跑向墙壁，却撞上了镜子。

比利亚乌鲁蒂亚个子矮小，身体单薄，仿佛随时会受到神秘而无可名状的力量的伤害。他的生命体现在诗歌中。戈罗斯蒂萨则和他截然不同，他身体结实，为人机灵，寡言少语。他只创作过一首伟大的诗篇《没有终极的死亡》。许多人认为这是自17世纪的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以来墨西哥最优美的诗篇。这首诗描写的是死亡与形式，形式——杯子——延迟了死亡——水，水在颤抖中停止，如同生命本身的流动状态。在形式与流动之间，人类浓缩于他那必死的侧影之中，“一个无法捕捉的神灵占据了我，包围了我的表面，令我窒息”。

在这些墨西哥作家中，存在着重大的吸引和抗拒，海梅·托雷斯·博德特[1]似乎是其中的不和谐点，一位在文学和仕途之间摇摆不定的诗人兼小说家。他最终选择了后者，却从不放弃文学上的雄心。巴雷达有时摆出他自己笔下的人物——某个中国洗衣工兼间谍李富禅医生——的架势对戈罗斯蒂萨说：

① 海梅·托雷斯·博德特(1902—1974)，墨西哥诗人，外交官。

“小心托雷斯。”

“哪个托雷斯?”

“托雷斯·博德特。”

豪尔赫·莫拉和他的朋友们坐在这个墨西哥咖啡馆里,就像坐在自己家里参加某个马德里式的聚会——聚会这个词,比利亚乌鲁蒂亚记得是来自德尔图良的名字[①],这位公元2世纪前后的教父喜欢和他的朋友们聚在一起,进行苏格拉底式的辩论,不过很难想像和德尔图良这么教条的人进行辩论会是什么样子,在他看来,教会是真理的主宰,没有必要再进行什么辩论。巴雷达为他即席创作或回忆了一首滑稽诗:

盛装打扮,仿佛准备参加聚会,
犹滴[②]出了家门,走向贝图利亚……

我们的辩论想成为苏格拉底式的,但却常常变成了德尔图良式的,豪尔赫·莫拉在走进咖啡馆之前提醒了劳拉·迪亚斯。其他的聚会者,或者说苏格拉底式的聚会者,有巴西略·巴塔萨尔,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肤色黝黑,头发浓密,眉毛粗重,目光明亮,笑容像阳光般灿烂,还有多明戈·比达尔,他的面庞棱角分明,仿佛刀削斧劈一样,与他的年纪很相称,又好像出自一块石刻的日历。他不时地搔搔

---

① 德尔图良(Tertuliano,约155或160—220以后),基督教早期重要的神学家、雄辩家、伦理学家,教会拉丁语的创始者,在传播基督教词汇和教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此处的“聚会”一词,原文作tertulia,所以比利亚乌鲁蒂亚说是来自德尔图良的名字。

② 《圣经》中的犹太女英雄,为拯救贝图利亚城,割下了敌军首领荷罗孚尼的头颅。

头,使他的五官呈现出略带攻击性的生动表情,好像是为了抵消厚厚的眼睑下那慵懒而温柔的目光。

“我的绅士,我去了不会打扰你的同伴吗?”

“劳拉,我希望你能在场。”

“至少你得告诉他们一声。”

“他们已经知道了。因为你就是我,这就够了。要是他们不能理解,那他们就去做弥撒好了。”

这天下午他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共产党在战争中的作用。步入咖啡馆的时候,豪尔赫告诉劳拉,比达尔将扮演共产党员的角色,巴塔萨尔则扮演无政府主义者的角色。这是商量好的。

“那你呢?”

“你先听我说,然后你自己判断。”

两位聚会者向劳拉表示欢迎,没有言不由衷的举动。让劳拉吃惊的是,听巴塔萨尔和比达尔讨论战争的口气,好像他们处在正在发生的一切的一年或两年之前。共和国不仅仅是看到了失败,它已经失败了。而远处的奥克塔维奥·巴雷达的脸上写满了好奇,劳拉·迪亚斯,她和谁走在一起?这姑娘曾在弗里达失去孩子的时候,陪伴里维拉一家去了底特律。比利亚乌鲁蒂亚和戈罗斯蒂萨耸了耸肩。

辩论开始了。劳拉立刻觉得这的确是计划好的、可以预见的,仿佛每一个聚会者都在戏剧中担任了某个角色。她责备自己,告诉自己她的印象已经被莫拉那些话所左右。比达尔首先发难,好像是受到了某个隐身提词员的提示,他论证说,他们共产党人在1936年和1937年拯救了共和国。要是没有他们,马德里早在1937年的冬天就陷落了。要是没有共产党颁布的命令,无论是民兵还是人民军队都无法抵挡首都街道上的混乱,食品、交通和生产的匮乏。

“你忘了所有其他的人。”巴塔萨尔提醒他，“那些同意拯救共和国，却不赞同你们的主张的人。”

比达尔皱起了眉头，随后又放声大笑，他说，这不是赞同或不赞同的问题，而是谁能以最有效的方式拯救共和国。我们共产党推行团结一致的政策，反对那些在战争中还要求无政府主义多元化的人，就像你，巴塔萨尔。

“难道你们更喜欢一系列小规模的内战？无政府主义者是一派，军队是一派，共产党人反对所有人，也遭到所有人的反对，最后却把胜利拱手让给敌人，他们倒很团结。”比达尔扯了扯前额上的头发，这回，他没有搔头。

巴西略·巴塔萨尔沉默了一会儿，劳拉想，这个人在试图理清他的思路，可是他的确很混乱。也许是我错了。这是一种我不了解的痛苦。

“然而事实上我们输了。”过了一会儿巴西略有些悲伤地说。

“要是没有共产党的纪律，我们会失败得更快。”比达尔以一种过分中立的口吻说，仿佛是出于对巴西略没有表现出来的痛苦的尊重，提前提出了这个无政府主义者可能提出的问题，你们会问，我们失败不就是因为共产党把自身的利益和苏联的利益放到了西班牙人民的集体利益之上了吗？那么我告诉你，共产党的利益和西班牙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苏联人民用武器和金钱帮助我们，不仅仅是帮助共产党人。

“共产党帮助了西班牙。”比达尔最后说，然后注视着豪尔赫·莫拉，好像大家都知道，只要巴西略·巴塔萨尔突然推一把，接下去的讨论就由豪尔赫·莫拉来负责。出乎大家的意料，莫拉以低沉的声音提出了他的问题，这比他高声说话更加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然而，西班牙是什么？我认为，她

不仅仅是共产党人，也是我们无政府主义者、自由派和议会民主派，共产党却在逐渐孤立、消灭党外的所有人，它通过削弱其他共和派，通过嘲笑一切非共产党的主张来加强自身，推行自己的意志，它号召团结，实际上却施行分裂。”

“所以我们失败了。”过了一会儿，巴塔萨尔说，他的目光深深低垂，劳拉先是猜测，随后又感觉到某种比政治讨论更个人的东西。

“莫拉，你很沉默。”比达尔回过头来，对巴塔萨尔的沉默表示尊重。

“好吧。”豪尔赫笑了，“我来一杯牛奶咖啡，比达尔来杯啤酒，至于巴西略嘛，他已经迷上了龙舌兰酒。”

“我不想隐瞒大家的分歧。”

“我也不想。”比达尔说。

“谁也不想。”巴塔萨尔有些匆忙地说。

莫拉认为西班牙不仅仅是西班牙。这是他一贯坚持的看法。西班牙是法西斯分子们对抗整个世界的总体战争的演习，如果西班牙输了，那么欧洲和整个世界都会输……

（“我得跟你说说拉克尔·阿莱曼……”）

“请原谅我为魔鬼辩护。”比达尔以他特有的方式笑了笑。他是第一个穿着马海毛的运动衫——墨西哥人管这叫毛线衫——走进墨西哥一个正式咖啡馆的人，好像他刚刚从工厂出来。“想像一下，如果革命在西班牙取得了胜利，那会发生什么事？魔鬼说，那么德国就会侵略我们。”

“但是德国已经侵略了我们。”巴西略·巴塔萨尔以平静的失望打断了他，“西班牙已经被希特勒占领了。同志，你还在维护什么？或者你在害怕什么？”

“我害怕一个混乱的共和国的胜利，这种胜利只会导致法西斯分子的永久胜利。”

比达尔拿起啤酒杯，就像一头在沙漠中刚刚找到水源的骆驼。

“你是想说最好佛朗哥先赢了这场战争，然后我们再发起一场总的战争来反抗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的法西斯分子?”巴西略非常失望地说。

“巴西略，我的魔鬼也这么说。纳粹分子欺骗了全世界，他们正逐渐占领欧洲，却没有遭到任何抵抗。法国人和英国人天真地，或者说怯懦地相信能和希特勒缔结协约。只有在这儿，纳粹分子不欺骗任何人……”

“这儿? 在墨西哥?”劳拉笑了，想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

“对不起，一千个对不起。”比达尔笑了，“只是在西班牙。”

“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劳拉又笑了，“比达尔先生，我明白你的这个‘这儿’。要是我在西班牙，我会说，‘在这儿，在墨西哥’。对不起。”

“你喝点什么?”巴西略问道。

“巧克力汁。这是我们的习惯。是用小磨加水制成的。我的 Mutti，就是我妈……”

“好吧。”比达尔又回到了讨论中，“账目要分明，巧克力汁要浓，对不起也说过了。如果纳粹分子在西班牙取得了胜利，也许欧洲就会觉醒，会看到恐惧，而我们已经认识了恐惧。也许，为了赢得总体战争的胜利，我们不得不输掉西班牙的这场战争，这样才能警醒世界来对付邪恶。西班牙，小战争，西班牙的小战争。”比达尔咬着嘴唇，忍住了笑。

豪尔赫睡得很不安稳。他一会儿说梦话，一会儿下床喝水，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又坐在沙发里发愣。劳拉光着身子注视着他，也很不安。她对豪尔赫给她的性爱十分满

意,然而她又警觉地感到这不是为了她,而是一种窒息……

“告诉我,我想知道,豪尔赫,我有权利知道。我爱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一个美丽而冷漠的村子,似乎它正在逐渐地死去,不愿任何人看到它垂死的挣扎,同时却又希望有人能为它即将逝去的美丽作个见证。从伊比利亚的建立以来,岁月的印记一个接一个地烙在它的脸上。先前它只是一个未被开采的黄金头盔,价值一只陶锅。罗马门经受了岁月和风雨的侵蚀依然屹立,仿佛是权力的象征,正统的见证。中世纪巨大的城墙,卡斯蒂里亚乡村组成的环带,以及它对伊斯兰教的防御,——然而伊斯兰教却无处不在:在“枕头”这个词中,在“屋顶”这个词中,在清澈的“水池”中,在“可恶”的快感中,在类似能食用的石竹花的洋蓟头饰样中,在基督教教堂正中的拱顶中,在类似犹太教堂的门窗上摩尔人的装饰中,——而这些教堂已经倒塌,空无一人,被遗忘和抛弃紧紧追随。

被12世纪的城墙环抱的圣塔菲·德帕仑西亚村只有一个中心,就像是城市的肚脐,在那里汇集了整个村子的历史。它的中心广场是一个圆形的斗牛场,遍地黄沙,期待着在其上倾洒西班牙国旗的另一种色彩[1]。广场上没有朝阳或背阴的看台,周围环绕的是镶嵌着巨大玻璃窗的房子,这些格子窗在星期天才打开,用来观看给整个村子带来预示和力量的斗牛。这个封闭的大型广场只有一个入口。

三位共和国战士一直走到这个村子惟一的中心,村长共产党员堂阿尔瓦罗·门德斯在那儿等着他们。他没有穿制服,只披了一件短坎肩,腆着大肚子,身穿一件无领衬衣,

---

[1] 指红色,西班牙国旗为红黄二色。

脚登一双没有马刺的靴子。全身惟一的装饰就是那张长着两道浓眉的脸,那弯弯的眉毛就像是清真寺的入口;双眼因为年纪的关系已经被眼皮盖住很久了,要凭猜测才能注意到不易觉察的目光深处有一簇秘密而坚硬的闪亮。与之相反,三位战士坦诚的目光中充满了惊奇。老人从他们的目光里读出了些什么,他说,我只是履行了我的责任,看到那扇罗马门了吗? 这不是党派的问题,而是权利的问题,这个村子是合法的,因为她属于共和派,没有被法西斯颠覆,这个村子由民选的共产党员,就是我,阿尔瓦罗·门德斯,作为村长进行合法的管理,不管有多少恐惧,不管多么痛苦,村长必须履行他的职责。

“这不公平。”巴西略·巴塔萨尔咬着牙说。

“巴西略,我要告诉你一件事,而且我不再重复第二遍。”村长站在黄沙遍地的斗牛场的正中间说道,四周的窗户紧闭着,然而透过窗后薄薄的窗帘,穿着黑衣的女人们正好奇地注视着他们。“服从正确的命令时需要忠诚,但在服从错误的命令时更需要忠诚。”

“不,”巴西略忍住了令他喉咙发烫的呼喊,“最大的忠诚在于反抗错误的命令。”

她背叛了我们,村长说。她把山上共和派的阵地告诉了敌人。你们看,山上的这些灯火,山顶之间那些流动的火光,是所有人以所有人的名义保存下来的,那些火苗仿佛瞬间的月亮,那些稻草和柴火做的火把,那些彼此相依相偎的灯火,那些没有火光的地方:那是共和国燃烧的根须,是我们为了抵抗法西斯分子而设的防卫圈。

“她全告诉了他们。”村长气得连声音都发颤了。他的愤怒比燃烧的山头更炙热。“她告诉他们,如果能够熄灭那些灯火,就能欺骗我们,就会减弱我们的防御。她对他们

说，熄灭山上的灯火，把看守火把的共和派一个一个地杀掉，那么就能够以我们的拯救者佛朗哥的名义攻下这个上当受骗，没有任何防御力量的村庄。”

他那蛇一般的目光注视着每一位战士。他想做一个公正的人，听取他们的意见。阳台上的嘈杂声和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打断了他们；一个女人出现在阳台上，她面如皎月，眸如桑椹，身穿一袭黑衣，头上围着头巾，岁月的消磨使她的皮肤薄得仿佛透明，像是在一张白纸上擦去了过去所写上的东西。门德斯，这位圣塔菲·德帕仑西亚的村长，没有理睬她。他重复道："请说。"

"为了荣誉，救救她。"豪尔赫·莫拉说。

"我爱皮拉尔。"巴西略·巴塔萨尔高声喊道，声音盖过了阳台上的女人，"为了爱，救救她。"

"她必须为了正义去死。"村长一脚踩在干净的沙地上，目光扫向共产党员比达尔，寻找支持。

"尽管与政治理由相悖，还是请救救她。"后者如是说。

"形势不利啊。"老人试图笑一笑，却又忍住了，最后他神情严肃地说，"不利啊。"

这时，阳台上的女人叫了起来：求求你！村长对所有人说，别把我主持正义的职责和我妻子的愤怒混为一谈，于是那女人在阳台上又喊了起来，难道你只有作为村长和共产党员的职责吗？老人仍然没有理睬她，只顾与比达尔、巴塔萨尔和莫拉说话，我不会感情用事的，我只服从西班牙和共产党。

"求求你。"女人喊着。

"克莱门西亚，这是你的错。你不顾我的意愿，把她培养成了天主教徒。"村长背过身，回答说。

"阿尔瓦罗，不要折磨我，我这辈子就剩下她了。"

“咳！家里的矛盾没法用法律解决。”

“矛盾有时候不是来自仇恨,而是来自溺爱。”克莱门西亚喊着,扯下了裹在头上的头巾,露出了一头凌乱的白发和一对写满预示的耳朵。

“我们的女儿在村口无法无天,你说怎么办?”

“她已经不再是你们的女儿了。她是我的妻子。”巴西略·巴塔萨尔说。

那天晚上,有人把公牛放进了圣塔菲的广场,山上的火光开始熄灭。

“天空布满了谎言。”克莱门西亚在拉上阳台的窗帘之前,悲伤地说。

(“我得跟你说说皮拉尔·门德斯……”)

在巴黎咖啡馆第二次聚会的主题就像是一曲独奏:暴力,它的种子,它的萌芽,它的产物,它与善恶的关系。莫拉负责最艰难的那部分论述,他说不能把一切罪恶都归咎于法西斯分子。我们别忘了共和派的暴行,无政府主义者在萨拉戈萨杀害了当地的红衣主教索尔德维亚,1934 年社会主义者用棍棒打死了在卡萨·德坎波操练的长枪党人,挖出了他们的眼睛,往他们的眼窝里撒尿。同志们,这些都是我们的人干的。

“过去是我们的人。”

“后来法西斯分子不是也把往他们的尸体上撒尿的女孩杀害了吗?”

“同志们,这是我的观点。”莫拉握着他墨西哥情人的手,说,“西班牙暴力的阶梯总是把我们引向相互敌对的战争。”

“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分子 1934 年切断铁路,想把加泰罗尼亚从西班牙永远独立出去。他们的确有理由这么做。”巴西略看了一眼豪尔赫和劳拉紧握在一起的双手,“正是时

候!”但他的内心既痛苦又羡慕。

比达尔发出一阵大笑,笑声像身上毛衣的毛线一样丰富。“我们就这样关起门来,各地区之间兴高采烈地自相残杀。操!世界真他妈的是堆狗屎。”

豪尔赫松开了劳拉,把手搭在比达尔的肩膀上。我不会忘记佛朗哥分子在巴达霍斯有组织地、大规模地屠杀群众,也不会忘记对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①]的杀害,以及在格尔尼卡的屠杀。同志们,这是我的开场白。

“朋友们,忘掉过去的政治暴力吧,忘掉所谓的西班牙政治的厄运吧,这是一场战争,然而已不是我们的战争了,我们已经被赶出了战争,我们只是用来排演的剧院,我们的敌人来自国外,佛朗哥只是个傀儡。如果我们不打败他们,希特勒就会征服整个世界。请记住,我曾经在德国求学,亲眼目睹了纳粹分子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忘掉我们西班牙人可怜的暴力吧。等着看真正的暴力,恶魔的暴力,这个大写的恶魔,像鲁尔[②]的工厂那样井井有条。那时候,我们的暴力就变成弗拉芒科舞台或者斗牛场上的暴力了……”豪尔赫·莫拉说道。

(“我得跟你说说拉克尔·阿莱曼……”)

“劳拉·迪亚斯,你呢?你还没开口呢。”

她低下了头,接着又亲切地挨个扫了大家一眼,最后说:

“我很高兴看到男人之间最激烈的争论总会透露出一些他们共同的东西。”

---

① 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1898—1936),西班牙20世纪最著名的诗人和剧作家。他的作品地方色彩极浓,生动地描绘了故乡安达卢西亚的城市、风光、吉卜赛人和农民、宪警、圣徒以及古老的行为准则。

② 德国的主要工业区。

三个人的脸同时红了起来。巴西略·巴塔萨尔为她还不了解的状况解了围,“看得出来,你们很恩爱。在发生的这一切之中,应该怎样来衡量爱情?”

“你最好这么说,”比达尔插嘴说,“只顾个人的幸福,而不顾千万生灵所遭受的不幸?”

“比达尔先生,我有个问题。”劳拉·迪亚斯回过头来说。

“喂,直接叫比达尔就行了。你们墨西哥人真拘束。”

“那好吧,我就叫你比达尔。一对情侣的爱情能克服世上所有的不幸吗?”

三个人互望了一眼,各自的目光中分明写着羞怯、同情和怜悯。

“能。我想总会有拯救世界的方法的。不管是像我们的朋友巴西略这么孤独的人,还是像我这么井井有条的人。”比达尔半是谦卑,半是骄傲地承认着。

(“我得跟你说说皮拉尔·门德斯……”)

当他们单独走在5月5号大街上时,豪尔赫对他的情人说,劳拉,那个共产党员最后说的话,是正确的,却又自相矛盾。

她提醒他,她注意到他说话时有所保留。他的口才的确很好,但说话总是有所保留。这是另一个豪尔赫·莫拉,她喜欢这个莫拉。话虽这么说,可她希望自己能够在咖啡馆里的那个莫拉身上多停留一会儿,理解他们的沉默,和他们一起分担沉默的理由。

“你知道吗?谁也不敢提出自己真正的疑问。”当他们走向墨西哥市邮电大楼那幢威尼斯式的建筑时,莫拉已经恢复了原样,“最坚强的是共产党员,因为他们的疑问最少。然而,疑问越少就越容易犯历史错误。别误解我的意思,法西斯分子和共产党员不是一回事。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希

特勒信奉恶,恶是他的福音,包括征服、种族灭绝和种族主义。而斯大林,应该说他信奉善,信仰工作自由、按需分配和消灭国家。他传播俗世之神的福音。"

"所以他欺骗了这么多人?"

"希特勒传播魔鬼的福音。他以恶的名义犯下罪行:这就是他的可怕之处。以前这一点从未被人注意。他的所有追随者都必须分担他邪恶的意志。如戈林,戈培尔,希姆莱,里宾特洛甫,和巴本[①]一样的贵族,像厄内斯特·勒姆[②]一样的流氓无产者,像凯特尔[③]一样的普鲁士军人。斯大林以善的名义犯下罪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更大的恐怖,因为追随他的人总是怀着美好的信念,他们不是法西斯分子,都是普普通通的好人。当他们发现斯大林的可怕时,就会被斯大林亲自铲除,就像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④],和英雄时代的其他同志。这些拒绝追随斯大林的人更愿意追求真正的共产主义,至死不渝。难道布哈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他们不是英雄吗?告诉我有哪个纳粹分子背弃希特勒是出于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忠诚?"

"那么你呢,豪尔赫,我亲爱的西班牙人?"

"劳拉,我亲爱的维拉克鲁斯人,我是个西班牙的知识分子。如果你愿意,那么好吧,我是个少爷,是被罗伯斯庇

---

① 巴本(1879—1969),德国政治家、外交家,为瓦解魏玛共和国和帮助希特勒任总理起了主要作用。

② 厄内斯特·勒姆(1887—1934),德国军官,希特勒冲锋队(又称挺进队或褐衫党)的主要组织者。

③ 凯特尔(1882—1946),德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最高统帅部长官,希特勒最忠实和最信赖的将领之一。

④ 加米涅夫(1883—1936),老布尔什维克,俄国十月革命后十年间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主要人物,后成为斯大林的反对者,在大清洗中被处决。

尔押上断头台的贵族中的一分子。”

“你的灵魂被分成了两半,我的西班牙少爷……”

“不,我的确注意到了纳粹分子的邪恶和斯大林的背叛,但是我也同样感受到西班牙共和国的高贵,也意识到该怎样简便地将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正常的、现代的、受人尊敬的、和睦的、解决了一切问题的国家,咳,这些问题来自西哥特人。劳拉,亲爱的,为了这个共和国高贵的本质,我牺牲了自己的疑问。在纳粹的邪恶和共产主义的背叛中,我与那个年轻‘美国佬’的共和派英雄主义站在一起,美国佬,正如你们称呼的那样,那个吉姆来到哈拉马,为我们牺牲了。”

“豪尔赫,我不是傻瓜。还有其他人在为你们受苦。还有别的东西把你和巴塔萨尔、比达尔联系在一起。”

(“我得跟你说说皮拉尔·门德斯……”)

皮拉尔·门德斯站在圣塔菲·德帕仑西亚的围墙前,全身裹在粗糙的黑色皮斗篷里,金色的头发被山上的旋风吹得十分凌乱,她注视着山上的篝火一堆一堆地熄灭,胜利得到了证实,她却没有展露出笑容,她的胜利就是对她父亲的背叛,她更加坚信帮助自己人就等于帮助上帝,尽管公牛的叫声和三个共和国战士的脚步声让她浑身发抖,他们从罗马门走来,一直走到这片充满反抗精神的土地,而皮拉尔·门德斯,以上帝的名义,比任何政治信念都更加坚定地站在这片土地上,因为民族主义者和长枪党人同上帝站在一起,而他们其他人,她的父亲堂阿尔瓦罗和三个战士是魔鬼的受害者,而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还以为自己站在正义的一边,是他们,他们所有的人,那些赤色分子,是他们烧毁了教堂,杀害了神父,强奸了修女:多明戈·比达尔,豪尔赫·莫拉和巴西略·巴塔萨尔,她的爱,她亲爱的爱人,她生命中的男

人，那个无需举行婚礼仪式的丈夫，他们在尘土、公牛、微风和熄灭了的火光中向她走来，她站立着，面对着城墙，这垂死的城市裹在黑色的动物尸体拼成的长斗篷里，她是金发的西班牙女郎，是西哥特双眼碧蓝的女神，头发黄得像斗牛场上的沙土。

这三个男人会对她说些什么？

他们对她能说些什么？

一个字也没说。只有巴西略·巴塔萨尔的目光，像一枝带着生命中不可分割的痛苦与欢乐的双簇箭。她的情人如同一种代价，一种为扰乱生活的秩序而付出的代价，这就是爱情，皮拉尔·门德斯看着他们走近，这么想着。

巴西略屈膝跪下，抱住了皮拉尔的双膝，嘴里不停地重复着，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我的心肝，我的宝贝，别抢走我的宝贝，皮拉尔，我爱你……

"你，多明戈·比达尔，共产党员，敌人？"皮拉尔问道，为的是让自己在巴西略·巴塔萨尔流露出来的爱的痛苦面前坚强起来。

比达尔点了点头，用光秃秃的脑袋表示同意，手里抓着军帽，仿佛皮拉尔是位圣母，一位痛苦的女神。

"你，豪尔赫·莫拉，叛徒，少爷，你也成了赤色分子？"

豪尔赫抱住了她。她像一头令人厌恶的野兽般嚎叫起来，然而莫拉对她说，我不会放开你，你得明白，你被判了死刑。你听懂我的话了吗？明天清晨你就要被枪毙了。你的亲生父亲已经下令枪毙你，你那个当村长的父亲，那个叫作阿尔瓦罗·门德斯的父亲，他不听我们的请求，不顾你母亲，还是要杀你……

皮拉尔·门德斯疯狂的笑声使巴塔萨尔打了个冷战，他站起身来。我母亲？皮拉尔笑了，活像一头野兽，一只美丽

的鬣狗，一个失去了自己目光的美杜莎[1]，我母亲，还有谁会比我那个名不副实的母亲克莱门西亚[2]，那头母猪更希望看到我的死吗？是她让我至死都十分虔诚，是她灌输给我罪恶和地狱的概念。这个女人根本就不希望我活着，她希望我像烈士般死去，这个村妇希望我死得像个圣女，圣女，巴西略，你听到了吧，真希望我的母亲，克莱门西亚，能看到那个下午你夺去了我的童贞，一口一口地噬咬着我，唾弃我出血的处女膜，似乎那是一团鼻涕或是一块发霉的圣饼，巴西略，你还记得吧，你进入了我的身躯，像公狼进入母狼那样，从身后，从臀部进入，没有看到我的脸，你还记得吗，在那间没有家具的破房子里，是我带你去的，亲爱的，我惟一的男人，当我的亲生母亲希望我死去，希望我成为运动中的烈士，成为圣徒来拯救她自己的良心的时候，难道你认为你有权利来拯救我吗？克莱门西亚，真是取对了名字啊，她恨我，因为我没有按照她的期望成亲，而是把自己交给了一个思想可疑、家境贫寒的小伙子，我英俊的巴西略，我亲爱的巴西略，你来这儿干什么？你和你的朋友们想干什么？你们都疯了吗？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都是我的敌人，不知道我站在你们的对立面，我会以西班牙和佛朗哥的名义下令枪毙你们吗？我不希望通向西班牙式死亡的古道上长满荆棘，我愿意用我的鲜血来清洗这些道路……

比达尔突然捂住了她的嘴，仿佛是堵上了一段下水道，莫拉迫使她扭过双臂，巴塔萨尔又跪倒在她的脚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要说，但最后却说出了同样的话，我们想救你，跟我们走。看，山上还有没熄灭的篝火，我们会在那儿

① 希腊神话中被称为戈耳工的怪物，其形象为有双翼的蛇发女人。

② 克莱门西亚(clemencia)在西班牙语中有“慈悲，怜悯”的意思。

找到藏身之处的，你父亲将会履行他的职责，他已经下令明天清晨枪毙你，而我们不会履行我们的义务，跟我们走吧，让我们拯救你，皮拉尔，尽管我们将以自己的死亡作为代价。

“豪尔赫，为什么？”劳拉·迪亚斯问他。

尽管有战争，尽管有共和国，尽管有父亲的意愿，我的女儿必须为了正义去死，圣塔菲·德帕仑西亚的村长如是说；她必须为了爱而得到拯救，巴西略·巴塔萨尔如是说；尽管与政治理由相悖，她还是必须得到拯救，多明戈·比达尔说；她必须为了荣誉而得到拯救，豪尔赫·莫拉说。

“我的两个朋友看了看我，就理解了我。我没有必要解释。对我们来说，光是呼唤爱情，呼唤正义是不够的。理智赋予我们的是荣誉。用正义来换取荣誉？这是我在多明戈·比达尔的脸上看到这种两难的处境。背叛还是美？这是巴西略·巴塔萨尔充满爱意的双眸告诉我的。我注视着他们三人，他们只拥有真理赤裸的肌肤。在那个可怕的傍晚，面对中世纪的围墙和那扇拉丁大门，在逐渐暗淡的群山包围之中，他们三个，皮拉尔，巴西略，多明戈，我注视着这个充满象征意义的三人小组。劳拉，这个原因当时除了我谁也不明白，现在你也明白了，因为我告诉了你。这就是原因。对美的需要战胜了对正义的需要。由女人、情人和敌人组成的三人小组不能靠正义和感情来解决；这是一个建立在荣誉基础之上、对美的需求的举动。”

如果一尊雕塑并非由塑像，而是由被死亡威胁的活人组成，那么它能持续多久？

雕塑的完美——战胜了背叛和正义的荣誉与美丽，在豪尔赫向女人喃喃诉说的时候消失了。跟我们一起逃到山里去吧，救救你自己，要不然我们四个就一块儿死在这里，

她咬牙切齿地回答说，我是修女，我什么也不会，尽管巴西略苦苦哀求，除了怜悯却没有得到任何别的表示，跟我们走吧，逃吧，现在还有时间，她说，我就像一条寻找死神的狗，我闻到了死神的气息，我会一直追随着她，直到他们把我杀了，我不会让你们称心如意的，我闻到了死亡的气息，这个国家所有的坟墓都已经敞开，我们只剩下坟墓这座家园了。

“至少还有你的父母双亲。为了他们，救救你自己吧。”

皮拉尔扫了三个人一眼，目光中带着惊奇，又开始发疯似的狂笑起来。

“但是你们什么都不明白。你们以为我只是为这运动尽忠而死吗？”

她的笑声孤零零地持续了好几秒。

“我要死去，让我的父母永远互相憎恨。但愿他们永远都不要原谅对方。”

（我得跟你说说皮拉尔·门德斯。）

“我认为你是那种忠于朋友，也忠于自己的人。”劳拉把头靠在豪尔赫的肩膀上，说道。

“我不是，”他疲惫地叹了口气，“我只是个和自己生气的人。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告诉你真相，并且避开谎言。”

“也许就是因为怀疑，你才变得坚强，我的西班牙人。我觉得对于这一点，今天晚上我终于弄明白了。”

他们穿过阿吉雷斯·塞尔丹大街，走到美术馆的大理石门廊下。

“亲爱的，刚才我在咖啡馆里说，我们大家都受到了谴责。实话跟你说，我痛恨一切制度，包括我的制度和别人的制度。”

比达尔：看到了吧？没有秩序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管我们现在是赢了还是输了，不管我们今天胜利了，或者明

天又失败了，我们仍然需要秩序和团结、统治阶层和纪律。否则，他们会永远取得胜利，因为他们的确拥有秩序、团结、统治和纪律。

巴塔萨尔：那么，希特勒的严明纪律和斯大林的严明纪律有什么区别？

比达尔：目标不同，巴西略。希特勒希望一个奴隶的世界，斯大林则希望一个自由者的世界。尽管他们采取的手段可能会同样充满暴力，但他们的目标却完全不同。

"比达尔说的有理。"劳拉笑了，"你更像个无政府主义者，而不像共产党员。"

豪尔赫在美术馆的一个布告栏前突然停下了脚步。

"劳拉，今天下午，谁也没有扮演任何角色。比达尔的确是共产党员，巴西略也的确是无政府主义者。我没有把实话告诉你。我认为咱俩，我和你，面对讨论可能会产生某种距离。"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看着与美术馆的大理石和青铜很不相称的木框里胡乱贴着的黄纸黑字的海报。豪尔赫看着劳拉。

"对不起。你今天真漂亮。"

卡洛斯·查韦斯将与国家交响乐团共同演奏他创作的《印第安交响曲》和普罗科菲耶夫的《三个橘子的爱情》，钢琴演奏家尼基塔·马加洛夫将在音乐会上演奏肖邦的一号作品，希尔达姨妈曾在卡特马哥练习过这部作品，却毫无成果。

"多么希望我们的人什么错误都别犯。"

"阿尔莫尼亚·阿斯纳尔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完人。这是我认识的一个女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我不了解的女人。对她，我必须猜测。感谢你没有隐瞒，没有秘密，把一

切都告诉了我。谢谢你，我的绅士。你让我觉得好多了，更洁净了，我的头脑也更清晰了。”

“对不起，这几乎是一幕喜剧。我们聚在一起，重复着那些自己早已滚瓜烂熟的句子，就像是一幕穆尼奥斯·塞卡[1]的马德里喜剧。今天你也看到了。每个人都准确地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也许这样，我们能理清纷乱的思绪。我也不知道。”

在美术馆的门廊里，他将她拥入怀中。美术馆沉浸在墨西哥城突如其来的无边无垠的紫色夜幕中。“我厌倦了这场永无休止的争战。真希望除了心灵，没有别的祖国，没有其他的祖国……”

他们转过身，相拥着回到5月5号大街。他们渐渐地不再说话，就像那些点心店、书店和箱包店逐渐暗淡下来的橱窗。而路上的街灯一盏盏地亮了，好像打开了通向铁制大教堂的一条光辉大道。就在那座教堂前，去年3月18日举行了石油收归国有的庆祝活动。她与胡安·弗朗西斯科、圣地亚哥和丹东在一起，而豪尔赫则在远处，手里挥舞着帽子向他们打招呼。这是一个私人问候，但同时也是一项政治庆祝，在人群中攒动的人头之上向她问候，同时也向她告别，跟她说，我爱你，再见，我会回来的，会永远爱着你……

在巴黎咖啡馆，巴雷达一直观察着他们。他跟戈罗斯蒂萨和比利亚乌鲁蒂亚说，你们猜猜那几个西班牙人聚会时会谈论些什么。政治？艺术？不，是哈布哥[2]。他向他们朗诵了由一个怪异的西班牙人翻译并创作的诗体《圣经》

---

① 穆尼奥斯·塞卡(1881—1936)，西班牙诗人、剧作家。他偏爱写喜剧，并以幽默讽刺闻名。

② 一种火腿。

中用来描写巴塔萨尔的华筵的两句诗：

布尔戈涅，莱茵，瓦尔德拉马萨[1]：
香肠没有标价。

比利亚乌鲁蒂亚说他觉得墨西哥人取笑西班牙人的笑话并不十分好笑。戈罗斯蒂萨思索着，询问这种反对某个国家的墨西哥冲动的原因何在？这个国家赋予我们她的语言，她的文化，甚至混和的血脉……

"你去问夸乌特莫克吧，问问他觉得西班牙人在喝下午茶时表现如何？"巴雷达笑了，"烤蹄子！"

"不，"戈罗斯蒂萨也笑了，"问题在于我们不喜欢支持胜利者。我们墨西哥人被打败的次数太多了。我们喜欢那些战败者。他们是自己人。是我们。"

"历史上有过战胜者吗？"比利亚乌鲁蒂亚问道，他自己就被梦想、消沉或者死亡打败了，你会知道的，美丽、聪明而又沉默的卡门·巴雷达这样想着。

---

① 这大概是三种以产地命名的香肠。布尔戈涅在法国，莱茵在德国，瓦尔德拉马萨为马德里旁的小村镇。

第十四章　各地,个地:1940年

一

他去了哈瓦那、华盛顿、纽约、圣多明哥,往雷斯卡尔戈饭店给她发电报,有时也往她家打电话,只有听到她的声音时才说话。她说:"不,不是爱立信,是墨西哥电信公司。"这是他们约定的暗号。"海边没有摩尔人"表示她丈夫和孩子都不在;然而有时候豪尔赫·莫拉根本不在乎,他只是一个劲地诉说,而她则一声不吭,或者随便说些什么,因为她的丈夫和孩子就在她身边。不行,我今天就需要铅匠,或者衣服什么时候能取?或者怎么什么都这么贵!大概是因为打仗了吧,而此时,豪尔赫却对她说:那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日子,你不这么认为吗?为什么不回答?她紧张地笑笑,他则开始诉说,亲爱的,我们都那么迫不及待,这多好啊!你能想像第一个晚上我们都克制一些会怎么样吗?我们为什么要耐心等待呢?生命正在离我们而去,我亲爱的女人,带来快乐的女人,而她则默默地望着翻看《民族报》的丈夫或是在做功课的孩子,她想告诉莫拉,默默地告诉他,什么都无法平息我对生活的渴望,直到我遇见了你,现在我很满足。我的绅士,我不再要求什么了,只希望你能平平安安地回来,希望我们再次相聚在属于我们的房间,只要你请求我

放下一切的一切，我就会毫不犹豫地这么做，我的孩子，我的丈夫，甚至我的母亲，他们谁也不能阻止我，只有你，因为和你在一起，我感到我的青春仍未耗尽，我可以和你直说吗？昨天是我四十二岁的生日，很遗憾我们不能一起庆祝，胡安·弗朗西斯科和丹东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只有圣地亚哥还记得。我跟他说："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不要告诉他们。"我的儿子拥抱了我，说明我们是同谋。你，我，还有我钟爱的儿子，这是我全部的幸福。为什么要否认？假装我们同样地喜爱每个孩子，这多么愚蠢。不是这样的，不是。有些孩子能够猜出你需要的东西，有些孩子不仅仅是他们自己，有些孩子是照出过去和未来的镜子。我的圣地亚哥就是这样的孩子。他没有忘记我的生日，还让我想起你曾给过我一份恩惠，是一个我这样年纪的女人所需要的，我的绅士，如果我不接受你给我的生命，我就没有生命可以在将来交给我的孩子，我可怜的丈夫，我的母亲……

二

雷特西亚死了。尊敬的、杰出的母亲，妈妈，是劳拉·迪亚斯生命中最主要的女性形象，是一段被男性的常春藤紧紧缠绕的柱子：这其中有外公堂费利佩，父亲堂费尔南多，同样受人尊敬的哥哥圣地亚哥，令人伤心痛苦的奥兰多·希门内斯，丈夫胡安·弗朗西斯科，以及由她抚养的孩子。一场如此持久、如此血腥（已经如此遥远）的革命过后，当这个国家正渐渐恢复，当劳拉和胡安·弗朗西斯科徒劳地彼此寻找，当劳拉和奥兰多为了避免彼此看见，也避免被人看见而易容化装，所有的人都像藤蔓一样爬上了母亲雷特西亚的阳台。所有的人，除了豪尔赫·莫拉。他是第一个没有依靠

维拉克鲁斯那段由母亲滋养的树干的人。母亲的伟大在于她的公正无私,她的悉心照料,她打理一切日常家务时的细致入微,她那让人信任的巨大能力,她的在场,她的沉默,她的机智敏捷……

雷特西亚走了,随之而来的是劳拉对童年时代的所有记忆。今日的死亡唤回了昨日的生活。然而劳拉却想不起她母亲说过的只字片语。仿佛雷特西亚的一生就是一声长长的叹息,掩埋在为了让维拉克鲁斯和哈拉帕的家一切顺利的大量家务之中。她的演讲就是她的厨房,她那洁净的上了浆的衣服,散发着熏衣草香味的整齐衣橱,那个四脚浴盆,装开水的杯子和装凉水的脸盆。她的言语就是她的目光,她睿智的沉默能够理解他人,并且获得他人的理解,没有辱骂、谎言或者无用的欺骗。她的羞涩是真诚的,因为她任人猜测隐藏在内心的爱意,没有必要决不透露。她有过惨痛的教训:最初那几年的分居,当时堂费利佩住在维拉克鲁斯,而她住在卡特马哥。但是这种环境造成的距离不是还能让孩提时代的劳拉跑去找她的哥哥大圣地亚哥做伴吗,只要能够他们就要见面,他们在一起,半是大人半是孩子;先是在一起玩,接着又一起哭,没有其他的接触来破坏这种记忆的纯洁。这是劳拉·迪亚斯生命中最深最美的记忆。每天晚上劳拉都能梦见她那被枪杀了的年轻哥哥,他被埋葬在大海里,消失在墨西哥湾的波浪下。

母亲雷特西亚下葬的那天,劳拉同时经历了两次生命。她机械地完成了所有的仪式,完成了守灵和下葬的步骤,这两者都显得十分冷清。老家已经没有人留在哈拉帕了。财产的丧失,对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以及横征暴敛的新任统治者的恐惧,墨西哥城磁铁般的吸引,外省新机会的承诺,幻想和幻想的破灭,这一切让所有的老朋友、老熟人都离开

了哈拉帕。劳拉去了圣卡耶塔诺庄园。那儿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只有在劳拉的记忆中才能听到华尔兹舞曲、笑声、短工的忙碌、酒杯与酒杯之间的碰撞,才能看到堂娜赫诺薇娃·德尚挺得笔直的身影……

母亲已经下葬了,但那天在她女儿的第二次生命中,过去像一段没有留下任何遗迹的历史浮现了出来,仿佛山城突然出现在海边,老树突然萌发了新芽,鸟儿闪电般掠过空中,河流满载着灰烬汇入大海,星星都已化成尘土,森林则发出飓风的呼喊。

白天和黑夜已不复存在。

失去了雷特西亚的世界,天亮得都比平时晚。

只有哈拉帕永恒的雨水的香味把劳拉从沉思中唤醒,她对玛丽亚·德·拉奥说:

"姨妈,现在你得去墨西哥城和我们一起住了。"

但是玛丽亚·德·拉奥什么也没说。从此她不再说话,只用点头或者摇头来表示肯定或否定。雷特西亚的死让她失去了言语。当劳拉提起姨妈的行李,准备离开哈拉帕的家,这位黑白混血的老太太停下脚步,缓缓地转了个圈,仿佛她一个人能够再次召集家里所有的幽灵,给他们让出一块地方,承认他们是家庭的成员……当劳拉看到克尔森家的最后一个姐妹告别维拉克鲁斯的家,心中涌起一阵巨大的感动。玛丽亚·德·拉奥刚来的时候一无所有,还带着奴隶的印记,是好心的费尔南多·迪亚斯把她赎了回来,对他来说,行善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很快,耻辱就会带走哈拉帕黑嘴大街上的家,带走已经废弃的门厅,那里曾经停放过废弃的马车或是耗油量极大的旧式伊索塔-弗拉斯基尼,带走曾经抵御过山间长年细雨的挡泥板,院子里的瓷花盆和镶嵌玻璃,烧煤的厨房,简陋

的石碾盘，蒲扇，饭厅和被狗啃过的流氓画……玛丽亚·德·拉奥收起姐妹们用来系餐巾的银环。耻辱很快就要来了……

玛丽亚·德·拉奥，这个家族在外省的过去的惟一见证人，任由劳拉把她带到洋际火车站，就像雷特西亚的尸体被运到哈拉帕的墓地，埋葬在她丈夫的身边一样温顺。除了模仿逝去的姐妹，她还能怎么办？她，玛丽亚·德·拉奥，希望能用剩下的惟一方法继续鼓励她的血脉。她和死者一样安静，一样沉默；和她令人难忘的妹妹雷特西亚一样谨慎而恭敬。雷特西亚小的时候，每次过生日，她都要穿上白裙子，跑到卡特马哥庄园的院子里去跳舞：

5月12号
圣母出门早
一身雪白袍
短衣外面罩

由于雷特西亚的死，玛丽亚·德·拉奥混淆了对妹妹雷特西亚和对侄女劳拉的记忆。

三

一年前的一天，豪尔赫·莫拉从华盛顿行色匆匆地回来了。劳拉·迪亚斯将这一切——匆忙、伤心——归结于必然：1月26日，佛朗哥的军队攻陷了巴塞罗那，向热那亚挺进；当地居民开始向比利牛斯山疏散。

“巴塞罗那，”劳拉说，“阿尔莫尼亚·阿斯纳尔就来自那里。”

“是那个住在你家,你却从来没有见过的女人吗?”

“就是她。我的哥哥圣地亚哥曾和无政府主义工会者们在一起。”

“你很少跟我提起他。”

“因为我口中装不下两种如此巨大的爱。”她笑了,“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长得很帅,也很勇敢。他就像是个赤色地榆。”这回,她笑得有些紧张,“为了掩护他的政治活动他总是打扮得很时髦。他是我的圣徒,他为自己的信念献出了生命,二十岁的时候被杀害了。”

豪尔赫·莫拉不说话,显得有些不安。劳拉第一次看到他低下头,她发现这颗伊比利亚-罗马的头颅总是自豪地,甚至有些骄傲地高昂着。劳拉认为他低下头是因为他俩走进了瓜特鲁佩大教堂,豪尔赫坚持带她去那儿,向堂娜雷特西亚,他没来得及认识的劳拉的母亲表示一下敬意。

“你是天主教徒?”

“我觉得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连无神论者都是天主教徒。而且,我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位圣母是墨西哥民族团结的象征再离开墨西哥。你知道吗?在独立战争期间,西班牙的皇家军队曾经向瓜特鲁佩圣母像射击。”

“你要离开墨西哥?”劳拉很平淡地说,“看来,圣母并没有保佑我。”

他耸了耸肩,好像说:“和以往一样,我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有什么好奇怪的?”他们俩并排跪在大教堂第一排的凳子上,面向圣母的祭坛,圣母的形象被安放在玻璃盒中保护起来了。劳拉对豪尔赫解释,传说在西班牙的征服快结束的时候,1531 年 12 月的某一天,圣母出现在特佩亚克小山上,将她的形象留在了一个贫穷的印第安人、挑夫或者脚夫胡安·迭戈的斗篷上了,而特佩亚克山以前是用来拜祭某

位阿兹特克的女神的。

“16世纪的西班牙人真聪明啊。”莫拉笑了，“一完成军事上的征服，他们就开始致力于精神上的征服。他们——好吧，我们——破坏了一种文化及其宗教，但是我们用印第安人的象征，将我们自己的文化赋予了战败者——或者，也许我们是把他们的文化交还给了他们，用的却是欧洲的象征。”

“对。我们这儿管她叫黑圣母。这就是区别。她不是白人，而是无依无靠的印第安人需要的母亲。”

“这就是一切。你不觉得这非常聪明吗？这是基督教的圣母，是土著人的圣母，然而也是以色列的圣母，是期待中的救世主的犹太母亲。她有一个阿拉伯语名字，瓜特鲁佩，众狼之河。一个形象包含了多少文化啊！”

他们的谈话被来自身后的低沉赞歌打断了。歌声从教堂门口传来，就像一种古老的回声，仿佛这不是由朝圣者的嗓音发出的，而是一直陪伴着他们，或者从几个世纪以来就在迎接他们。豪尔赫向唱诗的地方望去，然而管风琴旁空无一人，没有风琴师，也没有唱诗班的孩子们。游行的队伍带着他们自己的合唱伴奏，歌声沙哑，声音单调，和所有的墨西哥印第安音乐一样。但是音乐无法掩盖膝盖在地上艰难挪动所发出的声音。所有的人都跪着前行，一些人手里举着点燃的大蜡烛，一些人张开双臂呈十字形，还有一些人用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脸。女人们披着头巾。男人们用带刺的皮鞭打在赤裸的胸口上，鲜血淋漓。一些人的脸上蒙着黑纱，在颈后系了个结，这使他们的面庞变成一张张努力凸现的图纸。低声的祈祷如同鸟儿的啼叫，莫拉注意到这忽高忽低的颤音与卡斯蒂利亚语平缓的语调完全不同，这种颤音的语调非常平和，但却使说话者的愤怒、命令、诉说表

现得更加强烈:可以想像,在这里除了近乎忠告或者宿命的声音,没有一种声音能够表达愤怒、命令或与他人交谈,但是他们有信仰,莫拉提高了声音,对,劳拉抢在了前头,他们有信仰,豪尔赫,你怎么了,为什么这么说?然而她不会明白,劳拉,你不会理解的,那么,莫拉,你解释给我听吧,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劳拉回答说,决心不让疑问的颤抖、抑制不住的愤怒,以及莫拉在瓜特鲁佩大教堂里产生的嘲弄感战胜自己,那时莫拉看到一队印第安信徒走进教堂,怀着一种无可置疑的信仰,一种纯净的信仰,靠想像来支撑并接受任何方式的轻信:正因为是难以置信的所以是真实的,豪尔赫重复着,他突然被这个地方和站在这里——瓜特鲁佩大教堂——的人所打动,劳拉·迪亚斯,她以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量感受到了这一点,她什么也做不了,只有倾听,她不会去阻止赤脚的印第安人组成的游行队伍进入教堂在莫拉身上唤起的激情,他们将他严肃的演说,他理智的思绪撕成千百块碎片,将他扔进记忆、情感和失败的漩涡,只围绕着一个词打转:信仰,信仰。什么是信仰?为什么这些印第安人有信仰?为什么我的导师爱德蒙·胡塞尔[1]信仰哲学?为什么我的情人拉克尔信仰基督?为什么我和巴西略、比达尔会信仰西班牙?为什么皮拉尔·门德斯信仰佛朗哥?为什么她的父亲,圣塔菲·德帕仑西亚的村长信仰共产主义?为什么德国人信仰纳粹?为什么这些孤立无援、忍饥挨饿的善男信女从未得到任何回报却仍然信仰他们崇拜的上帝?为什么我们明知我们所作出的牺牲只不过是信仰要求我们出示的证明,不会有任何回报,我们还坚持信仰,以信仰的名义行事?上帝这些可怜的子民要去向何方?豪尔赫·莫

① 爱德蒙·胡塞尔(1895—1938),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创始人。

拉一直注视着十字架,那上面的形象到底是谁?到底是什么?因为游行队伍并不是来朝拜耶稣的,而是来朝拜他的母亲的,他们并脚站立,深信她乃是无罪感孕。是圣灵让圣母受了孕,而不是耶稣真正的父亲,那个发情的木匠。穿着赎罪衣跪着爬向瓜特鲁佩祭坛的人当中有人知道玛丽亚的受孕并不纯洁吗?为什么他,豪尔赫·莫拉和你,劳拉·迪亚斯,我们不相信这个?你我相信什么?因为耶和华在基督中取了人身的圣举,我们就能一起相信上帝吗?因为基督把上帝变得这么软弱,使我们凡人可以与之认同,我们就能因此信仰上帝吗?劳拉,基督道成肉身是为了让我们和他认同吗?但是,为了能够配得上基督,我们应该降卑自己,好比他更低?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悲剧,这就是我们的不幸?为了信仰基督,为了能配得上他的舍身救世,我们就该不如他,比他低下,成为罪人,成为凶手,成为荒淫无度或者骄横自大的人吗?难道信仰真正的考验是接受上帝要求我们做不许做的事情?教堂中有哪个印第安人想到了这一点吗?没有,豪尔赫,一个也没有,这我无法想像,为了配得上上帝,我们就必须和这些卑微的印第安人一样善良、简朴,对诱惑无动于衷?或者为了配得上我们并不相信的事,我们必须像你,我,拉克尔·门德斯-阿莱曼,皮拉尔·门德斯和她的父亲圣塔菲·德帕仑西亚的村长一样头脑清晰,一样贪慕虚荣?墨西哥印第安人的信仰,还是德国哲学家的信仰,还是皈依了天主教的犹太女子的信仰,还是法西斯军人的信仰,还是共产主义战士的信仰?对上帝自己而言,哪个才是最好、最真的信仰?劳拉,告诉我;豪尔赫,告诉我……

“小点声。你今天怎么了?”

“你知道吗?”莫拉有些紧张地回答,“我看着那个光着脚,裹着毯子的可怜的印第安人,就如同看到了一件条纹制

服,胸前有一个绿色三角的,表示是普通罪犯,红色的三角表示政治煽动者,粉色的三角表示同性恋,黑色的三角表示社会破坏分子,大卫之星表示是犹太人……”

她叫拉克尔·门德斯-阿莱曼,是莫拉在弗赖堡的同学。他们有幸上了爱德蒙·胡塞尔的课。胡塞尔不仅仅是大师,而且是一位哲学上的同伴,一种引导他的学生独立思考的存在。拉克尔和豪尔赫很快就建立了对彼此的好感,因为她是 1492 年被天主教国王和王后驱逐出西班牙的犹太人的后裔。她能说 15 世纪的西班牙语,她的父母阅读用伊塔大司铎①和费尔南多·德·罗哈斯②时期的西班牙语编写的塞法尔迪报纸,用希伯来语歌曲来歌颂西班牙这片土地。和所有的塞法尔迪人一样,他们把从前卡斯蒂利亚老家的钥匙用钉子悬挂在德国的新家,渴望有一天——已经过去四个多世纪了——能够重返伊比利亚半岛。

“西班牙,”每天晚上,拉克尔的父母家人都要齐声祈祷,“西班牙,无情无义的母亲,你赶走了如此热爱你的犹太子民。但是我们不记你的仇,你仍是我们挚爱的母亲,亲爱的西班牙,没有回到你的身边,我们不愿就这么死去……”

拉克尔没有加入祈祷,因为自从她去弗赖堡上学那天起,她就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她皈依了天主教。她是这样对豪尔赫·莫拉解释的:

“大家都指责我,连我的家人也指责我。他们认为我

---

① 伊塔大司铎(约 1283—约 1350),原名胡安·路易斯,西班牙诗人。他的杰作《真爱诗集》写成于 1330 年,是西班牙中世纪主要的长诗。

② 费尔南多·德·罗哈斯(约 1465—1541),西班牙作家。其惟一的作品《塞莱斯蒂娜》标志着西班牙和欧洲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皈依天主教是想洗去犹太人的烙印。纳粹分子勾结起来准备夺取政权。在魏玛德国，谁将会在这个贫穷、卑微的国家取得胜利是显而易见的。德国人希望为他们软弱的国家找到一个强有力的人。我跟他们解释说我不避讳任何烙印。正好完全相反。这是一场斗争。这是一种向世界、家庭以及纳粹分子宣告的方式：看，我们都是闪米特人。我皈依天主教是出于和父母的根本分歧。我认为救世主已经降临，他叫耶稣基督。他们则仍在继续等待。正是这种等待蒙蔽了他们，使他们受到了追缉。因为等待救世主降临的人，总是一个革命者，是引起混乱和暴力的因素。在托洛茨基的街垒中，在爱因斯坦的黑板上，在爱森斯坦手中的摄影机里，在我们的导师胡塞尔的课堂上，犹太人变得混乱、畸形、不安、革命……这是无法避免的。他们在等待救世主的降临。然而，豪尔赫，如果你像我一样，承认救世主已经降临世间，那么你就能以他的名义改变世界，无需在教堂的期望前驻足不前，千年来的期望一旦实现就会改变一切。”

“听你这么说，好像犹太弥赛亚教的继承者是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现代进步人士。”豪尔赫叫了起来。

“他们确实是。难道你没有发现吗？”拉克尔急忙说，“没错。他们是期待着千禧年变化的那些人。他们有限的耐心一方面引导他们去发现相对论、电影和现象学，另一方面，又让他们以承诺的名义犯下罪行。在不知不觉中，他们扼杀了自己如此期待的未来。”

“但是，犹太人最大的敌人是那些穿着咖啡色制服，戴着卐字形徽章，在街上游荡的纳粹分子……”

“这是因为不可能有两个被选中的民族。不是犹太人就是德国人。”

“拉克尔,但是犹太人并没有杀害德国人。”

“这就是区别。希伯来人的弥赛亚主义创造性地升华为艺术、科学和哲学。回归为创造性的弥赛亚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手无寸铁。纳粹分子没有任何创造的天赋。他们的天赋只有一个:死亡,他们是死亡的天才。但是他们担心有一天以色列决心武装起来,以军事成就的名义丢弃他们的创造天赋。”

“作为一个民族,也许纳粹分子不会给他们留下另一条生路的。也许犹太人厌倦了作为历史中永恒的受害者和无辜的羔羊。”

“我祈求让他们永远不要成为任何人的刽子手。但愿犹太人不要再有他们的犹太人了。”

“小拉克尔,天主教的罪恶也不落于人后。请记住我是西班牙人,而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西班牙人。”

“比起共产主义殿堂的虚伪来,我更喜欢天主教的禁欲。我们天主教徒也谴责……”

“为萦绕在你心头的各种想法喝彩。我要吻你,亲爱的……”

“豪尔赫,别这样。告诉你,我们也谴责教会的罪行。因为这些罪行背叛了已经许下的诺言。这是一项义务:效仿基督。然而,共产党人却无法谴责他们圣殿中的罪行,因为他们认为这只是背叛了一种远在未来的承诺,这种承诺现在还未履行。”

“你会为此而加入某个教派吗?我是不是得成为堂璜才能把你从修道院里引出来?”

“哦,别开玩笑。堂璜,把你的手拿开。”

“不,我不是开玩笑。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种基督教的纯洁要求听从基督的教诲,而这只有进入某个修道

院才能做到。拉克尔,尔必入教堂修行!”

“不,必须在俗世上履行。再说,认识了你以后,我怎么可能去当修女呢?”

他们继续一起上胡塞尔的课,虔诚得近乎神圣。他们与导师共同研究却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因为胡塞尔带领他的学生,以他的谨慎和独立去揭示事物。学生们虽然受了他的影响,但多亏有胡塞尔赠送的翅膀,他们才能自由地进行思考。

“喂,乔治[1],老师说的‘境域心理学’是指什么?”

“我认为这指的是将情感、行为、认识具体化的一种方式。他要求我们,如果没有看到明显的、原原本本的,就像他所说的,‘活生生的’真实,我们就不要作出任何结论……首先要睁大眼睛看清楚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境域’,这才是我们真正存在的地方。然后才是哲学。”

晚上,他们经常在这个坐落在黑森林边上的大学城中散步,探索哥特式教堂的四周,沉浸在中世纪的景致中,穿过横跨在德累萨姆河上的桥梁。河水湍急,向莱茵河奔涌而去,与之汇合。

弗赖堡就像是一位女王年深日久的石像,双脚踩在水里,头上戴着松树做成的王冠。这对学生情侣的足迹踏遍了弗赖堡,一遍遍重温白天的功课,他和她一起——以前是挽着胳膊,现在是手拉着手——惊讶于他们的导师也在自我反思,神情紧张而高贵,高高的额头上眉头紧皱,显出一对咄咄逼人的眉毛,高挺的鼻子嗅出了思想,茂密的胡子挡住了他长长的嘴唇,长得好像某种哲学动物,一个游离基因离开了初次创生的滋养液,来到陌生土地上。胡塞尔坚持

① 乔治(George)为英文中和Jorge相对应的名字。

在演讲中容纳更多思想的声音。他的语言赶不上思维的敏捷。

大家都叫他“导师”。在学生的眼中他是坦诚的，他向他们提供一种没有教条，没有结论的哲学，在任何时候都乐意接受老师和学生的纠正和批评。大家都知道，弗赖堡的胡塞尔已经不是那个在哈雷，从一个简单的假设创造出现象学时的胡塞尔了：首先接受磨砺，然后再思索。也不再是哥廷根的那个胡塞尔了，那时的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仍未弄明白的部分，因为事物的奥秘有可能就在那儿。他是弗赖堡的胡塞尔，豪尔赫和拉克尔的导师。对他而言，人类精神的自由只取决于一件事：呼吁生命，反对威胁生命的一切。这是那个曾经目睹欧洲文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毁灭的胡塞尔。

“乔治，我不明白。他要求我们把现象缩减为纯粹的意识，把前者变为一个其下已经无法再压缩的地窖。我们就不能再往下挖掘，走得更深吗？”

“嗯，我认为你所说的地窖包括了自然、肉体和思想。这已经够多的了。接下去呢？老头子想把我们引向哪里？”

通过他那双鹰一般的眼睛，胡塞尔似乎读出了学生们的想法。他敏锐的目光和他鸽子般柔软的脖子，他的宽衬衫，挂着怀表链的背心，样式过时的黑色礼服，以及似乎要垂到黑色靴子上的裤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胡塞尔告诉他们，大战之后，欧洲的精神世界已经崩溃，他预言思想将会被缩减成自然和思维的共同基础，只是为了在欧洲重新建立更加美好的生活、历史、社会和语言。

“我无法想像没有欧洲的世界和没有德国的欧洲。一个欧洲的德国，将是欧洲向世界承诺的最好部分。我并不

是搞抽象哲学的,也不研究小姐绅士们的哲学。我的根扎在我们所做的最美好的部分。这是能比我们活得更久的东西,即我们的文化,能够启发诸位的子孙后代。我是看不到了。所以我才要教这个。我走在了我的死亡之前。"

于是他俩去一个欢乐的学生酒吧庆祝。通常他们不去那儿,是因为那里洋溢着喧闹的同学情谊。但是这天晚上大家带着诧异和微笑看到拉克尔和豪尔赫一起高举酒杯庆祝:"为相互主观性干杯!""为社会、语言、历史和一切与之有关的事物干杯!""我们永不分离!""我们是跟语言、集体和过去捆在一起的我们!"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两个哲学家在床上能融洽吗?你们的第一个儿子真的要取名为苏格拉底吗?这些话引起了哄堂大笑、同情、喧闹和叫喊。哦,相互主观性!过来,让我渗透你!

他们用惊奇、智慧和感性的目光打量着教堂的四周,最后走进了教堂。他们发现,就在那里,这座建成于16世纪初期的著名大教堂,正好展现了他们所关心的事情,仿佛他们又回到了导师的课上,不是作为补充,而是为了在三角楣上的原罪画中获得重生,在这里,在教堂的一侧,原罪排列在绘在拱门上的创世画之前,这告诉我们,是创世解救了原罪,将它抛在身后。堕落不是创世的结果,没有堕落,这对弗赖堡的情侣彼此说道,只有初始,然后是创世。

在建筑的西侧,撒旦摆出一副"世界之王"的架势,率领着一支队伍不仅远离原罪,而且也远离了神圣的创世。然而,就在撒旦队伍的前方,教堂的正门敞开着,在那里,而不是它的外面或里面,或者更确切地说,就在这个入口处,描绘并宣告着耶稣的救赎。

他们由这道门进入教堂，就像去领圣餐似的，并排跪在一起，也不怕被人笑话，高声祈祷：

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
我们要思想仿佛我们创造世界
我们要做历史活生生的主人
我们要生活在生之世界

纳粹分子把胡塞尔赶出了弗赖堡，又赶出了德国。这位流亡的老人在维也纳和布拉格继续教书，而德国国防军总是踩着他的脚后跟。他们让他回来老死在他挚爱的弗赖堡，但这位哲学家早已说过："在所有犹太人的内心深处，有一种绝对主义和一种对牺牲的热爱。"而他的女弟子埃迪特·施泰因[①]，却拒绝了以色列，皈依了基督教，加入圣衣会当了修女。就在这一年，她说："当上帝报复反犹暴行时，不幸将降临德国。"这一年，戈培尔策划了"水晶之夜"，毁坏犹太人的教堂、商业和犹太人本身。希特勒宣布他的目标是在欧洲永远消灭犹太民族。

就在同一年，豪尔赫·莫拉在墨西哥认识了劳拉·迪亚斯。而拉克尔·门德斯-阿莱曼胸前挂着大卫之星的标志，在大街上高喊着"赞美基督！"向党卫军们致意，接着被践踏，被鞭打，浑身鲜血淋漓地躺在地上，嘴里仍然重复着"赞美基督！"。

1939年3月3日，罗伊德·特里埃斯蒂诺的"欧根王子"号汽轮载着二百二十四名犹太人，从汉堡启航。这是被

---

① 埃迪特·施泰因(1891—1942)，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加尔默罗会修女，哲学家，神学著述者。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时认识胡塞尔。

公认为自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的恐怖以来最后一批离开德国的犹太人。当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可以归咎为纳粹分子疯狂的迫害（谁是犹太人？父母都是犹太人的孩子？或者父母中有一个是希伯来人的也算？或者祖父母一辈少于三个雅利安人的子孙也是？照此类推，一直到亚伯拉罕那一代的也算？），有些是因为富裕的犹太人，他们用钱财、土地、房屋、家具，从纳粹分子手中赎买他们的自由（正如帝国统治下的奥地利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家族），有些是因为以前的老朋友现在成了纳粹，但仍然对以前的希伯来朋友保持着亲切的记忆，还有的和犹滴一样，通过收买政府的某位官员来营救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但这个荷罗孚尼[1]却是不朽的：卐，最后还有一些是因为某些有权或无权的政府官员的幕僚，为个别的犹太人求了情。

从挨打的那天起，拉克尔开始在大卫之星的旁边挂上了基督的十字架，然后把自己关在汉堡的小书房里，因为这种双重的挑衅意味着在她家门口等待着她的将是嘴上没有戴铁罩的野狗和紧握着大棒的拳头。他们不断地叫嚣着，出来，你出来，犹太婊子，亚伯拉罕的烂种，讨厌的奴隶，地中海东部的虱子，吉卜赛人的下疳，出来，有种就出来，安达卢西亚的交际花，母猪，扫扫你的猪圈吧，在那儿的角落里找吃的吧，吃灰尘和蟑螂吧，如果犹太人真的能够吞下金子，那么他也能吞下老鼠。

他们又威胁邻居，说如果他们敢给我送吃的，就先取消他们的配额，如果再犯，就把他们送到集中营去：我，拉克

① 亚述国王尼布甲尼撒手下大将，于公元前689年受命前去攻打巴勒斯坦，围困犹太城市贝图利亚，一天，荷罗孚尼醉后熟睡时被漂亮的犹太寡妇犹滴所杀。

尔·门德斯-阿莱曼,决心为我的犹太血统和我天主教徒的信仰绝食;乔治,我决定做时代的绝对见证者,当纳粹党宣称"我们最大的敌人是信奉天主教的犹太人"时我就知道我不会有救了。这时我打开窗户,冲着街道大喊:"圣保罗曾经说过:我是希伯来人!我是希伯来人!我是希伯来人!"我的邻居们用石块砸我,两分钟以后,一梭子弹打碎了我的玻璃,我只好蜷缩在某个角落。直到墨西哥公使萨尔瓦多·埃利松多先生带着通行证来找我,告诉我你已经为我疏通关节,让我坐上欧根王子号汽轮,驶向自由的美洲。我早已发誓要死在德国,要做基督和摩西信仰的见证人。但是当时我却让步了,我远在他乡的爱人,我知道为什么,不是出于对他们的害怕,也不是担心自己会被送到那些臭名昭著的地方——达豪,奥拉宁堡,布痕瓦尔德[①]——去,而是为我的教堂、教父、教皇感到羞耻。他们没有出声来保护我们所有的犹太人,也没有庇护像我这样皈依了天主教的犹太人。罗马让我成了孤儿,乔治,庇护十二世从未发表过保护人类的言辞,更不用说单单为犹太人说话了;教皇从未帮助过人类。是你和墨西哥帮助了我。再没有比登上带着我们驶向美洲的欧根王子号汽轮更好的机会了。墨西哥总统拉撒路·卡德纳斯,将与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协商,让我们在佛罗里达下船。

在九天的航行中,我和其他出逃的犹太人交上了朋友。一些人对我信奉天主教表示诧异,另一些人则对我表示理解。但是大家都认为这是我为了能逃脱集中营而想出的一个失败的策略。船上没有统一的团体,然而胡塞尔确实有理由问我们:"我们是否有可能一起回到一个可以重新生活

① 此三处均为著名的纳粹集中营。

的世界,又在那儿重新找到相似的自我?”

我想去领圣餐,可是船上路德宗的神父却拒绝给我授圣餐。我提醒他,他在船上的合法职责是要名副其实地平等对待所有的信徒。他鼓起勇气告诉我,姊妹,现在是非常时期。

乔治,我承认,我是个挑衅者。但是请不要用在弗赖堡人们所说的那种骄傲和希腊式的自大[①]来指责我。我是个卑微的挑衅者。每天早上大家在餐厅一起吃早饭的时候,我首先用一只手拿起一块面包,用另一只手画个十字,用平静的语调说:“这是我的肉体。”再把面包送到嘴里。这掀起了轩然大波,激起了大家的愤怒。船长跟我说,您给自己种族的朋友带来了危险。我则笑话他的胡子。“这是第一次因种族问题迫害我们。船长,难道您没有发现这一点吗?过去总是以宗教问题迫害我们。”我撒了谎。伊莎贝尔和费尔南多[②]把我们驱逐出境,是为了维护他们“血统的纯洁”。但是,船长有他的回答:“门德斯小姐,船上有德国政府的密探。他们监视着大家,正准备随便找个借口来取消这次航行。他们当初允许这次航行是向罗斯福作出的让步,以换取美国不再增加接收德国犹太人的紧缩数额。各方都在试验。您得理解这一切。元首总是这样做的。我们只有这一线生机。请您克制自己。不要丧失拯救您和您的同伴的机会。请您克制。”

亲爱的乔治,一切都是徒劳。美国当局不允许我们在

① 在古希腊伦理与宗教思想中,过分傲慢意味着亵渎与轻蔑井然有序的宇宙对人类的各种限制。通常是希腊悲剧人物的根本弱点。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的剧情即是一例。

② 即前面所说的天主教国王与王后。

迈阿密下船。他们要求船长将船开到哈瓦那,让我们在那儿等待美国政府的许可。但是许可一直没下来。罗斯福被反对更多的外国人进入美国的公共舆论缠住了脱不开身。据说,美国接收犹太人的名额已经满了。没有人为我们说话,没有人。我听说前任教皇庇护十一世已经准备了一份关于"受到种族主义和反犹分子威胁的人类大团结"的手谕。可是他还没来得及颁布就逝世了。我的教会没有保护我们。民主也没有保护我们。乔治,就靠你了。乔治,求求你救救我。在你的拉克尔连哭都哭不出来之前,到哈瓦那来吧!耶稣不是说过吗?"如果你在一个城市受到迫害,那就到另一个城市去吧。"赞美基督!

四

莫拉:比达尔,我问你一件事。如果每一次都因为某个人和我们一起思考,却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就除掉他,那你所坚持的理想怎么可能实现呢?我们所有的共和派都支持共和国,反对法西斯主义。但是我们之间也是有区别的。阿萨尼亚①和普列埃多不同,康帕涅斯②和杜鲁迪也不同;何塞·迪亚斯和拉尔戈·卡瓦列罗③不一样,恩里克·李斯特和

---

① 马努埃尔·阿萨尼亚·伊迪亚斯(1880—1940),西班牙部长和第二共和国总统,试图组成温和的自由主义政府,但因西班牙内战爆发而受阻。

② 康帕涅斯(1883—1940),西班牙律师及政治家,共和派极左分子。1933年曾在阿萨尼亚领导下的内阁任海军部长。

③ 拉尔戈·卡瓦列罗(1869—1946),西班牙社会党领袖,第二共和国时期的杰出人物。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不久,出任第二共和国总理。

胡安·内格林[1],但是他们中的任何人,或者他们所有的人都不是佛朗哥、莫拉、塞拉诺·苏涅尔[2],或者阿斯图里亚的统治者多瓦尔。

比达尔:我们并没有拒绝任何人。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左派广泛的战线中。

莫拉:当左派追求权力时的确如此。可是当左派夺取了政权,共产党就开始清除所有和他们思想不一致的人了。

比达尔:举个例子。

莫拉:布哈林。

比达尔:换个别的,不是叛徒的。

莫拉:维克多·塞尔赫。我有个问题。一位同志被撤去了公职,没有经过审判就被流放,永远和他的家人分离,就因为他是"单独的个人",就不去关心他,这是革命行为吗?单个的、孤立的个人就不能被纳入历史伟大的集体史诗之中了吗?我不认为布哈林是叛徒,因为用他多党制的、人性的、自由的社会主义的方案也许还能把俄国从斯大林的恐怖中解救出来,并让俄国因此变得更加强大。

比达尔:让我们用"回到我们自身"来结束这个话题吧。莫拉,巴塔萨尔,你们认为共和国应该如何来协调胜利和伦理?

莫拉:兰波说,应该改变生活。马克思说,应该改变世界。他们俩都错了。应该让生活变得多姿多彩,让世界多元化。应该抛弃人类只有回到失去的大同世界才能取得幸

---

① 胡安·内格林(1894—1956),西班牙的共和派总理,任职期间正值西班牙内战的最后两年。

② 塞拉诺·苏涅尔(1901—2003),西班牙政治家。佛朗哥独裁时期曾任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

福这种浪漫主义的幻想。应该抛弃一体化的幻想。有句话说,一体化的理想和集权主义的现实只有一步之遥。

比达尔:你完全有权利轻视团结。但是如果没有团结,就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莫拉:但是却可以赢得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这不正是我们大家想要的吗?

比达尔:莫拉,怎么才能做到呢?

莫拉:重视差异。

比达尔:那么一致性呢?

莫拉:一种差异性的文化会使一致性得到加强。你认为被解放的人类会是一个完全团结、完全一致、完全统一的人类吗?

比达尔:你的话没有逻辑性。

莫拉:那是因为逻辑只是一种表达方式:这才具有意义。你是马克思主义者,你应该想到辩证法至少是一种选择,一种“这个或那个”。

比达尔:但愿综合法能让你团结。

莫拉:但愿它很快分解成命题和反命题。

比达尔:那么,你相信什么?

莫拉:两者或更多。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很疯狂?

比达尔:不。我认为这是政治上的无用。

巴塔萨尔:我的苏格拉底式朋友们,我能说两句吗?我不相信存在幸福的千禧年。我只相信在每个时刻、每天都存在自由的机会。就让它们溜走吧。它们就像贝克尔的燕子,一去不复返了。如果我必须在万恶中选择最小的邪恶,我宁愿一无所有。我认为政治是处于个人的完整之后的,因为如果没有个人的完整,人生在世就毫无意义。我非常担心如果我们,代表我们所有人的共和国无法证明我们把

道德放在资源之上,整个民族就会对我们背过身去,奔向法西斯主义,因为法西斯主义根本就不怀疑不朽,而我们对此却仍抱有疑虑。

莫拉:巴西略,你的看法呢?

巴塔萨尔:真正的革命者不谈论革命,因为在当今世界上,什么都配不上这个词。你们会认识真正的革命者的,他们从不谈论革命。豪尔赫,你的观点呢?

莫拉:我处于两个真相之间。一个是世界将得到拯救,另一个是世界受到了诅咒。在某种意义上,这二者都是真实的。这个腐朽的社会受到了诅咒。然而革命的社会同样也受到了诅咒。

比达尔:劳拉·迪亚斯,你呢?你还没张过嘴呢。同志,你怎么看这些?

她低下了头,然后又亲切地挨个扫了大家一眼,最后说:

"我很高兴看到男人之间最激烈的争论总会透露出一些他们共同的东西。"

"看得出来,你们很恩爱。"巴西略·巴塔萨尔看了看豪尔赫和劳拉说道,"在发生的这一切之中,怎么衡量爱情?"

"你最好这么说,"比达尔插嘴了,"只顾个人的幸福,而不顾千万生灵所遭受的不幸?"

"比达尔先生,我有个问题。"劳拉·迪亚斯说。"一对情侣的爱情能克服世上所有的不幸吗?"

"能。我想总有拯救世界的方法的。不管是像我们的朋友巴西略这么孤独的人,还是像我这么有条理的人。"比达尔半是谦卑,半是骄傲地承认。

这种目光没有逃过巴西略和豪尔赫的眼睛,也没有逃过什么都不明白的劳拉的眼睛。直觉告诉她,这天晚上的

聚会是一次告别的聚会。因为大家的目光中流露出紧张、忧郁、忍耐、害羞以及倾注于其中的爱。这些目光预示了无奈的分离,所以每个人的论证就像石碑一样不容置疑。这是告别,是永远失去的观点,是天上叫作谎言、地上叫作“政治”的那种东西。在两种谎言中,我们找到了一种令人痛苦的真实:“历史”。然而,在巴西略·巴塔萨尔悲哀地闪烁着的目光中除了一张写满了爱意的床,还有什么?在多明戈·比达尔阴沉的目光中除了一堆永远失落的观点还有什么?在她的豪尔赫,豪尔赫·莫拉忧郁而性感的目光中又有些什么……?向前追溯,在圣塔菲·德帕仑西亚的村长的目光中除了这样一个公开的秘密,——下令枪毙他的女儿以证明他对祖国西班牙、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热爱,还有些什么?在克莱门西亚在镜子前的目光中,除了那个令人讨厌的虔诚信徒的形象,——除掉了潜在对手的美貌与青春让她感到非常满意——还能有些什么?

巴西略拥抱了豪尔赫,跟他说,我们流了这么多次的眼泪,当未来降临的时候,我们会认识它的。

“生命之树长青。”比达尔同时拥抱了两个同志,向他们告别。

“兄弟,愿好运一直伴随着你。”莫拉说。

“但愿我们抓住最后的机会。”比达尔笑着脱开身,“别再嘲笑命运,让我们抛开不合时宜的欢笑吧。我们墨西哥见。”

然而他们此时正在墨西哥。他们在相聚的地方告别。这三个人是以失败的名义说话吗?不,劳拉·迪亚斯想,他们是以现在刚刚开始的流亡的名义说的。流亡没有祖国,不叫墨西哥、阿根廷或英国。流亡是另一个国家。

五

他们堵上了她的嘴，并且下令关闭圣塔菲广场周围所有的窗户。然而，仿佛什么都无法平息她的死所引起的轩然大波，或高或低的叫喊声从罗马门到斗牛场一直都跟随着她。或许只有被判死刑的女囚徒才听到了这些声音，或者所有的邻居都在撒谎，因为那天早上，大家都发誓说听到了黎明前远处传来了叫喊声和歌唱声。

紧闭的窗户。沉默的受害者。只有皮拉尔·门德斯的双眼在呐喊，因为她的嘴被堵上了，仿佛枪决已经执行。"堵上她的嘴！"母亲克莱门西亚向执法的村长、她的丈夫请求，"我惟一希望的就是别听到她的叫喊。我不想听她叫唤。""这将是一次干净利落的处决，老婆，你就别再闹了。"

我能闻到死亡的气息。皮拉尔·门德斯一字一顿地对自己说。她已经脱去了皮斗篷，只披了一件连乳头都遮不住的咖啡色法衣，没有穿鞋。她用双脚和嗅觉来感受。我能闻到死亡的气息，西班牙所有的坟墓都打开了。除了供狼饮用的血，西班牙还剩下了什么？我们西班牙人是死亡的猎犬，我们闻到了她的气息，一直追随着她，直到我们被杀。

或许这就是她的想法。或许这是共和国的三个战士，她的三个朋友的想法。他们留在城门外倾听着一切，专注地听着步枪的响声，那将宣告那个女子的死亡。为了她的生命，他们能献出比他们的生命更宝贵的东西，即他们拥有的共和国军人的荣誉。他们同样准备献出他们三个人共同的永恒荣誉，来保护他们中间一个人所深爱的女人。

听说最后她从斗牛场的沙地上被人拖走，双脚扬起了

广场上的尘土，直到她自己身上盖满了尘土，消失在尘土形成的云雾中。可以肯定的是，这天清晨，火和酷刑，这一对天敌，签订了一个条约，一起降临到圣塔菲·德帕仑西亚村，平息了步枪的鸣响。那时巴西略、多明戈和豪尔赫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作为对一个牺牲了的女人最后的敬意。他们互望了一眼，便向山上跑去，通知传令官不要熄灭火光，因为共和国的要塞还没有被击溃。

你们有什么证据？

一把灰。

他们没有看到秋天漂满了落叶的河流，干燥的夏季的重新来临使河水臭不可闻。

他们不相信下个冬季的寒冰会冻结在蓝天翱翔的雄鹰的翅膀。

当人群的呼喊像鞭子一样抽打着广场的时候，他们已经走远了，就在广场上，皮拉尔·门德斯被枪毙了，也就在广场上，她的村长父亲向整个村子宣告，我这么做是为了党，为了共和国，他不敢去看那扇百叶窗，在那里，他的妻子带着心满意足的仇恨望着他，她暗地里跟他说，你告诉他们，告诉他们真相，是你下令杀了她，可是恨她的却是她的母亲，尽管我爱她，我还是杀了她，她的母亲尽管恨她，却希望能拯救她，尽管我们俩都是佛朗哥分子，是属于同一党派的，又都是天主教徒，但是在年龄和容貌上却各不相同：克莱门西亚朝卧室中的镜子瞥了一眼，试图在她的衰老的脸上找到死去的女儿的痕迹，而死去的皮拉尔也许还不如一个苍老、无餍的女人，一个被突如其来的狂热和埋葬在两腿之间的谣言所折磨的女人。女儿年轻的面庞压倒了她苍老的面庞。

“不要把火熄灭，村子还没有投降。”

劳拉和豪尔赫沿着5月5号大街走向阿拉梅达大街，巴西略则朝另一个方向走去，走向大教堂；比达尔吹了声口哨，拦住了一辆罗马-梅里达的出租车，飞一般地离开。但每个人都转过身互相看了最后一眼，仿佛为了传递最后的信息："不要抛弃共患难的朋友。朋友要么一起活，要么一起死。"

第十五章　罗马区:1941 年

豪尔赫·莫拉走了。劳拉·迪亚斯回到家里,晚上从不外出,白天也整天在家。她有些茫然。她没有把真相告诉胡安·弗朗西斯科,而是首先反省自己的行为,“我做得很好,可结果都很糟。我很谨慎。我懦弱吗?我聪明吗?我是不是应该把一切都告诉胡安·弗朗西斯科,赌一赌他能否接受,再冒一次分手的危险,然后又重新陷入孤独,失去豪尔赫,失去胡安·弗朗西斯科,失去他们任何一个人的陪伴?莫拉不是说这是我们俩的私生活吗?这是神圣的,没有任何理由、任何道义能强迫我们把这种亲密关系告诉任何人。”

回到索诺拉大街的家以后,她常常照镜子。她的面容并不因为内心掀起的风暴而有所变化,直到现在都是如此。但从此以后却不一样了,她有时是昔日的那个少女,有时又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女人,一个改变了的女人。她的儿子、丈夫会怎么看她?圣地亚哥和丹东从不正眼看她,总是躲避着她的目光,匆匆地走开,有时候像小孩似的跳着跑开,不是出于兴奋,而是为了远远地避开她,不去注意她的在或不在。

“为了不承认我的不贞洁。他们的母亲不贞洁。”

他们不理睬她,而她却倾听他们谈话。家并不大,而且沉默增大了回声;这个家已经变成了一只蜗牛。

“当初爸爸妈妈见什么鬼了要结婚?”

只有镜子陪伴着她。她揽镜自顾,不仅看到了两种年纪,还看到了两种个性,看到了理智的劳拉和冲动的劳拉,充满活力的劳拉和胆小怯懦的劳拉。她看到自己的良心和愿望在镜子的表面挣扎,镜面光滑得犹如俄国电影里战争中的湖面。她应该和豪尔赫·莫拉一起走的;如果他提出这种要求,她会抛下一切跟他走的……

一天下午,她面对着敞开的阳台,坐在索诺拉大街的家里。她多摆了四把椅子,自己坐在正中间的第五把椅子上。过了一会儿,玛丽亚·德·拉奥姨妈拖着脚走来,叹了一口气,在她的身旁坐下。接着洛佩斯·格林从工会回来了,看了看她们,坐到了劳拉身边。又过了一会儿,孩子们从街上回来,看到这不寻常的场景,也都坐到了另一头剩下的两把椅子上。

不是他们的妈妈促成的。劳拉自言自语似的说,是时间和地点促成了我们。1941 年,墨西哥城的某个下午。那时影子被拉得更长,积雪的火山仿佛漂浮在燃烧的云床上,风琴师奏响《燕子》,刚过去的选举的海报开始吵闹不休,阿维拉·卡马乔[①]对阿尔马森[②]。这个悄无声息的家庭聚会举行的第一个下午包含了所有未来的下午,扬起风沙的下午,雨水平息了飞尘并用香气填满整个山谷的下午,一座在未来和过去之间摇摆的城市就坐落在山谷里。风琴师奏着新生的浅爱,女佣们一边哼唱着“走向丛林中的小径”,一边在阳台上晾衣服。街上的年轻人随着鼓点或其他乐器的声音

---

① 阿维拉·卡马乔(1897—1955),墨西哥总统(1940—1946)。

② 阿尔马森(1891—1965),墨西哥将军。1940 年代表保守势力参加总统竞选,败于阿维拉·卡马乔。

翩翩起舞,汽车、书贩、卖雪糕的人与卖辣椒粉和柠檬汁豆薯的小贩来了又去,卖甜食、亚当斯牌口香糖、咪咪牌棒棒糖、奶糖和甜薯的小摊都搭了起来。卖报亭关了,只剩下同盟国战败的惊人消息、连环画《查马科》和《佩平》、专给贵妇看的阿根廷风情杂志《莱奥普兰》和《家庭》,以及孩子们的杂志《比利肯》。小区里的电影院将要上映萨拉·加西亚、索莱尔兄弟、索菲亚·阿尔瓦雷斯、格罗利亚·马林、阿尔杜罗·德·科尔多瓦的墨西哥电影。小伙子们在街角的香烟铺偷偷地买阿拉斯牌、灯塔牌和精细牌的香烟。孩子们在玩跳房子,用桃核在地上划出临时的格子,用橘子汽水瓶盖来换葡萄做的"恰帕里塔",用罗马-皮埃达牌的绿色小轿车与罗马-梅里达牌的褐色或乳白色的小轿车进行赛车比赛。查布尔特佩克森林在墨西哥人住宅区包豪斯的后面拔地而起,带着一股苔藓和桉树的气味,一直延伸到象征性的奇迹阿尔卡萨尔。丹东和圣地亚哥每天下午回家之前都要登上阿尔卡萨尔,仿佛他们真的征服了一座陡峭而又神秘的城堡,到那里要经过崎岖小路、柏油大道和四通八达的道路,这些道路守护着城市上方这片令人惊异的开阔地带,其中有鸽子栖息的山林和摆放着19世纪的家具的神秘房间。

两个孩子坐在劳拉、胡安·弗朗西斯科和年迈的姨妈身边,感谢城市为他们提供了这一保留项目,包括运动,色彩,香味,歌声和墨西哥城的王冠——一座非常醒目的城堡,世上还有比我们的想像更多,更多的东西……

豪尔赫·莫拉走了。那些被她称为"事实"的东西,在浪漫的迷雾散去之后又重新浮现了出来。她的丈夫是第一个事实。他是最先重现的,他对孩子们(圣地亚哥二十一岁了,丹东比他小一岁)说:

"我爱她。"

他接受我,她残忍又促狭地说,他接受了我,尽管我从未跟他说过实话,他还是接受了我,因为他知道我的自由是他的残暴和愚蠢赋予的,“我应该和一个面包师结婚,他不在乎自己做的小点心。”后来他发现,当着孩子的面承认自己爱她的同时也在证明着他自己的失败,但也证明了他潜在的高尚。劳拉·迪亚斯希望所有的人,父母与孩子都靠着爱获得重生,她曾如此强烈地经历过这种爱,现在轮到她把这爱给予她的亲人们。

每天清晨,她在丈夫身边醒来——他们又睡在一起了——就听到这个男人的第一句话:

“有点不对劲。”

这句话拯救了他,也使她重新忏悔。胡安·弗朗西斯科身上被重新发现的或许一直就有的高贵让她感到高兴。是他向丹东和圣地亚哥谈起他们的母亲,回忆着他们什么时候认识,当时她的样子,她是多么的不安,多么的独立,令人试图去理解她……劳拉听到这些,觉得自己受到了污辱:她得感谢丈夫的说项,但事实上这侮辱了她,尽管这侮辱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傍晚坐在墨西哥峡谷中,面对着火山和查布尔特佩克的城堡是每天黄昏的一项仪式,用这种方式来说明:无论如何,我们都在一起。一天傍晚的仪式上,她大声地说:

“我爱上了一个男人,所以我没有回家。我和他在一起。我差点为他付出了生命,差点为他抛弃了你们大家。但是现在他抛下了我。所以我回来和你们在一起。我可以一个人独自生活,但是我害怕。我回来寻求庇护。我感到非常无助。我并不是请求你们的原谅,我只是请求孩子们,以你们的年纪,开始去理解生活是不容易的。谁都会犯错误,会伤害爱我们的人,因为我们爱自己胜过爱其他任何事

物，包括在某个特定的时期被我们深爱着的人。你们每个人，丹东，圣地亚哥，当机会出现在你们面前时，你们会更愿意继续走自己的路，而不是踏上我和你们的父亲所期望的那条路。当你们这么做的时候，想一想我吧。请原谅我。”

没有言语和激动。只有玛丽亚·德·拉奥在她因白内障而昏花的双眼前，闪过了关于维拉克鲁斯一家妓院里一个小女孩的古老记忆，关于一个把她从无助中拯救出来，并将她融入这个家庭的绅士的记忆，他排除了一切种族、阶级、道德和不道德的偏见，因为这些都是按照字面的含义，扼杀生命而不是赋予生命。

劳拉和胡安·弗朗西斯科请求彼此作出让步，孩子们不再奔跑、吵闹，不再为了避免见到母亲而东躲西藏。圣地亚哥无论睡觉或平时都把卧室的门敞开着，他的母亲却不明白，还以为这是他自由、坦率的一种举动，尽管这也很可能是一种应当受到责罚的反抗：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丹东笑话他，哥哥，下一步准备闹点什么？去大街上胡说八道吗？不，哥哥回答说，我想我们闹够了。谁？你和我吗？我喜欢这样，丹东；我只要自己就够了，我得关上门，省得进苍蝇；你什么时候想看我收集的《观看》杂志，你就过来。都是烂货、婊子……

劳拉一回来就去照镜子，几乎总是认为她的脸并没有因为使她不安的事情而有所变化。她发现圣地亚哥和她一样，也经常照镜子，特别是盯着玻璃窗中的自己，好像为自己感到吃惊，仿佛经常发现和他在一起的另一个自我。也许这只是母亲的想像。圣地亚哥已经不是孩子了，他有了新的变化。劳拉在镜子面前也时常认为自己是从前的女子，然而有些时候，镜中的她是个陌生人——一个改变了的女人。儿子也这么看自己吗？她快满四十四岁了。

她不敢进去。敞开的大门是一种邀请,令人妒忌或矛盾的是,这同时也是一种禁止。请看着我,但别进来。他在画画。身旁的圆镜子可以让他瞥见自己,他在创作——不是复制,也不是抄袭——自己的脸庞,母亲只有在儿子的自画像中才能认出和记住的脸庞。草图变成了圣地亚哥真正的面庞,向她显示,迫使她意识到她曾经离开又回来了,但她却从未真正注视过她的儿子。他们有理由不理她,从她身边跑开,偷偷地溜走,因为她也曾不理他们。他们不仅指责她抛弃了家,也抛弃了目光:他们希望能引起她的注意而她却不理睬他们。圣地亚哥首先发现镜子似乎可以代替他原本希望从父母、兄弟以及社会——他带着骄傲的誓言和无知的满足所闯入的一个充满敌意的社会——那里得到的目光。一幅画像,接着是一幅自画像。

而丹东,他也许在城市明亮的玻璃柜中发现了他自己。

她回来了,仿佛他们不存在,也没有感到被遗忘,没有受到伤害,不曾急切地想与她交流,正如圣地亚哥现在所做的那样:一张她不在的时候用来辨认的画像,一张儿子可能会寄给母亲的画像,——如果劳拉像她所希望的那样,已经离开,去和她的西班牙人,她的“贵族”一起生活的话。

妈妈,看,这就是我。你别再回来了。

劳拉想像着,她不会给予儿子别的面孔,而只有现在儿子呈现在她面前的这张面孔:宽宽的额头,间距很大的琥珀色的双眼不像现实中的那么黑,高挺的鼻子,挑衅的薄嘴唇,笔直而凌乱的头发闪烁着栗色的光泽,颤动的胡子,在自画像中,甚至下巴也在微微地颤动,仿佛想摆脱这张脸,准备勇敢地面对全世界的打击,这是小圣地亚哥。

他的身边有好几本书凌乱地堆放着,敞开着。梵高和

埃贡·希勒[1]。

你从哪儿弄来的？谁给你的？

跑马场区的德国书店。

劳拉想说，猎兔犬的种却变成了德国狗。但他却抢在了前头，你别担心，他们是流亡到墨西哥来的德国犹太人。

真是时候。

对，妈妈，真是时候。

凭着那幅自画像的诠释和帮助，她描绘着圣地亚哥的五官，但是她没有注意到草图的厚重和暗淡的光线会让观赏者认为这是一幅悲哀的、宿命式的脸，仿佛这位年轻的艺术家已经发现脸能够反映每个生命悲剧性的需要，而潜在的自由却超越了失败。劳拉看着这幅儿子为自己绘制的画像，想到了拉克尔·门德斯-阿莱曼的悲剧以及她与豪尔赫·莫拉戏剧性的故事。拉克尔阴郁的、与整个犹太民族一起分担的不幸的命运和西班牙贵族豪尔赫·莫拉戏剧性的、高尚的，最终可以谅解的回应，——他到哈瓦那去救拉克尔，就像他当初在西班牙想救皮拉尔那样——这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圣地亚哥和他的自画像让劳拉看到了一线光明，一个回答，对此她想作出自己的回应。应该给发生的事一点时间，应该承认痛苦会以某种方式转变成知识，为什么儿子的自画像会让她产生这些想法？

当时他和她是一样的。圣地亚哥看着她，通常也会接受她站在卧室门口望着他。

她没有将他们分开。他们完全不同，圣地亚哥接受了这一切，丹东则断然拒绝，扫除他道路上的障碍或妨碍他的

---

① 埃贡·希勒(1890—1918)，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以色情的人体绘画知名。

一切事物。他会在课堂上让一位穿着得体的老师成为大家的笑料，或者在课间休息时冲着他的胖同学做鬼脸。然而却是圣地亚哥更能抵抗世上的规矩，丹东在强烈地拒绝之后，最终却能接受它们。是丹东成为了独立战争中的主角，扮演了“多洛雷斯呼声”中的年轻主角。我已经长大了，这是我的生活，不是你们的，我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我支配自己的时间。是他醉醺醺地回来，是他在外面跟人打架，染上了淋病，红着脸伸手要钱。他最自由，却又最依赖别人。他展示自己，以便更轻易地屈服。

圣地亚哥还在上学的时候，就在何塞·克莱蒙特·奥罗斯科的冷饮店里打工。后来劳拉让他去找弗里达和迭戈，去给画家在民族宫开始绘制的壁画帮忙。他把钱准时交给母亲，就像狄更斯笔下某个在皮革厂干活的小孩。她笑着向他保证，这钱就为他存着。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希望不是惟一的秘密。”圣地亚哥说着，冲动地吻了吻他的母亲。

“你偏爱他，因为他原谅了你。”丹东冷冷地说。劳拉克制不住，打了他一个耳光。

“我还是不说话的好。”丹东说。

劳拉·迪亚斯已经掩藏了她对豪尔赫·莫拉的激情，现在她决定不再隐藏她对儿子圣地亚哥的感情，就像是为围绕在对莫拉的爱周围的沉默所做的一种不自觉的补偿。她不否认她爱圣地亚哥胜过爱丹东，她知道这一般不容易被接受。“要么都是亲生的，要么都不是亲生的。”她不在乎这些。在他身边，看着他在家里干活，出门，按时回来，把钱交给她，向她讲述他的计划，这一切渐渐在儿子与母亲之间编织出一种共同的东西，也可以叫偏爱。这意味着圣地亚哥

在劳拉的生命中，开始提前占有一席之地，占第一位。仿佛豪尔赫·莫拉的爱消逝了，这爱在她自己的注视下显示出劳拉·迪亚斯是一位独一无二、不容混淆、无可替代但最终会消逝、会死去的女人，然而却是曾经爱过和被爱过的女人，会把一切留给情人的女人，现在她所有的激情都转移到了圣地亚哥身上，不是母亲对儿子的感情，因为那仅仅是爱，或者偏爱，而是这位年轻人对生命和创造的激情：劳拉开始将他的激情变成自己的激情，因为圣地亚哥独立于自身之外，摆脱了虚荣，将这激情献给了她。

圣地亚哥，她的儿子，小圣地亚哥，他热爱所做的一切，全身心地投入他所做的一切，取得了飞速的进步，他模仿只在书籍和杂志中看到的复制品，并且研究墨西哥的壁画。他发现了自己身上的另一个自我。他的母亲也同时发现了这一点，刚开始时小伙子一走近白纸，就会提前产生创造的颤抖，后来只要他一走近画架——那是劳拉送给他的十九岁生日礼物——也会如此。

他在传播他的颤抖。他的激情传播到他的画布上，就像感染一个看他工作的人。他是一个全身心投入的人。

劳拉开始依靠儿子艺术家的颤抖来生活。看着他工作和进步，任凭自己被他的早熟所感染，因为那就像是儿子从体内带来的一股狂热。然而他仍是个快乐的青年。他喜欢美食，品尝各种各样的墨西哥辣酱玉米卷，邀请劳拉去参加鲁赛尔纳街边举行的东南界尤卡坦宴会，吃蛋黄酱，帕帕德苏尔杏仁，或者那不勒斯油腻的乳酪，在龙舌兰虫泡鳄梨凉拌菜和醉奶蛋糕的时节，邀请她去伦敦区大街上的贝林格豪森大院，邀请她去乌拉圭街区的多瑙河餐厅品尝浇了柠檬汁或加了厚厚的辣椒酱的牛角杂碎，这种辣椒酱香气四溢，是芥末的王中之王。

妈妈,我来付账,我来掏钱。

丹东仇恨的目光追随着他们,胡安·弗朗西斯科趿着拖鞋的脚步声追随着他们,却根本不理睬她。这一年,1941年,她回到家,对她来说,和圣地亚哥在一起的日子就是生活。然而,时常伴随着内疚的心情,她对莫拉的爱延续下来,变成了对圣地亚哥的爱。她发现自己对小圣地亚哥的爱,同样是她对大圣地亚哥的爱的延续;仿佛天上地下没有一种力量能让她停下,让她孤独,内疚或是解脱的孤独,这都算不了什么。哥哥、情人、儿子之间的界限是无法察觉的。接连好几天的下午,她都在阳台上眺望着摇曳的树林和休眠的火山。

"我去哈瓦那救拉克尔·门德斯-阿莱曼。欧根王子号汽轮没有被美国接受,而古巴又听从美国的命令,或者他们至少会揣测美国人的想法并照此行事。船将会启航,重新开回德国。这一次,谁也活不了。希特勒再次给民主设下了圈套。他对他们说,可以。你们看着,我送了满满一船的犹太人投奔你们,你们就收留他们吧。现在他会说,看到了吧?连你们都不喜欢他们,我更不喜欢。把所有的人关到毒气室,问题就解决了。劳拉,如果我及时赶到的话,我会救出拉克尔的。"

"胡安·弗朗西斯科,我们就永远无法和平相处了吗?"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我已经接受你住在我家了,已经要求孩子尊重你了。"

"你没看到家里还有别人和我们住在一起吗?"

"没有。这个幽灵是谁?"

两个幽灵,你和我。以前……

我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了。静一静吧。你的工作怎么样?

挺好的。里维拉夫妇不会处理文字。他们需要有人帮他们回信,收拾文件,检查合同什么的。

那太好了。恭喜你。不用花很多时间吧?

一个礼拜去三次。我想多花点精力在家里。

丈夫的这句“太好了”意思是“是时候了”,但是劳拉却忽视了这一点。有时候她觉得和他结婚就像是以另一面来面对命运。也许过去曾经或者一直都应该是个谜一般遥远的东西变成了日常的真实:胡安·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格林的真实生活。她不会大声地向他问她多次问过自己的问题:她的丈夫在干什么?他在什么地方失败了?他曾经充满了英雄气概,现在对此已经厌倦了吗?

“以后你会明白的。”他说。

“以后我会明白的。”她重复着,直到说服自己这是她说的话。

劳拉,我累了。我在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和联盟的议会得到了丰厚的报酬,家里什么都不缺。如果你愿意帮迭戈和弗里达的忙,那是你的事。你还想让我重新成为1908年和1917年在世界工人之家和红色旅里的那个英雄吗?我可以给你开个革命英雄的名单。除了死去的人,正义成就了我们所有的人。

不,我想知道,你过去确实是个英雄吗?

胡安·弗朗西斯科带着冷漠和咆哮,开始放声大笑。

根本就没有什么英雄。如果有,他们很快就被杀害了,人们就会立起他们的塑像,而且,塑像都够难看的,为的是让人不再相信什么英雄。在这个国家,连荣誉都是破烂,所有的塑像都是铜的,你几乎都刮不下任何金色的东西。你还希望我怎么样?妈的,为什么你不尊重我的过去?

我正在努力理解你,胡安·弗朗西斯科。既然你不告诉

我你的出身，至少你得告诉我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一个监视者。秩序的维护者。安定的管理者。我们赢得了革命的胜利。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来维持和平，权力交替剔除了军队的愚蠢行为，我们分配土地，推广教育，修建道路……你认为这还少吗？你想让我反对这一切吗？你希望我和所有那些贪得无厌之辈塞拉诺，阿尔诺尔夫·戈麦斯，埃斯科瓦尔，萨图尔尼诺·塞迪略[①]以及哲学家巴斯贡塞罗斯落得同样的下场吗？他们都没有成为英雄，都发霉烂掉了。劳拉，你还想我怎么样？

因为我在寻找一条小缝儿，我从那里可以爱你。胡安·弗朗西斯科，我就是这么傻。

那你是自找麻烦。还差得远呢！

当圣地亚哥画画的时候，他想告诉他，自己很喜欢他的艺术热情。父亲在关注中以非常冷静的理智告诉了他。

“迭戈用了‘飞跃’[②]这个词。他在法国待了很长时间。”

圣地亚哥正在用写实的手法描绘一对赤裸的男女，他们分开站立，互相凝视，用目光来彼此探索，双臂缠绕在一起。劳拉告诉他，永远相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两个人的精神状态几乎总是不一样的。一个完全一致的时刻会令我们激动不已，两个人之间的平衡只是不幸地预示了将有一个人要破坏这种平衡。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和你父亲的事。”

“妈妈，你只是走在他的前面而已。你已经让他明白你不会成为伤心的那个人。你把这个角色留给了他。”

---

① 萨图尔尼诺·塞迪略(1890—1939)，墨西哥将军。

② 此处原文为法语 élan。

圣地亚哥清理着他的画笔,注视着母亲。

"到了他死的那一天,谁还能走在他的前头?"

在谨慎有力地作出反应之前,怎么能够抛弃一个如此软弱的男人呢?劳拉对自己说,不,应该改变的是游戏的规则,规则是由男人制定的,用来约束男人和女人,因为只有它们才能规范两种性别,因为男人的规则对一个女人忠贞、持家的生活和她不忠、游荡的生活同样有效;在前一种情况下,她屈从,在后一种情况下,她反抗。这两种情况下她都是有罪的,她的忠诚是有罪的,因为她和一个不需要我们的男人一起依偎在冰冷的墓穴中,让生命就这么白白流逝;她的不忠也是有罪的,因为她和丈夫寻找另外的女人一样,寻求与另外一个男人的欢爱,这对她而言是罪孽,对她的丈夫却是一种点缀,他是堂胡安,而她是堂娜布塔[1]。胡安·弗朗西斯科,看在上帝的分上,为什么你不以一种伟大的爱情狠狠地骗我一场,而只是和你的老板,腆着肚子的莫罗内斯发生可有可无的关系呢?为什么你和一个女人没有像我与我的爱人豪尔赫·莫拉这样伟大、强烈而又勇敢的爱呢?

胡安·弗朗西斯科和丹东的关系与劳拉和圣地亚哥的关系一样:两个阵营。老头——他已经满了五十九岁,但看上去像有六十岁——原谅了小儿子所有的荒唐行径,给他钱,让他坐到他的对面,因为他们俩谁也不开口说话,至少在家里的另外两个对手劳拉和圣地亚哥面前是如此。尽管这样,母亲还是隐约感觉到胡安·弗朗西斯科和丹东之间有交流。一天下午,在阳台不断重复的问候仪式上,例行公事

---

① 布塔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婊子,妓女",此处作者用诙谐的笔墨将她与堂璜相比。而堂璜(即堂胡安)这个名字恰好又巧用了胡安·弗朗西斯科这个名字。

的家庭聚会中，沉默的小姨妈凭着她的意志证明了这一点。玛丽亚·德·拉奥感觉到父亲和小儿子之间存在着一股力量，她躲过了他们却没能躲过劳拉的目光。只有在那个时候，总是身穿一袭黑衣的黑白混血老妇吸引了劳拉的注意力。玛丽亚·德·拉奥飞快地转动着眼珠子，仿佛她是一只黑色的雄鹰，目光可以从中一分为二，能够同时看到两个方向。她的目光从胡安·弗朗西斯科转向丹东，又从儿子回到父亲身上。这样来回好几次。告诉劳拉某种可以理解为"他们互相理解"的含义，这是劳拉早就知道的；或者还可以理解为"他们是一丘之貉"，这层意思就比较难琢磨了：身手敏捷、喜欢热闹、举止随便的丹东看上去和稳重、腼腆、严肃的胡安·弗朗西斯科正好完全相反。他们的关系在哪儿？玛丽亚·德·拉奥的直觉可很少出错。

一天晚上，当圣地亚哥在他崭新的画架——迭戈·里维拉送给他的礼物——旁安然入睡，得到允许可以看他工作的劳拉，给他盖了条毯子，将他的脑袋放到尽可能舒服的位置，轻轻地抚摸着他宽阔的额头，当她离开的时候，听到胡安·弗朗西斯科的卧室传来笑声和低语声，她没敲门就进去了，看到胡安·弗朗西斯科和丹东叉着脚坐在地上，研究着一张摊开的塔巴斯科州的地图。

"对不起，"劳拉打断了他们，"已经很晚了。丹东，你明天还有课。"

年轻人笑了："我最好的学校就在这儿，跟爸爸在一起。"

他们喝了酒。朗姆·波特雷罗的酒瓶已经空了一半。酒精的作用使胡安·弗朗西斯科无法挪开按着家乡的那只手。

"小绅士，去睡觉吧。"

"哦，真讨厌。我们聊得多开心啊。"

“要是你不去睡的话,明天你就会无精打采的。”

“奇丘,丑鬼,阿维拉·卡马乔的儿子。”丹东哼着歌走了。

劳拉紧紧地盯着她的丈夫和地图。

“你的手指着哪儿了?”劳拉笑了,“让我看看。马库斯帕那,纯粹是巧合吗?还是它告诉你什么了?”

“这是隐藏在丛林中的一个地方。”

“我也这么想。它告诉你什么?”

“埃尔泽维尔·阿尔蒙特。”

劳拉沉默了。那个普埃布拉的传教士的形象突然又出现在她的脑海中,有一天,他来到卡特马哥,传播和推行苛刻荒唐的清规戒律,扰乱忏悔室里的纯真,另一天,他带着给松戈里卡圣婴的祭品逃跑了。

“埃尔泽维尔·阿尔蒙特。”劳拉神情恍惚地重复着,想起忏悔的时候那个神父的问题,“小姑娘,你喜欢看你爸爸的小鸡鸡吗?”

“他逃到塔巴斯科去了,当然是穿着便装。谁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钱。每个月他都要去一趟维亚埃尔莫萨,第二天一下子付清所有的债务。我妈死的那天,整个马库斯帕那地区没有一个神父。我跑到大街上喊,我妈想做临终忏悔,她想进天堂,有没有神父为她祝福?这时候,阿尔蒙特显露了他的神父身分,帮妈妈做了临终祈祷。我永远也忘不了妈妈那张安详的脸。她死的时候还感谢我把她送上了天堂。我问埃尔泽维尔神父,您为什么要隐瞒身分?他告诉了我。我对他说,这是您恢复自由的时候了。我带他去参加布兰科河的罢工,他照顾那些被农民打伤的伤员。军队里死了二百多人,阿尔蒙特为所有人都一个一个地做了祈祷。谁也无法拒绝他,尽管急着要把尸体装上火车,运

到维拉克鲁斯再把它们扔到海里去。然而埃尔泽维尔神父本性难移，他和玛格利塔·拉米雷斯结婚了。那是一个勇敢的女工，放火烧了一家轮辐店。这样，他犯下了两重罪。教会因为他在卡特马哥的偷盗而四处找他；政府呢，是因为他参加了布兰科河的叛乱。我后来问自己，教士有什么用？埃尔泽维尔所做的一切，就算没有教会也能做。有没有祝福，我的母亲还是会死的。波菲里奥·迪亚斯的军队杀害了布兰科河的劳动者，不管有没有得到神父的宽恕，大家还是会把他们扔进大海的。玛格利塔·拉米雷斯纵火的时候，也不需要神父。我怀着所有美好的信念问我自己，教会他妈的有什么用？仿佛为了回答我的问题，埃尔泽维尔后来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他去了维拉克鲁斯，宣称布兰科河的一切是一场'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他和美国公使一起出现在报纸上，祝贺政府'富有决定意义的举动'。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他在卡特马哥偷鸡摸狗的行为和他的出逃获得宽恕。他的血管中流着叛逆的血液，当他认为我们要取得胜利的时候，他利用了我，一旦我们输了，他就背叛了我们。他不知道我们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因为他，我极其痛恨、轻视教会。因此，我决定追随卡列斯，供出了索里亚诺修女。他们都是祸害，跟他们用不着客气。"

"那么，你什么都不欠他们？"

"我的确欠了埃尔泽维尔·阿尔蒙特的情。他跟我提到了你家。他把你说成是维拉克鲁斯最漂亮的小女孩。我觉得他对你有企图。他告诉我你是如何向他忏悔的。他让我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劳拉，我决定要认识你。我去哈拉帕是为了结识你。"

胡安·弗朗西斯科小心翼翼地折起了地图。他已经换上了睡衣，一言不发地躺了下去。

她却无法入睡。老是想像着在旧日感情的基础上,一个人可能感受到的巨大的无奈,仿佛吞下了生命中所有的毒芹,除了等死,别无他法。难道必须忍受痛苦才能成为某个大人物吗?接受痛苦还是去寻找痛苦?她曾见过阿尔蒙特神父像个影子似的躲在母亲雷特西亚在哈拉帕家中的客房里。也许对胡安·弗朗西斯科而言,阿尔蒙特神父的故事好像变成了一种没有被他自己觉察的罪孽和痛苦。有谁知道在这个国家的每个家庭和每个人的心中,宗教的根扎得有多深,对宗教的反抗仅仅只是另一种信教方式。革命和它的爱国举动,它在俗世上的圣徒,在战场上的烈士,不正和征服时期以来,曾教育、保护、剥削过墨西哥人的罗马天主教会一样吗?那是一个世俗的、然而却被信奉为能赋予健康、确保健康的教会——尽管它早已面目全非。但是这一切最终都无法解释或者辩护对一个躲避在家里,劳拉·迪亚斯自己家里的女人的出卖。

胡安·弗朗西斯科是不可原谅的。到他死的那一天——劳拉闭上眼睛准备睡觉——他也无法得到妻子的原谅。这天晚上,她觉得自己更像格罗丽亚·索里亚诺修女,而不是胡安·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格林的妻子。是修女,不是妻子,是修……

早上起床后,她继续陷入沉思,她不想把她丈夫生活中的变化——过去的那个精力充沛、慷慨大方的革命工人演说家,现在的这个政治家和第二把手——仅仅归咎于生存的需要。也许父子之间的地图游戏保存了胡安·弗朗西斯科的本质,比阿尔蒙特神父的故事还要走得更远。丹东,他有可能是知情者。他也会谈论或丢弃——如果他认为应该的话——他的名誉和机会。不,她不会在家里伪装出和善或差异,从今往后,在家里只讲事实,正如她所做的那样。

在大家面前作出榜样，在家人面前忏悔，她并没有失去、反而赢得了大家的尊敬。

那个周末，她把这些告诉了丹东："孩子，我很坦白。"

"你在无能的丈夫、一个女里女气的儿子、另一个醉鬼儿子和一个出生在妓院的姨妈面前忏悔。是啊，你好勇敢。"

她已经打过他一次了。她曾发誓不再打他。

"关于我的父亲，你希望我告诉你些什么呢？你要是跟他一起睡，你会套出他所有的秘密。妈妈，再勇敢些吧。我是为你好才这么说的。"

"你是个小可怜虫。"

"不，我希望我是个大可怜虫。你看着吧，伙计，就像吉科·门迪维说的那样，瓜恰恰恰拉恰！"

他迈了一个舞步，整了整蓝黄相间的条纹领带，然后说别担心，妈咪。每个人都有自己面对世界的方式。哥哥和我已经受够了。我快二十岁了，我们不再是您的负担了。

劳拉没有说出她的疑虑。丹东将需要全世界的帮助，由于世界不会无偿地帮助任何人，他必须有所付出。对小儿子她感到深深的厌恶。她问自己一些毫无用处的问题："他从哪儿学成这样的？胡安·弗朗西斯科的血脉中有什么？为什么在我的血脉中……"

圣地亚哥进入了生命中的狂热时期。他不再关心里维拉在民族宫的工作。他把在索诺拉大街的卧室变成了散发着浓烈颜料和松节油气味的画室。进入这个空间就像是进入了一个长满了冷杉、松树、落叶松、笃耨香树的原始森林；墙壁被抹得乱七八糟，像是一块摊开的、凹凸不平的画布；床上的被褥好像是用来盖在另一个圣地亚哥身躯上的，那个当他的双胞胎兄弟在画画时睡觉的圣地亚哥；窗户被盘旋着的鸟儿挡住了阳光。鸟儿们被引来赴约，就像秋分时

南方的召唤那么难以抗拒。圣地亚哥一边画画，一边高声朗诵，仿佛他也被一种南方的引力所牵引：

树枝出生时像个岛屿，
树叶拥有剑的形状，
果实完成了它的总结，
根节在黑暗中向下伸展，
这是鬣蜥的傍晚……

后来，他画画时又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所有的艺术家都是被驯服了的动物，我是一头没被驯化的动物。"确实如此，他留着一头长发，稀疏稚气的胡须，高高的额头，明亮而灼热的双眼中充满着强烈的爱，让劳拉感到害怕，劳拉觉得儿子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世上所有的词首字母都写在他身上了"，因为她的儿子圣地亚哥是《漫歌》中"黄铜和黑夜的年轻勇士"，美洲最伟大的诗人巴布罗·聂鲁达的这本诗集刚刚在墨西哥出版，母亲和儿子一起在读，她又想起了豪尔赫·莫拉说到那些战火纷飞中的马德里的夜晚，聂鲁达在一所灯火通明的房子里，头上是法西斯军队的轰炸机，在那样的欧洲世界中，回到献给我们的美洲的元素的赞歌，美洲永远处于毁灭和重建中，"多少年的风，多少月的风、多少星期的风"，"人类光环的高处；最高的杯子包含了众多的生命之后一个石头的生命的沉寂"。这些句子滋养了儿子的生活和创作。

她曾想做得公正些。她的两个儿子走向了两个极端，圣地亚哥和丹东成了光环的一分子，对两种新生命的预示性的沉寂而言，他们俩都是"高高的杯子"。直到这时她才相信，比她年纪大的或者和她同时代的人是可以认识的，而

她的孩子们，是一些不可思议的、无法确定的神秘。她询问自己，在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中的某个时刻，她的亲人们会不会无法理解她，正如她现在无法理解她的孩子们一样。谁能理解她？她徒劳地寻找着答案。玛丽亚·德·拉奥，她的确生活在生命的一个极端，没日没夜地面对着遗弃；或者她的丈夫胡安·弗朗西斯科，对于他，起初，她只知道关于他的传说，接着变成了一段失效的神话，最后变成了与理智的屈服交织在一起的长久的仇恨。

无论如何，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同盟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加强了。每个家庭都有一些无法控制的吸引力，就像那些从未掉下来的天体之间存在着引力一样，有一次莫拉跟她解释，正是因为它们彼此间存在万有引力的作用，尽管一个自始（如果说曾经有过）至终（如果说将来会有）永远处于扩张之中的宇宙具有一股无法遏制的强大作用，这些天体仍然能互相支持，相互保持彼此的完整。

“劳拉，重力不是下落，像通常人们认为的那样。那是一种吸引力。吸引力不仅将我们连接在一起，而且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

劳拉和圣地亚哥互相支持：儿子的艺术计划与母亲道义上的坦白激起了共鸣，劳拉回到失败的婚姻完全要感谢与儿子创造性的联合；圣地亚哥在母亲身上看到自由的决心，这和促使儿子去绘画的动力是一致的。与之相反，胡安·弗朗西斯科和丹东的接近，首先是出于父亲的某种男性骄傲，这是他喜好热闹的儿子，无拘无束，夸夸其谈，风流倜傥，就像父子俩一起去市中心看的豪尔赫·内格雷特大受欢迎的电影中的人物，就像伊图尔必德街上举行首映式的《中国宫殿》中的人物，电影中的纸板墓塔，笑眯眯的佛像，繁星密布的天空——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些组成了当时的

“电影大教堂”,“林阴道”,“殖民地”和对过分装饰的总督时代的缅怀,“美景”,“立多”和好莱坞式的虚荣,“流线型”,社会上的太太们就是这样形容她们的嫁妆、车辆和厨房。父亲喜欢邀请儿子,向他展示为了荣誉的决斗,马背上的壮举,酒馆的案子和神圣的小夜曲——他俩都沉迷于格罗丽亚·马林漆黑如水的目光中——她曾祈求圣母让某位壮士降临人间。因为曾有一位哈利斯科的骑士,尽管他自信征服了女人,却总是因为女人的种种技艺,折服在一群维拉克鲁斯姑娘——埃斯特尔·费尔南德斯,玛丽亚·路易莎·塞亚或小康苏埃洛·弗兰克——食人的贞节架下。

丹东知道父亲会喜欢饭馆、决斗和小曲中吟唱的故事,这些小曲在郊区居民中反复赞颂着恰罗·康多尔的壮举。他在预科中因逃学而受到惩罚。然而胡安·弗朗西斯科却为他举杯庆祝,儿子画着十字想像着父亲是否怀念起年轻时的冒险经历,或者多亏了他的儿子,他才第一次拥有了从未有过的青春。关于他更隐秘的过去,胡安·弗朗西斯科从未说起过。如果劳拉猜测她的丈夫对小儿子从头到尾袒露了某个秘密,那么决不是这方面的秘密。洛佩斯·格林的生命历程中有一块保留地,也正是这里唤醒了他的人格:他永远是劳拉十七岁时在哈拉帕的俱乐部里认识的那个魅力无穷、能言善辩、英勇无畏的工人领袖吗?或者在荣誉前后还有些什么或者某种禁忌可以解释现在和她一起生活的这个沉默寡言、冷漠无情、胆小怕事的男人?

胡安·弗朗西斯科用反抗波菲里奥·迪亚斯独裁统治的工人运动的光荣历史来教育被宠坏的儿子。从 1876 年以来,当马克西米利安的帝国崩溃——你看,都快过去半个世纪了——,胡亚雷斯带领着由秘密进入首都的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队伍,与支持哈布斯堡大公的匈牙利人、奥地利

人、捷克人和法国人的军队相遇。法国人走了,他们留了下来,胡亚雷斯下令枪毙了马克西米利安。他们统一了由手工艺者组成的"抵抗组织"。从1870年起,成立了墨西哥劳工大联盟,接着巴枯宁分子的秘密组织"社会党"在1876年召开了墨西哥共和国第一届工人大会。

"你瞧,孩子,墨西哥的工人运动不是昨天才诞生的,尽管它还要与殖民地长期的偏见作斗争。有一位无政府主义者的女代表,索莱达·索莉娅。他们想把她否决,借口说妇女的出现有辱先人。最后大会代表人数达到八万,你想想看,他们凭什么骄傲。迪亚斯有理由开始镇压,他最大的暴行就是对卡那内阿成员的镇压。堂波菲里奥从那儿开始镇压是因为控制黄铜生产的美国公司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派来了一百来名全副武装的骑警来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美国佬经常这么干。他们侵略某个国家就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矿工们也要求一直要求的东西:八小时工作日,工资,房子,学校。他们也想拥有生命和财产。但他们被屠杀了。而那儿的独裁统治也永远结束了。他们没有想到一条裂缝可能会让整幢楼房倒塌。"

胡安·弗朗西斯科喜欢他的儿子认真地听他讲述,追溯墨西哥工人运动中的这些英勇事迹,其中以1907年布兰科河的纺织工人大罢工为最。在那里,迪亚斯的财政部长伊夫·利曼托尔[①]借助法国老板来禁销未受审批的书籍,要求工人进出工厂时出示通行证,仿佛那是另一个国家似的,并且将每个工人的反抗行为都记录在案。

"这次,是一个名叫玛格利塔·罗梅罗的女子,她带头来

① 伊夫·利曼托尔(1853—1935),墨西哥财政专家。1893年起任迪亚斯政府的财政部长。

到了轮辐店,放火烧了店。军队冲了进来,杀害了二百多名工人。军队结集到维拉克鲁斯,我就在那时去那里组织反抗。”

“在那之前呢,爸爸?”

“我认为我的历史是和革命一起开始的。在这之前,我没有个人简历,儿子。”

他把丹东带到了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办公室。那是胡安·弗朗西斯科接听电话的小屋,他总是用“是的,先生”、“照您说的办”、“先生,请吩咐”来结束通话。接着胡安·弗朗西斯科就去国会,将总统和国务院的命令传达给工人议员们。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然而从工人中心的办公室到国会,再从国会回到办公室的过程中,丹东看到了一个他不喜欢的世界。一切都像一场巨大的密谋交易,上面真正的掌权者发号施令,下面到国会和工会里机械地重复着,没有讨论和质疑,只有无穷无尽的拥抱,拍肩膀,耳边的秘密,封了口的信封,不时的大笑,明显为了恢复领袖和议员们被摧毁的大男子气概的粗俗言行,没完没了的盛宴约定,这种宴会可能会一直在拉班迪达家举行到半夜,关于性和钱,“你明白我的意思”的挤眼暗示,而胡安·弗朗西斯科周旋于众人之间。

“这是指示……”

“这是最合适的……”

“当然是集体的土地,但是海滩上的旅馆会给整个公社带来好运……”

“医院,学校,公路,这些都会让您的地区更好地实现一体化,议员先生,特别是要从您家边上通过的公路……”

“好吧。我知道这是女人的任性。我们会让她如愿的。

我们又会失去什么呢？书记先生会因为生活而感谢我们的……”

“不，还有比阻止罢工更高的利益。这结束了。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一切都可以通过法律和协调来解决，不会有争议的。议员先生，请注意，作为政府成员应该维持墨西哥社会的安定和平。这是现在的革命。”

“同志们，我知道卡德纳斯总统同意让你们建立合作社。我们会有合作社的，只是生产条件要求更强有力的管理，要求与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和墨西哥革命党的全国性联合。否则，同志们，神父和大庄园主们会像以往一样把你们吞了的。”

“要有信心！”

怎么不要求一间更小一些的办公室呢？

不，胡安·弗朗西斯科对丹东说，有这样一块地方就够了，就像这样简简单单的，办事效率会更高；而且，我不会得罪任何人。

但我觉得皮毛就是要人看的。

那么你去当承包商或企业家吧。他们干什么都会得到人们的原谅。

为什么？

他们创造了工作机会。这就是规则。

那你呢？

我们大家都得扮演一种角色。这是全世界的规则。儿子，你喜欢哪一种？政治家，企业家，记者，军人……

哪种也不喜欢，爸爸。

那你要干什么？

做最适合我做的事情。

第十六章　查布尔特佩克-波朗科区：1947年

1946年12月米盖尔·阿雷曼[①]总统举行了就职典礼，与此同时在索诺拉大街的家里也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玛丽亚·德·拉奥姨妈又开了腔。“是个维拉克鲁斯农民。”她在说那个新当选，年轻又衣着入时的总统，接替军人执政后的第一位平民总统。

所有人——劳拉·迪亚斯和胡安·弗朗西斯科，圣地亚哥和丹东——都吃了一惊。但姨妈带来的惊异还不止于此，她莫名其妙地跳起了班巴舞，没日没夜，乐此不疲，脚脖子跳肿了都不在乎。

“真是越老越风流啊。”丹东嘲笑着说。

终于在新年年初的时候，玛丽亚·德·拉奥作出了令人轰动的宣告。

“伤心事儿都结束了。我要搬到维拉克鲁斯去住。在那边的一个我以前的男朋友向我求婚。他跟我差不多大，不过我也不知道我多大因为我妈妈没给我登记。她想让我快点长大好接她的班当妓女。老傻瓜，让她在地狱里烤着吧。我就知道马提亚·马塔达马斯——我情郎的名字——跳起丹松舞来像个天使，他还答应每周两次带我到‘武器广

---

① 阿雷曼(1902—1983)，墨西哥总统(1946—1952)。

场’在观众中间跳舞。”

“没有人叫‘马提亚·马塔达马斯’这个名字的。”丹东故意泼冷水。

“胡说。”姨妈反驳道，“圣马提亚是最后一位使徒，在耶稣受难以后补了叛徒犹大的缺，又凑齐了一打十二个。学着点儿吧。”

“使徒和最后时刻的男友，”丹东笑了起来，“好像耶稣基督是个登门推销员，把使徒论打便宜卖。”

“你就等着瞧吧，不信的家伙，有时候最后的时刻就是最先。”玛丽亚·德·拉奥斥责道，实际上与其说她是在斥责倒不如说是在跳布莱里亚舞，“我已经离不开他了。”她继续沉浸在美好的憧憬中，“脸贴着脸，在一块砖上跳，丹松舞就这么跳，身体几乎不动，只动脚，在缓慢、甜美、兴奋的节奏里移动步子。嗨，我的家人们，我要开始生活！”

没人能解释发生在玛丽亚·德·拉奥姨妈身上的奇迹，没人能左右她的意愿，甚至不能陪她上火车，更不用说到维拉克鲁斯了。

“我的男友，我的生活，我的时刻。我已经厌倦了被人遗忘。从现在到坟墓，将只有加勒比的快乐和欢笑的夜晚。老太太洗牌，一命呜呼！见鬼去吧！我才不呢！”

这些话顺理成章地表现出老人们在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时候是如何地释放自己的语言。玛丽亚·德·拉奥登上洋际列车，如释重负，像是换了个人似的，一个奇迹。

尽管小姨的椅子空了，劳拉·迪亚斯仍坚持继续黄昏时分在阳台围坐的仪式，观看城市的脚步，外观上这城市改变甚微，从阿维拉·卡马乔将军到阿雷曼学士占领时期一直如此，尽管在战争中墨西哥已经变成了拉丁美洲的里斯本（盛产仙人掌的卡萨布兰卡，肆无忌惮的奥兰多也许会如此

说),成为众多男人女人逃离欧洲危机的避风港。西班牙共和党人达到了二十万。劳拉对自己说豪尔赫·莫拉的努力没有白费。这是西班牙知识界最好的出路,对耻辱的佛朗哥独裁而言是一次可怕的抽血,但对墨西哥的高校、文学、艺术、科学生活而言却是一次极好的输血。作为对友善的栖身所的回报,西班牙共和党人给墨西哥带来了一场文化革新,带来了把我们从文化上的民族主义病毒中拯救出来的普世主义。

著名诗人埃米里奥·普拉多斯①戴着盲人眼镜,头发花白散乱,在雷尔马大街的一间小公寓里过着简朴的生活。普拉多斯在他"被追逐的身体"那美丽的诗行里已经预言了"逃离"与"到来",这些劳拉都已熟记在心并向圣地亚哥高声朗读。诗人想要逃离,他说,"我已厌倦于在枝叶间躲藏……厌倦于这伤口。忍无可忍。"劳拉高声朗读,倾听着豪尔赫·莫拉的声音自远方而来,仿佛诗歌是可怜的难免一死的造物被永恒之神所允许的真实现时中惟一的方式。埃米里奥·普拉多斯、豪尔赫·莫拉、劳拉·迪亚斯,也许还有听她朗读的圣地亚哥·洛佩斯-迪亚斯,所有人都想"以我僵硬的躯体……如同一条无水的河流,徒步在一场梦中行进,五道锋利的火焰烙在胸前"。

路易斯·塞尔努达在此流连,他打扮得像个英国的游荡者,穿着"犬牙"牌男上衣,戴着"温莎公爵"牌领带,头发顺贴,留着法国电影中男主角式的小胡子,在墨西哥的街道上留下了西班牙语中最美的情欲诗篇。现在是圣地亚哥念给他妈妈听,狂热地一首接着一首,毫不停顿,寻找着那完美的线条、难忘的词句:

① 埃米里奥·普拉多斯(1899—1962),西班牙诗人。

当两个身体相爱会发出何等悲伤的声响。
我祈望毁去她的身体，只留下她爱情的真实……
我不知道自由。除了被某个人俘虏的自由……
我曾吻过她的足迹……

路易斯·布努埃尔被萨尔瓦多·达利——这位旧日的同伴已经沦为拜金狂——的流言与中伤赶出纽约，兜里只揣着四十美元来到这里。劳拉是从豪尔赫·莫拉那里知道布努埃尔的，他给她看了一部充满着难以忍受的痛苦与抛弃的电影，关于西班牙的拉斯乌尔德斯地区，在西班牙被共和国禁演。在这里的亚马逊大街住着塞维利亚大学的前校长堂曼努埃尔·佩德罗索，整日被霍布斯、马基雅维利、卢梭的经典著作及身边的学生所环绕，丹东有一次被法律系的同学带到茶话会上，聚会之后，路经改革大道前往伦敦大街的贝林格豪森吃晚饭的时候，他对他的同学说：

“这老头很吸引人。不过他的观点是乌托邦式的。我不能苟同。”

在贝林格豪森靠边的餐桌上，马克斯·奥布和其他流亡的作家一起吃饭。他是个外表结实的男人，个子不高，头发拳曲，前额开阔，双眼消失在一泓玻璃水池的深处，如同一枚硬币不可分隔的两面，一面是鹰，一面是太阳一样，他的表情一面是恼怒一面是微笑。奥布在战争中曾经是安德烈·马尔罗的冒险伙伴，他曾预言佛朗哥一次“真正的死亡”，与日历上的任何一个日子都毫不相干，因为那将是一个惊喜，更是一种独裁者对独裁者自身灭亡的浑然不觉。

“我妈妈认识他。”丹东对他的同伴说道，“她和这些知

识分子走得很近,因为她和迭戈·里维拉、弗里达·卡罗一起工作。”

“因为她曾是一个西班牙共产党间谍的情人。”丹东的同学说。他是最后一个这么说的人,因为劳拉·迪亚斯的儿子一拳打在他鼻子上,打翻了椅子,弄脏了桌布,丹东忿忿地摆脱了侍者们,离开了餐厅。

“马诺雷特”也使墨西哥的各个广场充斥着人群,他是个佛朗哥分子,但实际上更像埃尔格列柯笔下人物的仿制品,瘦削,悲伤,容貌端正,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绰号“马诺雷特”,一位仿古主义的斗牛士。他斗牛时显得从容不迫,直截了当,身形像蜡烛一样笔直。他和佩佩·路易斯·巴斯克斯争夺胜利,胡安·弗朗西斯科对丹东讲述着,当时父子二人正好来到新墨西哥纪念碑广场,挤在六万名斗牛爱好者中间,单单是为了看看马诺雷特,然而佩佩·路易斯是信奉正教的塞维利亚人,而马诺雷特却是来自科尔多瓦的异教徒,他无视古典规则,从不伸出系有红布的木棒来逗引指挥,他不用这种方法来使公牛进入战场,他站在那里,逗引指挥时寸步不移,引公牛来斗他。当公牛攻击一动不动的斗牛士的时候,全场观众痛苦地喊叫,屏住呼吸,直到天才的马诺雷特用一记缓慢的奔刺消解了紧张,将斗牛剑深深地插入公牛的身体,才爆发出一阵胜利的欢呼。“你注意到了吗?”胡安·弗朗西斯科散场时对儿子说,他们走在蜂房一般围绕广场的长廊里拥挤的人流中,“你注意到了吗?他自始至终用面孔斗牛,毫不躲闪,自下而上把牛控制住,也揪住了我们所有观众的心!”然而丹东只记住了一件事:公牛与斗牛士面面相对。那是死亡的两张面孔。只是在表面上公牛死去,斗牛士活了下来。而事实上,斗牛士难逃一死,公牛却是不死的,不断延续,不断出场,一次又一次,被

阳光晃了眼，冲向血染的黄沙，那惟一的不朽的公牛的血，它见过一代又一代终有一死的斗牛士来了又去，“马诺雷特”何时死去？他将在哪个广场邂逅死亡，仅仅在表面上他为每头公牛带去这样的命运，将为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马诺雷特带来死亡的公牛叫什么名字，在哪里等待着他？

“马诺雷特给牛施了魔法。”胡安·弗朗西斯科忧伤地对儿子丹东说道，看完斗牛以后他们在“客栈”共进晚餐。

儿子想把这天下午观看马诺雷特斗牛所学到的东西藏在心里：凯旋，荣誉，不过是过眼云烟，必须杀死一头又一头的公牛来拖延我们最终的失败，直到我们的公牛把我们杀死的那一天，必须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日复一日地割下牛耳牛尾凯旋而归……

“据说人们为了搞到看马诺雷特斗牛的票，甚至不惜卖掉他们的汽车和床垫，这是真的吗？”丹东问道。

“这是第一次，广场上一周内有三场斗牛，”胡安·弗朗西斯科判断着，“应该是为了点什么吧。”

这位帅气的斗牛士流连于这座新兴的国际大都市的各个新建的夜间活动场所——卡萨诺瓦，子夜，无忧——陪伴在他身旁的是费尔南达·蒙太尔，一个瓦尔齐利亚模样的女人，以开得很低的领口来弥补那如尖塔高耸，染成蓝、绿、玫瑰色的发髻。被废黜的罗马尼亚国王卡洛尔在考约坎遛着他的那群卷毛狗，他长着暴雨胡，牡蛎眼，下巴凹陷。他的情人玛各达·卢贝斯库对她的银狐比对她流放中的国王更有兴趣；改革饭店的餐桌上卡门·科尔蒂娜和她的老盟友们，女演员安德莱阿·内格瑞特，英国女画家菲利茜蒂·史密斯讨论作战计划，想要将伴随着战争的大潮来到墨西哥的各国人士全都网罗旗下，“阿道夫·希特勒，愿上帝祝福你！”女主人向她的小团体发出感叹，而不远处便坐着西罗斯的

东家:一个叫 A. C. 布鲁门达尔的戴领带夹的侏儒,外号取自好莱坞电影里的匪徒"布希"·西格尔,他那不起眼的情人维尔吉尼亚·希尔,颤抖的下巴和褪色的头发流露出那种骤然的悲哀,在洛杉矶一些女人被这悲哀所袭击,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马蒂尼,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杜松子酒颜色的双眼里写满了失败的战役,他来到墨西哥是为了将他的小说《珍珠》搬上银屏,给他那驯服的鳄鱼当奶瓶,忍耐着导演的大言欺人和傲慢无礼,"印地安人"埃米利奥·费尔南德斯,喜欢用武器对待意见分歧者,他爱上了女演员奥利维亚·德哈维兰,将那条街命名为"甜蜜的奥利维亚",街上矗立着"印地安人"用薪水建造的城堡,都来源于他的众多成功之作:《野花》,《圣烛节玛丽亚》,《恋爱中的女人》……

劳拉·迪亚斯要到西罗斯去,因为迭戈·里维拉在那里画一组裸体女像作为装饰,创作的灵感来源于他与女演员波莱特·高达的"追星恋",那是个聪明而野心勃勃的女人,她只和劳拉说话,为的是用不理睬迭戈来挑逗他。而劳拉则以一种与"印地安人"所住的街道一样甜蜜的嘲讽看着她十五年来没有见过的人群,卡门·科尔蒂娜的小团体,在她桌前来往的宾客,瓜达拉哈拉画家迪索克·安布里斯尽管年已半百仍执意要穿得金光闪闪,在每一张奢望不朽的脸庞上留下时光无法抹去的印痕,仿佛一座蜡像的众神殿,身材臃肿的"墨西哥羚羊"安德莱阿,昔日肥胖而笨拙的西班牙移民奥诺马斯蒂科·加兰像一只撒了气的皮球,满脸皱纹,如同一条用旧的绳索,英国画家詹姆斯·萨克松越来越像温莎家族的缩影,而劳拉在哈拉帕的老友、加拉萨的前妻伊利莎白·杜邦瘦得像木乃伊,一只手拿着扇子,另一只手挽着一个年轻男子,肤色黝黑,留着小胡子,一位沉着的溺爱孩子的父亲。

一只手碰了碰劳拉·迪亚斯的肩膀。那是劳拉·里维埃,阿尔特米奥·克鲁斯的情人,凭借一种珍珠般的优雅胜过了已逝的十五年岁月,她的美丽都集中在饱含哀婉柔情而不曾衰老的眼神里。

"愿意的时候来找我。你为什么没找过我?"

奥兰多走了进来,手里拿着洪堡毡帽,奥兰多·希门内斯,劳拉无法做到随机应变,只有以当年在圣卡耶塔诺庄园舞会时的年轻面容与他相对,那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在弥漫着橘树香气的阳台,在沉睡的咖啡园爱上她的那个青年的形象使她感到眩晕,于是她起身告辞。

"受吸引并不等于下坠,"劳拉对她的儿子丹东说道,"那是接近,相互接近。"后者自从和父亲去过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和众议院之后,便想这并不适合我,可爸爸说得对,什么适合我呢?他也从阳台向查布尔特佩克森林望去,知道在这公园后面便是查布尔特佩克的洛马区,那里住的都是富人,新近发迹的或是立业已久的,这不重要,但那里正在建造崭新的带游泳池的豪宅来举行花园舞会和"著名的婚礼",能装下三辆车的车库,从"拉格兰哈"的"巴尼巴科"订购的装饰品,"瓦尔德斯·佩萨"的时装和"亨利·德夏蒂龙"的帽子,从"玛苏摩多"预订的鲜花和从"玛伊达"预订的宴席。

像他这样的一个穷人,既非新近发迹也非立业已久,怎样才能进到那些地方去呢?因为那是丹东·洛佩斯·迪亚斯的打算,父亲要他在这些低调的建议中作出选择:从政,经商,当记者,还是从军?丹东决意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也就是说,要拥有自己的财富,因为在墨西哥没有财富很难获得地位,年轻的法律系大学生想到,他获得财富的惟一方式是获得某种地位。只要翻看众多的各阶层的杂志就足以使

他意识到其中的差异。存在着一个新的革命性的阶层，一个住在洛马区的富裕阶层，根基不稳却又肆无忌惮，肤色黝黑却又厚施脂粉，不合宜地炫耀着他们或正当或不正当地获得的，但都是刚刚到手的财富：肤色黝黑的男人们——军人，政客，商人——与肤色雪白的女人们——土生白人，贫困的，能忍耐的——结合；那些革命者从北方持械而来，挑去了埃尔莫西奥和库利阿坎的，托雷翁和圣路易斯的，萨卡特卡斯和埃尔巴西奥的最美丽的花朵。儿女们的母亲。家园里的女灶神。权贵苏丹们的风流韵事中的屈从者。

古老的贵族阶层依然存在，一个寒酸的阶层，生活在起义者大道和改革大道之间以欧洲城市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中。他们住在建于1918或1920年间小巧而优雅的寓所中，通常都是两层的小楼，石砌的门面，有阳台和车库，布局高雅，朝向街道，从那里隐约可见往昔遗韵，图画和人像，嵌在天鹅绒上的勋章，带锈的古铜镜，在会客室后面，神秘的梳妆室，在这比利时式的大房子里，昔日主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不解之谜，他们曾被萨帕塔，比利亚，卡德纳斯夺去了财富；他们在哪里沐浴，如何烹饪，又是如何挨过那个世界的灾难……？

他们如何祈祷却是看得见的。每个星期日快一点的时候，上流社会的少男少女们聚集起来前往热那亚大街和改革大街街角的拉沃提瓦教堂作弥撒。仪式过后，一群年轻人在林阴道间逗留，聊天，调情，计划着去哪里吃饭，上哪儿？去"尼萨"转一圈再去何塞·路易斯的"客栈"如何？去利物浦大街小路易斯·穆尼奥斯的"1-2-3"怎么样？还是去美洲跑马场的"乔奇俱乐部"？或是去其中某个人的家里，——他们都有着五光十色的昵称，"小礼物"，"贝贝莎"，"球儿"，"内娜"，"青蛙"，"小棒儿"，"夏贝特斯"，"潜水员"，

“猫儿”。在墨西哥,只有贵族和歹徒才以绰号著称,那个一刀切掉丹东的曾祖母几根手指的强盗叫什么来着?什么地方的“美男子”?

丹东经过考察和筹算,决定从那里开始:拉沃提瓦教堂一点钟的弥撒,那蓝白相间的教堂好像一座改教的清真寺。

第一次,没有人注意到他。第二次,人们用奇怪的眼光看着他。第三次,一个高个子、黄头发的年轻人走过来问他是谁。

“我叫洛佩斯。”

“洛佩斯?”

“对,洛佩斯,电话簿上最常见的姓氏。”

这话把高个子逗乐了,他烫了发的脑袋和长脖子直往后仰,喉结激动地舞蹈。

“洛佩斯!洛佩斯!洛佩斯什么?”

“迪亚斯。”

“还有呢,还有?”

“然后是格林。然后是克尔森。”

“嘿,伙计们,这个家伙的名字比我们所有人的名字加起来还长。来‘乔奇’吃饭吧。我觉得你挺神的。”

“不,谢了。我已经有约会了。也许下星期日吧。”

“也许,也许,也许?你说话像个骗子。哈哈。我可不想说你是擦皮鞋的,你是奥古斯丁·拉腊,哈哈。谁知道呢,你这个家伙,来自骗子的国度!”

“你呢?你叫什么,黄毛?”

“黄毛!他叫我黄毛!不对,伙计,大家都叫我神父。”

“为什么?”

“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我老爸是个医生吧。我的第

二个姓是兰达;我是帝国时代这个城市最后一位统治者的后代。这个名字是从我阿妈那儿继承的。”

“那你阿爸的名字是?”

“哈哈,你别笑。”

“不对,是你在笑,笨牛。”

“笨牛!他叫我笨牛!哈哈,不对,大家叫我神父,我老爸也叫洛佩斯,跟你一样。真有意思,太有意思了!我们还是同名哪!哈哈,你的运气可不大好啊!我是阿纳斯达西奥·洛佩斯·兰达。星期天别不来。我觉得你这人不错。买一条有品味的领带。你戴的这条像一面旗子。”

什么样的领带算是有品味?该去问谁呢?下个星期天他穿了一身骑装到了教堂,马裤马靴,咖啡色上衣,敞着衬衫。手里还拿着条鞭子。

“这是上哪儿骑马去啊,……你叫什么来着?”

“洛佩斯,跟你一样。丹东。”

“上断头台的那个,哈哈哈!你爸妈真有创意!”

“没错,只是个人的幽默罢了。阿塔依德马戏团生意不好的时候就来雇他们给出主意。”

“哈哈哈哈,丹东!你真是个活宝。”

“对,我是猫的睡衣裤。”丹东用一部美国喜剧片里的台词答道。

“嘿,伙计们,这家伙什么都懂。是个了不起的家伙,是人猿泰山他妈!”

“没错,我是哥伦布。”

“那我的儿子们就是小克里斯托瓦尔了,哈哈哈。我就住这儿,转过安贝雷就是。过来,我借你一条领带,老运动员。”

拉沃提瓦教堂和“乔奇俱乐部”成了他每星期天必不可

少的日程，和他新结识的朋友们好好相处比起领受毫无忏悔可言的圣餐更加重要。

开始的时候他引起了人们的惊异。他努力地学习那些年轻人的着装方式。对于姑娘们截然不同的方式，他不让自己显得少见多怪，尽管见惯了一成不变的黑色和外省带花的丝绸服装的他从未见过穿裙套装的女孩，或者苏格兰裙子配运动衫，运动衫外面罩毛线衣，珍珠项链戴在最外面。一个西班牙姑娘，玛丽亚·路易莎·埃利奥。她的美丽高雅引人注目；淡金色头发，细高条儿像个小斗牛士。戴黑色贝雷帽，和米歇尔·摩根在法国电影里一样，这些电影所有人都到"特兰·吕可斯·普拉多"看过，小方格上衣，百褶裙，倚着一把雨伞。

丹东对自己的潜力抱有信心，他的男子气概，他自身的与众不同。他皮肤黝黑，像个吉卜赛人，仍然保留着孩子一样的睫毛，从未像现在这般映衬出一双碧绿的眼睛，橄榄色的脸颊，短小的鼻子，丰满而女性化的嘴唇。他身高一米七出头，有横向发展成方形的趋势，运动员似的体格却有着一双——人们跟他说起过——钢琴家的手，就像在卡特马哥弹奏肖邦的维尔希尼亚姨妈一样。丹东曾经粗鲁地说起，"这些精致的母牛需要的就是有人用铁家伙打她们的屁股。"他跟胡安·弗朗西斯科要钱，他不能每星期天都让别人掏钱，他也得出上一份，我结识了一些新朋友，爸爸，都是有地位的人，你也不愿意看我给你，给咱们家丢脸吧？你也看见了整个星期我都循规蹈矩，八点钟的课从不缺席，参加资格考试，就抽十来根雪茄，我是块学法律的料，我向你保证，爸爸，你借我的钱我会加上利息全部还给你的，我向你保证这一点……我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

赛马场中最好的看台被将军们所占据，他们仍怀念着

自己那些如今已是体弱多病的马队;其次是一些与军人们相比新近兴起的商人,他们不可思议地在总统拉撒路·卡德纳斯激进的改革中致富,蒙这些改革所赐,原本固守一处的短工可以离开庄园来到瓜达拉哈拉、蒙特雷和墨西哥城新建的工厂充当廉价劳力。没那么不可思议的一面在于,这些新的财富是在战争需求、囤积居奇、战略物资出口、食品短缺中聚敛起来的……

在所有的圈子里活跃着一个矮小的意大利人,打扮齐整,带着微笑,布鲁诺·帕亚伊,赛马场经理,他不可抵挡的伎俩能使最老奸巨猾的将军或墨西哥百万富翁粗鄙的狡诈相形见绌。然而无论如何,这里有明显的歧视存在。拉沃提瓦的小圈子,"神父"洛佩斯·兰达和他的朋友们占据了吧台、扶手椅和俱乐部的舞池,把赛马场里有益健康的露天位置留给了那些阔佬。将军和商人们的子女也待在边缘地带,他们长得不算好看,——按查第斯·拉腊萨瓦勒的话说,——是些"毛团"。然而,就在"毛团"中间,一天丹东发现了他一生中从未见过的美女,一个梦。

"梦"来自别处,地中海东部或是东方,就是马莱和伊萨克写的世界历史小册子上称为"前亚"的地方。"前亚"造成了马格达莱娜·阿尤布·龙戈利亚外表上的缺陷——没有停顿的眉毛,隆起的鼻子,正方的颌骨,——更衬托出那双阿拉伯公主的眼睛,或为之提供了框架,梦幻般的天鹅绒的眼睛,会说话的眼睛,在涂油的挑逗的眼皮下仿佛一种隐秘的性别。她的微笑如此热烈、甜蜜、无邪,就像闺房中的一袭幔纱,向整个世界遮蔽起自己,只向她的主人开放。她身材高挑苗条,然而也处处展示出几乎可以想像的丰腴线条:丹东便是这般向自己描述她的。

他的想像是对的。

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他咽下一个词:"谢莉·邓波尔",从此以后他就一直这样叫她,"我的梦":这个"梦"是有名字的,她叫马格达莱娜·阿尤布,一位叙利亚黎巴嫩商人的女儿,——在墨西哥,人们把他们称为"土耳其人"——,西蒙·阿尤布,将近二十年前来到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是一笔巨大资产和波朗科区最俗气的新巴罗克式宅第的主人。那么他是怎样发家的?自奥夫雷贡和卡列斯时代起囤积物资,战争期间哄抬物价,为同盟国的事业出口龙舌兰香精,从尤卡坦村社低价买进,向美国公司高价卖出;冬季向美国军队出售蔬菜,当所有的美国药品停止在墨西哥销售时建立制药厂,在本地生产更便宜的药品,还引进了磺胺和青霉素。他总是发明别人早就发明了的东西,也许甚至连阿司匹林也要算是他的发明!因此人们称他为阿司匹林·阿尤布,也许是想起了那位用子弹穿过太阳穴来治疗士兵头疼的革命将领。可能是他太不适合独身来皈依上帝了吧,他娶了一个家住边境村庄的美貌的北方姑娘为妻,属于那种可以让教皇起凡念,使圣约瑟生二心的美女。堂娜马格达莱娜·龙戈利亚·德·阿尤布。丹东仔细地打量了她一番,因为人家说妻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越来越像岳母,无一例外。大马格达莱娜也一样,不过她通过了测试。丹东对"神父"洛佩斯·兰达评价道,"成绩良好"。她的风采不减当年。

"我说,丹,你瞧瞧看台上那母女俩,告诉我你要奔哪个去。"

"运气好的话,俩都要。"丹东答道,"右手一个'曼哈顿',左手一个'蓓尔美尔'[①]。"

他冲着女儿去了,并且获得了成功。他请她跳舞。他

① 即英国伦敦的蓓尔美尔街(Pall Mall),以俱乐部多著称。

把她带出了初来者的孤立，领她进入资深者的团体。他甚至对自己感到惊讶，丹东·洛佩斯·迪亚斯(后面还有格林·克尔森)，牵着幸运的小公主的手一直把她领到了废墟国王们排他的圈子里。

“这是马格达莱娜·阿尤布。我们就要结婚了。”

十九岁的她惊讶地张大了嘴。小伙子在开玩笑，他们才刚刚认识。

“听着，美人。你想回到包厢跟你爸妈一起看跑母马呢，还是想自己当一回好母马，就像人们跟这些姑娘说的似的？除了我还有谁敢到你的包厢来，跟你的家长打招呼，还请你跳舞？现在该干什么了？我在大庭广众之下介绍了你，我不是公众人物，让你看看你要嫁的是谁，我的梦，我得到了我想要的，知道吗，我没看见你的子宫，——原谅我的表达方式，不过我就是这样，你最好慢慢习惯——好继续孤单无靠地生存在这个没有我的世界上。怎么样？你需要我，对吗，我的心肝儿？

他们去跳舞，跳贴面舞，她默许了他一些“自由”，抚摸她的后背，脖子，修剪干净的胳肢窝，咬她的耳垂，随之而来的是第一个吻，第二个以及成千上万的热吻和请求，我们出去吧，我的梦，不，丹，我有我的原则，在你的双腿之间，我的梦，我用我的手绢，别害怕，好，我亲爱的，啊我的梦，我太喜欢你了，我以前一点也不懂这些事，我从来没遇见过你这样的人，你真强壮，真可靠，真野心勃勃……

“我有一个弱点，马格达莱娜……”

“是什么，我亲爱的？”

“我要不惜代价来让人仰慕。你明白我跟你说的话吗？”

“我会让你感觉到这一点的。我向你发誓。你将一无

所缺。"

"蓝月亮,我看见你独自闪烁。"

马格达莱娜的家人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他也同样向他们回敬,面无表情。

"这个家需要重新装修。"丹东带着轻蔑打量着夸饰炫耀的铅皮屋顶,假祭坛,和波朗科区宅第的铁栅栏说道,"幸好你将和我一起住在一个格调高雅的地方。"

"是吗?"阿尤布怒道,"那么谁来为您的奢侈付账呢,小骑士?"

"您,我慷慨的岳父大人。"

"我女儿不需要慷慨,她需要舒适。"来自北方的母亲带着愚蠢的高傲说道。

"您女儿需要的是一个尊重她,保护她的男人,而且不会使她觉得低人一等和孤单无依,就像你们这些糟糕的父母所做的那样。"丹东重重地砸下这句话便摔门而去,险些震碎了绘有教皇庇护十二世画像的彩色玻璃窗,而正是这位教宗祝福着这城市,这世界,以及阿尤布·龙戈利亚的家。

让他回来。小马格达莱娜待在卧室不肯出来。她什么也不吃。她整天哭,就像那位抹大拉的马利亚①一样。

"我并不乞求施舍,堂西蒙。请你们让我说话,别用这种不耐烦的脸色看着我,因为这让我不耐烦。请控制一下自己。不是您在帮我一个大忙,而恰恰相反,是我在帮您的忙,我这就给您解释为什么,请原谅……我能让您女儿成为她不是却又想成为的人。她已经很富有了,她缺乏的是被接纳。"

"这正是问题所在。你什么也不是,穷鬼。"

---

① Maria Magdalena,圣经人物。

“我们用‘你’相称吗？好的，堂阿司匹林，我是你已经无法成为的人。这就足够了。我是未来。那即将来临的。二十年来你混得不错。不过你也明白，我亲爱的岳父，你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卡鲁索还在‘埃尔特雷奥’唱歌呢。你的时代结束了。战争结束了。现在是另一个世界。现在我们已经不用囤积居奇了。如今在美国一切都有富余。我们已经不是不可或缺的盟友了，我们就要再次沦为无关紧要的乞丐了。我说得对吗，我的阿司匹林先生？”

“说‘您’，丹东先生，说‘您’……拜托。”

“看来我说得还有点道理。现在我们要么靠国内市场生存，要么我们就无法生存。现在我们要在国内创造财富和买我们产品的人。”

“‘我们’。您滥用了复数，丹东。”

“正是我们想要的‘我们’，一点没错，堂西蒙先生。您和我，就算是滥用吧，如果不再是继续囤积龙舌兰香精，剥削贫穷的玛雅人，而是开办餐馆连锁店，经营批发商店，人们的消费品，在一个充满了干渴的热带国家卖廉价汽水，向家庭妇女推销节省劳动的吸尘器，推出防止食物腐坏的电冰箱，来代替笨重又不保温的雪柜，推销收音机让即使是最痛苦的人也能拥有娱乐……我们就要成为一个中产阶级的国家了，您没注意到吗？来吧，头儿，别让我失望。”

“您的口才很好，丹东。请继续。”

“继续讲吗？家具，罐头，便宜又有品位的衣服，代替披风和笨重的凉鞋，体面的饭店，美国风格，香水喷泉什么的一应俱全，不再是中国人开的小旅馆，为所有人准备的便宜汽车，不再是给穷人坐的公共汽车，给富人坐的卡迪拉克。您知道我的曾祖父是德国人么？记住这个名字吧。‘大众汽车’，人民的汽车。让他们回来建立德国工厂，您已经获

得了‘大众汽车’在墨西哥的经营许可，给我一半的股份，您就瞧好了，我的堂阿司匹林先生。不用再头疼了。这点我可以向您发誓！”

所有人都互相认识，他向劳拉、胡安·弗朗西斯科和圣地亚哥解释道。但这是他们所惟一认识的。他们，他们，他们。我向他们展示今日的世界，波菲里奥分子这些干瘪的猴子。要知道，我学会了说话的腔调，穿着打扮的方式，口头禅像“再见”，“耶稣保佑”和“小汽车”。我忍受着小团体就像餐馆里的一块烤肉备受折磨。你们知道吗，我在洛佩斯·兰达那里发现，一个年轻人总在另一个年轻人身上欣赏他所没有的东西。我明白了就向“乔奇”的那帮人表现他们所没有的一面好让他们觉得我有趣。我给马格达莱娜的也一样，我让她成为她所不是又想成为的人，富有但又有吸引力。我让她知道：你不是你想成为的样子，我的梦，但我会让你梦想成真。阿尤布夫妇以为他们帮了我很大的忙，还可以把一切麻烦都放在我身上。说谎。人生里的麻烦应该推到别人身上仿佛那是一件礼物，这正是可笑之处。

“你爸妈不喜欢我，我的梦。”

“我会让他们喜欢你，丹东。”

“我不想给你找这个麻烦。”

“这不是麻烦。这是我给你的礼物，亲爱的，我的丹……”

那是一种残酷的财富，丹东笑着向他的父母和兄弟说。他们经年累月积聚起财富却是为了永远不会来临的一天。他们已经失去了曾经有过的致富的种种理由。我要让他们重新振作。如今这些理由是我的理由了。妈，爸，婚礼就在下个月，差不多在我成为律师的时候。我取得了成就，为什么不向我祝贺？

我的兄弟让我感到茫然，圣地亚哥对劳拉说，使我觉得自己低等、愚蠢，他预先得到了所有的回应，而在我这里一切却都姗姗来迟，时过境迁，我为什么会这样？

她告诉他他们两个截然不同，丹东天生便适合外面的世界，而你却适合里面的世界，圣地亚哥，在那里一切回应不会很快很诱人，因为重要的是提出问题。

"不，有些时候根本就没有回应。"圣地亚哥在床上笑道，"只有问题。你说得对。"

"是的，孩子。不过我相信你。"

他艰难地从床上支起身来，靠近画架；很难判断这颤抖是源于发烧还是源于创作的前兆。他坐在画布前，挥洒着那灼热，那疑惑；劳拉看着他，也能够在自己的肌肤中感受到。这很正常，自从他发现了自己绘画的天赋以来一直如此；每一天都令自己惊奇，感觉自己在变化，在他里面发现另一个自己。

"我也发觉了，胡安·弗朗西斯科，但我没有和他说。你该多接近他一点儿。"

胡安·弗朗西斯科摇了摇头。他不愿承认，圣地亚哥生活在一个他所不理解的世界，他不知道和自己的儿子说些什么，他们两个从未接近过，现在因为他病了才去接近不是骗人吗？

"不仅仅是这样，胡安·弗朗西斯科。圣地亚哥不仅是生病而已。"

胡安·弗朗西斯科不理解这种同义词，当艺术家和生病。这就好比想像一面双面的镜子，每一面都反映出不同的真相，疾病和艺术，两种真相并非必然地相伴而生，但有些时候，确实如此。是哪一样居先呢，哪一样滋养了圣地亚哥那些痛苦的日子呢，艺术还是疾病？

劳拉看着儿子睡觉。她喜欢在圣地亚哥醒来的时候坐在床边。她看见他突然醒来,但却不可能知道那是因为活着迎接黎明的惊喜呢,还是要多画一天画的惊恐。

她感觉自己被排除在这种每日的选择之外，她承认她更愿意成为圣地亚哥每一天选择中的一部分，劳拉，我的母亲，劳拉·迪亚斯是我日子的一部分。她在他身边陪着他，放下一切照顾这个年轻人，但圣地亚哥并未表露对这种陪伴的认同，他只是待在陪伴中，劳拉说，毫无感谢地接受。

“也许没有什么可感谢的,我应该理解这点并且尊重他。”

一天下午他自觉身体良好,便要求妈妈带他到黄昏聚会的阳台。他的体重减轻了不少,以至于劳拉可以背上他,那正是童年时她没能做到的,那时他远离她在哈拉帕上学,与她的母亲和姨妈们住在一起。如今母亲可以补救那时的抛弃,那些虚假的理由,胡安·弗朗西斯科正开始他的政治生涯,没有时间照顾孩子,更糟的是,劳拉要独立生活,儿子们甚至连丈夫都是累赘,她是个外省姑娘,二十二岁便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六岁的男人,是该她自己生活、冒险、学习的时候了,修女格罗丽亚·索里亚诺只是一个离家的借口吗?那是和奥兰多·希门内斯与卡门·科尔蒂娜在一起的时候,在底特律与迭戈和弗里达一起的时候,而不是怀里抱着个孩子,承负着众多诺言的时候,从圣地亚哥这孩子宽阔的前额上可以看出荣誉、创造和美丽。永远不会,她对自己发誓,永远不会再抛下一个孩子,在他身上永远、永远包含着所有的诺言,所有的美丽,所有的温情和世界的创造。

如今那失去的时光随着罪疚的脸庞重现,因此圣地亚哥才面对迟到的母性的关怀而不表示感激吗?作为母亲就

意味着排除了一切感谢和承认。应当无需证据或期望就能够满足,如同那满足的温情的时刻。

劳拉在儿子身旁坐下,面对着都市的景观。此刻的都市仿佛增殖的蘑菇林一般。摩天大厦四处拔地而起,老公车被起初被用户视为不可理解又可疑的出租车所代替,乱糟糟的公共汽车被巨大的巴士所代替,冒着黑烟好像蝙蝠的哈气,而配备上漆木凳的黄色有轨电车,被仿佛史前怪兽般虎视眈眈的无轨电车取代。人们不再是下午两点回家吃饭,五点回去工作;如今实行的是美国新潮"流动时间"。街头演奏手风琴的,经营估衣的,磨剪子磨刀的,都渐渐消失不见。各个街角的杂货店、小铺面都渐渐消亡,彼此竞争的电话公司最终联合,劳拉想起了豪尔赫(她几乎已经不再想他),便从圣地亚哥说的话里走了神,他穿着晨衣,光着脚坐在阳台上,我爱你,城市,我的城市,我爱你因为你敢于在你的躯体上展示你的灵魂,我爱你因为你用皮肤思想,我爱你因为如果以前我没有像征服者们一样梦到过你,你就不让我看见你,因为尽管你这湖之城已经干涸,但当我需要忍受哀哭的时候你同情我,为我的双手充满水分,因为你允许我仅仅用目光为你命名又仅仅以命名将你看见,谢谢你凭着创造我自己来使我能够将你重新创造,墨西哥城,谢谢你让我和你说话,不用吉他,不用颜色,不用子弹,单单向你歌唱,以尘土的许诺,风的许诺,许诺不将你遗忘,许诺使你复活即使我自己消失,许诺为你命名,许诺在黑暗中看见你,墨西哥城,而我只要你的一样礼物作为交换:继续看着我当我已经不在这里,坐在阳台上,在我的母亲身边……

"你在和谁说话,儿子?"

"和你如此美丽的双手,妈妈……"

……和就像我第二个母亲的童年,和只有一次的青春,

和我已经看不见的夜晚，和我留下让城市替我照管的那些梦，和仍在一直等着我的墨西哥城……

“我爱你，城市，我爱你。”

劳拉把他送回床上，明白了他对世界所说的一切也是对她所说的。无须多加解释；语言会使自己背叛自己。那无言地生存于每日的陪伴这深邃潮湿的土地上的爱，放到露天里可以将它晾干。两人之间的沉默可以述说很多很多。

“我不想争辩，我不想添麻烦。”

沉默。寂静。孤独。就是这些将我们联合，劳拉握着圣地亚哥火热的手想道。没有比沉默地相伴更大的尊重和温情，共同生活却又彼此依赖，从不说穿。没有必要。解释会成为对如此深邃的温情的背叛，只能借助一种沉默来显明，好像一个由同谋、猜测、感恩彼此纠缠的线团。

劳拉与圣地亚哥这样生活着，与此同时儿子正在走向死亡，两人都知道这一点，但却心照不宣，互相猜测又彼此心怀感激，因为他们无言中惟一决意要禁止的便是同情。小伙子闪亮的眼神在日益深陷的眼眶中向世界和母亲——在儿子的心灵中，这二者永远是一致的——说道谁有权同情我？不要用怜悯来背叛我……我会做一个男人直到最后。

不为自己的儿子伤心对她而言十分艰难，不仅仅是不表现出伤心，而且要将之从她的情绪和眼神中摒弃。不仅是掩饰，而是消除，因为掩饰会被圣地亚哥清醒、敏锐的感受力立刻察觉。同情会背叛自己；这是劳拉入睡时不断重复的话，如今她每夜都睡在一张行军床上，在她高烧而憔悴的儿子的病榻旁，承诺之子，最终的爱子。

“儿子，你需要什么，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不,妈妈,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你知道吗,我真想抢来这世上的一切荣誉和美德送给你。”

“谢谢。你已经做到了,你不知道吗?”

“还有什么。再要些。”

还有什么?再要些?坐在圣地亚哥的病榻旁,劳拉·迪亚斯忽然想起了一天晚上她无意中听到的兄弟间的一次谈话,因为圣地亚哥总是敞着卧室的门,这一次却不同寻常地接待了丹东。

爸妈不明白咱们,丹东断言,他们为每个人设想了太多的路……咱们的目标互不干扰,这多好啊,圣地亚哥回答,我们不会彼此冲突……可你认为你的目标好而我的目标差,对不对?丹东坚持道……不,圣地亚哥更正道,不是说你的目标差我的目标好或者相反;我们是命中注定要完成它,或者至少试着去完成……命中注定?丹东笑了,命中注定?

如今,丹东已经和马格达莱娜·阿尤布·龙戈利亚结了婚,像他一直期望的那样,住在查布尔特佩克洛马区总督大街,从波朗科区新巴罗克的恐怖中脱身,但不是因为他政治家庭的趣味,尽管他确实梦想能住进一所线条笔直精确,毫不散乱的寓所。劳拉见到小儿子的时候越来越少。她托词说他也不来找自己,然而她承认,她更渴望去找圣地亚哥。不仅仅是去找他,是拥有他,他因不断复发的病症在熟悉的家中日渐虚弱。他不是她的囚犯。圣地亚哥是一位年轻的艺术家,正开始走向他的目标,没有人能够破坏,因为那是艺术的目标,是那些比艺术家自己存在得更久的作品。

摸了摸圣地亚哥发烧的前额,劳拉问自己,但是,这个年轻的艺术家,她的儿子,会不会把启始与目的混为一谈了

呢。他画中那些饱受折磨,充满情欲的形象不是一种承诺,而是一个结论。那不是一个开始,而是,不可宽恕地,一个结束。一切都已完成。发现这一点使她烦恼,因为劳拉·迪亚斯想在她儿子身上看到一种人格的完满实现,在这种人格中他的欢乐取决于他的创造力。身体的背叛是不公平的,而不幸的是,这身体并不取决于意志——圣地亚哥的意志,他母亲的意志。

她并不就此准备屈服。她看着儿子作画,专注而投入,独自作画并且只为自己而画,也是理当如此,不论画作的结果如何,我的儿子将要展示出他的才华,但却没有时间来享受他的成绩,他要工作,他要想像,但却不会有时间来生产:他的画是无可避免的,那就是奖赏,在只有他能做的事上我的儿子不能替代或被替代,无论多长时间,在他的作品中没有失败,即使他的生命还不完全,他的进展令人惊讶,献身艺术是一个又一个的启示,由惊奇走向惊奇。

"惟一好的东西是工作。"年轻的圣地亚哥画画的时候常这样说,"不存在艺术家。"

"你是一个艺术家,"劳拉鼓起勇气对他说,"你弟弟是个商人。这就是区别所在。"

圣地亚哥笑了,几乎是在责怪她粗俗的直白。

"不,妈妈,这多好,我们彼此不同,却不是从里面相分离。"

劳拉后悔自己的轻率。她并不想进行可恨的或贬低的比较。她想告诉他,看着你成长、变化、创造新的生活,这真是美妙,我不想再问自己,我的儿子能成为伟大的人吗?因为你已经是了,我看着你画画,我看着你仿佛你将活上一百年,我心爱的孩子,我从最初的时刻就倾听着你,从你无声地请求,母亲,父亲,我的弟弟,请帮我取出我从里面带来的

东西，允许我介绍自己……

她无法理解这请求，特别是当她想起另一次无意中听到的兄弟间的谈话，当丹东向圣地亚哥说道身体的好处在于能在任何时候使我们满足，圣地亚哥对他说它也能在任何时候将我们背叛，丹东答道所以应该及时行乐，于是圣地亚哥说：

“还有其他的满足，应该为它们而工作，”然后两人齐声说道：“它们从我们这里逃掉了……”接下来是一阵手足间分享的笑声……

丹东无所畏惧，除了疾病和死亡。在很多男人那里也是如此。他们能够在战壕中肉搏，却无法承受分娩的痛苦。他寻找并找到了越来越少回到索诺拉大街父母家中的借口。他宁愿打电话问起圣地亚哥，尽管圣地亚哥厌恶电话，那是人类发明的对艺术家最可怕的干扰，童年的时候多么好啊，那时有“爱立信”和“墨西哥”两个系统，联系起来很费劲。

他看了劳拉一眼。

此后种种疾病以一次快过一次的速度接踵而至，医生们无法解释这年轻人的日渐虚弱，他对感染的脆弱的抵抗力，免疫系统令人费解的损耗，以及医生们没有说而只有劳拉所说的，我的儿子一定要完成他的生命，我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我什么也不在乎，疾病，无效的药物，医生的忠告，我要给予我儿子的是他如果活上一百年所应当拥有的，我给我的儿子爱、满足、信心，让他相信在他生命的日子里一无所缺，一无所缺……

她夜间看护着他，入睡的时候她问自己，我能在我的儿子身上救出什么呢，既然作为艺术家的他能比死亡的回声更为持久？随着胸中的一阵惊恐她发现，她不仅仅想让她

的儿子拥有他所应得的一切，也想让自己，劳拉·迪亚斯，拥有儿子可以给予她的一切。他需要接受。她也是。她想要给予。他也一样吗？

像所有的画家一样，小圣地亚哥当他还能够自由移动的时候喜欢离开他的画作，远远地观看。

“我寻找它们如同寻找情人，但我创造它们如同创造鬼魂。”小伙子试图笑上一笑。

很晚她才在沉默中回答了这些话，那时圣地亚哥已经不能离开床榻，她不得不睡在他身边来安慰他，真正地待在他身边，支持他……“我不想失去你。”

她不想失去自己，她想说，失去自己的那个部分，她的儿子。

“给我讲讲你的计划和你的想法吧。”

“你这么说好像我能活上一百年似的。”

“长命百岁最后功成名就。”劳拉喃喃道，一点儿也不怕落入俗套。

圣地亚哥只笑了笑。“功成名就值得吗？”

“不值得。”她猜到了，“有时候空缺、沉默更好……”

劳拉不会去列出一个单子，列出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二十七岁便面临死亡的年轻人，所不能去做的，不能去认识的，不能去享受的……年轻的艺术家像是一幅缺少图画的画框，她本想用自己的经历与共同的承诺来填补，她本想带着她的儿子去底特律，去看艺术学院里迭戈的壁画，她本想两个人一起去那些传奇中的博物馆，乌菲齐，卢浮宫，莫里斯宫①，普拉多……

① 全称(莫里斯宫)皇家绘画陈列馆，位于荷兰海牙，以所藏15—17世纪佛兰德斯和荷兰绘画闻名。

他会喜欢的…

与你同眠,进入你的床榻,在近处和睡梦中提取形式、幻象、挑战,我接触你的时候想给予你的力量,当我在你耳边喃喃细语,你最后的虚弱对我的威胁更甚于对你自己,我想要证明你的力量,告诉你的力量与我的力量互相依靠,我的温存,圣地亚哥,就是你的温存,你没有的也不会再有的温存,你就这样接受我的接近吧,接受你母亲的身体,你什么也不要做,我的儿子,我生了你,我把你从里面带来,我就是你而你就是我,我所做的你也会做,你的火热就是我的火热,我的身体是你的身体,你什么也不要做,我来为你做,你什么也不要说,我来为你说,忘记这个夜晚吧,我将为你永远记住它……

"儿子,你需要什么,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不,妈妈,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你知道吗,我真想抢来这世上的一切荣誉和美德送给你。"

"谢谢。你已经做到了,你不知道吗?"

他们永远不会说出来。圣地亚哥爱着仿佛梦着。劳拉梦着仿佛爱着。两个躯体回到像当初一般,每个人的种子在对方体内。她在他里面重生。他一个晚上就杀了她。她什么也不愿想。任凭成千上万失落的形象从头脑中经过,如飓风般转瞬即逝,哈拉帕雨的香气,卡特马哥的金龟树,萨波塔尔佩戴着珠宝的女神,在河里清洗染血的双手,沙漠中的绿树,维拉克鲁斯的南美杉,河流在海湾一声嚎叫夺路而出,阳台上面对查布尔特佩克的五把椅子,六套餐具和卷在银环里的餐巾,娃娃李白,圣地亚哥,她的兄弟,死后沉没在海中,外婆科西玛被切断的手指,希尔达姨妈用于弹钢琴的艺术家的手指,诗人姨妈维尔希尼亚染上墨迹的手指,妈

妈雷特西亚飞快地料理家务的手指，在卡特马哥，维拉克鲁斯，哈拉帕的厨房里烹制一道甜食，那位在武器广场跳丹松舞的姨妈肿起的双脚，庄园里奥兰多张开的双臂邀请她跳上一曲华尔兹，豪尔赫的爱，爱，爱……

“谢谢。你不知道吗？”

“还有什么。再要些。”

“不要让笼子敞开着。”

“它们也许会回来。是些很好的恋巢的鸟。”

“但猫可不是这样。”

他紧紧地拥抱她。她在儿子的怀抱中没有闭上眼睛。她向四周望去，空白的画架，已经完成的作品互相倚靠立着，好像一支沉睡中的步兵，一支颜色组成的军队，一场被可能的目光检阅的阅兵式，或者永无可能，赋予画布以瞬间的生命，每张画布都拥有双重的存在，被看或不被看。

“我梦见了博物馆关闭后图画们的遭遇，它们整夜孤单。”

这是小圣地亚哥的题材。裸体的情侣彼此凝望却不触及对方，仿佛他们羞怯地知道自己在被观看。他画中的躯体并不美丽，并不古典，有些憔悴甚至有些恐怖。那是一种诱惑，但并不是肉体结合的诱惑，而是被观看的诱惑，在构成情侣的时刻被突然发现。这是他的美，表现为苍白的灰调子或极其微弱的玫瑰色，在那里肉体突显仿佛上帝的一次突然入侵，仿佛上帝在圣地亚哥的艺术世界里从未孕育出那个闯入者，他的对手，人类……

“你不要以为我不能苟且偷生。我不能屈从的是我已经无法工作。我不知道，一些日子以来，每天早晨已经没有阳光像以前那样落在我头上了。你不拉开窗帘吗，妈妈？”

当她拉开窗帘让阳光进来,劳拉转过身向圣地亚哥的床上望去。她的儿子已经不在那里。飘浮着一阵无声的哀歌。

第十七章　兰萨罗特:1949年

一

你不该来这里。这个岛并不存在。它是非洲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它是远离西班牙的石筏。它是墨西哥忘记爆发的火山。你会相信你眼前的一切,当你离开的时候你会发觉这里空无一物。你将在雾气中靠近一座漆黑的要塞,它从大西洋海面浮出,犹如远离欧罗巴的幽灵。兰萨罗特是那石舟,面对非洲海滩暂且停泊片刻;可那岛上的石头比沙漠的烈日还要灼人。

你所见的一切无非虚妄,是我们每一天的灾难,昨夜发生,尚未载入史册便即消逝,自夜而昼,来去两无常。你向主宰着整个景观的火山群望去,你记起近两个世纪前它们还不存在。岛上最高峻雄壮的山峰刚刚诞生,诞生中伴随着毁灭,低微的葡萄园埋葬在滚烫的岩浆里,百年前第一次喷发方才止息,火山又再次咆哮,一切草木房屋化作劫灰。

你不该来这里。是什么再次把你带到我面前?一切无非虚幻。海面下的火山口如何能够容下一道沙砾的山脉和一个比海与天更蓝的湖泊?我多么渴望与你相约众波之下,那里你和我将如两个海中的幽灵般重逢,而那大洋总要将我们分离。你与我,我们现在就要相聚在这颤抖的岛屿

上,在火焰埋葬于生命之中的这个岛上吗?

看:把一棵树栽下不到一米深,根脉就会燃烧。随便往一个土坑倒下一罐水,立刻就会沸腾。假若我能够隐藏在熔岩的迷宫中,——那是兰萨罗特的地下蜂巢,如果我能做到,你将永远找不到我。为何将我寻找?你如何将我寻到?不该有人知道我在这里。你来了,我不敢看你。这是一个谎言;你来了,我不愿意你看我。我不愿意你将我和你十年前在墨西哥初次遇到的那男人相比较——两次邂逅间已相隔千余年,若是地狱里也有历史,魔鬼也有时间的概念:它也是永恒的一部分。如今不是十年前了,那时候我对你说:"多留一会儿吧。"你现在已不记得我们和巴西略·巴塔萨尔、格雷戈利奥·比达尔的争论,你会大笑,劳拉,我们的理由都成了荒谬,失落,死亡,无可解释的残酷。让我们仔细注视生命,我们还剩下什么呢,劳拉,只有我十年前的眼神么,当我们彼此凝视,我在你眼里,你在我眼中,你问起自己为何我与众不同,我便在无声中答道"因为我眼里只有你"?

眼前你所见到的一切都是真的吗,看见你旧日的情人流亡在非洲海岸对面的小岛上,而你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墨西哥,在你的臂弯里,在一个隐蔽的酒店中,旁边的公园里种着桉树和松树?这男人与那一个是同一个人吗?那个男人在找什么,这一个又在找什么,你知道吗?是一件相同的东西还是截然不同的两样?因为这个男人在寻找着,劳拉,我只敢告诉你,爱过你的这个男人正在寻找着某一样东西。你敢不敢看着我,和我说真话:你看见了什么?

十年的分离,你有权利虚构我们的生活来解释我们的爱情,为那在我们脸庞上发生的一切辩解。我本可以欺骗你就像我这些年来欺骗自己一样。我们分离的那天,我没有及时赶到。我抵达古巴的时候,欧根王子号已经起航踏

上驶向德国的归程。我无可奈何。美国政府拒绝向这些旅客提供庇护,他们都是些逃离德国的犹太人。古巴政府即使不是遵从美国的指示也是照着美国的样子行事。也许犹太人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处境还不足以触动美国公众的良心。最右翼的政客们宣扬着明哲保身之道,与希特勒作对是一种危险的幻象,一个左派的圈套,希特勒已经为德国恢复了秩序与繁荣。希特勒是那背信弃义的英格兰杜撰出来的威胁,企图把美国人拉进又一场可怕的欧洲战争。罗斯福这无耻之徒在寻求国际危机,好再次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物并且再次连任。让欧洲自取灭亡吧。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犹太人不能参加高尔夫俱乐部,不能进入豪华饭店和公共泳池,似乎他们携带着各各他的瘟疫,在这里拯救犹太人不会成为一项受人欢迎的提案。罗斯福是一位实用主义的总统,别指望国会能批准他增加移民数目。他妥协了。操。①

我本可以骗你的。离开你的那个星期我到了古巴,并且获准上了船。我有西班牙的外交护照,船长是个正派人,一位老派海员,被他船上出现的那些盖世太保搞昏了头。那些人一听见西班牙这个词就立刻举手行法西斯礼。他们认为在这场战争中已稳操胜券。我也照样还礼。我才不在乎这些表面仪式。我要救出拉克尔。

警察中的一个极英俊的年轻人吸引了我的注意,一个不到二十五岁的西格弗里德②,金黄头发,神色天真,——在他修饰齐整的下颌与密布金色汗毛的脸颊间没有明显的界限——而他的同伴是个六十岁上下的小个子,如果脱去

---

① 此处原文为英语:Fuck you.

② 德国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人物。

黑色制服、靴子、纳粹袖章，活脱是个银行出纳员，电车司机或是卖罐头的小贩。他的小眼镜片，他稀疏的小胡子像苍蝇的双翅滋生在唇缝两边，那是以色列的神用宝剑一下在新生儿的嘴上切开，好让他们将生前关于性别的强烈记忆遗忘。小个子的双眼在剃过的脑袋上好像两条死鲱鱼失落在平底锅锅底。他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一个警察，一个屠夫。

他们高举手臂向我致敬，小个子高喊佛朗哥万岁。我也照样回敬。

我发现她蹲在船头，在挂着红底黑色卐字符的旗杆旁边。她并没有眺望莫罗的城堡和市区。她回首望着大海，仿佛目光可以回到弗赖堡，回到我们的大学和我们的青春。

我轻轻碰她的肩头，她不必睁眼看我，她紧闭双眼拥抱我的双腿，脸庞贴在我的膝上，发出忏悔的抽泣，近乎一声呼喊，一声不再属于她的呼喊，回荡在哈瓦那的天空中，好像一支合唱曲，并非出自拉克尔的声音，她只是一曲赞歌的接受者，这歌声自欧罗巴远来，为的是栖身在她的声音里，在我赶来拯救的这个女子身上。

“我爱你所付的代价
我们的爱情”

“为什么没有人来帮助我们?”她呜咽着对我说道，“为什么美国人不让我们进去，为什么古巴人不许我们避难，为什么教皇不理他的人民的请求和我的请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为什么抛弃我们，我不是那四亿信徒之一吗，教皇不是可以派遣他们来救我吗，只是救我而已，一个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

我抚摸着她的长发,对她说我就是来救她的。长发在古巴2月清晨寒冷的飓风中散开。我看见拉克尔飘散的头发,寒风的力量,但船头悬挂的帝国旗帜却像是灌了铅似的纹丝不动。

"你?"

拉克尔抬起暗淡的目光,双眉乌黑紧皱,塞法尔迪人的黝黑肌肤,嘴唇由于祈祷而半阖,修长的鼻翼颤抖着,我又一次看见她的眼睛。

我对她说我来这儿是为了把她从船上接走,我来是为了和她结婚,这是惟一能使她留在美洲的方法,和我结婚就能成为西班牙公民,他们就再也不能碰她,古巴当局已经同意,一个法官会上船来主持仪式……

"那船长呢?船长没有权力让我们结婚吗?"

"我们是在古巴海域,他无权……"

"你骗我。他有这个权力。不过他更害怕。我们都害怕。这些野兽使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恐惧。"

我拉住她的双臂;几小时内这艘船就要起锚踏上归程,不会再有人看到这些犹太人回到帝国,没有人,拉克尔,特别是你,和这艘船上的那些旅客一起,你们不该背井离乡又找不到避难所,听见元首的狂笑了吗,既然没有人喜欢你们,我又为什么喜欢你们呢?

"既然圣彼得是个犹太渔夫,为什么他的后继者不去对抗那些迫害他的犹太后裔的人呢?"

别再想这些了,她将要成为我的女人,那时我们会一起对抗邪恶,因为在这段时期的痛苦忍耐中我们终于见识到恶的嘴脸,我对她说,至少我们在这点上已经赢了,你已经知道撒旦的嘴脸,希特勒背叛了它,把上帝将它打入地狱时剥下的嘴脸显现出来:在天堂与地狱之间,一场仿佛这种古

巴一带的飓风抹去了魔鬼的面孔，留下了一张被单一样惨白的脸，这被单落入地狱口中，遮蔽了魔鬼的身体，直等到它重新出现的日子，就像圣约翰预言的那样：我看见那七头十角的野兽如何自海中而出，人们都拜那兽，谁能与它战斗呢？从它口中跳出满是自高和亵渎的话，它要与圣徒战斗并且取胜……现在我们知道了谁是圣约翰想像中的那野兽。我们来与这野兽战斗吧。它是上帝旗帜上的一块污秽。

“亲爱的。”

“我要像一个天主教徒一样为犹太民族祈祷，她曾是基督降生前启示的载体。”

“基督也有形象。”

“你的意思是基督确实拥有形象。他拣选了抹大拉的马利亚，留下他道成肉身的惟一证据。”

“这么说你既认识善的形象也认识恶的形象，耶稣的脸和希特勒的脸……”

“我不想见到善的脸。如果见到了上帝，我的眼睛都会瞎掉。上帝是不该被看见的。那样的话信仰就不存在了。上帝不让我们看见他是为了让我们相信他。”

二

他不得不在修道院外面接待她，因为修士们不接待女性，但还是给了他一个简陋的单人房间，还帮他收拾出一间茅屋，离圣巴尔托罗梅镇不远。那里吹拂的热风带来非洲荒漠的尘土，迫使农民们不得不给作物盖上席子。

“整个岛都被石头城墙围住来保护收成，土地上铺着一层火山砾，为的是留住夜间的水分让葡萄生长。”

她向石砌的小屋四周扫视了一圈。里面只有一张行军床,一张桌子和孤零零的一把椅子,一个很可怜的书架上放着两个盘子,一人份的锡餐具和半打书。

他们给他这座茅屋是为了让他觉得自己并非修道院的一部分,但也是为了在当局问起的时候可以回答说,他不住在这儿,他是个雇工,是个园丁……在收留他的时候,他们是破了例的,但条件是他进出得冒着风险,并非完全置身危险之外。

豪尔赫·莫拉明白修士们提出条件的含义。一旦出了麻烦,他们就可以说,莫拉并不和他们住在一起,他在教堂里祷告又从事室内和花园的劳作,是的,一种看不见的园艺工作,雕刻石头,栽种火山石,但他并不在教团的庇护之下。他住在外面就是个证明,住在圣巴尔托罗梅镇上,无遮无蔽地呼吸着远来的沙尘,像是在寻觅沙漏,玻璃纺锤来把时光量度,没有这些那时光也会像沙子一样消散:荒漠中的流沙……

他们没有直截了当地跟他说这些,但确实对他说了,坚持而又谨慎。他们欠着莫拉家的情,是他家出资兴建了兰萨罗特的这座修道院。他们理应为他提供庇护,因为他在战争期间一直与许多救援组织一起工作,发放毯子、药品、食物给那些需要的人,空袭中的受害者,战俘以及集中营里的囚犯,在这些人中有很多是反对纳粹的天主教徒。希特勒曾大肆嘲笑佛朗哥分子对天主教的虔诚,对他而言天主教徒与共产党人或犹太人一样危险,全是垃圾,至于庇护十二世从未说过一句维护天主教徒或犹太人的话……教皇是个可耻的胆小鬼。

豪尔赫·莫拉曾经作为移民在斯德哥尔摩定居,在那里与瑞典政府和红十字会组织的救援机构合作。但在战后他

又移居伦敦,成为英国公民。英国已经为自己在西班牙对共和国的见死不救英勇地付出了代价,在那个国度,她有能力阻止希特勒。如今,在"闪电战"中英国人孤立无援地抵抗着德国空军日复一日的狂轰滥炸。英国游客在战后纷纷回到西班牙。而豪尔赫·莫拉并非前去寻求阳光和异国情调。他曾经是共和国的战士,而佛朗哥党人复仇的狂热还远未止息。他们会尊敬一个乔治六世陛下的臣民吗?或者他们要向一个从他们手中逃脱的赤色分子算旧账吗?

这一切修士们全都明白。那么他们仍然要给他冒险的机会吗,离开修道院的机会,碰上国民卫队、被认出或被告发的机会?或者是他自己,莫拉,在寻找着这种风险?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了把修士们从一切责任中解脱出来?或是为了暴露自己,考验自己,特别是为了断送自己所不配得的安定,就像在相遇的那天,她到兰萨罗特来看他的那天他跟劳拉说的那样?那种安定他不配得,也没有人配得。

"我为什么要骗你呢,亲爱的。我是找你来的。我来求你和我回墨西哥去。我想让你平安无恙。"

她希望能理解他。她十分坦诚地对他说,——尽管天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很明智——我依然爱着你,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你,跟我回去吧,原谅我这样直率的提议,但我的确非常需要你。我从来没有像爱你一样爱过任何人。

于是他以一种她认为是悲伤的神色望着她,但渐渐地感到那是一种远离。

然而,她在自己内心感到一种拒绝的冲动,当他说到愿意待在一个有危险伴随的地方,同时就能觉出自己的弱小和需要保护……危险并没有夺去他的力量,反而给了他抵抗的力量,永远不会感到舒适的力量。

劳拉心中的拒绝是不情愿的。她坐在茅屋里惟一的椅子上，而他就靠着光秃秃的墙壁站着。既然在豪尔赫·莫拉身上总有某种严肃的僧侣气质，偶尔带些世俗的偏离，那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然而在这个她所爱的男人身上，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被肉欲的皮肤所隐藏，就像大地被大气层笼罩。离开了他的性，她就不认识他。他看着她，猜中了她的心思。

"别以为我是个圣徒。我只是一个被毁了的自恋者，这是有区别的。这个岛是我的监狱也是我的避难所。"

"像个满腹牢骚的国王，因为全世界都不理解你。"她摆弄着一盒火柴，在这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没有电灯，火柴成为必需品。

"不管怎样，一位受伤的国王。"

他在这里为了寻找信仰，寻求皈依吗，因为她已经成了天主教徒，而他也在寻找重返教会、相信上帝的方法？拉克尔和豪尔赫，另一对儿。

豪尔赫笑了，他依然能够微笑，他并不是苏尔巴朗某幅画中的圣徒殉道者，中心人物象征着摒弃骄傲来获得拯救。但同时可以在那形象上看到，那救赎正是他的骄傲。上帝会允许圣徒骄傲吗？会有英雄般的圣徒吗？如果上帝是不可见的，能在圣徒身上显现出来吗？

她抬起双眼，视线便与莫拉的目光相遇。这男人的脸庞十年里改变了很多。从二十岁开始，他的头发就白了。他的双眼并不深陷，并非紧紧地眷恋着大脑；脸庞削瘦，白色的胡须标记出一段消逝的时光，昔日延续的青春，前程似锦的岁月。他的脸庞改变了许多，但既然被她认出来了，便还是那张脸；不曾改变，他还是他，尽管已经有所不同。

"我能远离自己，却不能远离自己的身体。"他望着她仿

佛猜到了她的心思。

“还记得吗,我们曾经彼此喜爱对方的身体。我想再和你在一起。”

他对她说她是世界,她问他,告诉我为什么你不能待在世界里呢?

豪尔赫·莫拉的沉默并不善于述说,但她继续猜测其中的含义,因为他只给了她这一个机会:推测。他在寻找孤独,寻找信仰,还是这二者皆而有之?他逃避世界,为什么逃避呢?

“你在修道院又不在修道院。”

“不错。”

“你在不在宗教里呢?”

她认为他多少能向她作些解释。这么多年了,应当这样做。

“我们总能互相理解。”

带着一个遥远的微笑他很间接地回答了她。他记起她已经知道的一切。他曾是西班牙和欧洲的大学中的优秀学生,当西班牙——他笑了——从表面上离开埃尔埃斯科里亚尔①加入欧洲,舔着自己在对美战争中失利的伤口,西班牙帝国失去了在美洲最后的殖民地,古巴和波多黎各,最后的殖民地的丧失。西班牙得以联入欧洲要感谢天才的奥尔特加·加塞特,而莫拉是他的弟子。这一切永远地改变了他。接下来是在弗赖堡师从胡塞尔,与拉克尔同窗……他真是一个幸运儿。他不得不力争许可来与佛朗哥和长枪党这些文化的敌人作斗争,他们用沾满粪便的皮靴玷污各大

① 马德里附近村庄,圣洛伦索皇家修道院所在地。卡洛斯五世后除费利佩五世、费尔南多六世、阿尔封索十三世外历代君主葬地。

学的教室,高喊着:“消灭知识!”他们不放过他。他们让他尝到了恶毒的滋味和在哈拉马飞射的霰弹,然后告诉他,你当个外交官最为有用,让人信任的人,可靠的信使……他是个有贵族血统的共和主义者。他曾经处于优越的阵营。那时候世界属于他。即使他将会失去它,但它仍将永远属于他。与残酷的资产阶级和信奉法西斯的群氓相比,他觉得自己与战斗在马德里,在埃布罗河,在哈拉马的人民更为贴近。他恨佛朗哥,恨米伦·阿斯特拉依[①]和他臭名昭著的口号“消灭知识!”,恨盖波·德亚诺[②]在塞维利亚的广播节目和他对西班牙妇女的挑衅,他让她们和安达卢西亚的摩尔人私通,在那里男人是真正的男人。

“而你现在一无所有。”劳拉毫无感情地望着他,对豪尔赫的政治生涯听得疲倦了。

她想告诉他,她不相信他能遗世独立,她并不觉得豪尔赫·莫拉来到兰萨罗特是为了以自己的牺牲来取悦上帝。

“因为正如我眼前所见的,这是一种牺牲,不是吗?”

“你的意思是说,战争结束了,我应该重新担起知识分子的责任,像我的老师奥尔特加和胡塞尔一样写作吗?”

“为什么不呢?”

他笑了。“因为这是他妈的创造力的问题,明知你不是莫扎特也不是济慈。操,我已经厌倦再刨腾我的过去了。在我身上没有什么可以奢谈创造的资本。这是自知之明,超过一切,超过你,超过拉克尔,是我自身的空洞,意识到自己的局限,甚至自己的无能。我这么说你不在意吧?你现

① 米伦·阿斯特拉依(1879—1954),西班牙文人。

② 盖波·德亚诺(1875—1951),西班牙将军。在共和国时期曾任军区司令等职,1937年内战期间多次在电台中谈话。佛朗哥时升为中将。

在来向我兜售一个我不相信的幻觉吗，但这只是让我觉得你是个傻子，就像你们常说的那样，或者认为你低估我的智力。为什么你不能让我一个人待着呢，用我自己的方法来填满我的空虚？让我自己观察事物，看看还剩下什么能在我的灵魂里生长，一种思想，一种信仰，我向你发誓，劳拉，因为我的灵魂比你在外面看见的这片乱石岗还要荒凉……为什么呢？

她抱住他，跪下抱住他的双腿，头倚在他的膝上，斑驳的灰裤子上的湿气憋红了她的脸，那裤子都快洗烂了，好像永远不会再干，尽管如此仿佛仍然带着尿味儿，衬衫也是一样，匆匆洗过就翻个面穿上，因为是惟一的一件，但依然带着怪味儿，地里干活的身体的味儿，一头因为排出这些味道、粪便、精液而疲惫的动物的身体。豪尔赫，亲爱的，我的豪尔赫，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吻你……

"我已经没力气再去刨自己的根了。一个坏西班牙人和拉美人。我们到底是谁？"

她请求原谅惹他不快了。

"不，没什么。起来吧。让我好好看看你。你看起来真干净，真干净……"

"你想跟我说什么？"

劳拉已经记不起自己情人的样子，面对他潮湿的衣服，刚刚洗过，破旧不堪，发出令人窒息的味道，是任何肥皂都洗不去的。她已记不起这男人是站着还是坐在床上，低着头还是向外望着。望着屋顶还是望着劳拉的眼睛。

"我想对你说什么？你知道什么呢？"

"我知道你的经历。从贵族统治到共和国到战败到流亡到骄傲。兰萨罗特的骄傲。"

"魔鬼所犯的罪。"豪尔赫笑了起来。"你落下了不少，

知道吗?”

“我知道。兰萨罗特的骄傲呢?这我可没落下。就在这儿,就是现在。”

“我为修士们打扫厕所的时候,墙上看见了奇怪的图画。好像一位忏悔的画家动了笔又知道永远不会完成,就挑了修道院里最卑下羞辱的地方来开始这个谜。因为我所看见的或所想像的是一个奥秘,而这奥秘又出现在这么一个地方,那些好修士,不管他们自己愿不愿意,都得在那里方便,他们也不过是血肉之躯,这肉体提醒他们自己永远也不能成为纯粹的精神,不管他们的意愿如何。”

“你觉得他们知道吗?他们是那么天真吗?”

“他们有信仰。”

道成肉身,莫拉以一种不能自控的兴奋说道,上帝离开他神圣的自足在基督身上取了人的样式。这使他显得十分脆弱让世人可以与他获得认同。

“所以我们杀了他吗?”

“基督道成肉身是为了让我们在他身上认识我们自己。”

但是为了与基督相配,我们得一再降卑自己以免超过他。

“一位修士拉屎的时候应该想到这个。耶稣也做同样的事,然而我做的时候感到更多的羞耻。这就是信仰。圣特雷莎说,上帝在每日的饭食中间。”

“他在寻找吗?”劳拉问道,“寻找信仰?”

“基督为了道成肉身必须舍弃一种无形的神圣。为什么他们要我成为圣徒来呈现一点点耶稣的神圣呢?”

“你知道我儿子圣地亚哥死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吗?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痛苦吗?”

“你在想这个？或者你只是在询问自己？对不起，劳拉。”

“不是。那时我在想，如果上帝从我们拿去了什么，是因为他放弃一切。”

“放弃他自己的儿子耶稣？”

“对。自从圣地亚哥离我而去，我便一直无法放下这个念头。他是第二个，你知道吗？我的哥哥和我的儿子。两个人，大圣地亚哥和小圣地亚哥。两个圣地亚哥。你能感受到吗？想想我吧！”

“看得更远些。上帝放弃一切。他必须放弃自己的创造，这世界，来使我们自由。”

上帝以我们的自由的名义缺席，豪尔赫说，当我们将自由用于恶，而不仅仅用于善，上帝不得不在基督里道成肉身，向我们显示，上帝可以成为人，并在成为人的同时摆脱恶。

“这就是我们的难题。”莫拉继续道，“享有自由作恶或行善，认为如果我作恶便是玷污了上帝给我的自由，但如果我行善仍是对上帝的冒犯因为我胆敢效仿他，想和他一样，像路西法一样犯下骄傲的罪；你自己刚说过。”

“听起来真可怕。”劳拉握住豪尔赫的手。

“告诉我，我说了什么这样可怕？”

“你说上帝要我们做他所不允许的事。我从未听过比这更残酷的事。”

“你没听说过吗？我却看见过。”

三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愿信仰上帝吗？因为我害怕有一天

会看见他。我害怕如果我能看见上帝，我的眼睛会立刻瞎掉。我只能在上帝远离我的时候靠近他。上帝必须成为不可见使我能够委身于一种真实的信仰，但同时我又害怕上帝的不可见因为在那时我就不再有信仰，只有证据。拿着，读一读圣胡安·德拉克鲁斯的《登上加尔默罗山》，劳拉，和我一起进入时光中最幽暗的夜晚，我化装出行的夜晚，去寻找我的爱人彼此转化，爱人转变成情郎，我的感官停止，我的颈项被一只冰冷的手所伤，它说：看吧，不要忘记……是什么把我和我的爱人分开，上帝还是魔鬼？

不到十秒的惊鸿一瞥，我看见我的爱人，当我们瑞典红十字会的汽车驶过布痕瓦尔德的铁丝网，在那转瞬即逝的一刻我看见拉克尔消失在囚犯们的人流之中。

要在消瘦、饥饿的人群中作出区分是十分困难的，他们个个身穿条纹囚衣，胸佩大卫之星，裹着毯子却抵不住 2 月的寒气，互相簇拥取暖。除了她。

如果这就是允许我们看见的，那么在这可见的背后，他们向我们隐藏了什么呢，他们可曾想到，在向我们展示他们最好的一面的时候却不能不使我们想像真正的一面，那隐藏的一面？然而，在把这恐怖的一面当作最好的一面向我们展示的同时，莫非就在告诉我们，这正是那最好的一面，最坏的一面并不存在，——已经不存在——；那是死亡的面庞？

我看见了拉克尔。

一个穿制服的男人扶着她，一个纳粹看守搀着她，我不知道是他们命令他这样做以显示扶助一个无靠者的同情呢，还是为了防止拉克尔像一堆破布一样瘫在地上，或者是因为在他们两个，拉克尔与看守之间，存在一种自愿付出的关系，一些微不足道的恩惠但对她而言却是天高地厚——

一份额外的饭食，在敌人床上的一个夜晚，也许是一分简单、人道的恻隐之心，或者是为要打动来访者的一场关于人性的默剧——要不然是一例崭新的、不可预见的爱情，在牺牲品与刽子手之间，双双受到伤害，但在彼此不可分离的陪伴中找到了忍受伤害的力量，因自身的服从而来的痛苦使刽子手在同样因服从而受苦的牺牲品身上寻得了认同：他们是两个服从的存在，每一个都服从于更强者的命令，希特勒说过，拉克尔曾对我不止一次提起，只有两个面对面的民族，德国人和犹太人。

也许她在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没和你在哈瓦那下船吗？我愿意在我身上发生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不愿逃避我的命运。

那时拉克尔挣开纳粹看守的怀抱，双手抓住带刺的铁丝网；就在她的刽子手或情人或保护者或哑剧演员与我，她大学时代年轻的爱人豪尔赫·莫拉之间。我们曾经一同冲进弗赖堡的大教堂，两个人紧挨着跪下肆无忌惮地高声祈祷：

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
我们要思想仿佛我们创造世界
我们要作历史活生生的主人
我们要生活在生之世界

那时我们以知识分子深深的激情说出的话语在此时此刻返回，劳拉，以压倒一切的真切与无法忍受的事实，并非因为曾经实现，却恰恰因为是不可能的，时间的恐怖将之一扫而空，但却以一种神秘、奇迹般的方式使之成为可能，那是关于我这一场飞速而恐怖的相遇的最终真实，与我爱过

也曾爱过我的女人……

拉克尔用双手紧紧扣住铁丝网又从那布满铁刺的围栏上扯下来，向我展开，鲜血淋漓好像……我不知道像什么也不想知道更不想拿任何东西和拉克尔·门德斯-阿莱曼美丽的双手作比较，那是用来触摸我的身体如同触摸一本书如同弹奏舒伯特的一支即兴曲，如同触摸我的怀抱取暖当我们在冬天一起走在大学里的街道上：如今她的双手如基督的创伤鲜血流淌，这是她教过我的，不要看我的脸，看我的手，不要为我的身体悲伤，怜悯我的双手吧，豪尔赫，怜惜吧，朋友……感谢我的命运。感谢哈瓦那。

陪同我们的纳粹少校用一丝微笑掩饰起因拉克尔的举动引发的警惕和不快，轻描淡写地说道：

“你们都看见了，关于布痕瓦尔德的铁丝网都通了电的传说纯属无稽之谈。”

“请给她治治手吧。您看，流血流得很厉害，少校先生。”

“她是故意去碰那铁丝的。”

“她有这个自由？”

“是啊，是啊。您说得太对了。”

四

“我很无助。我只有你了。所以我才来兰萨罗特。”

“我很无助。”

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走回修道院。和平时不同的是，这天晚上豪尔赫想回到他的宗教团体，忏悔自己肉体上的软弱。劳拉再次邂逅了豪尔赫的躯体，感觉到这个男人身上崭新的东西，仿佛在此之前他们的肉体从未契合过，仿佛

这次劳拉破例化作肉身，只是为了更像自己，而他只是在她面前裸程相对。

“你在想什么?”

“在想上帝建议他所不允许的事:效法基督!”

“并不是他不允许。只是把那变得很困难。”

“我想像着上帝整天跟我说:我憎恨你在其他人身上所憎恨的东西。”

“那是什么呢?”

在此苟活，四平八稳地被保护着，犹豫不决，不知道自己是想要一种从肉体到精神全备而可靠的拯救还是一种赋予安全以价值的冒险。所以他天天从修道院走到茅屋，黄昏时才回去，从露天到避难所，目不交睫地望着国民卫队的队员们的脸，他们都已经习惯了他，还和他打招呼，他还和修士们一起干活，他是个侍候人的，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在一条石头过道之间他从一间石屋走向另一间石屋。他想像着一个石头的天空和一片石头的海洋，在兰萨罗特。

“你整天都在问我相不相信上帝，是不是已经恢复了天主教文化的信仰，我童年时的信仰……”

“你还没有回答我。”

“为什么我会变成一个共和主义者和反教权主义者?因为天主教会的虚伪和累累罪行，它支持有钱有势的人，它与法利赛人联盟来反对耶稣，它鄙视卑微无助的人，但嘴里却讲着相反的一套。你看见我在茅屋里的那些书了吗?”

“圣胡安·德拉克鲁斯和那本索尔胡安娜·德拉克鲁斯，我们一起在墨西哥的达库巴大街上的旧书店买的……他们好像是兄弟姊妹，可他是圣徒，她不是。人们压抑她还捂住她的嘴，抢走她的书，她的诗歌。甚至连纸、墨水和笔都不

给她。”

“看看这本在法国刚出版的书，是一个修士给我的。西蒙娜·韦伊[①]的《重负与恩典》，她是个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读读吧。她是个杰出的哲学家，她让我们明白我们永远不要思念一个我们所爱而又已经分离的人，却从不考虑这个人可能已经不在世上了……她对荷马作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读解。她说《伊利亚特》包含了三个教训。不要崇拜权力。不要轻视受苦的人。还有不要恨你的敌人。什么也不能逃脱命运的摆布。她死在战争中。死于肺结核和饥饿，特别是饥饿，因为她不肯吃比她在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弟兄所得的配额更多的东西。但她是作为一个基督徒而这样做的，以耶稣的名义。”

豪尔赫·莫拉面对布满孔隙的黑色土地停留了片刻，迎着提曼法亚的方向。那山峰带着燃烧的红色，如同烈火的福音。

五

我原谅历史上所有的罪行，因为比起这一宗来那些都是可饶恕的罪：隐蔽邪恶。这就是纳粹所做的事。他们证明不可想像的恶不仅是可以想像的而且是可能的。在他们之前，一切世纪的罪行，政治势力的罪行，教会的罪行，军队的罪行，王族的罪行，都从我的记忆里逃走了。他们所做的都是可以想像的。而纳粹所做的却不一样。直到那时，我还以为恶存在却不容人看见，试图将自己隐藏。抑或表现为一种以成就善为目的必要手段。你该记得格雷戈利奥·

① 西蒙娜·韦伊（1909—1943），法国思想家。

比达尔就是这样解释斯大林的种种罪行的。那些是为了成就善的手段。况且那些是建立在一种集体的善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而巴西略·巴塔萨尔不惜一切手段废除权力、废除领袖、废除等级，不过是为了寻求生之为人的自由。

这一种则不同。纳粹主义是高声宣告的恶，骄傲地宣告，"我是恶。我是完美的恶。我是可见的恶。我是恶并为此而骄傲。我认为惟有以恶之名而行的毁灭是正当的。恶死于恶之手。死亡即暴力，惟有暴力，别无他物，没有任何的救赎，不需软弱的辩词"。

我想见见那个女人，我对布痕瓦尔德的少校说。

不，您弄错了，您说的那个女人不在这儿，她从来没在这儿待过。

拉克尔·门德斯-阿莱曼。她叫这个名字。我刚刚看见她了，在铁丝网后面。

不，那个女人不存在。

你们已经把她杀了吗？

当心。请不要乱说。

她被我看到了所以就被杀了吗？因为她看见并认出了我？

不是。她不存在。没有她的记录。您不要把事情搞复杂了。话说回来，你们是因为帝国恩赐的特许才来到这儿的。是为了让你们看看犯人们受到的良好待遇。当然，这儿不是阿德龙饭店，不过如果你们星期天来的话就能欣赏囚犯管弦乐团的演出了。他们演奏《帕西法尔》序曲。是一部基督教的歌剧，你们知道吗？

我坚持要看犯人们的花名册。

花名册？

别装了。你们是很细致的。我想看看花名册。

“M”的部分里有一页被匆忙地撕下，劳拉。尽管他们是如此的细致，如此的训练有素，还是在失去的那一页的装订处露出尖锐参差的边际如同兰萨罗特群山上的峭壁。

关于拉克尔·门德斯-阿莱曼的命运我只知道这么多。

当战争结束我回到布痕瓦尔德，埋葬在公共墓穴中的尸首已经难辨往昔，被焚化的人们已化作尘埃，歌德和席勒的假发，在魏玛，北方的雅典，克拉纳赫[①]、巴赫和弗朗茨·李斯特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没有一个人会创造出纳粹在集中营入口处所刻下的铭文。不是那人所共知的 Arbeit Macht Frei，“劳碌得息”，而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另一句，Jedem das Seine，“罪有应得”。拉克尔。我要将她回忆，在停泊在哈瓦那的欧根王子号的船头，请她嫁给我以拯救她于无谓的牺牲。我要将拉克尔回忆。

不，她望着我，深邃的眼神如同蕴含预兆的夜晚，为什么我要成为一个例外，一个幸运儿呢？

她的话已足以将我半个世纪的经历总结，这世纪本要成为一个进步的天堂，不想却沦为一个堕落的地狱。不仅是法西斯与斯大林主义恐怖的世纪，也是这样一种恐怖的世纪，即与恶抗争者无法得救的恐怖，无人得救，劳拉！那些英国人无法得救，他们藏起粮食好使孟加拉人失去反抗的意志并无法在战时与日本结盟，那些与他们合作的穆斯林商人也无法得救；那些英国人无法得救，他们在印度打断争取民族独立的反抗者的腿还不让他们痊愈；那些法国人无法得救，他们协助纳粹的种族灭绝，或是反对德国侵占他们的领土却将他们对阿尔及利亚、印度支那、塞内加尔的占

① 克拉纳赫(1472—1553)，德国画家。

领视为神圣的权利;那些美国人无法得救,他们以支持美利坚合众国为条件维护加勒比及中美洲一切独裁者的统治,无视那里监狱爆满,乞丐遍地;谁能得救呢,是那些私刑拷打黑人的人呢,还是那些在密西西比——福克纳的土地上——被处决,被监禁,被禁止和一个白人一起喝水或撒尿的黑人呢?

"从我们这个时代开始,邪恶已经不再可能成为一种责任。"

"我不愿被怜悯,豪尔赫。我宁愿被迫害。"

这是我听到拉克尔说的最后的话。我不知我的痛苦来自于没有将她救出还是来自于她的痛苦。但她望着我的样子,尤其是在集中营她望着刽子手的样子,告诉了我直至最后的时刻,拉克尔证实了她的人性,并为我留下了一个问题好让我永远地与她活在一起。什么是你的美德的美德,亲爱的,我的爱的爱,我的正义的正义,我的同情的同情?

"我愿分担你的痛苦,一如你分担你的民族的痛苦。那就是我的爱的爱。"

六

劳拉离开了豪尔赫,离开了小岛。她登上了小汽船,知道她将一去不返。豪尔赫·莫拉将不再是一个清晰的形象,而变得模糊,从一种永远在场的往昔中浮现,对那一往昔的认同将成为他曾经存在的最终证明。然而他已经不再是他。

去吧,她对他说道,做个圣徒,做个苦行者,一个人爬到沙漠里的柱子上去吧,做一个不殉难的安逸的殉难者吧。

他对她说,她这样对他太严厉了。

她答道，因为我爱你。“你为什么要躲在一个岛上呢？你还不如待在墨西哥。没有比墨西哥城更好的藏身之处了。”

“我已经没有力量了。对不起。”

“好吧，你是西班牙人。你可以相信死亡会姗姗来迟。”

再次相遇使他如此痛苦吗？

“不，我已经学会去害怕那些用爱来改变我的人，而不是那些恨我的人。当你离开去古巴的时候，我无数次地问自己，没有他我能生活吗？没有他的支持我能生活吗？那时我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来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不至于为了某一个所爱的人而牺牲。你跟我说过，你知道吗？你支持我是为了让我回到自己的家，并且无论怎样要向我的家人说明真相。没有你的爱支持我，我永远没有这个勇气。没有关于你的记忆，只会又多了一个通奸者。有你在，没有人敢向我扔第一块石头。我感到自由因为有你陪伴着我。”

“劳拉，最恐怖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安静些吧。你只当我是因为自己的意愿而独自留在这儿的。”

“独自？这话我不明白。脱离世界你怎样成为一个宗教信徒呢？不离开自己你又怎样来到上帝面前呢？你已经很清楚自己是如何生活在修道院与世界之间的边际上。你相信那些禁止女性进入、与世隔绝的修士就能遇见上帝了吗？你相信他们脱离了世界还能与上帝相遇吗？你真够自负的啊，狂妄的家伙！你躲在这个石头小岛上就能洗净20世纪的种种罪恶了吗？你正是与你所憎恶的一样的骄傲啊。你是你自己的魔王。你打算怎样饶恕自己的专制呢，不知羞耻的豪尔赫？”

“想像上帝在对我说：我憎恨你在其他人身上所憎恨的东西。”

“想像？只是想像吗？”

“倾听，劳拉。”

“你知道吗？我会带着对你漠然和安静的智慧的敬意而离开。我可不会这样。”

“拉克尔埋葬在一个无名的坟墓里，里面挤满了赤裸的尸体。我们比她好些吗？我并非更好的。我不一样。跟你一样。”

“你为什么相信自己得到了解救？”她带着怀疑问道。

“因为你带着怀疑来和我说话。你是个彻头彻尾的怀疑论者。我以前曾经是个怀疑论者。当看到有人比我拥有更少的信仰的时候我就恢复了正常。我们是多么渺小啊，劳拉。”

他请求回答那个自从她来到兰萨罗特就一直在问的问题（“你不该来这里。这个岛并不存在。你会相信你眼中所见，当你离开的时候你会发觉这里空无一物。”）：你信还是不信？

“就像问题问的那样，基督教是真理还是谎言？我的回答是你的问题无关紧要。我在这儿，在兰萨罗特，在修道院生活和你所理解的生活之间（在安全和危险之间）想寻求的答案是，信仰能否为你在这里在这片土地上的疯狂赋予意义。”

他发现了什么呢？

“对一个基督徒而言基督的生活永远是可能的，但是没有人敢于效法他。”

“他们不敢还是不能？”

“他们以为像基督就是行基督所行，叫死人复活，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们把基督变成了能动的观念。劳拉，只在我们不信他的时候基督才来找我们。我们不寻找他，

他就与我们相遇。那是帕斯卡尔的真理：因为你没寻找我你就遇上了我。那就是我今日的现实。你走吧，劳拉，想想吧，我并不快乐。在这个岛上的每个傍晚都很忧伤。”

“我来是因为你的地方已经空无一物。”劳拉喃喃自语，渐渐远离兰萨罗特夜幕中的海岸驶往特内利费里夫岛，夜色渐沉，岛屿变得火红。“我已经不能再忍受。生活在一个空虚的地方，怀念我儿子不曾拥有的生活和弃我而去的你的爱情，这是危险的。然而我失去了我的儿子，你失去了拉克尔。我们两个都付出了珍贵的东西。也许上帝，如果存在的话，他会认同我们这样的丧失并觉察到我们一点一滴的悲伤。现在我不愿再想念你了。对你的思念给我太多的安慰，放纵了我的想像。我要彻底地向你告别。我从不认识你。”

当他们在修道院门口分别的时候，劳拉等了一会儿，有些迷惑。为什么他们不让女人进去呢？她见没有什么阻止她进入，便最后一次去找豪尔赫，感到双唇最后一次火热，向他说出了本来准备永远埋藏在心中的话：

“我非常爱你。”

他趴在修道院的食堂里，用舌头舔着地板，坚忍不拔，中规中矩，一块接着一块。

第十八章　索诺拉大街:1950 年

当生命中的这一刻来到,只剩下对逝者的爱,此外一切都无关紧要了。这一切都应为逝者而做。我们,你与我,我们能够忍受是因为逝者已经不在了。逝者的在场并非真实。他们的不在才是惟一的真实。然而我们对逝者的愿望既非在场亦非缺席。在我家里已经是空无一人了,豪尔赫。如果你认为是孤独驱使我回到你身边,我也不反对你这么想。

我丈夫胡安·弗朗西斯科死了。

玛丽亚·德·拉奥姨妈也死了。

但是我心爱的儿子圣地亚哥的死对我而言是惟一真实的死亡。它包含了一切死亡,也赋予一切死亡以意义。

姨妈的死甚至让我感到高兴。她死遂其愿,在她心爱的维拉克鲁斯和一个叫马提亚·马塔达马斯的小个子男人跳丹松舞,那男人总是穿一身粉蓝,每周两次和姨妈一起在公共广场巴掌大的地方跳丹松舞。

胡安·弗朗西斯科真正的死亡早在很久以前就发生了。他虚浮的身体证实了这一点。他拖曳着双脚走到了死亡,他对我说"对我而言什么也不会再发生了",他问我:"我们那时候该结婚吗?"因为在他死的那一天我请求他说我们不要再互相指责了。

"我浪费了太多时间来恨你。"

“而我则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来忘记你。”

我们中是谁说的这些话呢，豪尔赫，是他还是我？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已经不记得是我们两个中的谁说过“别告诉我你值得我去恨你，我也不会说你值得我去遗忘”。

我愿意相信当他死的时候我并不爱他。自从你去了古巴，自从我回来我一直在问自己，他为什么接纳我回来？墨西哥的男人只会休妻，从不重收覆水；胡安·弗朗西斯科有什么东西超出了我的想像或超出了我对他的了解？

关于我的儿子们我可以说他们很强，比我自己所了解的要大些，但关于他我只能问，他是虚弱的还是堕落的？他从事一项失败的事业，只是为了寻求惟一存留的爱的形式：他人的怜悯？我怎么能抛弃这样一个软弱的男人呢？

我儿子圣地亚哥的死使我整天都在想着我爱的一切都已经死去。

我安慰自己就像我们所有人都会做的那样。日子会过去，我终究会忍受这空缺。

于是我强烈地反抗，我愿意我的痛苦总不消失，我想让我儿子的缺席成为永远，永远得不能承受。

于是我屈从于自己的骄傲。我自问如果一种爱仅以回忆为支撑，能否最终会变得不可忍受？我自问如果一种爱想要成为永远的痛，理应战胜记忆的抚爱，要求一个空间，一个巨大的空间，不是来盛纳回忆、温情，而是缺失，对缺失的了解，拒绝任何抚慰……

它从意想不到的地方来到。怜悯。

那是胡安·弗朗西斯科洒在圣地亚哥尸体上的眼泪。父亲为儿子的死亡哭泣，仿佛世上再没有人爱他这样深切，这样隐秘，毫不炫示。为此他才疏远他而接近丹东吗？为了在圣地亚哥离去的时候好受些？他哭泣是因为他从未接

近过他，还是因为他爱他胜过任何人，而只有死亡才使他展露自己的情感？

看见父亲在儿子尸体上哭泣使劳拉又回忆起那连番的唇枪舌剑，似乎她丈夫和她长久以来所说的一切互相伤害的话在不断地重复，在那一刻带着更多的怒气，和你结婚好像朝命运转过了脸去，不要像圣徒对诱惑者似的跟我说话，过来面向我，看着我的脸，为什么不相信我是真心爱你的，胡安·弗朗西斯科，却偏要认定我是在欺骗你？我不知道当初为什么我把你想像成一个勇敢又有魅力的男人，那都是别人说的，你永远是一个人们谈论中的人，一些背后的议论，从未成为真实，你我之间没有爱，只有昙花一现的幻觉，虚象，不是建立在尊敬与钦佩基础上的爱，幻觉和虚象不会持久，和你一起的生活胜过了我，使我困惑，使我陷入病患，我不恨你，你使我厌烦，你爱我爱得过分，一个真正的情人不该爱一个人爱得太过分，不该使人厌烦，胡安·弗朗西斯科，我们的婚姻已经死了，是一切毁灭了它，或者是什么都没有毁灭了它，谁知道呢，不过我们埋葬它吧，亲爱的，它散发着臭气，臭气……

现在我也许可以对他说，谢谢，谢谢你过分轻易的爱，我才能达到更高些的东西，达到那持久不变的希望，因为你我才到了豪尔赫·莫拉那里，与你的矛盾使我能够理解和热爱豪尔赫，我从未做到那样地爱你……

"我以为自己拥有比实际大的力量，劳拉。原谅我。"

"我不能把我最好的打入记忆的坟墓里。你原谅我吧。"

此刻看着他在死去的儿子身上哭泣，她也许愿意请求他，胡安·弗朗西斯科，原谅她，三十年来她都未能进入他的表面，关于他的神话，对他的起源，他神秘的过去一无所知，

对他现在的背叛也是如此……

因为儿子的死他们才终于可以交谈，这实在可怕。

同样可怕的是：两个人，劳拉与胡安·弗朗西斯科发现他俩都暗暗地以同样的爱看着小圣地亚哥，所想的也一样，都觉得他拥有一切，美貌，天分，慷慨，却单单少了健康，单单少了有待度过的生命和时光。只有在这个时候父亲和母亲才发觉两个人都滥用了对圣地亚哥的怜悯，因为在这个家里谁也没有权利怜悯别人。怜悯会背叛所爱的人。

"所以你也故意表现得向着丹东，是吗，胡安·弗朗西斯科？"

劳拉高估了母子间无声的交流。孤独与寂静把他们聚在一起。胡安·弗朗西斯科和圣地亚哥的关系也是真实的吗？说明发生的事不仅是一种侮慢？还是一种背叛？母子生活在一团琐事、猜测、得体的行为之中，单单少了怜悯，那该死的，被禁止的怜悯……？那远远地称赞着另一个儿子的父亲，也有同样的经历和感受吗？

每个母亲都知道有些儿子能自己照料自己。试图保护他们是一种冒犯。丹东就是如此。父亲的接近在他而言是一种滥用感情；胡安·弗朗西斯科却一无所知，把一切给了毫无需要的儿子，那个自孩提时起就整日嬉闹，对于阴影中发生的一切以及兄弟在家里沉默的存在毫不介怀的丹东。然而劳拉凭直觉知道尽管丹东不需要关照而圣地亚哥需要，但过分的被照顾的感觉会使体质虚弱的孩子比强壮的孩子更视之为侮辱和伤害。问题并不在这里。其中的一个儿子，丹东，在世间如鱼得水，尽展所长；而另一个，圣地亚哥，却罔顾一切，除了他认为重要的东西，有关他的绘画，他的音乐，他的诗歌，他的梵高，他的埃贡·希勒，他的波德莱尔，他的兰波，他的舒伯特……

此刻，看着父子俩，胡安·弗朗西斯科和丹东在年轻的圣地亚哥美好瘦削的身体上哭泣，劳拉发觉弟兄两个彼此相爱却羞于过分亲昵，手足之情以另一种男性的方式来表现，常常要等到死亡来临才流露出爱，亲密，温情……此时此刻劳拉归咎于自己。劳拉·迪亚斯抢去了世上所有的荣耀都是为了圣地亚哥？美德都归给软弱的；那强壮的就理当无份吗？事实上她已经失去了两个儿子？

“你知道吗？”胡安·弗朗西斯科在葬礼后对她说，“一天晚上，我无意中听见他们像成年人一样交谈。他们说：‘我们能满足自己。’他们在宣告独立于你我，劳拉。你的小伙子们在宣告独立呢，多么令人惊讶。只有圣地亚哥是严肃地说的。他能自我满足。丹东不行。丹东需要成就、金钱、社会。他不能自我满足；他自我欺骗。所以他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我们。”

还会有时间来修正三十年来共同生活的种种错误吗，包括两个长大成人的儿子，一个已经死了？圣地亚哥死前写过一首诗，劳拉拿给胡安·弗朗西斯科看，特别是有一行写道：

我们是被阐释的生命

他想说什么意思呢？这孩子平日里说的那些话到底有什么含义？别打开笼子，小鸟都很恋巢，不会飞走的，那些猫可就不一样了，它们会走开又回来伤害……“不总是有阳光洒在我头上……”也许这些意味着圣地亚哥能够从自己摆脱出来，自我更新，发现在他里面的另一个自己。她也发现了这一点却没有对他说。你呢，胡安·弗朗西斯科？

“我的儿子就是我的传记，劳拉，我再也没有别的。”

“那我呢?”

“你也一样,老婆。”

那就是胡安·弗朗西斯科的秘密吗,他的生活没有秘密因为他没有过去,他的生活只有外在的一面,胡安·弗朗西斯科,演讲家,领袖,革命者? 这一切的后面,后面是什么呢? 什么都没有吗?

“在维亚埃尔莫萨有一个得先天愚的女孩。她威胁人,厮打,口吐白沫。她母亲不得不给她戴上眼罩像一匹母马似的,好让她看不到外界就安静下来。”

“是你在塔巴斯科的邻居吗?”

不是,他没有邻居,他摇着头说。

“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 你永远也不告诉我吗?”

他又摇了摇头。

“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把我们分隔开,每当我们就快要互相理解的时候,你一次又一次地对你的历史缄默不言?”这一次他点了点头。

“你做过什么,胡安·弗朗西斯科? 你曾经英勇无畏但是你已经厌倦这么做了吗? 你的英雄气概是个谎言吗? 你知道我曾对此深信不疑吗? 你要把什么样的神话传给你的儿子们,活着的和死去的,你想过吗? 你要为我们留下什么呢? 全部的真相吗? 一部分的真相? 好的那一部分还是坏的那一部分? 哪一部分给活着的丹东? 哪一部分给死去的圣地亚哥?”

她知道只有时间,如烟消散的时光,可以最终揭示她丈夫胡安·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格林可疑的往昔。其实有过多少次他们互相要求彼此妥协,永远都说不出“我今天就告诉你一切”这样的话吗?

“以后你会明白……”他一次又一次地拖延。

“你知道你在逼我做什么吗？你在逼我问你，我该给你什么，你想从我这里要什么，胡安·弗朗西斯科，你想让我还对你说‘我亲爱的，我的爱人’，你明明知道这些话我只留给另一个男人和我的儿子们，这些话不是给你的。你是我的丈夫，胡安·弗朗西斯科，不是我的柔情，不是我亲爱的，我的爱人（我的绅士，我亲爱的西班牙佬……）？”

她害怕——或者说她愿意相信——胡安·弗朗西斯科最终在某个时候会从他的昏睡中跃出，以另一种既苍老又清新的声音来接触她。她用耐心武装好自己，等待着将要来临的结局，那结局的渐渐临近可以从这个大个子男人衰老的身体上展露出来，宽宽的肩膀，巨大的手掌，身子长双腿短，这一点和他同一血统的一些人一样——他的血统，是劳拉想归咎于胡安·弗朗西斯科的某种东西，至少他的种族，血统，祖先，家庭，父亲和母亲，情人们，第一个妻子，私生子和合法的儿女，还有别的什么呢？有一天她差点搭上洋际列车回到维拉克鲁斯，再换船和火车去塔巴斯科查看关于他的各种注册登记，但又自觉是令人不齿的窥探行径，便仍继续自己的日常生活，帮助比往日更加痛苦的弗里达·卡罗，她截除了一条腿，成了床榻和轮椅的囚徒，还整日参加里维拉为那些新的流亡者——被国会的反美行动委员会迫害的美国人——举行的聚会……

一场新的战争开始了，丘吉尔在一次精彩的演说中将它命名为“冷战”：“一道铁幕在欧洲降下，从斯德丁[1]直到波罗的海。”斯大林支持各民主国家。这位老独裁者的偏执达到了疯狂的顶峰，他所监禁和下令屠杀的不是那些并不存在的敌人，而是他的朋友，怕的是某一天这些人会变成他

① 斯德丁(Stettin)即什切青(Szczecin)，波兰西北港口城市。

的敌人;他把暗杀和监禁残忍地提前实施了,恐怖而又毫无必要……然而毕加索在为斯大林所作的“现实主义”的肖像中却以一只和平鸽作陪,因为这位在西班牙战争期间“巴黎咖啡馆”里的聚会上被多明戈·比达尔、巴西略·巴塔萨尔和豪尔赫·莫拉无数次谈起的怪兽,如今已经成为和平之星,来对抗那些美帝国主义者,他们既不怯懦也不懒惰,发明出他们特有的反共偏执狂,在每块桌布下面,在纽约的每一处角落,在每一部好莱坞电影中都能发觉斯大林所遣特务的影踪。这些新的流亡者开始在里维拉夫妇家中聚会。很多人不再去那里,或是厌倦于迭戈滔滔不绝的马克思主义言论,或是愤慨于弗里达对斯大林老爹的崇拜,为他画像并献上赤裸裸的赞颂之词,尽管(也许正是原因所在)斯大林下令杀死了弗里达的情人莱昂·托洛茨基。

劳拉·迪亚斯想起了豪尔赫·莫拉的话:不必改变生活,无需改造世界。应当使生活多样化。应当丢弃重新获得大同的幻觉,不必把它当作通向一个新天堂的钥匙。应当赋予差异性以价值。差异性巩固了同一性。豪尔赫·莫拉说他置身于两个真相之间。其一,世界将会自我拯救。其二,世界已注定无可救药。两者同样正确。被资本主义腐败了的社会无可救药。然而革命的理想主义社会也难逃同一结局。

“你要相信自由的种种可能。”一个热切的声音在劳拉·迪亚斯耳边响起,在里维拉夫妇家聚会上平淡的交谈和深刻的争论中屡占上风。“你要记得政治次要于个人的完整性,因为没有了后者,在社会中的生存就失却了意义……”

“豪尔赫!”劳拉带着无比的惊讶叫了起来,转脸朝向那个仍然年轻的男人,并未脱发但不再像以前那样乌黑,已是点点银星,眉毛也一样染上了白霜。

“不是。抱歉让你失望了。我是巴西略。巴西略·巴塔

萨尔。你还记得我吗?”

他们以一种新生般的激情拥抱在一起,仿佛以某种方式两个人在此刻获得重生,并在这相遇的激情中彼此相爱,回到十五年前的两个年轻人,只是此时他们已经有了各自的伴侣。已然如是,永远如是。陪伴劳拉·迪亚斯的是豪尔赫·莫拉。陪伴巴西略·巴塔萨尔的是皮拉尔·门德斯。而豪尔赫,在他的岛上,永远陪伴他的是另一个门德斯,拉克尔。

他们以无尽的柔情彼此凝视,半晌说不出话来。

“你明白了?”巴西略微笑着,双眼湿润,“我们永远走不出那些难题。我们不是去追就是被追。”

“我明白了。”她用虚弱的声音答道。

“这些美国佬里有很好的人。几乎都是电影和戏剧导演,作家,不少是西班牙战争中的老兵,林肯纵队的,你还记得吗?”

“我怎么会不记得呢,巴西略?”

“他们几乎都住在奎尔纳瓦卡。我们为什么不找个周末去和他们聊聊呢?”

劳拉·迪亚斯只能在她们老朋友,这个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脸颊吻上一下,好像再一次亲吻豪尔赫·莫拉,好像初次看见总是躲着的阿尔莫尼亚·阿斯纳尔的那张脸庞,好像从大海的深处浮现出她心爱的兄弟大圣地亚哥的形象……巴西略·巴塔萨尔成为一段往昔的催化剂,那是劳拉·迪亚斯深爱的却又认为是永远失去了的往昔。

“不了。你使我们的过去重现,巴西略。谢谢。”

去奎尔纳瓦卡谈论政治,不过这一次是和美国人,不是和西班牙人,也不是和被革命,被卡列斯和莫罗内斯背叛了的墨西哥工人领袖……这个主意使她感到厌倦和忧愁,那天晚上回到索诺拉大街熟悉的家,已是孤身一人,玛丽亚·

德·拉奥姨妈和圣地亚哥都死了，丹东结了婚住在洛马区，劳拉纯粹是为了审美的原因，发誓决不踏进那里一步。

“你说过你要改变岳父岳母的趣味，丹东。”

“再稍等一阵，妈妈。这是一种调整，一种适应。对我岳父堂阿司匹林我得先教给他趣味以后好控制他。他有点结巴，别担心，他的平顶阳台已经没有下水管道了……”

“你妻子呢?”

“爱指手画脚，我向你发誓，可怜的马格达莱娜什么也不懂，连从哪儿打嗝都不知道。”

“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俗人。”劳拉忍不住笑了。

“得了，我能让她相信孩子是从巴黎来的。”

“孩子?”劳拉抱住了儿子问道。

五十二岁的时候，我要当祖母了，劳拉自言自语走在从考约坎欢庆会返回的路上，她就是在那里与故友巴西略·巴塔萨尔重逢。她认识豪尔赫·莫拉时四十岁。如今我是独自一人与胡安·弗朗西斯科一起生活，但我就要当祖母了。

胡安·弗朗西斯科穿着睡衣裤，趿拉着拖鞋为她开门的样子提醒了她自己仍然是妻子，不管她愿意还是不愿意。此刻一个过分崇高的念头在她脑海中闪过，又被她厌恶地顶了回去。只有在家庭里才能够存活。只有留在家庭里的才能够长久。萤火虫在世上寻找光亮，都难免葬身火中。这也许就是她外祖父老德国人堂费利佩·克尔森所想的，他横渡大洋为的是在卡特马哥的咖啡园里离群索居，不再离开一步。难道他会比自己的子孙更幸福吗?不该拿儿子跟父亲作比较，更不用说孙辈了。一代人与另一代人的隔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世界本是由被鸿沟彼此隔离的世代组成。很多时候也是由分离的伴侣们所组成，在哀怨的沉默中被分开，就像外祖父和美丽而残

疾的外祖母堂娜科西玛一样,她永远也逃不出后者那若有所思的目光——这一点劳拉从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知道,——“帕潘德拉的美男子”危险而又英武的形象。看着胡安·弗朗西斯科穿着睡衣裤,趿拉着拖鞋为她开门的样子——平底拖鞋上漏出个洞好让右脚大拇指透透气,长毛绒的睡衣裤上刺眼的条纹好像床罩改成的毛巾,——她丈夫也许是胡亚雷斯时代那个拦路打劫者“帕潘德拉的美男子”的私生子,这个想法令她立刻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呢,老婆?”

“我们就要当爷爷和奶奶了,老伴儿。”她歇斯底里地大笑着答道。

儿媳阿尤布·龙戈利亚怀孕的消息以一种无法觉察的方式给胡安·弗朗西斯科以沉重的打击。仿佛即将来临的分娩要求一次加速的死亡作为牺牲,要为新生儿腾出无益地被占据的地方,因为老头子已经过了六十五岁了。这是目测而出的结果,劳拉笑着自语道,因为没有人见过他的出生记录。她看到自从他打开孤单的家门的那天晚上他就已经死了。这就是说,他所剩下的时日被拿去了。

些许悲伤的爱抚已经来不及了。

她看着他关上门又上了锁,好像这个悲伤穷苦的地方还有什么值得偷的东西似的。

要说上一句他最终拥有幸福的生活,却已经来不及了。

他趿拉着拖鞋走到厨房,自己冲了咖啡,这既使他昏昏欲睡又让他觉得自己在做一点有用的事,不用劳拉帮忙。

要改变那寒冷的微笑已经来不及了。

他慢慢地呷着咖啡,将剩下的面包用咖啡蘸湿。

要使变得衰老的灵魂重获青春,即使是相信灵魂的不朽能够让胡安·弗朗西斯科幸存的灵魂自我重生,都已经来

不及了。

他用根牙签剔了剔牙。

要回转身去,重拾青年时代的种种理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工团,都已经来不及了。

他站起来,把用过的器具留在桌上等女仆来清洗。

要一个崭新的、最初的饱含爱意的眼神,永远无法寻找无法预见,却在惊喜中邂逅,但已经来不及了。

他离开厨房,扫了一眼过期的报纸,那是注定要用来烧开水的。

当已经失去了别人的爱与尊重,要一份老人们配得的怜悯的时候,却已经来不及了。

他穿过摆放着丝绒家具的客厅,若干年前当胡安·弗朗西斯科在饭厅讨论工人政策的时候劳拉就是在这里度过漫长的等待的。

当被要求结果而非空谈的时候,想要自怨自艾已经来不及了。

他半转过身去回到饭厅,仿佛失落了什么东西,一种回忆,一个承诺。

要为自己申辩说加入执政党是为了说服官员们承认自己的错误,已经来不及了。

晃动中他抓紧了楼梯的扶手。

试图从内部改变政府和政党已经来不及了。

每一级台阶都花费了他一个世纪的时间。

想被她所认可已经来不及了。

每一级台阶都化作石头。

要自觉有罪或满足只取决于她的判断而非其他人,已经来不及了。

他终于到达了第二层楼上。

自己的意识对他加以判决已经来不及了。

他感到迷失了方向,卧室在哪儿,哪扇门通向浴室?

多年积累起来的声望却在一瞬间失去,仿佛除了世界向你背过身去的那一刻一切都无关紧要,想要恢复它已经来不及了。

啊,对了,浴室在这儿。

想听她问起你今天干什么了就答道跟往常一样你都知道,已经来不及了。

他羞怯地用指关节敲了敲门。

想要再每一刻都监视她,找侦探跟踪她,因为太爱她稍稍地羞辱她,已经来不及了。

他走进浴室。

要她克服厌烦和对爱情与温柔的轻蔑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

他向镜中望去。

要劳动者们爱戴他,他也感到被劳动者们爱戴,已经来不及了。

他拿起剃须刀,剃须皂和刷子。

要重新经历布兰科河大罢工的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已经来不及了。

他用湿润的刷子和剃须皂慢慢地弄出泡沫。

要再次组织革命的红色旅已经来不及了。

他把满是泡沫的香皂涂抹在脸颊、上唇和脖子上。

要振兴世界工人之家已经来不及了。

他慢慢地刮着脸。

要人们承认他的革命功绩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没有人记得。

他习惯晚上睡前刮脸,这样可以为早上出门上班节省

时间。

要人们承认他,他是个人物,他干事,他配得一个位置,都已经来不及了。

他刮完了脸。

除了接受失败一切都来不及了。

他拿毛巾把脸擦干。

要问自己一句错在哪里,已经来不及了。

他在镜子里冲自己笑了半天。

要打开一扇通向爱的门已经来不及了。

他看见一个陌生的老人,另一个男人,正是他自己从镜子深处走来在此刻与他会面。

说我爱你已经来不及了。

他望着脸颊上的皱纹,压低的下巴,奇特地拉长了的耳朵,眼袋,白发四处生长,耳旁,头上,唇边,好像结冰的干草,老不死的。

他感到巨大的欲望,痛苦而又舒服,想坐下来拉屎。

去实现对一个崇高、荣耀、令人钦佩、流芳百世的目标的承诺,已经来不及了。

他脱下儿子丹东生日的时候送他的条纹睡裤,坐在马桶上。

已经来不及了……

他猛地一挣,向前倒了下去,肚子敞着,心脏停止了跳动。

死老头子,老不死的。

为胡安·弗朗西斯科守灵的时候,劳拉准备把她的丈夫忘掉,就是说,抹去所有的记忆,它们像她婚姻的坟墓上一块提前摆上的石碑压迫着她,在胡安·弗朗西斯科的葬礼上,她却闭上眼睛,待在灵柩旁,想着分娩的痛苦,想着她的

儿子们是如何地诞生，生大儿子的时候经历了那样的痛苦，每一次子宫收缩之间的漫长煎熬，而第二个儿子的诞生柔和得像吞下一块奶糖，柔和、流动像熔化的黄油……她把手放在丈夫的灵柩上，决定经历生产的痛苦，而非死亡的痛苦，她意识到他人的痛苦，别人的死亡，终究与我们无关，无论是丹东还是圣地亚哥，都无法感受他们的母亲分娩时的种种痛苦，对他们而言进入世界是一声既非幸福亦非悲哀的呼喊，新生儿胜利的呼喊，“我来了！”，而母亲是受苦者，也许就像她带着可怕的创伤生出圣地亚哥，大喊着不在乎被大夫和护士们听见，“该死！我为什么要有个男孩？太可怕了！为什么不先通知我？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最好杀了我吧，我要死，该死的男孩，让他也一块死吧！……”

如今胡安·弗朗西斯科已经不在人世，也不会知道这些。他不会感到丝毫的痛苦。

她也一样。因此她宁愿去回忆分娩的痛苦，好让守灵的人们——旧日的同志，工团分子，政府的下级官员，几个议员，以及与其他人形成鲜明反差的丹东阔绰的家人和朋友们——在她脸上看到分享痛苦的痕迹，然而这是虚伪的，因为痛苦，真正的痛苦，只有感受它的人才能感受，女人分娩的时候，无论是助产的大夫还是出生的孩子都无法感受，当子弹将死刑犯穿透的时候，只有他才能感受，而非行刑队或者下达命令的军官，只有病人能感受，而非护士们……

不知为什么，劳拉想起了西班牙人皮拉尔·门德斯站在圣塔菲·德帕仑西亚小镇门前的形象，她在午夜时分高喊拒绝父亲的怜悯，要求将自己以政治狂热分子判处，以背叛国家和效力革命之罪名在清晨枪决。和她一样，劳拉也想高声呼喊，但不是因为她的丈夫，也不是为了她的儿子们，而是为了她自己，回忆起那平常又恐怖，无法描述无可比拟的

分娩的痛苦。有人说痛苦摧毁语言。只能是一声呼喊,一声呻吟,一个断断续续的声音。谈论痛苦的人是没有感受到痛苦的人。掌握痛苦的语言的人所描述的是他人的痛苦。真正的痛苦没有语言,然而劳拉·迪亚斯在为丈夫守灵的夜里并不想喊叫。

她紧闭双眼,想起了其他的尸体,两个圣地亚哥的尸体,圣地亚哥·迪亚斯·奥夫雷贡,她的半个兄弟,二十一岁在维拉克鲁斯被枪决,和她的儿子圣地亚哥·洛佩斯·迪亚斯,二十七岁在墨西哥城自然死亡。两个美丽的死者,一般地美丽。她为他们服丧。她的两个圣地亚哥,大圣地亚哥和小圣地亚哥,这个夜晚将在散落的世界重聚,并无协定,为的是赋予其独有的形状,两具年轻美丽的躯体的形状。因为躯体是一回事,而美丽是另一回事。

工人同志们想在胡安·弗朗西斯科的灵柩上盖一面有镰刀和铁锤的红旗。劳拉拒绝了。象征物纯属多余。他们没有权利用一块红布来界定他的丈夫,还是留给斗牛场更合适。

同志们退了下去,感觉受到了冒犯但仍保持沉默。

身着红袍的神父准备念玫瑰经。

“我的丈夫不是信徒。”

“上帝在他的慈悲里接纳所有的人。”

劳拉·迪亚斯扯下装饰在棺材盖上的十字架,还给了神父。

“我丈夫是反对教会的。”

“夫人,请不要侮慢我们。十字架是圣物。”

“拿着吧。十字架是折磨人的刑具,放个绞刑架或者是断头台的模型不是更好么?要是在法国,他们也许会把基督耶稣送上断头台的,知道吗?”一阵恐惧和抗议的低语在

儿子丹东的亲朋好友的队列中浮现，这使劳拉觉得心满意足。她知道自己做了些无需做的事，一种挑衅。她自然而然地做了出来。她无法阻止。她高兴这么做。她忽然觉得，这好像一种解脱的行动，某种新东西的开始。一切之后，她不过是一个孤单的女人，一个寡妇，无亲无靠，除了被劳拉·迪亚斯所厌恶的世界掳去的一个疏远的儿子？

人们或被轻蔑或被侮慢，渐渐离去；劳拉与惟一的一个亲切地望着她的人交换着目光。那是巴西略·巴塔萨尔。但在他俩交谈之前，一个矮小老迈的男人，瘦巴巴的好像一件洗坏了的套头衫，裹着一件过于肥大的斗篷，五官线条分明又带着时光消磨的印记，两耳上方白发组成的小道好像冰冻的牧场，递给她一封信，并用一种抵达岁月深处的声音对她说，读读吧，劳拉，是关于你丈夫的……

信上没有日期，却是用一种古老的教会体字迹写成的，比起和常人交流来说，更适于登记出生洗礼和葬礼，人生的始与终。那天晚上她读了这封信。

“亲爱的劳拉，我可以这样称呼您吗？您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就认识了您，尽管漫长的时光把我们分隔开，我对您的记忆依然鲜活。我知道您的丈夫胡安·弗朗西斯科带着他出身的种种秘密离开了人世，仿佛那是些无足轻重或令人羞耻的事。但是您有否发觉，他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死去的，隐姓埋名，无声无息？如果我现在请求您，您能否回想一下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您丈夫所过的生活？那样，我亲爱的劳拉，您也会处于和他相同的境地。您也没有什么可以讲述。您相信来到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生命中都有些不平凡的东西可以讲述吗？因为这个他们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不值得尊敬，有些时候也不值得爱吗？我写信给您，我亲爱的朋友，您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就认识了您，是为

了请求您不要再去猜想胡安·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格林在认识您和与您结婚之前是怎样的人,不要再用这种方法折磨自己。维拉克鲁斯罢工中的正义斗士,革命的红色旅的组织者,那广为人知的一切之前的他。那就是您丈夫的生活。那光荣、雄辩、无畏的二十年,那就是他的生活。在那段光辉岁月——如果您允许我这么说的话——之前或之后,他都没有别的生活。和您在一起他想寻找一个迟暮英雄的停泊港。他无声中要求的安宁您给了他吗?或者您在要求他已经无法给予的东西?一位疲惫的英雄,他已经度过了一生只有一次的光辉岁月。他来自远方,出身低微,劳拉。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小男孩,在马库斯帕那流浪,好像一只没有主人、没有家庭的小动物,当塔巴斯科为这穷人中最饥饿者提供的香蕉不够吃的时候,就到处偷摸来果腹。我收留了他。我给他衣服穿。我教他认字。您知道这在墨西哥很常见。年轻的神父教一个穷苦的孩子读书写字,他长大以后用学会的语言反对我们的圣母教会。胡亚雷斯如此,洛佩斯·格林也是如此。这个姓是从哪儿来的呢?既然他无父无母,连条向他叫的狗都没有,就像我们绝妙的俗语说的那样,'是听来的,神父……'洛佩斯是伊比利亚谱系中很常见的姓,格林在塔巴斯科的居民中用得很普遍,他们是殖民时代英国海盗的后裔,那时候亨利·摩根爵士正攻打坎佩切海湾沿岸,洗劫向西班牙输出墨西哥金银的各个港口。至于胡安,也是西班牙语中最常见的姓名。但弗朗西斯科,是因为我教导过他这位基督教最令人崇敬的圣徒,阿西西的男子的种种美德……哦,我亲爱的劳拉,圣弗朗西斯科抛弃了奢华享乐的生活,成了上帝的传道者。而我,您知道,在我身上发生了相反的事。信仰有些时候会变得软弱。没有疑惑就没有信仰。那时我还年轻,来到卡

特马哥接替一位深受爱戴的教区神父,您肯定还记得,赫苏斯·莫拉雷斯神父。我曾经在他面前做过几次忏悔。笼罩在莫拉雷斯神父头上圣洁的光环激怒了我。当时我还很年轻,充满了幻想,甚至还有些堕落。既然圣弗朗西斯科从罪恶走向了圣洁,我也要做同样的事,也许反其道而行,做一个堕落的教区神父,一个罪孽深重的人,那时候我什么可怕的事没在您的耳边说过,劳拉,却罔顾我主耶稣基督的大诫命,不可惊吓孩子们?我竟犯下如此滔天罪行,挟卷最穷苦的人们的财富,献给松戈里卡的圣婴的供品,逃离村子?相信我,劳拉,我犯罪是为了成为圣徒。这就是我的计划,我的堕落的圣弗朗西斯科主义,如果您愿意这么叫的话。我被撤销教职,这样便遇见了您,靠偷来的钱财苟且偷生,寄宿在您母亲——愿她安息在神的荣耀里,——哈拉帕的家中。您应该是向您丈夫提到过一些。他想起了我。他来找过我。他感谢我的教导。他知道我的罪行。他向我忏悔了他的罪行。他出卖了那个自称卡尔梅拉,参与刺杀当选总统阿尔瓦罗·奥夫雷贡的修女格罗丽亚·索里亚诺。他对我说他这么做是出于革命信念。当时的政策是消灭教权主义,后者在墨西哥剥削穷人并站在剥削者一边。他毫不迟疑地把她交了出去:那是他的义务。他从未想到您,劳拉,连信徒都不是,竟然会如此在意。多么奇怪却又多么糟糕。我们没有衡量自己行为的道德影响。我们认为要按意识形态行事,革命派的,教权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反对取缔教会的,却任那宝贵的液体从我们的指缝间流走,因为缺乏更好的词来命名,我们称之为灵魂。您对告发修女格罗丽亚·索里亚诺的强烈抗议使胡安·弗朗西斯科陷入了混乱并继之以沮丧。这成了他道路上的石碑。他已是穷途末路。他做了些荒唐事,比如雇人监视您。我向您保证,

他为自己的愚蠢后悔了。然而您知道，当了一次神父就永远是神父；就算是人家切开我双手的手指肚，我也不能不倾听和赦免。劳拉：胡安·弗朗西斯科向我忏悔告发了修女格罗丽亚·索里亚诺。这是他感激我的方式，我曾收养了这个赤脚、无知的孩子让他读书，您想想，那已经是六十八年前的事了。但他还做了一件事。他归还了松戈里卡的圣婴的财富。一天下午黄昏时分，当地人发现了那些珠宝和供品，他们曾经继承和积攒起来的一切都回到原处。您不知道这些是因为卡特马哥的消息只留在卡特马哥。全村人惊喜中将之归结为圣婴的神迹，重新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财富又把它放回它应当在的地方。这好像是在对他们说，'我让你们等待是为了使你们感到我的供品的空缺，这样一来当你们重新获得的时候便有更大的喜悦。'你哪儿来的钱来做这一切？我问胡安·弗朗西斯科。他告诉我，用的是工人们的会费。他们知道吗？不知道，我跟他们说是为了乌苏马辛达河决口引起的传染病的受害者。连个管账的人也没有。劳拉，希望你有一天回到家乡，看看那祭坛有多漂亮，这多亏了胡安·弗朗西斯科。劳拉，原谅那些人吧，他们除了说说掏心窝子的话再没有别的可给予了。就像在我家乡人们常说的，这个皮袋已经盛不下东西了，这位神父已经发不了圣饼了。我想我们不会再见面了，我不愿我们再见面。我费了很大努力才能在今天的葬礼上面对你。你没认出我真是太好了，妈的！连我也已经认不出自己了，哎！

请为我留一点点温情，埃尔泽维尔·阿尔蒙特

周末，巴西略·巴塔萨尔借了一辆车，两人一同前往奎尔纳瓦卡，劳拉和她的老友，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

第十九章　奎尔纳瓦卡:1952 年

劳拉一头扎进漂满九重葛的池子里,随后又从池边的水中探出头来。池子四周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先生女士在交谈着,其中大多是美国人。在这些人当中,只有少部分人身着泳装,绝大多数都穿着外衣:女士们穿着宽大的裙子和领部绣有花卉的墨西哥短袖衬衫,男士们穿着短袖衬衫和夏裤,几乎人人脚上都穿着墨西哥式简陋的皮凉鞋,手中都端着一杯酒,这些人全是英国著名共产主义者弗雷德里克·贝尔的客人,他在奎尔纳瓦卡的家已经成为在美国遭麦卡锡迫害的受害者的避难所。

贝尔的妻子鲁斯,是个美国人,她的矮短身材——走起路来好像拖拉着来自她的出生地芝加哥街区的根脉——弥补了她那瘦高挑儿的英国丈夫的讽刺意味。她属于那种生活在大湖泊、大草原上的妇女,却偶然地降生在被诗人卡尔·桑德伯格称为"自大男人们的城市"芝加哥到处铺满沥青的环境中。鲁斯的双肩轻浮地靠在自己的丈夫和丈夫的朋友身上,她是弗雷德里克的桑丘·潘萨。弗雷德里克是位高瘦的英国人,一双蓝眼睛,宽宽的前额,长着雀斑,脑袋上一圈稀疏的雪白头发。

"一位仕途失意的堂吉诃德。"巴西略·巴塔萨尔对劳拉说。

从站在草地上的赤脚到短短的已经花白的天然鬈发,

鲁斯显得像一枚钢骰子般坚强有力。

“几乎所有人都是电影导演和电影编剧，”巴西略继续说道，他正开车行驶在新开通的从墨西哥城到奎尔纳瓦卡的高速公路上，这条路使行程只需四十五分钟，“有一两个教师，但大部分都是演艺圈的人……”

“你救了自己，你属于少数人。”劳拉微笑着，头上系着一块手帕，用以阻挡 MG 敞篷车里的气流。流亡在墨西哥的共和派诗人加西亚·阿斯科特把这辆车借给了他的朋友巴西略。

“你以为我就是个教授，在瓦萨尔学院里给上流社会的美国小姐们讲西班牙文学？”巴西略一脸坏笑，他灵活地转过了公路的一个个弯道。

“在那里你认识了那些赤色分子？”

“不，我就是人们常说的兼职者，也就是说我有第二职业，每周末在纽约社会研究新校上班，但没有报酬。到那里上课的都是些劳动者，以前没读过书的成年人。就在那儿我认识了很多人，今天你就能认识他们。”

劳拉想请求巴西略一件事，请他不要带着怜悯对待她，请求他以一种平静无声的回忆来承担他们共同了解的过去，这些回忆带来的欢乐与痛苦，在他们身上已打下深深的烙印。

“你还是那么漂亮。”

“我已经过了五十岁，刚过。”

“但这里有比你小二十几岁的，她们都不穿连体式泳衣了。”

“我喜欢游泳，我生在湖边，长在海边。”

出于礼貌，人们不会盯着她看，但当劳拉一头扎进泳池，又从九重葛间探出头来，她看见那些美国佬赞许、好奇、

带着笑意的目光,这个周末这些人来到奎尔纳瓦卡,在赤色分子弗雷德里克·贝尔家中聚餐;劳拉看着这群人,这群在这个共同和特殊的时期集中到一起的人,就像是看一幅迭戈·里维拉的壁画或一部金·维多①的电影。劳拉欣赏着这一场景,她知道是同一样东西把这群人联系了起来,那就是迫害。但每个人又都保全了自我的个性,他们并不是个"群体",尽管他们都相信这个群体。在他们的眼神里,他们站立或端着酒杯或仰起下巴的姿势中,在她或他表现自己的方式里,都充满着骄傲。这一点给劳拉留下很深的印象,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受伤的自尊仍需时间来平复。这里是政治犯的康复中心。

劳拉以前对那些人的经历有一些了解。在公路上，巴西略给劳拉讲了更多的事情，那些人必须坚信自身的个性，因为麦卡锡的迫害要让他们变成一个群体，赤色团伙，头脑简单的共产主义分子，夺取他们的个性使他们成为敌人。

"您参加了在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的对迪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欢迎会吗?"

"参加了。"

"您知道他是为苏联作宣传的骨干分子吗?"

"我只知道他是位伟大的音乐家。"

"现在我们谈的不是音乐而是颠覆活动。"

"议员先生,您想说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能让听众变成共产党?"

"正是如此。我的爱国主义的信念告诉了我这一点。委员会认为,显然您不具备这种信念。"

---

① 金·维多(1894—1982),美国导演。作品有《大众》等。

“我和您一样都是美国人。”

“但您的心在莫斯科。”

(我很报歉,您不能再与我们共事,我们的公司不能卷入是非当中。)

“您在电视台编排了一部查理·卓别林的电影专集,是吗?”

“是的,卓别林是个伟大的喜剧艺术家。”

“您最好说他是个可怜的悲剧艺术家。他是共产党。”

“可能吧,但那与他的电影没有关系。”

“别傻了! 赤色思想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渗入电影。”

“可是,议员先生,这些是卓别林 1917 年前制作的默片。”

“1917 年发生了什么?”

“苏联革命。”

“啊,那么查理·卓别林不仅是共产党,他还在为苏联革命作准备,这就是您想说的,伪装成一部喜剧的叛乱宣传手册……”

(我们很遗憾,我们公司不能播放您制作的节目。如果您继续编排煽动电影,广告商威胁要取消对您的赞助。)

“您是或者曾经是共产党员吗?”

“是的,陪我一起到委员会报到并在战争中致残的十四位老战士也是或曾经是共产党员。”

“红色纵队,哈哈。”

“我们在太平洋为美国而战。”

“你们为苏联而战。”

“那时苏联是我们的盟友,议员先生,而我们只杀日本人。”

“战争已经结束了,你们应该去莫斯科生活,去那儿

享福。”

“我们是美国人，议员先生。”

“那就证明给我们看。请向委员会提供其他共产党的名单……”

（……在军队，在国家机关，尤其是在电影、广播、新生的电视界中，国会的“宗教裁判官”们热衷于调查一切电影界人士的事，热衷于与他们交往，热衷于与罗伯特·泰勒、加里·库珀、阿道夫·门鸠、罗纳德·里根，所有的那些告密者合影；或给劳伦·巴考尔、汉弗莱·博加特、弗雷德里克·马奇、莉莲·赫尔曼、阿瑟·米勒拍照，他们这些人有胆量揭发这些“宗教裁判官”……）

“这就是选择所在：夺取我们身上的个性让我们成为敌人或同谋者，成为替罪羊，成为告密者，这就是麦卡锡主义的罪行。”

劳拉的头从水中冒出来，看到水池四周的人群，想像着所有他们所能想到的事，一个小个子男人引起了她的注意，他肩膀削瘦，眼神忧郁，头发稀疏，精心修过的脸像是被擦抹过，仿佛他的五官每天早晨会都被剃刀削平，在一天里再慢慢恢复原状。他上身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黄褐色无袖衬衫，下身一条同样松垮、同样颜色的裤子，腰间系着一条蛇皮腰带，这些东西在热带市场上都能买到，那里一应俱全，脚上没有穿鞋，一双赤脚轻柔地拨弄着草地。

劳拉出来时禁不住盯着他看，尽管他并没有看她，他谁也不看……劳拉从水中出来了，所有人都故作无视年过半百的她那依然诱人的裸露的身体。高个子的劳拉有着棱角分明的面庞，自小就显露出高傲并具有挑战性的鼻梁，而不是儿童那种玫瑰花蕾般的小鼻子，自小就有那双近乎金黄色的眼睛，嵌在若有若无的眼晕中，对她来说年龄仿佛也是

若有若无的，尽管岁月流逝，她却能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常得到重生，她薄薄的嘴唇好像曼姆林[①]的圣母，仿佛从未有一位天使来探望过她，来把她的上唇割开，使记忆一出生就被遗忘。

“那是一个古老的犹太人传说，”鲁斯一边掺兑着一杯马蒂尼酒一边说道，“我们出生的时候，一位负剑天使会从上天下来，在我们鼻尖和上唇之间拍打几下，给我们造出这条难以解释的属于另一个世界的裂缝，”鲁斯用指甲一划，但不是划出一条虚拟的、如同头号共产党人卓别林的那种小胡子，“然后，根据传说，天使让我们忘记所有出生前的记忆，那段短暂的、子宫内的记忆，包括我们父母的隐秘和我们先辈的光荣。”“干杯！”那位“奎尔纳瓦卡部落伟大的母亲”用西班牙语说道，劳拉马上为她起了这么个名字，并笑着说给巴西略听。这位西班牙人也赞同她的叫法。劳拉无法让自己不这样想，尽管那些宾客不愿承认他们需要鲁斯。“谁不想要一位妈妈？”巴西略微笑着说，“尤其是每个周末都能为他们备上一大盘不见底的细面条。”

“迫害者们[②]出版了一份匿名告示，叫作‘红色渠道’。为了自我标榜，他们警觉地打着爱国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旗号。但如果没人揭发告密，他们和他们的宣传也不会大行其事。他们开始罗织罪名，大肆搜捕，有时他们定罪的理由相当可笑，比如听了场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会或看了场卓别林的电影之类。被红色渠道揭发只是一系列迫害的开

① 曼姆林(约1440—约1494)，文艺复兴时期佛兰德斯画派画家。为该画派中宗教感情最深者。

② 原文作“女巫猎手”，原指中世纪时以消灭女巫为名进行宗教迫害的人，此处指麦卡锡分子。

端，接下来是给雇用嫌疑犯的人发信，给受牵连的公司发威胁通知，给受害者打恐吓电话，直至由反美活动委员会在国会上传唤。”

“刚才你不是要给我讲一位母亲吗，巴西略……”

“你可以去问他们中任何人有关马迪·克里斯蒂安的事”。

“马迪·克里斯蒂安是一位奥地利演员，曾主演过一部非常有名的戏剧《怀念母亲》，”一位高个子戴着笨重的玳瑁眼镜的男人说，“她是纽约大学的戏剧教授，但她热衷保护政治犯和战争难民。”

“她曾给我们西班牙流亡者提供庇护，”巴西略回忆道，“因此我认识了她，她是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四十来岁，金发，有着北欧女神般的轮廓，眼神里仿佛在说：‘我不可战胜’”。

“她也保护过我们这些被纳粹驱逐出境的德国作家，”一位下巴方方，双眼无神的男人插话道。“她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保护在国外出生的人。这一切都是罪名，足以让红色渠道揭发她是苏联特务。”

“马迪·克里斯蒂安，”巴西略·巴塔萨尔甜蜜地微笑着，“她死前我见到过她。拒绝透露身分的侦探时常来拜访她，她还常接到匿名电话。公司不再给她角色演。有人敢叫她演片子，迫害者们就把事情搅黄。电视公司单方撤销合同，尽管答应说会给她支付工资。一个人怎么能带着这种恐惧、犹豫来生活？外国流亡者的保护者反而成为本国的流亡者，‘难以想像’，她最后在死于脑溢血前说了这样一句话，终年五十岁。埃尔默·赖斯，这位剧作家在马迪葬礼上说，她代表了美国的慷慨，但得到的是诽谤、迫害、失业和疾病。‘任何想唤醒麦卡锡主义分子良知的举动都丝毫不起

作用,因为他们缺乏良知。'"

弗雷德里克的房子汇集了许多往事,随着客人们的一个个退场,最早是巴西略,当这位无政府主义教授离开,回到瓦萨尔学院圣洁的世界中,只剩下劳拉一个人,她开始整理听到的故事,试图从这种受伤的、无谓的或紧迫的解释中剥离出真相,所有的真相。

说有许多种过去指的是有许多种由来。每个周末的宾客中,很多人旅居奎尔纳瓦卡,其中有些人明显是中欧犹太人——他们岁数最大,而且他们的妻子聚到一起,相互讲述着好像是历史但却是距今不超过五十年的往事。(美国历史就这么短暂,巴西略说),这些老夫妻笑着回忆起他们的出生地:往往是几个相邻的波兰村庄,或离匈牙利与贝萨拉比亚边境几英里的地方。

一位手颤动着,眼睛充满笑意的小老头给劳拉讲述道:"我们曾是裁缝、小商贩、小店主,因为是犹太人而受歧视。我们移居到美国,在纽约我们还是外国人,受歧视、被驱逐,于是我们去了加利福尼亚,那里只有阳光、大海、沙漠,整个大陆在加利福尼亚终止,劳拉小姐,我们全都去了那座以天使,许多天使命名的城市[①]。长翅膀的城市好像正等待着我们中欧犹太人去创造我们的财富,洛杉矶,正如我们女东道主鲁斯所讲的,一位天使从天而降,用剑切除了我们对不愿再继续的往昔的记忆。说真的,我们犹太人不仅创造了好莱坞,还把美国创造成了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我们做的美国梦比任何人都要美好,劳拉小姐,我们在这里种下的是好是坏,很快就能证实。我们让好的事物实现,让好的事物与清白结友,我们给美国这个英雄一位清白的未婚妻,我们

① 洛杉矶一名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天使",且为复数。

创造出一个伊甸园式的、乡村的、田园的、自由的美国，在那里，正义总是得到伸张，一切都像美国人曾经盼望的那样，或者更确切地说，像人们想在一面清白和善良的镜子中看到的那样，在那里面，爱与正义总是获胜。把这一切给予美国人民的是我们，被迫害的中欧犹太人，为什么人们现在还要迫害我们？我们是共产党分子？我们是理想主义分子？”

“放肆。”麦卡锡又一次对他咆哮。

“您，议员先生，您是赤色分子。”这个矮小、秃顶的男人说。

“证人犯了轻慢国会罪。”

“您，议员先生，受雇于莫斯科。”

“把证人拉出去。”

“您是克里姆林宫造就的最佳宣传机器，麦卡锡议员。”

“拉出去，强行拉出去！”

“您以为效仿斯大林就可以维护美国民主？您以为通过效仿敌人就可以维护民主？”哈利·杰夫大叫着，巴西略·巴塔萨尔叫他哈利·杰夫。他们是哈拉马前线上的同伴，比达尔，莫拉，哈利，巴西略和吉姆，他们是战友。

“安静，安静，证人犯轻慢罪。”麦卡锡用他那无赖的声音气急败坏地大叫，那张永远挂着轻蔑的微笑而歪斜的嘴，那刮过两个小时后就渐渐长出的胡子，那双被自己逼急的野兽的眼睛：乔·麦卡锡就像一头意识到自己是人的野兽，怀念他昔日的自由，他那林莽中动物的自由。

“华纳兄弟得承担一切罪责，”另一个老头插话道，“他们把政治带入电影，社会题材、失业、犯罪、失足少年、监狱暴力，每部电影告诉美国，你不再是清白的，你不再是田园的，你生活的城市充斥着贫困、剥削、有组织犯罪，从匪徒能摇身变成银行老板的罪犯。”

“就像布莱希特说过的，抢劫银行与成立银行哪个更糟糕？”

“我告诉你，”第一个老头回答道，他是劳拉的知己，“电影是一项集体工作，一位作家，无论多么精明，都无法拿L.B.梅耶[1]或杰克·华纳寻开心，去挂羊头卖狗肉，骗梅耶说，瞧，这是一部关于高尚的俄国农民的电影，可实际上是一首伪装了的共产主义颂歌；梅耶也不会轻信任何欺骗，因为一切都是他生产的，因此他最早告发他自己的合作人。这头披着羊皮的狼。这头狼开脱自己，因为他把羊羔交给屠夫，为使自己免受屠刀。让人愤怒的是麦卡锡吸食的是所有梅耶雇用的演员、作家的血，而不是梅耶本人的血。”

“报复是甜蜜的，西奥多……”

“相反，如果不是你去吸食自己所揭发的受害者的血，报复是苦涩的。报复是用出卖制成的苦汁，应该保持缄默，不能暗地里得意，而是在羞耻中生活。”

哈利·杰夫起身，点燃一枝香烟，离开了花园。劳拉·迪亚斯追踪着香烟那萤火虫亮光般的轨迹。一枝在漆黑花园中闪亮的骆驼牌香烟。

“我们都要为一部电影负责任，”这个叫西奥多的老制片人继续道，“保罗·穆尼不会因为主演了《刀疤脸》就要对阿尔·卡波内[2]负责，爱德华·阿诺德无需因为在《遇到约翰·多依》中表现了财阀政治的法西斯主义就要对此负责。所有人，从制片人到发行商，都要为我们的电影负责任。”

---

① 路易斯·伯特·梅耶(1885—1957)，美国电影制片人，好莱坞全盛时期驾驭美国电影业发展方向的“沙皇”之一。

② 一个著名的意裔美国强盗。

“羊泉村。我们都是羊泉村。[1]”巴西略·巴塔萨尔笑着说，一点不担心被惟一的美国人听懂。

“那么，”老制片人的妻子艾尔莎天真地说，“处理新政[2]时期的社会题材是一码事，赞扬战争时期的苏联又是另一码事，天晓得这样说是否有道理？”

“俄国是我们的盟友，我们这些流亡者都知道！”贝尔大声说，“应该对他们友善！”

“他们曾让我们发扬亲苏联精神，”鲁斯插话道，“罗斯福与丘吉尔曾请求我们这样做。”

“那么迟早有一天会有人敲你家的门，通知你到反美活动委员会报到，因为你把叼着烟斗，满脑子农民智慧，保护我们免受希特勒的迫害的斯大林演成了伟大的乔叔叔。”这位戴着深色玳瑁眼镜像个猫头鹰的高个子男人说。

“难道不是这样吗？”一位头发拳曲、杂乱地堆在脑顶形成一个高耸的天然冠发的小个子男人微笑着答道，“难道不是俄国人把我们从纳粹手中拯救出来吗？你还记得斯大林格勒吗？难道我们已经把斯大林格勒忘记了吗？”

“阿尔伯特，”这个高个子近视的男人回答，“我不会和你争论的。我总是支持与我志同道合、与我并肩作战的人，我们是一起被捕的，因为拒绝向麦卡锡委员会出卖自己的同志。”

一天晚上，在贝尔家蝉声一片的花园里，哈利对劳拉讲了许多，“那是一个时代。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但那个时

---

① 西班牙黄金世纪时期剧作家洛佩·德·维加（1562—1635）的戏剧《羊泉村》中，描写15世纪卡拉特拉瓦骑士团的一名队长在其领地羊泉村鱼肉百姓，村民们不堪忍受，奋起反抗，杀死了这名队长。事后村民统一口径，有人追查时都说是羊泉村干的。

② 指罗斯福新政。

代也有自己的光荣。”

“在我去西班牙前，我曾在黑色戏剧设计组与罗斯福的公共事业振兴署合作，后者引起了1935年哈勒姆的暴乱。不久，奥尔逊·威尔斯扮演了一位黑麦克白，这一角色引起争议，并遭到那位纽约时报戏剧评论家的强烈抨击，评论家在写下我对你讲的那些的一个星期后死于肺炎。这就是伏都教①，劳拉。”哈利笑着，并请求劳拉允许他叫她的教名。

“劳拉，就这样叫。”她说。

“哈利，哈利·杰夫。”

“我知道，巴西略跟我谈过您……谈过你。”

“还有吉姆，豪尔赫。”

“豪尔赫·莫拉给我讲过你们的那些历史。”

“要知道，永远无法了解全部历史。”哈利说，口气中混杂着抵触、忧郁和羞愧，劳拉想是这三种情绪的混合。

“哈利，你了解所有这段历史吗？”

“当然不，”这个男人尽力使脸色恢复平常，“一个作家从来不必了解历史的全部。他想像其中的一部分，并让自己的读者延续它。一本书不应该是封闭的，读者应该延续它。”

“不是去完成它而是去延续它？”

哈利头发稀疏的脑袋点了点，手没动但同样表示赞同劳拉的话。巴西略曾描述1937年哈拉马前线上的自己。他以斗鸡般的精神弥补了身体上的衰弱。哈利那时曾说，“我须要给自己弄一份简历来抵消我的公众情结。”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弥补了他所有的缺陷，他总爱争论——豪尔赫·莫拉回忆道——他通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著作，并能

① 源于非洲，流行于海地黑人中的一种原始宗教。

像背诵圣经一样复述，他总是用同一句话来结束他的祷文，“明天见”。斯大林的错误仅是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次事故。共产主义前途是光明的。西班牙时期的哈利年轻、冲动、文弱和优柔寡断——莫拉这样形容他——因为他不了解一个没有受过批评的政治信仰的脆弱性。

“我想挽救我的灵魂。”哈利在西班牙内战前线说。

“我想了解恐惧，”他形影不离的朋友吉姆说。“这位个子高得缺乏比例的纽约人当时与哈利一起，”莫拉微笑说，“组合成了经典的一对：堂吉诃德与桑丘·潘萨。”“或者穆特与杰夫[1]。”巴西略接话道，与好友莫拉一起笑起来。

“再见吧，领带。”吉姆与哈利一同说了这句话，那时候正值文森特·希恩与欧内斯特·海明威去报道战争，他们二人争论谁将有权写另外一个人的讣文。

这个穿着西装上衣打着领带的小个子犹太人。

如果哈利·杰夫十五年前讲的是准确的，那么这三个五年对于这个男人来说是三个世纪，他无法隐藏他的忧伤，也许他想隐藏这忧伤，可是这忧伤从他悠远的目光中，从他那悲伤抖动的双唇中，从他桀骜不驯的胡须中，从他那异乎寻常呆滞的双手中得以泄露出来，即使他尽量不表露自己的感情或真正的兴趣。哈利坐着，手支着身体，他把双手合成拳，用力支着下巴。哈利手上有被侮辱、被践踏的印迹，这是遭受麦卡锡主义暴虐留下的印迹。

“我们永远不会得胜，那种认为我们曾经在某个时候胜利过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哈利说，他的声音如尘土般冷静、客观，“存在过激情，这点完全正确，有许许多多的激情。对美国人而言，我们愿意信仰我们所做的并在做的过程中产

① 喜剧电影中的主人公，类似“胖子与瘦子”之类。

生激情。为什么不把兴趣、信仰、激情,类似克利福德·奥德茨的《摇篮摇》首映时的激动人心与你对每天发生的事——自发的罢工、暴动、警察的暴行、从背后被射杀的工人——大胆的、直接的看法联系起来?我们剧院取消对工人戏剧作品的赞助所引起的义愤怎么没能激发我们?我们的舞台布景被取消,布景员被解雇,后来呢?我们没有剧场。于是我们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把演出带到现场。带到钢铁厂,我们在工厂上演工人的剧目。"

哈利睁开双眼时流露的沮丧与合上双眼时流露的指责令劳拉难以面对,像平时那样,她盯着这个坐在花园小山丘的皮椅上的矮小而无助的男人,从小山丘上可以看到这座他的城市,奎尔纳瓦卡,就是在那儿,埃尔南·科尔特斯[①]下令修建一座被高耸的塔楼与大炮护卫着的石砌的王宫,用以避开这座被征服的阿兹特克城的高度的控制,这座阿兹特克城池先被夷为平地,又被科尔特斯下令建成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城市,一座呈直角形固若金汤的城市。

"如果科尔特斯重回他的王宫,看到在里维拉壁画上自己是个冷酷无情、目露凶光的征服者时,会有什么感觉?"

"迭戈画上白色的骏马,犹如甲胄般闪闪发光,从而弥补了上述不足。他不可避免地流露对史诗的敬仰。那是我们全体墨西哥人的史诗。"劳拉把手指靠到哈利的手指上。

"战后,我获得了一份小额奖学金,我去了意大利。同样乌切洛[②] 也画中世纪的战场。明天你带我去哪里继续了解奎尔纳瓦卡?"

---

① 埃尔南·科尔特斯(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

② 乌切洛(1397—1475),意大利画家,佛罗伦萨艺术大师,文艺复兴最初期的战争画家。

他们一起去了波尔达花园，在那里，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把自己的情趣寄托到那些隐秘、豪华、湿润的花园中，那里远离查布尔特佩克的王室建筑，远离妻子卡尔洛塔永不知足的欲望。

"大公不去碰他的妻子是因为不想把梅毒传染给她。"两人擦着在奎尔纳瓦卡的广场瓜乌纳瓦克喝啤酒留在嘴上的沫子，异口同声地笑着说。就在广场旁的几棵树下，劳拉·迪亚斯倾听着哈利·杰夫不时被调侃所冲淡的讲述，并试图深入到隐藏在故事深层的秘密当中。

"我年轻时代的文化是无线电广播文化，看不见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奥尔逊·威尔斯得以震惊世界，让人相信另一个威尔斯，H. G. 威尔斯[1] 的故事正在新泽西州真实地发生。"

劳拉笑个不停，要哈利听听墨西哥的"恰恰恰"，它来自于小酒馆中客人唱的一段小曲。

"水手们来啦
跳着'里卡恰'来啦"

"明白吗？"

剧团把被封杀的剧目带到故事现场，钢铁厂。厂方决定那天组织一次野餐。工人们宁愿过一天的乡间生活也不愿看一天政治剧。

"知道吗？当作品重新上演时，厂方老板把我们安排到群众中，灯光寻找着我们。突然，灯光找到了我们，发现了我，灯照在我的脸上，使我什么也看不见，但却使我说出了

---

① H. G. 威尔斯(1866—1946)，英国科幻作家。

‘我们需要正义’。这是我惟一一次当众讲演。然后灯熄灭了，我们回家去听广播中的看不到的事实。希特勒利用广播，罗斯福、丘吉尔也一样。如果是美国政府自己、美国军队请求我：‘这是美国之音，我们应该打败法西斯，苏联是我们的盟友，应该激励苏联斗争’，我能怎么办？反苏宣传吗？你想，劳拉，我在战争期间做了反共宣传，他们要把我当叛徒枪毙。而今天我不反苏了，我还要因为反美而被审判。我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

讲述这一切时，哈利没有笑。不久，到了吃晚饭时间，被宴请的一行十二人认真地听着老制片人西奥多重复他们犹太人移民到好莱坞的故事，犹太人在好莱坞的创业史，但这里最年轻的编剧——他从不松开领结——粗鲁地要老头闭嘴，并说，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问题，并以他的方式经受这一切，而他不会因为萧条、失业，不会因为那些为了希望轮上一碗热稀汤而排着长队的快冻僵的人就怀念故土。没有安全感，没有希望，只有共产主义，共产党。如果是党给予你惟一的安全，惟一的希望，怎能不汇聚到党的身边？怎能永远诋毁共产主义？

“否认我是共产党员就像否认我曾经年轻过。”

“可悲的是我们否认了我们自己。”另外一个食客说。这是个长相出众的男人(就像箭牌衬衫广告中的人物，哈利嘲讽地形容道)。

“你想说什么？”西奥多问。

“我们注定与成就无缘。”

“我们不一样，”老头子与他的妻子异口同声地嘟囔道，“艾尔莎和我，我们不一样。”

“我们都一样，”相貌英俊的男人再次说，他的白发很显眼，他也以此为骄傲，“共产党员都一样。取得成就是种罪，

无论如何是一种罪,并且是罪孽就要偿还。"

"在你身上是很好的印证。"老头笑着说。

"这就是问题所在,报应来了。我先是经商,但厌倦了。接着为婊子和公狗写电影剧本。然后,为补偿以前的生活,我开始放荡不羁,妓女们趴在我身上,我喝着比 Rin Tin Tin 还烈的低档威士忌,最后是恐慌。事实上我们没为共产主义做什么,我们做的是为了享乐和消遣。显而易见,报应来了。西奥多,因为是共产党而被人揭发和失去工作。麦卡锡是我们的死亡天使,我们无法逃脱。我们活该,妈的肮脏的告密者。"

"而那些不是共产党员的人,那些毫无理由被指控、被中伤的人呢?"

所有人都转过身看是谁在说话,但上述提问好像找不到来源,好像是幽灵说的话,这是凭空而落的声音,只有坐在哈利面前的劳拉注意到这位前西班牙战士曾想过这些问题,也许是他说的,但没有人注意,因为女主人鲁斯已改变了交谈的气氛,她一边端上一大堆不见底的糕点,一边唱道:

你要是一直这么盯着我
就会给我惹麻烦[1]

哈利说过广播是看不见的节目,激发人想像……那么戏剧是什么?

"以掌声结束的东西。"

---

① 原文为英文:You're gonna get me into trouble/ If you keep looking at me like that.

“那么电影呢?”

“是让我们得以存活的幽灵,是让我们得以延续的有声音和活动的画面。”

“为此你到好莱坞去写电影剧本?”

哈利回答“是”,但并没有看劳拉,他很难注视别人,其他所有人也避免看他,劳拉逐渐注意到这一现象,它如同一个奥秘般引人注目,如同广播节目一样无影无踪。

劳拉感觉她可能成为哈利注视的对象,因为她是新来的、纯真的,也不了解大家都知道的事。所有流亡者对待哈利礼节上是无可挑剔的。哈利每个周末都去巴西略家。每个星期天与其他流亡者一同用晚餐,但没有一个人看他。劳拉惊奇地发现,哈利讲话时一片沉默,没人听他讲话,因此显得跟没讲一样,因为没人听到他讲什么,只有劳拉,只有我,劳拉·迪亚斯,注意听,只有她倾听这个孤寂的男人讲话而无须开口回答。

在这之前,他能和谁说呢?奎尔纳瓦卡的自然风光,是那样的丰富多彩,尽管与劳拉·迪亚斯童年的维拉克鲁斯迥然不同。这是个变幻莫测的自然,散发着九重葛与马鞭草的气息,散发着刚切开的菠萝和破开淌着汁水的西瓜的清香,藏红花的芳香,但也有堆积在深沟中的垃圾与粪便的气味。这一切飘散在每个花果园、每个街区、每幢房子的周围……这位从曼哈顿到西班牙,从西班牙再到好莱坞,又从好莱坞来到墨西哥的朝圣者,这位小个子的纽约犹太人,他是在向这个大自然倾诉吗?

这次劳拉在自己的土地上反倒成了外国人,或许她就是这位出奇安静与孤寂的男人要倾诉的另一个女人,他不是高声而是悄声细语,随着他们成为朋友和从贝尔家的红色领地迁到波尔达花园的宁静中,武器广场的喧闹里,咖啡

的轻微或无意识的醉意中，马利克饭店的露天处，修道院深居简出的孤寂中，劳拉学会读懂这种唇间的低语声。

在那里，哈利让劳拉注意到上个世纪虔诚的壁画下面隐藏着另一幅画，但被某种原始、残忍和缺乏虔诚的宗教虚伪和恶习所掩盖了。

“你知道是什么吗，你知道吗？”劳拉毫不掩饰自己的好奇与惊诧。

“我知道，一位愤怒到极点的教士给我讲过。你在这里看到了什么？”

“圣心、圣母玛利亚、东方三王。”劳拉说道，但心里却想起埃尔泽维尔·阿尔蒙特神父与松戈里卡的圣婴的珍宝来。

“你知道下面有什么吗？”

“不知道。”

“是那位独一无二的墨西哥圣徒，圣费利佩·德赫苏斯的福音传播历程，他的母亲曾说：‘无花果盛开的日子，小费利佩将成为圣徒。’”

“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一位我非常喜欢的用人老桑帕亚就给我讲过那个故事。”

“费利佩 17 世纪远渡日本传播福音。就在这儿，被隐秘地画出那些可怕和恐惧的场面。波涛汹涌的大海，遇难沉没的船只，圣徒史诗般的、孤寂的布道，最后被不信教的人钉在十字架上。临终时刻痛苦而漫长。一部伟大的影片。”

“所有上述内容都被覆盖了，被怜悯，被谎言。”

“是一幅忏悔画吗，哈利？”

“不，这不是一幅悔悟的作品，而是事实完全地再现，是一次成功的模仿，依我看，这是一部影片。”

他第一次邀请劳拉到他租来的小屋，房子离广场不远，

隐藏在林子中。在奎尔纳瓦卡,只须往街那边走几米就可以发现这里的房子几乎都隐藏在靛蓝色的高墙下,像一块宁静的绿洲,那里的青苔、红色的屋顶、褐色的门墙与延伸到青黑色悬崖边的热带雨林相互掩映着……散发着潮湿的、林木腐烂的气味,哈利的房子有个花园,砖砌的露台,白天砖晒得滚烫,晚上又变得冰凉,屋顶上的屋檐破破烂烂,有个厨房,里面一动不动地坐着个沉默的老妇,手里拿着一柄芭蕉扇,还有间起居室,被帘子分割成两个独立的空间,显得颇为隐秘,床单精心地平铺开,仿佛如果哈利让床乱着就会受到惩罚似的。

屋里摆放着三个敞着口的箱子,装满了衣服、纸张和书,与精心铺整的床单形成鲜明对比。

"你为什么不把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

哈利没有马上回答她。

"为什么?"

"我随时可能会走。"

"你会去哪儿?"

"回家。"

"回你的家?好像你没有家,哈利,这就是你的家,你不知道吗?这就是你的家,你已经失去了其他的一切。"劳拉似怒非怒地叫道。

"不,劳拉,你不了解什么时候……"

"为什么不能坐下来工作?"

"我不知道干什么,劳拉,我在等。"

"去工作。"她口中说道,心里却想说"留下来"。

"我在等。某个时候。现在的某个时候。"

劳拉献身于哈利有许多理由,比如年龄,因为自从巴西略回瓦萨尔前与她告别的那一晚起,她就再没做过爱。劳

拉没理由要求他，巴塔萨尔也一样，那是一幕让人难受而又难忘的场面，是对豪尔赫·莫拉与皮拉尔·门德斯的纪念，只有她与他，劳拉与巴西略在场，凭着对不在身边的情人的柔情与尊敬，他们上演了这一幕，但他们之间这幕爱情戏是因对别人的爱而引发。它唤起了劳拉·迪亚斯一种欲望，这种欲望开始生长，一种情欲，她相信，如果这种欲望还没有丧失的话，也一定是被年龄，被内心的端庄、对死者的怀念和相信自己被两个圣地亚哥，被豪尔赫·莫拉和胡安·弗朗西斯科从某个隐秘的地方监视着的迷信想法所控制——这些死者或是已消失的人，生活在某个地域，在那里，他们惟一的任务就是监视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劳拉·迪亚斯。

“我不想做出任何不利于我自尊的举动。”

“自尊，劳拉？”

“自尊，哈利。”

此刻在奎尔纳瓦卡与哈利的相处唤起劳拉一种新的柔情。这种感情劳拉一开始讲不清楚，也许是从每周聚会上视线的追逐开始，没有人注视哈利，哈利也不看任何人，直到劳拉到来，两人四目相对，与豪尔赫·莫拉的爱情不也是这样开始，在迭戈·里维拉和弗里达·卡罗家举行的聚会上四目相交？但西班牙情人目光的力量与这位悲哀的、彷徨的、受伤的、被侮辱的、需要关怀的美国情人的软弱是多么不同，这种软弱不仅蕴含在他的眼中，也充满了他的身体。

劳拉先是搂住他，两个人坐在悬崖边小屋的床上，劳拉像搂住个婴儿一样搂住他，用一只手搂住他的背，另一只抓住他的手，几乎是喃喃地说着话，让他抬起头，看着自己，劳拉想看哈利·杰夫真实的目光，而不是他那副流亡者的、写着失败的、自怜的面具。

“让我来整理你箱子里的东西吧。”

“别给我婆婆妈妈的,操!”

他说得不错,劳拉对哈利就像对待一个软弱怯懦的孩子,她应该让他感到自己是个男子汉,哈利,我想点燃你最后的火焰。当你不再对成就、工作或政治,或其他人产生激情时,也许你无法拒绝的性,像精灵一样,隐藏着,戏谑着,你生命中惟一的这部分,哈利,也许还继续说“能”,或因为纯粹的兽性或因为你的灵魂,我的灵魂,除了性已不再有其他屏障,但它却被忽略了。

“有时我把性看作两个小矮人,从我们的双腿之间露出小鼻子,戏弄我们,挑逗我们,不让我们把他们从那充满了悲伤与喜悦的洞穴中拖出去扔掉。他们明知道不管自己怎样折磨我们,我们总要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小矮人们。”

他不想把性与任何东西作比较,他拒绝任何比喻。但性就在那里存在着,劳拉想像着的性,哈利已遗忘的性。一次热情的、迟到的、喧闹的、意外中两人同时说出、喊出的沉醉,就好像两个被关押很久的人走出监狱,就在牢房门口,在铁栏杆的两边,劳拉正等着哈利,哈利正等着劳拉。

“我的小宝贝,我的小宝贝。”

“我们明天见。”

“我是位富有的犹太老制片人,在这里只想分享那些遭受麦卡锡主义迫害的年轻犹太人的命运。”

“你知道吗,每天清晨到来时,我都会对自己说,这是我平静生活的最后一天。”

“当你听到有人敲门时,你不知道这是贼还是乞丐、警察、狼或是白蚁。”

“你怎么能够断定,一直自称是你的朋友并来拜访你的人不会变成你的揭发者呢?你怎么能知道?”

“我在奎尔纳瓦卡流亡,因为一想到要第二次接受审

讯,我就无法忍受。"

"还有比亲身经受迫害更残酷的东西,那就是在别人身上看到背叛。"

"劳拉,如何平复我们的痛苦与羞耻?"

"我的小宝贝,我的小宝贝。"

第二十章　特博斯特兰:1954 年

一

“我应该永远保持沉默。”

劳拉想带哈利去墨西哥城看病,他却想待在奎尔纳瓦卡,最后,两人相互妥协,到特博斯特兰住上一段时间。劳拉想着那地方的美丽和清幽,一个广阔的亚热带山谷,但被金字塔般雄伟的高山包围着,巨石林立犹如刀劈斧砍,四周没有缓坡或小丘,陡然而立,气势凌人,仿佛矗立着的巨大石墙,保护着这片生长着甘蔗、欧石南、稻米和橙树的土地。这里将会是两人的世外桃源。也许哈利会重新开始写作,而她会照料哈利,这是她扮演的角色。劳拉不假思索就担当了这个角色。在过去两年中他们之间所建立起来的纽带是牢不可破的,他们俩都相互需要对方……

远离了奎尔纳瓦卡那些反复无休的哀伤,特博斯特兰会使她柔弱的、心爱的哈利恢复健康。他们租的小屋被两座庞然大物防护着,同时也笼罩在它们的阴影中:一座是山,另一座是宏伟的教堂——为与大自然媲美,多明我会的修士们建造的寺院和堡垒。这类建筑在墨西哥很常见。哈利总是让她注意这种情况:在墨西哥建造出能与大自然景观相媲美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有着山川、深渊、荒漠一样

的规模。而特博斯特兰的小屋与世无争，所以劳拉·迪亚斯选择了它，就凭它裸露土坯的朴素，小屋面朝着一条没有铺砖的土路，在路上走着的懒洋洋的野狗比人还多。房子的内部却又展现出墨西哥人的另一项才能：把人从一个贫瘠、脏乱的地方带进一块美丽的绿洲，绿油油的植物、清澈的泉水，宁静的院落和阴凉的长廊，长廊好像来自远方，没有尽头。

他们只有一间卧室，里面摆放着一张年代久远的破床，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墙壁上镶嵌着些易碎的瓷砖，有一间像劳拉小时候家里那样的厨房，没有电器，只有一个需用扇子助燃的煤炉和一台小冰箱，用来冰镇送货员每天送来的哈利最喜爱的双 X 牌啤酒。这里每天的生活都以小院为中心，院里摆放着几把藤椅和一张铺着皮革的桌子，桌面软软的，布满了一圈圈啤酒瓶底印上去的污渍，很难在上面写作，本子和笔摆放在卧室的抽屉里。哈利重新开始写作时，劳拉就会偷偷地翻看写在粗劣的学生作业本上的东西，纸上飞溅着哈利用的艾斯特布罗克牌墨水的痕迹。他知道劳拉看他的东西，劳拉也明白他知道，但两人彼此心照不宣。

雅各布·胡里奥·加芬克莱，这是他的原名，我们一起在纽约长大。如果你是个曼哈顿东南区的犹太青年，除了长着眼睛、鼻子、嘴巴、耳朵、脚和手，还有一样我们特有的东西：一片在肩膀上的石屑。你向外人挑战(要是你生在一个像我们一样的街区，谁不算外人呢)，要他猛地一巴掌或轻柔地弹指一挥去掉你肩上的石屑，我们明知这片石屑不是后放的而是与生俱有的。这是我们受辱的、贫穷的，外来意大利、爱尔兰、犹太(不管是波兰籍、俄罗斯籍或乌克兰籍，但都是犹太人)移民身上所特有的赘生物，如果我们脱光了衣服洗澡或做爱或赤身睡觉时可以更清楚地看见它。即使

我们穿上衣服,肩上石屑的棱角也会磨破衬衫或上衣呈现出来,对人说:你有种就来烦我!辱骂我!打我!羞辱我!你就来吧!我从小就认识他,雅各布·胡里奥·加芬克莱,他肩上的石屑比任何人的都大。他矮矮的个子,黝黑的皮肤,是个长着罗马式鼻子的犹太人,嘴角挂着微笑,但透出一种冷酷、戏谑、危险的神情。他的眼神、斗鸡般的架势、连珠炮般的讲话和长期保持的警惕中也流露出这种神情,因为在任何街角或门背后随时会发生挑衅;厄运会从屋顶露台上,在酒吧门口,在河边腐朽不堪的码头边上……随时降临。胡里奥·加芬克莱把发生在纽约邪恶的街头,黑暗的地下管道里的一切都搬上了舞台,他的表演毫无掩饰,容易招人责难,但他以大无畏的勇气,挺身而出维护所有那些与他一样,身居"西方文明"中的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永远存在的犹太人聚居区的人。我是在剧院认识他的。他主演克利福德·奥德茨①的作品《金色少年》,一位青年小提琴家,他用自己的才能去换取了角斗场上的成就,他失去了双手,失去了手指,失去了拳头,无法去攻击乔·刘易斯(也是犹太人)和费利克斯·门德尔松(是个黑人)。他到处签名,只要有人对他说,胡里奥,犹太人、黑人、墨西哥人、共产党人、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穷人的小孩、新几内亚的盘尾丝虫病人正遭受着不公正待遇,胡里奥就会签名。他什么都签。他签的字有力、曲折、饱满。他的签名既是爱抚又是拳击,既是汗水又是眼泪。这就是我的朋友胡里奥·加芬克莱。他在格罗普剧院成名后,被人带进了好莱坞,那时的胡里奥始终不改那街头的堂吉诃德本性。他表现自我,使观众为之

---

① 克利福德·奥德茨(1906—1963),美国剧作家。20世纪30年代社会抗议派戏剧代表人物。

倾倒。他既不英俊,也不潇洒,既无礼貌,也欠幽默。他不是加利·格兰特或加利·库珀,他是约翰·加菲尔德,纽约贫民街区的好斗少年,在贝弗利山庄重新投胎,他脚穿沾满烂泥的鞋子踏进玫瑰环绕的豪宅,把肮脏的双脚伸进清澈见底的游泳池。因此他最好的角色是在《诙谐曲》中和琼·克劳馥配戏。正如在事业初期一样,他再次扮演那个具有小提琴天赋的贫民少年。而她与他相仿,看似一位有钱的贵妇,成为这座小城市中这天才少年的保护者,实际上也和他一样卑微,和他一样出身于社会底层,却装得富有、高贵、优雅来掩饰同样是来自于街头的事实,也曾是一个指甲尖利、屁股柔软且野心勃勃的街头女孩。因此他们是显眼的一对。他们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琼·克劳馥与约翰·加菲尔德,她处处掩饰,他却不然。当麦卡锡主义的潮流从美利坚的管道中涌出时,胡里奥·加芬克莱成了国会调查的最佳人选。他反美,可疑,黑肤色,是外来人,有犹太血统。此外,没有任何犯罪行为。这些对于麦卡锡是最主要的:吓住那些无辜的人。他没有任何过失,但却被指控犯有一切罪行:在莫斯科的大清洗期间签名支持斯大林;大战期间寻求第二阵线;是地下共产党员,用好莱坞支付给他的,也是热爱祖国的美国人民的钱支援共产党,表白自己支持穷人和无产者(后者足以使他成为可疑分子,要是他曾向有钱有势的人要求公正,那就更可疑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在曼哈顿的寓所乱得一塌糊涂,抽屉大开,纸张散乱。绝望的妻子像看疯子般地望着他。而胡里奥·加芬克莱埋头在支票本、公文包、文件柜,在旧书或破包中,寻找人们指控他的支票证据,叫嚷着:“为什么他们不让我安生?”他有胆量,但犯了一个错误,他接受了国会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发给自认为是被诬告者的邀请,对于该委员会来说,到那里

去本身就是犯罪的证据。接着,好莱坞的极端反动分子,罗纳德·里根、阿道夫·门鸠和金格·罗杰斯的母亲,都跳出来证实这种怀疑。国会里的人随后把消息传给好莱坞散布流言的专栏作家们。赫达·霍珀、沃尔特·温切尔、乔治·索科尔斯基,所有这些人以无辜牺牲者的鲜血为生,都是笔墨强盗。委员会马上鼓动其经验丰富的爪牙去警戒和纠察,阻止公众观看有约翰·加菲尔德这类嫌疑犯出演的电影。这样电影制片厂就会重复委员会对加菲尔德说的话:“你是个危险分子,你使制片厂的安全受到了威胁。”于是制片厂解雇了他,并对他说:“胡里奥,去请求原谅,老实交待,就没事了。”“列出名单,胡里奥,否则你就没有出路了。”于是这个来自纽约贫民区的街头少年重新变得一无所有,木讷笨拙。他紧紧握着拳头,以沙哑的声音抗争:“只有白痴才会理睬麦卡锡一类白痴的进攻。”“你认为像罗纳德·里根那种可怜虫说的东西能使我屈服吗?让我继续相信我的人性,哈利,让我继续相信我是有灵魂的……”好莱坞方面先是对他说,我们无法保护你;随后又说,我们不能再雇用你了;最后告诉他,我们将出示对你不利的证据,公司和制片厂是第一位的。“胡里奥,要知道,你只是一个人,我们却雇用了上千人,你想让这些人饿死吗?”胡里奥·加芬克莱三十九岁时死于心脏病突发,可能这是真的。他压力很大,心理紧张,心脏随时会爆裂。但事实上,人们发现他死于许多情妇之一的床上。我坚持认为约翰·加菲尔德是在偷情时死掉的,并且这样的死是令人羡慕的。当人们安葬他时,一位犹太教士说,胡里奥像流星一样降临,又像流星一样离去。亚伯拉罕·波伦斯基,这位曾经执导过胡里奥最后几部电影之一,也许是最伟大的电影《邪恶的力量》的导演说:“胡里奥维护他街头青年的荣誉,那些人因此杀了他。”那些人杀了他。

他死了。上万人来到他的灵柩边为他送行。共产党人？斯大林派来的特工？克利福德·奥德茨在那里哭泣，这位“金色少年”的作者、左派文学的骄傲，已经沦为国会委员会的告密者，先是告发死去的人，因为他认为不可能伤害死者；接着告发了活着的人以保全自己；然后又告发了自己，正像一批人所说：“我只指证以前被指证过的人的名字。”当奥德茨哭着离开约翰·加菲尔德的葬礼时，被人用拳头暴打了一顿。直到最后，雅各布·胡里奥·加芬克莱仍在纽约的大街小巷以打斗过活。

夏日的雨水浸泡着花园，渗入房子的墙壁里，在土坯墙皮上留下黑色的圆形印迹。这时，哈利·杰夫感到窒息，他请求劳拉·迪亚斯帮帮忙，念一念关于约翰·加芬克莱的稿子。

“但是也有人被传讯却既不出卖别人，也不痛苦或消沉，不是吗，哈利？”

“你过去在奎尔纳瓦卡认识了他们，有几个属于好莱坞十人案中的人，的确，他们敢于沉默也未被吓倒，尤其他们拥有不自寻烦恼、不自杀或不走向死亡的勇气。因此他们更是典型，对不对？在格罗普剧院我的另一位同志，一个男演员J.爱德华·布朗伯格，以心脏病发作为由，请求委员会原谅他不能出庭。最恶劣的法官之一，国会议员弗朗西斯·E.沃克对他说，共产党人善于用自己医生签字的假条作借口，这些医生毫无疑问，至少是赤色分子的同情者。埃迪·布朗伯格今年刚刚在伦敦逝世；劳拉，在他上了好莱坞黑名单之后，有几次他打电话对我说：‘哈利，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有几个家伙轮班站在我家门前，而且总有两个家伙很显眼地站在路灯下，我看见他们在窥视我，在等电话。我再也

不能远离电话机。哈利,他们可能再把我叫到委员会去对我说,他们许诺给我的角色已给别人了;或与此相反,许诺给我一个电影角色,条件是与他们合作,也就是说,揭发别人。哈利,这种事每天发生五六次。我每天待在电话机旁度日,心如刀绞,思考着我该不该揭发,我该不该考虑自己,我该不该顾忌自己的妻儿。最后我每次都是说不。我不会去揭发,哈利,不,我不想伤害任何人。哈利,我尤其不想伤害我自己,我对同志的忠诚,就是对我自己的忠诚,我救不了他们,也救不了我自己……'"

"那么你呢,哈利,你会写自己吗?"

"我感觉非常不舒服。劳拉,给我一杯啤酒。啤酒会让我好受些。"

又是一个清晨,鹦鹉在阳光下叽叽喳喳地叫着,舒展它们的冠羽和翅膀,仿佛在发布信息,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消息。在吃早饭时,哈利回答了劳拉的问题。

"你只给我讲了那些由于不揭发别人而被毁灭的人,但你曾告诉我,另外一些人由于闭紧嘴巴而获得自保,坚强地活着。"劳拉坚持道。

"如果没有罪人怎么会有无辜者?"哈利说,"这是多尔顿·特朗博在麦卡锡主义分子开始他们的迫害行动时所说的话。在此期间,特朗博戏弄了这些法官,他用假名撰写了些电影剧本,还用假名得了奥斯卡奖。当特朗博披露作者是他时,评奖委员会被他的胆量吓得屁滚尿流。劳拉,当这一切都结束时,我怀疑就是特朗博本人说的下面这句话:没有英雄,也没有懦夫;没有圣徒,也没有魔鬼,只有受害者。总有一天,所有被告将被平反,并将像文化界的英雄一样受到欢迎,而原告将成为被告,受到应得的贬黜。特朗博讲的有道理,我们都是受害者。"

“哈利,难道那些‘宗教裁判官’也是受害者吗?”

“是的,连他们的子孙都会因为不想承认自己是这种平庸者的后代而改名换姓,这种人给成百上千的无辜者带来贫苦、疾病甚至逼他们自杀。”

“哈利,难道也包括告密者?”

“他们是受害最深的人,他们的前额上烙着该隐的标志。”

哈利拿起一把水果刀,在前额上一划。

劳拉惊恐地看着他,但没有阻止他这样做。

“他们应该砍去自己的手和割去自己的舌头。”

哈利把刀伸进口中,劳拉叫了起来,阻止了他,从他手中夺下刀,呜咽着抱住了他。

“他们被判处流亡和死刑。”哈利在劳拉耳边以细小的声音说道。

很快,劳拉学会读懂哈利的思想,哈利也学会理解劳拉的思想。热带特有的声音犹如波涛般回响,这给他们的交流带来了帮助。劳拉从小在维拉克鲁斯就了解这种回响,进城后已经把它遗忘了,城里的噪音是偶然的、突发的、意外的、刺耳的,就像两个指甲抓搔着学校的黑板。相反,在热带,鸟儿们的啼鸣宣告天明;它们的飞回则预示黄昏的到来。早祷与晚祷的钟声融汇在自然中,天芥菜菜地散发出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我们不时地感觉到它。收割好的一捆捆天芥菜散发出最初的香气,以及经提炼后放在食橱里的香气。当哈利往牧场自产的早餐鸡蛋中撒胡椒时,劳拉正瞧着花园里盛开的胡椒花,黄宝石般的花瓣嵌入那脆弱的、薄薄的、昏黄色的花冠中。热带的生活没有一刻停歇。她从花园走回桌边,先是踩死屋里的蝎子,接着又预防性地在花园中,在石头下搜寻着蝎子。它们是白色的昆虫,哈利

笑着踩着蝎子。

“我妻子曾经让我常去晒太阳。你的肚皮白得就像煎炸前的鱼柳。这些蝎子也是这样白。”

“海鲷的肚子。”劳拉笑着说。

“‘放弃这些吧，’她跟我这样说，‘那不是你的事，你别信这些，你的朋友们不值得你这样。’接下来又是老一套，‘你的问题不在于你是共产党人，而在于你失去了写作才能，哈利。’”

无论如何，他最终坐下来写作，万事俱备，就只差动笔了。在特博斯特兰，他开始非常有规律地写作，一开始写些受害者的人物小传，如加菲尔德、布朗伯格，这些人都曾是他的朋友。为什么哈利不写他的敌人，那些“宗教裁判官”？为什么他只写遭受迫害，饱受创伤的受害者，如加菲尔德和布朗伯格，而不写那些得以保全的人？那些人战胜不幸，没有哭泣，他们战斗着，坚持着，还嘲弄了整个事件的天大愚昧。多尔顿·特朗博、艾伯特·迈尔兹、赫伯特·毕伯曼等等……那些到墨西哥来逗留在奎尔纳瓦卡或在那里定居的人呢？为什么哈利·杰夫甚至没有谈到过他们？为什么不把他们写入在特博斯特兰的传记中？尤其是为什么从不触及最卑劣的人，如爱德华·德米特里克，伊莱亚·卡赞、李·J.科布、克利福德·奥德茨和拉里·帕克斯，那些确实出卖过别人的人，那些确实指证过他人的人呢？

哈利一脚踩死了只蝎子。

“有毒的昆虫总是待在充满敌意的地方，住在好像没有生命的地方。汤姆·潘恩在形容偏见时说过这句话。”

劳拉尽力想像哈利所想的一切，所有那些哈利没有和她说过但在他狂热的目光中闪过的事情。她不知道哈利也在作同样的思考。他认为读懂了劳拉的思想。每天早上她

在镜前梳妆时,他就从床上看着她。他将两年前结识的从长着九重葛的水池中冒出来的仍然年轻的女人与现在已经五十六岁的女人进行比较。现在她的头发日渐花白,花白的长发在后颈纯朴地挽成一个髻,额头亮光光的,五官棱角分明,精巧的鼻子,高高的鼻梁,有着哥特式的薄嘴唇。所有这一切都被黑眼眶下衬托的浅黄眼睛的光泽和睿智所弥补。

他还在一些家庭琐事中注视她:收拾厨房、理床叠被、擦洗家什、炒菜做饭、花很长时间洗澡、坐在马桶上,不再使用卫生巾,忍受酷热,像胎儿一样蜷缩着睡觉。而他,哈利,像木板一样直挺挺地躺着,直到天亮。难以解释的是,天亮时,两人的姿势颠倒了过来,他像个胎儿一样卧着,她却直直地挺着,两人就像是孩子与他的保姆……

他对自己说,一离开夜里情人温柔的双臂,马上去照镜子的时候,就会想她所想:一样东西是身体,另一样东西是美丽……相互拥抱、相互爱抚是多么热烈、多么温柔,尤其是多么有益健康啊!挽救爱情是要忘掉自己的身体,与对方的身体融为一体,让对方的身体也吸住我的身体,不再考虑美丽与否,不再单独注视对方,而是要闭着眼睛,融合在一起,只有抚摸,只有愉悦。用不着识别是丑还是美,美与丑这两者在黑夜里,在亲密的拥抱中已毫无意义。这时两个身体相互融合,不再关注自己身外之事,除了与自己做爱的伴侣,不再顾及别的事物,直至两人化作一体,丢弃所有美丽与丑陋、年轻与年老的观念……想着劳拉对他说过的话,哈利自言自语:我只看重你身上的内在美……

他明显地日渐憔悴,“苍白得像海鲷的肚皮”,如同劳拉说的,不是显眼的光头,而是在脑顶突兀地长有几绺稀疏的头发,抵挡着应有的完全谢顶。在脑顶上、耳朵上方、干瘦

的后颈上的头发,犹如干旱牧场上长的嫩芽。苍老在劳拉身上则体现得不明显。劳拉·迪亚斯的美丽是明明白白的,哈利想说,像是一种古典美,不仅仅是一种从希腊时代就赋予的美的概念,也许还是另一种美的概念,阿兹特克女神般的美丽,仿佛阿兹特克神话中的死神,而不是美神维纳斯。

“劳拉,苏格拉底是一个相貌丑陋的人,他每天晚上祈祷希望能看到自己的内在美。这是神赐的天赋:思想、想像力,那就是苏格拉底的美之所在。”

“他不想其他人也看见这种内在美吗?”

“我认为他的演说是一个爱好虚荣者的演说。他虚荣到宁愿喝毒汁也不愿承认自己有错。他没有错。他坚持己见。”

人们总是以谈论同样的东西而告终,但从来没有触及到“同样东西”的实质。苏格拉底宁死也不愿反悔。麦卡锡的受害者也是这样。麦卡锡主义的告密者却相反。这时,哈利看着镜中的她,暗想她是否也同样看着他,这是一具逐渐失去美的外在躯体,或许也是一具逐渐获得另一类美感的内在躯体。只有在做爱中,只有在肉体结合时,这种提问不再有意义。躯体逐渐消失,只留下快感,这种快感超过任何可能的美感。

相反,劳拉好像并没有这样审视他。她一如既往地接受他,但他感到自己变得令人不高兴,冲动得想对她说:“为什么你不染染头发,为什么你不换个发型?为什么丢弃了自己所有的风情?”他看着我仿佛我是他的护士,他的保姆,期望我变成一条美人鱼。但我可怜的奥德修斯精神恍惚,呆若木鸡,整日在烟灰的海洋中消耗自己,被烟熏得窒息,逐渐淹没在他那每天四盒骆驼牌香烟或五盒不带过滤嘴的罗利牌香烟的迷雾里,前一种香烟弗雷德里克·贝尔送了他

一箱,而后一种,哈利说有股香皂味。他坚持认为那种气味也许是街角小店沾染的。

"有时最好的往往是惟一的,但在这儿,惟一的却总是最糟糕的。"

他们去逛星期六的集市。哈利决定买株"生命树",劳拉没有理由反对他买这东西,但她还是这样做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反对。"事后她想着。随后,两人整整一个星期没有讲话,实际上,那件泥塑的五颜六色的烛台并不难看,也没有碍着谁,但也并不像哈利说得那样带有民间细腻和夸张的新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对他说,这些东西粗俗不堪,虚有其表,只有老外才买,为什么你不买些浅玫瑰色的木偶或五光十色的接球玩具,或者干脆为自己买条毛料披风或为我买件披巾?傍晚时分,我们挤坐在一起,抵御着一股从山上突如其来的寒流,身上裹着墨西哥传统衣服。你想这样来贬低我吗?他在我对镜梳妆时盯着我,让我想他所想:她老了,不注意打扮了,马上就五十七岁了,已不需要卫生巾了,对他来说这还不够吗?此外,他还想让我在家中放满旅游垃圾,像"生命树"、接球玩具、集市上的木偶?为什么你不干脆为自己买把砍刀?哈利,那种刀背上刻有诙谐的铭文的砍刀,"我就像那又辣又鲜的绿辣椒",买了刀下次你想割掉自己的指头或舌头时,就可以做了。那样你可以自我安慰,安慰自己曾经是这样的人或并不是这样的人,安慰自己现在是这样的人或本来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哈利已没有力气打劳拉了。当她把"生命树"扔到砖砌台阶上摔成碎片,哈利向她扬起手时,劳拉反而对他产生怜悯。第二天,劳拉去打扫撒了一地的碎片,把它们扔进垃圾箱。但仅仅一个星期后,她独自一人去了市场,把一棵崭新的"生命树"放在两人每天吃饭用的餐桌和藤椅前的墙壁托

架上。

劳拉想用这一切冲淡她对五颜六色的天使、水果、树叶和树干造型无法解释的厌恶，她渴望呼吸花园里树叶的清香，观看打在芭蕉叶上雨水的光彩，以及回忆记忆深处的东西：绿叶成阴的咖啡树，星罗棋布的柠檬和柑橘林、无花果、红百合的果园，芒果树浑圆的树冠，能抗拒干旱和飓风的开有小黄花的雷鸣树，在卡特马哥生长的各种鲜花……还有在森林边缘的木棉，它周身布满钉子——这是木棉长出的尖刺用来保护自己。树干上刀剑丛生以自卫，不让任何人靠近。路的尽头长着一株木棉，它周身的尖刺已被一个去维拉克鲁斯的路人用利刃砍断。

每当夜幕降临，两人并排坐在花园里，谈论着每天的生活琐事，市场上的食品价格，明天的菜谱，美国杂志送到特博斯特兰的延误（如果能送到的话），奎尔纳瓦卡团体的深情厚意：给他们送来剪报，一直送剪报，从不送报纸或杂志，以及短波收音机中播放的祝福语，讨论去不去奎尔纳瓦卡的奥坎波电影院看西部牛仔片或看场让劳拉笑和让哈利流泪的墨西哥情景剧。但他们从不提起去贝尔家做客，哈利称之为亚里士多德派的学院。他讨厌那里的辩论，那永无休止犹如一场三幕悲喜剧般的辩论。

“第一幕是真理。引领我们认识共产主义并同情左派的信念，工人阶级的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对苏联作为第一个工人阶级和革命国家的信仰。我们用这种信仰来反驳美国资本主义的萧条、失业和败落的现实。”

花园里飞着萤火虫，但它们的亮光远没有哈利断断续续点烟发出的亮光多。他用上一根烟蒂点燃下一根香烟，没完没了地抽着烟。

“第二幕是英雄气概。先是对美国经济萧条的斗争，而

后是对法西斯主义开战。"

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了他的辩论,这阵咳嗽是那样强烈,那样有力,似乎不是哈利这副日益消瘦和苍白的躯体发出的,因为他的胸腔中已无力包容一场如此强烈的风暴。

"第三幕是有着崇高信仰的男女、共产党员或单纯的人文主义者的被害。麦卡锡与斯大林的警察头子贝利亚或希特勒的爪牙希姆莱是一类人。麦卡锡主义者们在政治野心和捞取实惠的心理驱使下,在战争结束、冷战开始之际,加入到反共大合唱中。冷静地算计着如何败坏别人的名声以攫取权力。告密、苦闷、死亡……最后是尾声。"哈利摊开双手,展开手掌,手指都泛黄。他耸着肩头,轻轻地咳嗽着。

正是她曾经说过,对他也对自己说,尽管不知道应以什么顺序,什么方式更好地向哈利表达,尾声必须是思考,用智慧的力量来理解曾经发生过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为什么我们在美国的表现与在俄国一样?为什么我们变得和我们说要与之斗争的东西一样?为什么会出现贝利亚和麦卡锡之流?"

劳拉倾听着哈利讲话,但她想告诉他,政治的三幕剧和尾声永远不会这样演,这样井然有序,这样遵循亚里士多德的戏剧模式,——哈利用这样嘲弄的口气形容奎尔纳瓦卡的"学院",——那应该是错综复杂的,其中夹杂着有理和无理,希望和失望,肯定和批判,同情和蔑视,这一点两人都知道。

"但愿我能再回到西班牙的那段时光,并留驻在那里。"哈利常对她说。他突然转向劳拉,强烈地,用他那一次比一次衰弱但却一次比一次更加沙哑的声音继续道,"为什么你不抛弃我,为什么还跟我在一起?"

这是试探的时刻,是她犹豫不决的时刻。她可以收拾

好行李离开，这是可能的。她可以留下忍受一切，这也是可能的。但她既没有一走了之，也没有被动地留下来。她理解哈利，她一次又一次下着同样的决心：我要留下来，我要做点贡献，我不仅要照顾他，不仅要给他勇气，还要尽力理解他，了解他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能知道那个充满丑闻的时代中发生的一切事情，但却不了解他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不对我——我爱着他，不对我讲他自己的故事，为什么……？

好像他看穿了劳拉的心思，像所有因为情感而不是因习惯而走到一起的情侣那样，我们相互猜透对方。哈利，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种故作姿态的漫不经心，一个被侵入的梦——就像做爱时相互进入对方身体那样——就足以使自己知道另一半在想什么：你在思念西班牙，你在思念吉姆，你在想他那样年轻就死了，使他自己得到了解脱，没有机会成为历史的牺牲品，而是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后者是高尚的，是英勇的。但是成为历史的牺牲品，不能预见，没有及时避开历史的打击，或当遭到打击时没有坚定地承担打击，这些是悲惨的，也是可怕的，哈利。

“一切都已成为一场闹剧，一个错误……”

“我爱你，哈利，这不是一个闹剧，也不是一个错误……”

“为什么我一定要相信你？”

“我没有欺骗你。”

“所有人都欺骗我。”

“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所有人。”

“为什么你不对我讲讲？”

“那为什么你不亲自去调查一下？”

“不,我不会背着你干任何事。”

“别傻了,我准许你,去吧,回奎尔纳瓦卡,向他们打听我,告诉他们我允许你这样做,让他们告诉你事实。”

“事实? 哈利。”

(事实是我爱你,哈利,我以一种不同于那时我爱我丈夫、爱奥兰多·希门内斯或豪尔赫·莫拉的方式爱你。我像爱他们一样爱着你。像一个同男人生活、上床的女人一样爱着你。但同你在一起是不同的,哈利,除了我像爱那些男人一样爱着你,我还像我爱我的哥哥大圣地亚哥和我的儿子小圣地亚哥一样爱你。哈利,我爱你就像对我死去的哥哥,仿佛我看到你已死了,他葬身在维拉克鲁斯的波涛中。我爱你就像看到我死去的儿子圣地亚哥。他在他没有完成的诺言中闪闪发光,他性格温顺,容貌俊美,我就是这样爱着你,哈利,就像爱我的一个儿子、我的一个哥哥、我的一个情人那样。但又是不同的,亲爱的,我像女人、母亲、情人一样爱他们,但对你我像条母狗一样爱你。我知道,无论你还是其他人都不理解,我像条母狗一样爱着你,我想亲自孕育你,然后流尽身上最后一滴血为你而死。母狗是我把你区别于我的丈夫、情人、儿子的比喻。我对你的爱是一种动物的爱——这种爱让我想代替你处在目前的境地,代你而死。但惟一的代价是让我成为你的母狗。这种心情是我以前从没有过的,我想解释明白,我不知道怎样说,事实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想的。哈利,因为只有现在,在你身边,我才会问自己以前从未问过的东西,我问自己我们的爱是否值得拥有? 我问自己现在这种感情是不是爱? 不是你问,而是我自问,因此我想变成动物,成为你血淋淋的、垂死的母狗。就是为了说:是! 存在这种爱,就像存在公狗和母狗一样。我想从任何罗曼蒂克的美好事物中演绎你的和我的爱。哈

利,我想给你我的身体最后一次机会,让它们扎根在这块最低、却是最为具体、最为肯定的土地上,在这块土地上,一条公狗和一条母狗相互嗅着、撕咬着,纠缠在一起性交,相互分开,相互遗忘。因为我将在你死后带着对你的回忆生活。哈利,我对你的回忆永远不会是完整的,因为我不知道你在恐怖时期做了什么。你没有对我讲过。也许你是个英雄,你的卑微被斗士的荣誉掩盖了,就像约翰·加菲尔德,你不给我讲你的功绩,而把自己的一颗心屈服于多愁善感,你为一场拉马尔科的电影而流泪,但也许你是个叛徒,哈利,一个告密者,那是你的耻辱,因此你希望回到西班牙,再度变得年轻,到战场上死在你年轻朋友吉姆的身边,用战争和死亡代替那些事件和不光彩,哪一个是真的?我认为是第一种,否则,在奎尔纳瓦卡,人们不会接纳你到受害者的小圈子里。但也可能是第二种,因为他们不理睬你,也不与你交谈,他们邀请你,让你坐到那儿,不与你说话,但也不攻击你,直到你坐的椅子变成了被告席。你了解我,你已不再孤独,我们应该离开奎尔纳瓦卡,抛开你的同志们,不再去听那些一再重复直到厌腻的论证……)

“我们应该揭露斯大林自战前起所犯的罪行。”

“你别自欺欺人,那样他们早就把你清除出党了。此外,对待敌人,忘却是必要的。”

“这并不阻碍我们,至少应该讨论苏联的错误做法。我们或许可以更人道一些,或许可以更好地维护自己抗击麦卡锡的攻击。”

“那时我们怎能想到要发生什么?”一天晚上,夜幕降临到依山而建的小花园中,初绽的花朵和垂死的树木散发着香气,哈利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对劳拉说,“我们美国的共产党人在西班牙战斗,然后在二战中抗击轴心国。法国共产

党也确实组织了抵抗运动。苏联的共产党员在斯大林格勒拯救了我们大家。谁能想到战争一结束,成为共产党人竟是一项罪名,而我们这些共产党人都会走向火坑呢?谁会想到呢?”

又一枝香烟,又一瓶双X啤酒。

“忠诚于不可能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罪过。”

劳拉曾问他是否结过婚,哈利回答说结过。但他不愿谈那事。

“全都过去了。”他想结束话题。

“你知道并不是这样。你必须告诉我一切,我们要一起面对这些,如果我们还将继续生活在一起的话,哈利。”

“愤怒、争斗、说教、秘密会议产生的不安,对控告者是否有道理而产生疑问,你是说这些吗?《我与一名女共产党员结过婚》好像是那些把麦卡锡主义标榜成爱国主义的卑劣电影中的一部。制片厂的头头们就这样洗刷了他们赤色分子的罪名。让他们见鬼去吧。我们明天见。”

“你那时对妻子忠诚吗?”

“那时我十分柔弱,我对她敞开胸怀,我袒露心扉,向她说了我的疑惑:我给电影厂写剧本是否值得?或许他们仅仅是让我相信我这样做是对的,因为我从事的是一项事业——这项事业,是惟一正确的事业。我们是否正在为一项不值得耗费精力的东西付出高昂的代价?她告诉我,哈利,你写的是狗屎,不是因为你是共产党人,亲爱的,而是因为你已经才尽了。看看事物本来的面目吧。你曾经有才华,好莱坞窃取了它,你的才华虽小,但毕竟是才华。你丧失了你曾拥有的那点儿东西。这是她对我说的,劳拉。”

“如果跟我在一起,结果肯定会不同。”

“我不能,我不能,我已经不能了。”

“我想同你一起生活(以我哥哥圣地亚哥,我的儿子圣地亚哥的名义。如果我过去不会或不能照顾他们,我现在要照顾你。你理解这一点。但你生气了,不愿我像对待婴儿一样对待你。我要证明给你看,我并不是你母亲,哈利,我是你的母狗,你不会把一位母亲比成动物,也不会把一位情人比作动物。好莱坞罗曼蒂克式的多愁善感不允许这样做。哈利,对我来说,我不在乎,我求你这样做。让我做你的母狗,尽管有时我会对你咆哮,我不是你的母亲,也不是你的妻子,也不是你的姐妹……)。”

“做我的母狗。”

他抽着烟,喝着酒,每一口烟或每一口酒都侵蚀着他的肺和他的血液,她装作同他对饮。她假装在喝威士忌,其实在喝苹果酒。她觉得自己像酒吧的妓女一样,喝着染色的水,让人以为是法国白兰地。她对自己的欺骗行为感到羞愧,但她不想让自己生病,因为到那时谁来负责照顾哈利呢。1952年在奎尔纳瓦卡的一天清晨,她看着身边柔弱的、昏睡的男人,从那时起她决定,从今往后她只有把生活专注于照顾这个男人,对他负起责任,她的生活才有意义,因为劳拉·迪亚斯五十岁以后的生活浓缩成那样一种信念:我的生活要变得有意义,只有把自己的生活献给需要自己的某个人,照顾需要帮助的人,把我的爱给我心爱的人,完完全全地,无条件地,没有其他的私心杂念,就像对待奥兰多,这就是我生活的意义。即使有争吵、不理解,他或我也会生气,摔盘子,几天不说话,但这样更好,没有那些粗暴和冲动,我们俩就会变成牛皮糖。我将纵情发泄我对他的愤怒,我不会抑制怒火。我将给爱情最后一次机会,我将以他已不能再等待的名义去爱哈利,我将让我的这段生活变得有血有肉,并且这个时刻已经到来:我知道他的想法与我一

样:劳拉,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这是你我之间不能再等待的东西,是已经表白过的,是已经发生过的,但现在正在发生,我们正提前经历着死亡,劳拉,因为在我们的眼前正在展现的前景仿佛已经发生过。

“只有死者才会知道这些。”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弗雷德里克·贝尔对在奎尔纳瓦卡每个周末都来聚餐的人说,“我们都知道,在战争时期,工业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这要感谢战争。我要问的是,我们那时该参加罢工去反抗劳动的剥削者吗?我们没有那样做,我们曾经是‘爱国者’,是‘民族主义者’,但不是‘革命者’。”

“如果美国工人参加了罢工去反抗美国资本家,纳粹是否会赢得战争?”那个享乐主义者问道,尽管天热,他并没有解开领结。

“你在对我说,让我在今晚自杀与明早被枪毙之间进行选择?像罗密欧一样?”一个长着正方颌骨,睁着一双无神的眼睛的男人插话道。

“我的意思是,我们正处于战争时期,战争还没有结束,也永远不会结束。同盟将会改变,今天他们赢,改天我们赢。重要的是不要丢掉目标。让人奇怪的是,目标就是起源。你们注意到了吗?目标是人类起初的自由。”他以箭牌衬衫这一生动的广告语结束了讲话。

不对,哈利对劳拉说,起源不是自由,起源是恐惧,是与野兽的搏斗,是手足之间的不信任,是为女人、母亲、家族而战,是保存火种不让它熄灭,是祭祀儿童来驱除死亡、灾害、风暴,这才是起源,黄金时代从来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事实是如果你不相信这些,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革命者。

“那麦卡锡呢?贝利亚呢?”

“他们是厚颜无耻之徒,他们从不信仰任何东西。”

“我尊重你的遭遇,哈利,我的意思是我非常尊重你。”

“别浪费时间了,劳拉,来,吻我一下。”

哈利死后,劳拉·迪亚斯回到奎尔纳瓦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流亡者团体。他们还是一如既往,每周六晚聚会。鲁斯给他们提供大量糕点。劳拉发现演员表变了,但角色还是那么多,空缺由新来的人填补上。麦卡锡还在孜孜不倦地寻找牺牲品。迫害的阴影四处扩散就像油渍在海水中飘散,就像强行注入阴茎中的脓液。西奥多这位老制片人去世了。他的妻子艾尔莎在他走后也没有支撑多久;那位高个子男人,戴着玳瑁眼镜的近视眼有机会在法国拍电影;而那个头发拳曲,前额头发高高翘起的小个子男人又可以重新为好莱坞写电影剧本,但用了笔名,一个借用的化名。

其他人继续在墨西哥生活,生活在弗雷德里克·贝尔周围,获得墨西哥左派人士,如里维拉或住在首都的加布里埃尔·菲格罗的保护,但他们一如既往地忠诚于那些理论。那些理论让他们生活、回忆、争论,并减缓了痛苦,尽管名单上被迫害者、被排斥者、入狱者、流亡者、自杀者和失踪者与日俱增。对衰老的脚步充耳不闻,对镜中出现的麻木的、实在的、细小的变化视而不见。现在的劳拉·迪亚斯是奎尔纳瓦卡流亡者的一面镜子。她告诉他们哈利已经死了,所有的人一下子变得苍老多了。但那时劳拉明显感受到,所有人、每个人都像同一团火中的火星闪烁着。一秒钟后,当她简短地把哈利的死讯宣布完毕,笼罩在所有的人,连最勇敢的人也不例外的恐惧(恐惧是乔·麦卡锡训练出来专咬“赤色分子”脚后跟的最好的猎犬),随着一声叹息,一声最终宽慰的叹息烟消云散,大家似乎在对劳拉说:哈利已不再痛苦,也不再让他们痛苦了。

在奎尔纳瓦卡逃避麦卡锡迫害的美国避难者的眼神足以使劳拉从心灵深处无法控制地回忆起哈利·杰夫的一切：他的温柔、他的暴躁、他的勇气、他的恐惧，他那由政治之痛变成的肉体之痛。他的痛苦，她情人哈利就是一个痛苦的灵魂，仅此而已。

贝尔，这个英国人说，如果一个人被传讯到国会反美活动委员会，就只能在四种方案中选择一种：

可以援引保障言论和结社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持这种态度的危险在于会被认作对国会的不敬而被投入监狱。这就是好莱坞戴斯家族的遭遇。

第二种选择是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该法案赋予所有公民不对自己定罪的权利。谁要是选择援引第五修正案就将丢掉工作，登上黑名单。这是奎尔纳瓦卡大部分流亡者的遭遇。

第三种可能是揭发，提供人名，并相信调查委员会会重新让他们工作。

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了。所有人，十七个被邀请的客人加上贝尔，他的妻子和劳拉，启程前往特博斯特兰的小墓地，在那里安葬着哈利。那晚有月亮，那些尽管简陋但都装饰着鲜花的坟墓，散布在雄伟高大的特博斯特科山脚下。特博斯特科三层金字塔一直向下延伸，直到蓝色、玫瑰色、白色和绿色的十字架，仿佛不是墓地而是墨西哥热带的花季。总是早到的寒流在傍晚时分降临到特博斯特兰，那些美国佬都穿着粗呢上衣，披着披肩，甚至风衣。

他们是对的。尽管月光皎洁，群山向山谷投下巨大的影子。这些人，这些被迫害者、流亡者的移动好像一种映象，好像远方一只苍鹰的黑色的翅膀，它有一天照过镜子却认不出自己，因为它以一种方式想像自己，但镜子却显示出

并非如此。

那时，在特博斯特卡的夜晚，在清冷的月光下，一切就像格罗普剧团的最后一部作品（闭幕前的幕布对着空荡荡的大厅），每个流亡者在哈利的墓前说了点什么。坟墓里的男人被这个集体接纳但没人理会他。直到有一天，劳拉一个猛子跃进布满九重葛的水池中，从水中出来时正看到她可怜的、悲惨的、病弱的爱人。

“你只告发那些已被揭发的人。”

“你所揭发的人早已上了黑名单。”

“在告发你的朋友与背叛祖国之间，你站到了祖国一边。”

“你告诉自己，如果你继续留在党内，他们会使你的灵感源泉枯竭。”

“党告诉你如何写作，如何思想，但你背叛了她。”

“你最先反党。”

“你一想到斯大林主义会像统治苏联一样统治美国，就不寒而栗。”

“你到委员会面前讲了并且害怕得浑身颤抖。这里，在美国你经历着与以前同样的恐惧。斯大林主义曾审讯过你，但在美国它叫麦卡锡主义。”

“一个名字你也没有揭发过。”

“你对抗过麦卡锡。”

“既然你明知他们早就知道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哈利，你这是为了揭发揭发者，使败坏他人名誉的人声名扫地，哈利。”

“为了重新工作，哈利，甚至你发现揭发与不揭发都一样，电影制片厂不会给赤色分子工作，但也不会给那些承认自己是赤色分子和揭发同伴的人工作。”

“没有出路,哈利。”

“你知道,反共主义已经成为美国流氓的庇护伞。”

“你没有供出活着的人,但也没有供出死人。”

“你从未供出没有被指证过的人,也不只是指证那些已经被指证的人。”

“你甚至也不供出已经指证了你的人,哈利。”

“党请求你忍耐。你说,你即使讨厌党,也不会向委员会屈服。党的辉煌时期比委员会的任何时候都要好。”

“我最糟糕的时候是我不能跟妻子说出发生的一切。猜疑毁了我们的婚姻。”

“我最糟糕的时候是躲在一座熄了灯的房子里,以逃避委员会的传讯。”

“我最糟糕的时候是得悉他们在学校里对我幼小的儿女实施冷酷的法律。”

“我最糟糕的时候是没有告诉孩子所发生的一切,尽管我知道他们已了解一切。”

“我最糟糕的时候是必须在社会主义理想与苏联现实之间作出抉择。”

“我最糟糕的时候是必须在工作上的文学质量与党的教条命令之间作出抉择。”

“我最糟糕的时候是在认真创作与按制片厂要求进行商业写作之间进行选择。”

“我最糟糕的时候是看着麦卡锡的脸色,知道美国已失去民主。”

“我最糟糕的时候是约翰·兰金国会议员对我说:你不叫麦尔文·罗斯,你的真名是伊曼纽尔·罗森伯格。这证明你是撒谎者,骗子,叛徒,无耻的犹太人。”

“我最糟糕的时候是遇见一个出卖我的人,看到他因羞

愧而用双手捂住脸。"

"我最糟糕的时候是出卖我的人哭着向我求饶。"

"我最糟糕的时候是我被令人作呕的专栏作家索科尔斯基、温切尔、赫达·霍珀不断指名道姓。他们提到我时把我抹得比麦卡锡还黑。他们的笔墨比狗屎还臭。"

"我最糟糕的时候是必须伪装自己的声音给家人和朋友打电话,为的是不连累他们。"

"他们对我女儿说,你爸爸是个叛徒,你要与他断绝一切关系。"

"我的朋友对我儿子说:你知道你爸爸是什么样的人吗?"

"他们对我的邻居说:不要与赤色分子的家属说话。"

"哈利·杰夫,那你对他们说了什么?"

"哈利·杰夫,安息吧。"

所有人又都回奎尔纳瓦卡了。惶惑、激动、茫然不知所措的劳拉·迪亚斯来到特博斯特兰的小屋收拾东西。她也是为了平复自己的伤痛和哈利的伤痛。她既整理东西同时也整理自己的心情。独自一人面对哈利的亡灵,自问她感受的伤痛是否矛盾。理智告诉她,没有矛盾。只有我自己的痛苦,无法转嫁的痛苦。哈利,尽管我看见你痛苦的样子,但我无法像你一样感受它。你的痛苦只有通过我的痛苦才能感觉得到。我的痛苦,劳拉·迪亚斯的痛苦,这种痛苦才是我惟一能感受到的。但我可以用你痛苦的名义说话,这是真的。一个叫哈利·杰夫的男人想像的痛苦,他死于肺气肿。自己窒息而死,被空气肢解,折断了翅膀。

"对麦卡锡主义的委员会回答除了有那三种可能外,"劳拉回墨西哥城前一天的下午,弗雷德里克·贝尔来对她说,"还有第四种可能,称为执法证词,英文叫 Executive

Testimony。证人在公开作证前先要经过私下演练。那时公开听证就成为纯粹礼仪性的活动。委员会想知道的仅仅是名单。他们对名单的渴望永难满足。一般情况下证人被叫到旅馆一间房内,在那里秘密揭发。委员会早已掌握了名单,但仍不满足,证人必须公开重复一遍名单,为的是给委员会贴金,也让告密者名誉扫地。这中间存在着误解,委员会让告密者以为私下招供就够了。恐怖和迫害的气氛到那种程度,以至于告密者要抓住这根救命稻草,自欺欺人地认为:'我是例外,他们会给我保密的。'有些时候他们不是没有道理,劳拉,难以解释的是为什么有些人在秘密会议上坦白后马上会被公开审讯,而有些人则不然。"

"但是哈利在委员会面前是勇敢的,他对麦卡锡说:'议员,你就是共产党员。'"

"对,他在委员会面前是勇敢的。"

"但他在执法证词中并不勇敢吧?他先是出卖然后又翻悔,先揭发自己的朋友,接下来又抨击委员会。是这样吗?"

"劳拉,那些被揭发的牺牲者并不是我们出卖的。我只能对你说,有高尚理想的人,他们想的是:'如果我说出一个没有嫌疑的人,对于他人们决不可能提出任何证据,这样我既对委员会有交代又让自己得救,但又不伤害我的朋友。'"

贝尔站在那儿,与劳拉·迪亚斯握了握手。

"我的朋友,你是否能帮我把这些花带到马迪·克里斯蒂安和约翰·加菲尔德的墓前,谢谢你,帮我这个忙吧。"

劳拉·迪亚斯最后要对哈利·杰夫说的是:"我宁愿握你已失去生命的手也不愿握任何活人的手。"

她现在不知道哈利是否听见了她的话。她以前并不知道哈利是死还是活着。

二

劳拉总有股冲动想对哈利说:“我不知道以前谁是你的牺牲品,但是,现在让我做一个吧。”劳拉也知道他对她的回答:“我不需要救命稻草……”“但我是你的母狗。”

哈利曾经说过,如果他有罪,他将全部承担。

“我想拯救自己吗?”远处传来他的提问,“我想同你一起拯救自己吗?我们俩得一起揭开这个疑团。”

她承认这种猜测耗费她许多精力,因为哈利从未明确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但很快劳拉就懊悔自己的直率。好几年前她就明白,哈利·杰夫的真相就像是一张没有写下日期和金额但已签了名的支票。劳拉一直爱着这个快要倒下的男人,有两种情感支撑着他,一种是流亡组织对哈利的感情,另一种是哈利对组织的感情。

劳拉曾自问为什么流亡者们与哈利保持距离,而同时又接纳他为他们中的一员。

劳拉曾希望哈利本人告诉她真相,所以她一直不接受第三者的说法。哈利曾严肃地告诉她,失败是无人理会的孤儿,而成功享有无数父母的关爱。相反,谎言有众多子女,而真理却难有后代。真理是孤独的单身。因此人们宁愿撒谎;谎言同我们交往,让我们开心,谎言把我们结合到一起,成为死党;相反,真理让我们孤立,把我们变成被猜疑和妒忌所包围的孤岛。因此我们一再地玩着谎言的游戏,以免忍受真理的孤独。

“那么,哈利,你我知道些什么?我们彼此了解多少?”

“我尊重你,你尊重我,这就足够了。”

“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光这样还不够。”

“对,是不够。”

哈利流亡在墨西哥,好莱坞的十君子以及那些遭受国会迫害,后又遭麦卡锡议员迫害的人也都一样。是否共产党员,这已不是问题。也有些特例,比如犹太老制片人西奥多和他的妻子艾尔莎。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指控,但他们因孤独而自我流放。因为正如人们所说:“电影是在众所周知的情况下由大家合作完成的,如果一个人犯了什么罪或受到某人的迫害,那么所有人都应共同承担,无一例外。”

“羊泉村,我们都是羊泉村。”劳拉回忆起巴西略·巴塔萨尔的话,笑了起来。

存在斯大林和苏联的坚定信徒,也存在对斯大林主义失望的信徒,但他们不愿在自己的美利坚大地上充当斯大林主义分子。

“要是我们这些共产主义分子在美国掌了权,我们也可能会诋毁、放逐和杀害那些不同政见的作家。”额前有一撮头发的男人说。

“那么我们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只是苏联斯大林主义分子,是宗教和专制文化的产物,这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或杰弗逊的民主精神毫不相干。”他的一位高个子、高度近视的同伴回答。

“斯大林已彻底败坏了共产主义理想,你不要自欺欺人了。”

“我将继续保持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希望。”

劳拉没有为这些声音找到它们各自的面孔或名字,为此她曾经自责过,但她之所以没有那样做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人们来了又去,不同的声音却说着相似的理论。他们在这里出现,然后就永远消失,在奎尔纳瓦卡贝尔家中长满九重葛的花园里只回荡着他们的声音,而不见其人影了。

有些前共产党人害怕落得与罗森伯格夫妇[①]同样的下场:因为莫须有的罪名,不相干的罪名或仅仅由猜测得出的罪名在电椅上被处决。有些美国左派、忠诚的社会主义者和普通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为一群卑劣的机会主义分子造成的迫害和告密的气氛而忧虑。有些麦卡锡主义受害者的亲朋好友,因同情受害者而逃离美国。

在奎尔纳瓦卡一个告密者都没有。

劳拉自问,这个矮小、谢顶、瘦弱、穿着简陋、患有肺气肿而且身上充满矛盾的男人到底属于哪一类人。她以一种不同于以往她在其他男人如奥兰多、胡安·弗朗西斯科,尤其是霍尔赫·莫拉身上所感到的爱,爱上了这个男人。

很矛盾,哈利肺气肿病得快要死了,但他每天还抽四盒烟,因为他说创作时需要香烟。这是一个改不了的习惯。只是他什么也没有写出来,却还不断地吸烟。他望着莫雷洛斯山谷美好的暮色,眼里充满激情。印第安桂花的香气压倒了哈利·杰夫即将停止的呼吸。

他艰难地呼吸着,山谷的空气侵入他的肺叶,损害着它们:氧气已进不了他的血液。但有一天他自己的呼吸,一个叫哈利·杰夫的人的气息会像水从一根破裂的管中涌出一样,从他的肺中散逸出来,并将侵袭他的喉咙,直到窒息,而使他窒息的与他所需要的是同一样东西:空气。

"如果你注意听,"病人做了个鬼脸,"你可以听到我肺部的噪音,就像谷物发出的稀里沙啦声,我是一杯大米做的克里斯派……"他艰难地笑着,"是冠军们享用的早餐。"

很矛盾,是他认为人们不知道,或人们知道只是不对他

① 罗森伯格夫妇(1918—1953;1915—1953),因间谍罪(向苏联泄露关于原子武器的军事秘密)最早被处死的美国文职官员。

说,还是他明白人们已知道或他们认为他还不知道?

“哈利,你会怎么描写你自己呢?”

“会用那些我厌恶的词句来叙述历史。”

“是历史还是你的历史?”

“应该忘却个人的历史来再现真正的历史。”

“只要把个人历史加起来不就是‘真正的历史’?”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你,改天你再问我这个问题吧。”

她思念所有与她有过性爱的情人:奥兰多、胡安·弗朗西斯科、豪尔赫和哈利;所有她爱的亲人,她父亲费尔南多和妈妈雷特西亚,她的几个姨妈玛丽亚·德·拉奥、维尔希尼亚和希尔达;她心灵深处的挚爱:两个圣地亚哥。她中断了思绪,既茫然又冷静。她的另一个孩子丹东,在劳拉的心灵圣殿中已不再占有一席之地。

许多次她问哈利:“如果有的话,谁是你的牺牲品?哈利,或许你没有,但如果有的话,现在让我做你的牺牲品吧……增加一个而已。”

他不信任地看着她,有时还迫使她以同样的方式看自己。劳拉·迪亚斯从没有为谁牺牲过。劳拉·迪亚斯没有做过任何人的牺牲品。所以,她可以成为哈利的牺牲品,而且是纯粹的、无偿的。

“为什么你不写作?”

“最好问我写作有什么意义……”

“好吧,有什么意义呢?”

“意味着下沉到作者本人内心深处,仿佛他本人就是一座矿藏,等待日后重新上升。劳拉,就是双手抱着我自己浮到纯净的空气中来。”

“你从矿藏中带来了什么?金子?银子?铅?”

“回忆?一堆烂泥般的回忆?”

“我们对每一天的回忆。”

“今天就把它给我们吧。全是瞎掰。”

他本想死在西班牙。

“为什么?”

“为了协调,我的生命与历史本应是一致的。”

“我认识许多有你一样想法的人,历史应该停驻在西班牙,当时所有人都那么年轻,都是英雄。”

“西班牙曾是庇护所。但我现在已不需要救命稻草,我早就对你说过了。”

“那么你应该承担西班牙内战后发生的事情。那时错误还在继续吗?”

“有好多无辜的人,到处都有,我无法拯救那些烈士。我的朋友吉姆死在哈拉马,我本应为他而死。他是无辜的,此后再也没有人比他更无辜。”

“为什么? 哈利。”

“因为我不是无辜的。我不会让任何人再成为那样的无辜者。”

“你难道不想自救?”

“想。”

“和我一起?”

“对。”

但哈利已经垮了,他无法自救。他永远不会死在哈拉马前线。他将死于肺气肿。不是死于佛朗哥或法西斯的子弹——一颗具有政治意义的子弹,而是死于自己体内子弹的自爆,这颗子弹是生理上的或精神上的,或者既是生理上的同时也是精神上的。劳拉想给这毁灭起个名字,正是这毁灭最终无情地使她同这个男人走到一起。这个男人除了劳拉,没有一个朋友,还用香烟和懊悔的情绪来毁灭自己。

他们离开了奎尔纳瓦卡，因为一切还是老样子，而哈利说他厌恶一成不变的东西。在奎尔纳瓦卡人们允许他住在那里，但既不与他说话也不理睬他。劳拉以哈利的口气自问，“为什么与其他流亡者之间会保持着冷冰冰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而且，为什么他们接纳我但同时又排斥我？是他们不想让我经受他们自己所经受的歧视待遇吗？”“所以我如果偷偷告发他们，”劳拉以哈利的口气说，“他们不会当面指责我；所以我如果偷偷地干的话，他们不会像对待敌人那样对我。可是我不能出卖别人。”

“平静地生活下去？”

“我不知道谁是你的牺牲品，哈利，你就让我成为你的牺牲品吧！”

如果他在墨西哥避难，那是因为美国当局还在追捕他。他们为什么还要指控他呢？是因为他没有告密？或者恰恰是因为他告密了？但是，他的告密属于哪种类型呢？是一种能使我在我的牺牲品之间生活的告密？他是否要当着其他受迫害者的面揭露自己是个告密者呢？这样能获得好处吗？能获得什么好处呢？忏悔和信任？他若忏悔，那人们就会信任他、理睬他并和他说话吗？难道他们和哈利全都错了？

在奎尔纳瓦卡流亡的时候，人们是否一致相信哈利没有告密并接纳他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那么，为什么当局不追捕他，而继续在追捕我们？”

（劳拉，告密者是不可动摇的，攻击告密者的可信度就是在破坏这种告密制度的根基。）

（你告过密吗？）

（你就权当我是吧！但不要让人家知道我告过密，让大

家以为我是英雄。难道这对事业不是更有益吗?)

“我向他们保证。他可以回去,没有人会再纠缠他。”

“不,那些宗教裁判官总会再找出新的理由去迫害人。”

“犹太人、改宗者、穆斯林、变态者、混血儿、没有信仰的人、异教徒……”在某次拜访中巴西略回忆道,“宗教裁判官总能找到指控人的理由。如果某个理由不行或过时了,托尔克马达[①]就会从袖子中又掏出另一个新的出人意料的理由。这是件没完没了的事情。”

劳拉与哈利晚上搂在一起,黑着灯做爱。哈利忍住咳嗽,劳拉穿着一件睡衣来掩盖她那已不再令哈利感到愉悦的身躯。两人会交谈着,会亲昵地说着话。他会对劳拉说她是他最后一次爱的机会了。劳拉会对他说这些话他早就说过了。而他则说,现在正在经历的事情早已发生过了,你,劳拉·迪亚斯,和我,哈利·杰夫,我们之间现在发生的事早已被你和我所经历,她早应该猜想到,她也早应该想像到。早饭时,霞光像鸡尾酒一样绚丽多彩,只有一层薄薄的像马蒂尼酒般的透亮继续维持着夜色。晚上做爱的时候,她能想像出他对自己提问的回答。为什么他没有说? 或者,如果他说了,为什么他这样做? 是偷偷地说的吗?

“你那时没有说,是吗?”

“没有,但人们对待我的态度仿佛我已经说了似的。”

“是的,他们在骂你,他们对待你就好像你分文不值。我们离开这里吧! 就我们两个。”

“为什么你说这些?”

“如果你有一个秘密,而他们尊重的是这个秘密,因为

---

① 托尔克马达(1420—1498),西班牙第一任宗教总裁判官。此处指麦卡锡分子。

你对他们并不重要。”

“你这个婊子，母狗，你以为用你的圈套就能逼我说……”

“在婊子面前，男人还诉说他们的悲伤。让我做你的婊子吧，哈利，说吧……”

“老母狗，”哈利讽刺地笑着，“老婊子。”

她已没有能力去感受他对她的辱骂，是她自己求他的：“让我做你的母狗吧！”

“好吧！母狗，你就假设我曾秘密作证。但设想一下，我只提到了那些清白无辜的人，如马迪、朱莉。你明白吗？我原以为，因为他们是无辜的，敌人不会碰他们。可是敌人却迫害了他们，杀了他们。我原猜想敌人只会拿共产党人开刀，我想像出一些无辜者，他们不会动他们的。那些人没有遵守他们的诺言，没有像我想的那样思考。所以，我从秘密作证转到公开审讯，我抨击了麦卡锡。”

（你现在是或者曾经是共产党员吗？）

（你是共产党人，议员。你是红色间谍。莫斯科给你钱，麦卡锡议员。你是共产主义最优秀的宣传者，议员！）

（肃静！这是蔑视，证人是蔑视美国议会的罪犯！）

“为此我在监狱中关了一年？为此流亡者不得不尊重我并接纳我为他们中的一员？为此我就成了英雄？但是，我也是个告密者？他们是否想到我出卖，是因为我以为没有人能证明不可能证明的事：马迪·克里斯蒂安或者约翰·加菲尔德是共产党员吗？他们是否想到我提到无辜者是为了拯救有罪的人？他们是否想到我不明白迫害的逻辑，这逻辑就是把无辜者变成牺牲品？他们是否想到我本可以揭发我另外一些朋友：J.爱德华·布朗伯格或者马尔茨、特朗博、德米特里克，因为他们才是共产党人？他们是否想到正

因为这些人是共产党人我才没有在秘密审讯时出卖他们？他们是否想到因为我也是无辜者所以我讲的都是无辜者？他们是否想到我以为他们从这些无辜者身上找不出任何证据，因为这些人本来就是清白的？因此委员会就通过恐怖的手段来证实无辜者原本没有做过的事情？吓唬无辜的人要比吓唬有罪的人容易得多？有罪的人会说他现在是或曾经是共产党人并光荣地承担后果，但无辜的人只会否认，并遭受比有罪更严重的惩罚？这就是恐怖的逻辑？对，恐怖如同一把无形的钳子不断夹紧你的喉咙，就如肺气肿那样窒息着我自己。你无能为力，你最终只能是筋疲力尽、死亡、生病、自杀。恐怖就是恐惧杀死无辜者。这是宗教裁判官们最强大的武器。你就说我是个笨蛋吧，因为我没有预见到这些。你想，当我决心对委员会发动攻击时，我对别人的揭发却已经产生效果了。没有人能再走回头路，劳拉。"

"为什么那些迫害者没有揭发你，为什么他们没有揭发你在秘密会议上讲的话与公开审判时相反？"

"因为对他们来说，英雄的沉默比告密者的沉默更糟。如果他们揭穿了我的双面把戏，也就暴露了他们的把戏，也就丢失了他们手中的王牌。他们在我的揭发面前保持沉默，还是拿我提到过的人开刀，我的揭发并不重要，他们早已有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牺牲者的名单，告密者只不过是公开证实了他们想让这些人说的话。后来又有许多人都公开告发了马迪·克里斯蒂安和约翰·加菲尔德。因此他们对我的控告保持沉默，因为我的反叛，他们把我送进了监狱。我出狱后只能流亡……不管怎么说，我失败了，他们使我不再是原来的我了。"

"在奎尔纳瓦卡的朋友知道这些吗？"

"我不知道，劳拉。但我猜他们知道。他们四分五裂。

对他们而言，最好是把我当作受害者一样接纳到他们中间，这样比把我作为叛徒排斥要好些。但他们既不和我说话也不理睬我。”

劳拉恳求哈利一起离开奎尔纳瓦卡，在其他地方，两个人可以彼此给予两个孤独的、迷途的人所能给予对方的一切。我们俩在一起就可以享有两人分开时所没有的，就像我们现在这样。让我们在无限的空虚把我们吞没之前走吧，亲爱的，我们将带着所有的秘密，悄悄地死去，走吧，亲爱的。

“我向你发誓，我将永远保持沉默。”

第二十一章　罗马区:1957 年

一

1957 年 7 月这场地震晃动墨西哥城时,劳拉·迪亚斯正站在索诺拉大街老宅子的屋顶平台上观看夜色。她一反常态地吸着烟。是为了纪念哈利。他去世三年了,她这位可怜的情人给她留下了无数没有答案的问题,充塞着她的头脑和心田。她活着,但身边却无人相伴,因为她所爱的人已经舍她而去,而今她刚满五十九岁。

回忆充斥着她的白昼,有时,像今晚这样,也充斥了她的夜晚。自打哈利去世,她回到墨西哥城后,她的睡眠减少了。美国情人的命运久久困扰着她。她不愿意把哈利·杰夫当成失败者,因为她不想把失败的原因归于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也不想把它归咎为哈利本人的自暴自弃。她不愿意承认,不管有无迫害,哈利都不会再写作,因为他已无话可说;他在政治迫害中苟且偷生。对无辜的人,更糟的是对不同思想的人们所进行的大规模迫害,占据了这位流亡者的全部生活。

挥之不去的还是那个问题。哈利的才思枯竭是因为迫害呢,还是他早就已经才尽,只不过麦卡锡主义的迫害把它升华成了英雄事迹?他本人没有什么过错;他想死在西班

牙,死在哈拉马,死在他的伙伴吉姆身边,那时候,思想与生活是一致的,那时还没有什么将它们分离,那时候还没有,劳拉,这种可恶的胡思乱想……

平台上,劳拉·迪亚斯心头想着她可怜的哈利,在她左边,放眼望去,可以看见漆黑的、沉睡着的林海,树冠起伏,就像一位沉睡在树丛宝座上,头顶石头城堡王冠的老国王在呼吸。

右侧,远处,金色的独立天使在探照灯的映射下愈发地金光闪闪,探照灯勾勒出那金色少女在空中绰约的风姿,她打扮成一位希腊女神的模样,但其实是天界的男扮女装者,因为他是一位男性天使,而他所代表的伟大事业却是阴性的:独立[①] ……这位男-女天使右手擎着一顶桂冠,振翅欲飞,但不应是这样的飞翔:悲惨地、突然地、急剧地从半空的柱子上一头栽落,撞在底座上,粉身碎骨,这就像路西法[②]的坠落一样,天使陨落,天上的天使臣服于颤抖的大地。

劳拉·迪亚斯目睹了天使的坠落,不知为什么,她想像从上面坠下的并非是眼前这个天使,而是安托涅塔·里瓦斯·梅尔卡多小姐,她给雕塑家恩里科·阿尔西亚蒂当模特这件事曾一度引起轰动,然而她却未曾料到有一天她美丽的塑像,她整个身躯,会坠落到秀美的纪念碑脚下粉身碎骨。劳拉看到了树林的起伏,看到了天使的坠落,但她切身感受到的却是自己的家在吱嘎作响,它跟天使的翅膀一样断裂了,就像一块咬在城市恶魔牙齿间的烙饼,四分五裂,记得从前的某个夜晚她曾与奥兰多·希门内斯一道走遍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当时,他们是为了一睹墨西哥真正苦难

---

① “独立”一词在西语中为阴性。

② 即魔鬼的别名,本为天使长之一,后自甘堕落。

的脸孔,那种深藏的苦难,苦难中的极至,它不敢现身,因为它早已万念俱灰,而任何人,无论如何,也不会给它任何恩赐。

她等待着地震平息下去。

对她来说,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一动不动。此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对抗这种来自地底深处的力量,顺从它,但又以与它相反的静止来战胜它。

在此之前,她只经历过一场大地震,那是在1942年,那一次因为发生了一桩异事,墨西哥城受其影响而晃动了:一个米却坎的农民在犁地时,从一个孔洞里开始冒出袅袅烟雾,几小时后,仿佛大地真的会生儿育女一样,从那个孔洞中钻出了一个火山孩子——“小帕里库”,它不停地喷吐石头、熔岩和火苗。每到晚上在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它的火光。“小帕里库”现象有趣而奇特,而恰恰是它的奇特使它变得可信。这个地方的真名非常拗口:帕兰瓜里库提罗,简称为“小帕里库”。在一个可以一夜之间凭空变出一座火山的国家中,还有什么不会发生呢……

1957年的地震更残酷、更急迫、更干脆,仿佛一刀砍在睡梦中城市的躯体上。待它平静下来后,劳拉小心翼翼地沿着环状的铁楼梯拾级而下,来到卧室这一层,地上一片狼藉,柜子和抽屉,牙刷、杯子和肥皂,搓脚石和洗澡巾,在底层,客厅里的画东倒西歪,灯全都熄灭了,盘子碎了,欧芹给打翻在地,电镀瓶也给弄碎了。

外面情形更糟。来到大街上,劳拉才真正明白房子遭受了什么样的重创。与其说是它的表面出现了裂缝,还不如说是被匕首扎得遍体鳞伤,就像一个给剥了皮的橘子,已经没法再住人了……

地震惊动了陈年的鬼魂。电话还可以使用;当劳拉吃

着沙丁鱼菜豆饼，啜着葡萄汽水时，丹东打来了电话，奥兰多也打来了一个电话。

胡安·弗朗西斯科的葬礼之后，劳拉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的小儿子。那一次在葬礼上，劳拉颇难为了丹东的岳父家，尤其是她儿媳妇，阿尤布·龙戈利亚小姐。

“这点麻烦算不了什么。”劳拉对自己的儿子说。

“那好，”丹东答道，“水和油，你知道……不用担心。你什么都不会缺的。”

“谢谢。但愿我们什么时候能见上一面。”

“但愿。”

当劳拉去奎尔纳瓦卡跟一个共产党美国佬住在一起时，这个政治家庭内部再度掀起了轩然大波，但是丹东从没有中断过给劳拉寄钱，他的钱一向准时、充足。这是惯例，没什么可说的。一直到地震发生的那一天，一直是这样。

“妈妈，你没事吧？”

“我很好，房子完了。”

“我会派几个建筑师去看看房子。你先搬到一家旅馆里，然后通知我，让我来替你打点。”

“谢谢。我要去迭戈·里维拉的家里。”

传来一阵不安的沉默，随后，丹东用欢快的声音说道：

“真是世事无常呀。屋顶砸在了堂娜卡门·科尔蒂娜身上。她当时正在睡觉。你认识她吗？想想吧，被活活埋葬在自己的床上，压得像个馅饼。美丽可爱的墨西哥呀！听说在 30 年代，她曾是社交场上的灵魂人物呢。”

不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起来，劳拉吓了一跳。她回想起由两家公司，爱立信和墨西哥，分担线路和号码，给人们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的年代。她用墨西哥，豪尔赫·莫拉用爱立信。现在只有一家电话公司，情侣们想必缺少游戏的刺

激，再不能把电话当作假面具了，劳拉不无怀恋地想。

仿佛是为了让响个不停的铃声再多响一会儿似的，劳拉开始回忆起自从她外公费利佩·克尔森1867年离开德国后出现的一切新发明：电影、收音机、汽车、飞机、电报、电话、电视、青霉素、油印机、塑料、可口可乐、LP唱片、尼龙袜……

或许是周围的灾难令她想起了豪尔赫·莫拉，她的心脏竟伴随着电话铃声狂跳起来，她又迟疑了几秒钟，不敢拿起听筒。她仔细聆听电话里的声音，是一种故意显得有点尖锐，以便让人听起来更像英国人的男中音，这个声音稍事寒暄之后，问道：

"是劳拉吗？我是奥兰多·希门内斯。你知道卡门·科尔蒂娜的惨剧吗？她被砸死了。当时她还在睡觉。屋顶砸在了她的身上。我们在加尤索·德·沙利文给她开追悼会。我想，看在过去的情分上……"

下午七点从出租车上下来的那个男人，屁股还没离开座位就跟她打招呼，随后他迟疑地向她走过来，脸上的笑容不断变换，好像他的嘴巴是收音机旋钮，在寻找正确的电台。

"劳拉。是我，奥兰多。认不出来了吗？瞧，"他笑着展示袖口和金戒指上他姓名的首写字母OX，此外再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他的身分了。他的头顶已然毫发无存，而他也并不想掩盖这一点。最扎眼的——劳拉心里想，最严重的——是像婴儿屁股一样光滑的秃头跟他沟壑密布的脸孔形成的强烈对比，这张脸上细小的皱纹纵横密布。它是一朵怒放的番红花，向四面八方伸展；它是一张不对称的蜘蛛网。

奥兰多白皙的肤色、金黄的头发无力抵抗时间的流逝；

他脸上密集的皱纹，就像一块经过几个世纪的耕作而日益贫瘠的土地上的条条犁沟。然而，他还保持着修长的体态，还依旧讲究衣着，他穿着威尔士王子牌的格子西装，打了一条既得体又不失风度的黑领带——他一向不失风度——胸口的衣袋中随意地插了一簇自由牌手帕。“只有穷讲究的人和托卢卡人①才用配套的领带和手帕”，多年前他曾这么跟她说，是在圣卡耶塔诺，在雷吉斯饭店……奥兰多呀。

“亲爱的劳拉。”他看到劳拉一开始没认出他来，就抢先开口，他飞快地在她脸颊上亲了两下，然后闪开身体打量她，手里一直抓着女人的手。

“让我瞧瞧。”

还是以前的奥兰多，总是先发制人，抢在她说出“奥兰多，你的变化真大呀”前头，他无声地说：“劳拉，你的变化真大呀。”

在去沙利文大街的路上（谁是沙利文？是英国式轻歌剧的作者吗？只不过这个人像连体儿一样总跟他的兄弟吉尔伯特寸步不离，就像奥尔特加和加塞特一样②，奥兰多这个话匣子打趣道），这位劳拉从前的男友谈论着卡门·科尔蒂娜可怕的死亡，以及将永远笼罩着她的谜团。这位30年代鼎鼎大名的女主人，用她的活力把墨西哥社会从麻木痉挛中——如果能这么说的话，那就是“矛盾修饰法”，同意，奥兰多微微一笑——拯救出来的女人，已经卧病在床好几年了，她患有静脉炎，无法行动……问题是，当时卡门·科尔蒂娜能够起身从房倒屋塌中脱身出来吗？还是她身体这座

① 托卢卡人，墨西哥的印第安人。

② “奥尔特加和加塞特”其实是一个人，即Ortega y Gasset（奥尔特加·加塞特），西班牙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奥兰多此处借其姓氏开玩笑。

监牢注定她眼睁睁地看着屋顶坍塌下来，把她压死？那又何必要娇滴滴地走路，就像谚语里所说的蟑螂那样……

“我是个话匣子，我说起话来没完没了，对不起。”奥兰多笑着说，边说边用戴着手套的手抚摩劳拉·迪亚斯裸露着的手指。

刚从出租车上下来，奥兰多就挽起她的手臂，把嘴凑到她耳边说，不要害怕，亲爱的劳拉，你会见到所有我们二十八年前的老朋友，但你不会认出他们来的；你要是有什么问题，就按一下我的胳膊——不要离开我，我求你——，我会告诉你谁是谁。

“你读过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吗？没有？讲的是同一回事。主人公三十年后回到一间巴黎的沙龙中，却已认不出那些年轻时代的密友了。面对那些‘丑陋的老家伙’，普鲁斯特的叙述者说，不仅要用眼睛，还要用记忆。衰老，他补充说，就像死亡。有些人面对衰老无动于衷，那并非是因为他们比别人勇敢，而是因为他们比别人缺乏想像力。”

奥兰多姿态夸张地在丧事板上寻找卡门·科尔蒂娜的名字，以便找到灵堂的位置。

“当然，跟普鲁斯特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在法国社会一个高雅的沙龙中找到了衰老和时间的流逝，而咱们两个自豪的墨西哥人，却是在一家殡仪社中找到的。”

灵堂上并未弥漫着通常情况下那种熏人的花香。正因为如此，在场女士们的香水才更显香气袭人。她们就像行将黯淡下去的天空中的最后几朵云彩，她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过卡门·科尔蒂娜敞开的棺木，死者被精心地修复过，以致她既不像自己，也不像其他任何曾经活过的人。她是一个挂衣服用的人体模特，仿佛她整个波折起伏的女主人生

涯都是为她筹备这最后一刻，上演她有生之年那场永恒演出的最后一幕：她是一个人体模特，躺在白色的丝绸被褥间，覆盖在塑料罩子之下，她的头发被精心染成朱红色，面颊光滑还涂了胭脂，嘴巴略显淫秽地肿胀，半张着露出一个微笑，看起来就像是在舔死神，仿佛它是糖果一样，鼻孔里塞着棉花，因为从那里也许会逃逸出卡门残存的生命的浆液，双目紧闭——但是少了女主人像一切仪态优雅的近视者那样曾灵巧摆弄过的眼镜，有时，那副眼镜就像一个风车，有时像一个备用的手指，有时像一个疲惫的钟摆或一把威胁的匕首，总而言之，是卡门·科尔蒂娜用来指挥她那出精彩的社会戏剧的指挥棒。

少了那副眼镜，劳拉认不出她了。她被初恋男友那一贯诙谐的腔调所感染，差点就跟他说，但愿哪个仁慈的鬼魂会替卡门的尸体戴上眼镜，她肯定能够再次睁开双眼，复活。劳拉也认不出那个肥胖、却保持了镙钿一样光滑的肌肤，坐在轮椅上的女人，但是她却认得替她推轮椅的那个男人，他是画家迪索克·安布里斯，他频频出现在报纸的文化与社会专栏中，因为肤色，身量和肤质的关系，他变成了一条长有鳞片，黑白双色的沙丁鱼。他瘦小枯干，跟往常一样穿着蓝色混纺布的衣服——裤子，衬衫，外套，好像不光是为了与众不同，相反还要引导一种新的时尚。

他专注地推着轮椅上那个长着似睡非睡的眼睛，若有若无的眉毛的女人，但是，哎呀！奥兰多失声叫道，那张与生俱来的、对称的、既成熟又炫耀着永恒青春的面孔在哪里？虽然这张脸跟三十年前一样，丰而不腴，劳拉的朋友曾把这比作熟透的水果。刚刚从枝头采摘下来的水果。

"她是安德莱阿·内格瑞特。你还记得在卡门的聚会上，迪索克为她所作的画首次亮相吗？她一丝不挂——当

然是在画里——太阳穴上有两撮白头发，阴部也被染成白色，向人显示她的阴毛也是白色，天哪天哪。啊，她现在什么也不用染了。”

“吃了我。”当安德莱阿和奥兰多一块经过牧师在十数位卡门·科尔蒂娜的朋友面前主持悼亡经的厅堂时，安德莱阿小声对奥兰多说。

“吃了我。”

“剥了我。”

“不正经。”女演员笑道，低低的 Lux perpetua luceat eis[①]念经声模糊地掩盖住这种场合中常有的窃窃私语。

画家迪索克·安布里斯，他的面部已然全无表情。他是一个印第安的图腾，是个微型的特斯卡特里波卡，这个注定要在墨西哥-特诺奇底特兰可怕的黑夜里鬼魂般游荡的阿兹特克精灵。

迪索克斜眼向门口望去，一个高大，黝黑，一头鬈发的年轻人正搀着一个肥胖的女人走进门来，女人浑身上下无处不肥胖得鼓凸出来，而且每一寸表皮都经过再加工。她挎着年轻人的胳膊，高傲甚至旁若无人地走着，尽管她体型庞大，但却炫耀着自己步履的轻盈。她像无敌舰队的一艘帆船，在波涛汹涌的人生洋面上奋勇前行。她用小脚支撑起一个巨大的肉球，肉球顶端是一个长着金色发卷的小脑袋，发卷勾勒出她的面庞，它经过雕刻、润色、修整、拼合、恢复，像快要爆炸的气球一样时刻准备向四周伸展，虽然它上面毫无表情，纯粹是一张被无形的别针别在耳朵上，缝在下巴上的面具，而她下巴上刚刚去除的一堆赘肉似乎正想卷土重来。

① 拉丁文，大意为：愿永恒之光为他们而照。

“劳拉，亲爱的劳拉！”裹着黑纱，身上缀满珠子，这位模样可笑的来客叫道。劳拉问自己，天哪，她会是谁呢？我想不起来了，真的想不起来了！直到后来，她才发现，这个浑身结着疤的球体并没有跟自己打招呼，而是朝站在劳拉·迪亚斯身后的一个人轻捷地奔了过去，尾随着这起重机的活广告，劳拉也转过头去，看见她正亲吻一位身材恰恰与她相反，瘦小枯干的女士的面颊。那位女士身着黑衣，脖子上挂了一条珍珠项链，头戴一顶小小的英式圆柱形帽子，从帽檐上垂下一段黑纱，紧贴皮肤，看起来就像长在脸上的一样。

“劳拉·里维埃，真的是你吗。”浑身是疤的胖妇人嚷道。

“见到你真高兴，伊丽莎白，”劳拉·里维埃一边应答，一边小心翼翼地与肥硕的伊丽莎白·加西亚·杜邦，前德·加拉萨夫人分开，劳拉·迪亚斯在一旁暗自吃惊，她是伊丽莎白儿时在哈拉帕的伙伴，还记得伊丽莎白的妈妈堂娜路西亚·杜邦对她们说，姑娘们，千万不要让人看到你们的胸脯，她一边说，一边往伊丽莎白身上套一件老式的舞服，是粉红色的，上面缀满花边，还拖着长长的纱……

（劳拉就没有这种麻烦，因为她的胸部很平。可是我……妈妈。

（伊丽莎白，我的女儿，你让我生气。

（没办法，托你的福，上帝才把我造成这个样子。）

她没认出劳拉，正像劳拉也没认出她一样，因为劳拉——她斜眼在灵堂的镜子里瞟了一眼自己——自己的变化跟伊丽莎白一样大，或许，是因为伊丽莎白虽然认出了劳拉，但却由于心中尚存旧日的积怨而不愿跟她打招呼，或许是想避免，确切说，避免那些对比，谎言，你一点儿也没变，你是怎么做到的呀？是跟魔鬼签了什么协议吗？上一次见面的时候，在改革饭店的“希罗斯”，伊丽莎白看起来活像一

个患了厌食症的木乃伊。

劳拉·迪亚斯一直等到伊丽莎白·加西亚走开，才来到劳拉·里维埃身边，她伸出手去，握住的是一只瘦骨嶙峋的手，她在那黑色面纱的深处，在压在帽子底下，梳得整整齐齐的白发间寻找昔日的影子，年轻时那淡黄色的头发已经全白了。

“我是劳拉·迪亚斯。”

“我一直在等你，你跟我保证会给我打电话的。”

“很抱歉。你跟我说过要自己靠自己。”

“你以为我不会帮助你吗?”

“是你自己这么跟我说的，还记得吗?‘我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我已经被俘虏了，我的身体已经被陈规陋习束缚住了。’”

“‘但如果我可以从我自己的躯体中逃脱出来的话……’”

劳拉·里维埃微微一笑，“‘我恨他。’我告诉过你，你或许还记得……”

“我很后悔当时没有去找你。”

“我也是。”

“你知道吗?我们本可以做朋友的。”

“唉。”劳拉·里维埃叹了口气，在背转身去之前，留给劳拉·迪亚斯一个忧伤的微笑。

“她是真心爱上了阿尔特米奥·克鲁斯，”在送她回索诺拉大街的路上，在城市的一片狼藉间，奥兰多·希门内斯向她吐露，“她是个对光线着魔的女人，灯光，室内光线，还有，灯具的合理摆放，精确的电压数，脸部的着光……这些一直令她着魔。她以前是——现在也是——自己的画像的画家。她就是自己的自画像。”

(我再也受不了了,亲爱的。你得做出选择。

(耐心点,劳拉。你要想到……别逼我……

(逼你做什么了,你是害怕我吗?

(我们这样不好吗? 还缺什么呢?

(谁知道呢,阿尔特米奥,可能并不缺什么。

(我没有骗你,没有逼你。

(我没有改变你,那是另一回事。你没有准备好。而我越来越累了。

(我爱你,一如你我认识的第一天。

(现在已不是那个时候了。不是了。把音乐声开大一点。)

从出租车上下来后,奥兰多想亲劳拉。她把他推开了,心头泛上一阵恶心和惊诧。她感到那两片皱巴巴的嘴唇的摩擦,感到那张皱纹密布、干巴的粉红色烧鱼脸贴了上来,她心里感到一阵厌烦。

"我爱你,劳拉,一如你我认识的第一天。"

"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候了。我们已经看透对方。太透了。再见,奥兰多。"

那么谜呢? 这位在维拉克鲁斯时大圣地亚哥的知心朋友,隐身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阿尔莫尼亚·阿斯纳尔与外界之间的神秘邮差,并因为这件事而诱惑了劳拉的奥兰多·希门内斯,她的情人奥兰多、伴随她在墨西哥城地狱界里周旋的维吉尔,难道两个人到死都无法揭开他的那些谜底吗? 不能再把什么谜底归结到这条过时的、风干的、碌碌无为的"变色龙"身上了,他在陪她去吊唁卡门·科尔蒂娜之余,还陪她参加了墨西哥城整整一个时代的葬礼。

她宁肯永远与谜相伴。

但是,对"另一些时代"的缅怀令劳拉的嘴里有一番苦

涩的味道。家里来电了。她开始收拾掉在地上的东西,收拾厨房中的破烂家具和饭厅,尤其是客厅和阳台,那是当年劳拉·迪亚斯与豪尔赫·莫拉轰轰烈烈的爱情平息、她的家庭和解后,她与丈夫胡安·弗朗西斯科,儿子圣地亚哥和丹东,以及老迈的、维拉克鲁斯的姨妈玛丽亚·德·拉奥,观看查布尔特佩克森林午后景致的地点。

她重新摆好在地震中掉下来的书籍,从伯特拉姆·D.沃尔夫所作迭戈·里维拉的传记的书页间掉出一张弗里达·卡罗的照片,那是劳拉·迪亚斯在她去世那天,1954 年 7 月 13 日为她拍的,当时,劳拉把哈利·杰夫一个人留在特博斯特兰,自己匆匆赶往考约坎里维拉夫妇的家中。

"拿着,"哈利把一个莱卡相机递给她。他在好莱坞时曾用它拍照片。"别忘了把弗里达死着给我带回来。"

她有时真想狠狠地挖苦一下哈利。弗里达去世时肢体不全,生着病,但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还在不停地作画。哈利在一个热带山谷中奄奄待毙,但是他却没有胆量去重拾纸笔。劳拉拍下弗里达尸身的照片,不为别的,就为了拿给哈利并跟他说,"她到死的那天都没有停止创作。"

但是哈利也死了。卡门·科尔蒂娜也死了,劳拉心中对哈利的挖苦,当看到躺在小小帘子下经过整容处理的卡门的尸身时心里萌发的好笑,此刻在她面对死去的弗里达的照片时,都变成了超越爱与敬的情感。

躺在棺木中,弗里达·卡罗炫耀着她那绑着彩色绸带的一头乌发。她戴满戒指与手镯的双手静静地放在沉睡的胸膛上,那上面为了这最后一次远行挂满细细的金项链以及产自莫来利亚的银饰。绿松石耳坠不再自耳轮上垂下,而是跟她一样,平躺在那里,神秘地留驻死者的余温。

弗里达·卡罗的面容栩栩如生。她虽然阖着双眼,却依

然警觉，因为她那两道浓眉令她看起来仿佛在询问什么，那是一条危险而迷人的长鞭，是她的特征。她浓密的双眉试图、但却未能够掩盖住她的髭须，那出了名的覆盖上唇的显眼汗毛，它令人联想在她的双腿间，一个与迭戈的相似的阴茎正蠢蠢欲出，极力想把错觉变成可能，把弗里达变成双性人，并且，让她进行单性生殖，让她能够使自己受孕，并用自己的精子和雌性器官，借助于雄性器官的活力，生育出一个新的生命。

劳拉·迪亚斯就这样为劳拉·迪亚斯拍下了弗里达，她以为自己拍摄下的是一具没有生命的躯体，但是她却没有察觉到，弗里达早已踏上了前往米克特兰的旅途，那里是印第安人的地狱，只有靠三百条伊克斯昆特雷犬引路才能到达，而此刻弗里达豢养的那些无毛狗正在死者家中的院子里、屋顶平台上、厨房中悲哀地狂吠，它们是一群失去了母亲的孤儿。

弗里达·卡罗的卧姿只是一种欺骗。她早已朝着一个印地安人的地狱进发，这个地狱正如她自己所画，但没有鲜血，没有荆棘，没有折磨，没有手术室，没有铁撑子，没有断肢，没有婴孩，是一个只有鲜花的地狱，里面落着热带的雨水，地上跑着无毛狗，还堆满了菠萝、草莓、橙子、芒果、曼蜜果、柠檬、番木瓜和人心果，她将站着到达那里，既谦卑又骄傲，毫发不少，病体痊愈，未曾进过医院，不曾经历任何变故，她会跟绍洛特先生，这位米克特兰宇宙共和国的大使、死神(即此世)的外长与全权大使打招呼，“你好，绍洛特先生。”在迈进地狱时，弗里达会如是说道。

她走进地狱。人们把她从考约坎的家中抬到美术宫，并在她身上盖了一面共产党党旗，此举导致学院的领导被撤职。随后人们把她抬到火葬场，把佩戴着首饰、穿戴齐整

的她按原样送入焚尸炉中，她茂密的毛发，更有助于燃烧。在火焰升腾之际，弗里达·卡罗竟坐了起来，她一下子坐起，仿佛她还想跟多年的老友们，即20年代在大学预科中传为笑柄的“帽子派”团体道别，仿佛她还想再跟迭戈说句话，弗里达的尸身就这样在焚尸炉火苗的刺激下，挺立起来。长发燃烧，仿佛是一个光环。她给朋友们留下了最后一个微笑，消失了。

劳拉·迪亚斯手中只剩下这张她为弗里达·卡罗遗体所拍摄的照片。在照片上，死亡于卡罗而言只是一种摒弃这个世界的丑陋，去更清楚地看它的方法，而并非逃避世界的手段；是为了找到作为女人与艺术家的弗里达与真理的相似之处，而不是与美丽的相似之处。

她死了，但从她阖紧的双眼前显现过她的画作中所有的痛苦，与其说痛苦不如说恐惧，根据某些观察者的说法。不，在劳拉·迪亚斯的照片中，弗里达·卡罗身上集合了医学世界里所有的痛苦与丑陋，堕胎、毒瘤、截肢、毒品、不动的梦魇、魔鬼的陪伴，向着真理进发的苦痛的朝觐之旅，真理是美好的，因为它靠品质而非表象来辨别我们的存在。

弗里达赋予身体以形态：劳拉拍下了它。

弗里达将散落集中起来：劳拉拍下了那个整体。

弗里达，像一只百年一现的凤凰，在烈焰焚身之际，坐了起来。

她重生，为了与她的无毛狗们一道去另一个所在，去那死亡与骷髅的国度，那个肤色焦黑又喜好打扮的老鸨的家乡。

她去了，穿戴得漂漂亮亮，加入天堂中的狂欢。

二

一手拿着死去的弗里达的照片，一手拿着哈利送给她的相机，劳拉在她里约热内卢广场上的新寓所的镜子中打量着自己，自从地震把索诺拉大街上的老宅子毁掉，而丹东，房产的所有者，决定把它拆除，在原址上另外修建一所十二层的联合产业后，劳拉就搬到了这里。

"我还以为你父亲和我才是房子的主人。"当丹东去看望她，跟她解释他的新打算时，劳拉略带惊诧、但并无责备地说。

"房产在我名下有一段时间了。"劳拉的小儿子答道。

母亲的惊诧是装出来的；真正的惊诧来自于这个三十六岁男人体态上的变化，自从胡安·弗朗西斯科入土，而劳拉被她的政治家庭逐出家门后，她就一直没有见过自己的儿子。

不是鬓角那几缕灰白的头发，也不是约略有些凸起的肚子改变了丹东，改变他的是他的神气，一种哪怕在亲生母亲面前也不加掩盖的对权力的炫耀，或许正是因为在她面前，他才越发变本加厉。从头到脚，从马龙·白兰度在《朱利乌斯·恺撒》中的发式，到深灰色的西装，到窄窄的英式领带，到古奇牌皮便鞋，一切都在强调权力，自信，以及惯于让人俯首帖耳的作风。

丹东故作沉着地伸了伸胳膊，露出红宝石颜色的袖扣。

"我在波朗科区替你看好了一个漂亮的新公寓，母亲。"

不，她坚持道，我想待在罗马区。

"污染越来越严重了。交通也会阻塞得可怕。另外，住在那里也不时髦了。而且那种地方通常是地震损坏得最厉

害的地方。”

正因为这样，她重复道，正因为这样。

“你知道什么是联合产业吗？我在修建的将是墨西哥第一个。很快就会流行起来的。对等式所有权是这个城市的未来，我敢跟你保证。得跟得上潮流呀。另外，你喜欢的那种广场上的房屋不卖，只出租。”

她正是想从现在开始自己付房租，不再靠他帮助。

“你靠什么谋生呢？”

“你是觉得我已经老得不中用了？”

“母亲，请你不要太固执了。”

“我曾经以为我的家是属于我的。你非得买下一切才会快乐吗？让我按我自己的方式生活吧。”

“哪怕饿死？”

“独立。”

“那么，你需要我时，就给我打电话。”

“我不会改变主意。”

手拿莱卡相机，劳拉·迪亚斯在地震这一年，因弗里达·卡罗和卡门·科尔蒂娜分别离世坚定了一个决心。奥兰多令她回想起一个业已不存在的、堕落的、生存在重重苦难中的城市，在30年代的一天，在改革大道某个宅子里举行的聚会结束后，奥兰多曾带她去见识那座城市的面目。现在，手里拿着相机，劳拉徘徊在市中心的大街小巷，发现它在居民众多的同时却是一派荒芜。她没有找到那个堕落的城市，奇迹的真正宫廷，奥兰多曾带她走遍、试图向她证明已然病入膏肓的城市，她不仅没有找到它，而且那个30年代时就在眼前的城市，现在已变成了真正的隐没之城，或者至少它已被遗弃，被日益扩张的城区给甩在了身后。第一张照片，是中心广场的周边地区，这个广场远在阿兹特克时代

就是无数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如今它也并没有废弃,因为在墨西哥城没有一块空隙,但它也不再是市中心了,它变成了又一个街区,最古老,在某种程度上也因其历史和建筑成为最得天独厚的街区;如今在倒塌的独立天使周围,在改革大道两侧正在孕育一个新的中心,改革大道两侧,有些城区以河流的名字命名,还有一个借用一些异邦城市的名字。华莱士城区和夸乌特莫克河区。

每天有两千人,每月有六万人涌进墨西哥城,他们是为了逃脱饥饿、干旱的土地、不公、横行霸道、粗暴的酋长以及麻木,同时也是由于城市的诱惑,人家宣传说,城市里遍地是黄金,美得像天堂。啤酒广告牌上不都是金发碧眼的俏妞吗?越来越风行的电视剧的主人公们不都是有钱又穿着体面的白人吗?

对劳拉来说这一切都无法解释汹涌的移民潮,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到哪里去?他们靠什么为生?他们是什么人?

这是劳拉所作的第一篇图片记录;它总结了她的人生历程,她的外省的根,她的少妇生活,她的两次生育,她的爱情,以及她的爱情所给她带来的一切——莫拉的西班牙世界,拉克尔在布痕瓦尔德所受的非人折磨,皮拉尔在帕伦西亚的圣塔·菲的城墙前被残酷地枪杀,麦卡锡主义对哈利的迫害,弗里达·卡罗的两次死亡,先是动弹不得地死去,后来在火焰中重生之后死去——这一切都被劳拉集中在一张图片上,它拍于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墨西哥城生长出来的一个无名城市。

堕落的城市,无名的城市,在一个干旱的谷地中兴起的城市,立在砾石丛中、长在牧豆树间的城市,这里面有随意拼凑起来的房屋,纸壳与金属板搭就的洞穴,土制楼房,喝

的是有毒的水，点的是奄奄一息的蜡烛，直到有一天群众的智慧发明了从电线杆和动力塔那里偷电的方法。

因此劳拉·迪亚斯在弗里达尸身之后拍摄的第一张照片，是倒下的天使，在纤细的纪念碑脚下摔得粉身碎骨的塑像，脱离了身体的翅膀，模特安托涅塔·里瓦斯·梅尔卡多小姐四分五裂并失去双眼的面庞，若干年之后，她本人也因为对哲学家、第一任教育部长何塞·巴斯贡塞罗斯的爱，从巴黎圣母院的大钟楼上纵身跳下，殉情而死。巴斯贡塞罗斯写的传记，《克里奥尔的尤利西斯》，1935 年出版时因其直言不讳引起了轰动，奥兰多用他所能说得最动听的话说道，“这是一本应该站着读的书……”

当劳拉给哲学家的情人，破碎的天使拍照时，她不由得想起这个城市的四时天气，虽然它有着“长春”之誉，但却好像从来未有过春天。她发觉自己从未注意过年年岁岁都是怎样过去的。这个城市没有四季。1 月寒冷，2 月有沙尘暴，3 月火热，夏天阴雨连绵，10 月可尔多那左风[①] 提醒人们表象是骗人的，12 月是透明的。1 月寒冷。

她回想起在这个城市里居住的岁岁年年，在那上面她一点点叠加上巴斯贡塞罗斯的脸庞，从浪漫的青年学生到大革命中智勇双全的游击战士，到广阔阵线中伟大的启蒙者，——这一群体正是迭戈·里维拉创作壁画的源泉，——到柏格森主义哲学家，到信奉宇宙种族的美洲主义者，到与元首卡列斯及其宫廷小丑、贿赂过胡安·弗朗西斯科的路易斯·拿破仑·莫罗内斯共同竞选的总统候选人，从悔恨的流亡者，到最后他老态龙钟，脾气暴躁，为佛朗哥和法西斯主义歌功颂德，还命人删改他的著作。

① 墨西哥 6 月到 11 月间的一种南来大风。

巴斯贡塞罗斯是伴随墨西哥革命而变化的悲剧性形象,而他那倒下的情人,安托涅塔·里瓦斯·梅尔卡多,独立天使,则是固定的、象征性的、超自然的形象,她象征着祖国,英雄们以她的名义进行战斗,一边毒害她,一边跟她做爱。二者——哲学家和他的情人——如今都身处一座业已陌生的城市的废墟中,而劳拉此刻正走出家门来拍摄这座城市。

劳拉的第一张杰作总结了她的生命历程,她的外省的根,她的少妇生活,她的两次生育,她的爱情,以及她的爱情所给她带来的一切。

哈利·杰夫在奎尔纳瓦卡的死,与卡门·科尔蒂娜在墨西哥城的死,在这二者的触动下,她开始问自己,我明年做什么呢?从前,在她年轻时,一切都无法预见,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而且不管怎样,都让人心满意足。特别是弗里达的去世,更加令她回想自己的过去,它就像一张模糊的照片。地震,与奥兰多的相逢,卡门的死逼着她思考,我能够让从前再度清晰起来吗?

她的睡眠也不一样了。从前她在梦中从不思考,但却焦虑。现在,她既不思考也不焦虑。她历尽沧桑似的睡着。她睡得像个老人。

她不愿这样。她想再一次像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那样睡着,仿佛醒来时,生命才刚刚开始,仿佛爱情还是一种尚未品尝过的苦痛。她想每次醒来,都会期盼明天,记载下她最真实的情感,那在头脑与心灵交汇之处的情感。以前她对一切都熟视无睹。她不知如何对待日常事物,时间放在她空空的双手上的钱币。

城市和死亡将她唤醒。墨西哥城就像一条巨大的、睡梦中的蛇一样将她缠绕。劳拉伴着缠绕着她但并未使她窒

息的巨蛇沉重的呼吸醒过来。她醒了，拍下巨蛇。

她先拍下了弗里达。现在她要赶在儿子下令拆除前，把索诺拉大街上的老宅子拍下来。她拍下它支离破碎的外表，也拍下它打上封条的内部：车库，在这里胡安·弗朗西斯科曾存放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赠给他的汽车；饭厅，在这里她的丈夫曾跟工人干部们开会；客厅，在这里，她就像克里奥尔的珀涅罗珀[1]一样与回到家中的丈夫一道耐心等待那安详、孤寂时刻的到来；门厅，被追捕的修女格罗丽亚·索里亚诺曾藏身于此；厨房，在这里，维拉克鲁斯的姨妈，玛丽亚·德·拉奥坚持烹调维拉克鲁斯风味的传统菜肴——墙壁上至今还飘着辣椒、马齿苋和欧莳萝的香味——热水壶，它烧掉无数泛黄的旧报纸，上面刊登着关于所有当权人物、罪犯、娱乐界人物的报道：火苗吞噬了卡列斯和莫罗内斯，吞噬了隆巴多和阿维拉·卡马乔，吞噬了托洛茨基和拉蒙·梅尔卡德尔，吞噬了被人杀害的秦达·阿斯纳尔和强奸犯、疯子、杀人凶手索维拉·德拉·弗洛尔，吞噬了坎汀弗拉斯，伦巴舞女美切·巴尔瓦和马上歌手豪尔赫·内格雷特，吞噬了“利物浦港口”的便宜货，和诸如“最好更新美好拉尔”和“两千万墨西哥人不可能搞错”之类的广告，吞噬了玛诺雷特和阿鲁萨的行为，吞噬了埃尔内斯托·乌尔楚尔图庭长的城市化措施和霍阿金·卡皮亚的奥运奖牌，火苗吞噬了这一切，正如死亡吞噬了被她儿子圣地亚哥变成为圣地的那个房间一样，那个房间是他构思的源泉，是幽暗的洞穴，里面画稿

---

① 珀涅罗珀(Penelope)，希腊神话中英雄奥德修斯的妻子。她丈夫长年未归，众多部落酋长纷纷前来求婚。为摆脱纠缠，她坚持要他们等到她为奥德修斯的父亲拉厄尔特斯织完一块寿布。三年间她每夜都把白天织的布拆掉，直到奥德修斯到家，才得以解脱。

堆积如山；还有丹东的密室，那里谁也不准进入，是他想像中的房间，四壁上可能贴着从《请看》杂志上剪下的裸女照片，也可能四壁空空，像修道院那样，直到他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就像他后来做到的那样；还有双人卧室，在这里，所有劳拉曾爱过的男人都来到她眼前，我爱他们什么，爱得有多深……

她走出家门，拍摄身处重重都市苦难中的一座座堕落之城，她发现自己做的事情是拍摄下与她自己的生活迥异的生活，她不否认仅仅手持相机，独自一人走入一个生存在苦难中，而又把苦难以犯罪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城市时，心里所产生的恐惧，她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在暴土扬尘的街道上死在乱刀之下的人，她害怕听到在罪恶横行的街区边上不断逡巡的救护车震耳欲聋的汽笛声响；被醉醺醺的丈夫踢死的女人；刚生下即被扔到垃圾箱里的婴儿；先被遗弃而后被发现死在草席上，以草席权当裹尸布，死后一个礼拜还没有入土，已变成干尸，甚至连臭味都不再散发的老人；劳拉拍下这一切，她心里暗暗感谢，不管怎样，胡安·弗朗西斯科令她逃脱了这样的命运，逃脱了周围这样的暴力与苦难。

走进这堕落的城市中的一家饭馆，发现所有人都死在枪弹下，两败俱伤，同归于尽，似乎是死在某种罪恶的圈套中，他们全都没有名姓，但是此刻却因劳拉的照片而不致被人遗忘，劳拉感谢豪尔赫·莫拉令她免受意识形态的毒害，带她走进思想的世界，祛除了她一个女人对思考的恐惧；她脑海中有一幅不现实的图景，豪尔赫用舌尖舔着兰萨罗特修道院的地板，将意识形态从他自己的灵魂中，从血腥的20世纪的灵魂中舔去。

豪尔赫·莫拉仿佛是一丝春风，吹散了劳拉镜头中那些孩子生活于其中的暴力，孩子们生活在下水道，地道中，但

即便这样，那野草样的童年仍美丽得让人心醉，就好像豪尔赫清洗修道院的地板一样，劳拉的相机清洗了孩子们，孩子们是干净的，虽然他们流着鼻涕，挂着眼屎，头发脏兮兮，胳膊畸形，癞痢头，小手因乱写乱画弄得脏兮兮的，光脚板上结的一层污泥是他们惟一的鞋袜，在拍他们时，劳拉感谢哈利让她明白了忠诚的不忠，让她产生了对那惟一的、永远不会再度出现的英雄主义时代的思念。她记起罗伯特·卡帕[①]在西班牙内战中拍的那张民兵的伟大照片。

她来到警察局和医院。没人会理睬一个上了年纪、头发花白、穿着松松垮垮的裙子、破凉鞋的妇女（就是她），他们任她拍下一个双腿间密密实实地缝着一个空可乐瓶子的妇女；拍下一个龟缩在牢房中，用指甲抠下墙皮，把白灰塞到鼻孔中的吸毒者；拍下在家中，在街边被殴打的男男女女，他们淌着血，眼皮被拳头、棍棒打得肿胀起来，但与其说他们是因为这才眼前模糊不清，不如说是由于困惑的缘故；拍下"胡利娅"们的到来，即妓女和男妓，男扮女装者和毒品贩子们被送进警察局；拍下夜间对吸毒者的突袭……

生命被扔在酒店门前，从窗口投下，碾在车轮下。这些横死的生命，除了劳拉·迪亚斯的相机，再没人多看一眼，她是劳拉，她身上背负着所有的记忆，爱情与信仰，但再也不是孤独的劳拉，而是独立的劳拉，她不再依靠任何人，把赡养费退还给丹东，按时支付里约热内卢广场上公寓的房租，起初她把分散的照片和报道卖给报章杂志，后来在日内瓦大街上的胡安·马丁美术馆举办过第一次展览后，开始有私人购买她的作品，最后，她作为一颗新星与玛格努姆机构，

① 卡帕（1913—1954），匈牙利摄影家，20世纪著名摄影记者。

卡蒂埃-布勒松[1],英格·莫拉和罗伯特·卡帕所在的机构,签了约。

女艺术家见证了城市的苦难,但同时,也见证了它的喜悦。劳拉和沐浴在母亲视线中的新生婴孩,仿佛耶稣本人重新来到人世;劳拉和脸上带着刀伤,野性被驯化的男人,后者在虔诚地亲吻瓜特鲁佩圣母像;劳拉和小小的愉悦,连同悲剧的预兆在成人礼上、婚礼上、洗礼上:劳拉的相机,在记载下瞬间的同时,也记载下这一瞬间的未来,这就是她艺术的力量,一个延续的瞬间,一只美学的眼睛,它在俗事中找到温情,它在最极端的暴力中找到爱的温柔,这话不仅是评论家所说,还是她的崇拜者们的感觉。劳拉·迪亚斯在六十岁时成为墨西哥一位伟大的摄影艺术家,自阿尔瓦雷斯·布拉沃[2] 之后最杰出的摄影家,人们管她叫"无形事物的女祭司",用光线写作的作家,她拍摄的,就是波萨达[3]雕刻下来的东西。

获得独立和名声后,劳拉·迪亚斯把死去的弗里达的照片珍藏起来,她永远不会把它公开于世,这张照片是劳拉头脑中丰富的记忆的一部分,是一个生命的情感文献,这个生命,在成熟后就像一株花期迟晚但却长开不败的花一样,绽开怒放。弗里达的照片是劳拉在跟别人共同生活时未能拍下的那些照片的见证,是一个护身符。在迭戈与弗里达身边,劳拉不知不觉间,就像在梦中一样,积累起艺术灵感,而她用半生的时间才让这种灵感得以盛开。

她不后悔那段时间,也不把它看成是一个依附于男人

---

① 卡蒂埃-布勒松(1908—),法国著名摄影家。

② 阿尔瓦雷斯·布拉沃(1902—2002),墨西哥摄影家。

③ 波萨达 (1851—1913),墨西哥版画家。

世界的时期,怎么会呢?在那段日子里,有她的两个圣地亚哥,有她的情人豪尔赫·莫拉,奥兰多·希门内斯和哈利·杰夫,她的父母,她的姨妈们,快乐的黑人清洁工老桑帕亚,还有她可怜又让人同情的丈夫胡安·弗朗西斯科。她怎么会忘了他们呢?但她又多么后悔没有拍下他们呀!她设想自己的眼睛是照相机,能够把她生命中六十个寒暑的所见所感拍下来,她感到一阵颤栗。艺术是选择。艺术是以几乎放弃一切为代价换得一小部分的拯救。

不可能同时拥有艺术和生活,劳拉·迪亚斯最终感谢生活走在艺术的前面,因为后者,早熟也好,甚至丰富也好,都会杀死前者。

这时,她发现了一件早该明白的事情,这时,她在索诺拉大街老宅子的瓦砾间清理出她儿子小圣地亚哥的画作,把它们带往里约热内卢广场上的新公寓。这时,她在成堆的铅笔画、蜡笔画、素描和数十幅油画中间找到了那幅一对裸体情侣的画,他们对望着,没有肉体的接触,只有对对方的渴求,但这已足够。

她匆匆离开倒塌的老宅子,搬到里约热内卢广场上自己的公寓中,开始她独立的新生活,并追随迭戈·里维拉和弗里达·卡罗留下的灵感,出门去拍摄城市和人们的生活,在这一片匆忙中,劳拉没顾得上仔细观看自己儿子的画作。可能是她爱他爱得太深切了,所以她不愿接近那些证明他存在过的实物,只想让他继续活在母亲的心间。可能只有在她发掘出自己的才能后,才会明白儿子的才能。她在准备整理自己拍摄的照片时,转而去整理圣地亚哥·洛佩斯·迪亚斯的画作,在数十幅油画作品中,此刻她正在观看的这幅画吸引了她的注意力:互相凝望着却又没有接触对方的一对男女。

她起初对这幅作品颇不以为然。人物身上弯曲、醒目、简洁而残忍的线条，来自圣地亚哥对埃贡·希勒的崇拜和他对维也纳画册的长期研究，这些画册奇迹般来到跑马场区的那家德国书店。在将儿子的画幅与维也纳画册进行比较后，劳拉很快发现，它们的差别在于，希勒的人物几乎总是惟一的、孤独的，或者偶尔人物们会放荡而天真地缠绕在一起，但仅限于形体上、生理上僵硬的碰撞，而且总是——单独或团体——没有空气，只有人物，不涉及景物，房间或任何空间，就像最现代的艺术家嘲讽地回归最古老的技法，希勒这个表现主义者回到拜占庭画派，根据这一派画风，造物主上帝的形象要先于创作任何形象固定下来，存在于肃穆的绝对空间中。

年轻的圣地亚哥的这幅作品无疑从埃贡笔下痛苦的人物中汲取了营养，但就像一种对再生的再生，一如乔托[1]与马萨乔[2]对待拜占庭古老的肖像画法那样，他把空气、景物与地点还给了人物。圣地亚哥画中的裸体男子身形消瘦并被看不见的荆棘洞穿，他年轻，还没多少体毛，但是他的脸显示出一种无法战胜的恶，一种疾病侵蚀了他那表面没有伤痕，而内里已被蛀空的躯体，因为没有人征得他的同意就把他给创造出来，他死死盯着金发裸体女人凸起的小腹，——劳拉立刻去圣地亚哥的藏书中寻找类似的形象——：她像荷尔拜因[3]和克拉纳赫笔下的夏娃，命里注定要去被动地征服那个少了一根肋骨的男人，但是这一次却

---

① 乔托(1267—1337)，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

② 马萨乔(1401—1428)，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画家。

③ 汉斯·荷尔拜因(Hans Holbein)，叫这个名字的画家有两位，为父子二人，荷尔拜因(约1465—约1526)与小荷尔拜因(1497—1543)，此处似指后者，为德国肖像画家、版画家。

因欲望而扭曲。从前的夏娃们不安分,是祸水,而这一位,小圣地亚哥崭新的夏娃,却在分担着抽搐的、年轻的、身受折磨的亚当的痛苦,亚当紧盯着女人的小腹,而她,夏娃,则紧盯着男人的双眼,两人——直到这时劳拉才注意到这个细节,然而它却至关重要——的双脚没有踩在地上。

他们不是在漂浮,而是在上升。当她理解了儿子的这幅画的涵义后,劳拉为之深深打动了。这个亚当,这个夏娃没有堕落。他们在上升。在他们脚下,苹果皮与蛇蜕混成一个整体。亚当与夏娃离开了乐园,但却没有堕入苦难与劳作的地狱。他们犯下的是另一种罪过。他们在上升。他们背叛了神谕——你不要吃那个果实——非但没有堕落,而且在飞升。感谢性欲,叛逆和爱情,亚当与夏娃成为人类飞升的主角。世间的恶在于相信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堕落了,并让我们继承邪恶。对小圣地亚哥来说,相反,亚当与夏娃的过错不是世代相传的,甚至连过错都谈不上,伊甸园里上演的一幕是人类反抗天威的解放。它不是戏剧,而是历史。

在儿子的画中背景深处,劳拉看见画着一只小小的黑帆船,它正在远离伊甸园的海岸线,船上只有一个孤独的乘客,一个微小的、被古怪地分成两半的人物,他的脸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一半头发是金色的,一半是火红色的,但是他的身体裹在一件鼓起的长斗篷中,这一点跟魔鬼和天使都无二致,劳拉猜想,二者都是上帝,他一手握着十字架,一手握着马刀:两件意味酷刑和死亡的器具。情侣在飞升。堕落的是上帝,圣地亚哥画的就是上帝的堕落:一种远离,一种距离,上帝的脸上有股诧异,他莫名其妙地离开伊甸园,因为他创造的生灵竟然会反叛,竟然决定飞升而非堕落,他们嘲弄了神的奸计,神创造世界仅仅是为了让人们把

罪恶世代相传,目的是让世间的男女千秋万代都在他面前低下头颅,依赖他,听他审判,只有神才能根据他反复无常的心意赦免——在他们再次堕落之前——他们。

在画幅下面,圣地亚哥在画布上写下了:“艺术不是现代的,它是永恒的。埃贡·希勒。”

线条压制住色彩。所以色彩才要这么强烈。黑色的船。造物主半边红色的脸。红绿色的苹果皮,它同时也是蛇蜕。但是夏娃的皮肤却像曼姆林的淑女一样晶莹剔透,而亚当的皮肤则暗淡无光,黄绿色,病恹恹,就像希勒画中的少年。

男人望着女人。女人望着天空。但是两人谁也没有堕落。因为他们都在渴求对方。劳拉在心中比较她与儿子、早夭的艺术家的情感后,找到了他们在创作上的异曲同工之处。

她把小圣地亚哥的画挂在公寓的客厅中,从此她明白了儿子是母亲的父亲,摄影家劳拉·迪亚斯不知不觉间,从她自己儿子身上学到的东西远远超出她从任何一位别的艺术家那里学到的东西。起初,她没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认同,秘密的、人所不知的认同,才会这么强烈。

现在什么都不重要了,只要有情感的共通。

三

影展络绎不绝。劳拉的照片先是被卖给报章杂志而后又结集出版。

飞禽走兽的祝福。

大胡子的老人聚在一起高唱革命时期的歌谣。

卖花人。

圣胡安节时满满的蓄水池。

一个冶金工人的生活。

一个护士的一天。

她的杰作之一是一位死去的吉卜赛女人,在她胸脯上摊开的手掌上已经没有纹路,一个命运模糊的吉卜赛女人。

现在,轮到她偿她欠豪尔赫·莫拉的债:一篇关于流亡在墨西哥的西班牙共和派的报道。

劳拉发现,西班牙内战在很多年中,都曾是她政治生活的中心,对她影响之深远超过墨西哥革命,后者浮光掠影地滑过维拉克鲁斯州,好像死亡是仅仅给予劳拉的哥哥,圣地亚哥·迪亚斯一个人的感人而又不容他人染指的特权,对劳拉来说,圣地亚哥是1910年革命惟一的主人公。

在西班牙,相反,战斗着豪尔赫·莫拉,巴西略·巴塔萨尔和多明戈·比达尔;在西班牙,年轻的美国佬,吉姆,牺牲了,忧伤的美国佬,哈利,活了下来;在西班牙,年轻貌美的皮拉尔·门德斯被她的共产党父亲,镇长阿尔瓦罗·门德斯下令枪决在圣塔菲·德帕伦西亚的拉丁门前。

背负着沉甸甸的爱,劳拉开始拍摄在墨西哥的西班牙流亡者们的脸孔。卡德纳斯总统收留了二十五万共和党人。每当劳拉拍摄他们当中的一位,她总会动情地想起豪尔赫前往哈瓦那去搭救停泊在莫罗斯的欧根王子号船上的拉克尔的情形。

她的每一个模特都可能遭受这种命运:监狱、酷刑和断头。她明白。

她面对的是生的奇迹。她清楚。

哲学家何塞·高斯,他本人跟豪尔赫·莫拉与拉克尔·门德斯-阿莱曼一样是胡塞尔的门生,高斯俯在马斯卡龙学院庭院的铁栏杆上,哲学家长着一颗古罗马贵族的头颅,秃顶

而棱角分明，他的下颚坚定，唇线坚毅，近视镜片后的眼睛闪烁着怀疑一切的光芒，他的小圆眼镜仿佛是专门用来为一个哲学界的弗朗茨·舒伯特服务的。高斯俯身在铁栏杆上，哲学系的男女学生们从美丽的庭院中扬起头来，崇敬地望着恩师。

路易斯·布努埃尔约她在巴拉多酒吧见面，电影艺术家向他最喜爱的酒保，科尔多瓦，点了上好的马提尼酒，此时，他脑海里正在过一部文化界的电影，从马德里的学生公寓，到拍摄《一条安达卢西亚的狗》，那里面布努埃尔和达利用一个贴上睫毛的死鱼眼睛替代女主人公被剃须刀剖开的眼睛，到《黄金时代》，以及里面那块代表教阶制度的马约尔卡海边的石头，到参与巴黎的超现实主义运动，到流亡纽约，到被达利告发（“布努埃尔是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他亵渎神灵而且相信无政府主义，现代艺术博物馆怎么可以容忍这种人的存在呢？”），到口袋中揣着四十美金来到墨西哥。

欢愉、愤怒与遐想依次、同时地闪过布努埃尔绿色的眼睛，他的视线定格在过去的某个点上，劳拉拍下阿拉贡村庄卡兰达的一个小孩，在受难节上他拼命地敲鼓，直到手上流出血来，因为他想借此摆脱皮拉尔圣母给他带来的肉体的诱惑，在他童年的床上，她诱他手淫。

在莱尔马大街一个寒酸的公寓中，劳拉在巴斯克作家卡洛斯·布朗科·阿吉纳加的帮助下，拍到了马拉加杰出诗人埃米里奥·普拉多斯，她跟豪尔赫·莫拉以前就认识他，此刻他栖身于几间陋室，堆积如山的书籍和纸张中，脸上每根线条都露出疾病和流亡的刻痕，但是他却能够把苦难转化成两样东西，劳拉拍下了这两样东西。一样是他那宛如流浪的西班牙圣徒的脸上无尽的温情，这张脸藏在雪白的头发和厚厚的眼镜后面，仿佛是羞于自己的天真，所以要躲藏

起来。

另一样是在苦难、贫穷、沧桑、衰老和流亡背后的抒情的力量。

如果我能给你
黎明所有的曙光……
我会像太阳一样，缓缓穿过，
你的胸膛，
直到夜晚才离去，
不带血痕，没有痛伤……

马努埃尔·贝德罗索是个博学的安达卢西亚老人，曾担任塞维利亚大学的校长，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崇拜他的青年学生，他们每天陪他从中心广场边的法律系走到他位于亚马逊大街的居所。劳拉为这段路程留下图片的见证，还拍下在大师图书馆中的一次次座谈，他的图书馆中摆满散发着热带烟草气味的古老珍本。佛朗哥分子放火烧毁了他在塞维利亚的图书馆，但是贝德罗索像大海拾珠般一件件把它们从拉吉尼亚的旧书店，墨西哥城的盗贼们销赃之所中淘了回来。

有贼偷他，还有别的贼偷别人，但书籍却像忠心耿耿的爱人一样，总是能回到贝德罗索瘦长的手掌中，他就是埃尔格列柯画中的骑士，他的手总像上了弦的箭，时刻准备伸出，仿佛是为了劝诫世人，或者为了召集一个思想的仪式。劳拉抓住了他伸出修长的双手的瞬间，他在为世界祈求一丝光明，平息敌对的火焰，坚定他墨西哥学生们的信仰。

劳拉也拍下一群吵闹、快活、总在争论中的真诚的年轻流亡者，他们适应了墨西哥，但从未忘记西班牙，他们讲话

时还在发C的音,把个人好恶摆在脸上:巧克力与神父先生,佩雷斯·加尔多斯的小说,咖啡馆中的聚谈,身穿黑衣的老妇,津津有味的闲话,怨歌与斗牛,教堂钟声和葬礼的守时,为了躲避魔鬼、人世和肉欲的诱惑而永远躲在床上的家庭的缺乏理智。劳拉拍下他们一直在进行并将会永远进行下去的永恒的争论,他们就像爱尔兰人一样彼此陌生,因为他们来自马德里和纳瓦拉,来自加利西亚和巴塞罗那,因为他们名叫奥泰萨,塞拉·布伊格,穆纽斯·德巴埃纳,加西亚·阿斯科特,希拉乌,杜兰,塞哥维亚和布朗科·阿吉纳加。

然而劳拉最喜欢的则是被丹东称为“40年代乔吉俱乐部中最受欢迎的女宾”的女流亡者。她跟她的丈夫住在比亚龙金大街上一栋奇形怪状的房屋里,她浑身上下完美无缺,令劳拉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点瑕疵,令她绞尽脑汁也无法在一张照片或者一千张照片中穷尽她所有的魅力,她苗条,袅娜,优雅,在家中她赤脚走路,像猫一样,身后如影随形般跟着另一只猫,它的女主人令所有猫族中的雌性既仰慕又嫉妒,因为她身姿迷人,下颏柔弱,眼眸忧郁,银铃般的笑声富有感召力。

玛利亚·路易莎·埃利奥心里藏着一个秘密。她的父亲自1939年开始就藏在纳瓦拉一个村庄的帐篷里,因为他被长枪党人宣判了死刑。她不能跟人说起这件事情,但是,父亲居住在女儿的眼睛里,那是一双因痛苦和期待变得清澈无比的眼睛,她期待着有一天,幽灵一样的人能够逃出西班牙,出现在墨西哥女儿面前,一如想像中他的样子:肉身的鬼魂,望穿秋水后的记忆。

还有一个肉身的鬼魂,这一次的确是太鲜活了,但最后他变成了迷恋自己话语的色鬼,他就是路易斯·塞尔努达,一位举止高雅、衣着讲究的同性恋诗人,他不时出现在墨西

哥,接待他的总是他的伙伴奥克塔维奥·帕斯,他们之间时有纷争,因为塞尔努达的清高太无耻,帕斯的清高太虚伪,但他们最后总能言归于好,因为两人对诗歌有着共同的狂热。对路易斯·塞尔努达的评价越来越高:他是同时代诗人中的佼佼者。劳拉·迪亚斯想离他远一点,以便能更清楚地看他,剥掉他的表层,剥掉他马德里翩翩佳公子的伪装,请他朗读:

我想在爱情死去的时候活着……
你的死唤醒了我死的愿望
就像你的生曾唤醒我生的愿望

还缺少巴西略·巴塔萨尔,但是,线总是交叉,劳拉摄影展的时间总对不上巴西略所在大学的假期,但不管怎样,劳拉在美术馆的中心立起一个空相框,在旁边写上她老朋友的名字。

这看不见的照片同时也是为了向不在的豪尔赫·莫拉表示敬意,劳拉决定尊重身在远方隐姓埋名的他的意愿,因为他是她最爱的人,也许巴西略没有他同伴豪尔赫的陪伴,就不可能出现在关于西班牙流亡者的影展上。

那比达尔呢? 失踪的不仅是他一个人。

美术馆的馆长马鲁·布洛克告诉劳拉一件怪事,每天下午六点钟左右,一个黑衣女人都会走进大厅,在巴西略·巴塔萨尔的空白相框前驻足整整一个小时——一分钟不多,一分钟不少,虽然她从来不看表。

几乎一动不动,有时她把身体重心换到另一只脚上,或者稍稍走开一公分,或者歪歪头,好像是为了更好地欣赏那并不存在的东西:巴西略的照片。

劳拉不知是该服从好奇的天性，还是要保持谨慎。一天下午她走进美术馆时，正看见黑衣女人站在缺席者那空白的照片前。劳拉不敢走近，但是她，神秘的来客，却半转过身子，好像受到了劳拉目光中磁石的吸引，露出了她的真面目：这是一个四十来岁，长着一双蓝色眼睛，沙黄色头发的女人。

她望着劳拉，但没有微笑，劳拉很感激那个女人的矜持，因为她害怕那个女人张开嘴巴时她会看到什么。美术馆来客用既冷漠又紧张的神情来掩盖她目光中流露出来的激动，但是没能成功。她意识到这一点，把秘密转移到吃力地合在一起的嘴唇那里，很显然她那么吃力地合起嘴巴是为了掩盖什么……是牙齿吗？劳拉问自己，这个女人不想让我看到她的牙齿吗？劳拉只能靠仅有的两只眼睛来辨认她，劳拉已然习惯了发掘目光，捕捉它的神韵，她在黑衣女人的目光中看到了月亮，看到了燃烧干柴和稻草的火把，看到了山中的野火，劳拉骤然停下来，咬紧下唇，仿佛是为了刹住自己的回忆，为了不去回忆这些话，莫拉，豪尔赫·莫拉曾经说过，那是在巴黎咖啡馆中，二十年前，他身边坐着格雷戈利奥·比达尔和巴西略·巴塔萨尔，保护他们的是5月5号大街咖啡馆中狂狷的氛围，可只要一开口，就会像野狼和公牛和风和山间的灯火一样，暴露在最恶劣的环境之中。

“我是劳拉·迪亚斯，照片的作者。我可以为您做点什么吗？”

黑衣女人转过头去，看着巴西略·巴塔萨尔空空如也的相框，对她说道：劳拉，要是你认识这个人，就通知他我回来了。

她终于微微笑了笑，露出被毁得惨不忍睹的牙齿。

第二十二章　里约热内卢广场:1965 年

圣地亚哥·洛佩斯-阿尤布,劳拉·迪亚斯的孙子,在1965 年圣诞节这天,带着他的女友劳德斯·阿尔瓦罗,来到祖母家居住。公寓虽很破旧,但却宽敞,这座楼房是幸存下来的上个世纪的遗物,1922 年新婚的劳拉刚来到这里时眼中的那座五彩缤纷家家户户住在二层小楼中的城市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变迁。现在,墨西哥城还在不断膨胀,它就像一个瞎眼巨人一样,所过之处一片狼藉,它一路推倒 19 世纪的法式建筑,18 世纪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以及 17 世纪的巴洛克式建筑,就像捻着一串回溯的念珠,历史被不断磨蚀,直到它就像一块包含着难言的疼痛、苦难与忘却的溃疡一样,一直糜烂到阿兹特克旧城的故址。

劳拉不理睬儿子的傲气,拒绝丹东假仁假义的帮助后,径自搬进里约热内卢广场的老房子里,并根据自己的需要重新设计了房屋的布局——生活空间,以及同时必备的暗室,档案室,图片资料架。一生中,她头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房间,著名的"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即维吉尼亚·沃尔芙为广大女性争取的神圣空间,独立的最小堡垒:主权握在自己手里的小岛。

她五十八岁离开索诺拉大街上的老宅子,到现在六十七岁,她早习惯了独立、自由地生活,她如今有自己的职业,有生活来源,功成名就,但她并没有对孙子的到来感到丝毫

不适，因为圣地亚哥和劳德斯让她再度青春焕发，家务活是由三人默契地共同分担，餐桌上的交谈总是给他们带来可以解释却无法预料的财富，自从圣地亚哥出现在劳拉家门口那一刻起，三人的共同生活就注定他们要品味相同的渴望，注定他们彼此息息相关。奶奶，他来到劳拉家门口，说道，我再也不能住在我父亲身边了，可我没钱，没办法独立生活和养活我的女友。

“你好，我来介绍一下。我是你的孙子圣地亚哥，这是我的女友劳德斯，我们来投靠你了。”圣地亚哥笑了笑，露出了丹东那副雪白、整齐的牙齿，但是他的眼睛，温柔忧郁，跟他伯伯圣地亚哥的一模一样，他举手投足间仪态潇洒，甚至有些做作的痕迹，这又不由得让劳拉联想起那位装扮成公子哥儿模样、维拉克鲁斯革命中的“赤色地榆”，第一位圣地亚哥。

劳德斯·阿尔瓦罗，容貌美丽，朴素大方，她跟现在所有的年轻人一样，穿着长裤，今天穿件涂着切·格瓦拉的 T 恤衫，明天穿件涂着迈克·贾格的 T 恤衫，一头乌黑的长发，不施脂粉。她身材娇小玲珑，“小娇娘，体态妙”，这是《真爱诗集》中的句子，记得豪尔赫·莫拉曾经引用过，来打趣劳拉·迪亚斯那日尔曼人的身材。

这对青年情侣的到来令劳拉感到由衷快慰，她张开双臂把他们拥在怀里，他们有权利现在就享受幸福，而不是像劳拉与豪尔赫，或者巴西略·巴塔萨尔与皮拉尔·门德斯那样，要经受二十年的风雨磨折，后面这一对终于团圆了，而劳拉与豪尔赫却做梦也不敢有此奢望，因为命运从来不会两次给悲剧安排下一个美满的结局。

因着这一切，在劳拉·迪亚斯眼中，圣地亚哥第三和劳德斯享有世间的所有权利。因为丹东的不孝和他妻子的傲

慢，她从没见过自己的孙子，但他却认得她，他认得她，崇拜她，因为他说他马上就要上大学了，学的是法律，自己身上既没有奶奶也没有早亡伯伯的艺术天分。

“那幅一对恋人在对望的画，是他画的吗？”

“是的。”

“他可真是个天才，奶奶。”

“没错。”

他从不自吹自擂，他还不到二十岁，但劳德斯有一天晚上在准备晚饭，做番红花鸡爪饭时，对劳拉说，圣地亚哥真是个男子汉，才这么点岁数就敢作敢为，堂娜劳拉，他就是看见裹死人的席子，也不会眨一下眼睛。有一阵子我担心自己成为他的负担，会影响他的前途，尤其是他跟父母的关系，可您瞧，堂娜劳拉，他在父母面前态度多么坚决，让我觉得他需要我，我不是他的负担，而是支撑，他尊重我……

他们是在大学预科的舞会上相识的，圣地亚哥很喜欢参加这类舞会，而不喜欢他父母或他父母的朋友们组织的聚会。他们组织的聚会极其严格，邀请的只有“相熟人家”的子弟。在预科学生的舞会上，相反，没有门第之分，只要是同道中人，就可以前来，而不管财产多少或家庭关系如何，大家可以连同女友、姐妹一块儿前来，偶尔还会出现一两个单身女郎(因为未婚女子无人陪伴就不得抛头露面，这样的传统还远没有消亡)。

丹东很赞成大学预科学生这样的聚会。学校里建立的友谊才是天长日久的，尽管你母亲只想让你参加我们这个阶级的聚会，但是孩子，要是你留心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统治我们的人从来都不是名门望族的子弟，他们要么是在社会底层要么是在中产阶级中成长起来的，在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时候，是结识他们的最好时机，因为有一天，我跟你保

证,他们会对你加倍相报的。穷朋友,在丹东的眼里,是笔稳妥的投资。

“在墨西哥只要你有本事,就可以出人头地,圣地亚哥。切记。”

在法律系的第一年,圣地亚哥结识了劳德斯。她学的是医护专业,来自埃斯贡迪多港,位于俄阿哈加州的海滨,在那里她父母有个旅店,旅店虽然谈不上高级,但是它的“台马斯卡”却远近闻名,她说。

“什么是‘台马斯卡’?”

“一种加香草的蒸汽浴,可以帮助你去除体内的毒素。”

“我觉得我现在正需要这个,你请我去吗?”

“随时可以。”

“太棒了。”

他们一起来到埃斯贡迪多港,在太平洋岸边一片陡峭的海岸上,两人相爱了。那片海岸表面上是个波浪不兴的沙滩,实际上却是一个深渊,人在上面一个闪失就会失足落下,就在圣地亚哥措手不及,张皇失措,无力对抗裹挟着他的急流之际,劳德斯纵身跳入水中,用一只胳膊绕住他的脖子,用另一只自由的胳膊划水,一直把他带到岸上,在那里精疲力竭却又兴奋异常的他们,把初吻奉献给了对方。

“你跟我讲这些的时候,声音还在颤抖。”劳拉对劳德斯说。

“那是因为我害怕,堂娜劳拉。”

“别再堂娜堂娜地叫我了,把我都叫老了。”

“好吧,劳拉。”

“你害怕什么?”

“圣地亚哥的父亲很严厉,劳拉,他受不了有什么事情不按他的命令办,否则他会暴跳如雷,非常吓人。”

"那只小狮子并不像人们形容的那样可怕。他吼叫,吓唬别人,你也吼回去,那样他就老实了。"

"我不会。"

"我会,宝贝。我会。你不用担心。"

那个瘟神亲自去了埃斯贡迪多港,奶奶,通常情况下他总是差遣自己的爪牙去吓唬人,但是这次他亲自乘坐私人专机去见劳德斯的父母,并告诉他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他儿子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想找刺激,是因为不听父母的话和疏于管教,他让他们跟自己女儿说清楚,不要上圣地亚哥的当,让她小心点,很可能他会让她怀孕而后再甩了她,但是,不管她是否怀孕,圣地亚哥都会甩掉她的。

"您儿子可没有跟我们说过这些话。"劳德斯的父亲说道。

"是我这么跟你们说的,我的话才算数。"

"我想听您儿子亲口说出这些话。"

"这里没有他讲话的分儿。他是个给宠坏了的孩子。"

"一点儿不错。"

"您不要再固执了,阿尔瓦罗先生。不要固执了。我从来不做游戏。您要多少钱?"

丹东并没有把圣地亚哥当成"给宠坏了的孩子"。他只是把"现实"摆在他眼前。他是独子,很不幸,他母亲没法再怀孕,再怀孕会要了她的命,圣地亚哥是他母亲全部的寄托和心肝宝贝,但是他丹东,作为父亲,不得不更严厉和现实一点,他不能感情用事。

"你将来会继承我的财产。你学习的是法律,这一点很不错,虽然我建议你本科学经济,然后去美国学习工商管理。做父亲的当然希望儿子把自己的事业延续下去,而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的。不会让我和深爱着你的母亲失

望的。”

她是一个红颜逝去的女人,“就像露珠一样”,这是她本人的习惯说法。马格达莱娜·阿尤布·德·洛佩斯-迪亚斯直到中年以前还保持着当年在星期天的乔奇俱乐部时吸引丹东的迷人之处。这些迷人之处表面看来是她的缺陷,浓眉,高鼻梁,方下巴,对应着一双阿拉伯公主般朦胧、漆黑的眼睛,这双躲在眼影下的眼睛善于传情达意,仿佛是隐藏的性器一样撩人。相反当时大多数待字闺中的小姐,虽然容貌美丽,但是却太“规矩”了,她们获准离开修女们办的学校后,就像身体里某个隐秘部位被人打上“准许出版”的标记一样,终于可以抛头露面了。她们有着法国圣心学院毕业的姑娘们——俗称“靓妞”——的膝盖、手肘、脚踝,模样虽然不错但却不免乏味。她们的脸蛋,年轻的丹东嘲笑说,虽然能用但已经褪色了。

马格达莱娜·阿尤布,丹东刚堕入爱河时管她叫“我的梦”,她与众不同。另外她还是圣地亚哥第三的母亲,为了生他,堂丹东的太太年轻时的容颜一下子丧失殆尽,她被医生宣判:再生一个孩子,您就没命了,太太。她的眉毛还是那么浓密,同时,她也赢得了一副宽胯骨。

圣地亚哥从小到大都有一种负罪感:我母亲生我时差点死掉,我的弟弟妹妹们也因为我的缘故没办法来到世上,但是丹东把这种负罪感变成责任。圣地亚哥,因为是独子,因为他的生命几乎是用母亲的生命换来的,现在,在快满二十岁的时候,必须担负起应该担负的责任来,这些责任毫无过分之处。丹东要求儿子的也无非就是:学习,拿到学位,跟一个门当户对的姑娘结婚,积累财富,传宗接代。

“还有,儿子,给我一个幸福平静的晚年。我觉得这是我配得的,在辛辛苦苦这么多年之后。”

他说话时，一手插在蓝色条纹西装的口袋中，一手理着自己的领子。他的脸就像他的西装一样：严肃，布满纹路，在胡子眉毛和黑发的衬托下，呈现出铁青色。他这个人，从头到脚，都是深蓝色的。他从来不看自己的鞋子。它肯定光可鉴人。没有必要看。

圣地亚哥第三对他父亲给他设计的前途没有任何异议，直到他爱上了劳德斯，丹东对此反应粗暴而大失风度，从那时起圣地亚哥眼中的父亲就开始有了这样的形象，他爱他，感谢他给予他的一切，按月的零花钱，四门雷诺轿车，新鲜玩意儿"美洲邮政卡"（虽然有花销限额），可以随意在"马卡萨卡"那里订做西装（虽然圣地亚哥宁可穿皮夹克和牛仔裤），他从来没有仔细想过支撑他父亲说出"世界就该如此"的是着什么样的动力、行为、道理甚或不幸，他的父亲事业有成，德高望重，在这一切的武装下，他可以对他的儿子说，"你得沿着我的路走下去"，而对儿子的女友说，"你不过是一块绊脚石，滚开，否则，我就一脚把你踢开"。

父亲的态度激怒了年轻的圣地亚哥，他起初很生气，但随后他做出的事情却是他以前想都不会想到的。年轻人明白了自己的真正想法，意识到劳德斯也有同样的心思；两人不待形势明了，是不会睡在一起的，既不会因为一次不该有的怀孕而"欺骗"对方，也不会去有意挑逗对方。同时，圣地亚哥也开始思考，我父亲究竟是什么人？谁给他的权力让他指挥别人，他凭什么那么自负？

他对劳德斯说，我们要比他更聪明，亲爱的，我们不要再天天见面了，只可以在星期五晚上偷偷见上一面，让老头子察觉不到什么蛛丝马迹。

圣地亚哥对丹东说，好吧，他去学习法律，但是他想实习，希望能够在他父亲的办公室里帮帮忙。丹东被喜悦冲

昏了头脑。他想像不到给自己的儿子在“代理商协会写字楼”中找个职位会带来什么危险，代理商协会写字楼是改革大道上一座亮闪闪的不锈钢和玻璃结构的建筑，它距离哥伦布塑像和革命纪念碑只有咫尺之遥。那里从前是老贵族纳尔贡·德尔·罗萨尔的巴黎式房屋，房子上开有天窗，期待墨西哥的雪花飘落，而老贵族的本领在于，在卡门·科尔蒂娜组织的社交晚会上，当众把他的单片眼镜(果冻做的)吞下去。而改革大道，这条卡尔洛塔皇后为连接她居住的查布尔特佩克城堡和市中心，并仿照她家乡布鲁塞尔的路易斯大街样式而修建的大道，如今却越来越像休斯顿或达拉斯的一条大街，两旁挤满了摩天大楼，停车场和快餐店。

在那里，圣地亚哥会锻炼自己，会走遍大楼里的角角落落，会了解到所有情况，他是老板的独生子……

他和档案员交了朋友，档案员是个斗牛爱好者，他就送票给他去看小何塞·乌埃尔达和马努埃尔·卡佩迪尤的斗牛表演。他和接线员们交了朋友，给她们弄到楚鲁布斯科摄影棚的通行证，让她们看丽维尔达·拉马尔科拍电影，拉马尔科就是那位阿根廷女探戈表演艺术家，在奎尔纳瓦卡的电影院里，她一次次地让哈利·杰夫流出动情的泪水。

每天给堂丹东打电话的阿尔特米萨小姐是什么人？为什么圣地亚哥不在跟前时，人们就小心翼翼地谈论她，而当老板的公子一来，人们就哑口无言了呢？有时他父亲在电话里恭恭敬敬，诚惶诚恐，好的，先生，愿意为您效劳，好的，听您的吩咐，对方是什么人呢？这有别于那些只能够接受简短、严厉、直截了当命令的人，我马上就要，古帖利托斯，别给我睡觉，这里不是懒猪们待的地方，我看你都快懒到家了，你怎么了，方塞卡，又在睡懒觉了，好，我等你十五秒钟，要么，您就另谋高就吧，比这更恶劣的是，有的人干脆就受

到严重威胁，如果您还想着自己的女人和孩子，最好就照我说的办，我要是不发号施令，那些听差非反了不可，而您，雷伊诺索，只要想想文件在我手里，要是我把它交给上面，您就惨了。

"听您吩咐，先生。"

"马上把文件给我送上来。"

"跟您无关的事您就别掺和，混蛋，否则说不定哪天早上醒来舌头就给人割掉了，把卵蛋含在嘴里。"

圣地亚哥一边深入到他父亲控制下的金属和玻璃的迷宫当中，一边温柔、贪婪地寻找劳德斯的爱抚。温柔和贪婪是因为"必要"，但同时也是"爱"的两个代名词。在电影院中他们手拉着手，在咖啡厅中他们深情对望，他们在圣地亚哥的汽车中接吻，在黑暗中摩挲对方，但是他们要等到两个人真正居住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最终结合。他们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即使有时候，其中一个或两个人都会觉得这种举动有多么古怪乃至可笑。他们两个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喜欢拖延。想像。

阿尔特米萨小姐是谁？

她的嗓音低沉却甜美，当她在电话里对丹东说"我爱你，我的小东，我爱你，甜心"时，这声音的甜美达到了极点。圣地亚哥在父亲电话的分机里偷听到这段甜蜜对白时，笑得几乎背过气去，而当他听到严肃的堂丹东说："我的小心肝说什么呢，我的小宝贝感觉怎么样，我的小猫咪用她的小嘴吃什么呢？"而那个低沉的嗓音用职业化的亲昵回答道"我每个礼拜四都吃甘薯酱"时，圣地亚哥更是连笑都笑不出来了：劳德斯，圣地亚哥对自己的女友说，这是一个好兆头，我们要查清楚这个所谓的"小猫咪"或者阿尔特米萨究竟是何许人也，她尝起来又是什么味道，说真的，我老板可

真有一套!

圣地亚哥没有想到什么这是对堂娜马格达莱娜的背叛之类,因为他本人不是清教徒,但是,我确实感到好奇,劳德斯,我也是,清纯的俄阿哈加姑娘笑道,二人此时正埋伏在丹东办公室的出口,这是一个星期四的晚上,丹东没有带司机,亲自驾驶一辆不太起眼的雪弗莱汽车,前往安苏雷斯区达尔文街,为了不露出马脚,圣地亚哥和劳德斯驾驶一辆租来的福特车跟在后面。

丹东停好汽车,走进一所门口装饰着阿波罗和维纳斯石膏像的宅子。门关上了,一切笼罩在神秘之中。随即,传出音乐和笑语声。灯亮了,又熄了。

一天早晨他们又来到这里,一个园丁正在修剪门口的树篱笆,一个女佣正在拂拭落在淫荡塑像上的尘土。房门半开着。劳德斯和圣地亚哥瞥见一个普通的有钱人家的客厅,里面摆放着绸缎座椅,花瓶中插满斑叶阿若母,铺着大理石地板,楼梯是墨西哥电影里常见的那种。

突然一个样子傲慢的年轻人出现在楼梯上面,他的头发很短,身上穿着一件丝质睡衣,脖子上系着丝巾,古怪的是,他正在往手上套着一副白手套。

"你们想干什么?"他问道,他竖起的弯弯细眉跟他低沉的嗓音极不协调。"你们是什么人?"

"对不起,我们找错地方了。"劳德斯说道。

"吓了我一跳。""手套"小声嘀咕了一句。

没问题,代理商协会的档案员对圣地亚哥说,既然是老板的公子,请进。

每天下午,当他父亲在佛克莱尔、利沃里、大使饭店用餐未归时,圣地亚哥就仔仔细细地翻阅公司所有文件,就像过筛子、一个爱与憎恶编织的筛子一样,法律系的青年学生

在心里不断重复，这就是我的父亲，就是这钱养我、教育我，这些交易就是我家的房顶和地板，我靠父亲做的这些交易开着最新款的雷诺……

"我们要做得跟地下情人一样，"圣地亚哥对劳德斯说，"要记住，我们不想让人看到。"

"还有什么？"

"这样就行了。亲爱的！不，我跟你说正经的。我们得去哪儿才不会让人看见呢？"

"别费神了，圣地亚哥。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跟着你爸爸的汽车。"

"家居"酒吧位于起义者大街上，它宽敞、幽暗；两张桌子之间离得很远，没有统一照明，每一张小桌子有一盏暗暗的小灯，室内一片幽暗。桌布都是红白格子的，为了更有法国情调。

劳德斯和圣地亚哥跟踪丹东，看到他连续三个礼拜二的晚上九点钟，准时来到这里。但是他进出都是一个人。

一天晚上，圣地亚哥和劳德斯八点半钟来到这里，坐下后，点了两杯"库巴"酒。法国侍者对他们不屑一顾。所有桌子边都坐着一对情侣，只有一张桌子例外。桌子边坐着一个女人，衣领开得很低，大半个乳房露在领子外面耀武扬威，她抬起胳膊理了理蓬松的红发，同时也向人炫耀刮得精光的腋下，然后拿出一个粉饼，在本已涂得雪白的细眉周围又涂了几下，她目光傲慢，嘴唇厚得夸张，就像一个堕落的琼·克劳馥。引人注目的是，无论她做什么，始终都没有摘掉白手套。

丹东走了进来，吻过她之后，在她身旁坐下来，圣地亚哥和劳德斯早已躲进了一个昏暗的角落里，付过了账。那天晚上，两个年轻人驾驶雷诺汽车向俄阿哈加州海滩开去。

圣地亚哥一整夜都在开车,一言不发,毫无睡意,绕开墨西哥、俄阿哈加州和埃斯贡迪多港之间无穷无尽的弯道。劳德斯靠在男友的肩膀上熟睡;圣地亚哥只能看见景物模糊的轮廓,巨大的山脊,——这个色彩鲜明的国家雄浑不羁的躯体,松林和大漠,石壁和雪峰,丛生的仙人掌,以及突然闪过的盛开的蓝花楹。景致寂寥,荒无人烟。这是一个解体中重生的国家。

早晨八点钟时,大海出现了,海滩上空无一人,劳德斯醒来后发出一声欢呼,这是这一带最好的海滩,她说。她脱光衣服走进大海,圣地亚哥也除去衣物,两人一块儿赤条条地走进大海,太平洋是他们的床单,他们的吻比静谧、碧绿的海水还要深沉,他们亲吻时察觉到水波把他们从沙底拥起,海水的活力令他们兴奋异常,劳德斯感到圣地亚哥的阴茎顶端在摩擦她的阴蒂,于是她抬起双腿绕在他的腰间,他紧紧抱住她,把阴茎浸没到大海之中,他挤压她的阴部,让她从体外、他从体内感受到男女间的欢爱,他们陶醉了,清洗身体,惊起成群海鸥。

你要尽早学会游戏规则,丹东在圣地亚哥随他在代理商总会工作伊始,就这么告诫过他。想往上爬的人,就加入革命制度党,他们会对自己的所得感到满足。他们是对的。他们是墨西哥酱里的芝麻[1]。他们来者不拒。他们今天是办公室主任,明天是国务卿,后天则可能去负责修建桥梁道路。没关系。他们必须接受。纪律高于一切,没有"或者"这回事。他们没有别的选择。这是我们共同遵循的规则的起点,不管他是正在向上爬,还是像我们这样,已经在上面的人。儿子,你不要得罪大权在握,或者将来可能会掌权的

① 即"什么事都少不了他们"。参见第四章注。

人。不要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跟人发生冲突。儿子,你不要去兴风作浪。这个国家只有在动荡中才会发展。越不安定,我们越相信自己在进步。这一点是个秘密,也是个悖论,当然。你不要当众发表任何有争论的言论。这里一切顺利,墨西哥安定、欣欣向荣。现在全国上下团结一心,要是有人对此感到不安,去蓄意破坏平静的话,那他就会付出高昂代价。我们现在正在经历墨西哥奇迹。正像美国人说的那样,我们要的不仅是每只锅里有一只鸡。我们希望家家户户都有一只塞得满满的冰箱,如果可能,里面塞的完全都是你已故外祖父堂阿司匹林超市里的东西。当时是我说服他,做生意要舍得投入。哈,堂阿司匹林骨子里简直就像一个油盐店小老板。

他往一个沉重的玻璃杯子中倒了二指深的"奇瓦丝·雷加尔",啜了一口,继续说道。

"我会给你拉好关系的,圣地亚哥,放心吧。应该在年轻时起步,但难的是坚持下去。你看,政客们从年轻时就开始闯荡,但是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大多是昙花一现。我们生意人从年轻时开始创业,但是我们可以干一辈子。没人选举我们,只要我们不当众发表什么言论,就没人注意我们,更没人批评我们。你不须要引人注意。在我们这种制度下,抛头露面和自吹自擂就是大逆不道。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你不要在公开场合发表任何过后会让你觉得后悔的言论。你的想法,只要你自己清楚就足够了。不要让别人知道。"

圣地亚哥接过父亲递过来的酒杯,一饮而尽。

"好样的,"丹东笑了。"你什么都不缺。要谨慎。不要冒险。大选到来时,相信任何一位候选人都会赢,但却要去投靠最有希望的那一位。没有'忠诚'这回事,但是要学会

讨好。做生意要利用好六年中的头三年。随后是衰退、疯狂、梦想连任或者获得诺贝尔奖。总统们在这个时候都很神经质。应该尽快跟新总统搞好关系,尽管他可能是由前任总统扶上台的,但一旦他坐上宝座,他就会把他的前任给干掉,包括他的家人和朋友。圣地亚哥,你要静悄悄地做自己的事情。我们是安安静静的连续,他们是吵吵嚷嚷的碎片。有时候,这种吵嚷声意味着灭顶之灾,就是这么回事。"

他要邀请门加娜跳舞,请苏塔娜吃晚饭。贝伦加娜的父亲是堂丹东的合伙人,他大概有五千万美金的微薄资产,但是罗里·巴拉达的爸爸大概有两亿美元,虽然他不如合伙人那么好摆弄,但是他非常宠爱自己的女儿,会把一切留给她的……

一切? 圣地亚哥对他父亲说,你管什么叫一切,父亲? 妈的,你给我提的建议你自己都没有做到,虽然你把那些文件藏得很隐秘,但还是露出了太多的马脚,那些文件里头是你长期积攒下来的证据,你想利用它们要挟帮过你的人,还要提醒欠你人情的人不要忘记,不管是哪种情况,你都够黑的,老家伙,不要这样看着我,我不想跟你吵架,妈的,我手里有你干下的每个勾当的复印件,脑子里有你因为替某位部长损公肥私而得到的每一笔佣金,我背得下你在阿卡普尔科一桩非法土地买卖中因为充当中间人和挡箭牌而得到的每一笔回扣,因为你给美国商人充当掩护替他们从事禁止外国人插手的活动而得到的每一张支票,因为一位董事长及其合伙人打算发展旅游业,你就不惜以杀害当地农民为代价夺走公有土地,为此你得到的每一个比索我都记得,我清楚不听话的工会领导和老实巴交的农民代表是怎么死的,有钱可使鬼推磨,你既自己当鬼又让别人也当鬼,我的爸爸,狗娘养的,你这一辈子就没有做过一件合法的事情,

你靠着体制生存,体制也靠你生存,你栽在证据上,因为你想让帮过你或你帮过的人栽在上面,但是纸里包不住火,老家伙,我有这一切的复印件,不用害怕,我不会把它们给报纸的,那样我有什么好处? 我会守口如瓶,除非你变得比现在还要丧心病狂,小心点,你可以找人宰了我,那样我就会让一切都真相大白,不是在这里,这里你可以买通记者,这帮狗屎,而是在美国,那里才是你的要害,你会身败名裂,老头子,因为你替美国和墨西哥的犯罪分子洗钱,因为你玷污了美国神圣民主的神圣法律,你贿赂银行官员,给参议员们送礼,妈的,甚至你在美国还组织了一个听命于你的小小的"第三院",说真的我挺佩服你,你比威利·梅斯强,没有你没插手过的东西,说实话,与其说我是瞧不起你,不如说我是瞧不起这个你帮助建立的狗制度,你们从头烂到脚,从脚烂到头,从总统到每一个警察,比那四十年来在我们中间分给我们吃的一坨干屎还要腐烂,他妈的,堂丹东·洛佩斯-迪亚斯,真他妈的! 我不想吃屎,我不想要你一分钱,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到你那副可耻的嘴脸,不想再看到一个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不想看到一个全国农民联合会的救世主,不想再看到一个因为靠政府才侥幸没有破产的银行家,一个……狗娘养的,我要做的就是跟你们这些人为敌,如果我发生什么意外的话,你会比我更惨,亲爱的老爸。

圣地亚哥把文件的复印件扔到他父亲脸上,他父亲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浑身哆嗦,痉挛的手指下意识地放在呼救铃上,但最终他什么都不能做,而是像他儿子预想的那样,突然地丧失了所有力气。

"记住,每一张纸都有复印件。在墨西哥,在美国,在安全的地方。保护我吧,爸爸,因为没有人可以比你大逆不道的儿子更好地保护你了,妈的!"

圣地亚哥拥抱了一下父亲，他父亲也拥抱了他，圣地亚哥趴在他父亲的耳边说，我爱你老头，你知道，不管怎样我爱你，老家伙。

1965年那个圣诞节晚上，劳拉·迪亚斯坐在餐桌边的主人位子上。她坐在上首，两边是两对情侣。她觉得安全，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朋友和孙子爱情的对称而感到完美。她不再独身一人。她右手边，孙子圣地亚哥和他的女友宣布他们将在年底结婚，她7月份临产，他会找份临时差事，与此同时……

"不，"劳拉打断他说，"这就是你的家，圣地亚哥。和你女人留在这里，你们给一个老太婆的生活带来了欢乐……"

因为有圣地亚哥第三在身边，就好像同时拥有另外两位圣地亚哥，哥哥圣地亚哥第一和儿子圣地亚哥第二一样。把孩子生下来，圣地亚哥要完成学业。对她来说，家里充满爱充满喧闹就跟过节一样……

"你伯伯圣地亚哥从来不关房门。"

家里一片温馨。劳拉打算从根脉呵护好这一对如花美眷，这大概是因为在她右手边，在圣诞晚餐上，坐着一对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才团圆，才过上幸福生活的情侣。

巴西略·巴塔萨尔已然有了斑斑白发，但他还保持了吉卜赛人的轮廓，肤色黝黑，棱角分明，跟年轻时代一般无二。相反，皮拉尔·门德斯，却流露出她在苦难、匮乏的一生里所遭受的磨折。不是外在的匮乏，她不曾挨过饿，她受的苦痛来自内心，在这张脸上刻画着疑问，被撕裂的忠诚，经常被迫进行的选择，要用爱来抚平的创伤，这种创伤来自家庭内部，来自党派之争，来自，为什么不是呢，臆想。女人长着暗黄色头发，牙齿残缺，她伊比利亚人的轮廓依然美丽，这张脸是历史上多次融合的结果，穆斯林和哥特人，犹太人和罗

马人,好像上面画着一幅她祖国的地图,她的话语也铿锵有力,一如在圣塔菲的拉丁门前,那出古老悲剧中的慷慨陈词。

“最大的忠诚莫过于反抗不公正的命令。”

“为了荣誉,救救她。”

“要有怜悯之心。”

“天空中漂浮着谎言。”

“我死是为了让我的父母永远彼此仇恨下去。”

“为了正义,她必须死。”

“有什么痛苦不是来自上帝呢?”

劳拉对皮拉尔说,这对孙儿,圣地亚哥和劳德斯,有权听听 1937 年发生在圣塔菲的戏剧故事。

“那已经是陈年旧事了。”皮拉尔说。

“没有什么陈年旧事不会在我们这个时代重演,”劳拉抚摸着西班牙女人的手说,“我说得没错。”

皮拉尔说她当时在死亡面前毫无怨言,现在也不会去抱怨。抱怨只会增添痛苦。只会雪上加霜。

“我们都以为那天早上她给枪杀在城墙前面,”巴西略说。“我们信了三十年。”

“你为什么会相信?”皮拉尔问道。

“因为是你父亲说的。他是我们的人,他是圣塔菲的共产党镇长,当然我们会相信他的话了。”

“最好的命运莫过于死的时候没人认识你。”皮拉尔看着年轻的圣地亚哥说。

“为什么?”

“因为要是人们认识你,你死的时候,就得证明一些人的正义性,谴责另外一些人的非正义,结果就是你背叛了所有的人。”

巴西略要告诉青年们的，是他请假飞回墨西哥来看他的女人、他的皮拉尔时，已经告诉劳拉的一番话。堂阿尔瓦罗·门德斯，皮拉尔的父亲，在那天清晨假装杀害了他的女儿，而实际上把她藏在格莱多山上一座倒塌的房屋中，在那里只要战争还在继续，皮拉尔就什么都不会缺少；临近田庄的主人是中间派，既是堂阿尔瓦罗的朋友又是堂娜克莱门西亚的朋友。他们谁也不会背叛。然而，皮拉尔的父亲对他妻子克莱门西亚只字未提。姑娘的母亲坚信自己的女儿是运动的烈士。佛朗哥胜利后，她公开宣布了这种说法。堂阿尔瓦罗被枪决在他女儿本应死去的地点。母亲则培植了对自己烈士女儿的虔诚，把皮拉尔本应倒下的地点奉为圣地，尸体没有找到，是因为赤色分子们肯定早已把它扔进了乱葬岗中……

女英雄、被赤色分子处决的烈士皮拉尔被列入长枪党人的圣徒名册中，而真正的皮拉尔藏在山中，她不能出头露面，她不为人所知地活着，开始是在露面并讲出真相和躲藏保守秘密二者之间犹豫，但是当她得知父亲的死讯后，她开始坚信，在西班牙，历史是悲哀的，总是不得善终。最好是继续这种销声匿迹的状态，以保守父亲忠实的回忆和母亲神圣的虚伪。她习惯了，开始她被父母的朋友们好心地收留，后来当佛朗哥开始反攻，父母的朋友们感到危险逼近时，她又被圣衣会的修道院收留，该教派是圣特雷莎·德·阿维拉所建，从她被修道院收留那一刻起，她就得服从严格的纪律，在这里，她被庇护在基督教的博爱精神里，但是她盼望加入到姐妹们的规矩当中，皮拉尔·门德斯发现修道院的清规戒律是让人在日常生活中修身养性：清贫，教派的毛织法衣，敝履，素食；扫地，织布，祈祷和读书，因为圣特雷莎说过，没有什么比“一个愚蠢的修女”更让她恶厌的了。

修女们很快发现了皮拉尔的才能，她是一个能读会写的姑娘，她们把女圣徒留下来的书籍放在她的手上，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们认为她已经接受了修道院的习惯(甚至她们还在她性格的刚烈中看到了被国王费利佩二世称为“流浪女人”的开山女圣徒的影子)，当院长嬷嬷为谦卑、聪明的修道院女工乌尔苏拉·桑切斯申请通行证时，没有受到当局方面的任何阻力，她说这个女工想要去看望法国的亲戚，但是没有证件，因为共产党把她家乡的所有档案都给烧光了。

“我出去时眼前一片漆黑，但往事留下的印痕太深了，所以在巴黎我很快就又想起了从前，既然我注定不会在村子里整天喝从山上流下来的被石灰染成白色的劣质水而了此一生，我决定重寻属于自己的命运。嬷嬷们跟我引荐了几个巴黎特雷莎会‘的人，我开始在大街上散步，我恢复了女性的感觉，我想要华贵的衣服，我当时三十四岁，我想看到自己漂漂亮亮衣着得体的样子，我在外交圈里交了几个朋友，在大学城的墨西哥之家中找到一份工作，我认识了一个有钱的墨西哥人，他的儿子在那里读书，后来我们就同居了，他把我带到墨西哥，他很多疑，后来我就生活在阿卡普尔科一个飞满鹦鹉的热带笼子里，他送我珠宝首饰，我觉得我这一辈子都生活在笼子里，村子、修道院和金子的牢笼里，坐了一辈子的牢，尤其是被自己囚禁，先是不能揭发我的父亲，随后是不能把我母亲报仇的快感夺走，也不能拿去她以为我死了以后安到我身上的神圣光环，正是靠这光环使她自己成为了圣徒，我太习惯于生活在秘密当中，为了不打破我的父母、西班牙内战、保护我的村民、收留我的修女以及把我带来美洲的墨西哥人强加给我的沉默。”

她停顿了片刻，所有人都在专注地聆听。世界认为她

死了,她不得不为世界死去。我们身上有什么痛苦是来自于别人,又有什么痛苦是来自于我们自己?

她看着巴西略。抓起他的手。

“我一直爱着你。我以为我的死会保住我们的爱情。我的骄傲让我相信最好的命运莫过于死时无人认得。我怎么会鄙视我一辈子最珍视的东西呢?你的爱,豪尔赫·莫拉以及格雷戈利奥·比达尔的同志情,在需要的时候,你们肯与我同生共死。”

“你记得吗?”巴西略打断她说,“我们西班牙人是追捕死神的猎犬。我们闻到她的气味,追捕她直到她把我们自己杀掉。”

“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重走已经走过的路。”皮拉尔悲伤地说道,“我曾为了我可笑的政治派别而放弃了三个好男人的爱。但愿他们会原谅我。”

“暴力喜欢繁育,”劳拉微笑着说,“幸运的是,爱也同样。通常说来,二者相伴。”

她抓住右边劳德斯和左边皮拉尔的手。

“所以,当我看到将举行关于西班牙流亡者的摄影展的消息,我就从阿卡普尔科飞来,于是发现了巴西略空白的相框。”

她看着劳拉。

“不过要是你没在那里,我们就永远不会团聚了。”

“您是什么时候通知您的墨西哥情人再也不会回到他身边的呢?”圣地亚哥问道。

“我刚一看到空相框的时候。”

“您可真勇敢。可能巴西略已经去世了呢。”

“不会的,”皮拉尔的脸红了。“所有肖像都有出生日期,如果那个人去世了的话,也会注上去世时间。而巴西略

的没有。我当时就知道。对不起。”

年轻人没有说很多话。他们全神贯注地聆听皮拉尔和巴西略的故事。然而圣地亚哥却和祖母交换了一下充满爱意的目光，在那里，在劳拉的眼睛里，他找到了一种神奇的东西，他后来想把这告诉给劳德斯，告诉她不要忘记这一切，这话不是由他说出来的，是此刻由目光、由 1965 年圣诞节上劳拉整个人的态度说出来的，劳拉的这种目光包容了所有在座的人，同时也向他们敞开，让他们诉说，请他们看看彼此，解读彼此，展示自己的爱。

但是她是世界的平衡点。

劳拉·迪亚斯已经学会不要求理由地爱，因为她已经学会用相机，用眼睛去看别人，而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那样看自己。

吃过晚饭后，她给他们朗读了一封豪尔赫·莫拉的简短贺信，落款是在兰萨罗特。劳拉忍不住把皮拉尔·门德斯和巴西略·巴塔萨尔出人意料的奇迹般重逢告诉了他。

豪尔赫的贺信上只有一个问题：“什么幸福不是来自于上帝？”

圣西尔维斯特尔节的晚上，劳德斯·阿尔瓦罗和圣地亚哥·迪亚斯-佩雷斯结婚了。证婚人是劳拉·迪亚斯，皮拉尔·门德斯和巴西略·巴塔萨尔。

劳拉想的是第四个证婚人，豪尔赫·莫拉。他们此生再也不会相见。

第二十三章　特拉特洛尔科:1968年

“任何人不得认领尸首。任何人不得将死者带回家中。明天这所城市里不得出现五百列送葬队伍。把尸体扔到乱葬岗。将没有人会认得他们。”

让他们凭空消失。

劳拉·迪亚斯在1968年10月2日夜里拍摄下她的孙儿圣地亚哥。她从“星履”徒步赶来,看到游行队伍进入三文化广场。她已一点点记录下这场学生运动中的所有事件,从最初的示威到调集警察部队,到炮轰预科学校大门,到军队占领大学城,到军警们肆意捣毁实验室和图书馆,到校长哈维尔·巴罗斯·斯埃拉率领整个大学城的人进行抗议游行,到人们聚集在中心广场上对总统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高呼“滚到阳台上来,大嘴”,直到十万沉默的市民组织的静默示威。

劳拉记录下圣地亚哥和劳德斯以及十几个激动的青年男女讨论时事的夜晚。两岁的孩子,圣地亚哥第四,熟睡在曾祖母在里约热内卢广场的公寓里为他准备的房间中,她把从前的档案搬出去,把已经没用的破烂扔掉,虽然这些破烂实际上是珍贵的纪念,但是劳拉对劳德斯说,如果在七十岁时,她还没有把值得记忆的事物记录在脑海之中,那她就会被不加区分的往昔压垮。往昔有很多种形式。对于劳拉来说,它就是一片纸的汪洋。

究竟什么是照片？它归根结底不就是一个被化为永恒的瞬间吗？时间的长河是不会停顿的，把它完完整整地保存下来等于疯狂，在太阳星辰下流淌的时间，不管有无我们，都会继续流淌，在一个无人居住的世界当中，一个月亮般的世界当中。人类的时间是牺牲完整，突出某个瞬间，与此同时，把永恒的荣耀给予瞬间。这一切都在挂在公寓中的她的儿子小圣地亚哥的画中得到诉说：我们没有堕落，我们飞升了。

劳拉留恋地翻检手边的纸页，把她认为已经没用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为自己的曾孙腾出房间。我们把房间刷成粉红色还是蓝色？劳德斯笑道，劳拉也跟她一块儿笑了起来；不管是男是女，婴儿都会睡在一个包围在胶片气味中的摇篮里，墙壁上浸透了潮湿的照片，显影液和照片特有的气味，这些照片像刚洗过的衣服一样挂在木头钩子上，而这些钩子更适合出现在一个晾晒场中。

她看到孙子与日俱增的热情，她想提醒他，你不要感情用事，在墨西哥，一个人如果胸中怀有信仰并把它带到街上，他的幻想很快就会破灭，受到惩罚：学校里教给我们的，圣地亚哥反复对他的同志们说，他们年龄在十七岁到二十五岁之间，有些人皮肤黝黑，有些却金发白肤，墨西哥就是这样，是一个彩虹般的国家，一个长发一直垂到腰际，肤色深棕，长着一双墨绿色眼睛的漂亮姑娘说，一个跪着的国家，应该把它扶起来，一个黑皮肤，高个子小眼睛的小伙子说，一个民主的国家，一个白皮肤，矮个子，肌肉结实，眼镜时常从鼻子上滑下来的青年说，一个跟伯克利、东京和巴黎的伟大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一个应该禁止“禁止”、让想像力发挥作用的国家，一个黄头发，酷似西班牙人，大胡子，目光炯炯有神的小伙子说，一个不要忘记另外一些人的存

在的国家，一个土著人模样，神情严肃，藏在厚厚的镜片后的小伙子说，一个无论什么人都可以相爱的国家，劳德斯说，一个没有剥削的国家，圣地亚哥说，我们做的仅仅是把学校里教给我们的东西带到大街上，他们教给我们叫作民主、公正、自由、革命的东西；他们让我们相信这一切，堂娜劳拉，奶奶，你能想像出，有哪一位学生或先生会去捍卫独裁、压迫、不公和反动吗？但是他们使我们看清了他们的嘴脸，黑皮肤的小伙子说，让我们对着他们高喊，戴着厚厚镜片的土著小伙子说，喂，学校里教给我们的那些东西在哪里呀？喂，棕色皮肤绿色眼睛的姑娘也加入到这一和声当中，你们以为自己在欺骗谁？看着，大胡子目光炯炯的小伙子说，壮起胆子看着我们，我们二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有三千万，你们以为自己还可以继续欺骗我们吗？高个子小眼睛的年轻人激动地说，民主在哪里？是在革命制度党组织的事先在票箱里塞好了选票的选举中吗？公正在哪里？圣地亚哥接下去说道，是在一个六十个人比六千万人的钱还要多的国家里吗？自由在哪里？长发垂腰的姑娘说，是在由腐败的领导控制的工会里吗？是在卖身给政府的报纸里吗？劳德斯接下去说道，是在隐瞒真相的电视里吗？革命在哪里？白皮肤，矮个子，肌肉结实的小伙子说，是在刻在议会里的“比利亚”和“萨帕塔”的金字上吗？是在落满了为革命制度党聒噪演说的那些鸣禽夜鸟的粪便的雕像上吗？

提醒对他来说是不会有什么作用的。他已经跟父母断绝了关系，他在祖母这里取得了认同，她和他，劳拉和圣地亚哥，一天夜里跪在中心广场上，两个人一块儿把耳朵贴在地面上，他们听到了同样的东西，城市和国家沉闷的声响，正在爆发的边缘……

“墨西哥这座地狱，”圣地亚哥当时说道，“难道犯罪，暴

力,腐败和贫穷都是她命中注定的吗?”

“孩子,别说话。听。在拍照片之前,我总是注意倾听……”她想把一种光辉的自由传给自己的后代。两个人从冰冷的石头上抬起头来,他们对望,用目光充满爱意地询问对方。劳拉从那时起就明白圣地亚哥会去做什么,她不会对他说,你有妻子和孩子,你不要牵扯进去。她不是丹东,不是胡安·弗朗西斯科,她是豪尔赫·莫拉,她是哈拉马前线的美国人吉姆,是在维拉克鲁斯被杀害的年轻的圣地亚哥第一。她是那些可以怀疑一切但却不会因此而停止行动的人。

圣地亚哥她的孙儿,在每一次游行中,在每一次演说中,在每次大学生的集会中,身上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他的奶奶跟随他,拍下他,他对自己被拍摄下来这回事毫无察觉,劳拉用充满同志情谊的目光看着他:她用相机记录下每一个变化的瞬间,有时是变得疑惑,有时是变得肯定,但是最后所有的肯定——在行动上,在话语间——都比疑问更不确定。最不能肯定的东西就是“肯定”本身。

劳拉在学生运动的日日夜夜里,在太阳和火把的光里感觉到肯定会发生变化,恰恰因为它的不确定。她的脑海中依次闪过这一辈子听到过的所有信条,遥远的1914年战争中英法盟军和中央政府对立的立场,比达尔的共产主义信仰与巴西略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莫拉的共和信仰与皮拉尔信奉的佛朗哥主义,拉克尔信奉的犹太教,以及哈利的彷徨,胡安·弗朗西斯科的机会主义,丹东彻头彻尾的犬儒主义和她另一个儿子,圣地亚哥第二,完整的精神世界。

这个崭新的圣地亚哥通过他的祖母劳拉·迪亚斯成为了他们所有人的继承者,不管他自己是否知晓。与劳拉·迪亚斯在一起的年年岁岁成就了“新圣地亚哥”的日日夜夜,称他为“新圣地亚哥”,好像他是在客西马尼见证基督受难

的西庇太之子的漫长同名行列中的又一位使徒。圣地亚哥们,“雷之子”没有一个得到善终,大圣地亚哥死在希律王的刀下,小圣地亚哥被犹太人公会下令乱棍打死①。

圣徒圣地亚哥历史上有两位;而她,劳拉,已经有了四位同名的圣徒,一个名字里,祖母心中说,体现出我们的血脉相联。劳拉,劳德斯,圣地亚哥。

现在,劳拉·迪亚斯多年的朋友和情人们的信仰成为劳拉·迪亚斯孙儿的信仰,此刻,他正与千百个墨西哥青年,男男女女,一齐进入三文化广场,那里是特拉特洛尔科阿兹特克人古老的庆典中心,此刻广场上惟一的光亮来自阿纳华克古老山谷里垂暮的夕阳,这里的一切都很古旧,劳拉想道,印第安人的金字塔,圣地亚哥教堂,方济各会的修道院和学校,但也有一些现代建筑,外交部,住宅楼;或许年代最近的建筑才是外表最破旧的建筑,因为它们不结实,表面已经有了裂缝,油漆脱落,玻璃碎裂,晾着衣服,悔恨的雨水在嘀嘀嗒嗒,还有啜泣从墙壁中渗透出来:广场上华灯初上,高大建筑上亮起了探照灯,可以看得见厨房、阳台、客厅和卧室的内部;成百上千的青年在从一边进入广场,从其他各个方面都有数十名军警包抄过来,屋顶平台上人影憧憧,戴着白手套的拳头举了起来,劳拉拍下她孙儿圣地亚哥的身影,他的白衬衫,他愚蠢的白衬衫,就好像他自己在乞求作子弹的靶子一样,他的声音在告诉自己的祖母,我们在未来

① 圣经人物中,大圣地亚哥为约翰的兄弟,十二使徒之一,西庇太之子,公元44年殉道;小圣地亚哥即新约圣经中《雅各书》的作者,耶稣的表兄弟,曾任耶路撒冷主教,于公元62或63年殉道。大圣地亚哥(中文和合本中译作“雅各”)与约翰曾被耶稣称为“雷之子”(参见《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十七节);客西马尼为耶稣被出卖、被捕之地,当时包括大圣地亚哥在内的十二门徒都在场)。

找不到容身之地，我们企盼一个可以给我们年轻人容身之所的未来，我在由我父亲创造的未来里找不到落脚之地，劳拉对他说，你说得对，在她孙儿身边，她也已明白，在她这一生当中，墨西哥人都在梦想一个不同的国家，一个更好的国家，从德国移民来到卡特马哥的外祖父费利佩这样梦想，从特内里费去到维拉克鲁斯的祖父迪亚斯也这样梦想，他们梦想一个勤劳正直的国家，就像圣地亚哥第一梦想一个公正的国家，圣地亚哥第二梦想一个和平有创造力的国家一样，圣地亚哥第三，这个夹杂在大学生队伍中在 1968 年 10 月 2 日的晚上走进特拉特洛尔科广场的年轻人，继续了他的同名者们的梦想，看着他走进广场，拍摄着他，劳拉说，今天我爱的人是我的孙儿。

她举起自己的相机射击，相机是她手边的武器，她觉察到自己态度的不公，成百上千的男女青年走进广场要求一个更好的国家，一个忠于自己的国家，而她，劳拉·迪亚斯眼中只有她肉中的肉，只有她钟爱的孙子，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他头发蓬乱，穿着白衬衫，脸色黝黑，长着一双黄绿色眼睛，太阳一样的牙齿，大地一样的肌肉。

我是你的同伴，劳拉远远地对圣地亚哥说道，我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我了，现在的我属于你，今天晚上，我懂得了你，懂得了我的爱人豪尔赫·莫拉，懂得了他热爱的、并为之用舌尖舔着兰萨罗特一所修道院地板的上帝，上帝呀，我对你说，把我的一切夺走吧，给我疾病，给我死亡，给我高烧、疳病、结核，让我眼瞎耳聋，挖出我的舌头，割掉我的耳朵，上帝呀，如果这些能够救我孙子的命，拯救我的国家，让我横死吧，只要这样能够让我的祖国，我的孩子们身体健康，谢谢你，圣地亚哥，谢谢你让我们所有人看到在这个沉睡、自得、受骗和骗人的 1968 奥林匹克年里的墨西哥还有可为之

奋斗的东西,谢谢你,我的孩子,你让我看到生者与死者的区别,此时,广场上群情激荡,情景直追震倒了改革天使的那场地震,劳拉·迪亚斯把相机举到半空,它什么也没看到,它在颤抖着落下之际,发现一个士兵的准星就像一块疮疤一样盯着它,她按下快门,机枪开始射击,压过了歌声,口号声,青年们的说话声,随后是可怕的寂静,只能听到受伤的和垂死的青年的呻吟声,劳拉寻找着圣地亚哥的身影,目之所及只是嚣张的白手套漫天飞舞遮住了苍穹,"圆满完成任务",和星星的无力,对于发生的一切,它们无语。

他们用枪托把劳拉轰出广场,他们把她轰出去并非因为她是劳拉,是摄影家,是圣地亚哥的祖母,他们是把目击者轰走,他们不想有人看到这一切,劳拉把她的胶卷藏在肥大的裙子下面的内裤里,贴着阴部,但是她已不能拍下从浸透年轻的血的广场上升腾起的死神的气息,她已捕捉不到特拉特洛尔科夜晚那阴郁的天空,她已克制不住从巨大的城市墓地里,从呻吟声中,从叫喊声里,从死神的回声里弥漫出来的巨大恐惧……

即使是丹东·佩雷斯-迪亚斯,有权有势的堂丹东,也没有权利找回他儿子的尸首吗?不行,即使是他也不行。

年轻的叛乱头目圣地亚哥的年轻的寡妇和年迈的祖母有什么权利呢?如果她们愿意,可以去停尸房转转,看一眼尸体。作为对总统先生堂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的私人朋友,律师堂丹东先生的一种让步。她们可以看看他,但不可以把他带走埋葬。一概不准。1968年10月3日在墨西哥城里不得出现五百个送葬队伍。会给交通带来巨大困难。交通法规会被破坏的。

劳拉和劳德斯走进冰冻的大厅当中,一盏奇怪的荧光灯照着平躺在木头架子上的赤裸的尸体。

受害者们死在一个因虚荣、权力、恐惧和残忍而疯狂的总统手里,劳拉害怕死亡会令赤裸的受害者们失去个性。那将是这位总统的最终胜利。

“我没有杀过任何人。死者在哪里?来,让他们说句话我听听。说呀。说我杀了他们!”

在总统的眼里,他们不是死者。他们是闹事者,破坏分子,共产党,搞破坏的空想家,是总统绶带所代表的祖国的敌人。只有雄鹰,特拉特洛尔科的夜晚,逃脱了总统的绶带,向远方飞去,羽蛇羞臊地蜕掉了皮,仙人掌遭虫蛀蚀,湖水又开始燃烧。特拉特洛尔科湖,祭坛,1473 年为了巩固阿兹特克人的统治,特拉提尔卡的国王被人从高高的金字塔上扔了下来,为了巩固西班牙人的统治,神像被人从高高的金字塔上扔了下来,特拉特洛尔科被死亡从四面八方围困在其中,“松潘特里”墙,由骷髅一个挨一个,一个叠一个垒起,它就像一挂巨大的死亡项链,由上千个骷髅头构筑成的墨西哥政权的城防和警戒线一次又一次地在死亡中树立起来。

但是死者们彼此不同,没有一张脸孔与另外一张相同,也没有一具躯体与他人一样,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姿态。每一粒子弹都在遇难青年的胸膛、头部、大腿上留下了一个不同的图案,每个男人的阴茎都是一种不同的静止,每个女人的阴部都是一种不同的孔洞,这差别是牺牲的青年的胜利,他们击败了一种懂得事先赦免自己的暴力。证据就是两周之后,总统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将为奥运会揭幕,放飞一群和平鸽,他的脸上挂着一丝志得意满的微笑,他的笑容就像淌着血的大嘴一样放纵。在总统席上,脸上挂着为自己国家感到自豪的微笑,圣地亚哥的父母,堂丹东和堂娜马格达莱娜,双双坐在那里。国家恢复了秩序,这多亏总统

先生那过人的精力。

当她们在临时停尸房里认出圣地亚哥的尸首时，劳德斯哭倒在她年轻的丈夫赤裸的尸身上，但是劳拉却轻轻抚摸孙儿的双脚，把一张卡片挂在他的右脚上：

圣地亚哥第三
1944—1968
一个有待创建的世界

老人和少妇拥抱着，最后看了一眼圣地亚哥，离开了他，她们共同分担着一份弥漫的、莫名的恐惧。圣地亚哥离去时，脸上带着一副痛苦的神情。劳拉有生之年都在渴望死者的微笑会把安宁归还给尸首，归还给她。

“忘却是一种罪，是一种罪，”她不断地重复，她对劳德斯说，不要害怕，但年轻的寡妇还是感到害怕，每次有人敲门她都会想到，是他么？是一个鬼魂，一个凶手，是一只老鼠，一只蟑螂？

“劳拉，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把一个人像只蝎子一样关在笼子里，就挂在那儿，没有水和面包……”

“孩子，不要这么想。他不该受到这个。”

“你在想什么，劳拉，除此之外；除了他？”

“我在想，有人在受苦，苦难必须要降临到他们身上。”

“但是有人在承受别人的苦难吗？又有谁可以不必受苦？”

“没有人，孩子，没有人。”

他们把这座城市交给了死神。

城市是野蛮人的营地。

有人在敲门。

第二十四章　罗萨区:1970 年

一

劳拉,用照相机看遍世界的劳拉,1970 年 8 月的这天早晨站在她浴室的镜子前,她想,我自己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呢?

或许,她记忆中还保存有一种记忆,我们过去的容颜不是岁月在皮肤上简单的积累,也不是岁月的复叠,而是一种澄明:这就是我,此刻我眼中的自己,就是我一向的样子。时刻可以变换,但永远只存在一个时刻,虽然属于我脑海里的一切此刻都印在那里;我从前是觉得,而现在是知道,属于头脑中的东西永远也不会离去,永远不会说“再见”;一切都会逝去,除了永远活在我脑海里的事物。

我是卡特马哥的小女孩,圣卡耶塔诺的少女,哈拉帕等待出嫁的姑娘,墨西哥城的新嫁娘,慈爱的母亲和不忠的妻子,哈利·杰夫执著的情人,我孙子圣地亚哥的避风港,但是除此之外,我更是豪尔赫·莫拉的情人;在我生命中的所有面孔里面,这一张才是停留在我的想像中、我的面孔的面孔,这一张才是包含一切面孔的面孔,这一张上面凝结着我的幸福激情,是支撑起我一生中所有面具的面孔,是我五官的最终的骨头,当肉体被死亡吞噬后,只有它还会存在……

然而，镜子还给她的，并非是30年代劳拉·迪亚斯的面孔，那张她明知转瞬即逝，但却把它想像成永恒的面孔。为了更好地理解她所拍摄的现在，她读过很多有关人种和墨西哥古代历史的书。古时候墨西哥人有权为死后选择一张面具，戴上一张理想的面孔前往米克特兰，印第安人的阴间，地狱和天堂的合二为一。如果她是印第安人，劳拉就会选择与豪尔赫相爱那段时光的脸孔作为面具，放在她所有面孔，童年的、青年的、成年的以及老年的面孔上面。只有她儿子圣地亚哥痛苦的面孔才比得上这张与莫拉热恋时的面孔，但后者体现出对幸福的渴望。这就是她在脑子里为自己拍摄的照片。是1970年8月的这天早晨她想在镜子中看到的东西。但是镜子，在这天早晨，却比女人自己更忠实于她。

她一直很注意自己的仪表。在看到伊丽莎白·加西亚-杜邦发型上滑稽的变化后，她就发现应该一劳永逸地确定某种发型，而且永远不要改变；奥兰多的朋友们肯定了她的看法，一开始你换了发型，然后很得意，觉得自己焕然一新，但结果却是人们先注意到你变了一张脸，瞧瞧那些鱼尾纹，悄悄爬上额头的皱纹，哎呀呀，岁月不饶人，真是老了。劳拉·迪亚斯从小留着刘海儿，用来遮盖自己又高又宽的额头，并缩短自己过长的脸型，她有一次梳着玩曾把刘海儿放弃，而自从她认识豪尔赫·莫拉之后，她就下决心不去模仿那些墨西哥的克拉拉·鲍的小男孩发式，琼·哈洛的丝光金发以及艾琳·邓恩的波浪式；她把头发统统拢到脑后，露出宽阔的前额和如奥兰多所说，“意大利式”的鼻子，她的鼻子高耸而高贵，挺拔，纤细而敏感，好像总在探究着一切。她先是拒绝冯·施特罗海姆的快乐寡妇梅·莫雷式的樱桃小口，而后是琼·芳登的性感大嘴，它给涂抹得像是通往性的

地狱的可怕入口，劳拉·迪亚斯依旧保持自己的薄嘴唇原样，不涂口红，这突出了她头部的哥特人曲线，她是莱茵河和加纳利岛，高山和穆尔西亚的后代，她把一切美丽都集中在自己的眼睛上，她的栗色眼睛接近金黄，暮霭时分呈现出绿色，性爱高潮时则呈现出银色，高潮时，豪尔赫·莫拉总让她睁着眼睛，你的目光就让我难以自持，我亲爱的劳拉，我高潮时让我看着你的眼睛，你的眼睛让我兴奋，是的，性并不美丽，甚至可以说粗陋，1970 年 8 月的这天早晨劳拉·迪亚斯对自己的镜子说，让我们兴奋的是目光，是肌肤，是性在灼热目光中的投射和甜美的肌肤让我们走近“性”这张不可避开的蛛网，走进这藏着愉悦与死亡的巨大洞穴……

洗澡时，她已不再看自己的身体。她已不再关注它了。还有弗里达·卡罗，当然。弗里达让她的朋友感谢自己拥有虽然衰老但却完整的身体。在豪尔赫·莫拉之前，是弗里达·卡罗，由她来作为拥有一成不变的风格的典范，这种风格一旦确定就再也不会改变，无人可以仿效，尊贵且惟一。这不是她的朋友以及偶然情况下的秘书劳拉·迪亚斯的风格，劳拉总是跟随服饰的潮流——此刻她正在用手摩挲着挂在衣橱里昨天穿过的那些衣服，20 年代轻便的“弗莱帕”，30 年代白色丝绸长裙，40 年代的裙套装，和克里斯蒂安·迪奥尔的“新视点”，这种宽大的裙子战胜了战争期间给人们服饰上带来的匮乏从而重返时尚舞台，但自从她去过兰萨罗特之后，劳拉就开始采用一种舒服的衣着，几乎是一件长袍，没有纽扣拉链以及腰带，什么累赘也没有，是一件穿上和脱掉时不需任何仪式的修女式长袍，对她而言，这件长袍是理想的穿着，先是很适合她在莫雷洛斯热带山谷中生活，随后，使她可以在“美洲的罗马”——墨西哥城里飞跑，就好像简单舒服的棉布给她安上了翅膀一样，这座城市

是由四层、五层、七层地层叠加而成，每一地层都像沉睡的火山一样高、像雾气蒸腾的镜面中的倒影一样深。

1970年8月的这天早晨，窗外下着雨，肥大的雨点敲打着浴室的玻璃窗，镜子只还给我一张脸，已经不是我所喜爱的，三十岁时的容颜，而是今天，我七十二岁的面庞，镜子无情、诚实、残酷、毫不掩饰地还给我这张面孔，皱纹密布的高额头，深蜜色的眼睛埋在鼓凸的眼袋和破帘子一样耷拉下来的眼皮之间，鼻子高耸，以致我想不起来什么时候自己曾经有过这么高的鼻子，不抹唇膏的皱巴巴的嘴唇，嘴唇和面颊上爬满纹路，就像一张给包过太多没用礼物的旧皱纹纸，还有无论如何也无法掩饰、泄露年龄的脖子。

“跟火鸡的肉瘤一样。”劳拉决定面对镜子笑上一笑，继续爱自己，爱自己的身体，继续梳理自己斑白的头发。

随后她把胳膊抱在胸前，感到胳膊冰冷冰冷的。她看到镜子中自己被时间啄食的双手，然后记起自己风华正茂时的身体，那时它是多么让人渴求，总是根据虚荣、愉悦、优雅和诱惑这样的舞台提示，作出适合的展露或掩藏。

她继续爱自己。

“伦勃朗在各个年纪为自己画像，从少年到老年。”奥兰多·希门内斯说，他已经多次邀请劳拉去罗萨区总统酒店的苏格兰酒吧小坐，而她如同奥兰多本人反复重申的那样，“看在过去的情分上”，终于答应他在下午六点，趁酒吧还没人时，跟他小聚片刻。“再没有什么其他绘画档案比他所留下的更感人的了，这位大艺术家在一生当中客观地注视自己，最后以一幅老人的肖像达到巅峰，在老人的眼神中包含所有从前的岁月，毫无遗漏，仿佛晚年不光揭示出完整的一生，还揭示出我们曾经历过的一切轮回。”

“你还跟从前一样，是个审美家。”劳拉笑道。

“不,你听我说。在衰老的眼皮下,伦勃朗的眼睛几乎是紧闭着的。眼睛在流泪,不是因为动情,而是因为年岁让我们的视线变得潮湿起来。看看我的眼睛,劳拉,我得一刻不停地擦它! 就好像我总在感冒似的!”奥兰多也开始笑了起来,他用颤抖的手抓起装着苏格兰苏打酒的酒杯。

“你看起来很棒,很年轻,”劳拉说道,她真的在欣赏旧日恋人的清瘦硬朗,衣着中带有一种过时的高贵,仿佛温莎公爵式的打扮还在时兴似的,身穿灰色格子西装,打着宽结领带,卷边软裤,脚上是厚底“教堂”牌皮鞋。

奥兰多已经变成了一个衣着体面的扫把,扫把顶端的头颅上些许顶着几根灰发,紧贴在两侧的太阳穴上,寥寥几根头发经过小心翼翼的梳理,消失在后颈上。他的身体稍稍前倾,以示礼貌,但泄露出来的却是年岁的痕迹。

“不,听我跟你说,老伦勃朗最后一幅肖像的可贵之处在于,艺术家镇定地面对时间的侵蚀,他不光让我们记起他一生中的岁月,还让我们回想起自己的一生,这位知命而睿智的老人的眼中所珍视的东西,深深地刻在我们脑海中。”

“是什么东西?”

“是永恒的青春,劳拉,因为打动我们的是创作出青年、成年和老年这一完整作品的艺术力量。这才是伦勃朗最后一幅肖像真正留给我们的印象:我永远年轻,因为我永远有创造力。”

“这一切对你来说真轻松,”劳拉又笑了一下,笑中带有几分服气。“轻描淡写,残忍,迷人,邪恶。有时候,还很智慧。”

“劳拉,我是一只萤火虫,点燃和熄灭都在无意之间,”奥兰多也朝她笑了一下,“这是我的天性,你能接受吗?”

“我很清楚。”劳拉笑了笑。

“还记得我第一次问你吗？‘你的身体可以接受我吗？是不是可以得个十分？’”

“你的问话让我觉得诧异。”

“为什么？”

“你说起过去，就好像一切都可以重来一次。你谈到过去，是为了眼前给我提出一个问题，现在。”劳拉伸出手去抚摸奥兰多的手；她注意到刻有他姓名首写字母 OX 的金戒指戴在他瘦长的手指上，已经略显粗大了。

“对我而言，”这位多愁善感者说，“你和我永远待在 1915 年圣卡耶塔诺庄园的阳台上……”

劳拉飞快地喝下她最喜欢的干马提尼酒，“不，我们现在待在 1970 年罗萨区一家酒吧中，此时再回忆起我们初次相遇时的浪漫，不免有些滑稽，我可怜的奥兰多。”

“你不明白吗？”老人皱了一下眉头，“我是不想让我们的关系在习以为常中冷淡下去。”

“我可怜的奥兰多，年龄会冷淡一切。”

奥兰多盯着威士忌酒杯的底部，“我不想让诗歌变成散文。”

劳拉沉默了一会儿。她想讲出真相，又不想伤害老朋友。她不想滥用自己的年岁——劳拉·迪亚斯的七十二个光阴——而站在一个不公正的高度来评判别人。妄加评论是老年人经常遇到的诱惑之一。但是奥兰多却飞快地抢在了她的前面。

“劳拉，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劳拉没有回答，她依次跟自己说了三句真理，并反复说了几遍，逃避会简化一切，拖延会腐蚀一切，深沉会杀死一切。在奥兰多那里，他总是倾向于简化：逃避。但是，劳拉觉得忙不迭避开一个处在可笑境地边缘的人或处境是一种

背叛,她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这样,我不会背叛自己,自己的过去,在这个时刻我不逃避,我不简化,不嘲笑,在这个时刻我拖延,尽管会走向灾难,我深沉,尽管会走向死亡……

"奥兰多,"劳拉往前凑了凑,"我们在圣卡耶塔诺相识。在墨西哥成为情人。你用一张字条抛弃了我,字条上写着你不是自己口中说的那个人,也不是你外表上看起来的那个人。你太靠近我的神秘了,你责备我说……"

"不,我是在提醒你……"

"奥兰多,你是把它劈头盖脸朝我扔来。'我更想保守我的秘密',那时候,你给我写道。没有神秘,你又补充说,我们的爱情就会兴致索然……"

"我不是还跟你说,'我永远爱你……'"

"奥兰多呀,奥兰多,现在你跟我说我们该待在一起了。神秘结束了吗?"

她真心地爱抚那只青筋毕露的冰冷的手。

"奥兰多,忠于你自己吧,坚持到最后。继续避开任何错误的决定。远离任何最终结论。做你的奥兰多·希门内斯,让所有事情都敞开来放在那里,没有结尾。这是你的天性,你没发觉吗?这一点甚至是你身上我最佩服的地方,我可怜的奥兰多。"

有一刻,奥兰多的杯子变成了一个水晶球。他想揣摩。

"我本应向你求婚的,劳拉。"

"什么时候?"她察觉到他话语中的无力。

"你是想说我已经成了自己恶习的受害者了吗?我已经永远失去你了?"

这么说来,他不知道这所谓的"永远"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在热带庄园里举行的舞会上,他不明白就在那里,在

相识之初，在奥兰多想说“永远”的时候，他就已经向劳拉·迪亚斯说出“永不”，他误以为自己迟迟没有说出这句话，像他刚刚所说：我当时是不愿意我们的关系在习以为常中冷淡下去，我不愿意你太靠近我的神秘。

劳拉打了个冷战。奥兰多是为死亡在向她求婚。他终于接受了现在这样的现实：已经再没有游戏可以玩，再没有讽刺可以展示，再没有谬论可以探讨。奥兰多意识到在这么说的同时，他在否定自己整个人生，一生中对神秘和逃避的嗜好吗？

“你知道吗？”劳拉·迪亚斯微笑道，“我把我们之间的关系看成了一部虚构小说。你是想给它添上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吗？”

“不是，”奥兰多犹豫地说，“我是不想让它结束。我想重新开始。”

他把杯子端到口边，一直到它遮住了眼睛。

“我不想孤单地死去。”

“注意。你是不想在没有搞清本应会发生什么事的情况下死去。”

“说得对。本应发生的事情。”

劳拉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回答。是一锤定音，发表意见，简化问题还是重新开始？但无论怎么做都要饱含自己所能付上的柔情。

“本应发生的已经发生过了，奥兰多。一切都恰恰按照本应发生的样子发生过了。”

“认命吗？”

“不，可以不这样。我们把一些谜团带到坟墓中去。”

“当然。但是，你把自己的魔鬼埋在哪里呢？”奥兰多机械地咬了一下瘦长的手指，那上面沉重的金戒指在跳动。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附着一个魔鬼,到死亡来临的时候它也不肯离去。我们从来不满足。"

离开酒吧后,劳拉在罗萨区走了好一会儿,这是一个新繁荣起来的街区,年轻人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他们逃过了特拉特洛尔科屠杀,来到这里的监狱或咖啡馆,它们同样都是牢笼,都是监牢,但是在查布尔特佩克大街、改革大道和起义者大道的周边地带创造出一个遍布咖啡馆、饭店、街道和镜子的乐园,人们在镜子前驻足,打量自己,欣赏别人,炫耀时装样式,迷你裙和大腰带,半腰黑色漆皮靴子,肥大的水手裤和跟披头士一样的发型。在游牧城市的一千万人口中,有一半人不到二十岁,在罗萨区他们可以畅饮,展示自己,交朋友,观看和被看,他们在这里可以重新相信世界是美好的,是可以征服的,它不曾有过横流的鲜血,不曾有过让人夜不成寐的历史。

这里,在与日内瓦、伦敦、汉堡和安特卫普一样的街道上,波菲里奥时代的没落贵族们曾在这里居住,在把首都变成大都会的二战期间,"卡萨诺瓦","子夜","无忧",最早的几家豪华夜总会就在这里开张;就在这里,在拉沃提瓦教堂中,丹东大胆地开始向社会的顶峰迈进;就在这里,在改革大道,特拉特洛尔科事件中的青年们向着死亡行进,在这里的咖啡馆曾是文学青年的聚集地,"奇内雷","提罗"和"安达卢西亚狗";这里有"佛克莱尔"、"利沃里"、"埃斯多利"这样有权有势者光顾的餐厅,也有"贝林格豪森"这样面向所有人的饭馆,那儿有龙舌兰虫,通心粉汤,里脊,美味的醉奶蛋糕,那里的罐装啤酒最凉,别处都比不上。同样在这里,随着地铁的开通,人群涌来仿佛被列车倾吐出来似的,骗子,斗牛士,失落的街区里的年轻人,这些街区从城市的荒漠一直延伸到骆驼饮水,车队休息的地方:罗萨区,由艺术

家何塞·路易斯·奎瓦斯命名。

拍尽人间的劳拉,感到自己无力拍摄下这个新现象:城市逃离人的眼睛。在劳拉这一生当中,城市的中心已几度挪移,从中心广场,马德罗和胡亚雷斯大街到洛马区和波朗科,从像巴黎一样的住宅街变成像达拉斯一样商业街的改革大道,现在城市的中心又移到了罗萨区,而它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劳拉·迪亚斯在空气中可以闻到,在眼睛里可以看到,在皮肤上可以感觉到,罪恶横行的年代,不安和饥饿,让人窒息的空气,大山的无形,星光的易逝,太阳的暗淡,化成了一座无底却也没有宝藏的矿井一般的城市中致命的沼气,没有光亮却有死亡的悬崖……

怎样才可以把激情与暴力分离开来?

国家提出的问题,首都提出的问题,是劳拉的答案:是的,终于,跟奥兰多·希门内斯见了最后一面后,劳拉·迪亚斯说:

“是的,我想我做到了把激情与暴力分离开来。”

我没有做到的是,她一边安静地从尼撒大街向里约热内卢广场走去,一边对自己说,她一路上经过奥里萨瓦大街和那些熟悉的地方,这些地方几乎可以说得上是她日常生活中的图腾——“神圣家庭”的庙宇,基安多尼冷饮店,杂货店,纸张商店,药铺,在普埃布拉大街拐角处的报摊——,我没有做到澄清那么多谜团,除了奥兰多的,今天下午我终于弄清了它的来龙去脉:他总在期盼永远不会到来的东西,等待不可等待的东西就是他的命运,他在向我求婚时想打破这种命运,但是命运——经历已变成宿命——又一次强加在人的头上。这是命呀,劳拉小声嘟囔了一句,一缕阳光裹挟住她,漫长的午后在行将逝去之际又爱上了自己的美丽,这是墨西哥谷地一个自恋的午后,她在心里重复着豪尔赫·

莫拉最喜欢的一首诗，

树木是幸福的，因为它们几乎没有知觉
顽石全然没有知觉，它就更加幸福
没有比清醒更大的悲哀
没有比活着更大的痛苦……

这首由尼加拉瓜伟大诗人鲁文·达里奥所作的“生命与希望之歌”在8月的这个黄昏雨后的洁净清澈的下午让劳拉沉浸在它的话语之中，墨西哥城此刻短暂地恢复了早已淡忘的清澈的美……

每天固定在那个时刻的雨已经下过了，就像在墨西哥人们所说的那样，“雨停了”，劳拉一边往家中走，一边在脑海里历数所有那些没有答案的谜团。确有阿尔莫尼亚·阿斯纳尔其人吗，那个隐身女人真的住在哈拉帕家中的阁楼上，抑或她只不过是个借口用来掩护加泰罗尼亚和维拉克鲁斯无政府主义者的密谋？阿尔莫尼亚·阿斯纳尔是不是年轻的奥兰多·希门内斯头脑中大胆淘气的想像？我从来没有见过阿尔莫尼亚·阿斯纳尔的尸体，劳拉突然意识到；仔细想想，这只不过是人们告诉我的。“别讨厌”，他们跟我说。她的外婆科西玛·莱特真的爱上了那个英俊、粗野的强盗，那个砍掉她的指头并让她在冥想中度过余生的“帕潘德拉美男子”吗？她的外公费利佩·克尔森是否曾经怀恋过他在德国度过的业已逝去的叛逆青春，他最后是否完全接受了在卡特马哥做富有的咖啡种植园主这样的命运？希尔达和维尔希尼亚姨妈此外还会有更好的命运吗？如果她们是在德国接受教育，没有被隔绝在墨西哥丛林一个黑暗角落，要是在杜塞尔多夫，她们俩会一个成为著名钢琴家，另外一

个成为著名作家吗？要是外婆科西玛没有断然地把玛丽亚·德·拉奥姨妈跟她母亲黑人妓女分开，让她走进克尔森家，那么她的命运就不是一个谜。劳拉自己的父亲堂费尔南多·迪亚斯的善良和正直不是一个谜，有为青年，在海湾被波菲里奥·迪亚斯的士兵杀害的第一个圣地亚哥，他的死给人带来的痛苦不是一个谜。但圣地亚哥自身却是一个谜，他出于需要的政治观点和他出于意愿的个人生活。或许后者归根结底又是奥兰多·希门内斯编造出来的神话，是为了诱惑劳拉·迪亚斯，让她辗转反侧，刺激她的想像力。在她丈夫胡安·弗朗西斯科的生命源头处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以致他在公共广场上风光二十年后，最后则无声无息地拉着粪便死去？在作为中间阶段的风光之前和之后都是空荡荡、一无所有吗？生于粪便中，死在粪便中吗？这个中间阶段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的作品，而不是一个过场吗？一无所有？包含无尽痛苦的谜团：如果她的儿子圣地亚哥活下来，如果他的天分完全显示出来，得到充分发挥；如果丹东天性中没有那份把他带向财富和堕落的野心。如果死在特拉特洛尔科的圣地亚哥第三，按照他父亲的设计走他的人生道路，是否今天还会活在世间？他的母亲阿尤布·龙戈利亚，对这一切会怎么想，对这些属于她而又与劳拉·迪亚斯共同拥有的生命，她有何想法？

哈利在反美活动委员会那里是否检举了左派同志？

尤其最重要的，豪尔赫·莫拉现况如何？活着，快死了还是已经死了？他找到上帝了吗？上帝找到他了吗？豪尔赫·莫拉费尽周折寻找精神中的善，只是因为他早已把它找到？

面对这最后一个谜团，豪尔赫·莫拉的命运，劳拉停住了思绪，她给予心上人一个特权，这一特权很快就扩展到所

有劳拉·迪亚斯生命中的主角身上:把一个秘密带进坟墓的权利。

二

当圣地亚哥第三在三文化广场遇害倒下后,劳拉认为他年轻的遗孀,劳德斯·阿尔瓦罗应该理所当然地带着他们的孩子,圣地亚哥,留在她身边,这个孩子是第四个与使徒重名的人,他是受害者痛苦和幻化的见证人:圣地亚哥们是"雷之子",是基督被希律杀害的第一个使徒的后裔,而劳拉·迪亚斯用关爱、家庭和回忆拯救了他们。

劳德斯·阿尔瓦罗一边尽着做母亲的责任,一边组织示威活动拯救 1968 年事件中的政治犯,她向特拉特洛尔科的青年寡妇们提供帮助,她们跟她一样,带着小孩,小孩子需要托儿所、药品、看护和成长——劳德斯告诉劳拉——带着对父亲的牺牲的鲜活记忆。有时候情况相反,独身的是父亲,他们的妻子,青年学生,也在特拉特洛尔科倒了下去。

就这样,10 月 2 日事件中的幸存者组织起一个团体,可以理解,在他们中间,劳德斯遇上一个年轻人,跟他成了知心朋友,并爱上了他。这个年轻人名叫赫苏斯·阿尼巴尔·普利埃哥,二十六岁,是个崭露头角的电影人,他已成功拍摄下特拉特洛尔科事件中的一些断断续续的场景,光与影的场地,流淌的鲜血,弹片的回声。那个晚上,赫苏斯·阿尼巴尔年轻的妻子也在示威的时候死去了,这个失去妻子的青年——高个子,黑皮肤,鬈发,笑容开朗,目光清澈——与几个月大的女儿,留了下来,他的女儿埃内蒂娜和劳德斯的儿子,劳拉·迪亚斯谱系的第四个圣地亚哥,上的是同一家托儿所。

“劳拉，我想跟你说句话。”劳德斯围着她丈夫的祖母转了几个礼拜之后，终于忍不住，开口说话了，尽管劳拉早已料到这一切。

“你没有必要跟我说什么，亲爱的。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什么都明白。你跟赫苏斯·阿尼巴尔再相配不过了。简直是天作之合。如果我是女神甫的话，肯定会为你们祝福的。”

令他们结合在一起的，不仅是爱情：还有工作。劳德斯在劳拉身边学到了很多东西，作为赫苏斯·阿尼巴尔的摄影助手，可以越来越多地陪伴在他身边，她想告诉奶奶劳拉，她和丈夫以及两个孩子——埃内蒂娜和圣地亚哥第四——要去洛杉矶生活，有人向赫苏斯·阿尼巴尔提供优厚的条件让他去美国拍电影，在墨西哥机会少之又少，迪亚斯·奥尔达斯政府早已把赫苏斯·阿尼巴尔拍摄的特拉特洛尔科电影没收了……

“不要再跟我解释什么了，亲爱的。要是我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就权当我明白吧。”

里约热内卢广场上的公寓空了。

圣地亚哥第四几乎没有给曾祖母留下什么深刻的记忆，说出那个名字让我心中充满骄傲、满足、慰藉和难过，让我害怕让我悲伤，让我快乐地相信，我终于摆脱了尘世的浮华——我如今是曾祖母了——同时它也让我相信，我可以让死者复活，我的死将永远陪伴每一个死去的圣地亚哥，在维拉克鲁斯被枪杀的，死在墨西哥城的，在特拉特洛尔科遇害的，还有现在移民去洛杉矶的，我的小男子汉——我忍不住要笑——我的小劳力，我再也不能用结婚时妈妈送给我的毛巾来擦干他湿湿的脊背了。

一个人生活对劳拉·迪亚斯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她手

脚勤快，从日常小事中汲取快乐，像铺床、洗衣和晾晒，让自己保持“年轻”，像她形容奥兰多的那样，去新建的超市奥雷拉采购，就像她刚结婚时去阿尔瓦罗·奥夫雷贡大街的老超市巴林一样。年老的她继承了母亲雷特西亚对烹调的爱好，恢复了那些古老的维拉克鲁斯菜谱，摩尔人和西班牙人，旧衣裳，海边的玉米粽子，夹馅海蟹，淹在自己墨汁里的墨斗鱼，在洋葱、橄榄和西红柿的大海中畅游的海鲷，浓浓的热咖啡，就像帕洛基亚咖啡馆中给客人上的一样，热咖啡降暑，堂娜雷特西亚·克尔森会这么劝告你。就好像刚刚从另外一个著名咖啡馆，哈瓦那大街的阿尔门达莱斯公园中的咖啡馆出来，有油腻的蛋黄甜食，还有劳拉去5月5号大街塞拉亚之家购买的各式各样的墨西哥甜食，双色奶糖，杏仁糖和甘薯；水晶桃子，菠萝，无花果，樱桃和山杏，她早餐吃欧芹酱辣汤，农家鸡蛋，鸡蛋饼，莴苣和鲜奶酪，分黄蛋，以及各式各样的墨西哥面包，小甜点和黑面包，还有麸皮面包，奶油酥糖饼，贝壳面包和奇林德里纳。

她把自己的照片归类，处理购买她经典作品的订单，准备书籍，同时也请新一代作家帮她写序言，包括萨尔瓦多·埃利松多，塞尔吉尔·皮托尔，埃雷纳·波尼亚托夫斯卡，马尔戈·格朗茨以及“浪潮”①的青年一代，何塞·奥古斯丁和古斯塔沃·萨因斯。迭戈·里维拉已经在1957年去世，罗德里格斯·洛萨诺，玛丽亚·伊斯捷尔多，阿方索·迈克尔这些劳拉认识并且在艺术上给了她灵感的艺术家都已作古(前者那纯净、耀目的黑白灰色构图，中间一位慧黠的天真，后者在颜色构思上给人带来的冲击)，健在的只有彼此对立的

① 六七十年代的一种时尚。

西凯罗斯上校和塔玛约[①]，前者紧握双拳，高高举起，反对这个运动的世界所歌颂的速度；而后者英俊、忧郁、沉默，头颅好像波波卡特贝特火山。已经不剩下什么可以依托。回忆与意愿仿佛都无济于事。人们一个又一个地消失，那些共享的记忆的守护者……

又是一个干爽的午后，墨西哥城的金秋此时已不再阴雨绵绵，有人敲响了劳拉的家门。她打开门，不认得眼前这个女人——首先映入她眼帘的是一袭黑衣，考究而昂贵的黑色女装，好像是要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一个本身没有引人之处的身体，她的容貌也是这样，看上去姿色平平，谁也看不出这张脸上有逝去的美丽的痕迹，就是那种所有年轻女性包括容貌丑陋的姑娘们也具备的固有的美丽。她的五官乏善可陈，面孔上却流露出一种骄傲，强烈、痛苦、顺从的骄傲，"顺从"这个字眼来自这位太太的眼睛，她一双浓眉下的眼睛里写着不安、犹豫和磨难，她突然惊叫了一声，陌生的来客低下头去，紧张地望着地板，她这一声惊叫，跟她整个人一样透露出顺从。

"我的隐形眼镜掉了。"陌生人说。

"那就赶快找呀。"劳拉笑道。

两个人都趴在地上，摸索着门口的地板，直到劳拉的食指指肚碰到那一小块丢失的湿塑料片。而她另外一只手却碰到一个遥远而熟悉的身体，她把找到的眼镜片还给马格达莱娜·阿尤布·龙戈利亚，我是丹东的妻子，劳拉·迪亚斯的儿媳，她一边直起身来，一边说道，她不敢把眼镜放在原来的位置，而劳拉则请她进门。

---

① 塔玛约(1899—1992)，墨西哥画家。30年代后从事壁画。代表作有《今日墨西哥》、《民族的诞生》等。

"啊,污染这么厉害,眼镜很快就变成咖啡色了。"新来的人说着,边说边把那一小块塑料片塞到自己的夏奈尔皮包里。

"是丹东出什么事了吗?"劳拉先问道。

马格达莱娜立刻作出一种微笑,随后她又奇怪地大笑起来,就好像这笑是一种被迫的礼仪。"您儿子……好吧,我丈夫……从来就不会出什么事,就是说,从来不会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但是,有一点您很清楚,他生来就是为了胜利……"

劳拉什么话也没说,但是她用目光询问道,你想说什么,来吧,说出来吧。

"夫人,我害怕。"

"叫我劳拉。别那么客套。"

她的客人从头到脚透露出来不确切,怀疑,从发型到鞋子,这些不必要的花销却有效地将表面遮掩了起来。必须得面对她了,告诉她自己害怕什么,害怕她的丈夫,害怕劳拉本人,害怕回忆,对叛逆的儿子,对死去的儿子,对已经移民的孙子的回忆,他已远离这个暴力凌驾于理性,更有甚者,是凌驾于激情之上的国家……

"害怕什么?"劳拉又问了一遍。

两人坐在劳拉从索诺拉大街拖来的蓝色天鹅绒沙发上,但马格达莱娜却在环顾四周凌乱的房间,堆积如山的报纸、杂志、纸片、剪报和用图钉钉在软木垫上的照片。劳拉明白她是在第一次打量她儿子走出去就义的房间。她还久久凝视着由小圣地亚哥所画的亚当和夏娃的画。

"您得知道,堂娜劳拉。"

"管我叫劳拉,要说你,看在上帝分上。"劳拉假嗔道。

"好吧,你得知道,你得知道,我不是表面看起来的样

子。我不是你认为的那个样子。我崇拜你。"

"或许你本应该更爱更崇拜一点你的儿子。"劳拉很平静地说。

"这正是你应该知道的事。"

"知道?"劳拉怀疑地问道。

"你有理由怀疑我。不要紧。如果我不跟你讲出真话,那就再也没有别人了。"

劳拉没说话,却用专注和尊重的目光看着她的儿媳。

"你想像得到当他们杀了圣地亚哥时,我的感受是怎样的吗?"马格达问道。

劳拉感到有一道闪电劈过她的脸颊。"你儿子的鲜血还没有干,我就看到你和丹东坐在奥运会的总统看台里。"

马格达莱娜的目光中带着哀求。

"请你考虑一下我的痛苦,劳拉,我的羞耻,愤怒,和我得如何压抑住这种愤怒,听命于我丈夫这个习惯战胜了我的痛苦,我的愤怒,最终我是如何落得跟以往一样,顺从我的丈夫……"

她正视着劳拉。

"你得知道。"

"我从前一直想搞清楚圣地亚哥死时,你和丹东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劳拉揣摩着。

"这才是最要命的。什么也没发生。他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继续过他的日子。"

"你儿子死了,你活着。"

"我早在儿子死之前就已经死了。对丹东而言,什么也没有改变。至少在圣地亚哥反叛他时,他就已经失望了。他死的时候,丹东就差说一句'他是自己找死'。"

丹东的妻子晃动着双手,就好像要撕扯开一层面纱。

“劳拉,我来这里是为了把自己展示在你面前。我再没有别人了。我再也受不了了。我需要在你面前敞开自己。我只剩下你了。只有你才能理解这一切,我所受的伤害,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啃咬我的失望和痛苦。”

“你承受住了。”

“你不要以为这里面没有骄傲,不管你认为我有多么顺从,但是请你相信我从来没有丧失为自己感到的骄傲,我是女人,我是妻子,我是母亲,我为自己是这些而骄傲,虽然已经有很多年丹东在床上碰都不碰我一下,劳拉,请你相信,就因为这我才感到愤怒,在顺从和生活中的种种秘密之外我仍感到骄傲。”

她停顿了片刻。

“我不是表面看起来的样子。”她又开口道。“我以为只有你才会理解我。”

“为什么,孩子?”劳拉抚摸着马格达的手。

“因为你活得自由自在。所以你可以理解我。我很简单。”

劳拉差点对她说,对你说,我现在还能为你做什么呢?现在大幕就要落下,跟奥兰多一样,为什么所有人都期盼我给他们的作品写下最后一幕呢?

但是,她托起马格达莱娜的下巴,问道,“你觉得自己生命里有哪一个瞬间是完全由你,只靠你自己来承受生活中的责任吗?”

“我没有,”马格达莱娜急忙说道,“但是你有。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劳拉·迪亚斯微笑了一下。“我不是问你,马格达,我是在问自己。我求你问我一个问题。问我,马格达莱娜。你自己,总是处在你自己要求的高度吗?”

“不不，我没有。”马格达莱娜结结巴巴地说道。“当然没有。”

“不，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劳拉说，“请你问我这个问题。”

马格达莱娜发出几个含混的词，你自己，劳拉·迪亚斯，你总是能达到自己的要求吗……

“还有别人的要求。”劳拉继续说道。

“还有别人的要求。”马格达的两眼放出光芒，她在思索。

“你从来没有受到诱惑吗？你从来没有想过只做一个体面的太太？你从来没想过这两样东西可能相生相伴，做体面的太太，和因此同时做一个堕落的太太？”劳拉接下去说道。

她停顿了片刻。

“你丈夫，我的儿子，他代表欺诈的胜利。”

劳拉不想留什么情面。马格达做出一种作呕的表情。“他总是以为别人的生活都得依靠他。我跟你发誓，我恨他，鄙视他。对不起。”

劳拉把马格达的头靠在自己胸前。“你从来没有想过你儿子的牺牲替丹东赎清了他所有罪过吗？”

马格达离开劳拉的臂弯，迷惑地看着她。

“你得明白这一点，我的孩子。如果你不理解，那么你儿子就白死了。”

圣地亚哥，这个儿子为父亲丹东赎清了罪过。马格达抬起头，目光里带着疲惫、恐惧和拒绝的混合，她的目光与劳拉的目光汇合，但这位七十二岁的女人，不是那个寡妇，不是母亲，也不是祖母，只是叫作劳拉·迪亚斯的女人，在窗前看着她的儿媳马格达莱娜·阿尤布在街上越走越远，看见

她拦住一辆出租车,她回头看了一眼窗子,劳拉正站在那里带着无尽的柔情与她道别,在恳求她:要明白我跟你说的话,我不要你的忍耐,我要的是你的勇气、果敢,对一个男人出人意料的胜利,他从自己的女人身上期待一切,除了大度的谅解。

在马格达登上出租车之前,劳拉看见了她笑盈盈的目光。可能下次她再来时,会坐着自己的汽车,带着自己的司机,不必再躲闪她的丈夫。

第二十五章　卡特马哥:1972 年

她乘坐的是从前许多次把她送回维拉克鲁斯的洋际列车。正如许多过去的东西一样,这昔日驰骋于墨西哥首都、哈拉帕和港口之间的豪华列车如今变得狭促,而且显然也老旧了。布料磨损,座椅塌陷,弹簧支楞出来,玻璃混浊,椅背上污迹斑斑,厕所堵塞。劳拉决定乘坐普尔曼式车厢里的私人包厢,这种包厢远离卧铺车厢其余部分,那些地方在白天只是座位,而到了晚间,就会从上方奇迹般落下一张床来,上面已铺好雪白的枕头和新洗的床单,床单上罩着一张绿色的绒毯。同时,座位也变成床铺,到了就寝时分,旅客们身上可以盖上一床钉着铜纽扣的厚厚的羊毛毯。

与此不同,劳拉乘坐的包厢保持着一种"俗气的高雅",奥兰多·希门内斯也许会这样品评。包厢里摆着雕花镜子,洗手池的龙头是镀金的,就像"幻境画"里一样(奥兰多语),还有一个让其余一切黯然失色的古董:银质痰盂,跟她婚后第一个家里使用的那些一样,那是在胡安·弗朗西斯科与工人领袖们会面的年代里。不管怎样,这个私人包厢沉浸在一种对逝去的荣光的感伤之中。这列火车连接的是国家的首都和重港,这天晚上它连接的是劳拉和她终于可以回归故里的激动。而回归的代价,这是问题之所在,墨西哥国家铁路局印制的车票上并没有指出。

她睡了整整一夜。哈拉帕在不知不觉间就过去了,通

往圣卡耶塔诺庄园的路上野草萋萋。与此相反，晨曦中的港口用扑面的清新迎接她的到来，这清新中业已夹杂着一丝白天的暑热（这是她喜欢的）——又将是阳光灿烂的一天。但是，她却不想过多地对一个地方眷恋怀旧，这个地方给她带来太多少女时代的回忆，那时她牵着第一位圣地亚哥的手沿着防波堤漫步，那葬在波涛中的兄长。

住在皇家酒店高高的顶层上，她更喜欢欣赏海湾水天交际处的变换，那里最明朗的天空可能蕴涵着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一种“北方”的感觉，大雨，狂风……傍晚她下到广场上，独自一人坐在门廊里一张小桌子旁边，她从没有觉得自己处在这么多人的陪伴之下——这就是维拉克鲁斯的夜晚给我们带来的惬意——在鼎沸的人声中，在人群里，伙计们端着漆盘穿梭往来，盘子里放着啤酒，库巴酒，莫霍酒，还有里面浸着一簇薄荷的维拉克鲁斯式薄荷酒。

全国各地的音乐——北方的大鼓，西部的马里亚切，首都的三人博莱罗，尤卡坦的哈拉纳，卡帕内卡的木琴以及维拉克鲁斯竖琴和比韦拉琴各显其能，响成一团，只有在市政府前的跳舞场开始后，才能让这一切收敛起来，安静下来，这时丹松舞曲召唤最受人尊敬的舞伴们起舞，这种舞蹈只有脚下动作，但同时身体的其余部分呈现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性感，仿佛膝盖下面一个最细微的动作都可以使膝盖上面释放出诱人的魅力。

玛丽亚·德·拉奥姨妈在她生命中最后的日子里曾来这里跳舞，她当时已经同著名的马提亚·马塔达马斯结婚，这个人肯定是个病恹恹、为人冷淡而且从头到脚一身蓝的小老头儿——头发和皮肤，西装和领带，皮鞋和袜子——跟此刻这个看到劳拉独身一人，就过来邀请她加入到丹松舞曲“内雷伊达斯”节奏中去的小老头儿一样。他邀请她时一个

字也没有说，跳舞时，他也一语不发，而她在跳丹松舞时，却偷偷地问自己，我失去了什么，我又得到了什么？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吗？我怎么来衡量我生命的长度？仅仅凭借那些来自从前、此刻仿佛正在对我诉说的声音吗？我应该感谢再没有人会为我哭泣吗？我应该为再没有什么人可以失去而感到痛苦吗？想到这些就足以证实，劳拉·迪亚斯，你真的老了吗？我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灰蓝色的小老头儿把她恭恭敬敬地送回桌子边。他一只眼睛在流泪，而且一直板着脸，但在跳舞时，他却知晓如何用目光、节奏来抚摸女人的身体，他一只手紧紧握着劳拉的手，另一只手紧紧贴着她的腰部。男人和女人。丹松舞之所以是最性感的舞蹈是因为它把遥远转化成贴近，而同时又没有失去距离。

除了这天晚上，出发顺着公路回到卡特马哥的前夜，劳拉还会再次听到并跳起丹松舞内雷伊达斯吗？她乘坐皇家酒店的出租车，到了湖边下车之后就让司机返回维拉克鲁斯。

"难道不让我等您吗？"

"谢谢。不必了。"

"您的行李怎么办，夫人？我怎么跟酒店的人说呢？"

"让他们替我保管一下。再见。"

从远处看，她觉得卡特马哥的家已有所不同，好像别离让一切都变得更小，但同时也更长更狭窄似的。并且回到过去就像走进一条空旷而没有尽头的走廊，在里面已经再也不会见到我们心中盼望再次见到的熟悉的人和物。好像他们就是以这种方式戏弄我们的记忆和想像力一样，过去的人和物向我们要求把他们放在现在，而又不要忘记他们的过去，同时他们也有未来，即使这未来只不过是记忆在当

下的重现。

然而谈及陪伴死神，生命中有效的时间究竟有多久？唉，劳拉叹息一声，大概需要重温她生命中走过的所有的和每一个年头，回忆，想像，乃至补充上并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甚至是无法想像的事情，这一切仅仅凭借一个人的存在，这个人代表着一切不曾发生，一切曾经发生，或者一切本应发生，一切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

今天，这个人是她，劳拉·迪亚斯。

自从特奥多罗·塞萨尔曼医生给她确诊说，在最好的照料下，癌症也只会给她留下一年的时间，劳拉就决定尽早回到她出生的地方，所以，1972 年 5 月这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她爬上通往克尔森家老屋的小山包，这栋老屋已荒废了四十年，外祖父堂费利佩去世之后，三个单身姨妈靠庄园和土地的田租为生，费尔南多·迪亚斯生病后，他在哈拉帕的家人靠劳拉·迪亚斯的母亲堂娜雷特西亚·克尔森的辛勤操持支撑，“女朝圣者”庄园的土地被没收后，母亲决定战胜家族的体面，把家里的房屋出租给客人，“条件是必须是我们认识的人”。

劳拉想到父母对那所谓“体面”的渴望，不由得微笑了一下，同时她也准备用这个微笑来面对古老的单层咖啡种植园的废墟，它那粉刷过的四面外墙，记得劳拉小时候总在中央庭院里玩耍，她身前身后通向卧室、客厅和餐厅的门不时开关，而现在劳拉从外面远远看去，外墙把里面的一切都遮蔽得严严实实。一种莫名的羞愧令劳拉在走向故园的路上止住脚步，好像在步入废弃的家园前，她的灵魂需要重新接触路上万紫千红的大自然，无花果树和西印度郁金香，红色百合，长着红色树干和圆圆树冠的芒果树。

她小心翼翼地打开大门，然后闭上眼睛，沿着一条想像

中的走廊向前摸索，等待听到扭曲的门发出呻吟声，生病的合叶发出吱吱嘎嘎，经年的灰尘落下来……为什么要去面对家的废墟呢？那就如同面对她自己遗落的童年一样，尽管劳拉此时闭着眼睛，尽管她已经七十四岁，但她仍可以听到黑人桑帕亚拿着笤帚打扫院落的声音，他一边打扫一边哼着"黑人桑帕亚，跳呀跳起舞，跳起舞来不打嗝儿"，也想起自己在过生日时一大早就爬起来，还套着睡衣就在院子里蹦蹦跳跳，边跳边唱"5 月 12 号，圣母出门早，一身雪白袍，短衣外面罩"，她还听到此刻从客厅中传过来一支肖邦小夜曲悲伤的旋律，客厅里，希尔达姨妈正梦想着在德国自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钢琴家，她听到维尔希尼亚姨妈正在朗诵鲁文·达里奥的诗句，她在梦想成为名噪首都的伟大诗人，她还闻到厨房里饭菜飘香，负责厨房的母亲雷特西亚心中没有对丈夫的思念，她正在等待堂费利佩干完田里的活儿归来，他勤劳而律己，早已忘记了那个狂热的德国社会主义青年的梦想，还有外婆科西玛，她坐在摇椅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或许正在梦见勇敢的"帕潘德拉美男子"……

就这样，劳拉·迪亚斯闭着眼睛摸索前进，她相信方向感会把她带到自己小时候的房间，让她打开朝向院子的房门，走近床边，摸到床沿，坐下来伸长手臂摸到圈在大枕头中间的娃娃，她正幸福地卧在东方公主的榻上，李白，她宠爱的娃娃，脑袋、手和脚都是细瓷做成的娃娃，棉花做的身体上罩着红色丝绸做的中国式衣服，眉毛紧贴着丝编的刘海儿描画而成……劳拉睁开眼睛，发现娃娃真的就在眼前，躺在枕头中间，在等待劳拉把她抱在怀中，揉搓她，跟以前一样，从来也没改变，让劳拉转动她细瓷做成的头部，张开或合上她的双眼，她的眉毛皱也不皱，眉毛下的眼睑平静而满怀期待。李白没有老。

劳拉·迪亚斯几乎要感动得喊出声来，她把李白抱在怀里，环视她儿时的房间，发现屋子里面一尘不染，还是从前那个脸盆，儿时的衣橱，用细铜棍儿支起来的白纱窗帘。但李白本来是留在了弗里达·卡罗的家里。是谁把她带回卡特马哥的呢？

她打开自己的房门，来到打扫得干干净净，种满向日葵的院子里，她跑到客厅里，发现外公外婆的柳编家具，放着大理石桌面的桃花心木桌子，从新奥尔良带回来的灯罩，摆放着瓷质牧羊女的玻璃橱，还有画着同一个小流浪儿的两幅画，在第一幅画上小孩儿拿着小棍儿去捅一条正在睡觉的狗，第二幅画上，狗醒了，一口咬在小孩儿的屁股上，小淘气疼得大哭……

她快步朝餐厅跑去，心里已经料到会在那里看到什么，摆好的桌子，浆洗过的巨大的白桌布，摆得整整齐齐的椅子，一边三张，放在老堂费利佩惯常使用的沙发椅两侧，每个座位前都整整齐齐地摆着一套德累斯顿牌餐具，刀叉和勺子都是按顺序摆好的，在每一个餐盘右侧，都有一卷塞在银环里的餐巾，每一个银环上面都写着用餐人的名字，费利佩、科西玛、希尔达、维尔希尼亚、雷特西亚、玛丽亚·德·拉奥、劳拉……

在科西玛的盘子里摆着四件首饰，一个金环，一个蓝宝石戒指，一个珍珠戒指……

“梦，”劳拉·迪亚斯对自己说，“我在做梦，或者我已经死了，而我自己不知道。”

房门被人猛地推开了，出现了一个男人，打断了她的思路，这个男人皮肤黝黑，大胡子，穿着靴子，卡其布的长裤，衬衫被汗水湿透了。他手里提着枪，头上系着一条红头巾，是用来吸汗的。

“对不起，夫人，”他嗓音很柔和，说话时没有 S 音，是维拉克鲁斯口音，“但这里是私人住所，应该征得允许……”

“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劳拉·迪亚斯答道，“我在这里长大。我想再看看它，赶在……”

“主人不想有人擅自闯进来，对不起，夫人。”

“主人？”

“当然，夫人您瞧，他费了多少心思才把房子给修好，这里从前是废墟，尽管听人说，这所房子以前是卡特马哥最有名的庄园。后来主人来了，把它修理得焕然一新。他花了差不多五年时间才把这些东西敛起来，他说他希望看到房子跟一百年前一模一样，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主人？”劳拉追问道。

“当然，我的主人。堂丹东是这所房子的主人，从这里一直到湖边的土地也归他所有……”

劳拉迟疑了片刻，想是带李白走呢，还是让她舒舒服服地待在床上，围在枕头里。她看到李白那么心满意足，那么喜欢待在旧日的床上……她又环顾了一下往日的纪念，客厅、餐厅、银环……

“休息吧，李白，睡吧，好好过你的幸福日子。我会永远照看你。”

院子里，年轻的护院远远地看着她，就好像认识她很久了似的。随后，她来到田野上，她心中想，不管土地有多广阔，到头来分给我们每个人的不过是一小块儿，作为我们曾经在大地上生存过一段时间的结果。但是，这个 5 月的下午，她前所未有地感激完美对称的南美杉树，它枝条上的每一个幼芽，都会随即长成与旧枝一模一样的枝条，我自己也会像这样衍生吗？我自己会成为另一个劳拉·迪亚斯，第二个劳拉·迪亚斯吗？不是在我本身，而是在我的子孙和祖先

中,在我来源之处的人们中,在我留在世上的人们中,我正在走向的那些人和我留在身后的人,这世界就像一棵南美杉,在每朵花上都孕育出一个新的花朵;愿这花朵不怕风吹雨打,愿开着黄花的雷电保护它躲过雷击;世界就像这棵既可以抵挡住火山,又可以忍受干旱的神奇的树一样吗?

她走进丛林。心中的念头随着树丛的分开纷至沓来。她身上背负着沉甸甸的生命,自己的还有别人的,那些陪伴她给她带来喜悦或苦痛的生命;所以,她的生命不会结束,劳拉·迪亚斯的生命不会结束,因为我的生命中并非只有我自己,它是许多条线,很多代人,真正的历史,它是活过的生命,但它更是想像出来的;我只是那个爱哭的、痛苦的、服丧的人吗?不,我不承认是这样,我一向昂首挺胸,我从来不乞求,我往前走,试图衡量生命的距离,凭借那些来自从前、此刻仿佛与我相伴的声音,凭借写在七个餐巾银环上面的名字,凭借四个圣地亚哥的名字,凭借我生命中四个男人的名字,奥兰多和胡安·弗朗西斯科,豪尔赫和哈利,我不会是痛苦的人,不会是爱哭的人,我还会挺直腰杆走路,虽然我谦卑地承认自己永远不会是自然的主人,因为自然比我们的生命更长久,她要求我们不当她的主人,而是她的一部分,回归自然,把历史、时间以及时间的痛苦留在身后,不要再幻想我们是什么事物或什么人的主人,哪怕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爱,劳拉·迪亚斯只是我们的艺术的主人,是我们从自己的身体出发所能给予他人的一切的主人,劳拉·迪亚斯的身体,短暂易逝而有限的身体……

她想起了哥哥圣地亚哥的愿望,他想迷失在丛林当中,正像最后他迷失在大海里一样。

她要完成圣地亚哥第一的心愿。她会变成丛林正像他变成了大海。

她走进丛林，就像走入一个真空一样，再也不会有什么音讯传回。

外公费利佩·克尔森的目光和话语陪伴着她，哪个生命真正结束了呢？哪个生命不是一个未竟的诺言，不是暗藏着别的可能？

她想起外公去世的那一天，劳拉拿起他青筋暴起，长满老茧的手，抚摸他几经磨损，几近透明的皮肤，她感受到，我们每个人都在为别人而生：我们的存在无非是为了完成那些未竟的命运……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孩子？总有一天，小毛病会赶在一块儿来找我的麻烦，就像现在这样……但是我想在走以前，承认你是对的。是的，在树林里是有一个身上挂满珠宝的女人像。我是故意要骗你的。我不想让你堕入迷信和巫术当中，小劳拉。我带你去看一棵木棉树，是要让你学会靠理性来生活，而不要靠幻想和激情，我年轻时，为此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做什么事都要小心。木棉树上长满了刺，像匕首一样锋利，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外公……”

丛林闪现出来，像她自己的呼吸一样高，像她自己的心跳一样深沉。

林中的道路分开了。

路的一边通往石头女人，腰束蜗牛和毒蛇的土著女人的雕像，她头戴被大自然染成绿色的王冠，胳膊、鼻子和耳朵上缀满项链、戒指和耳环……

另一边通往木棉树，原始丛林的女王，她的王冠是周身上下像伤人的匕首一样宽阔的刺，她巨大的黑色身躯没有年龄，一动不动，但却满怀思念，她的枝条像手臂一样张开，等待着长满匕首的巨大身躯能够并且愿意给予的致命的

亲热。

劳拉·迪亚斯用她剩余的所有力量紧紧拥抱住木棉母亲,保护神,真空的女王,从那里再也不会有什么音讯传回。

第二十六章　洛杉矶:2000 年

底特律受袭事件过去一年后,上面委派我去拍摄一部有关洛杉矶的片子。这一次,我的爱好和职业奇迹般地结合在一起:1930 年大卫·阿尔法罗·西凯罗斯在奥尔维拉大街创作过一幅壁画,这一次我要去一展复原壁画的风采。

这条特色街道是英裔美国人的发明,是为了对“赦罪天使之圣母镇”的西班牙历史表示敬意,这座城市是 1769 年由一个想寻找地点传播天主教福音的西班牙探险队建立的,这些英裔美国人也是为了——当我们在坡莫纳高速公路上以每小时十二公里的速度爬行时,埃内蒂娜·普利埃哥对我说——给自己寻找一个浪漫的过去,并求得眼前对墨西哥人良心上的平安,这些墨西哥人并非住在风景优美的奥尔维拉大街上,而是住在东洛杉矶的街巷之中,这一百多万有或没有证件的墨西哥人每天都坐着公共汽车或马车前往西洛杉矶街区,去照料那里的草地和玫瑰花丛。

“从前我的爷爷追随萨帕塔在莫雷洛斯纵马驰骋,”从坡莫纳开始就一直坐在我们汽车里的老园丁对埃内蒂娜和我说道,“现在我坐着公共汽车从威特尔到威尔郡。”

老人哈哈大笑,他说现在加利福利亚洛杉矶是他工作的地点,而奥科泰佩克·莫雷洛斯是他度假的地方,他往那儿寄美金,回去休息,探望家人。

埃内蒂娜和我彼此看了一眼,也随着老人笑了起来。

我们三个人都是洛杉矶人，但我们说起话来却好像城市里陌生的来客，就像此刻正穿越两个加利福尼亚之间的边界，翻过竖立在圣迭戈与蒂胡安纳之间的界墙来到这里的新移民一样。我只不过离开这所城市一年的光景，大家就都以为我已经一去不返了，包括我的女朋友埃内蒂娜，因为这里的规矩就是这样，你刚刚来到就已经准备离去，或者已经离去，你永远是一个过客，这话不对，埃内蒂娜和我心里想，我们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和墨西哥人早于任何人来到这里，我们不仅没有消失，相反，随着一浪一浪的移民潮，我们的人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墨西哥人来到洛杉矶就好像重归故里……仅仅在刚过去的这个世纪，来到这里的人就包括逃避波菲里奥·迪亚斯独裁的人，躲避革命的人，随后是卡列斯当政期间反对废除教会的人，元首卡列斯的敌人，随后是被卡德纳斯驱逐的卡列斯本人，再往后则是为军队服务的壮丁，到后来是高呼着“我们来了”的帕丘卡人，他们都是穷人，这些穷人创造了城市的财富和艺术，来自墨西哥的穷苦人在这里干活，办起小公司积聚财富，来自墨西哥的文盲在这里上了学堂，并把内心深处带来的东西翻译出来，舞蹈、诗歌、音乐、小说：我们驻足在一幅巨大的石墨壁画前，壁画中的象征形象几经捣毁又毁之不去，瓜达鲁佩圣母，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爱打扮的骷髅”，今天的蒙面客马尔科斯，昨日的蒙面客佐罗，大盗穆里埃塔，还有传教士胡尼佩罗·塞拉神父……

“他们没能抹杀西凯罗斯。”我一边慢慢地开着车，一边笑着说，我心中坚信，在洛杉矶驾驶汽车相当于“翻阅城市的本来面目”。

“你能想像，要是他的‘施主’看到你我将要看到的东西会怎样气急败坏吗？”埃内蒂娜思忖，她就是三岁时跟随鳏

夫父亲，摄影师赫苏斯·阿尼巴尔·普利埃哥来到洛杉矶的小女孩，她的父亲娶了劳德斯·阿尔瓦罗，这两个人都在特拉特洛尔科事件中失去了伴侣，都带着孩子，他们各自的孩子，埃内蒂娜和我，从小就是伙伴和朋友，现在是一对恋人。

洛杉矶变成了一幅巨大的墨西哥壁画，就像树立起来的一座彩色大堤，以免此刻从金门桥的小山上望去尽收我们三人眼底的加利福尼亚州随着一次终极震颤，整个从山上滑落到大洋里面……离去。回归。或者初次来到。从山上可以远眺笼罩在污染之中的太平洋，在山脚下，雾气中，城市延展开来，它没有中心，多人种杂居，里面的人们操着各种语言，是移民而来的通天塔，太平洋岸边的君士坦丁堡，是急剧滑向虚空的整个大陆与虚空间的交界……

再过去什么也不会有了。大陆在这里终结。从纽约开始是第一座城市，在洛杉矶结束，它是第二座，可能也是最后一座城市。已经没有空间可以征服。现在只能去月球或者尼加拉瓜，去火星或越南。拓荒者们开拓出来的土地到了尽头，扩张的史诗已经完结，贪婪、上天赋予的使命、博爱、拯救世界的迫切，否认别人本来的命运，出于自己的利益强加给人一个美国的未来，这一切都已随风而去……

当我沿着为现代世界里的兔子设计的公路缓缓前行时，这一切在我脑子里盘桓。我看到了柏油和混凝土，同时也看到发展，建设，待售的彩票，加油站，快餐店，大型影院，洛杉矶这座巨大城市巴罗克式的漩涡，然而在劳拉·迪亚斯的曾孙，年轻的摄影师，也就是我的脑海中却叠加上与眼前的城市不同的影像，一条热带河流在咆哮声中奔入大海，雷鸟划过墨西哥的丛林，沙尘之星在如同瞬间的世纪里逐渐消散，一个贫穷落魄的世界，死神在埃斯贡迪多港一个深深的蒸汽浴池中清洗血迹斑斑的双手，我就是在那里被我的

父亲圣地亚哥第三和此刻还健在的我的母亲，劳德斯·阿尔瓦罗孕育出来的……丛林中的一棵木棉树。

我晃晃脑袋驱散这些影像，让注意力重新集中在我自己的计划上（就是因为这一计划，我才重返洛杉矶），重新用理性的眼睛观看潮水般涌来的加州拜占庭印象。我在编纂一本书，一本关于墨西哥壁画家在美国的摄影集，此前我已在达特茅斯和坡莫纳拍下奥罗斯科留下的壁画，在纽约码头上的洛克菲勒中心和新学院里找到迭戈·里维拉一度被禁的作品，洛杉矶是我长大的地方，1970 年我的母亲和她后来的丈夫，赫苏斯·阿尼巴尔及其女儿，埃内蒂娜，在经历叫作特拉特洛尔科的又一次创伤后，离开了墨西哥，现在我回到洛杉矶，来拍摄西凯罗斯七十年前在奥尔维拉大街留下的壁画。

“奥尔维拉大街，”埃内蒂娜故作深沉地叹道，“典型的托托纳卡热带迪斯尼乐园。”

有一点引起了我的深思：在美国的墨西哥壁画时常会成为审查、争论、查封的对象。艺术家们仅仅是一些不安分分子，而老板们是一群懦夫吗？老板们如果知道里维拉、奥罗斯科或西凯罗斯不会创作他们喜欢的传统装饰性壁画，心地还会那么平静吗？纽约、底特律和洛杉矶的美国梅迪奇[①]们——他们昏聩、慷慨又吝啬——可能以为（这是埃内蒂娜的看法），订制购买一件艺术品就足以化去艺术家批判的目的，让艺术作品无害，可以把经过阉割的作品算作慈善事业，成为他们不用付税的财富。

老园丁感谢我们让他搭了顺风车，他在威尔郡下了车，准备再搭一段车到布兰特武德。埃内蒂娜和我祝他好运。

① 梅迪齐家族是 15 世纪统治佛罗伦萨的家族，著名的文艺保护人。

“别忘了，”这位奥科泰佩克的老街坊笑着对我们说，“要是你们知道有哪家花园需要人修整，就请告诉我一声，我乐意效劳。你们自己有没有花园？”我们继续朝奥尔维拉大街方向行去。西凯罗斯在露天所作的壁画，足足看了好几分钟，这幅壁画画在一栋三层楼房高高的外墙上。它在封闭沉寂了后，终于重见天日。1930 年一个加州富太太听人说起“墨西哥的文艺复兴”，当时里维拉在底特律，奥罗斯科在达特茅斯，两人都有事在身，所以她就找到西凯罗斯，签合同预订了这幅画，她还向他询问作品的主题是什么。

“热带美洲。”壁画家毫不迟疑地回答，他长着一头拳曲的、乱蓬蓬的黑发，炯炯有神的绿眼睛，巨大的鼻翼，他说话时很奇怪地不太连贯，因为他经常犹豫，说话的时候夹杂很多口头语。

听了西凯罗斯的话，富太太眼前浮现出一幅绝妙的景象，棕榈树和夕阳，翩翩起舞的伦巴舞女和英俊的骑手，红色的屋顶和美丽的仙人掌。她签好支票，同意了。

落成那天，古老的广场上挤满权贵和上流社会人士，当“热带美洲”上覆盖的帘幕揭掉之后，一个黑色皮肤，沦为奴隶、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出现在壁画上，他象征的是拉丁美洲。一个身负十字架，赤裸、痛苦的拉丁美洲，他身后的十字架上，栖息着一只虎视眈眈的恶鹰，正是美国国徽上的那一只……

富太太当场晕厥过去，官员们暴跳如雷，西凯罗斯竟然把洛杉矶置于地狱之中，第二天早晨，壁画上就给严严实实地涂上石灰，被腰斩了，就像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空空如也。空空如也。

在新千年的第一年的这天下午，看到壁画在本来的位置上重见天日，埃内蒂娜比我更加激动。我的绿色眼睛、橄

榄色皮肤的姑娘抬起胳膊，把长发拢在脑后，把它编成一条紧紧的发辫，就像一根避雷针一样，用它来传递她的情感。正如她后来对我所说的那样，这幅作品的重见天日就像她本人，埃内蒂娜的重见天日一样，它是奇卡诺人身份的证明[①]，他们既属于墨西哥又属于美国。再也不需要遮遮掩掩，再也不需要伪装，这片土地属于所有人，属于所有种族，所有语言，所有历史。这是它的命运，因为这就是它的根源。

我全神贯注地为壁画拍照，心头兴奋异常，因为终于有一次我的工作和个人计划契合在一起，我打算编纂一部有关美国建筑物上的墨西哥壁画的书，这本书差点夭折于底特律，因为当我从美术学院出来时遭到偷袭，就是在美术学院里，当我拍摄里维拉的工业题材壁画时，我发现了一张女人的脸，她是我的，我的血亲，我的记忆，她是劳拉·迪亚斯，我在特拉特洛尔科遇害的父亲的祖母，她是另一位圣地亚哥的母亲，这一位圣地亚哥虽然没有完成他的抱负，但却很可能把他头脑中的艺术传给了他的侄儿，她是圣地亚哥第一的妹妹，这位圣地亚哥在维拉克鲁斯被枪杀，尸身送还给墨西哥湾的浪涛。

现在，在这里，在洛杉矶，在美国的通天塔，太平洋岸边的拜占庭，新世纪的乌托邦，我就要完成一本书，一本关于我先人的艺术和我的家人的书，一段埃内蒂娜和我决定称为“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的历史。

“还有别的话要说吗？”那天晚上埃内蒂娜问我，我们两个拥在一起，赤身裸体地躺在家中的床上，我们的家位于圣

---

① chicano，指墨裔美国人，他们主张捍卫自身作为少数族群的社会、工作、文化、语言诸方面的权益。

莫尼卡，在家中听得见大海潮声。

是的，毫无疑问，总还有别的话要说，埃内蒂娜和我从小亲如兄妹，但我们是赤诚的恋人，两个人都深深爱着对方，不要任何解释，自从我们童年时来到加州开始，我们一块儿长大，一块儿上学，我们一块儿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书，我们两个都疯狂地喜欢那里开设的哲学和历史课，墨西哥革命，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拉美工人运动，西班牙内战，燔祭，美国麦卡锡主义，学习奥尔特加·加塞特的著作，爱德蒙多·胡塞尔，卡尔·马克思，斐迪南·德·拉萨尔，爱森斯坦电影中对墨西哥的看法，列尼·里芬施塔尔眼中希特勒的荣耀，以及阿兰·雷乃[1]眼中的奥斯威辛，“夜和雾”，重新翻看罗伯特·卡帕，卡蒂埃-布勒松，维吉[2]，安德烈·柯特兹[3]，罗钦可[4]和阿尔瓦雷斯·布拉沃的摄影作品，所有这些共同的学习，以及相同的爱好和准则浇灌了我们的爱情之花，当她得知我在底特律受到袭击后，马上飞到那里，在病床前陪伴我。

交谈。

我得了脑震荡，终日沉浸在梦境中，我必须卧床，等待一条断腿恢复功能，后来在我断腿功能慢慢恢复之际，我却没有丧失对梦境的记忆。

交谈。

跟埃内蒂娜交谈，尽可能地回忆，回忆不起来的就编造，把记忆和想像自由自在地糅和在一起，我们知道的，人

---

① 阿兰·雷乃(1922—)，法国导演，“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作品有《广岛之恋》等。

② 维吉(1899—1969)，澳大利亚摄影家。

③ 安德烈·柯特兹(1884—1985)，匈牙利摄影家。

④ 罗钦可(1881—1956)，苏联画家、摄影家。

们讲给我们听的，劳拉·迪亚斯的先人和子孙所知道的和梦想的，我们生命中的真实和可能，费利佩·克尔森和科西玛·莱特的谱系，希尔达，维尔希尼亚，玛利亚·德·拉奥和雷特西亚姐妹，雷特西亚妈妈和她的丈夫费尔南多·迪亚斯，费尔南多的大儿子圣地亚哥第一，劳拉在圣卡耶塔诺庄园参加的第一次舞会，和胡安·弗朗西斯科的婚姻，丹东和圣地亚哥第二的出世，与奥兰多·希门内斯以及豪尔赫·莫拉的爱情，对哈利·杰夫的虔诚，圣地亚哥第三在特拉特洛尔科的遇害，劳拉·迪亚斯，女儿、妻子、情人、母亲的解放，痛苦和光荣：埃内蒂娜和我记起这一切，我们记不得的就靠想像，我们想像不到的就舍弃，认为它配不上一个为无法分离的“是”或“不是”的可能性而存在的生命，生命中既然选择了一条道路，就要牺牲另外的道路，心中一直牢记没有什么可以完全被占有，真理或错误，知识或记忆都概莫能外，因为我们来自不完整却深切的爱，来自深切却不完整的记忆，我们继承的东西不可能多过祖先传给我们的，共同的过去和对未来的期望，此刻都统一在现实当中，凭借的是记忆，是愿望，是智慧，明白爱之生生不息的智慧。此刻的记忆神化了昨日的记忆，即使这是一种变形。今朝的想像就是昨日和明天的真实。

“所以你在死去的父亲脚上所拴的卡片上写下你自己的名字，圣地亚哥第三，1944—1968？”

“是的。我觉得自己跟他们一起死去，他们就能继续在我身上活着。”

在床上，埃内蒂娜和圣地亚哥长久地凝视着亚当和夏娃从天堂中飞升而非堕落的画，画中这第一对情侣赤身裸体，主宰着自己的欲望，这幅画是圣地亚哥第二，小圣地亚哥在死前所作，劳拉·迪亚斯在遗嘱中把它传给了最后一对

情侣,圣地亚哥和埃内蒂娜。

“我爱你,圣地亚哥。”

“我也爱你,埃内蒂娜。”

“我非常爱劳拉·迪亚斯。”

“我们两个可以携手再现她的生命,这真好。”

“她的岁月。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
作者=（墨）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著
页数=580
SS号=11685670
出版日期=2005年5月